

王光祈文集

中国近代外交史料译文卷

四川音乐学院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 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王光祈文集

中国近代外交史料译文卷

四川音乐学院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 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光祈文集 /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编．—成都：巴蜀书社，2009.10

ISBN 978-7-80752-458-8

Ⅰ．王…　Ⅱ．①四…②成…　Ⅲ．音乐—文集　Ⅳ．J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7591 号

王光祈文集　　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　编

策划编辑　黄云生
责任编辑　黄云生　谭晓红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60mm×185mm
印　　张　168.125
字　　数　3300 千
插　　页　16
书　　号　ISBN 978-7-80752-458-8
定　　价　880.00 元（全五册）

本卷前言

作为我国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音乐学家，王光祈在留学德国之际，心忧祖国内难未已、外患日亟，“不愿自己陷于血冷之境地”，孜孜努力于中国近代西方列强侵华外交史料的翻译，自1928到1930年，先后译出《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李鸿章游俄纪事》、《瓦德西拳乱笔记》、《美国与满洲问题》、《三国干涉还辽秘闻》、《西藏外交文件》、《库伦条约之始末》共七种，并相继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一时“国内读先生书者众”。今天，当我们翻开这些译著的时候，不仅可以看到列强侵华及彼此间尔虞我诈的万般景象，而且透过当时世界格局与中国外交的演变，更可感到王光祈深邃的外交与民族复兴思维。

“弟本来是研究外交的，因欲研究外交，故极留意世界大势”（王光祈《致君左》，1919年6月1日）。“我是一位梦想大同世界的人。我将中国这个地方看作世界的一部分”。“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就是要使中国这个地方——人民的风俗制度等、学术生活等等，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而且配得上为大同世界的一部分”（王光祈《少年中国之创造》，1919年7月）。胸怀世界，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放到世界发展的大格局中去探索；而欲把握世界大势，则必须掌握大量的原始资料，了解各国的真实意图和行动，所以在“国难方殷”之际，翻译各国外交史料，让国人能清醒地感知到外面的世界，让同胞深刻了解西方列强对华瓜分豆剖之欲望和行径，在王光祈看来就成了极具使命感甚至颇具启蒙意义的重大举措，即便“处于经济万分压迫之下，健康十分受损之际”，也要“执笔为文”（王光祈《与邵循正君书》）。

用历史来警觉现实，用屈辱来激励发愤，用侵略者狡黠的自供惊起国人自卫防范，

这是王光祈译书治史的出发点。当日本田中内阁制定所谓《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决定用武力干涉中国内政、吞并东三省、扩大对华侵略之际，王光祈的《三国干涉还辽秘闻》、《李鸿章游俄纪事》、《美国与满洲问题》、《库伦条约之始末》等译著，及时向国人提供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特别是侵略我国满蒙地区罪恶活动的大批原始记录和自供状，以无可辩驳的史实揭露了列强侵凌、欺辱我中华的本来面目，对国内舆论确有振聋发聩之效，同时也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推动正在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启迪和动员作用。而《西藏外交文件》一书，收录了自唐代宗广德元年（763 年）吐番人寇长安，直至民国三年（1914 年）西姆拉（Simla）会议时止，有关西藏问题的重要文件凡十三篇，加上《译者导言》七章，可谓集诸家之长，"不但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外交、留心解决西藏悬案之人甚有价值，即对于专治古史者，亦当不乏兴趣"（王光祈《西藏外交文件》译者序文。中华书局 1930 年版）。

由上述七种译著组成的《中国近代外交史料》，是王光祈奉献于祖国史坛的不朽译作。译著中的材料均采自列强侵华档案和秘密文件，以及帝国主义分子当时直接参与相关事件之著述，是研究近代中外关系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一直大量引用他翻译的外交史料各书。据不完全统计，王光祈所译七种外交史料中，计有《瓦德西拳乱笔记》被大部辑入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义和团》第三册；《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被全书载入同一丛刊之《辛亥革命》第八册。此外，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近代中国史稿》，引《瓦德西拳乱笔记》七处，《库伦条约之始末》三处；由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历史系编写，中华书局 1979 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引《瓦德西拳乱笔记》六处，《库伦条约之始末》五处；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沙俄侵华史简编》，引《李鸿章游俄纪事》九处，《瓦德西拳乱笔记》一处，《库伦条约之始末》十七处；胡绳所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82 年出版），引《瓦德西拳乱笔记》四处。其他如刘大年著《美国侵华史》，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下册，陈旭麓主编《近代中国八十年》，以及廖一中、李德征等人编著《义和团运动史》，李宗一著《袁世凯传》，北京大学历史系所编两卷本《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也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王光祈所译史料。至于在有关列强侵华活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西藏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方面的学术论文中援引上述史料者，则不胜枚举。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王光祈不仅是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音乐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史学家"，他具有"新史家"的科学精神（周谦冲《王光祈与现代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1936 年 4 月出版）。他自幼深爱文史，在中国大学攻读法律时，课余在清史馆兼职，在法律各科中，"独喜国际公法，中西外交史，

曾搜集外交部与各国所定条约档卷，详为披览，颇具心得”（倪平欧：《光祈北平生活之一段》，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心系祖国，放眼世界，“引起民族自觉之心”，“陶铸民族独立思想”（王光祈《中国音乐史》自序，中华出局1934年版），王光祈以如此境界潜心研究近代中西外交，也因之有了那些不朽的译作，成为彪炳中国近代外交的辉煌华章！

本卷的编校工作，实际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四川音乐学院毕兴教授、韩立文教授、四川师范学院侯德础教授、马功成教授为本书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表示感谢！

廖　勇

2009年3月

本卷编辑说明

一、本卷收录王光祈译著的《中国近代外交史料》七种，即《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李鸿章游俄纪事》、《瓦德西拳乱笔记》、《美国与满洲问题》、《三国干涉还辽秘闻》、《西藏外交文件》、《库伦条约之始末》。

二、收入本卷的译著，均按写作或原出版时间顺序编排，编者在每篇篇名下作了简要的题记。

三、编校以上海中华书局初版为底本，严守存真慎校准则，以保持作者译著原貌。

四、对原译著中涉及的重要历史事件、人名、地名等，作了必要的注释。

五、原译著中未予中译的外文词语等，均一仍其旧而不作任何改动，以利于读者能从译著原貌中进行研读探索。

六、我们对原译著中的个别地方作了删节处理，并在删节处出注说明。

编　者
2009 年 9 月

本册目录

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

译自德国外交文件汇编

题记：1911年（清宣统三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两个月内即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12月，孙中山回国，经十七省代表会议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2月12日，清帝被迫宣布退位，结束了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

辛亥革命爆发后，西方列强感到惊慌失措。当时，德、美、俄、英、法、日等国，围绕对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承认、对袁世凯的“窃权”当政以及“南北议和”等，频频展开外交活动，并通过驻北京各外交使团连续举行会议，商讨如何维护各自在华利益，进而利用中国动荡局势乘机扩大其侵略利益。王光祈翻译的德国外交部重要文件，就真实地反映了各列强的态度。他将这些文件汇译命名为《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

本书译稿于1928年8月5日在柏林完成。1929年4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目 次

八日自柏林寄）
十八、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正月二十九日自华盛顿寄）
十九、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二月五日到柏林）
二十、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二月十二日到柏林）
二十一、德国外部秘书 Kiderlen 致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之电（二月十三日自柏林寄）
二十二、德国驻华公使 Haxthausen 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Hollweg 之文件（二月三日自北京寄）
二十三、德国外部秘书 Kiderlen 致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之文件（二月二十八日自柏林寄）
二十四、德国外部代理秘书 Zimmermann 致德国驻英大使 Marschall 男爵之文件（七月二十五日自柏林寄）
二十五、德国驻英代办 Kühlmann 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八月六日自伦敦寄）
二十六、德国驻华公使 Haxthausen 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九月二十一日自北京寄）
二十七、德国驻华公使 Haxthausen 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十二月二十四日自北京寄）
二十八、德国外部代理秘书 Zimmermann 致德国驻华公使 Haxthausen 之电（一九一三年正月十日自柏林寄）
二十九、德国驻华公使 Haxthausen 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三月十六日自北京寄）
三十、德国外部秘书 Jagow 致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之电（三月三十日自柏林寄）
三十一、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四月一日到柏林）
三十二、德国外部秘书 Jagow 致德国驻英大使 Lichnowsky 侯爵之文件（四月三日自柏林寄）
三十三、德国外部秘书 Jagow 致随侍德皇行在的参议 Treutler 之电（四月五日自柏林寄）
三十四、德国外部秘书 Jagow 致德国驻日大使 Rex 伯爵之电（四月七日自柏林寄）
三十五、德国外部政治司长 Stumm 之纪录（四月八日柏林）
三十六、德国驻英大使 Lichnowsky 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四月九日自伦敦寄）
三十七、德国外部秘书 Jagow 致德国驻英大使 Lichnowsky 侯爵之文件（四月二十一日

译者叙言

本书系译自德国一九二六年出版之《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四年的欧洲内阁大政》（《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 1871—1914》）一书。该书所刊皆系德国外部重要文件，共有数十巨册。盖德国战后左党执政，刊此以明战前欧洲政治真相；德国如不革命，此种文件吾人势将永无寓目之时也。

在此四十余年中（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四年），吾国生活于列强均势之下，一举一动皆仰外人鼻息。其中如中法战争（一八八四年到一八八五年）[①]、中日战争（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②]、胶州事件（一八九八年）[③]、庚子事件（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一年）[④] 等役，固为吾国历史上永不可磨之污点；此外，如满洲问题、蒙古问题、西藏问题、银行团问题等等，更为吾国留下许多纠葛，均待加以解决。故此种外交史料，实为国人所应当特别注意者。

大战[⑤]以后，欧洲外交局面虽然略有变迁，而列强在华形势则依然如昔。读者诸君

---

① 中法战争：1884—1885年法国侵略中国的战争。战争期间，中国军民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引起法国政局的动荡，茹费里内阁因此倒台。但清政府却于1885年6月授意李鸿章与法国在天津签订了屈辱的《中法新约》。

② 中日战争：1894年（农历甲午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又称甲午战争。日军相继在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中使中国军队受挫，并于1895年2月攻占威海卫军港，清北洋舰队全军覆没。4月17日，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

③ 胶州事件：又称胶州湾事件。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11月，德国借口其传教士在曹州巨野（今属山东）被杀，派遣舰队强占胶州湾。1898年3月，清政府被迫与德国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承认德国租借胶州湾九十九年，并享有修筑胶济铁路及开采沿线矿产等特权。

④ 庚子事件：即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最初在山东、河南等地，后扩展至华北、东北各地，北京、天津一带声势尤为浩大。在抵御八国联军侵华、保卫京津的廊坊和紫竹林等战斗中，义和团英勇作战，迫使侵略者多次退却。在八国联军的残酷镇压下，义和团运动终遭失败。

⑤ 大战：指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试将此次列强承认南京政府[①]问题，持与辛亥列强承认中华民国[②]问题，一为比较，则各国对华政策之相反，与彼此利害之冲突，固与十五年前毫无异也。故读本书者，不仅对于已往史迹，完全了然，即对于现在局势，亦将由此有所领悟也。中华民国十七年八月五日王光祈叙于柏林南郊 Steglitz Adolfstr. 12。

又战前德国外部所谓秘书（Staatssekretär），略与吾国所谓总长相似；战后则与吾国所谓次长相似。译者附注

一、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密码，一九一一年十二月自华盛顿寄。十二月十日到柏林。）

（原注）自一九一一年秋初，中国革命运动发自南方，蔓延极为迅速。当时人民反抗清室政府铁路借款[③]政策，实为促成革命重要原因之一。其后忽含反抗皇室之性质，遂于十月中旬宣布共和。清室方面虽于十月三十日颁布宪法信条，而革命之势，实已无可制止。因汉口、武昌等处不宁之故，于是列强方面其势不能不注意保护自国侨民一事。其在德国一面，则于十月十二日左右，派遣炮舰（Tiger）一只，河道炮船（Vaterland 与 Otter）两只，前往汉口。该项舰队人员，于是月十七日竟与华人方面发生战事，因而引起日本报纸方面之对德激烈攻击。据德国驻日代办 Radowitz 十月十九日之报告，该报纸等对于德国准备驻胶军队动员占领山东土地之消息，加以大声疾呼，肆意批评。其实此种批评之无稽与可笑，正与上述消息相同也。而在实际上，则恰恰日俄两国正欲利用中国乱事。其在日本报纸方面，已于是年十月之间，尝以实行干涉之举，恫吓中国。到了一九一二年正月，俄国方面亦复着手利用，虽其时清室政府全权代表袁世凯[④]已与革军方面，（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订立议和条约，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决定政体问题。一九一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俄国外交总长 Sasonow 曾向俄皇提出

---

① 南京政府：即南京临时政府。1911年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会，依照《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② 中华民国：1912—1949年中国国家的名称。1911年武昌起义后，各省响应。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就任临时大总统，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权，称中华民国。

③ 铁路借款：自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清政府相继与比利时银行团签订《芦（沟桥）汉（口）铁路借款合同》，与英国中英公司签订《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与美国美华合兴公司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等，致使上述各地铁路沿线权利为西方列强所控制。

④ 袁世凯（1859—1916）：北洋军阀首领。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靠出卖维新派取得慈禧太后宠信，1899年勾结德国侵略军残酷镇压义和团。1901年继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及练兵处会办大臣。以实行"新政"为名，扩编北洋军为六镇，从此成为北洋军阀的首领。1911年辛亥革命后，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建立北洋军阀政权。1915年5月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2月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1916年6月，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忧惧而死。

建议，谓宜乘中国政府交替之际，将中俄两国间许多悬案一气呵成解决。此项建议已得俄皇批准。考其内容，虽无立即武力吞并中国领土之意，但对于此种吞并之事，固已明白保留，如有必要当即实行。

（美国外务卿）Knox 先生，最近一反其前此所发言论、所得东京消息，向余言曰：驻日美使（Charles P. Bryan）曾有报告前来，谓日本政府对于干涉中国一事，现刻已在考虑之中云云。更因巴黎某报登载（俄国外交总长）Sasonow 于巴黎某次访谈之际，曾谓俄、日、英、法四国对于处置中国问题一事，业已意见一致，对于早期干涉之举，势当加以阻止云云。颇使 Knox 先生深感不安。彼以为（俄国外长）此种宣言，明明系对美而发。并谓日本方面意在取得他国委托，以执行干涉任务。

据上述 Knox 先生席间偶然谈话的语气观之，更就彼谓俄国外长 Sasonow 此种宣言或者亦系对德而发云云的用意观之，则彼时常希望美、德对东亚问题彼此合作之心，实已完全表露于外。

Bernstorff

德国外部秘书 Kiderlen 注：不错。但美国方面必须首先为之，并实行一种明了政策，不要欲将我们送上前去，于是袖手不管。

二、德国驻日代办（Radowitz）致柏林外部之电（密码，一九一一年十二月自东京寄。十二月九日到柏林。）

有时代表（日本）外部发言之机关报纸 Yomiuri，谓德国每有更正事件，向来极为迅速，而此次关于扶助中国帝制传闻，独未加以力辟。因此遂信德国政府诚然……（译者按，此处原注有“暗码脱略”数字。）但德国私人之参与战事，当为德国政府所前知。是以汉人对此怀恨，乃系当然之事云云。（该报）此种言论，似为（日本）外长（Vicomte Uchida）答余前此对于一部分日报颇持仇德态度所提之抗议。因余对于事实真相，以及阁下对华政策，皆无所知之故，即请赐与训令，以作余谈话之标准。

Radowitz

三、德国外部秘书 Kiderlen 致德国驻日代办 Radowitz 之电（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自柏林寄。）

答复第八十二号之电报。

帝国政府自中国变化开始以来，即坚持不干涉原则。所有报纸传闻，谓德国私人帮助清室军队，为帝国政府所前知云云，实属不确。关于此事，或者至今未觅证据，或者

详查之后知其不确。无论在职或退职德国军官，均未有在清室军队服务者。

Kiderlen

四、美国驻德大使 Leishman 送交德国外部代理秘书 Zimmermann 之公文（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译者按，此非全文，乃系德外部节录备案者。）

敝国政府因应日本帝国政府请求发表对于中国时局所抱意见，以及拟采何种必要手段之故，曾经回答，大意如下：

美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之深忧时局严重，表示同情。因此之故，对于（日本）近来递交上海委员致与美国政府之同样公文辞意，亦表同情。（该项公文）当时曾特别表示早期协商谅解以止现在战事之必要。（惟）美国政府现仍保持其绝对中立之态度，一如列强一致所已采用者。

此种共同行动，可以视为第一步骤。美国政府因此颇欲静待（日本）此刻努力之结果如何。并愿继续观察在华重要列强协商情形，究竟采用何种方法，方能有利于永久的负责的中国政府。

若德国帝国政府曾接日本政府同样公文，本使馆甚欲一知答文内容，以便报告本国政府。

德外部代理秘书 Zimmermann 注：此系美国大使交来者。余曾答之曰：据余所知，德国未曾接有类似此种之日本询问；如果有之，当与美国共持同一论点。

五、德国外部代理秘书 Zimmermann 致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之文件（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自柏林寄。）

此间美国大使曾交来公文一件，兹特抄录附呈阁下。敝处已向（美使）Leishman 先生口头回复。其大意略谓，（德国）帝国政府方面，至今尚未接得日本政府此类询问。但将来如有此项询问到来，则德国方面之回答，当与美国所持论点相同。

阁下固早已熟知，帝国政府自中国乱事开始以来，即已抱定宗旨，认为此事乃系中国内政。所有恢复秩序之举，首应静听华人自为。但是假如一旦发生必须加以干涉之情形，则据帝国政府之意，此项干涉应由在华列强，先期协商一致，然后共同实行。至于一国单独进行，意欲由此以得特别利益之举，则吾人无论如何，皆不愿有此项情事发生。

此间日本代办 Hata 曾于其间面告敝处，谓日本政府现已决定，从日本国内派遣五百兵士，前往汉口。据 Hata 先生个人意见，此项兵士之遣派，当系用以替代（该处）日本海军，保护汉口日本租界云云。究竟此种派兵之举，是否已可视为日本实行干涉之

初步，此时尚未能加以判定。惟余揣测美国政府方面，亦接有上述派兵五百之消息；因而余甚欲一闻美国方面对于日本此举之批评如何。

因此，余敬请阁下，依着此项方向，谨慎探听；然后再以所得结果，短电相示。

此外，阁下如遇机会，可向美国当事方面声言，略谓吾人始终愿与美国政府在华合作。德、美两国在华利害，甚为相同。因此，吾人对于美国政府如有提议条陈，随时均愿听教，并交换意见。

Zimmermann

六、德国驻华公使 Haxthausen 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自北京寄。）

近数星期以来，一部分中国报纸对德大施攻击。其原因系由于怀疑德国对华乱事所持之态度而生。其主要材料则为德国方面曾以军火及军官帮助清室政府。同时更疑德国抱有特别计划，尤其是在山东方面。

德国贩卖军火之事，诚然现尚未归停止；但其中大部分系实行交付从前已定之货。而且德国前此受托代交之奥国 Skoda 厂大炮，亦必须挂在自己账下；盖因此种贸易系由一家德国商店代表 Skoda 炮厂介绍作成者也。但是此外却有一事不容疑惑者，即德国小商店、小商人曾经乘机发售军火。盖严令禁止之举，一如英国根据一九〇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议决所颁布者，其在德国以及他国方面自昔未尝有也。大部分东亚德侨，尤其是寓居北方者，对于清室政府表示同情之心，实较对于革命党人为多。此种思想亦尝发为言论，见之于德国东亚主要机关报纸 Ostasiatischen Lloyd 之中。所有上述种种情形合拢起来，于是不免易起革命党人怀疑德人及德国之心。更有仇德外报，从中大为利用。余于此处只引一例，即屡次报上主张以及屡由敝处更正之德国军官参与清室政府军队一事是也。在沪发行之法国报纸（Echo de Chine）最近犹发表一种奇怪消息，谓德国方面对于清室除助以军器火药外，并以七十位军官供其使用。该报自述与革命党领袖某曾作谈话，该领袖谓清军之所以得胜，系由于其中曾有德人百名为之指导云云。同时，该报更谓此次谈话之中，曾述及抵制德人问题之事云云。

此外，此间尚有一种谣传，略谓清室拟将山东抵押与德，以允许借款为交换条件，而且此事正由德国国会委员会讨论云云。

其中尤以日本报纸，或在日本势力下之报纸，煽动最甚。余于此处谨择录数段附呈。Manchuria Daily News（《满洲日日新闻》?）系在大连发行，《顺天时报》则系专门鼓吹日本利益、销路甚为广大之北京报纸。若将此项抨击，再与日本国内报纸论调合观，则真可以称为日本舆论对德实施总攻击。除了日本普通目的，欲使德国在此或可得

着最后胜利之革命党人眼中丧失信用，以便德国政治、商业大受其损以外；尚有一种特别目的，即欲由此掩饰日本自己运往中国之大批军火交易，使人不加注意。此外，更欲由此在将来共和政府之中，以使德国军事方面在华等于专利之情势为之破坏。并预为中国大批购买日本军用材料，聘请日本军事教习之备。同时又可使德国商业受一打击。所有报上关于革军势力范围下面现正筹划抵制德货之消息，日益众多。有时亦常发现于革党与日人谈话之中。

余曾接到共和代表上海 Huang Tschên-hua 一封长信，其中对于德国售卖军火与清室一事，加以抗议。并为中德邦交与保守中立计，请求禁止德商此种军火交易云云。

余对于攻击之举，凡认为必要之时，莫不力加辩抗。惟时常更正，反有转令此间报纸攻击愈为频烈之虞。至于我们此地报纸，组织殊不宏备。Ostasiatische Lloyd 每周只发行一次。天津方面之 Tageblatt für Nordchina（《华北日报》?）又复除了该处德侨以外，极少为人注意。此外，青岛各报之势力影响，亦只限于本地一处而已。

此项报告正将写毕之时，余见本月十二日路透电报，载有德国报纸对于此间种种抨击情形曾加以抗驳云云。对于此种仇视情形如能加以注意，不为无益；若能再在德报之上加以相当说明，则其效力或更宏大。

Haxthausen

七、德国驻俄大使 Pourtalès 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二年正月四日，自圣彼得堡寄。）

（俄外交总长）Sasonow 先生，昨日曾向余表示，对于中国时局十分悲观。据该处所传来之一切消息，清室运命，实已完全告终。Sasonow 先生之意以为，究竟来日如何，此时简直不可预料。该总长现时似不相信（中国由此便可组成）一个联邦大共和国。彼宁肯相信（中国势将成为）许多小共和国。将来或由一位强有力者，使之再行统一联合起来。

余曾询问 Sasonow 先生究竟据彼所得消息，日本是否果有实行干涉以助清室方面之意。该总长答曰：近来未曾闻有此项计划，惟此间日本大使（Itochiro Motono 男爵），在前一向曾时常表示列强应该共同干涉之意；而且此种共同行动应由日本联合在华最有关系之英、美、德三国为之。该大使对于法国竟未提及，可谓奇怪特别；或系偶然疏略亦未可知。（德国编辑者原注：此与 Sasonow 一九一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之建议，完全相异。该建议之中，曾计划俄、日两国共同实行干涉，而以法、英两国为援助。至于德、美两国之援助，固丝毫未尝计及："我们如与日本谅解共同行动，则我们之希望当更易于得偿；倘若我们办到盟友法国方面确实允助我们，同时英国方面又允帮助日

本。”）但近来 Motono 男爵此种共同行动之思想，似又冷淡下去。（德皇维廉第二朱注：日人将独自设法去干。因为我们欧人之间是向来彼此不能相容的。）

当其谈到中国前途，以及揣测该国许多省份行将各自独立分据之际，亦曾语及蒙古方面。该总长自谓，蒙古北部希望并入俄国之意，久已有之。蒙古王公曾屡次请求，所有蒙古地方，或者至少蒙古北部，归入俄国版图。俄国方面对于此项请求，尝采拒绝之态度。近来蒙古方面又复屡次派委员来俄，表示拟向俄皇呈递请愿书之意。大约该项请愿书内容，仍系重新请求归入俄国版图，或者愿受俄国保护之意。但俄国方面曾暗示蒙古不必如此。盖现值中国乱事之际，殊非接受此项请愿书之适当时机故也云云。其后 Sasonow 先生复向余解说，谓俄国对于合并蒙古全部或一部之事，甚非所愿。因其结果，只替俄国新添负担而已。为俄国利益计，甚望蒙古自行宣布独立，以作俄华两国间之一种缓冲国家。（德皇威廉第二朱注：废话！彼必须将蒙古自行取去，否则日本人要跑来了！）俄国对于此种国家当然甚易得到商业上之利益，此实为俄国对于该地之主要目的云云。

就大体而论，余觉得此间对于中国事变，现刻尚欲暂抱观察态度。

F. Pourtalès

八、德国外部代理秘书 Zimmermann **致德国驻日大使** Rex **伯爵之电**（**一九一二年正月七日，自柏林寄。**）

由中国传来之消息，均谓日本报纸之故意对德攻击，尝为中国报纸所采录，因而产生排德之举。

请将此电内容并按照第四十七号电报之意（按即上列第三篇），通告（日本）外务部，并特别声明，日报此种行动，颇使此间感觉不快，我们甚望（日本）政府对于此种仇视论调加以有力干涉。

Zimmermann

九、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密码，一九一二年正月，自华盛顿寄。正月十三日到柏林。**）

答复 A 字第三四六号咨文。（按即上列第 5 篇。）

（美外务卿）Knox 以为日本前此曾拟实行干涉，并曾设法冀获英国之助，但未得何等效果。彼相信日本之干涉思想，现在当已捐弃。Knox 并不知道日本派兵之事。彼以此举实为日本“忠实”之好例，盖日本意欲促使美国再行较前多派兵队（到华）。

Knox 曾接英、俄两国十分坚确明白之保证，谓彼等对于中国问题，当俟在华关系

列强彼此协解，方才进行。Knox 对于一切列强之中立态度，甚为相信。现在之问题，只是此种中立态度，是否应当采取而已。

Bernstorff

十、德国外部代理秘书 Zimmermann 致德国驻日代办 Radowitz 之电（一九一二年正月二十日，自柏林寄。）

闻日本采购多量大米，此举是否含有预备战事之意？该国有无对华单独行动之迹象表现，请电复。

Zimmermann

十一、德国驻日代办 Radowitz 致柏林外部之电（密码，一九一二年正月二十日，自东京寄。）

据 Katsura 侯爵机关报 Kokumin 消息，最近曾开 Genro 会议，内阁总理及外部人员均曾列席，讨论近因北京政局形势大变与蒙古独立影响满洲两事所发生之新局面。（德国编辑者原注：外蒙于一九一一年年底，在活佛 Hutuktu 之下，宣言脱离中国。）就 Katsura 侯爵机关报的论调观之，可以断其曾受军阀首领 Yamagata 侯爵一派之影响。因此之故，（日本）对于满洲方面，或用实行合并之手段，或采类似俄国对蒙之行动，均非必无之事。俟 Yamagata 奏陈日皇之时，即可决定。风闻（日本）于最近一星期以后，曾秘密增派满洲驻军。

Rakowitz

十二、德国驻日代办 Radowitz 致柏林外部之电（密码，一九一二年正月，自东京寄，正月二十二日到柏林。）

答复第四号电报（按即上列第 10 篇）。并与第二号电报所陈者有关（按即上列第 11 篇）。

日本机关报纸竭力设法，以使因 Kokumin 登载变更对华政策消息所引起之印象，逐渐趋于冷淡，（不再为人注目）。英国大使（Sir Clande M. McDonald）以为此种变更对华政策之揣测，实无根据可言。并不相信日本将在满洲实施侵略行动。如其有之，将遭英国方面之强烈反抗也。

反之，（德国）使馆军事参赞（Bernewitz 男爵）曾经密闻（原注：不要在报上发表），日本军事方面，现正准备一切积极行动。占领南满之事，业已预定现驻满洲之第五师担任。所有该师之原防即由其后备旅队补充。因此之故，召集数期预备军之举，业

在进行之中。至于其他已经备好之师团，其输送之期，尚未确定。据报纸消息，现有巡洋舰两只，开往大连。

照上面情形看来，似乎政府方面虽已准备一切，但根本态度却尚未曾决定。此外，并须寻得一个口实，可以辩护此种积极行动之必要。因此，武力派皆希望清室完全颠覆之后，满洲方面发生骚乱，于是遂以铁路陷于危险为理由，作成积极行动之口实。倘若英国大使之言果是，则日本此种行动，实无异对于向来以英盟为基之政策，将有所离弃。因此，近传日本已与俄国联络之说，不尽无据。盖日本方面，若无俄国，似乎不敢作此冒险之举。

Radowitz

十三、德国外部代理秘书 Zimmermann 为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所作之说帖（一九二一年正月二十四日，柏林。）

余在昨日或今日上午之时，惜尚未能敬向阁下报告中国事件。但据皇上陛下在 A 字一三三〇号文件篇末所下注语内容观之，则彼对于此事，却极为注意。阁下今日午后或当见着皇上。兹特简单敬陈如下：（按 A 字第一三三〇号文件与驻华德使 Haxthausen 一九一二年正月九日之报告内容相同。该报告系详述中国革命事变之情形以及各国所表现之干涉欲。其篇末曾谓："日本驻华公使 Ijuin 本系主张日本采取强硬手段，利用中国乱事者。据云近因英国压迫之故，已由东京方面饬令该使稳慎行事。……所有住在临时政府势力区域之公私英人，以及《泰晤士报》驻华访事 Morrison 博士，自始即向共和徒党暗送秋波。驻华英使之态度，因受此辈英人影响之故，于是动摇不定。至于现方离职之驻华俄使，其为人不甚赞成俄国急进，因彼以为俄国暂时尚不能在东亚方面增负重大新责故也。但新任俄国驻华代办，则主张积极政策；在此方面似与日使颇有意味相投之点。"云云。）德皇威廉第二于此篇末曾加以朱注云："此三位难兄难弟，已经有了他们的计划！英国，俄国，日本！如我们不赶快一点，则我们只好站在外面白白望着。"

据鄙见所及，若就东京使馆拍来之 A 字第一四四二号电报（按即上列第十二篇）观之，则日本实有积极侵略满洲之意。我们对此当然不能直接公然反对。但在他方面，则为我们利益计，却不愿日本有此积极行动；因此种行动易给他国口实，亦复从而效尤，其结果实有促现瓜分中国成为各种势力范围之势。此种办法实与我们及美国之政策不合。美国从前曾经提出"满洲中立"之建议，并将其论点详向世界各国说明。余预料美国方面当愿再采类似步骤，以助中国无疑。英国方面对于美国此种步骤，当难加以闭拒。因此鄙见以为我们应该妥为利用上述 A 字第一四四二号东京电报，一面由（驻美

德使）Bernstorff 伯爵向（美国外务卿）Knox 先生，一面由余向（驻德美使）Leishman 先生，嗾使美国向着列强发出下列一种宣言：

所有世界列强，对于干涉中国内政一事，直至今日盖无不设法加以避免，忠守彼等屡次所发出之尊重中国统治主权、领土完全，以及开放门户、利益均沾宣言。现在无论皇室及革党方面既皆决心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则干涉之举，愈觉无因。据势揣测，即在将来，当亦不至发生引起列强干涉之原因。倘此种揣测，竟全违期望而不能见诸事实，则美国相信当能与其他列强协商一致，只有采取共同行动一法，始足以使列强对华问题中之一切误会困难，根本加以免除。倘若列强对于斯议加以赞成，则美国将不胜欣慰之至云云。

我们宜先行示意华盛顿政府，如有此项宣言发出，我们定当立刻表示赞成。英国方面，其势当难伤害美国兄弟感情，必将赶过我们之前，争先表示同意。法国方面，当可共抱同一论点。至于俄国方面，就其在蒙行动而论，确是令人可疑；但据来路明白之各项消息，谓俄国对于中国在蒙主权，并不欲正式加以侵害，甚至于对于蒙古宣布独立一事，亦不愿加以注意重视。（柏林俄国使馆参赞）Schebeko 先生，曾于昨日随便谈话之中，依照此意，向余言曰：俄国对于中国之统治主权及领土完全，并不愿加以摇动，仅仅欲于蒙古地方在中国主权之下，关于经济问题拟与北京方面有所协商而已。据此，或者甚至于俄国方面，对于美国之行动，亦有表示同意之可能。又日本方面，处此情形之下，似乎不敢单独自外。无论如何，余甚觉上述宣言，实感必要，且有希望，倘若系从美国发出，非由我们发出。

若阁下对于上述种种加以赞成，则余敬托阁下或者今日午后，即向陛下面陈，并乞其许可华盛顿方面（德国使馆），以及此间我们向着（美使）Leishman 先生，所取之行动。

Zimmermann

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注：对于此种根本思想，陛下已于前数日表示同意。因此从新面陈之举，实无必要。可以依照上述意见，与（柏林顿使）[1] Leishman 面谈，并给（驻美德使）Bernstorff 训令。

十四、德国外部代理秘书 Zimmermann 致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之电（一九一二年正月二十五日，自柏林寄。）

据日本报纸登载，现有一万军队准备动员，开往满洲。又据秘密消息，日本确已准备军事行动，召集预备兵队，大批购买米粮。日本单独行动，足使他国亦复效尤，起而

① 柏林顿使：当为“柏林美使”。

干涉。其结果，我们与美国以及英国所引为忧虑之瓜分中国成为势力范围一事，竟将促现。我们希望美国政府从速向列强发出下列宣言：“所有世界列强，对于干涉中国内政一事，直至今日，盖无不设法加以避免，忠守彼等所发出之尊重中国领土完全、统治主权以及门户开放宣言。直到今日，尚未发现何种引起干涉之原因，盖无论皇室及革党方面，皆莫不以尽力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为责也。据势揣测，即在将来，当亦不至发生引起列强干涉之原因。倘此种揣测，竟违期望而不中，则美国政府相信，当能与其他列强协商一致，只有采取共同行动一法，始足以使一切误会困难根本加以免除。美国政府希望上述提议，对于列强所抱论点，皆已一一解释清楚表示明白云云。”

我们对于此项毫无疵病之宣言，定当立刻表示赞成。英国方面亦料如此。盖日本此种行动，对于英国利益颇有冲突之处，实毫无疑义故也。

（美使）Leishman方面，我们已依照此意，秘密向其怂恿，彼将直电本国政府主张之。请君向机[①]行动，并宜秘密办理，勿令英国怀疑。

Zimmermann

Zimmermann注：美使Leishman对于此种意见，极为赞成。彼并谓处置此事，实以美国政府动议，不由我们提出为佳。

十五、德国外部代理秘书 Zimmermann **致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之电**（**一九一二年正月二十六日自柏林寄。**）

继续第七号电报（按即上列第十四篇）。

东京消息：“外务大臣否认报纸所载关于准备动员之新闻。（德国）使馆武官曾密向陆部探询，据云第十二师与他师，早已接得命令准备一切。但现在尚无新令发出。

外务大臣声言，革党方面设法勾结土匪在满洲骚动。报纸方面日日登载类似此项之消息。”

据此，则日本方面确已准备动作。彼之官式更正，更足使我们（劝美发表宣言之）活动，愈无疵弊可言。

Zimmermann

十六、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密码，一九一二年正月，自华盛顿寄。正月二十七日到柏林。**）

答复第七号及第八号电报（按即上列第十四与第十五两篇）。

---

① 向机：当为“相机”。

（美国外务卿）Knox 先生曾将（驻德美使）Leishman 之电报，念与我听。该电要点，即系主张对于中国领土完全一事，从新再发一次宣言云云。Knox 不甚赞成此举。因为对于此事，实已屡次表示，而且中国交战双方，行将由此宣言看出，彼辈大可往下战去，不必顾虑，盖列强并不加以干涉故也。余乃向 Knox 言曰：此事之用意，只在阻止单独干涉而已云云。其后彼似已愿向列强发出此类宣言，但在发出之前，尚有两点必须打听清楚方可。Knox 本人自前次东亚失败以后，变成十分谨慎，一如余前此报告之中屡经提及者也。

第一，Leishman 电中曾言，阁下尝获英、俄使馆方面消息，得以推定该两国对于此种宣言，当表赞成云云。Knox 请将此事经过详细示知，尤其是英国态度。盖彼在发出宣言之前，无论如何，须向英国方面一为窥探故也。

第二，Knox 尚欲等候东京方面回信。盖彼曾经听得日本某家银行，曾预付上海某铁路公司一笔大批款项，该款其势必将流入共和徒党手中。Knox 对于此项消息，甚以为虑，随即请求日本（驻美）代办 Hanihara 将此事真相见告。要之，Knox 似乎已将前此信任日本中立之心丧去，并甚惧日本单独行动。

倘若数日之后，阁下方面关于英国态度之消息，以及日本方面之回信均已到此，则 Knox 愿与余再行接洽。

Bernstorff

十七、德国外部代理秘书 Zimmermann 致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之电（一九一二年正月二十八日，自柏林寄。）

答复第十七号电报（按即上列第十六篇）。

阁下前此对美声明，此种行动之要义，乃在防止单独干涉一事而已，可谓恰如其分。顷接下列东京电报，此事愈觉有速办之必要：

“使馆武官得可靠消息，虽然声明担保（决无准备动员之举），而第十二师却已准备动员。新兵留驻不发，而以后备兵队补充。并定正月二十五日为准备动员之第一日，预计八天竣事。第一次由 Modschi 开往大连之运输船只，预定为二月二日出发。Michi 登载同样消息，并谓或者其中一部分将在烟台起岸，以警护中国北部。又驻 Schimonoseki（德国）领事（Müller）报告，Modschi 方面装载军火之消息。

（日本）政府方面或因报馆走漏消息之故，将命令收回，或向后展期，均非必无之事。”

Sir Edward Grey 曾令 Sir Edward Goschen 相告，“彼对于主张中国领土勿受侵害、不宜剖成势力范围之意见，表示赞成云云。”

据俄国大使报告，俄国对于中国统治主权与领土完全，皆不欲加以摇动。至于蒙古地方，则俄国将在中国主权之下，关于经济问题，拟与北京方面有所协商而已。

Zimmermann

十八、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密码，一九一二年正月二十九日，自华盛顿寄。）**

回答第十号电报（按即上列第十七篇）。

（美国外务卿）Knox 先生曾将美国驻日大使第一个电报，念与我听。该电谓日本外务大臣与陆军大臣（Ishimoto 男爵）均极否认（日本）抱有干涉（华事）之心。此外更将美国政府纪录一件，念与我听。该项纪录之内，曾照录所有在华各国政府之宣言，其中盖无不主张，如有干涉必要之时，只能由列强共同协定行之云云。

Knox 先生在原则上实与我们意见一致，惟采取一种手段以阻止日本单独行动，则彼因前此经验之故，颇为踌躇。彼甚以伤损任何一国政府，尤其是日本政府为忧。盖各国政府既已明白宣言，并无实行干涉之意故也。彼曾询余，可否由余致彼一封普通公函，探问美国政府对于东亚时局之意见。至于该函之内容，彼当然完全听余自行斟酌。彼将于复余信中，重将彼所接着之各国政府宣言，照述一遍，对于我们所计献之宣言内容（即阁下第七号 A 字一五六八电报所言者），加以采用。（译者按，第七号电报即系上列第十四篇。）然后彼再将此项与余来往之函件，通知各国政府云云。余乃答彼，余实未有权限，作此函询之举，但余将向阁下请示训令云云。

倘阁下对于此种函询之举，认为无妨，则敬请阁下给余处置此事之训令。据 Knox 先生之意，只须余函之中，表示我们甚欲一知美国政府对于东亚时局之态度云云，即足。

Bernstorff

原书注语：正月三十一日电令 Bernstorff 伯爵："依照来电末句之意，作函以询，当表同意。"二月一日 Bernstorff 发来第十九号电报，报告递给该函之经过。

十九、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密码，一九一二年二月，自华盛顿寄。二月五日，到柏林。）**

继续第十九号电报（按即二月一日报告递给该函经过之电报，详见前篇篇末注语）。

自从昨晨此间报纸接得柏林电报，谓德、美两国政府之间，现正讨论中国问题，云云，顿使此间舆论方面大为注意，频向政府方面探询不已。因此之故，（美国外务卿）Knox 先生拟将下列答文，于星期二日通知此间与华有关之各国大使。并建议该文于星

期四日，此间与柏林方面，同时发表云云。倘若此项建议，余应反对，则请赐给训令。（原书注语：二月六日电答 Bernstorff 伯爵，柏林外部，表示同意。）

答文内容如下：

“为答复上月三十一日来文，询问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时局所采态度一事，余得忝叨荣幸可以相告者，即是中国现刻乱事开始以来，敝国政府每遇机会之时，常与其他与华有关之列强交换意见——尤其是法国、英国、意国、日本、俄国以及德意志帝国政府，究以何种方法保护共同利益为适宜。交换意见结果，敝国政府于是大为了然，所有与华有关之列强，盖无不一致具此卓识，主张保持共同行动之政策。

此种意见一致之处，可于十二月二十日法、英、德、日、俄、美代表同时咨交上海和议委员之通牒中见之，以及列强所采保护中国全境外人共同利益之手段中见之。

此外，据敝国政府所获消息，得知其他关系列强，亦曾互换意见；以及对于此事之官式报告，亦常在各国新闻纸上见之。

因此，敝国政府得以明了，所有列强对于现刻时局，彼此共同协作，不但毫无单独自由行动以及干涉中国内政之举，而且与其（平日）相互约保尊重中国领土完全统治主权之言，全然相符。所幸者现在中国方面，并无外力干涉之必要理由，盖无论皇室及革党方面，皆莫不以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为责任。据最近消息，愈足令人相信，即在将来，当亦无必须出于干涉之事。虽然，倘若将来竟违一切期望，干涉之举显有必要，则敝国政府深信，先由列强协商，然后共同行动之政策，实应保持坚定。以便一切可能之误会，自始即行扫除。

此外，敝国政府尝觉注意中国借款，不宜轻易贷与华人，实为严守中立政策之当然结论。除非对于此类借款，加以保证，决定用于战争双方以外之中立事项，方可。敝国政府又尝觉得现在时机，正宜特别适应借款政府所抱原则，凡对于彼等国民向华投资有与自国政府所持列强协调政策不合者，当加以阻止。”

二十、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密码，一九一二年二月，自华盛顿寄。二月十二日，到柏林。）

与第二十二号电报有关（按即上列第十九篇）。

（美国外务卿）Knox 先生昨晚对余谈及（彼之）中国通牒，大奏功效，不胜欢喜之至。彼曾接到……（原书注：此处电码不明。）政府来文表示，完全同意。此间与华有关之各国代表，曾用口头表示赞成。日本方面立刻停止军事准备。Taft 与 Knox 两位先生，对于德、美两国之意见相协，公布于众，引为十分欣幸。（按柏林方面发表美国来文，系在二月八日。）此种表示（实令我们）特别可喜者，因（近来）颇有美国拟与英、

法两国缔结公断条约，以谋政治亲近之说故也。Knox先生对于我们之前此建议，得此优良效果表示十分满意。此间对于中国通牒所得印象甚深。余并将续向Knox鼓吹。

Bernstorff

二十一、德国外部秘书Kiderlen致德国驻美大使Bernstorff伯爵之电（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自柏林寄。）

答复第二十八号电报（按即上列第二十篇）。

请向（美国）外务卿Knox正式表示，帝国政府对于中国通牒内所述之美国东亚政策，全与我们对华政策相同一事，特别欣慰满意。此间发表牒文之时，亦复备受（舆论）重视赞许。

Kiderlen

二十二、德国驻华公使Haxthausen致德国国务总理Bethmann Hollweg之文件（一九一二年二月三日，自北京寄。二月十八日，到柏林。）

当去年夏季，英、日同盟条约续约之时，颇使东亚大部分英侨十分不乐。彼辈觉得英国方面虽由条约获得后方保障，但关于东亚问题之行动自由，却长期深受日本盟邦之束缚，必须常与日本政策有所调和，而日本政策却又不必常与英国自身利益相符。

英国之势力范围，系集中于扬子江及中国南方一带，实首先直接受着革命影响。当袁世凯十一月中旬来此之时，中国帝室军队虽在汉口、汉阳获得胜利，而英国方面对于援助北京政府之举，却不久即行放弃。上海英国商人之压迫，与深恐商业受损之殷忧，终占优势。盖彼辈对于开来之南军，甚欲好意联络故也。（英国如果）援助（北京），是否能令北京方面利用军事胜利机会，竟将占据上海、陷失南京之危加以化除，固然不能断定。但此种援助之举，却不能促使局面大为变动，（则可断言）。盖“十九信条”[①] 之中，业已表示充分顺从维新人士之望故也。在实际上，北京方面所从事讨论者，亦已不是维持满洲朝代问题，乃是变更帝制国体问题。英国政策，乃系由上海方面决定者，既已鼓吹和平，则（当然）成为和平。英国之调停，首使长江战事归于停止。倘若袁世凯之双料角色，一旦被人指责，则袁氏势当立即察知，所演满洲一角，现在业已失败，于是只好能替满洲救得多少，便救多少。袁氏固曾努力设法如此为之。英国政策之所以赞成共和徒党者，据余所见，似乎英国政策具有一种排满倾向。至于共和国体，英国方面

① 十九信条：全称《重大信条十九条》。清政府于1911年11月3日（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颁布。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贵族为保持其垂亡的封建皇朝，玩弄立宪骗局，宣布实行责任内阁制，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皇室经费听由国会决议，皇帝权限和皇室大典由宪法规定，但仍规定皇位世袭，不受侵犯。

固未必乐于赞成。但彼似已相信，反对清室运动，业已不可遏止。不如趁此机会将此腐败不堪阻碍进步之满党扫除。

日本利益分布中国全境，（尤其是）台湾对岸，满洲方面，以及长江重要口岸之商业，自中国乱事开始以来，群谓日本必将起而干涉，（在实际上）日本某某方面人士，曾经力主干涉，亦复似有其事。日本商业因（中国）乱事之影响，所受损失极为重大，日本以中国邻邦、亚洲强国之资格，为生存关系所指命，（不得不）在此行将组成之中国新邦内面，稳树一种重要势力。（因此）日本倘若长持（袖手）静待态度，则反是令人惊异，不解其故。大约英国方面，曾经加以一种温和的压迫；而单独行动一事，日本又以其财力薄弱之故，自感力量不足。惟日本是否终听此种扩张稳固亚洲大陆势力之机会白白放过，却是一个很大疑问。现在关于仅仅形式上隶属中国的蒙古、西藏之命运问题，较之中国本部各省统一问题，反居次要地位。而日本之亚洲大陆势力，则一直侵入中国本部各省之内。但在此处日本却与欧洲列强，连英国一并在内，以及北美方面，发生利害冲突。此外，更加以日本在此素为英国在华商业中心之长江流域一带，势将成为英国最大劲敌。据最近长江方面消息，日本努力设法贷与革命政府款项，用中国某项长江商舰以及某项铁路为抵押，以谋日本商业地位之稳固。惟日本在华大陆势力之发展，不仅使英国在华商业势力大受影响，并且使英国亚洲政治地位陷于危险。此处实为英、日两国利害相反之根芽，或者竟被此次中国乱事使其大为明白显露。此次乱事，并将使英国对华政策之改定，多从欧洲方面着眼，或者竟使英国感到对德甚有接近之必要。惟英、日同盟在中国新邦之特殊势力一日存在，则其余列强，势将因为利害联带关系之故，迫结一种共同战线。

V. Haxthausen

二十三、德国外部秘书 Kiderlen 致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之文件（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自柏林寄。）

为阁下易于洞悉详情之故，（兹特函述如下）：

日本大使（Chinda 男爵）受本国政府之命，交来公文一件，兹将原文抄录附呈。该文谓东京内阁建议，列强对于中国问题，至今所持之共同行动态度，亦当推广及于中国新政府承认问题一事。而且此项承认，应以允许保证维持列强在华一般权利与利益为转移云云。

我们业已答复日本大使，略谓帝国政府关于列强对华共同行动一事，时常均极主张；所以对于日本政府此次之提议，甚为乐于赞成云云。

Kiderlen

附 件

公文原文。（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柏林。）

“为中国新设永久政府并注意实行本国对外义务事，列强似当先行协商，在此现状之下，如何承认新邦问题。关于此种承认问题，列强似有现刻即行加以研究之必要。

所有外人现刻在华所享之权利、特权及自由，在此新设政府之下，应当继续享受，实为十分重要。此种权利、特权及自由，大半基于条约允许，只有一部分乃系由于国家法令或固定习俗所取得。因此之故，列强能于承认之时，要求（中国）新政府正式证明此种权利、特权及自由，以作预防之计，对于列强方面，似甚有益。同时，列强能得上述政府正式承诺中国所负外债，亦极有益。

在承认新政府一事尚未决定以前，暂由列强在华代表及领事，径与中国出名军官协商普通的、局部的事件，实有必要。

因此，帝国政府提议，共同行动之原则，际此目下难关曾经显奏功效者，实应推用及于上述各种问题，如承认新政府问题以及行动步骤问题，其间列强当可一致进行。而且承认之举，应以新政府担保尽力保护列强在华公共权利及利益为条件。

假如上列各项提议，列强可以承受，则藉此一致行动之举，当可获得较为有利之保证，而承认问题亦将易于解决。帝国政府并望赐给驻京代表关于此事之必需命令。

二十四、德国外部代理秘书 Zimmermann 致德国驻英大使 Marschall 男爵之文件（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自柏林寄。）

据（吾国）驻华公使报告，英商出资经营之天津报纸，名为 The China Times（京津泰晤士报?）者，近曾发表许多论文，其中主张英国干涉中国乱事之论调，日益明了显著。在六月十七日之该报中，即已对于英国干涉 Kau-lung（九龙?）方面一事，大为辩护。并谓著名华人方面，为南省利益计，亦尝赞成此举。在七月六日之该报中，干涉问题，便已成为全篇论文之主旨，其中并曾述及英国方面之军事准备，篇末更献议（英国）政府，采取积极政策，占领广州 Kau-lung（九龙?）铁路及其附近。并谓所有在华英人对于此举，无不完全同意。在七月八日之社论中，复因行刺香港总督事件之故（原书旁注：按一九一二年七月四日，曾发生手枪行刺新任香港总督 Sir Henry May 未遂一事。此事系由中国皇党命人为之，欲以此挑拨英国，反对共和政府），遂认干涉一举，为保护危迫 Shameen（沙面?）之当然结果，不久当可实现。并以某国——日本——为此种日益蔓延的乱事之主持者。最后乃以“干涉之举殆为绝对必要”（almost absolute necessity of intervening）一语为结。

该项报纸虽非代表英国政府意见，但此种言论系从英商方面发出，不能完全漠视。

至少含有表示在华英商论调之意义。

因此，余得忝叨荣幸，敬请阁下，如遇机会之时，可使（伦敦）外部注意及此。并表示吾人甚信英国政府亦与德国一样，不为报纸鼓吹所惑，严守中国领土完全以及外人不加干涉之原则，一如至今所持态度，即在将来亦复如此。

所有关于此项接洽之经过情形，余敬望阁下见示。

Zimmermann

二十五、德国驻英代办 Kühlmann 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二年八月六日，自伦敦寄。）

关于 China Times（京津泰晤士报?）鼓吹一事，余曾向此间管理华事当局谈及。彼允向 Sir E. Grey 提及此事，使其注意。彼并特别郑重声明，英国政策，除维持中国领土完全外，实无他图。Sir E. Grey 绝对严守不干涉原则，并将照旧努力，以保持列强关于对华问题之协调。

R. V. Kühlmann

二十六、德国驻华公使 Haxthausen 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自北京寄。十月三日到柏林。）

此间中国舆论及社会方面，对于英国西藏要求，虽然不乏猛烈攻击，但皆具多少让步倾向，终于屈受。反之，彼等对于德、美两国处此英、俄、日三国行动所造成之局面，究采何种态度，则日益注意不已。

华人方面初以为法国对滇，当能忠实相待者，乃近来常在报上屡得相反消息。更因 Manchester Guardian 之电报，谓英国政府预料，法国将以最近变乱之故，合并云南云云，愈为推波助澜。上海方面之孙逸仙[①]“中国共和党”[②]，据云此时与此间美国使馆通其声气。该党提议组织德、美、华“三国同盟”，以对抗（英、日、俄、法）“四国同盟”。并谓假如德、美两国东亚政策不加以变更，则彼等在华政治地位，行将降

① 孙逸仙（1866—1925）：我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905 年组建中国同盟会，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提出“三民主义”学说。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② 中国共和党：1912 年 5 月 9 日，上海民国公会、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等，正式合并成立共和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蒙古族）为理事。党义是：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其政治含义就是强化袁世凯的权力基础，反对同盟会对袁世凯的制约。5 月 29 日，在北京成立本部。实际上，中国共和党成为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之主要反对党。但德国驻华公使却误以为中国共和党仍为孙中山领导。

为零度云云。美国使馆某君，素善传达美使意见，近来曾向我们使馆某员言曰：若要援救中国脱离瓜分之危，只有一个方法，即美、德两国切实合作而已。从速承中华民国及其现有领域，并保证彼之合法地位，实为防护我们双方势已陷于危境的利益之最好方法。

我们无论如何，必须随时注意，此项“四国同盟”之政治结合，终将于此现在“六国团体”之中另自造成一派，以使我们及美陷于孤立。但美国在华，就经济方面而论，与我们竞争最烈，倘上述情形发生之后，究竟美国是否永与我们合作，却是未敢深信不疑。

除了最近陈报之某某方面故意欲将亲王 Heinrich 殿下勾留青岛一事，解作德国某种政治野心外（按普鲁士亲王 Heinrich 代表德皇参加九月十三日日皇葬礼，归途之中，曾于九月二十六日前到青岛），所有此间中国报纸及洋文报纸，尚无何种关于德国扩充山东势力的行动之论载。有一法俄机关报纸，名为 Journal de Pékin 者，曾经设问道：“但德国究以何时弃其冷静态度。”（Or l' Allemagne，quand sortirat-elle de sa froideur）反之，美国报纸名为 China Press 者，则谓德国就经济方面而论，业已完全据有山东，若欲图谋政法方面之发展，则势将费去许多金钱劳力，而其结果，并不能赢得丝毫经济利益云云。

V. Haxthausen

二十七、德国驻华公使 Haxthausen 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自北京寄。一九一三年正月五日到柏林。）

秘密。

余近来曾与荫昌将军[①]会晤，谈及新任驻德华使问题。该将军本人欲得此缺，曾经努力运动许久，但现在彼却表示暂时不愿任此。盖彼认为此间形势极不稳固，甚愿静待前途如何发展故也。余又从他方面某君处闻知，该将军曾向人言，彼不愿作此种民国纸扎房子之公使前往柏林云云。当余与该将军谈话之时，彼曾语及勾留青岛之退职满党一事。彼谓彼从华人及德人方面闻知，当普鲁士亲王 Heinrich 殿下逗留青岛之际，曾与此项满党来往甚密，并曾接见恭王云云。荫昌以为，假如此事一旦为中国大众所知，实

① 荫昌（1859—1934）：字五楼，后改字午楼，满洲正白旗人，姓氏不详。生于北京城。1872 年入读京师同文馆德语班。毕业后曾在奥地利学陆军，入军队做实习生，与德皇威廉二世（时为太子）同队，两人感情甚好。曾随李鸿章创办天津武备学堂，与八国联军议和。1912 年 3 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北洋政府成立，荫昌被聘为总统府高等顾问。12 月被北洋政府授为陆军上将，是中国满族上将第一人。

属最可惋惜。又荫昌曾与上述某君晤谈，谓殿下曾向恭王[1]宣言，彼本人与其皇兄（系指德皇而言）将尽力设法以助清室复辟云云。但余与荫昌两人之间，却未直接谈及此项宣言之事。余曾答荫昌云：余对于接见恭王之举，事前并无所知，其后虽于十一月初间得悉此事，但谈话内容如何，却不知之。（原书旁注：关于普鲁士亲王 Heinrich 与恭王在青岛晤谈一事，系在十月六日，此事曾见于亲王 Heinrich 一九一二年十月六日致彼之皇兄详函中。据云，恭王晤见亲王 Heinrich 之时，曾请求赞助中国复辟之举。但亲王 Heinrich 曾向其解释，德国行动实有应极谨慎之必要，“以免他国因此问题发生嫉妒怀疑吃醋之事”云云。）不过，余可以向君保证者，即帝国政府对华政策系以忠实无偏之态度，对于中国政府之发展与坚固，常用善意的注意云云。余曾请求荫昌照此意思，凡遇谣传有碍德国对于中国现政府之邦交者，请引余言为证，加以更正。

关于殿下接见复辟党魁恭王一事，已于前次报告阁下。其间余更从各方情形，察知此间外人方面，颇以为殿下勾留青岛一事，中国复辟党徒曾发生无限希望云云。同时，余更毫无疑惑者，即此项事实，已为此地政府中人所知悉，难免不加以利用，以使我们政府对华政策，发生不利之情形。

余敬请阁下自行定夺，究竟在此情形之下，可否现在即将我们对于中国现政府之确实友谊态度，特别表示一番。但宣言之中，无论如何不要牵及上述（青岛）事件，只是声明我们对于现在政府，甚抱善意而已。其间尚有一事须加注意，而且前次业已报告阁下者，即据各方情形观之，反动派之运动，业已着手进行，但彼辈所具能力与前途希望如何，暂时尚不能加以评断。此外，尚望勿令社会方面特别注目者，即青岛在实际上，确成许多清室党徒之一种逋逃薮，以及一般反对现政府的民国官吏之避身地。

至于此间报纸对于殿下与恭王会晤之事，至今并未登载。

V. Haxthausen

二十八、德国外部代理秘书 Zimmermann 致德国驻华公使 Haxthausen 之电（一九一三年正月十日自柏林寄。）

答复上年上月二十四日之报告——A 字第三一一号（按即上列第二十七篇）。

阁下如遇有谣言，谓帝国政府赞助清室复辟运动者，请加以相当辟正。并将帝国政

[1] 恭王（1832—1898）：即恭亲王奕䜣。满族，爱新觉罗氏，道光皇帝第六子，咸丰初封恭亲王。1860 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被任为全权大臣，与英、法、俄分别签订《北京条约》。1861 年，主持各国事务衙门。咸丰帝死后，在英、美、法、俄的支持下，与慈禧太后同谋发动祺祥政变，任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主张“借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又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展洋务活动。

府对于现在中国当局之完全真实友谊态度，加以特别声明。

Zimmermann

二十九、德国驻华公使 Haxthausen 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三年三月十六日，自北京寄。）

余于附件之中，敬将本月十日（德国）领事 Merklinghaus 一函抄呈阁下。该函系报告山东都督（周自齐）以及素与中国政界有关之某君，关于中国北部反对共和运动，行将拥护现住青岛的恭王为帝之谈话。

现在此间尚未新露何等朕兆，足以看出行将发生此种复辟之举。因为一部分过激国民党分裂之故，选举袁世凯之形势其间愈见顺利。新任驻德华使颜博士曾向余云：照现刻估计，选举总统之票数，当有百分之八十落在袁世凯身上。据一般揣测，国会开会当在四月中旬。许多议员现已来京。据说袁氏之选举竞争者黄兴①，以及国民党预拟之少年内阁总理宋教仁②行将抵京。并闻国民党甚欲组织一种完全政党内阁。即或将来袁氏被选，新阁已组，而宪法党派两种激烈战争，仍不能免。国民党要求无条件的接受彼辈所组织之政党内阁。而且现在即已开始争论，究竟国会颁布新宪一事，应于总统选举以前，或在选举以后行之。关于此项宪法之草拟，系请日本法律家 Ariga 于五个月内编成之。Ariga 乃系现在中国大部分少年政客之教习。半官性质之 Peking Daily News（《北京日报》?），曾对于此种政党专权野心之可忧现象，加以抨击。彼谓此种政党争权之举，乃建于个人野心与阴谋之上，并非立于国家观念之上也。究竟袁氏是否仍旧沉机观变，并使党人内部自行破裂，抑或袁氏无法敷衍下去，竟出于篡夺一途而不辞，一如彼之敌党时常用以谤彼者，吾人此时皆不能加以预断。如果出于篡夺一途，则 Merklinghaus 信中所言，（中国北部所酝酿之反对共和运动），愈有见诸事实之可能。但满清复辟恭王为帝一事，则必须中国全部瓦解，始可言及。

若能依法组织正式政府，以及袁氏当选（总统），则承认问题一事，势将日益接近。华盛顿政府方面（对于此事），似乎极好商量。美国驻华代办（E. T. Williams）曾向

① 黄兴（1874—1916）：近代民主革命家。原名轸，字廑午，又字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1902 年夏赴日本留学。1904 年与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1905 年在日本拥护孙中山组成中国同盟会。1907 年起，先后参预或指挥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广州新军起义等。1911 年，与赵声领导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武昌起义后，被推为革命军总司命。1912 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总长。1913 年 7 月由上海至南京任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流亡日本。

② 宋教仁（1882—1913）：近代民主革命家。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904 年与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1905 年参加同盟会，任《民报》撰述。1912 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总裁，8 月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他颇想成立政党内阁，以制约袁世凯。1913 年 3 月国会召开前夕，他被袁世凯派人刺死于上海。

余表示：若能现在即行承认民国，以使袁世凯被选之事，从兹稳确，当甚有益。要之，无论如何，一到选举既过，即行承认必不再待其他各国，以及尚拟提出特别条件之某某列强，一齐决定承认之后，始行着手承认。

余以为倘若我们方面亦能于袁氏当选之后，立即注意承认一事，当甚有益。

V. Haxthausen

三十、德国外部秘书 Jagow 致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之电（**一九一三年三月三十日，自柏林寄。**）

驻美日本大使（Chinda 男爵）曾奉本国训令，特向美国当局提及：前此美国政府对于承认中华民国一事，曾经允许列强采取共同行动云云。请阁下亦向美国当局提及此项约言。

请以电报见复。

Jagow

原书旁注：按日本此举，系与美国退出“六国团”一事有关。一般人均视美国退出该团之举，为美国单独承认中华民国之预备步骤。

三十一、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密码，一九一三年三月，自华盛顿寄，四月一日到柏林。**）

答复第三十三号电报（按即上列第三十篇）。

因余与（美国外务卿）Bryan 先生明日始能见面之故，余乃向外务部员某述及此事。彼谓此间政府对于前此约言，未尝去怀；但此项约言曾附下列一条，加以限制，即“若因此而发生过分迁延情形则为例外”（unless undue delay is caused hereby）是也。此间对于此事，现尚未曾决定云云。

余觉得美国方面行将坚持其主张，因为确有“过分迁延情形”（undue delay）故也。

Bernstorff

三十二、德国外部秘书 Jagow 致德国驻英大使 Lichnowsky 侯爵之文件（**一九一三年四月三日，自柏林寄。**）

兹将（我国）驻华公使上月十六日对于中国时局情形之报告一件（按即上列第二十九篇），敬谨抄呈阁下，以便阁下详知此中情形，并希阁下便中探察 Sir Edward Grey 对于承认中华民国问题，究取何种态度。

余（前此）曾亲告阁下，日本政府于去年二月曾经提议，列强对于中国问题至今所

持之合作态度，应该推而及诸承认中国新政府事件云云。据（我国）驻美大使报告，当时美国政府亦曾承认此项提议，但此种允诺之下却附列“若因此而发生过分迁延情形则为例外”（unless undue delay is caused hereby）一语，加以限制。照最近（我国驻美大使）Bernstorff 在华盛顿所得印象观之，则该处对于承认中国问题，诚然尚未决定，但现在美国政府似颇认为确有“过分迁延情形”。

余对于阁下所探得之结果，极愿乐于一闻。

Jagow

三十三、德国外部秘书 Jagow 致随侍德皇行在的参议 Treutler 之电（时德皇驻跸 Homburg，密码，一九一三年四月五日，自柏林寄。）

钦命驻美大使四月三日报告：

“（美国外务卿）Bryan 先生当面向余以及其他各国使臣，发出下列通知：

‘总统望余告知阁下，并由阁下报告贵国政府，彼（指美国总统）欲于四月八日（中国）国会聚集之日，承认中国政府。彼并望余告知，彼甚盼请贵国政府合作，同时为之。’”云云。

各国对于美国建议之确切表示，尚未发表。日本方面似乎不甚倾向承认一途。俄、英两国则又好像要求中国先行承认彼等蒙、藏特别利益为其条件。至于法国当惟俄国马首是瞻。

长此迁延承认，则我们势将陷于甘为其他列强代谋在华特别利益之嫌疑。此外，美国倘若单独承认，则彼之在华声势当特别增高，而我们则反蒙不利。因此之故，余以为，假如袁世凯能于国会开会之后，立刻得着特别多数票子当选总统，我们应即决计承认中国。盖彼之个人声望，实足以担保维持国内安宁秩序故也。

请将此意代奏陛下，并将上谕电示。

Jagow

原书旁注：四月六日 Treutler 回电：“陛下准如所议。”

三十四、德国外部秘书 Jagow 致德国驻日大使 Rex 伯爵之电（一九一三年四月七日，自柏林寄。）

答复第十七号电报。（原注：按四月四日 Rex 伯爵拍来第十七号电报，谓日本政府对于美国主张四月八日承认中华民国一事，将向华盛顿方面提出反对之议，并请德国政府亦作同样步骤云云。）

威尔逊总统[1]既已宣言，则向华盛顿提出抗议似将毫无效果。假如袁世凯于总统选举之时，获得特别多数票子，则我们当准备承认。因我们深信彼能维持秩序故也。日本如作同样步骤，当不胜庆幸之至。

请以电报见复。

Jagow

三十五、德国外部政治司长 Stumm 之纪录（一九一三年四月八日柏林。）

Cambon 先生曾以公电一道示余，谓法国政府对于承认中华民国一事，颇嫌为期太早。并希望将来承认之时，须由列强共同为之。法国政府更望帝国政府亦照此意答复日本政府云云。余乃将我们所持论点，告知 Cambon 先生。并谓将来如有必要之时，当在作此步骤之前以及袁氏当选之后，一与其他列强接洽。

Stumm

三十六、德国驻英大使 Lichnowsky 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三年四月九日，自伦敦寄。）

余今日曾得机会，一向 Sir Edward Grey 询问，彼对于承认中华民国问题，究竟采何种态度。该总长乃向余言曰，彼此刻尚不能给余一种确切回答，但在短期之内，当能详细告余。盖彼对此事，计有两种可能情形：或者彼与其他列强，对于承认问题商量一致；或者彼将宣言，据彼之意，承认民国之必要时期，尚未到临。至于美国方面好像亦不复似前此之着急，因四月八日并无承认之举故也。据该总长之意，现在中国局势尚不能令人给以一种信赖的判断，共和民国尚未全然稳固，各省势力似乎日趋独立一途，中央政府势力几乎完全降落。因此之故，中国分裂成为若干部分，或改成联邦国家，均非必无之事。

Lichnowsky

三十七、德国外部秘书 Jagow 致德国驻英大使 Lichnowsky 侯爵之文件（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一日，自柏林寄。）

阁下本月十四日——第二三七号——报告内所转来之英国政府关于承认中华民国问题通牒一件，即请依照下列意思，回答英国政府：

---

[1] 威尔逊（1856—1924）：美国总统，1913—1921 年在职，民主党人。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和校长、新泽西州州长。总统任内促成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 年 1 月，倡议建立国际联盟，并提出所谓“十四点”和平纲领，旨在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夺取世界霸权。

帝国政府实与英国政府相同，不能断然决定遵从美国方面之建议，亦不能对于承认中华民国一事，仅凭中国国会组织开议一事为转移。帝国政府之论点，乃在先候中国总统选举之结果，然后始能谈及承认问题。袁世凯如能得着大多数票子当选总统之时，则帝国政府却甚倾向承认中华民国一途。因袁氏个人声望，足以担保维持国内安宁秩序故也。若在总统选举之后，立即继以承认，则据我们意见，不仅对于袁世凯之权力加以增进，并能助彼抵抗中国南方之分裂企图。假如英国政府亦复赞成此意，则帝国政府将不胜庆幸之至。

至于正式承认外人在华之一切条约的及惯例的权利一事，就国际原则而论，中国新政府当然应该全部承认，（无待赘言）。因此之故，帝国政府以为此种当然之事，将来承认之时，殊无特别加以声明之必要。

Jagow

原书旁注：德国政府曾以同样意旨于四月二十六日答复日本四月二十二日通牒："帝国政府对于承认中国新政府问题，应当从速加以讨论一事，正与日本帝国政府之希望相同。（德国）帝国政府，在此情形之下，诚然主张暂待中国总统选举结果，但袁世凯如能获得大多数票子当选总统之时，则（德国）帝国政府即当决计承认中华民国。盖袁氏声望足以担保维持国内安宁秩序故也。倘若日本帝国政府亦以此意为然，则（德国）帝国政府，将不胜庆幸之至。"此项复牒原文曾于四月二十七日用第七十三号及第八十八号公函通知德国驻日大使及驻华公使。

三十八、德国驻英大使 Lichnowsky 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八日，自伦敦寄。）

此间政府因答余前次依照训令所行步骤之故，曾将该国对于承认中华民国一事之论点，于本月二十四日说帖之中，加以说明，兹特敬谨抄呈。

该说帖之中，谓英国政府决计附和日本政府所持态度。日本政府方面，近来曾向英国政府续提数种关于态度问题之建议。现在业已训令英国驻华公使（Sir J. N. Jordan），对于此事，会同驻京各使，依照日本建议原则，加以讨论。又此项日本建议，想（柏林）帝国政府方面亦已同时接到矣云云。

Sir E. Grey 并闻日本政府之意，关于担保实行日本所拟各种条件之手段，应听驻京各使相机为之云云。该（英国）总长对于斯议，亦复加以赞成。

该总长个人当然希望此项问题，能与（德国）帝国政府一致进行；惟英国政府此时业已发出宣言，听从北京使团议决，假如此项议决能符日本政府所拟原则云云。又该总

长甚望（德国）帝国政府赐给驻华德使之训令，能与此项论点一致。

Lichnowsky

三十九、德国驻华公使 Haxthausen 致柏林外部之电（密码，一九一三年五月二日，自北京寄。）

美国驻华代办今日曾将威尔逊总统承认中华民国之通知一件，递与袁世凯。

Haxthausen

四十、德国驻日大使 Rex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密码，自东京寄。一九一三年五月四日，到柏林。）

（日本）外务大臣邀余相见，并求余拍电（柏林），谓日本为已贷之款须谋稳确起见，甚望列强对于承认中国一事，务须同时为之。就中国现状而论，列强颇有共同行动之必要。

英国（驻日）大使（Sir W. C. Greene）语余，英国完全赞成日本论点。我们如果单独行动，日本方面似将深感不快。

Rex

四十一、德国外部秘书 Jagow 致德国驻日大使 Rex 伯爵之电（一九一三年五月七日，自柏林寄。）

答复第二十一号电报（按即上列第四十篇）。

专就我们舆论及国会方面情形而论，对于承认问题，已有坚持原来论点之必要。日本如能作同样行动，我们实始终盼望。

秘密奉告：倘若我们接受日本论点，将使我们陷于日本对华政策之牵绊中，对于德国利益实无好处。

Jagow

四十二、德国驻华公使 Haxthausen 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自北京寄。五月七日到柏林。）

阁下各种训令，使余得知德国政府对于承认中华民国问题一事，决计不受其他列强论点之支配。

总统选举之期，现在仍未确定。国会至今犹未组成。就其所拟议案而论，暂时实以宪法问题为首。但是政治方面，如果一旦发生意外转变，则利用国会优良形势，迅速选

举袁世凯，亦并非必无之事。

余于前数日既已向着（临时）总统，报告德国方面关于承认民国问题及选举袁氏问题所持之态度，则我们将来表示承认之期间，切勿后于其他亦以袁氏选举胜利为承认前题之各国。

因此之故，余相信当能得着阁下之同意，假如袁氏一旦多数当选，余将不再拍电请示，立即亲向（中国）外交部递一通牒，表示（德国）帝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关于此种书面承认宣言之形式，尊处如有特别意见，即请赐电训示。

V. Haxthausen

四十三、德国外部秘书 Jagow 致德国驻华公使 Haxthausen 之电（一九一三年五月八日，自柏林寄。）

答复四月二十五日 A 字第八十六号报告（按即上列第四十二篇）。

同意。通牒形式听阁下为之。

Jagow

四十四、德国外部代理秘书 Zimmermann 致德国驻华公使 Haxthausen 之电（一九一三年五月十四日，自柏林寄。）

答复第五十一号电报（按 Haxthausen 于五月十三日曾发第五十一号电报，报告近来颇有法国行将承认中华民国之传闻云云）。

假如他国，尤其是英国，在总统选举之前，即行宣言承认，则阁下亦宜立刻表示承认。

Zimmermann

四十五、德国驻日大使 Rex 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三年五月九日，自东京寄。五月二十五日，到柏林。）

美国承认中国一事，日本报纸大加抨击："此种承认对于中国丝毫无益；其余五国，允许中国借款所表示之对华友谊，实较确切许多。美国此种专凭己意，旁若无人之行动，实使大家均感不快。美国欲以此种谄媚中华民国手段，获得中国特别友谊，究竟美国此种目的能否达到，确是一种疑问。华人对于世界各种事变，极为注意，彼等眼见美国旧金山方面侮辱日人之行为，定能深自警戒，切勿陷入美国圈套，以免初为人所利用，后又被人驱逐。美国旧金山法律之使华人深蒙不利，固正与日人相同也。"

日人对于美国行动之愤怒，当然不是为中国自身福利着想。又彼等对于美国承认中

国一事之不乐程度，尤为特别加重者，即美国恰在施行旧金山法律侮辱日人之时，故意对华表示友谊是也。日报之引举此项法律，在使华人注意中日共同利害，对于美国不加信任。——此种引证其势当不能发生效果，盖旧金山法律之不利日人情形，迥与不利华人情形相异也。

A. Rex

四十六、德国驻日大使 Rex 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三年五月十日，自东京寄。五月二十五日到柏林。）

在邮局快将关闭之前，余拟用简短数语，将余对于承认中国问题之意见，敬向阁下陈述。

我们对于承认问题，应该保留自由行动，固已毫无疑义。但承认之时期，却须十分谨慎选择。现在所当考虑者，中国南方反对袁世凯之运动，大为增长；因此之故，现与我们尚称友善之中国南方，对于我们承认袁氏民国一事，并不加以感谢。

究竟我们单独承认所得之利，果能大于我们对华政策被人怀疑所受之害，则只有深悉北京政府方面对于我们承认价值是否重视之人，方能加以判断。余之责任所在，应当上陈者，即日本方面甚望共同行动。Makino 男爵曾向（此间）英国大使表示，甚以我们态度为忧。

A. Rex

四十七、德国外部秘书 Jagow 致德国驻华公使 Haxthausen 之电（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七日，自柏林寄。）

因日本方面之建议，余特委阁下参加讨论承认中华民国问题之（北京使团）会议。请将我们向来所持论点提出。但若会中议决在总统选举之前，即加以承认，则亦勿加反对，而与其他各国共同表示承认。

Jagow

四十八、德国驻华代办 Maltzan 男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五日，自北京寄。七月二十七日到柏林。）

余谨将半官性质的 Peking Daily News（《北京日报》?）今日所登关于江西乱事之论文一篇，敬呈阁下。（原书旁注：一九一三年七月中旬，中国南方江西、江苏、安徽、湖南四省宣布独立，由此又复从新发生内乱。独立省分方面，曾得日本暗中帮助。而袁政府方面，则以一月期间削平乱事之故，深得英、德等等之同情。关于承认中华民国问

题一事，本在春间业已似将解决者，至是复因内乱之故，大为延置。）

该文最为引人注意之点，系在显然激烈攻击日人煽动促进中国革命一事。从前《北京日报?》对于一般华人早已指责日本之情形，本来甚为缄默，不肯有所论列，现在则以江西乱事之故，大为刺激，不复有所顾忌，直谓日人对于南方革命运动一事应负其咎。

该报以为，若无上海长江各处外国租界，尤其是日本租界之庇匿，则一切煽动党徒业已被捕，而革命运动亦早为中央政府所削平矣。所有各种阴谋变乱之举，其线索无不发自上海汉口租界。

该文并述前任江西都督李烈均[①]被袁世凯撤职之后，如何逃避上海外国租界，并由该处阴谋促进江西乱事。数日之前，李氏曾偕许多日本军官，驶往九江，以便指挥该地革命运动。

该报并谓最近武昌乱事之煽动诸人，曾受日人之助，乘坐日舰潜逃。据可靠消息，现在江西变乱之中，实有五位日本军官参与其事，并有三只日本战舰开往九江，以作（南军）侦探之用。

该报认为此种帮助革命运动之情形，实令人不可忍受。于是特别明白要求日本，设法阻止日人再行参与现刻乱事。

该报以为此次九江叛乱，实少成功之望。并相信此种叛乱，将被其间大为增厚之北军军力完全削平。该报最后更表示叹惜不已者，即此次所有祸魁，当然又可逃往上海，再由该处从新鼓动，密谋变乱。该主笔并惧此种十分危险之政法煽动，势将永无停止之时，倘若中国政府一日不能逮捕潜匿租界之乱徒，倘若外国官厅一日不将此事认为己所当负之职责。

该文因其攻击日人甚烈之故，颇引一般注意。此种半官报纸之攻击，据余观之，所言不为无理。盖日本军官之参预九江乱事与日本军舰之派往该处，已从其他可靠方面加以证实。又如日人之不断的煽动反对此间中央政府等等，皆足以看出日本政府如何充分情愿，帮助（中国）一切反对中央权力之运动。

在昨日某处宴会之中，曾有多数能操德语之中国军官参与。对于日本所持（助南）态度，颇表示其不胜愤恨之情。但是无人相信总统方面，敢向日本要求正式表明态度。

Malfzan

---

① 李烈均（1882—1946）：原名烈训，又名协和，字侠如，号侠黄，江西武宁县人。曾留学日本，1906 年加入同盟会。1912 年 3 月任江西都督，大力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改革。1913 年 7 月，孙中山、黄兴掀起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李烈均被推举为江西讨袁总司令，在湖口誓师讨袁，通电全国，痛斥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意图破坏共和，为全国之公敌。”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严重，李烈钧一再致电蒋介石，主张对日抗战，要求改良政治，尊重言论自由，以维系人心，一致御侮。1946 年 2 月，李烈钧病逝于重庆。

四十九、德国驻日大使 Rex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密码，自东京寄。一九一三年七月三十日，到柏林。）

所有日本报纸，日日皆在攻击德国积极帮助北军[1]；谓有德国军官若干曾于九江受伤；兵工厂一役，德国战舰曾给（北军）军火子弹云云。望向报纸严重更正。

Rex

五十、德国外部秘书 Jagow 致德国驻日大使 Rex 伯爵之电（一九一三年七月三十日，自柏林寄。）

答复第三十六号电报（按即上列第四十九篇）。

德国因其在华重大经济关系之故，甚望中国早日平定革命之乱；但却未尝有意破坏放弃中立态度，积极帮助任何一方。所有关于德国军官、战舰参预其事之传闻，完全不确。请将上述各语，向着该处公众表示。

Jagow

五十一、德国驻英大使 Lichnowsky 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三年八月八日，自伦敦寄。）

余曾遵命往询 Sir Edward Grey，究竟彼对于日人破坏中立之行为，是否现有或曾有意思，一向东京方面提出抗议云云。Sir Edward Grey 答曰，彼曾据报纸所载日本军官参预中国南方乱事之消息，特与此间日本大使（Inouye 侯爵）晤谈，并对该使解说此种态度之危险。未几，Inouye 侯爵曾奉本国政府之命，向着 Sir E. Grey 回答，谓日本政府业已禁止一切现任军官及官吏，参与其役。对于（日本）私人方面，亦曾加以通告，彼等关于此事之举动，万勿预计可得本国政府之助，将来所有结果均须自行负责云云。其后，Sir E. Grey 对于此事，不复再作其他行动。虽彼自此以后，犹常接到日本领事暗助革命之消息，但此项消息，后来未能充分证其确有根据。

Lichnowsky

德外部 Zimermann 旁注：我们亦复屡向此间日使表示（此种态度之危险）。该使答余之词，亦与上文所述相似。

---

① 北军：辛亥革命后，通常将南方革命党人率领的军队称为"南军"，将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军称为"北军"。

五十二、德国驻华代办 Maltzan 男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之文件（一九一三年七月三十日，自北京寄。八月十三日到柏林。）

因为（日本）明助今次革命，而此役经过似又对于北方袁世凯一面极为顺利，于是日本在华迄今所具之势力，大为动摇。（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好。）据总统亲近之人所谈观之，实可以看出袁世凯最后毕竟察出日本势力之危险，尤其是军事及交通方面。

其最为明显之例，即总统已将全受日本支配的孙逸仙（德皇威廉第二旁注：贿赂）之督办巨大铁路任务撤去。此外尚可注意者，即中国对日失望之后，又复力谋与德特别联络。就华人性质而论，依照欧洲观念，虽然劣点不少，但却颇知感激。吾人毫无疑惑者，即袁世凯对于德国政府现正心感不已。实因德国政府自革命初起之时，立即站在袁氏方面；并促使初甚消极之英国改持同样态度。盖日本在长江之行动，固使英国亦复甚感不便故也。至于其他各国政府之态度，若就此间各使行动观之，则至少系偏于观望一途。美国方面，因其承认中国结果未获预期利益之故，初颇露其不乐之意，因此所传革命消息，最初颇带南方色彩。俄国方面对于日本之预谋革命一事，必定其为接近。（德皇威廉第二旁注：乃系约定!）关于此事证据不少，譬如俄、日总领事在武昌副总统方面之秘密行动，早期被人发现一事，以及同时 Tsitsikar（齐齐哈尔?）方面之武力压迫，最为引人注意一事。（俄国驻华公使）Krupensky 先生眼见中国重新陷入难关，其欣喜之情，初时几乎不能掩饰。彼曾故意谓余，北方之希望，确是狠少云云。迨至革命运动南方渐形不利之时，而该使乃反为非难日本不道德举动之第一人。该使在此每遇困难之时，辄以彼之法国伙伴为其傀儡。M. Conty 亦复每在大众之前，尽心将俄暗嘱，一一加以实行。彼常拒绝引渡汉口法国租界以内所获之乱党，彼更竭力反对德、英两国拟用改造借款名义，先行支付上海舰队及兵工厂饷款之举，彼对于乱党认为交战团体，而不以乱党视之。俄、法机关报纸 Journal de Pékin 对于德国政府之袒护北方，曾加以非难。最后 M. Conty 更据领事电报，散播一种不确消息，略谓中国乱党曾将南京德国领事袭击，以报引渡汉口乱党之仇云云。现在时局既已利于北方，于是 M. Conty 之见解，亦复大为改正。所有全部乱事期间之内，德、英两国使馆方面，以及最后美国使馆方面，无不彼此随时协商一致进行。（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好。）凡有行动，尤其是德、英使馆之间，无不先行详加协议。（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好。）此种由德华香港两家银行巧妙助成之德、英合作，乃使袁世凯始得有此北方能占优势之局面。

袁世凯得着最后胜利，则英国必将不使此种良好机会放过，尽力利用无疑。至于德国方面至少必须享受同等权利。（德皇威廉第二旁注：非如此不可。）

由最近曾经呈报之与总统长子（袁克定）晤谈一事，以及其他谈话观之，则可察知，现在总统对于德国要求，尤其是军事及交通方面，确愿较前多许。因此，在最近之

将来，实为取得中国政府应允德国要求之适当机会。（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好。）

Maltzan

五十三、德国驻日大使 Rex 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该使其时寓居 Nikko。一九一三年八月十日，自 Nikko 寄。八月三十日到柏林。）

依照所赐训令（参阅上列第五十篇），余对于报纸讹传德国对华政策与德国军官战舰参预战役一事，曾在各该西文日语报纸之上，加以驳正。——兹将本月三日 Japan Times 所载此项驳正宣言，剪下寄呈。——宣言之中，曾依照训令，声明德国因其在华经济关系甚为重大之故，只望中国乱事早日结局，但却未尝有意加以干涉。所有报上登载德国军官战舰参预其事之消息，皆系毫无根据云云。关于措词方面，似以不必特别提出"中立"一语为佳。盖最近此间报纸，因讨论日本态度一事，对于"中立"名词之解剖，曾发生一场激烈辩论故也。余果采用"中立"一语，势将引起辩论，继续不已。就宣言之中所择各语而论，实无再行引起讨论之可能。余并觉得，即此已足使令报纸谣传德国干涉之事，完全消灭。据近来报纸态度观之，此次更正之举，实已完全达到目的。所有前此各报之喜将该项谣传散播者，近来业已信任我们宣言，凡与该项宣言抵触之消息，自此以后，确已不复发表。

A. Rex

五十四、德国外部秘书 Jagow 致德国驻英代办 Kühlmann（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自柏林寄。）

钦命驻日大使来电报告如下：

"（日本）汉口驻军之换防人数六百五十名，以及京、津之间换防人数一千二百名，现在即行派遣，而向来换防之举，则常在十一月初间为之。（日本）内阁现处于十分困难之境。人民方面诚然尚未激动，但反对党方面却力迫内阁不已，假使中国若不从速接受条件。（原书旁注：日本政府于九月十日左右，因为中国被煽居民屡向日人暴行之故，特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此项提出通牒之举，颇引起一般人发生日本武力行动之忧。其后因中国接受日本条件之故，此项危险乃归消灭。）日本武力行动之举，实属可能。但俄国大使（Malewsky-Malewitsch）却向余保证，（日本）此种行动，当不在满洲之内，而在长江方面。至于英国大使，则自谓对于日本方面之意见，彼实未尝有所闻知。余乃向彼言曰，余盼望日本政府当能将其决定的行动，告知我们两人云云。"

请将此项电报内容，告知伦敦当局。并声明我们相信，英国政府必能劝告日本采用聪明和缓手段。盖英、日同盟固尝保证中国独立与完全故也。但就现在日本国内激昂情

形观之，一旦日本政府被迫出于武力行动，却非完全必无之事。因为我们既与英国同是希望“一个强而统一之中国”（a strong and united China），所以一旦日本果有武力干涉之举，我们甚望能与英国政府交换意见云云。请用电报报告。

Jagow

五十五、德国驻英代办 Kühlmann **致柏林外部之电（密码，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自伦敦寄。）**

余曾依照训令，一与（外部副秘书）Sir E. Crowe 会谈中国时局。彼谓，据此间所知之日本条件，似乎并非不合情理。中国方面实可使此种难关从速解决，如能对于日本与以诚意的迅速的赔偿。（伦敦）外部方面并不相信日本将用何种武力行动，足以危及中国领土完全。而且日本在此，曾向外交方面特别努力运动，从速承认中华民国，（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在孙逸仙之下吗!?）足见日本并无采取武力政策之意。（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因为日人固不相信中华民国能够维持！彼等并且深惧袁世凯成为迪克推多。袁氏足使中国巩固，恢复中国秩序。）该秘书甚愿常将伦敦方面意见，时时告知我们。

Kühlmann

五十六、德国驻英代办 Kühlmann **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自伦敦寄。）**

此间政府，因受远东最近传来消息之影响，对于前此所抱见解，略有变迁。现在该政府认为日本武力干涉之举，确有可能性质。但该政府却相信，日本此举，只在安慰本国民意起见，特迫中国明白承认赔偿而已。此外当无其他深谋远虑之侵略久占计划云云。

R. V. Kühlmann

五十七、德国驻华代使 Seckendorff **男爵致柏林外部之电（密码，一九一三年九月，自北京寄。十月一日到柏林。）**

与六月十七日第四十四号电报有关（按即上列第四十七篇）。

今日外交团会议之中，日人（Yamaza）曾声称，愿于总统选举之后，承认中华民国，倘若中国政府对于历来条约上之对外义务习惯权利等等，正式加以承认。（原书旁注：日本政府关于承认中华民国问题之态度显然转变一事，可于十月十九日 Rex 伯爵之报告中见其端倪：“日本政府忽将其向来态度改变，主张立刻承认中华民国，颇使一般人大为惊讶，出于意外。因而对于此中秘密关系以及必有他项暗约之种种揣测，继续不断。其实，日本政府对于列强同时承认一事，固时常努力不已，以防其他各国落于德

国之后。Makino男爵与余某次会谈之时，曾经向余示意，谓俄国方面对于承认问题一事，态度极为不明。"云云。）而且日人提议，非正式的劝告内阁总理（熊希龄）[1]，于中国通牒之内，除通知总统选举结果外，并须随带下列宣言，咨交各国公使："所有前清时代及临时政府[2]与外国政府、公司、私人所订之一切条约、合同以及其他约定，均将严格尊重。所有外人在华依据国际约束、本国法令、固定习惯所享之一切权利、特权、自由，特此保证承认。"

英人方面赞助此议。俄、法两方均言当向本国政府请示。余则将政府四月二十七日A字第八十八号训令之意见，声明一番。（请参看上列第三十七篇之"原书旁注"一条。）

因为总统选举一事，据最近消息，将在十月六日八日之间，或者略为提前举行之故，所以日人将于明日私向内阁总理探询。外交团下次会议，系定于十月二日午前。荷兰方面拟于总统选举之后，立即承认，不管日本行动有无效果与否。请赐同样电令。

Seckendorff

五十八、德国外部秘书Jagow致德国驻华代使Seckendorff男爵之电（一九一三年十月二日，自柏林寄。）

答复第一百二十五号电报（按即上列第五十七篇）。

请照历来训令，一俟总统选举之后，即行加以承认，不管日本行动有无效果与否。

Jagow

五十九、德国外部秘书Jagow致德国驻华代使Seckendorff男爵之电（一九一三年十月四日，自柏林寄。）

据（驻德）日本大使通知，谓十月二日（北京）使团会议，各国公使均已赞成日本提议。该提议之中，系主张一俟中国政府将日使所条陈的宣言，用秘密的但系正式的方法发出之后，各国即用内容相同之通牒，表示承认，此项通牒内容，系由日本公使所草拟云云。

即请复电见示，究竟（柏林）日使此项通知，真确与否，究竟中国政府愿意发出日本方面所希望之宣言与否。并请实行承认之前，静候（本部）训令为荷。

Jagow

---

① 熊希龄（1870—1937）：湖南凤凰人，字秉山。光绪进士。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参加维新运动被革职。武昌起义后到上海，与立宪派张謇、梁启超等拥护袁世凯窃国，任财政总长和热河都统。1913年袁世凯解散国民党，他与梁启超、张謇等组阁，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1928年任国民党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

② 临时政府：即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

六十、德国驻华代使 Seckendorff **男爵致柏林外部之电（密码，一九一三年十月五日，自北京寄。）**

答复第八十号电报（按即上列第五十九篇）。

日本公使于（十月）二日会议之中，报告彼与（中国）内阁总理私人接洽之结果。据云（中国）总统将于十月十号革命纪念日就职演说之中，采用日本所条陈的对外宣言，正式向众公布。（中国）外务部方面，将于选举方竣之后，十月十号以前，书面通知各使（此次）总统选举结果之际，同时并用另外牒文一件，将对外宣言内容，先行告知各使。然后各使随即各用同样通牒，不待对外负责宣言（正式公布，）即行承认民国。对于（中国）外务部方面，则另用牒文答复，证明该部所寄之中国对外宣言内容，使馆方面业已收到云云。

对于此种方式，各使……（原注：此处电码缺漏。）惟俄使方面声称，尚未接到关于承认问题之训令。因为华人方面既已愿将日本所条陈的对外宣言，先行咨送各使，而承认一事又在总统选举之后立即实行，不待对外宣言正式公布，所以，余对于使团内部关于承认通牒内容，彼此采用同一词句之议，亦觉有益。日本方面于十月三日会议之中提出所拟（承认）通牒内容，会中稍加修改，即行通过。

选举总统一事，系于明日午前八钟实行。因此之故，敬请立赐训令。正式政府就职之礼，系在十月十日。

Seckendorff

六十一、德国外部秘书 Jagow **致德国驻华代使** Seckendorff **男爵之电（一九一三年十月六日，自柏林寄。）**

答复第一百三十号电报（按即上列第六十篇）。

采用同样的承认通牒一事，表示同意。

Jagow

六十二、柏林外部致中国驻德使馆之牒文纪要（一九一三年十月八日，柏林）

（德国）外务部谨向中国使馆证明，本月七日通牒，业已收到。按该牒内容系报告现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袁世凯，已于本月六日补选为民国正式总统，并定于本月十日举行就职之礼。

（德国）外务部敬向中国使馆表示，其对于此次选举结果之诚恳庆意，并附告钦任（德国）驻华使臣，已奉帝国政府之命，承认中华民国。

李鸿章游俄纪事

译自俄国国务总理 Witte 笔记

题记：1895 年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后，以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集团对沙俄产生了很大幻想，认为依靠沙俄可以牵制其他列强，于是主张“一意联络俄人”。1896 年 6 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清政府派遣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庆贺沙皇加冕，并前往英、德、法、美四国“联络邦交”。李鸿章奉命出使欧美消息公布后，俄国特派专使前往苏伊士运河迎接。到达圣彼得堡后，尼古拉二世亲自接见，给予最隆重的礼遇。在俄期间，李鸿章与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进行秘密谈到，结果于 1896 年 6 月 3 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秘约》。其内容主要包括中俄两国结成对日军事同盟、中国应允俄国修筑经黑龙江、吉林以达海参崴的铁路（即东清铁路）。

李鸿章游俄期间，维特奉命接洽，在谈判订约过程中经常彼此会晤，“与李鸿章甚为友善”。后来他把与李鸿章交往以及《中俄秘约》签订前后的相关情况，用笔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俄国政府内部各派对于如何保障俄国在华利益，特别是谋取中国东北作为其“势力范围”的争执与最终取向。

王光祈于 1928 年在柏林将维特笔记的部分内容由德文翻译成中文，并于 1929 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公开出版发行。

目 次

译者叙言

此书乃译自俄国帝政时代国务总理维特 Witte 伯爵之笔记。维氏（1849—1915）为俄国战前最负时望之大政治家，有“俄国财政界彼得大帝”[①] 之称。当李鸿章[②]赴俄订约之时，维氏正任财政大臣；俄皇以其熟东方情形之故，特令彼与李氏谈判，遂订中俄密约[③]。

---

① 彼得大帝（1672—1725）：即彼得一世，号称俄国最杰出的沙皇。1697 年，曾化名秘密出国旅行，考察西欧文化、科学和技术。回国后，实行一系列改革，积极兴办工场，发展贸易，改革军制，建立正规的海陆军，加强中央集权制。对外方面，通过发动北方战争，战胜瑞典，取得波罗的海出海口；通过对波斯战争，获得里海沿岸一带。

②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1861 年编练淮军，扼杀太平天国革命。1870 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外交、军事、经济大权。自 19 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办近代军事工业，逐步扩大所谓“自强求富”的洋务事业，先后设立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利用海关税收购买军火和军舰，建立北洋海军。对外主张妥协投降，代表清政府相继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

③ 中俄密约：即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1896 年清政府特使李鸿章与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在莫斯科签订。共六款。主要内容为：如遇日本侵犯俄国亚洲东部或中国、朝鲜领土时，中俄两国共同出兵并互相接济军火、粮食；开战时，俄国军舰可驶入中国所有口岸；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两省修筑铁路直达海参崴。从此，沙俄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东北三省。

维氏虽深信俄国实有世界帝国之资格，但同时却能深悉俄国内部各种弱点，故主张和平发展之政策；一方面设法联络中国，他方面则竭力促进国内经济。但俄皇尼古拉第二[①]与其他侵略派，则主张急进，以武力占据中国土地。于是，俄国之中分为和平、急进两派，互相争论不已。

俄皇对于维氏个人，本来不甚喜欢，但以其理财能力与国外信用之故，又不能离彼。其后，急进派终占胜利，一九〇三年八月，俄皇遂免维氏财政大臣之职，而任以一种地位极为崇高但无丝毫实权之部臣协会主席。迨日俄战争（1904—1905）既终，俄皇欲以战败国资格而订不割地、不赔偿之议和条约，因之，举国无人敢任议和代表一职。于是不得不起用维氏，任以赴美与日议和之责；其结果订成有利俄国之和约。旋因俄国革命[②]事起，举国沸腾，俄皇乃根据维氏一九〇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之报告，发表俄国有名之“十月宣言”[③]。更以维氏为众望所归，遂任为俄国第一任国务总理。一九〇六年五月五日，维氏因保守党大地主等等之反对，乃辞职而去。

从一九〇七年夏季起，维氏遂在国外开始作此笔记，至一九一二年三月二日停笔，以后便未再续。记中所载，为尼古拉第二执政时代至一九一二年止之俄国各种要政真相。维氏系于一九一五年三月十三日去世。俄皇曾令人抄没其稿件，急欲获得此项笔记稿子一读，但未被其觅着；盖该稿系以他人名义存在法国 Bayonne 地方某家银行故也。直至一九二二年，此项笔记乃以俄文印成两册行世，一时甚为风行。英、德、法、美各国，皆有译本。德国译本，只译其中重要各章，并未全译；但亦有一大厚册。余所译者即系根据德文译本，而且只择其中四章之与中国有关者。其中前两章，系李鸿章尚在俄国之时，后两章则在李氏已回中国以后，但因此两章中，仍与李氏游俄时所订密约有多少关系，故本书取名《李鸿章游俄纪事》，读者幸勿以名实不符见责。

---

① 尼古拉第二（1868—1918）：俄国最后一个沙皇，1894—1917 年在位，外号“血腥的尼古拉”。1896 年攫取中国中东铁路建筑权，1898 年强占旅顺、大连，1900 年参加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并乘机侵占中国东北。1904—1905 年进行日俄战争。1905 年 1 月，下令枪杀彼得堡的示威工人，导致俄国 1905 年革命的爆发。1907 年 6 月，下令解散国家杜马，逮捕社会民主工党的杜马党团，使全国陷于恐怖之中。俄国十月革命后被枪决。

② 俄国革命：即 1905 至 1907 年的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 年 1 月 9 日（俄历），沙皇政府枪杀彼得堡工人的事件，激起各地工人的抗议罢工和示威游行。10 月，爆发了全俄政治大罢工和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士兵骚动不断，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同年 12 月，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下，莫斯科和其他许多城市爆发武装起义，革命发展到最高峰。1906 年、1907 年又陆续爆发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但革命已转入低潮。列宁称 1905 年革命为“十月革命”的“总演习”。

③ 十月宣言：即“十月十七日宣言”，沙皇尼古拉二世在 1905 年 10 月全俄政治大罢工高潮时期所颁布的宣言。宣言伪称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赦免政治犯，允许各阶层居民参加国家杜马选举，并承认国家杜马为立法机关。沙皇企图以此欺骗群众，平息罢工，进而打击革命力量。

本书第三章中，关于旅顺大连条约[①]，维氏向李鸿章、张荫桓行贿一事，至今真相不明。惟据友人中之研究当时史事者，则谓李鸿章似未收受此款；欧战[②]以后，清理华俄道胜银行，其中曾有华人存款，而姓名不可查考，或即系此项款子。但是此外又有人疑此项款子，系为太后所得云云。至于张荫桓遣戍新疆之际，闻出京时，有向俄使索款之说，则颇迹近嫌疑矣。

中华民国十七年九月二日，王光祈序于柏林南郊 Steglitz，Adolfstr. 12。

第一章　与李鸿章谈判并缔结中俄条约

（俄文原本为第二章）

当（俄皇）亚历山大第三末朝之际，中日两国关系，紧张达于极点；到了最后，彼此遂以兵戎相见。我们当时在远东方面以及海参崴[③]方面之兵力，极为薄弱。于是，我们乃将海参崴全体驻军，调往吉林方面，以免中日军事行动，蔓延北部，害及俄国领土及利益。当时我们所（能）为（者，不过）如此而已。

皇帝亚历山大即于是时物故，中日战事则以日本全胜而终。当尼古拉第二即位之始，日本方面尝将辽东半岛全部占据。其后，该国与华议和，除获得其他各种利益外，其最重要者即为合并上述半岛全部一事。

此即 Lobanow-Rostowski 侯爵接任外交大臣时节之局面。其时，西比利亚巨大铁路正在建筑，差不多已到 Transbaikalien 区域之内，于是发生下列一个问题：究竟该路应该如何取道往下筑去？将由我们领土 Amur 省中大绕其道吗？抑或另取他道，利用中国领土满洲北部吗？

但是此项问题，实系无法解决，而且从未悬揣，我们或可得着中国准其穿过北满之

① 旅顺大连条约：即《旅大租地条约》，原称《中俄会订条约》，又称《中俄条约》。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3 月，清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与沙俄驻华代办巴布罗夫在北京签订。主要内容为：沙俄租借旅顺口、大连湾，租期二十五年，期满经双方同意仍可延长；旅顺口为军港，只许中俄船只使用；租借地内行政完全由沙俄官吏管理；沙俄获得修筑中东铁路支线的特权。同年 5 月，又在圣彼得堡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六款，其主要内容是进一步确定沙俄建筑铁路及在租借地附近的独占权。这两个条约，使中国东北全境变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

② 欧战：即 1914—1918 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欧洲为主要战场。

③ 海参崴：原书作“海参威”，下同。

同意。

惟建筑全部西比利亚铁路一事，换言之，即连络海参崴与欧俄之举，乃系先帝亚历山大第三遗嘱，为余受命办理者；因此，余在一切政客之中，实为唯一从事研究此项问题之人。更因余较其他一切人等，对于此事关系特重之故，所以余对此事考究特详，了解特多。当时之人，确极鲜有能知中国究系何物，能识中、韩、日三国地理形势与夫三国现在相互关系者。总而言之，我们社会方面以及最高官吏自身，凡关中国之事，皆系蠢无所知。即新近任命之外交大臣 Lobanow-Rostowskī 侯爵，对于远东事务，亦复莫明其妙；如果当时有人向其询问："什么是满洲？何处是奉天省城？何处是吉林？"则彼之智识程度，只等于第二班中等学生。

Lobanow-Rostowski 侯爵乃系一位深有学识之人，一如余前此所言，凡有关于西方之事，彼盖无不尽知；但对于远东方面，却是从无兴趣，一点也不知道。

当彼对于（外交）大臣一职，方正接事之时，而中日战争已以著名《马关条约》告终。余对此约，认为极与俄国不利。盖日本由此获得大陆方面一块领土，直向我们逼近。我们沿海领域与日本国境，至今皆系以海间隔；而现在日本乃欲跑到大陆，筑其利益基础，同时该处大陆又为我们最要利益之所在。因而，此时遂发生一个问题：究竟我们对此应持何种态度？

余在当时，乃系唯一从事研究远东问题之人，皇上甚望俄国势力大向远东扩张，而且对于此种理想，特较其他各事注重；盖因彼从前曾向远东旅行，实为初次感着自由不拘之乐故也。但彼在当时，尚无一定目的（计划），只是一种热望冲动，觉得非向远东前进取得土地不可而已。因此，余曾从各方着想，对于中日和约，我们究应如何对付。盖依照该约，则辽东半岛全境，皆将落于日本之手也。其后，余遂决定下列计划，而且始终坚持，即对于俄国方面最为有益者，实以邻接一个强壮的、但是不能活动的中国为善。由此可以担保俄国东方安宁，以及俄国前途福利。

于是，余遂觉得万无允许日本竟在如此紧接北京之地，作其巢穴，并获得如此重要区域之辽东半岛，成为优势地位之理。其结果，余乃发出下列疑问：究竟对于中日和约之实行，是否应有加以阻止之必要？

因此，陛下允许召集会议，（讨论此事）；此项会议系在新任外交大臣 Lobanow-Rostowski 侯爵临时寓所之中举行。（原注：此寓所乃系彼的属僚之住宅。）

会议主席，系由海军大将 Alexei Alexandrowitsch 大侯爵担任。与会者为下列诸人：陆军大臣 Wannowski 侍卫，参谋大臣 Obrutschew 侍卫，海军代理大臣 Nikolai Matwejewitsch Tschichatschow，以及余与外交大臣。

在此会议之中，余曾发言，谓俄国将在许多许多年月之中，皆以中国保持现状、存

在不亡为有利。但于此必须尽力坚持，中国领土不可瓜分、不可侵害之原则云云。对于余之意见加以赞助者，只有 Wannowski 一人。Obrutschew 则对于此事之态度，颇为随便。盖因其心时常皆在西方种种可能冲突之上，只是专意于此，(不问其他)。至于其余与会之人，则无一定意见。

主席对此问题，并不加以表决，而另自提出下列一个问题：究竟将用何种方法，以使余之希望，见诸事实？余乃言曰：宜向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谓我们对于害及中国领土不可瓜分、不可侵害的原则之举，不能承认，因此我们对于中日和约，不能表示同意云云。中国之所以承认该项条约者，当然系由于压迫所致，盖中国固居战败一方故也。继而余又言曰：日本既系战胜国家，必须与以战费赔偿，应由中国方面，付以多多少少一笔大宗赔款。倘若日本对此加以拒绝，则我们只有出于积极行动一途。至于积极行动之方式如何，则此刻尚未达到决定时期；但余相信，到必要时，可以采用炮击日本几处港口之手段。

在此会议之中，余之见解主张及其实行方法，于是皆已具体提出。但会议一番，仍无一定结果而终。盖因会议之中，对于余之主张，固无人特别加以反对，但同时许多与会之人，却亦未曾特别表示赞成故也。至于 Lobanow-Rostowski 侯爵，则终席不发一言。

关于此次会议情形，系由（主席）大侯爵奏报皇上；皇上于是召集第二次会议，即在御前举行，参与其会者，只有余与 Wannowski 将军，Lobanow-Rostowski 侯爵，Alexei Alexandrowitsch 大侯爵，数人而已。余将余之意见，再行陈述一遍。其他诸人或者丝毫不加反对，或者仅仅略持异议。结果，皇上准余所陈办法，并命 Lobanow-Rostowski 侯爵加以实行。我们在此却当公认 Lobanow-Rostowski 侯爵，办事手段之敏捷，彼立即取得德、法两国同意赞助俄国之要求。于是，不稍迟延，立由俄国直向日本提出最后通牒；日本被迫接受，并要求一笔大宗赔款，以为辽东半岛之补偿。

我们俄国对于赔款高度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皆不加以过问干涉；我们只是坚持下列一种原则：即我们对于伤及中国领土完全一事，不能加以承认是也。由此，《马关条约》乃得成立。关于割让（辽东）领土一条，改用赔款代之。

同时，余与中国方面接洽，并自愿代筹一笔巨债。当然，此种巨债决非仅靠中国信用所能筹集；因此，俄国方面乃代中国作保。换言之，此项债款之担保，应该首由中国关税收入，其次则为中国全部财产；但中国方面一旦无力支付之时，则俄国方面即当力负此项债款安全之责。此外，余对于此项中国债款一事，确亦着手进行，而且在巴黎市场方面，其参加者为下列数家银行：Banque de Paris et Pays-Bas，Grédit Lyonnais，Hotinguer。上述各家银行代表，特因此事，前来圣彼得堡。彼等并以此次代余办理债

款功绩之故，求余帮助彼等，发展在华银行事业活动，以促进法国该地市场。

因余个人努力经营，以及上述各位法国银行家请求之故，于是由余建立俄华银行(?)[1] 一所，其中实以法人资本为主。最初之时，我们国库方面，亦为该行之主要股东，但到后来差不多完全脱离。自不幸的俄日战争以后，我们在华威信，损失极为不小。此项由余组成之俄华银行（?），其中法国银行方面，俄国方面，以及中国方面（原注：中国资本，颇属不少），皆有股份在内。自不幸的（俄日）战争以后，以及余离财部以还，该行大为衰落。现在该行已与北方银行（?）合并，于是成立一个新行，名为华俄道胜银行（?）。当其我们既向中国表示如此重大赞助以后，于是其时甚与皇上接近之 Uchtomski 侯爵，因而特往中国一游；以便一方面对于中国情形，加以较深了悉，他方面对于中国政治家，得以彼此相识。

当陛下加冕大礼时期将届之际，各国派遣代表来俄，一如向来习惯。此项代表，大部分皆系各国皇室中人，或者高爵显宦。中国代表则为李鸿章，乃系一位极为超群之政治家，其时正任中国最高职位。因此，派彼参与加冕大礼，乃系中国对于我们幼主，特别表示感谢之意。

其时，我们西比利亚巨大铁路，业已筑至 Transbaikalien。现在我们必须加以决定，究将如何往下筑去。当然是，余遂想到，宜将该路一直筑至海参崴，并取道蒙古以及北满地方；由此，则该路之筑成，将特别迅速；由此，则西比利亚铁路[2]确成一种世界交通大道，将日本及远东全部，直与俄国及欧洲方面相联。

关于此项问题，当用和平方法以达目的，并用双方商务利益之言为号召。余对于此种思想，誓以全力赴之，并嘱 Uchtomski 侯爵办理此事。余亦曾有机会，得向陛下奏陈此事。惟其间 Badmajew 博士适有故乡 Burjāten 部落一带之行，彼甚希望该路一直经过 Kjachta，径达北京。彼对于联络海参崴之举，认为不关重要。余对于此种思想，当然不能附和。第一，因余对于联络海参崴一事，认为极有必要；第二，余更据理预料，此项直达北京之办法，定将引起全欧反对我们。

而且西比利亚铁路之通行——依照皇帝亚历山大第三理想——完全不是军事政治的，乃是纯粹经济的性质，仅与内政一面有关而已。盖皇帝之意，欲借该路以使我们沿

① 括号中的问号为原译著中保留的，下同。

② 西比利亚铁路：即西伯利亚大铁路，它西起莫斯科，跨越八个时区和 16 条欧亚河流，沿途经 1000 多个车站，一直通往日本海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总长 9200 多公里，被称为俄罗斯“脊柱”。1896 年，俄国人诱迫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决定在中国境内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支线，并命名为东清铁路（后又称中东铁路）。1898 年，东清铁路动工修建，1903 年 7 月 14 日全线通车。

海国境与其余俄国各地，直捷联络。换言之，所有此项巨大西比利亚铁路，其在皇帝亚历山大第三眼中以及皇帝尼古拉第二眼中，只有一种经济的意义，只算一种纯粹防御的而非侵略的手段，尤其是该路决不用作任何将来征服行为的工具。

当 Badmajew 博士到了蒙古以及北京之时，行动极为蠢笨含糊。其结果直至 Uchtomski 侯爵方面以及后来余之方面，无不与彼完全断绝关系。盖因我们觉得其人实系一位聪明而狡诈之骗子是也。

当其李鸿章既已由华启程（原注：此系彼之初次外国游历），不久即将行抵苏彝士运河[1]之际。余乃向皇上言曰：倘若 Uchtomski 侯爵能到苏彝士运河与李鸿章相晤，当极有益；盖该侯爵前此曾与李氏相识，而且关系甚好故也。而且余对此举不仅认为有益而已，简直认为极感必要；因余曾经闻知，其他各国，尤其是英国、德国、奥国，亦复甚为努力，设法吸收李氏。彼等希望李氏取道欧洲，然后前往圣彼得堡；余则极愿李氏先行来到俄国。盖余明知，若彼先赴欧洲，则彼势将深受欧洲各政治家种种诡计之影响。

陛下准余所请，并命 Uchtomski 侯爵与余详议，往彼相晤之举。但皇上希望办理此事，切勿惹人注目。于是，Uchtomski 侯爵先行前往欧洲，然后乘搭某船（原注：大约在马赛）驶向李氏而去，遂遇彼于船出运河之际。其后，李氏不顾所接欧洲各国政府请帖，决计偕同全部随员，以及 Uchtomski 侯爵，共乘我们“俄国航业商务公司”的轮船，为余早经准备者，一直前往（黑海北岸）Odessa 而来。

因 Odessa 为李鸿章所到的第一个俄国城市之故，余遂以为彼在该处应以相当敬礼招待。于是，余乃将此奏明皇上，并谓若能按照李氏位分，采用军事敬礼，列队迎接，并使李氏由此得睹我国军容，当甚有益云云。皇上准余所请，并手谕陆军大臣 Wannowski 照办。但余在此处却大碰官僚派妒忌习气的钉子。在（陆军大臣）Wannowski 侍卫处如此，在（外交大臣）Lobanow-Rostowski 侯爵处亦复如此。Wannowski 侍卫既奉上谕之后，乃用函答余，略谓对于采用军事敬礼一事，彼诚然遵谕照办，但彼甚欲一知，究竟从何时起，余在陛下之处，作此干预关于陆部事件之举。盖关于军事敬礼事件，乃系陆军大臣之事，非财政大臣之事也云云。至于 Lobanow-Rostowski 侯爵，则希望李鸿章即在 Odessa 驻下，一直至于加冕之时；或者先到莫斯科，并在彼处候至加冕时节。总之，无论如何，不要径来圣彼得堡。盖在加冕之前来此，对于李氏，毫无意

[1] 苏彝士运河：即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西奈半岛西侧，连接红海与地中海，使大西洋、地中海与印度洋联结起来，是亚洲与非洲的交界线，著名的国际通航运河。

义故也。

但是，李鸿章既已不顾他国所递加冕以前先游欧洲之请帖，一直取道 Odessa 前来俄国；而彼之来此，又系我们特别派遣 Uchtomski 侯爵往迎所致。此外，假如我们欲与李氏有所接洽，必须先在加冕以前为之。盖加冕时节，每日皆为各种庆会所占满，实难得有机会与彼接洽故也。

因上述种种情形，余必须再向皇上奏明呈请，关于李氏直接前来圣彼得堡之事。

于是，皇上不顾 Lobanow-Rostowski 侯爵之异议，允许李氏直向圣彼得堡而来。余乃下令特派专车，迎载李氏前来圣彼得堡。皇上命余担任与李接洽之事。因此，Lobanow-Rostowski 侯爵遂与李氏未有接洽。而实际上该侯爵亦不能担任接洽之事，盖彼当时对于此项事件，固一无所知，而且对于我们远东政治问题，亦复丝毫不感兴趣故也。

李鸿章首先前来财部，向余正式拜谒一次。随后，余即向彼回拜一次。自此以后，我们又复见面数次。于是，开始协商中俄两国关系之彼此谅解问题。

自始即尝有人告我，若与中国大臣接洽，千万不要着忙，因彼等对于此种着忙举动，认为不是良好现象故也。因此，必须十分缓慢进行，并用各样中国礼节，加以点缀。

因此，当其李鸿章前来访余，走入客厅之时，余乃身着礼服，上前迎接。我们互相问候，极为繁重，彼此鞠躬，极为深低。于是，余遂导彼来到第二客厅之内，并命人摆上茶来。余与李氏系坐着，而彼之随员以及余之属吏则皆站立。余乃询问李氏，是否愿意抽烟。彼于此时，遂发出一种声音，有如驹嘶；立刻即有两位华人，由旁室之中跑来，其一手携烟筒，其一则持烟草。于是，开始抽烟之礼。其仪式乃系李氏静坐于此，只是一呼一吸；而用火点烟、掌握烟筒、取筒出口、送筒入口诸事，则由旁立左右之华人，敬谨为之。李鸿章之意，实欲用此抽烟之礼，使余深得一种印象。但余之态度，却故为沉静，一若对于种种举动，全未加以注意也者。

当然，值此初次拜谒之际，余无一语及于政治事件。我们不过互相问候数十次，彼问询皇上健康情形，皇后健康情形，以及每个皇子的健康情形。余亦探询 Bogdychan（满洲皇上）之起居，以及一切皇室近亲之安康。此即第一次见面时节谈话内容之全部。

在第二次会面之时，李氏对余，即已较为熟识。因彼现在察知，一切仪式皆不足使余得着特别印象之故，彼遂不复为此，而且忽然开始纵谈不已。尤其是后来在莫斯科之时，彼此渐为亲近。于是，我们之交际情形，极为简单与自然。

余之职位关系，尝使余得与许多大政治家相识，而且其中并有数人乃系历史上之不朽人物。在此一切大政治家之中，李鸿章之风度，却使余所得印象特深。此次真可称为

一位大政治家，当然是一位中国人，丝毫未受欧式教育，但在他方面却深具中国学识，尤其是具有一个极为健全明白之头脑。彼在中国历史及政府之中，关系极为重大，盖在实际上，彼可算是真正统治中国者也。

现在余遂动手，向李游说，我们对于中国如何十分尽力，得使中国整个存在；盖因我们曾将中国不可侵害之原则，向众宣布故也。我们并将永久坚守此项原则。只是我们必须得有相当机会地位，如遇必要情形之时，始能实力帮助中国。但在我们未有一条铁路备此需用以前，则我们其势无从帮助；盖我们所有兵力，皆在欧俄方面，而且必须常驻该处故也。

因此之故，如遇必要之时，我们军队必须一面能由欧俄方面，一面能由海参崴方面，出发前往。当其中日战争之际，我们曾调遣军队由海参崴方面开往吉林方面。但是，此项军队尚未行抵吉林之时，而中日战争业已终了。此无他，缺乏交通大道故也。此外，因为我们编制 Amur 境内军队之故，所有新兵必须由彼运来，然后又运回去。因此，为保护中国安全计，我们第一必须先有一条铁路；而且该路必须最为直捷以达海参崴方面，如此则非穿过蒙古北部以及满洲境内不可。并且该路对于经济方面，亦复极感必要，盖中俄两国产品，由此可以增进。最末又言——其后此言果为事实所证明——该路当可不会引起日本猜疑；盖因此路在实际上，确使日本由此得与全部西欧联络故也。更因日本著名的效法欧洲文化，至少对于文化外表与其一切工艺尽力吸收，则该国对于此路，势当甚为欢迎无疑。

李鸿章当然安排着种种困难。不过，余就谈话情形观之，觉得彼固具有允许之意，若彼看见我们皇上果有希望此事之心。因此，余乃奏明皇上，若能接见李氏，当极有益。

皇上于是接见李鸿章，但含若干私人性质。各种公家机关报纸，对于此种接见之举，从未有人提及。此次接见之事，遂无何等声张，安然过去。

余记得十分清楚，在加冕以前，曾因某事举行朝贺，而且在 Zarskoje Selo 宫中，恭向皇上敬致庆意。（原注：此事在皇上前往莫斯科以前。）每有敬致庆意之举，则列席诸人，照例当作鹅式鱼贯前行，直向皇上而进。当余接近皇上之时，皇上遂向余握手，天颜为之开展，更以细语向余言曰："李鸿章曾来朕处，朕已将此事告彼。"

于是，余与李氏晤谈，我们对于所有各点，皆归一致，乃将《中俄密约》各项原则规定如下：

（1）中国方面允许我们建筑一条铁路，经过彼之领土，由赤塔[①]笔直到海参崴。但该路建筑必须属于私人会社经营。李鸿章对于余之主张该路由国家建筑，或者该路属于

① 赤塔：州名，今属俄罗斯。在东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东。东南和南部分别同中国和蒙古毗邻。

皇室与国家一事，绝对不能同意。因此之故，乃特组织“中东铁路公司”一所。此项公司无论从前与现在，均是完全惟政府之命是听；但因彼系私人公司性质，更因一切私人公司向来仅受财部监视之故，所以该路职员，均非国家官吏；乃系或与私人铁路公司职员相等，或者奉命派往该处，其性质略似交部所属道路技士之服务于欧俄方面各种私人铁路公司者。

（2）所有沿路地带，应由我们获得，其宽窄以铁路交通所需为限。换言之，便是一种没收。我们在此没收地带之上，具有主人资格，土地亦复属于我们，我们可以随意处置管理，我们可以派遣本国警察保护，此即后来所谓“中东铁路警卫队”是也。

该项没收地带，应以铁路必需者为限，而视为俄国之所有权，说对一点，而视为中东铁路之所有权。至于铁道路线，尚待确定，但无论如何必须多多少少笔直的由赤塔以达海参崴。中国方面对于铁路建筑及使用，均不担负任何危险责任。

（3）他方面我们负责抵抗日本一切侵略中国土地之行动。因此，我们遂与中国方面结成一种对日防守同盟。

上述种种，即为我们与李鸿章方面协商一致之重要原则。

其时，前赴莫斯科举行加冕大礼之期，日益接近。

李鸿章随带全体侍从，以及奉命护彼之俄吏，前往莫斯科。

余乃将与李会议之结果情形，奏陈皇上。皇上随即授余全权，命与外交大臣 Lobanow-Rostowski 侯爵接洽。

余遂往晤 Lobanow-Rostowski 侯爵，告彼余已奉委全权之事。（原注：彼当然早已知道。）并言余与李氏已将所有各点，协商一致；但是仅系口头约束，现在须将此种口头约束，应用书面确定。

此际 Lobanow-Rostowski 侯爵，遂以其天生材干，使余不胜惊讶。于是，彼乃向余言曰：“请将君所办到之事，详细依次见告。”

余乃将我们约中各点，详细的，有统系的，一一告彼。

当 Lobanow-Rostowski 侯爵既闻余言以后，彼乃提笔尽将全约各点，一一写就。迨余诵读之下，见其所书之详细有序，实使余惊讶不已。盖 Lobanow-Rostowski 侯爵将余所言一切，皆用极为超卓适当之词记下，故也。当彼将其所书给余观看之时，乃谓余曰：“请君诵读一遍，是否已经很好，或者君尚欲改正一二。”余遂答以毫无可加改正之处。盖彼将一切写得如此超妙，仿佛彼曾亲自与李接洽一样。余并谓倘使余自行书此，则所需时间，必将较彼为多，或者尚不能写得如此简要云云。其后，Lobanow-Rostowski 侯爵向余言曰：明日彼将往谒皇上，并将此项草案进呈；倘若皇上允准，彼即将该项草案寄余。

次日，余从侯爵处得到草案，其间使余大为惊诧者，即其中有一条已经更改。按该条原来系谓我们与中国结成一种对日防守同盟；倘若日本攻击中国地方或我们海疆，则我们及中国当负共同抵御之责云云。现在，此条业已成为普通化，不复专指日本，乃系泛言，倘中国领土或我们 Amur 区域，如被任何一国攻击之时，则我们及中国当负共同抵御之责。

该条如此措词，乃使余陷于不胜惊骇之境。盖我们与中国结成防守同盟，究系仅仅对待日本，抑系对待一切国家，实有天大区别故也。中国与英，以其彼此相邻之故，亦有种种交涉；该两国间时常发生意见，并有永久争端。（原注：譬如关于西藏之争端，一直继续到今。）其次，中国对于我们盟国法兰西亦有种种交涉；盖法兰西据有安南[①]东京故也。此外，尚有其他欧洲各国，据有租界以及其他权利等等。因此之故，我们担任保护中国以抗列强袭击一事，不仅是势有不能，而且是倘若该约订成之后，为任何一国探知，则许多欧洲国家，势将群起反对我们。

因是，余立刻往谒皇上。并言 Lobanow-Rostowski 侯爵既闻余述与李交涉的结果以后，曾草成条约一件，并给余诵阅；当余阅后，随即加以赞成。但是，现在此约之中，已有一条加以变更，而且变更的十分危险。

皇上已领解此意，并谓余曰："君可往见 Lobanow-Rostowski，向彼告知此事，并令彼依照前此所书者书之。"

余乃向陛下言曰，余对此举，颇有难行之处。盖以 Lobanow-Rostowski 之年纪而论，可以当作我的父亲；以其在职年限而论，亦远较余为久；更加以此次一切与李会议之事，又皆系余担任；倘若现在余将该侯爵所办理者加以改正，则将谓余有意侮彼，并使彼对余仇视。余对彼当然无所用其恐惧，但终觉此举，十分为难。倘若陛下一愿屈尊，自向侯爵言之，则实较妥善多矣云云。

皇上遂言："朕将自行向彼言之。"

未几，我们全体均赴莫斯科，举行加冕之礼。

余在陛下之前，先到莫斯科；而李鸿章则更是在余之前，已到该处。余之全部时间，皆为关于加冕事件之种种公宴所占去，但余对于李鸿章，却未尝加以怠慢。因余以为自我作始之谈判，必须令其妥为结束，实属非常重要故也。

当其帝后车驾既入莫斯科以后，圣眷依照旧俗迁居 Neskutschny Park 宫中。随后，余即往谒陛下，有所陈奏。

当余方正上前启奏之际，而皇上已屈尊语余："朕曾与 Lobanow-Rostowski 侯爵晤

① 安南：指越南。唐调露元年（679 年），在今越南北部置安南都护府，简称安南府，"安南"之名始此。



谈，已将朕意告彼；谓与华同盟抵御外来攻击一事，若不限于日本，兼及其他各国，则实对于我们，甚为不便云云。该侯爵于是完全赞成，并允将草约中之此条，由彼自行更改。换言之，该约将照君之原案，加以改正。”

皇上向余，言得如此确切，使余深信不疑。自与皇上谈话之后，余尝数次遇着 Lobanow-Rostowski 侯爵，但余二人对于兹事，彼此均未谈及。

余与李鸿章继续往下谈判。并欲与彼除了此项重要条约，我们获得建筑铁路，直达海参崴的权利之外，再行结成一种中俄友谊与防守条约。因为中国系将筑路权利给与私人公司之故，余遂决计，此项权利应行给与俄华银行；盖该行此时业已成立营业故也。因此，现在所应设法者，即一方面由李鸿章代表中国允许建筑中东铁路之权利，并将此项权利授与俄华银行。他方面同时俄华银行又用特别手续，将此权利移交中东铁路公司。此事之所以如此办理者，因为在中国皇帝批准中东铁路权利之前，中东铁路公司尚不能组成，则李鸿章当然亦不能将此筑路权利授与尚未成立之中东铁路公司。而中东铁路公司之组织，又必须待至此项权利完全有效之时方可。但是现在此项权利尚未完全议定，而且与李鸿章方面磋商，亦不能十分迅速议定；盖其中已有种种细目问题，须加以多少仔细整理。不过，余之手中甚欲执有两项文件：其一，为《中俄密约》，依照该约，中国方面应允给与一家俄国公司，建筑中东铁路，经过蒙古、满洲机会；其二，则为中国政府与任何一家俄国公司所结关于建筑铁路之合同。于此最为适当者，自然首推俄华银行。但是仅仅如此，该行尚不能利用此种极有价值之权利。余乃同时准备一种草约，以与该行相订。按照该约，所有全部事宜，应由该行移交中东铁路公司。而且此项公司之组织，应由俄国政府任之。于是，首应从事者，即系先与中华帝国主要大臣全权代表李鸿章订立一种密约。因此，先行定下一个订约日期。俄国方面全权代表则为 Lobanow-Rostowski 侯爵与余两人；中国方面全权代表则为李鸿章，盖彼其间已奉北京来电授与画约全权；届时，同到外交大臣寓所，依照普通习惯仪节，采用一切正式手续，将约画押。此种条约照例书在特种纸上，格外小心美丽抄写。其次，即由各位全权代表画押，签名之下，更附以全权代表图章。

到了预定日期，我们齐到莫斯科外交大臣寓所；该寓所系在加冕期间，特为外交大臣租赁者也。一方面为俄国全权代表与其属吏，他方面则为李鸿章与其全部侍从。

当其我们彼此聚首，团坐桌旁之时，Lobanow-Rostowski 侯爵乃向我们言曰：此项行将签押之约，非常重要。此约内容，所有全权代表，换言之，即是彼与我以及李鸿章三人均已深悉，所以无须再行诵读。并曾交给李鸿章之同事诸人阅看，彼等当已向李禀明。其中各条皆系精确按照约定所书，并经书记审查，我们只须画押签名而已。又李鸿章之同事（诸君），或欲再行审读一遍，亦未可知。

照例，此种条约共应签押两份：其一为我们方面保存，其一则为相手方保存。因此，其中一份交与李鸿章之同事，以便其审阅；其他一份则由余加以审查。盖余欲藉此察验，究竟关于我们负责捍卫中国一条，是否一如初次草稿所拟。换言之，我们负责捍卫中国，只以日本攻击为限。

余忽然看见该条，使余惊骇万分。盖其中词意，非如初次草稿所拟，乃系按照后来Lobanow-Rostowski侯爵所改拟者。

因此，余乃走近Lobanow-Rostowski侯爵身旁，请其暂到侧边，低声向彼耳语："侯爵，该条并未修正，一如皇上所希望者。"盖余以为该侯爵乃系故意如此为之。但其间使余不胜惊讶者，忽见该侯爵以手摸额，并且言曰："阿呀，上帝！余忘去吩咐书记应将该条依照初草稿所拟改写。"但是，彼却未尝丝毫狼狈失措，彼只将时计一看，业已十二点一刻。于是，彼乃拍掌数下，立刻即有侍役上前，彼遂言曰："摆上早餐。"盖原来预拟签押完竣之后，即在彼处早餐故也。

于是，该侯爵乃向着李鸿章以及其余在场人员言曰："现在已是十二点以后，我们先吃早餐，否则食品将寒；一俟吃完之后，再行签押。"

因此，我们全体前去早餐，只留书记二人，利用我们饮食期间，重将条约改写一遍，而且按照前在圣彼得堡时，该侯爵依据余之报告所草成者。是以吃完早餐之后，桌上所放之条约，已词义之下，但在实际上却是最初所拟词义之下，加以签押。

该项条约实系一种极为重要之事件。假使我们始终守约不渝，则我们俄国可以省去一场十分可耻的日本战争，我们至今犹能稳立远东方面。

惟此后余将尚有机会再行纪述者，即我们自已将此条约违背。一半出于恶意，一半由于轻率。因而竟使我们在远东方面，陷于如此地位，直至今日未变。

条约既结以后，遂由中国皇帝与俄国皇帝批准。该约实应作为所有我们对华关系，所有我们远东地位之基础看待。

李鸿章于订结条约以后，一直留至陛下离开莫斯科之时。余常有机会与彼会晤，或者彼来谒余，或者余往谒彼。李鸿章寓在一所私家房屋之内，乃系以彼代表中国皇帝之资格，特别为彼租赁者也。

彼渐与余相习。因此，彼每值余在场之时，已不复摆弄所有中国各种愚蠢（架子）。彼常有几个卫兵在侧。但是所谓卫兵，在中国方面之意义，略与我们不同。我们所谓卫兵，乃系岗兵警士，用来保护其人之身命与健康，以防各种恶意袭击。至于中国所谓卫兵，则系谨细服侍其人之身体，因此常在左右不离。早晨则为彼穿衣，晚上则为彼脱衣，日间则为彼按摩，擦以各种香味药油。总而言之，彼辈乃系专为服侍其人之身体

者。而且李鸿章甚至于当余在座之时，往往竟令卫兵从事若干此类行为。

有一次余在李鸿章处，忽报（土耳其斯坦）Buchara王公（Emir）车驾访谒。李鸿章立刻整饬美观，严肃坐在椅上。当其Buchara王公与其全部侍从走入客厅之时，李氏本系坐在该厅之内，于是起身向着来宾，前行数步，并致问候之辞。

因为余与彼两人皆系熟识之故，所以未曾离去，即与彼等共坐该处。Buchara王公见李之自大态度，颇觉被其侮辱。因此特向李氏声明，彼为一国元首，此次所以前来拜谒李氏者，乃系尊重中国大皇帝之故云云。该王公在此全部拜访时间之内，只向李氏询问（中国）皇帝以及太后的起居；而对于李鸿章的起居，以及李鸿章这个人，则简直毫不关心。此种举动对于素讲仪式之华人，当然认为十分侮辱。

至于李鸿章方面，则所有全部时间皆只是询问该王公的宗教一事。李并向彼声称，中国人乃系谨守孔子学说者。而且李氏语语不离宗，总是归到该王公及其人民所奉究系何教之问题。于是，该王公乃向李言曰，彼系回人，因此所奉者为谟罕默德[①]所建之宗教信条；并将该教内容，加以解说。

解说之后，Buchara王公即行起身，而李鸿章——或系彼的自己主意，或系由于旁人告彼——则将该王公伴至车前，而且李氏举动态度，好像在此Buchara王公之前，不禁变成十分卑小一样。

余乃暗思，你看，Buchara王公给与李氏之印象何等深大。该王公不过仅仅表示彼为一国元首而已。

当其该王公业已坐入车中，车身方正开动之际，李鸿章忽然大呼一声。于是，车子复归停止，时有俄国某军官系任该王公之翻译，同坐车中，乃询曰：“请问，有何见教?”

于是，李鸿章言曰：“即请转语王公，余有一事忘去告彼，此时方才想起。彼之开宗祖师谟罕默德从前曾在中国。其后因罪被罚，揭示于众，并将彼逐出中国。大约彼即偶然窜入该地，并为伊等建立宗教。”

此举之出人意外，竟使Buchara王公对于如此结局，一时昏惑不知所措。至于余之方面，则十分明白，此乃李鸿章对于该王公做出元首自大样子之报复手段。

于是，李鸿章十分满意，回到客厅。因为其时业已不早，余乃辞彼归家。

假如我们一阅当时官式报纸消息，则将觉万事皆有记载。譬如对于各国元首之到

---

① 谟罕默德（约570—632）：即穆罕默德，中国古代史书曾译为摩诃末、马哈麻、谟罕驀德等。伊斯兰教创始人。

临，对于一切重要人物与其代表，对于皇上如何接见彼等之情形，以及彼等加冕之后离开俄国告辞皇上之情形等等，皆由政府公报加以记载。总而言之，所有此等贵宾及陛下之一举一动，皆有官式报告。其最少为人提及者，当为李鸿章氏。彼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两处之被皇上接见，以及加冕事毕，彼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再被皇上接见，均未尝为人道及。对于该项十分重要之《中俄密约》，更无一字泄漏；其中只有一部分可令欧洲方面知道者，即中国曾经给与俄华银行建筑中东铁路之权，以便延长西比利亚铁路是也。盖此举实际上不能隐瞒，因为实行莫斯科条约，则中、俄两国代表势必对于建筑中东铁路之权利，加以确实规定故也。所有关于此项权利范围之解释，以及我们由此所欲达到之目的等等，皆由余一一告述余之财部属员 Peter Michailowitsch Romanow 办理。该员乃系一位极为超卓熟练之官吏，已于前数月在 Zarskoje Selo 物故。彼为参院议员，并任该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原注：系投票选出）——在中国方面担任起草办理此事者，则为圣彼得堡方面之驻俄华使，此人并同时兼任柏林方面之驻德华使一职。通常习惯，一年之内，冬春两季，彼在圣彼得堡，夏秋两季，则在柏林。现在关于此项权利事宜之起草商决，既恰在夏天之际，所以，P. M. Romanow 特赴柏林，依照余之训令，与该华使共同商决此项草案。其后，此项草案遂由中俄两国政府加以批准。

余自己不能办理此事，因为加冕之后，余必须前赴 Nishnij Nowgorod 所开之展览会故也。其后，余又必须前往 Wolga，因当时该处政府，方正采行白兰地酒专卖办法故也。余在财政大臣任内，每遇各地政府采行白兰地酒专卖办法之际，余无不前赴该地政府，加以考察，究竟此种改良办法成绩如何，以及将来处置此事，所应取之一切手段。

第二章 加冕——Chodynka——与日缔结高丽[①]条约

（俄文原本为第三章）

余不愿详述因莫斯科加冕大典所发生之一切庆宴情形，亦不愿详述所有依照旧俗先期制定之一切典礼状况。余所欲谈者，乃系一种可悲可痛之事变，在礼单之上所未有

① 高丽：又称高丽王朝，王氏高丽，是朝鲜半岛封建王朝之一。918 年，后高句丽国弓裔王的部将王建推翻弓裔，建立高丽国，定都于开京（今朝鲜开城）。935 年并新罗，936 年灭后百济，统一朝鲜半岛。1392 年被朝鲜王朝所取代。

者，是即所谓 Chodynka 事变是也。

通常习惯，每当加冕之后，特为国民举行大庆一次，并由皇上颁赠人民物品。其中大部分，或者可以说全部分，皆系食用物品。换言之，即是一场群众大宴，并用皇帝名义，加以款待。

其后，则在离城不远之郊外大场，举行各种民间游戏。通常，皇上往往亲身前去，一为观察，究竟彼之人民，所受款待如何，快乐情形如何。

是日，人民皆已赶赴该处，皇上亦将于午间来此参与音乐大会。该会系由巨大乐队组成，为著名之乐队指挥者 Ssafonow 所指导。该队并将演奏一篇特别乐章 Kantate，系专为加冕大典所谱制者。从清早起，此种款待人民之举，即已开始进行。

当余方正命驾前往登车而上之时，忽闻人民聚集庆会之 Chodynka 大场，早晨曾发生一种大祸；盖因该处人众拥挤不堪，其结果竟至踏死挤伤人数，计有两千之多。

在此印象之下，余乃乘车直赴 Chodynka 大场，所有其他往赴大庆之人，其心情亦复如此。余之脑中则更苦思不已，究竟此种挤成残废之人，应将如何处置？此种被挤而死之尸，应将如何安排？究竟此种尚未死去之人，是否已经分送各种医院？此种尸首能否移往他处，以免其余群众、皇上、外宾，以及成千之侍从看见？继而余又思道：皇上是否因此大祸之故，将令该处庆礼改为丧礼，不开音乐大会，而设祈祷大会？

当余行抵该处之时，却已不见何种特别痕迹，仿佛未有此种大祸一样。盖早上之时，已将一切移开。所有各种痕迹，皆已扫灭干净，眼睛之中，实已一点不能看见。凡遇可以察出大祸遗迹之处，皆设法加以遮掩粉饰。但是，凡往该处之人，当然心中脑中，皆有此项大祸一事，固无不立于此种印象影响之下。

李鸿章亦复偕其侍从乘车前往该处。当彼走到演台之际，余乃趋前与彼相见。彼遂向余问询，而由彼之译官转译（原注：因为李鸿章只会说中国话之故，所以我们交际，常用译官转译）："发生大祸，死伤两千之事，果真确实吗？"

因李鸿章似已尽知详情之故，所以余虽心中不愿，却仍答道："不错，确有此种祸变。"

于是，李鸿章复又问道："请君语我，此种祸变，是否当然不向皇上详细奏报？"

余乃言曰："此事当向皇上奏报，毫无疑义。余个人并相信，此项祸变发生之后，皇上即已立刻闻知一切。"

于是，李鸿章连摇其头，并谓："你们政治家真是毫无经验之人。请看，当余身任北洋大臣之时，该处曾发生大疫，死者万人。但余却时常上奏皇帝，该处一切均属照常无恙。当其有人向余问道：尊处有无染疫之人？余乃答曰：毫无染疫之人，所有居民健康，完全如故。"

李鸿章言至此，似乎作一段落，随又言曰：“请你说一说，我何苦将此本省人民死亡之事，以使皇上忧心？倘若我系你们皇帝的官吏，我定将一切隐瞒不报，何苦去使他怪可怜的来忧此事？”

余闻此语之后，乃自思道：我们究比中国进步。未几，各大侯爵与皇上之驾到此。其间使余惊讶者，即此次庆祝并不取消，仍按照原来计划次序进行。音乐大会仍在著名的乐队指挥者 Ssafonow 之下举行。大家均做作好像没有此次大祸一样。只是皇帝脸上现有若干忧色。余相信，倘若皇上依照自己情意行事，则所有此次庆宴，或将根本撤消，而代以祈祷大会。但是，彼一定曾受他人不良怂恿；而且用不着特别推测，即知此种怂恿系由莫斯科总督 Sergei Alexandrowitsch 大侯爵为之。该大侯爵曾娶皇后之妹为妇。彼在当时，以至于彼之死亡，实为最与皇上接近之人，极使皇上受其影响。

大家虽然决计对此可怕大祸，不愿加以闻问，不愿加以注意，但在莫斯科方面，自然仍是引起一种特别景象——亦与平常一样，在上层方面，则引起内廷党派相争，引起许多奸计诡谋。

至于我们若究此种祸变何以发生，谁应担负其咎，则可以立刻寻出答案，即是：缺乏组织，乃为一切祸根，实无人应负其咎。

当时莫斯科警察长为 Wlassowski 上校。其人曾任波罗的海某城警长之职。（原注：似在 Riga。）后来，彼以具有魄力、万事不怕之考语，被人荐与大侯爵。换言之，其人似乎甚为胜任维持莫斯科秩序之责。彼之前任则为 Koslow 将军，乃系一位极为端正之人，但其性质却不适于“警察资格”。

Wlassowski 之态度（原注：就余所已领教者而言），乃系属于一流人物，即是：我们对之，只须用眼一望，接谈十分钟，即可知道其人为何如。如此一流人物，即俄语所称为 Cham（原注：光棍，骗子）者是也。其人所有全部空间时间，皆消磨于饭馆、酒会之中。乃是一个狡猾奸诈的小子，具有一副应打嘴巴的面孔。在莫斯科警厅之中，彼曾采用通行贿赂之法，并且定为成例。从表面上看，彼似乎真正能将莫斯科秩序维持几分，此外，彼更是善于顺人意旨。所有 Sergei Alexandrowitsch 大侯爵署中之人，与彼周旋，并不视作一位正经人士，乃是当作一种 Cham 看待。彼对于大侯爵署中一切（好劣）委托，无不敬谨奉行。

该警察长现在于是宣言：所有关于 Chodynka 大场之一切安排布置，一切游戏设备，一切款待事宜，皆由内廷大臣办理。因此，警察方面对于场中布置，未尝参与，所有一切皆属于内廷大臣权限之内。反之，所有场外秩序，凡与警察职权有关者，盖无不井井有条，并未发生任何事变祸患。至于此次死伤如许众多之祸变，其发生之原因，乃系群众争获皇上赏赐，因而拥挤不堪，以致被压受踏者，竟有两千之余，其中妇女小孩

不少。

其在内务府代表方面，则又宣称，彼等诚然承办关于散给赐品设备游戏之事，但对于场上秩序之维持，则非属彼等权限，乃系莫斯科警察之职。其间如有纷乱情事发生，则其咎不在内务府方面，而全在警察厅方面。

莫斯科总督 Sergei Alexandrowitsch 大侯爵当然力代彼之警察辩护。向使莫斯科总督一职，非系该大侯爵担任，而系他人担任，则对于此次事变，莫斯科总督当然为第一负责之人，其次则为内廷大臣 Woronzow-Daschkow 伯爵。

Woronzow-Daschkow 伯爵，在先帝亚历山大第三之时，即已身任内廷大臣。因为彼之地位关系，当于幼主方面享有一种特别声望。此次彼对其属僚，亦复同样袒护。彼谓此次事变，究与彼等（内廷人员）何关，所有过失皆在莫斯科官署方面，尤其是（该地）总督。

在此相反主张之下，范围日益扩大，于是不久成为两个党派：其一，则为 Woronzow-Daschkow 伯爵一派。该伯爵曾深得已寡皇太后 Maria Feodorowna 之宠幸，固为世人所知；而太后当时对于皇帝方面，独有极大势力。于是，该派不畏劳烦，永远坚谓，所有过失皆是只在莫斯科警察一面。其他一派分子，则属于下列一流人物，即彼辈认为袒护 Sergei Alexandrowitsch 大侯爵方面，实是于己有益是也。因此，彼辈主张，大侯爵与其警察对于此次事变，全无关系；只是内务府人员，当负一切过失之责。此外，还有许多人，不知究应加入何派方面：莫斯科总督一派呢？抑内廷大臣一派呢？盖因彼等尚未十分明悉，究竟皇上方面谁人势力最大：已寡之皇太后呢？抑 Sergei Alexandrowitsch 大侯爵呢？

最后，遂将此次事变之调查责任，委托当时司法大臣 Nikolai Walerianowitsch Murawjew 办理。该司法大臣之调查记录，乃系一束至今尚属秘密的特别文件，并藏在余之档案内面。Murawjew 叙述该项祸变全部以及发生情形，极为详尽；但关于过失问题，则彼或者设法避开不提，或者表示一种全系主观之见解。盖 N. W. Murawjew 个人之为司法大臣，系由该大侯爵所庇护。在此以前，彼曾为莫斯科法庭之检查官，与大侯爵甚为接近。

N. W. Murawjew 之奉命调查该项事变，在莫斯科方面，即已认为大侯爵势力颇占优势之朕兆。惟此项势力，继续并不甚久。盖其后内廷大臣方面之势力，渐趋强大，并有皇太后 Maria Feodorowna 为其后援故也。

因此，复命从新调查，并令旧任司法大臣 Pahlen 伯爵办理此事。该伯爵乃系一位极可尊敬之人，并为此次加冕大典特置之最高礼官。彼之调查记录，余未得读；在官式方面，余亦未尝接到何等关于此项调查结果之通知。但余却有数次，曾从该伯爵处闻

知，彼尝寻出证据，其重大过失，实在莫斯科警察方面，以及莫斯科官署方面，而非内廷大臣方面。换言之，Pahlen 伯爵系以此事归罪于莫斯科总督。

在祸变发生不久之后，调查手续尚未结束之时，Pahlen 伯爵一时太不小心，竟向宫中宣称：此次事变之所由起，即系尝以重大位置任命各大侯爵之故。凡各大侯爵身任重职之地，不是时常发生祸变，便是紊乱毫无秩序云云。因此之故，各大侯爵无不群起反对 Pahlen 伯爵。

Pahlen 伯爵关于调查结果，曾有详折奏呈皇上；而且皇上曾在折上，加有批语。此事余本习知，但批语内容虽经 Pahlen 伯爵告余一次，但余现在却已不能记忆。余所知者，只是此项批有皇上朱谕，甚使 Pahlen 伯爵不乐之奏折，现藏在 Mitau 附近伯爵邸内之稿件中间。

（增补之文：陛下在 Pahlen 伯爵折上所下批语，本极恭维；但数日之后，Sergei Alexandrowitsch 大侯爵从莫斯科前来，于是此事完全变更。）

最后，此项死伤如许众多之事变，乃以警察长 Wlassowski 一人，独负其责，免职而去了事。由此遂将此事掩饰过去。但在俄国史书之上，尚将继续流传下去。

其后，Pahlen 伯爵亦复一时被置闲散地位。但皇上对彼感情，终未变更，不久仍如前此眷爱，一直至于今日。惟自此以后，Pahlen 伯爵不复再得重要差使，而彼之年纪老迈，当亦为其原因之一也。

至于 N. W. Murawjew 个人，则宦途极为顺利，深蒙 Sergei Alexandrowitsch 大侯爵之庇护，余对此事，以后或将再为谈及。

当五月三十一日 Chodynka 祸变发生之日，法国大使 Montebello 伯爵（原注：后为侯爵）曾有跳舞大会之设。该大使因其夫人之故，十分豪富；同时更因彼之为人，尤其是彼之夫人为人，十分漂亮；于是颇受皇室贵族方面之欢迎。该项跳舞大会，预拟大为铺张；而且皇帝皇后亦将列席参与。（是日祸变发生之后，）余等终日皆无所知：究竟此项跳舞大会，是否因此祸变停止举行？抑或照旧举行？其后闻得，此项跳舞大会并不停止；但大家揣测，皇帝皇后将不赴会列席。

到了预定时间，余乃前赴此项大会。同时掌管请愿书事务之局长 Dmitrij Sergejewitsch Sipjagin，以及 Sergei Alexandrowitsch 大侯爵亦到。当余等方才会见之时，于是乎彼此皆自然而然的谈及祸变一事。大侯爵乃言曰：许多人皆劝皇上，转请（法国）大使将此大会改期举行；无论如何，皇上自己总不宜前去赴会。但皇上并不赞成斯议。此次祸变，照彼观察，诚然算是巨大不幸，惟加冕大庆，却不应因此愁闷减色。所以，对于 Chodynka 祸变一事，应该完全置之不理云云。余闻此语之后，不禁追想中国大政治

家（李鸿章）之言，盖即是日早晨，余尝闻之于彼者是也。

未几，皇帝皇后驾到。跳舞大会于是开始。皇帝系同 Montebello 伯爵夫人跳舞，皇后则偕 Montebello 伯爵跳舞。惟皇帝不久即行离开跳舞大会而去。

皇上气色甚为不乐。盖此次祸变，确使彼精神上感受影响不小。假使彼对此间舞会以及其他宴会，一一依照彼之心意行事，则彼当必不如此为之也。

在莫斯科方面，并曾与日签订一种条约。所有关于此项条约之谈判，皆由 Lobanow-Rostowski 侯爵担任。余对此种谈判，诚然亦当参与，但只居次要地位。余以为此项条约，颇获胜利。盖依照该约，俄、日两国在韩势力，彼此加以画分；但俄国方面，却能始终保存其在韩优势地位。

日本代表对此，颇表示容许。依照该约，我们得有派遣军事教官，以及数百兵士留驻韩国之权。因此，无论军事与经济方面，我们皆占优势。盖我们依据该约，得置一位财政顾问于韩国皇帝之侧；而实际上则该顾问实与韩国财政大臣无异。惟俄、日在韩势力，应该彼此对等；日本之在韩国亦与我们一样，得有设置工厂、从事商业之权。所有一切财政利益，凡一方可以获得者，他方亦应获得。故余谓该约甚为有益，已如上面所言。

因此，俄、日两国在韩势力，遂以确定画分，而且其时韩国业已宣告独立自主。盖在中日战争以前，韩国乃系中国自治区域之一，完全立于中国势力之下。其后，中日和约遂认韩国为独立自主国家。

在他方面，我们因为《中俄密约》之故（原注：此事已于前章述及），又曾获得建筑铁路通过蒙古、满洲以达海参崴之权，因而我们从此得有一条颇含重大政治经济意义之铁路。但是，我们必须特别加以声明者，尤其是余之个人可以完全自信不疑向人加以声明者，即该路决不用作任何侵略欲望之工具，只应作为东西民族彼此接近之媒介——物质的与精神的接近，而且只应作为精神感化之用途。换言之，即是（欧洲）新文化，基督教文化，向着黄种民族古旧异教文化，表示其特别优善超卓而已。

余与李鸿章甚为友善。彼曾屡次向余言曰，彼以俄国友人资格，甚劝余等，千万勿要超越路线，向南而行。因为倘若我们竟自为之，则势将引起华人方面之激动。而普通一般华人对于欧人又未丝毫了解。每见一个白人，无不视作恶汉。只须错行一步，便可引出极坏可悲之结果，无论对于俄国、中国，莫不如此云云。所有李鸿章此项劝戒，对于余之个人，实为一种赘言。盖余乃系亚历山大第三理想之忠实信徒（原注：亚历山第三曾被其子于著名宣言书之中，称为“和平创始者”），始终诚心奉仰和平思想。而且，余以为我们人类如能实践基督第一戒条，无论何人，皆未具有杀伤同类之天赋权利，则

基督教义始可获得实效，趋于繁盛之途也。

余之所以记述李鸿章此种动人忠告者，盖欲由此证明，李鸿章在一切中国政治家内，其优秀杰出为何如。若由我们欧人视点观之，则李鸿章乃系一位未受教育没有文化之人；但自中国文明视点观之，李鸿章固系一位富具学识极有文化之人也。

当时皇上，无论在精神方面与心地方面，皆系至为良善。因此，余若将李氏忠告之言，再行转达皇上，实属多事。盖余深信皇上之视中俄条约，亦复除和平目的外，实无他意。至于该约之所以必须秘密者，并非因为俄国得有筑路权利之故；盖我们于中国为日所败之后，曾尽力帮助中国，此项权利乃系当然之事故也。其所以必须秘密者，乃是因为同时结有一种对日防守同盟之故；盖欲前此日本战败中国时所发现之一切情形，以后不至再行产生故也。

第三章 辽东半岛之占领

（俄文原本为第九章）

一八九七年，正值防疫委员会某次开会之际，外交部方面忽然送来已经译出之特别快电一件，并即交与外交大臣 Murawjew 伯爵（译者按，此人与第二章中之司法大臣同名，但非一人）。该伯爵将电读后，随即给余，并表现一种颇受刺激之态。该电之内，乃系德国战舰业已开到青岛港内（原注：胶州）。

余读罢之后，乃向 Murawjew 伯爵言曰，希望此次德人占领该港一事，或者仅系暂时之举，不久彼等当仍退去，倘若彼等不去，余相信俄国以及其他列强，必将逼迫彼等退去云云。

Murawjew 伯爵对余此言，并不加以回答；盖彼既不愿说“是”，亦不愿说“否”故也。此外，余对此项消息之来，完全出于意外，而在该伯爵方面，则似乎不然。

数日之后，此项事变消息遂明白披露。德国外交方面声称，德国战舰之所以开到该港者，系欲由此要求中国赔偿刺杀德国教士一事云云。但是，此处令人深觉奇怪者，即为此事，竟至于需用如彼重大舰队；而且该舰队并派兵登陆，径将青岛占领。

未几（原注：在十一月初旬），余与其他几位大臣，接着 Murawjew 伯爵来函，系请余等列席御前会议，讨论一种条陈，并由陛下主席。

参与此项会议者，计有陆军大臣 Wannowski，海军代理大臣 Tyrtow，外交大臣 Murawjew 伯爵，以及余。

该条陈之意系谓，因德人占领青岛之故，此际对于我们，恰是一个良好机会，亦复占领中国一个海港，或是旅顺港口，或是附近该处之大连湾云云。

Murawjew 伯爵于是乃发言曰，彼认为此种占领，或者说对一点，此种据为己有，实是恰合时宜。盖俄国在太平洋方面，颇需占有一个港口，而该处两个海港（原注：旅顺或大连），照其军事形势而论，确是极为重要故也云云。

余反对此议，最为坚决。余谓，我们既已主张中国不应受人侵略，并因保持此项原则之故，乃迫日本退出辽东半岛——而旅顺、大连亦即属于此项半岛之中。而且我们既与中国订结对日防守同盟密约，我们负责代华抗御一切日本侵略欲望。现在，我们此类侵夺行动，实为违反条约，达到极点。即或我们对于上述各种反对理由，暂行不问，而从自私论点出发，则我们此项行动，无论从日本或中国方面观之，均将自行陷入十分危险之境。盖我们中东铁路现始着手建筑，该地对于我们感情极为良好，但是假如我们一旦占领旅顺或大连，则势将引起中国反对我们，尽将彼等前此对俄好感，一变而为恶感云云。其后，余又谓，我们如欲永将占领之地保住，则其势非设法使中东铁路与该地联络不可。此外，我们必须再筑一条支路，行经满洲（原注：该地中国人口极繁），穿过奉天现代中国皇室发祥之地。所有上述种种，将使我们发生无限纠葛，恐将获得一个最可悲痛之结果。

陆军大臣 Wannowski 竭力赞助 Murawjew 伯爵之议。该大臣自谓，彼对于重要外交问题，诚然不能加以评断。但若外交大臣以为此项行动毫无危险，则彼以陆军大臣资格，甚赞成占领旅顺或大连之议云云。

海军大臣对此问题，并不表示意见。但云依照彼之见解，假如俄国海军能在高丽海岸得一港口，以作根据，直与太平洋方面接近，当较为便利；至于旅顺、大连之地势，并非恰如海军部所希望者云云。

因余认为此项行动，乃系一种极为不祥之举，势将得一可怕结局之故，乃与外交、陆军两大臣，数次激烈辩论。余并谓，无论日本与英国方面，对于此事，皆将不能袖手旁观云云。而 Murawjew 伯爵则谓，彼愿对此担负全责，而且彼相信无论英国与日本方面，皆将不至因此采取何等对抗行动，云云。

余之竭力抗辩，终使皇上赞成余意。（原注：皇上对于余之抗议，虽然心中似乎不以为然。）于是，是日议事记录之中，乃书陛下对于外交大臣之条陈，未能加以同意等语。

至于 Murawjew 伯爵之为人，乃系极为虚浮，总想随地皆能显露头角。彼之心中尝觉不宁者，即在彼接任外交大臣以前，余与 Lobawow-Rostowski 侯爵之远东政策，竟

能如此胜利；我们一方面既获建筑中东铁路之权，他方面我们在韩势力复极占优势。（原注：对于日本而言。）而其间我们却又赢得中国方面之十分友善关系，同时日本方面亦无敌视我们之情形。盖日本当时竟能因为我们之故，安然自愿退出辽东半岛；而且日本又因我们西比利亚铁路直达海参崴之故，预计必有大益可得，亦复甚为满意；盖该路能使日本更与欧洲列强再为接近一点故也。

在那日会议之中，余并曾言曰，余实不能了解此种逻辑：假如德军开到青岛之意，系在占领该地，而我们对于此举，若是不以为然，则我们尽可迫劝德国取消此意；即或德国行动不合道理，并且我们对于德国占领该地，又复认为不利；而我们亦不能由此遂下断案，竟谓我们亦必效尤德国，去作强劫中国之行为。此外，中国与德并非同盟，而与我们却为盟友。我们曾与中国相约，代彼抗御外敌，而现在我们自己却忽然将彼土地夺去一块云云。数日之后，其时前次议事纪录，业由皇上批准，余当日因有陈奏之事，往谒皇上，顿觉情形有变。皇上乃向余言曰："Sergei Juljewisch，君是否知道，朕已决计占领旅顺、大连，并已派遣我们舰队，随载陆战队伍前往该处。"云云。皇上随又补言："朕之所以为此者，盖因前日会议之后，外交大臣曾来朕处报告，谓英国舰队现到旅顺、大连之前巡游；假如我们不占上述两处港口，则英国势将取去。"云云。

此项由 Murawjew 伯爵奏报皇上之消息，其后余由英国大使处探悉，并非确实。英国战舰诚有数只前往旅顺附近巡行，但其性质，只是对于德国占领青岛之举，作一示威运动而已。英人方面毫无占领该处任何港口之意。

皇上对余所言，使余不胜苦恼之至。当余退出皇上御斋以后，遂在前厅之内遇着 Alexander Michailowitsch 大侯爵，彼对于我们战舰之计划，似已知之。彼乃开始向余谈及此事；但余却不愿与之谈论，只是言曰："请殿下记着今日勿忘！君当看见此项不祥举动，将得何等可怕结果。"

余从皇上处出来，遂由 Zarskoje Selo 方面，直赴德国代理大使 Tschirschky 处。盖其时，Radolin 侯爵正在假期之内故也。

余曾与 Tschirschky 晤谈。（原注：此君现任德国驻奥大使，当时则为德国驻俄使馆参赞。）余谓彼曰，当德皇从前在此之时，曾向余言道，假如余有事件向彼询问之处，或者余有意见向彼陈述之处，请余不必羞怯，直由（德国）大使转达可也云云。现在此种机会，可谓业已到临。所以，余甚望彼（译者按，系指 Tschirschky 大使而言）转电德皇：谓余恳切劝彼求彼（译者按，均指德皇而言），无论为余祖国或彼之祖国计，均望对于处办青岛罪犯一事（译者按，当系指曹州凶手而言），或处以死刑，或要求赔偿，皆可依照彼意为之，惟望彼之战舰随即退开青岛而去；否则，此种（占领）行动，势将引出（他国）其他行动，造成最坏结果云云。

不到两日工夫，Tschirschky遂来余处，并以德皇回电示余。该电系云："请告Witte，余从彼之电内看出，彼对于此次事件中之几项重要情形，尚有未能明悉之处，所以我们不能从彼之劝。"

于是，余乃想起Alexei Alexandrowitsch大侯爵向余相告之言；余又想起两位皇帝在Peterhof并驾出游一事；最后，余更想起Murawjew伯爵在防疫委员会开会之时，那样沉默情形。

后来，Murawjew伯爵欲替自己辩明，曾向余言曰："当时阁下之意，以为假如我们对于德国行动不以为然，则尽可迫劝德国取消此举，而我们自己则不应侵袭中国云云。但是，我们对于德国却无从迫劝，盖因我们前此太不小心，对于德国该项行动，早已表示同意故也。"

虽然，余既预见此种决议将得不祥结局，于是弗敢放任不管，务必设法促其觉悟。其间，余与外交大臣，曾有数次甚为激烈之争辩。因此之故，余与Murawjew伯爵之关系，极为紧张寒冷，直至彼死之时。

但是，所有一切忠告，结果皆归无用。盖外交、陆军两位大臣，如果竭力主张占领该处港口，以利俄国，而我们幼主又复好大喜功，当然从其所请，此固极为明显不待智者而知者也。

当其我们战舰泊在旅顺前面，军队犹未上陆之时，余曾与英国大使O'Connor、德国大使Radolin晤谈数次。（原注：O'Connor其后改任君士坦丁①方面英国大使，已于数年前死去。Radolin后来转任德国驻法大使，现在业已退职；余与Radolin个人感情极好。）当Radolin假满归来之时，特来余处，并询余对于此次事变意见如何。余乃答曰："余认为此次全部事变，乃是一场大大儿戏。但是，可惜此项儿戏，势将得一最坏结果。"（原注：所谓"儿戏"一语，系指德皇此次行动而言。盖此次事变，全由德皇引起。）Radolin竟认为此种谈话，实有电达柏林之必要。究竟彼之电报措词如何，余固一无所知，但其结果何如？

凡有外国公使拍与本国政府之密码电报，一如其他各国通例，暗由我们外部设法译出。其时，翻译各种密电，往往只有数个密码不能译出，其余大部分密码，则皆容易译出。于是，关于余与Radolin谈话之电报，亦被翻译出来，并被Murawjew伯爵看见。彼竟认为此事颇有转奏陛下之必要。过了数日之后，余到陛下那里，陛下接见余之情形甚为冷淡。当余辞出之时，陛下乃举身，并向余言曰："Sergej Juljewitsch，朕劝君，

① 君士坦丁：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古称拜占庭，公元前7世纪为希腊人所建。公元330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迁都于此，改名君士坦丁堡。

如与外国公使谈话，稍为小心一点。"

余当时却未能立刻了悉，究系指着何种谈话而言。乃向皇上答曰："陛下，臣实不知系指何种谈话；臣所知者，只是臣与外国公使谈话，实无一次有损陛下或祖国之事。"

皇上对此，未曾加以回答。

当其我们战舰尚泊旅顺前面之时，Murawjew 伯爵曾给我们驻华公使训令，该使须向中国政府安慰；并谓我们之来，系助中国脱离德人压迫；倘若德人退走之后，我们亦将随之退去云云。因此之故，中国方面初时对于我们之来，十分欣慰；而且相信我们约言，竟有数个星期之久。但是不久，中国政府即得彼之驻德公使报告，谓我们系与德国通同一气为之云云。于是，中国政府开始对于我们怀疑。

其间，陆军大臣 Wannowski 于正月一日辞去本职，其后任为陆军中将 Kuropatkin。因此，是役开始之时，Kuropatkin 实未参与。余乃希望，新任陆军大臣 Kuropatkin 当可与余合作，我们仍将退出旅顺而去。

当此之时，此间曾召集一种会议，由 Alexei Alexandrowitsch 大侯爵主席，议定我们对华要求条件。在此会议之中，Kuropatkin 业已列席。

余对于此项全部计划，仍是始终加以反对。但是并不能获得 Kuropatkin 之赞助，不但不得赞助而已，而且恰恰相反。盖 Kuropatkin 之意，倘若我们既向中国要求旅顺、大连，则我们必须同时尽取辽东半岛的关东区域而有之。其论据系以为，若不如此，则我们倘遇战争之时，实无力保卫该项港口云云。此外，彼并谓，我们必须从速筑一中东铁路支线，直达旅顺港口。

Kuropatkin 并不批评我们此项计划究竟是好是坏；彼但提出上述（占领关东全部之）要求条件，认为一种必然结论而已。后来，遂依照此项要求条件，加以议决。

于是，余乃利用下次前往冬宫陈奏之机会，特向皇上辞职。至于辞职理由，则系首为前次皇上向余所下之警告，其次则为最近各种举动全与余意相反。

皇上乃向余答曰，彼实不能离余。彼对于余为财政大臣一事，实系十分信任。关于此层，余当然无所埋怨。（原注：此语一点不错。盖余在财政大臣任内，无时不受陛下十分信任。）若就个人品格而论，彼对余极为尊敬。因此，彼实不能准余辞职，并请余照旧服务。至于旅顺、大连问题，现在业经议决，究竟我们举动是好是坏，将来总可看见。无论如何，此项问题业已了结，彼实不愿再行更改。但求余以后对于此事，仍须尽力助彼，使其顺利完成，彼愿躬自求余为之云云。

其时，我们驻华公使 Pawlow，为 Cassini 之继任者，乃将我们要求条件，递交中

国。其内容系要求中国，将关东区域以及旅顺、大连，租与我们，以三十六年为期。但此种租借实与普通租借不同，盖无论我们方面或中国方面，均无租金一说故也。中国政府对于此项要求，系取拒绝态度。

我们战舰泊于旅顺海湾之前，军队尚未登陆。初时，中国官厅对待我们水手，极为客气；但其后彼等态度渐渐更改，对待我们水手，极为粗野。

中国摄政皇太后[①]与其幼年皇帝，移居京城附近别墅（颐和园）之内，并在该处接见大臣。伊因为受了英、日外交方面影响之故，对于我们要求，一点也不让步。

现在，余既看见（中国）太后陛下不愿让步，而且如果和平协解不能办到，则我们军队势将上陆；倘遇抵抗之举，必将（开战）流血。至是余乃不能袖手旁观，特电我们财部代表 Pokotilow（原注：此君其后被任驻华公使），请彼往访李鸿章以及另一大臣张荫桓[②]。用余名义，劝告彼等，尽力设法接受我们条件；而且事成，余愿送彼两人重大礼物，对李赠送五十万卢布，对张赠送二十五万卢布云云。余与华人交涉，而乞灵于贿赂之举，生平实只有此次一回也。

彼两人现在看见，割让关东区域与俄一事，实已无可避免；而且彼等又知，我们战舰泊在中国海岸，动员既已备就，军队更为不少。于是，决计往竭太后，劝其接受俄国条件。

会议多次，太后乃允让步。余接 Pokotilow 来电，略谓条约当可签字云云。余遂将此电上奏陛下。因为陛下对于余之前次（行贿）举动并不知道之故，于是彼乃在奏札上批道："朕实不能了解，其故安在?"其后，余乃向彼说明，此次中国政府之所以允许签字者，由余运动使然，现在我们所得成绩，乃系我们公使数星期之久，费尽劳力而未能办到者。于是，皇上乃在电上批道："真是太好，好得出人意外。"

该约系于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由李鸿章、张荫桓与我们代表共同签字。

倘使当时中国政府不愿让步，则我们分舰队与陆战队司令 Dubasow 提督，必将奉令占据关东。而在实际上，此举极易办到。盖旅顺要塞，有如小孩玩具一般，中国并无兵队驻扎。

经此种种情形，于是上述不详条约，乃告成立。其后产出许多恶果，并引起不幸的俄日战争，以及国内革命之事。此种强暴侵略，竟将俄、华向来友善关系，打成粉碎，并且永远不能恢复。

---

① 中国摄政皇太后：即慈禧太后。

② 张荫桓（1837—1900）：清末外交官。字樵野，广东南海人。1882 年（光绪八年）在总理衙门任职。1885 年任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今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1890 年回国，仍在总理衙门任职。1898 年戊戌变法时调任管理京师矿务铁路总局，倾向变法。戊戌政变后，被充军新疆。1900 年被杀。

此种侵略与其结果，竟使中国成为今日现象。换言之，竟使中国将成瓦解之势，旧时中华帝国改为中华民国，以造成中国内乱之结果。吾人毫无疑义者，即中国内乱与清室瓦解两事，当使远东方面发生极大变化，以致我们与全欧方面，数十年之久，犹可见其影响所及。

此种强力合并关东之举——此事情形，观余上述各节，当可明了无遗——乃是一种万分卑鄙之行为。

关于此事之材料，后世历史学者，可在当时各政治家以及余之文件中寻出。

此事之初因，实为德皇威廉占领青岛一事。彼对于此事之影响与结果，或者有所不知。但吾人毫无疑义者，即是彼与德国各外交家，当时确是特别设法，以使我们去作东方冒险行动。盖彼欲令我们将其全力，一齐转向远东方面，以便德国自己东界，得以安宁。此种目的，彼固已经达到。盖我们因占关东之故，引起可怕之俄、日战争，竟使我们深受一场战败之耻。

当其俄、日战争之际，德皇又复以保护我们西陲之责自任，但是并非白做人情。彼在友谊幌子之下，遂与我们结了一种于德十分有利、于俄十分不利之通商条约。

当我们方占关东区域之际，凡在该地享有利益之各国，无不大为震动，尤以日本、英国为最。于是，英国则夺去威海卫港口，日本则提出关于高丽方面之要求条件。

Murawjew 伯爵对于此事，当初显然未曾料及。盖彼从前尝向皇上担保，一切皆将安然过去，当无波折横生；而现在彼却不能不向日本、英国让步，以便彼此妥协。

对于英国方面，则由我们明白担保：如果我们据有旅顺，并禁止外国船只来往，则我们应在该港之旁，另筑一个商港，允许一切船只通行，作为自由港口。我们既对英国以及全球发出此种约言，诚然略使当时因为我们侵略所引起之印象，从此缓和一点。但各国仍未完全安心，尤其是日本方面，尚未心满意足。因此，我们乃不得不开始退出高丽方面。

因为我们在加冕大典时节，曾与日本订约之故，所以我们在韩势力甚占优势。我们可以派遣若干军队与教官，留驻韩国。其中尤为重要者，则为韩国财权落在我们手中。盖依据该项俄日条约，余曾为韩国皇帝置一顾问；而在实际上，则此项顾问，实与韩国财政大臣无异。该顾问为 Alexejew 君，乃系余之旧日属员，专司关税事项。当彼被任韩国顾问之后，竟在短促期中，对于韩国皇帝，具有极大势力。倘能如此继续下去，当可尽据韩国财政经济之权而有之。

我们关东冒险之举，其在日本方面视之，盖有如霹雳一声。于是，Murawjew 伯爵，因惧由此将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之故，乃允日本要求，竟将我们军队与教官，由韩撤回；而我们所置韩廷财政顾问 Alexejew 亦必随之而去。因此之故，所有我们在韩之

军事经济财政势力，完全丧失，以利日本。

迨到最后，因欲力使日本安心之故，乃于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订结一约。依据此约，我们须将高丽全听日本势力支配。于是，日本方面乃得暂时安心。

倘若我们对于此约，无论文字与意义方面，均能坚守不渝，则俄、日两国和平关系，当可长久维持无疑。

余现在再为一谈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之（旅顺、大连）条约事件[①]。从此时起，李鸿章因其签订此约之故，于是大失国内声望，遂离向来担任之最高职位而去，改授中国南方某处督抚。至于其他共同签字之大臣张荫桓，则在拳乱之际，不知为何原因，竟由政府遣往中国内地，置诸牢狱之内，并在该处将其刺死，或缢死。其第三位则为许景澄，乃系一位极可尊敬、极为公正之人，当时曾任驻德、驻俄公使，当彼回到北京之际，遂将其明正典刑。

所有上述种种事实，皆足以证明中国公众舆论，对于此种关东条约，其愤激情形为何如者。

我们既已从事此项冒险行动，于是逼着我们对于扩充舰队一事，必须比较从前，特别加以注意。一八九八年四月初间，Alexei Alexandrowitsch 大侯爵遂开始与余接洽：究竟能否在预算之外，再筹一笔特别款项，为建筑战舰之用；此项造舰计划，并已由陛下核准云云。余此时固已明明知道，我们既已到了如此地步，当然须在远东方面，据有一种相当强大舰队。因此，余对于该大侯爵所表示之希望，亦遂加以赞成。于是，皇上乃召见余与海军大将，并同余等讨论，究当如何进行。其后议决：于一八九八年预算表之外，再筹九千万卢布，作为扩充舰队之用。皇上对于此项议决，十分满意；而且对余个人，又复照旧宠爱。因此，三月十六日，皇上乃向余特降一道十分慈爱之恩谕，褒奖有加。

从此，旅顺遂成我们军港，不准外国船只出入。此外，我们又因当时英国抗议之故，曾允在旁另开一个巨大商港，准其各国交通，作为自由港口云云。当余着手建筑此项自由港口之时，乃发生一个问题：究竟我们对于该港，应当何以名之？

因谨遵皇上之教，余乃转求大学院长 Konstantin Konstantinowitsch 大侯爵，一与

① 旅顺、大连条约事件：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旅大地区人民反抗沙俄侵略的斗争。1897年，沙俄侵略军强占中国旅顺、大连，次年1月派兵设卡征粮，强行勒索，激起当地农民的反对。俄军武力镇压，杀害一百余人。3月，《旅大租地条约》签订，4月沙俄派兵侵占金州（今金县），金州兵民猛烈抵抗，俄军被迫退出。11月勘划旅大“租借地”界限时，俄官员把赞子河以东盐滩划入界内，盐民群起反抗，遭到清政府的压制。

院中人员讨论：究竟此项新港，应当取一什么适当名字？该大侯爵之为人，极为清高可敬，真可以称之为大侯爵而无愧。其后，彼乃寄余一信，举了若干名字。彼意以为，或者该港竟以当今皇帝之名名之，称为 Serjestonikolajewsk（按，即 St. Nikolajewsk 之意）。或者从“光荣”一字引伸而出，称为 Port Slawsja。（按，即“光荣港口”之意。）或者从“光明”一字拼合而成，譬如“光明瞭望台”之类。或者为尊崇海军当局 Alexej Alexandrowitsch 大侯爵起见，称为 Alexejewsk。

当余再到 Peterhof 有所陈奏之时，于是将此清高大学院长之条陈，恭呈陛下阅览。其后，陛下乃向余问道：“君对此事之意见如何？究应用何名称？”余遂答曰：“余实未有宏亮佳名，给与该港。因为只有上帝始知，该港前途命运如何，或者该港能为俄国光荣之预兆，或者竟为困难痛苦之原因。所以，余遂觉得，对于该港可以随便取一名称，但以不含表彰意义为善。”皇上随又向余言道：“然则请举一例，譬如……”余乃忽然想起，忙向皇上答曰：“陛下，譬如该港原名 Talienwan（大连湾），或者我们兵士将他读错一点，竟自呼为 Daljnij 之意，亦未可知。而在实际上，此字意义亦与该地性质相符。盖 Daljnij 之意，本为‘辽远’，而该港距离俄国，又复真正十分辽远故也。”皇上对此名称，甚为满意。并言：“朕亦觉得如此，实以 Daljnij 一名为最善。”

余将预拟之布告进呈皇上。在布告之中，留一空白，以便补填该港名称。皇上接过布告，签名于下；并亲在空白之处，填上 Port Daljnij 名称。

余在上面曾用简短之词，略将我们历史中甚有趣味、甚可悲痛之一页，叙了一遍。以后记述之中，余或再将此役各种详情，一为提及。又余之草录此稿，乃由速记写成，一点也未准备；只就余之记忆中尚未忘去者书之。因此，既不是有统系的，亦不是极详细的。但可以保证者，即稿中所言，一切大纲要领，皆系毫无疑义之真相。余对于一切经过情形，皆以公正无偏、本诸良心之笔，照实写出。

第四章　拳乱与我们的远东政策

（俄文原本为第十三章）

英国仿照我们先例，径将威海卫占去，已如前面所述。法国则在中国南方，稳然盘踞。意大利亦持要求条件而至，以迫中国承认。因此，德国以及后来我们，遂在欧洲列

强之中，实为首开恶例之人。

由此种种事变，顿使华人爱国情感大为激动，其结果则造成所谓拳民运动[①]是也。

此项运动，首由南部开始，其后蔓延京师，以及北京一带。其目的在袭击欧人，毁其产业，危其生命。

中国政府渐渐为势所迫，赞成拳党方面；虽非公然为之，但暗中却系如此。无论如何，该国政府既无诚意，亦无方法，以压此项变乱。

当乱事及于北京之际，德国公使遂在该处被刺，因而形势愈为紧张。迨到最后，欧人使馆区域，竟变成一种被围状态。

于是，欧洲列强以及日本方面，互相协商，对于此项乱事，决采共同行动，并处罚此次肇祸诸人。

关于此事情形，余以后当有机会再为详述。现在余所欲谈者，只是当其拳乱初起之时，陆军大臣 Kuropatkin 正在 Don 境内勾留。彼于是立刻回到圣彼得堡，直从车站，径来财部见余，共带着满脸光辉。

当余向彼言道："现在君可领受我们占领关东区域之结果与影响。"彼乃怡然答曰："余对此项结果，异常满意。盖我们由此又可得着机会，占领满洲。"

于是，余遂询彼，彼将用何法占领满洲，将是否欲将满洲作成俄国一个省份云云。彼乃向余答道："否——但满洲地方必须弄得略如 Buchara 区域一样。"

因为占领关东半岛之故，遂造成下列诸端：

（一）取消我们在韩之势力——为使日本安心起见，于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正式结约规定。

（二）破坏俄华密约[②]。按该约系在莫斯科加冕大典时节所订。

（三）各国开始对华抢劫。彼等以为，假如俄国可以攫去旅顺港口与关东半岛，为什么我们（按，系列强自谓）不应同样起而侵略？于是动手占据各处港口，并用威吓手段，向华要求各种租借权利。

中国政府初时对于拳民暴动，系采旁观态度，并不设法禁压。但其后则暗中开始帮助拳民，于是遂召列强武力干涉之举。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外交大臣 Murawjew 伯爵去世。余在前面曾经述过，因

① 拳民运动：即 1899—1900 年的义和团运动。

② 俄华密约：即中俄密约。

为彼的恶劣远东政策之故，余与彼极为不和。吾两人之交际，只以有关公事者为限，已无私谊可言。当五月之中及六月初间，中国拳乱大为猖獗，此即该伯爵远东政策与夫占领中国领土之结果。余自始即知此项政策，必将引出不幸结果。

当欧洲驻京各使陷于被围之际，Murawjew 伯爵乃于六月二十日（晚间十钟左右）前来余处。余对彼之来，极为诧异，盖我们两人近来彼此固已不复再作私人拜访之举矣。

当时，余系侨居避暑山庄，寓在 Jelayin 岛上宫内，所谓“骑士斋”之内。余之书房系设在斋内上层。余遂请 Murawjew 到余书房之中，同时财部差役，复送来文件多种，余须加以翻阅及签字。Murawjew 进来以后，乃向余开始攀谈，略谓，我们两人从前因为占领旅顺、大连一事，彼此意见甚为分歧。但现在彼（系指 Murawjew 而言）已察出，当时余之主张或者确是不错。我们对于该事确实不应如此处置，盖现在由此惹出如许纠葛故也。惟现在一切已成既往，大错已经铸就；彼愿与余重修旧好，并求余与彼合作，竭力助彼施行一切策画（编者按，即“策划”），以对付拳民暴动与北京骚扰之事云云。

余乃向彼言曰：余对现在局面，认为当然结果。惟吾二人服务同一祖国，共事同一君主，如有必要之时，彼此携手进行，当然为余应有之责也。于是，Murawjew 伯爵当面许余，以后彼对余的富有经验之忠告，当特别较前注意。

此次谈话，差不多延到晚间十一点钟之时。于是，彼乃起身，并在出室之时，向余问道，Matilda Iwanowna（原注：余之妻室）是否在家。余乃答曰，伊在家中，现刻正在下面客厅之内云云。彼乃下楼而去。余则向彼略致歉意，未能偕彼下去。于是，遂由余之侍役引彼下楼而去。其时，余欲将财部送来文件办理完竣。当余既已办完之后——其时已在十二点钟左右——乃向楼下而去。当余正下楼梯之际，忽听得彼与余妻，正在狂笑不已。Murawjew 伯爵系于十钟左右，从 Kleinmichel 伯爵夫人处宴罢而来余寓，该项宴会当然伴以相当美酒。迨余方入客厅之内，Murawjew 恰正起身出去，犹自大笑不已。彼并言，彼每到余妻之处同，所度时间总是十分畅快云云。言毕，随即登车而去。

其时，余甚口渴——是日天气颇热——极想水饮。随手取一巨大酒瓶，以为其中尚有余沥。那知 Murawjew 已将其饮得一点不留。于是，余乃向着余妻言曰：“Murawjew 伯爵真是何等福分，倘使余亦如彼，饮尽此瓶，则余明日一定死去无疑。但是对于彼，则简直不算一回事，饮完一瓶，再来一瓶，彼之灌酒恰有如鹅之灌水一样。”

次日，即六月二十一日，清早余仍如时而起，照例骑游一遍。余之骑游，通常由一守界兵士伴随。迨到一点半钟或两点钟以后，余乃乘归。正从马上下来之际，余之侍役

遂上前向余言曰："Murawjew 伯爵业已归天。"余当时未能立即领悟其意，乃向彼问道："汝究竟说些什么？"彼遂答道："Murawjew 伯爵已于今晨死去。"

余立刻前赴该伯爵处，彼之尸身卧在床上。据云，彼于早晨起床，往坐桌畔取饮咖啡，其时彼似忽然中风，倒地而死云云。

现在之问题，即是何人应当继彼（外交大臣）之任。

其后，余有陈奏之事，往谒陛下。迨奏事既毕，皇上乃将面朝窗，以背向余，并发问道"Sergei Juljewitsch，请君告朕，君当推荐何人继任外交大臣？"余乃一如向例，答道："陛下眼中究有何人？"皇上遂言："并无一人。"于是，余乃答道："现在首欲问者，即此项人选，究应属于何界？或是曾在外交方面服务之人，抑或另外之人。假如此项人选，不必限于外交方面，则余建议，此项外交大臣一职，宜以素有劳绩而又具有平稳性质之人担任，或者从老练部臣中选出一位。盖因此种部臣，虽然对于外交事务不必尽悉，但至少能够谨慎行事，对于许多十分重要事件，当不至如 Lobanow 侯爵之有时漫不经心，尤其是不至如 Murawjew 伯爵之那样容易办理。假如陛下欲在外交界中挑选，则余心中实无一位使臣，足以胜任此项位置。或者只能推荐 Murarawjew 伯爵的属僚 Lamsdorff 伯爵一人而已。Lamsdorff 伯爵虽未尝一任使职，但彼平生职务却皆限于外交部中，直可以称为外交部中'有足的档案'。此外，彼之为人，就其精神能力而论，实是一位甚为超卓可敬之人。"

陛下对于余之推荐，表示同意。于是，Lamsdorff 伯爵首奉代理部务之命，其后被任外交大臣。

Lamsdorff 伯爵为人，本极清正，不过余对彼，却时常责备彼不应不阻 Murawjew 伯爵占领旅顺之举，竟使我们全盘汤内参人碎末，以致我们今日犹受哽喉之苦。

余觉得，Lamsdorff 伯爵本可设法阻止 Murawjew 不为。大约彼之所以不阻者，以免与其上司由此口角故也。

关于武力干涉中国一举，我们实居列强之首。最初，英国、日本军舰以及我们海军提督 Alexejew 所带战舰，前往烟台加以攻击。随后，由英国海军提督 S. Seymour 先行向着天津进兵，然后再向北京进行，以解使馆将被华人克服之危。

惟 Seymour 与其少数兵队，颇形单薄。于是，决定派遣雄厚兵力，由元帅瓦德西统率前进。但在瓦氏由德取道海路抵华以前，进兵之事却未停顿。我们实为首先攻打北京之人。

此事余与 Kuropatkin 两人之间，又复发生意见冲突。余曾设法游说 Kuropatkin，并尝竭力恳请陛下，不要攻取北京，我们军队不宜派往京中平乱，此事应听其他列强办理。

反之，Kuropatkin 则主张，我们对于处罚京中华人以及向京拔队前进，皆应首着先鞭，居于主要地位。

余曾设法劝谏陛下，我们对于此次事件，不应加以干涉。盖我们除了满洲之外，所有北京以及中国其他各地，皆无何等利益存在。我们只应保持满洲方面之地位，不应故意激动华人。此事尽可听由其他列强之对于北京方面及中国南部素有利害关系者为之云云。但此谏言，未蒙采纳。于是，竟违外交大臣 Lamsdorff 伯爵以及余之主张，我们军队遂在 Linewitsch 将军指挥之下，并偕日本军队，直向北京进行。

因此，关于处罚中国之举，遂由我们担任，我们直向中国侵去。摄政皇太后以及皇帝于是逃出北京，我们遂同日军占领该城。并由我们军队大施抢劫，以为攻克之表示，太后宫中抢取一空。

攻下北京以后，处罚华人之举，不复再为。只是对于私人财产，时常加以抢掠，尤其是对于宫中珍贵物品，尽量劫取而去。其间，令人闻之浩叹者，即风传我们将领，关于此种抢掠之事，并未尝落居他军将领之后也。此事曾由当时我们财部驻京代表，其后改任驻华公使之 Pokotilow，向余作非公式的报告，加以证明。当其攻下北京之后，未几，我们又复回到理性行动。因为余与外交大臣活动之故，我们军队遂由北京撤退。向使拳民暴动不复蔓延满洲境内，则我们此种活动，将得最后胜利无疑。不幸满洲方面，初时虽只发生一二变故，绑去铁路职员数人，焚烧铁路房屋数所，但其后暴动情形，却日益扩大。

当暴动初起之时，Kuropatkin 即欲立派兵队到华。换言之，立由 Priamur 区域，直向满洲进兵。余曾劝彼良久，勿为此举。而在实际上，满洲方面，其间除了一二轻微变故之外，亦复甚为平静。惟我们既取北京以后，更加以占领关东半岛旧恨，于是满洲居民对于我们，大加仇视。其情势之危急，甚至于我自己，亦请速从 Priamur 区域，派兵前往满洲。

即就处置此事而论，Kuropatkin 亦复不免轻举妄动缺乏眼光。彼之派遣军队，不仅是限于 Priamur 区域，并且从欧俄方面调动大宗军队，取道海路赴华。余虽向彼陈说，仅就中国现状而论，只须少数军队，已足压平一切暴动云云；但是彼仍不听，派遣大批军队前往。

当其我们军队仅有二三千人开入满洲以后，虽则彼等行动（指俄国军队行动而言）横暴不堪，而中国居民却亦忍耐相安，归于平静。因此，前由欧俄方面派往之军队，既达旅顺、大连以后，又复立刻转身回来。惟由铁路开到 Priamur 与西比利亚之军队，则直入满洲境内，将其南部北部占领。

当我们军队方入满洲之际，于是我们方面关于对华政策立即分为两派。所有路局管理方面与夫一切铁路职员以及守界护路警队，皆主张一种和平政策。因为彼等侨居该处之故，于是熟悉地方情形，竭力设法恢复俄国方面与中国官厅居民方面之友善关系。因此，彼等乃言：向使我们俄国自己，所有对华行动，一一皆合规矩，则中国方面实将永作我们最为忠实之盟友。所以，我们现在须将一切已成之错误，加以改正。其中可以称为错误者，譬如占领关东半岛一事，其结果必须建一支路以达旅顺；又如北京方面，我们本无利益可言，而我们却将其攻取占据。

反之，Kuropatkin 则坚持其主张，一如前此拳乱初起之时彼向余欣然相告者，即是我们必须利用此种机会，尽将全部满洲占为己有。换言之，彼所企图者，乃系另自一种计划，不是和平政策。我们军队在华一切行动，极为横暴不堪。换言之，一如敌人对待战败国家之态度，而且是对待亚洲战败国家之态度。

由此种种情形，遂将大祸根苗从兹种下，其后爆发之举，实属不能避免。余与 Lamsdorff 伯爵，设法劝告陛下，撤退满洲军队，恢复占据关东以前之两国友善情形。我们并谓：中国方面或者对于此种关东失地之仇，最后亦将表示释然，只须我们以后不再作此横暴压迫种种举动云云。反之，Kuropatkin 及其势力下面之各位军人，则反对此种意见。彼辈以为，我们必须利用机会，趁此易于着手之际，尽将满洲占据；虽不必竟为法律上的占有，却可以认作事实上的占有。因此之故，彼辈甚望满洲方面，常有变故发生。

当其北京已经攻下，满洲发生拳乱之际，最初（满洲境内）中国方面确有一二形似曾经训练组织之军队，但不久即被我们军队打溃。至于拳党主力所在，则为奉天省城附近一带，后来亦被我们小小部分军队，在 Subbotitsch 将军指挥之下，将其打败。于是，Subbotitsch 将军遂得一种 Georgskreuz 徽章；而且彼之得此，其重要原因，实由于彼与 Kuropatkin 素有交谊，并已到了彼此相称以“汝”之程度。

此种微少中国队伍，既经打败以后，所有满洲居民，于是完全归于安静。

但是我们军人方面，只是设法欲得一种口实，以免实行撤退军队。于是，下列两派之间，对于此事不断的争论，竟有一年半之久。其一派则为财政部方面，与夫中东铁路全体人员，以及外交大臣方面；其他一派则为陆军大臣方面，及其属下军人之驻扎满洲境内者。

至于皇上陛下对于此事，则未有一种坚决见解。彼在一方面，并不特别表示彼对于外交、财政两位大臣之意见实不赞成。而在他方面，则又往往赞助 Kuropatkin 之主张，而此项主张之最终目的，又系合并满洲。

此事之所以成此情形者，并非仅因财政、外交两位大臣与（陆军大臣）Kuropatkin

之间意见分歧的原故，乃是其中另有一种特别情形。盖当我们方正占据关东半岛，以及退出高丽方面，宁让日本获得优势之际，忽然（俄国内部）发生一种新起势力，一种非官式的，可以称为部曹以外之势力，开始鼓吹彼之特别政策。

其人名为 Besobrasow，乃系禁卫骑兵联队中之退职骑兵大尉。Besobrasow 乃为俄国当时发现的七大冒险星宿之一。其余诸人则为 Wouljarljski，骑兵大尉 Janin 等等。彼辈彼此相异之处，只在所受教育与社会地位两点；而相同之处，则均为冒险大家。惟其中 Besobrasow 一人，若就其品格而论，可以算作一位正经人，而其余诸人则不足以语此。

Besobrasow 为造成俄日战争冒险事业最有关系之人。我们于此，当然发生一种疑问：彼既是一位正经人，何以作此冒险事业？关于此项疑问，最好是由彼之夫人加以回答。伊因身体健康关系，常在日内瓦勾留。其夫时时前往该处，与伊久聚。

当其陛下在日本战争以前，任命 Besobrasow 为国务秘书之际，于是彼在俄国命运之中，遂开始发生重大关系。斯时，彼乃迎其夫人来此，以便介绍于宫中。而彼之夫人 Besobrasowa，却系一位诚实可爱受过教育之女士，于是大为作难；并且向人言曰："余实完全不解，（余夫）Sascha 何以能有如许重大势力；未必大家均不能察出，彼系一位半癫半狂之人耶?"

Besobrasow 于是开始鼓吹，我们对于高丽，不应加以放弃。当从前我们占领关东半岛之后，我们因欲避免与日立刻冲突起见，虽不得不离开高丽而去，虽不得不正式当众为之；但我们现在必须设法，暗将我们在韩势力，依然回复。换言之，宜用非正式的秘密行动为之。我们应在高丽方面，筹设各种企业，其表面一如私人经营，而实际上则由政府暗中资助与指挥。其后，此项企业当渐渐有如蛛网一般，布满高丽全国。

Besobrasow 将此理想，首先告知 Woronzow-Daschkow 伯爵。其时，该伯爵则因无事可做之故，方任圣彼得堡参议会委员之职。又该伯爵当亚历山大第三即位之时，曾任统带御前侍卫一职。当时，Besobrasow 系以少年军官，隶彼指挥之下，故彼二人因此相识。其后，Besobrasow 又将此项理想，往告大侯爵 Alexander Michailowitsch。

于是，该伯爵与该大侯爵，遂将 Besobrasow 介绍于陛下之前；而且该两人对于 Besobrasow 之理想，极为赞许。

Woronzow-Daschkow 伯爵之所以赞成此项理想者，完全因彼未能预察此项政策将来结果如何之故。至于大侯爵殿下，则系性喜一切政治冒险行动，以使彼之不静精神得以畅发，或者使彼得有机会显露头角。于是，彼等决定设法，以求实现 Besobrasow 之计划。因此，要求韩国许给各种权利；并派委员前往该国考察，从商业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着眼。不过，上述种种，彼辈皆以极为幼稚之方法行之。

其后，Besobrasow 渐在陛下方面获得势力，于是遂将 Woronzow 伯爵与 Alexander Michailowitsch 大侯爵抛在一边。大约该两人，其后察出此事将以不祥而终，甚欲脱身不再过问故也。

因此，Besobrasow 以后一切行动，可以说是由彼自己一人负责进行。

所有上述种种情形，日人方面当然完全明了。彼等深知：我们在官式方面，诚然曾将高丽委与日本，而暗中却想仍在该地占得优势。因此，遂使日本极端反对我们。未几，极力要求我们撤退满洲之举，已不尽在中国方面，而在日本方面，并且英、美两国均为日本之后援。

当其我们派兵入满之际，我们曾经大声宣言曰，我们之所以为此者，系欲帮助北京政府削平拳乱；盖中国合法政府无力平定此乱故也。倘乱事一旦平静，我们立即退出满洲而去云云。

现在拳乱业已平定，中国政府亦已回京，而我们却坐在满洲，依然不去。中国政府用尽方法，恳请我们，劝告我们退出满洲，而我们却时常寻得口实，不愿撤去。

因此，中国方面当然开始对于日本以及其他列强，表示同情。而且此项，列强仿佛专为中国利益起见，一齐起来要求我们军队退出满洲。

关东半岛之占有与满洲方面之进兵两事，遂使中国从此完全不再相信我们。

复次，向使我们坚守俄日条约，不在高丽国内作出许多秘密行动，以冀占得优势，则日本方面一定可以心安，不至于极力反对我们。但现在彼既看出，我们实系丝毫不能加以信托之人：我们既将日本逐出辽东半岛，而我们却自己据而有之；我们因为占有此种半岛之故，特与日本订结（撤出）高丽之约，以为交换条件，而现在我们却又秘密另寻他种方法以背此约。于是，日本方面亦复从此完全不再相信我们。

因此，中国、日本、美国、英国结成一团，反对我们，大家皆不再信我们，而且开始极力要求我们退出满洲。

既将北京抢掠之后，于是 Linewitsch 将军因为取城有功，得 Georgskreuz 徽章，挂在颈上，回到 Priamur 区域，担任军团统将之职。回时，行李之外，并由北京带归十大箱子，装满各种贵重物品。可惜，Linewitsch 将军此种榜样，亦为其他各位军官所仿照，彼等亦皆携带中国各宫各宅之物品而归。

余之极为叹惜不已者，即当时此项箱子由华输出之时，余实未尝闻知。向使余早闻知，则余一定下令，折开箱子，将此丑事暴露出来。

当中国皇宫既被抢掠以后，其中各种文件亦被劫去。一日，外交大臣 Lamsdorff 伯爵，忽然接到我们驻华公使送来文件一种，系我们军队从中国皇宫之内偷出者。该项文件，乃是加冕时节余与 Lobanow-Rostowski 侯爵同李鸿章所订之条约正本，其后更由

皇帝尼古拉第二与中国皇帝加以批准者。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者，即中国摄政皇太后，对于该约何等重视，竟将其藏在自己卧室特别柜子中。

当其北京被围之际，皇太后与皇室全体人员，慌忙迅速离宫，逃出京城而去，因此未将该约携走。

现在，于是发生一个问题：即我们对于此项条约正本，究应如何处置？Lamsdorff伯爵特来与余相商。余乃向彼言曰：照余之意，应将该约送还中国。盖我们虽曾显然违背该约，但我们却应借此表示，我们对于该约，仍然不愿委弃，仍然希望继续与华友善。

当然，我们遂将该约寄还中国。但是，中国方面却由此从新证明，我们真是不可信赖。盖我们虽将该约寄还，（表示好意），而在满洲方面，却仍强硬坚持，不肯退去故也。

庚子联军统帅

瓦德西拳乱笔记

题记：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侵夺中国沿海军港并深入内地掠夺铁路、矿山权益，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掀起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源自义和拳等民间秘密结社，最初流行于山东、河南等地，以设拳厂、练拳术等方式组织群众。1899 年，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逐步由山东扩展至华北、东北各省，京津一带声势尤为浩大。

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实施其瓜分中国的阴谋，借口清政府“排外”，遂联合大举进犯。1900 年 7 月攻占天津，8 月攻占北京。清政府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和亲贵大臣仓皇逃往西安，并派奕劻和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乞和。11 月，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1832—1904）抵京，侵略联军陆续增至十万人，由京津出兵，分侵山海关、保定、正定以至山西境。1901 年 6 月，瓦德西回国。9 月 7 日，侵华各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瓦德西自被任命为联军统帅赴华到回国期间，写下了大量日记，记述其沿途所见所闻以及各种观感，从中既可看到各列强围绕在华利益而呈现的错综复杂矛盾和彼此间的猜忌争斗，亦可窥见德国当时侵占我国山东的野心，是研究八国联军侵华和义和团运动的重要史料依据。

王光祈将瓦德西日记译成中文后，于 1928 年 9 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36 年 4 月三版发行。

目　次

十一月二十三日之报告（时在德国 Hannover）

庚子联军统帅瓦德西（Waldersee）[①] 拳乱笔记

一九〇〇年

八月初间，与吾马利亚滞居于 Neverstorff，七日方欲由彼处前往 Berches gaden，忽奉皇上电旨，任余为东亚高级军事司令 Oberbefehls haber，并谕立刻前赴 Wilhelms höhe 谒见。闻命之下，一时惊喜惶恐交集。吾妻之贤慧美德，是日又复充分表露。当其御召初来，恰有如霹雳一声，使伊为之震颤。但一转瞬间，伊又神色安定，深信上帝必能始终保佑。倘使吾妻相爱之情，犹有再行增进之可能者，则此短聚之十四日间，实其时矣。伊尽力设法使余勿过感别离之苦，此种态度直至 Neapel 码头分手之时，伊犹能强自保持也。八日余到 Wilhelms höhe，皇上待余极为优渥，并偕余散步半钟，讨论当时局势。皇上告余，彼自始即欲促成在华列强共同动作，幸而列强方面，亦渐渐有此省悟，非共设一位联军总司令，其势难期最大胜利。未几，首得俄皇方面同意，赞成余为联军总司令。皇上对于此次对俄交涉胜利，似极为得意，并信其他列强亦将次第赞成。但余不知奥大利、意大利、日本三国之同意，究竟何时可得。是否现刻已经征得，或须待至十七日余再到 Wilhelms höhe 谒见之时。此外，法、美两国方面，至今尚无回电。英国方面则正在接洽之中。以日本或美国担任总司令一职之事，自始即认为万不可能。奥、意两国则以其所负军事责任之少，在华利益之微，不复提出此项要求。只有俄、英两国，自信具有担任斯职之资格，但彼此均不愿相让，而且当时亦无人希望英国担任总司令一职，因英国在 Buren 战争一役，英军名誉损失不小故也。若法国方面担任斯职，虽不免英国出来反对，但究竟具有可能之性，不过据余所知，法国方面实未尝提出此项要求，如其有之，余信皇上或将承认。至于现在总司令问题之解决，实归功于俄皇之迅速决断。（俄国大臣）Kuropatkin 本人，虽欲谋得斯职，但英国方面决不承认。

① 瓦德西（Alfred Waldersee，1832—1904）：德国将领。历任参谋总长、兵团长、陆军元帅等职。1900 年 8 月，任八国联军统帅。11 月，抵京后，分别由北京、天津出兵进犯山海关、保定、正定以至山西境。次年 6 月回国。

现在此间以为北京各公使馆，已与外界完全隔绝。大家多疑大祸业已实现，所有全体外人已为中国“仇教主义”[1]之牺牲。皇上对于此事，曾特别注意讨论，并立誓报复斯仇。皇上每听旁人窃议，“中国政府对于此种过激行为，或终有所畏而不敢出。北京各使馆人员，或尚生存，亦未可知”云云，辄怒形於色，不以为然。皇上以为法、美两国必能赞成德国方面担任总司令一职。皇上又令德国海军，亦复归余指挥。此事于余极为有益。但海军大臣心中，似不以此举为然。彼以为将来内部必发生许多争执，盖德国陆军与海军，同归一个司令调遣者，此次似属于创举故也。所幸者当时除 V. Hahnke 将军外，Schlieffen 伯爵，Sendnn 及 Diederichs 两位海军提督，亦适在 Wilhelms höhe，对于司令部组织事宜，得以彼此直接讨论。

余之出发，以愈速愈妙，故决定乘二十二日由 Neapel 开驶之 Sachsen 号海轮前往。皇上发谕廷臣，代为预备一切。我们于九日到柏林准备行装，并到各部（陆军部、海军部，尤其重要者为外交部）接洽一切。十一日复往 Hannover，料理房屋，并准备将来如或不能再归之手续。十五日再到柏林，召集总司令人员会议。十七日正午，复赴 Wilhelms höhe 辞阙。十八日晚间，复回柏林。二十日早晨到 Anhalter 车站。

最可怪者是外交部中之办事情形。当时国务总理适在俄国滞留，对于中国问题，无法向其咨询，而且彼对于此事，似亦毫无兴趣讨论。至于外交大臣 Bülow，则其时正住 Norderney。皇上曾因 Metternich 之传介，与彼常有电报往来，但亦未被征询。所有海陆远征各队之出发，皆仅由皇上一人决断派遣。副大臣 Richthofen 则其时正在假期之内，不问一切。此种现象竟发生于政治问题如此紧急之时，可怪孰甚。当时代摄外交部务者，为 Stuttgart 地方代表 Derenthall 君，待余极为恭谨，但彼到职未久，亦不能多所助余，彼仅能用其职务名义，以与各国公使接洽而已。至于此次最有关系之人，实为余之昔日友人 Holstein。彼自 Henckel 事件之后，已成为余之死敌。彼近得素负干才之枢密顾问 Klemeth，为其助手。余现在毅然决定身入狮穴，与彼相晤。余二人对谈之下，彼此故意装作仿佛前此未曾发生嫌怨一样。彼并出各种文件相示，凡对于余有关系者，均令余阅视。彼此晤谈许久。余因而明了吾国对华政策，除了惩罚华人之外，未有特别目的。皇上诚然常有“瓜分中国”之笼统思想，但其本意，仅欲在世界政治舞台占

[1] 仇教主义：鸦片战争后，欧美的天主教、耶稣教和沙俄的东正教传教士，依靠不平等条约和大炮的保护，大批进入中国的边疆和内地。他们平时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搜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情报，测绘地图，及时向本国领事“汇报”；战时又以“中国通”的资格直接参与和策划对中国的侵略与讹诈。外国教会还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挑拨民族关系。遍及全国的教会教堂，又是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大本营。外国传教士在华的种种不法罪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自 1861 年起，相继爆发了“贵阳教案”、“南昌教案”、“衡阳教案”、“酉阳教案”、“天津教案”等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各国列强把中国人民反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蔑称为“仇教主义”。

一席地，至于由此态度所发生之结果如何，则未尝有一明确概念。Holstein 深以吾国此种政策未免过分为忧。彼预料必与列强发生许多纠葛。余亦以彼之意见为然。彼更谓吾国之派遣铁甲舰队，难免刺激英人之心，实属大可不必。

在陆军部与参谋部之间，以及陆军部与海军部之间，又复发生权限问题之争执，势将对于全体发生不良影响。因此，余第二次到 Wilhelms höhe 之时，特奏请皇上严旨干涉。皇上即当面许可。在柏林之时，Bllin 君曾来谒余。并为余言，船到大沽口起岸之时，若未先行预备驳船，势将发生极大困难。彼之言竟不幸而中。余遂遣彼前往海军部中交涉，但该部以为此种预备，系属于陆军部中之事。陆军大臣曾希望以青岛为大本营，盖彼实不知青岛殊非适宜之地故也。至少在最近数年之间，尚不适宜——此事幸余及时察觉，加以干涉。但是，余对于陆军部此次之热心赞助，却不能不加以承认。所有关于远征队之编制、出发等等手续，皆可令人佩服。虽然其中曾有几点错误，但就大体论来，总算成绩不小。当时陆军大臣正在给假期内，迨到一切主要工作既竣之后，彼始归来。彼之僚属以为彼不在部，于事之进行，反为有益，余亦甚以彼等之言为然。Einem 将军对于此次一切预备，实为主要人员。因为完全缺乏海外远征经验，以及不知战地情势等等之故，所以我们对于该部一切预备不到之处，宜加以相当原谅。此次最令人佩服者，实为该部毫不吝啬，其准备规模之大，颇为余前此意料所不及。因为对于纵队之准备，过于铺张，以致需马甚多，特在澳州、北美两处采购——余对于炮队之充分准备，则毫无间言——倘若当初不购马匹，改置日本、上海、广东等处易于购买之普通运输器具，则我们可以俭省数百万金钱，而且步队亦可较早出发。其他联军各国远较我们办理得法。尤其惹人注目者，实为我们之卫生队，其设备过于铺张，常为其他各国所惊讶。在各医生之中，有几位极为高明。至于红十字会派来之医院，人数既众，设备更富，其实未免多事。余之司令部大有人满之患。余虽曾经宣言，不需军事稽查以及军事审判人员——在远征队中已有此项人员——但仍然照例派遣前来。反之，余甚需用军事邮便，却又不妥为设备。至于司令部参谋长一职，都中拟以业经出发之旅长 Schwarzhoff 少将充任，余亦甚赞成之。其他参谋人员，余请陆军少将 N. Gayl，以及巴燕、萨格森、费登柏格三联邦之军官各一人，出来担任；又 Marschall，Knigge，Königsmarck，Wachs，Eulenburg 诸人，亦均派在参谋处任事，皆已得当局批准。其余人员则请 Hahnke，Schlieffen 两人自由选派。此次最有益的，为皇上差遣舰长 Usedom 以及余甚喜悦之传令官 V. Boehn 氏，前来佐余。

十八日，司令部全体人员奉诏齐赴 Kassel。皇上命余一一带入宫中谒见。见后，皇上乃正式赐余帅笏，并对余发出一种稍嫌过于活泼之演说。不幸此项演说为某家报馆所得，大施其恶意利用之伎俩。在晚间之前，已有消息传到 Wilhelms höhe，据云：北京

已由联军占领，该处皇室业已逃走。此项消息初来，当然顿使皇上大为失望，因彼脑中曾深信北京各国公使以及使馆全体人员，早已被杀，而且预计余到中国以后，全体联军前此因疑落雨时节碍难前进者，至是将在余指挥之下，直向北京开行，余将因此获得占领北京之荣誉。此种梦境，现在已成陈迹。北京各国公使仍然生存，所虑落雨时节，今年亦未如期而至；联军之前进，已因日本努力而实现，北京之占领，并未费去巨大的牺牲。但稍为凝思一下，觉得我们在中国方面应做之事，尚有很多。余并力劝柏林当局，将德国远征队之组织，特别扩充，亦蒙完全照准。德国军队为余唯一信赖之军队，且为余之基本实力所在，余固早已了然。又余以总司令资格，与联军各国周旋，其间必发生许多困难问题，亦为余早已料知。至于北京皇室之逃亡消息，余闻之甚觉可喜。倘使中国皇室在北京方面为联军所虏，则其势毋须劳力，便可议成和约。如是则余到中国之时，必嫌太晚；我们在和议席上，或将丧失重要位置。

皇上对于此次远征之役，怀有一种发展我们东亚商业之最大希望。皇上并令余谨记在心，要求中国赔款，务到最高限度，且必彻底贯彻主张。因为皇上急需此款，以制造战舰故也。其后，余更察知皇上欲在山东方面，扩充我们占有权利。为达此项目的起见，甚望能够置手烟台之上。皇上似乎曾谕海军提督 Bendemann（按：系当时德国东亚舰队之统帅）乘机攻取，其后此事未经实现，皇上颇感不乐。现在皇上当然预计余到中国之后，施行此种攻击计划，而况余手中更有铁甲舰队供其指挥乎。

余此行确未奉到一种指示机宜训令。除了几个问题曾向皇上叩询外，余亦未作颁赐训令之请求。余以为自己寻路做去，当极有趣，并愿此后亦不以问题去烦扰他人。

皇上对于余之个人，在实际上却极关心。彼遣御前侍卫两人，以随余行。并亲谕该侍卫等，对于余之生命安全，须负完全责任，不准一刻离开余侧。皇上曾向侍卫 Nasser 特别嘱咐，假如战争之时，余驰往前线太近，彼须将余立刻止住，紧拉马缰，不使前进。同样，传令官 Boehn 亦奉皇上之谕旨，对于余之勇莽冒险，须力加劝戒。皇上曾下谕 Lloyd 轮船公司，将所有头等官舱——其时大部分已由他人租定——一齐拨与司令部应用。又谕交通部长预备一驾上等花车，直达 Neapel 埠。此外，内廷方面复送来香宾酒二百瓶，以及余平居最喜之 Punschextrakt 酒五十瓶，以为途中之用，此项美酒居然——何等奇怪——竟自一齐到了北京。

现在社会方面，对于中国乱事，渐渐注意讨论起来，尤其是在远征队之成立与出发以后。爱国情感，因受设置德国统帅之刺激，日益趋于热烈。在汉堡[1]车站方面——其

① 汉堡：德国第二大城市，位于北部，在易北河、阿尔斯特河与比勒河汇流处。9 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曾在此建镇，称“汉马堡”。今天的汉堡是世界大港，被誉为“德国通往世界的大门”。

时，该处得知余驾将到之消息，不过仅仅数点钟——早已人山人海，向余庆贺。此种欢迎盛会，其后愈来愈多，一直经过 Hannover，Wilhelms höhe 柏林诸地，以至于启程之日，皇上自己即尝身先作则，为余大开庆贺之宴。余此次由柏林到 Neapel，所有德国境内沿途盛况，颇令人忆及一八七〇年（译者按，此系指普法战争[①]之时而言）。凡余所到，或仅仅经过之车站，无不聚满群众。其中如 Leipzig（此处更蒙 Treitschke 将军以王命来贺）、Reichenbach、Plauen、Regensburg 诸处，来会者往往在数千以上，尤以 München 一处，达于最高沸点。该处待从武官 Lerchenfeld 伯爵，以王长子之命来贺。此外，所有王公大臣，无不一一在场。此次确是一种巨大爱国波涛，经过德国全境，使余受着一种深刻印象。只是可惜一大部分自由党报纸，以及全体社会民主党[②]报纸，用其可鄙行动，竟将此次盛举，弄成酒中灌水，美中不足。吾人在该报纸等之上，只看见责备侮蔑嘲笑之词，其主要攻击目标，当然是在皇上。德国在华三万军队现状如何，是否已陷入险境，实无人可以预言。在大沽及天津之战，可谓美满已极，当时反对党之报纸，岂非亦尝对于出征同胞，表示热烈同情，而收掩其批评诋毁言论乎？

至于余之个人，对于此种喧哗庆贺之举，极感不乐；现在众望所归，可谓达于极点，只使余有损无益。此种感想，余在行将启程之前，屡向各相识者言之。此外，余对于各种口头笔下或电中报上，誉余为最能胜此重任之适当人物云云，余但觉其为谄媚之语而已。

在 Kufstein 之时，陆军中尉 Binder 以奥皇 Franz Joseph 之命来贺，彼并与余同车前往 Junsbruck，该处太守及其僚属与将校团等，均在站中迎候。参谋长 Pfeffer 以大公爵 Eugen 将军之命，伴余直至 Ala。八月二十一日早晨九钟，车到 Verona。该车主要部分，先由彼处直往 Genua，余则偕同 Boehn、Marschall、Yorck、Rogister、Wilberg、Wallmann，以及其他人员，另向罗马而去。晚间八钟即到。侍从武官 Brussati、礼官 Corsini、司令官长以及德国使馆人员，均在站中迎接，只可惜 Wedel 伯爵不在场，

① 普法战争：1870—1871 年法国和普鲁士的战争。战前，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力图通过战争，阻止德意志统一，夺取莱茵河左岸的德意志领土，扩大其在欧洲的势力；普鲁士王国首相俾士麦则企图通过王朝战争，统一德意志。在俾士麦挑动下，法国首先向普鲁士宣战。其间，法国巴黎爆发革命，推翻法兰西第二帝国，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普军仍长驱直入，包围巴黎，战争性质转变为普鲁士对法国的侵略。1871 年 5 月，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与德国缔结《法兰克福和约》，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赔款 50 亿法郎。通过这次战争，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② 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 19 世纪 40 年代。“民主党”当时在法国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社会党”指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共和主义者，两者联盟，合称社会民主党或民主社会党。1869 年德国建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大都用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并于 1889 年共同组成了第二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社会民主党纷纷支持本国政府进行战争，第二国际破产。一些社会民主党内的左派另建新党，取名为共产党。此后，在工人运动中，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成为两类不同性质的政党。

彼之代表为 Castel 伯爵。余乘宫车到 Quirinal 旅馆，为意王宾客。二十二日早晨先赴 Pantheon，置一花圈于 Umberto 王棺之前。然后再谒意王，叙谈甚久甚深。晚上八钟，遂到 Neapel，复得各处领袖之盛大欢迎。余乃与马利亚同赴旅馆，尚得两点钟之期间，独自与伊相聚。十一钟左右，我们同到码头，Sachsen 号即泊是处。但直至中夜之后，该船始准备完妥。现在遂到难为别离之时。上帝佑我可爱可敬之妻！并使伊之心继续安稳！上帝是我之指导者！他将赠给我们一个为时不要太远之欢愉再会！余抱着上帝信心，怀着十分勇气，浮向海上而去，回望与我世间唯一无二爱人相别之岸上不已。

八月二十五日之报告（时在 Sachsen 船上）

余与意王 Viktor Emanuel 陛下，曾有三刻钟之晤谈。最初谈及中国战事，意王遂谓：意国之所以参预斯役者，实以意国为世界大国之一，对于此种列强共同行动，不应自外。即或意国在华并无重大利害关系之可言，亦不应袖手旁观。彼之遣派军队到华，为数极小，盖意国之意只在向着华人表示到有该国军队而已。关于意国财政情形，亦复略为谈及。意王以为此役所需之费，当在二千万至二千五百万 Lire（意国币名）。谈次，意王复向余表示，彼甚希望意国在华军队，常能团聚一处。余乃答之曰：余将尽力，无论如何不使意军担任驿站以及类似驿站之役。余更将使意军常在余之附近驻扎。至于应用战舰一事，余从当时意王谈话口气之间，以及后来余与该国外交大臣晤谈之下，似乎除了大沽方面掩护陆军登岸外，并无一种确实计划。因此，余对于此事，便未详细商论。而且深恐意王陷于难于回答之境，所以关于意国海军提督（译者按：其时意国海军提督为 E. Candiani）是否得有训令参加列强海军共同行动之问题，亦复未曾提出，但就余所得印象而论，似乎可以办到。意国海军提督特与德国海军提督接近，或者甚至于意国海军置在余的指挥之下，亦如现在奥皇 Franz Joseph 关于奥、匈海军之所为（原注，按照奥国所派随员 Wojcik 队长之报告。该队长现居船上）。

意王对于李鸿章分向各国单独交涉，破坏列强共同行动之谋，亦复甚为明了。意王及其外交大臣，对于此位中国显爵（译者按，系指李鸿章而言），均甚怀疑，余于两人神色言词中见之。

谈毕，意王复述及最近暗杀事件（译者按，系指意王 Humbert 七月二十九日被刺之事而言），彼相信尚有秘密谋刺之组织，彼曾向吾皇陛下之警察官厅，给送各种重要消息。

谈后早餐，是为意王即位后之首次宴客，余得享傍坐女王之荣，并觉意王将来必深得贤妻之助。宴中复谈及无政府党人以及类似此种之党徒。余谓缺乏判断力之群众，需

要一位具有明白宗旨、坚强意志、努力前行之首领，以为指导。女王闻余此言，似颇首肯。余在此处似乎不能不略为提及，意王 Viktor Emanuel 即位之日虽不久，但大家均觉得，彼尝深思静察，具有比较其父治国，更当较为独立行动之决心。

从 Verona 到 Neapel 之途中，各处军事长官均到车站欢迎。在 Florenz 之时，Turin 伯爵亦来迎接。彼等对余无不热诚庆贺，并极信任余之指挥能力。在罗马勾留之时甚短，且未奉吾皇陛下谕往谒见神圣教皇之旨，是以未曾晋谒教皇，但余在此处不能不附奏一句，即所有沿途欢迎庆贺之中，天主教牧师来参与者，极为众多热烈云。

八月二十五日柏林威廉皇帝来电（该电系八月二十六日在波赛接到）

自君旅行以后，中国方面之军事情形如下：

北京已被占领，联军各司令拟将北京置于军事管理之下，皇室业已逃走。舰长 Pohl 带领二百七十三名登陆水兵，已到北京，舰长 Hecht 随着赶去。Hoepfner 将军已令海军两营登陆。其第一营已由 Madai 带往北京，现已经过一半以上之途程，Hoepfner 自己跟着前进，已有两日在途。铁甲战舰大约八日左右即可到吴淞，将与彼处巡洋战舰之长官接洽调用之事。扬子江流域方面，现正在发酵之际。厦门及其附近，发生暴动，教士被打，日本庙子被毁，日本在厦门已令军队登陆。满洲方面，尚继续与俄战争。在政治方面，俄国愿与李鸿章议和之希望，现已表露于外。但此事因各处尚在继续战争，恐一时不能成为事实。据各种消息，中国军队沿运河①而上，压迫天津到大沽及天津到北京两线。李鸿章曾向各国提出愿任议和调停之人。中国政府亦以彼任议和大使一职，向各国绍荐。余已拒绝李鸿章，并将此意向中国驻德公使（译者按，中国公使系吕海寰）及中国政府言之。因为俄国既已占领满洲，我们尚有他种军事任务亟须实行故也。据我所知，除俄国外，他国政府尚无接受李鸿章之请求者。

余与（英国）皇子 von Wales 及（英国驻德大使）Lascelles，曾在 Wilhelms höhe

① 运河：即京杭大运河，中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北起北京，南到浙江杭州，途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 4 省 2 市，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公元前 485 年吴王夫差开始筑邗沟，沟通江淮水道。隋朝时又开通济渠，连结洛、黄、汴、泗诸水达于淮河，拓宽浚深江南运河以达杭州。同时由洛阳附近凿永济渠通卫河，经临清转今天津，全线沟通，长约 2，700 公里。元朝定都北京（时称大都），自公元 1283 年起以 10 年时间先后挖通济州河、会通河，并建设闸坝，渠化河道，航程缩短为 1794 公里。此即今大运河的前身。

宫内晤谈，对于拒绝李鸿章之事，以及扬子江流域政策，已得其谅解。扬子江流域对于各国，应该门户开放，各国得自由保护其侨民；对于占有菲律宾根据地及希图直向中国海面扩张特别势力之美国，在扬子江流域方面，不应许以特别权利。皇子 von Wales 及 Lascelles 甚望英国将李鸿章拘执，以作人质。关于我们此次之谈话，已由 Lascelles 报告 Lord Salisbury；并请彼（指 Lord Salisbury）对于上所建议各点，发一共同宣言（译者按，此段为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六日所订《扬子江条约》之前史，阅者注意）。

除了俄国，其利益范围仅限于满洲与中国北部，而且在华亦无商业或商人须其保护，因与吾人行动不免异趣外，其余各国目的可与吾国一致者，则为各国均不希望过于急速议和。恰与吾人主张先行平定乱事，恢复国内秩序，承认一个新组政府，要求保证将来一切者，完全相同。即在俄国虽有希望和议之心（此事与俄国金钱恐慌亦有关系），但因中国暴徒续向北方开来，恐俄国此种和议希望，亦非立时可以实现。俄国预备输往东亚之军队，现尚滞留于 Odessa 地方者，据最近消息，又已开始动员。

威　廉

八月二十六日之报告（时在 Sachsen 船上）

皇上陛下，余与（俄国）皇子 Engalitschew 上校之谈话，不敢遗漏弗报。

该皇子云：此次对于中国开战，我们甚感不便。我们希望西比利亚铁路之建筑，不为所阻。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后，满洲将如已熟之果，落在我们手中。中国方面情形，因北京之占领，诚然大为变迁，但其前途如何，尚不可以预测。现在第一步决定，先将炮兵两旅停止动员。使我们最为忧虑者，厥为日本。我们相信日本现正预备派遣两万军队，前赴高丽南部。我们亦将因此在高丽北部，集合第三西比利亚军团。我们自己决无并吞高丽之心，但对于日本之占据该地，则万不能忍。现在我们对于此次战事费用，再加上一部分因铁路建筑被阻所受之间接损失，其数业已达到二万万之巨，颇使我们大受影响。尤其令我们怀疑者，究竟中国是否具有此项能力，赔偿参战各国费用？吾皇对于此次事件，只与 Lambsdorff 伯爵，以及 Witte、Kuropatkin 两位大臣，亲自讨论。关于吾皇之意见，余未完全得知，但有一事可以见告者，即余辞阙之时，吾皇曾谓余之指挥职务，至多四个月内可以完竣云云。

在余船上，皇子 Engalitschew 曾设法与余之各军官闲谈，故意牵入政治问题。但该皇子却未能因此侥幸，有所获得。盖余对各军官曾有训令，对待一切外国军官，均宜特别周到，但一谈及政治问题，则应设法避免。当皇子 Engalitschew 向余言曰“贵国

皇帝当有占据山东以至运河之意"，余答之曰：关于此种问题，余未得有训令。

九月十八日之报告（时在香港）

皇上陛下，当余行抵香港以后，余之行程首段，业已告终；不敢遗怠，详报一切。

所有沿途经过之海埠，余皆得着英国官厅极优之款待与尊敬。在新加坡之时，余遇着两只法国军队运输舰，以及一只载有第十六炮队之俄国志愿军舰。法国运输队首领 Laune grace，Clèment de Grandprey 两位高级中尉，对余极为恭敬，并谓在余指挥之下作战，实不胜荣耀欣喜之至。其后彼此之间，更以坦白态度，谈及普法战争，以及余当时参战之事。当余乘 Sachsen 号离开该埠，约距两只法国运输舰不及三十米突之远，慢慢开驶之际，所有法国舰上士卒两千左右，均奉命齐集舱面，各位军官则聚立指挥地点，并奏 Präsentiermarsch（行礼军乐）及 Heil Dir im Siegerkranz（译者按，此系德国战前国歌）两曲，以庆送余。当余命令乐队演奏 Marseillaise（译者按，此系法国国歌）一曲作答之际，彼辈于是大声欢呼良久，各位军官亦皆举起军帽摇荡不已。余之左右各有 Lloyd 公司之华丽轮船三只随行，当其经过该埠码头之时，要塞方面，Brisk 与 Brandle 两只英舰，以及意舰 Besuvio，均各放礼炮十九响，所有法、俄军舰以及许多停泊该埠之德国轮船，无不悬旗致贺。余甚相信上述各种优礼，除令人得着一种永世不忘之印象外，未尝不略含政治意味。尤其令人注意者，所有各种庆贺之举行，以及他国臣民之表示，均含着一种真挚的同情。

余在此处（指香港）得一印象，即英、俄两国在直隶[①]方面，甚为龃龉。颇希望余从速早到该地。因此余在上海之勾留，仅以接洽吾国公使及该处高级军官所需要之时间为限，随即赶向大沽而去。

尤有一事令余欣然报告者，即在哥仑布、槟榔屿、新加坡各处，德国一切事业均有兴盛发扬之象。余所接见之德侨，无不一致以为吾德在东亚方面海陆军事之发展，实促进吾国之尊严与荣誉不少。尤其是特别荣耀者，吾德得着统帅一席。

此外，Bremer Lloyd 轮船公司近年发展航业之计划，尤令人欣喜不置。该公司于去年曾将 Scottisich Oriental Steamship Co. 之全体船只（计共十三只）以及 Holt-Line

---

① 直隶：旧省名。明称直隶于京师的地区为直隶。自永乐初建都北京后，又称直隶北京的地区为北直隶，简称北直，相当今北京、天津两市以及河北省大部和河南、山东的小部地区；直隶南京的地区为南直隶，简称南直，相当今江苏、安徽两省。清初以南直隶为江南省，北直隶为直隶省，辖境依旧。

之大部分船只（计共十一只）收买。所以，德国旗帜常常表现于前此德船踪迹罕到之许多海埠。又北德 Lloyd 公司所属之“印度、中国海岸航线”，其船只已增至二十七艘，尚有八艘在制造之中，现将竣功。

九月二十一日柏林威廉皇帝来电（系九月二十二日在上海接到）

关于阁下之行动方针，余有所告谕如下：

中国政治局面，现以两事为转移：其一，系俄国方面所条陈之撤退驻华军队；其二，则为余向列强建议，在中国未交出北京祸首处以相当刑罚以前，决不与之开始谈判。俄国撤兵条陈，仅可得着法国方面赞成；但法国亦非出自心甘情愿。至于英国政府，则已拒绝俄国之请，正与余同，只是较余更为严厉一点。日本方面，仅愿将其可以省减之兵额暂时撤退。美国政府则以为，如果俄国坚持其议，美国当不加反对，惟此事悉听美国驻华司令自由处置。余之联盟国奥、匈及意大利，则赞成余之建议。俄国方面，现正努力约同法国，将其撤兵条陈，特别设法掩饰，一若并非与余为难者。此外，又许以两旅军队，在津敬候阁下指挥。余甚愿余之军队，如为军事环境所许，宜驻在北京。反之，对于余之公使偕同其他列强公使离开京师暂往天津一事，余可不持异议，余主张以惩办祸魁为开始谈判之先决条件，其论点之合于逻辑，殊非列强所能反对。此外，中国议和公使必须具有全权证书，方能与之开始谈判。余已命令海军提督（译者按，该提督之名为 Bendemann）对于总督李鸿章之前往天津、北京一事，如英、俄海军提督主张允准放行，则我们亦不必特持异义。反之，如英、俄不允准，则我们宜立于不利李鸿章之方面。

据余所得消息，并天津、北京之间，亦未尝达于安宁之境，更何论其余中国各地。我们军事责任，现在尚未完竣；中国现尚未省悟对于外人所应负之义务，该国大臣犹日日欲用其神拳魔术。

今日君之责任，宜用麾下所属列强兵力，制止中国一切继续反抗行动，勒令中国承认各种赎罪条件，然后始能着手外交谈判，使中国对于外人之关系，得一满意之解决。余之宗旨，始终未变，只求中国恢复秩序，立于一种具有充分强力的本国政府之下，允许外人得着和平文化工作之稳确机会。因此，君宜速到大沽，即由该处行使一切军事手段。余之驻华公使（译者按，该公使之名为 Mumm V. Schwarzenstein）已得余之命令，前往天津，告君一切政治现状。

威　廉

九月二十五日之报告（时在 Hertha 巡洋舰上）

在香港之时，余受英国总督 Sir H. A. Blake 及英国军事机关（海军方面系由司令 Powell 代表，陆军方面系由将军 Gascoigne 代表）之竭诚招待。余赴英国总督早餐之宴，因得与之久谈。余觉得该总督以及余截至今日曾经晤过之一切英国军官，对于俄国皆极为仇视。该总督系一位深悉中国情形之人，并因邻近广州之故，常与李鸿章来往。彼以为李鸿章实系今日中国大臣中唯一堪膺议和使命之人。又该总督之僚属人员，均谓李鸿章在满洲方面有田甚多，所以对于俄国，遇事特别顾忌。

当余在 Hertha 舰树立帅旗以后，从此正式就任陛下东亚海陆军队总司令一职。余于午后启程前往吴淞，Sachsen 轮船亦即随后跟来。余于本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一点三十分钟，安抵吴淞海湾，受该处所泊许多战舰之优礼欢迎。

因欲晤见陛下公使 Mumm von Schowarzenstein 之故，特乘 Lloyd 公司轮船前往上海。该处欢迎场所，因地理上之关系，系设在法国租界之内。英国将军 Creagh 之为人，可谓善于布置。彼令各国军队，如法国、日本、印度之类，以及上海志愿兵，聚集起来，举行一种规模宏大之军礼。而驻沪（德国）第一东亚步兵联队中之第一、第二中队，亦参与其会焉。又该将军请余次日检阅全体军队，并以印度骑兵卫队为余驻节上海期内之用，余均感谢承受。

倘若余赴阅兵典礼之时，身系黑鹰勋章之带，掌握元帅指挥之笏，跟着手持帅旗之陛下侍卫一人，以及军官数十，更有无数华丽服装、勇武相貌之印度骑兵，往来驱散拥挤参观之华人，实令人不免发生一种舞台演剧之感。但余深知此种演剧式之办法，对于亚洲居民，却是应该有的。

除了两个德国中队之外，其余各国军队，亦令余得着一种良好印象。尤其是午后参观两个印度联队及其内部详细组织，使余所得印象益深。该联队之士卒，皆系以从军为职业，已经几度“再役”。余觉其军事训练颇好，而且甚为忠实可靠，其服装军械，亦极为精善，所有帐棚设置，无论寒暑均备。此外，更有不能忘述者，即（英国）将军 Creagh，与其各位军官，对余极为竭诚优待。并屡次表示受余指挥作战，至为荣幸欢欣。又法国两位军官，Baëhne 舰长与 Villiers 上校，待余除了特别礼貌外，亦颇能诚实相对，余亦乐在此处述及。

余相信现在聚泊吴淞、上海之多数兵舰，以及各国陆军五千左右，必能使长江流域，一直上至汉口，镇静安定无疑。余并相信管辖该地之两位（中国）总督，颇欲压制

民众暴动之举。据现在所知，该两总督曾因此杀却许多暴动分子。但吾人对之，亦不能完全信任；盖中国大臣实无一可以信任者，彼辈始终只向有利一方行去而已。长期驻扎海陆重兵于上海内外，甚感必要。即或因英国之故，组成一种含有国际性质的，亦无不可。余与陛下公使及 Knappe 总领事对于此事之意见，完全一致。

现在泊于大沽海湾之陛下兵舰 Wörth、Hansâ、Fürst Bismarck 三只，已在望中。余此行第一目的地点，即将达到。

九月二十九日之报告（时在天津）

远征队之起船，遇着极大困难，办理非常缓慢。大沽海湾极不便于起船，因此运输舰必在距离大沽八海里之遥，即须改载驳船；而此项驳船复因海波之故，往往镇日受阻。起船码头本来已经甚短，而复被参战列强同时应用，其结果常常因为他国运输器具，塞满码头之故，我们无法起载。此外，起船时间复受（白河河口）水栅之影响，每二十四钟之内，只有两次可度，每次约需数钟。尤感困难者，当初在 Bremen 码头装载之时，对于行军情形，丝毫未顾。譬如军队立刻需用之物件，如战场用具被盖等等，则置在舱内下层。反之，其他物件可以展缓数星期起船者，却堆集舱内上层。又如大炮筒子与其车架，系折开分别装载，因此直到今日，尚有一个炮队，仅仅装好两个炮筒。又如医用车辆则堆在舱内上层，而医用药品现在犹深深埋在舱内下层。若此之类，不胜枚举。初到之时，甚感驳船缺乏，此种驳船可以由白河直达天津，我们当初对此丝毫未曾留意。

细考上述种种缺点之原因，除海湾及码头外（码头方面颇使工作延缓），实以今次输送如此大军，于如此遥远之地，为我们前此未有之举。同时，海军方面亦缺少派遣远征队之各种经验。海军副提督 Bendemann 告余曰：关于起船之事，彼在远征队到达以前，未尝预得何种通知云云。究竟当时能够征集几许可以上驶白河之驳船，现在余当然不能再为判断。陆军中将 Lessel（译者按，此人系德国东亚远征队之指挥官，一九〇〇年七月八日在德动员，九月中旬到华）曾告余曰：若欲征集许多可以上驶白河之驳船，恐非海军副提督 Bendemann 所能办到。但 Lessel 自信，如得 Bremer Lloyd 及 Homburg-Amerika-Linie 两个轮船公司之介绍，彼（指 Lessel 而言）能于较短时期内办妥，余因以此事托之。又余可以报告者，自余抵大沽海湾之后，关于起船问题，空气为之一新。所有前此海军副提督与陆军中将 Lessel 两人间之纷歧意见，现已调解捐除。

因海浪汹涌之故，总司令部起船之期，未能于二十六日实行，所以改在二十七日晨

早，即于是日正午移驻天津。余在大沽海湾之时，尝思及大沽、北京间一百五十基罗米突长远之战线，而仅仅倚靠大沽一个地点，并且起船装船之无限困难，以及现在冬日将临，为水所封者当有三四个月之久，实对于军事行动，大感不便。因此，余必须另寻一个宽广根据之地，此事若要实现，只有将山海关占领一途。因该处运输之舰，可以驶到岸边一千米突之近，而海湾冬际又不全冻故也。余将以该地为兵站，在冬日之际，余更将以之为总兵站。此种主张，除俄国海军提督 Skrydlow 外，其余各国海军提督均一致赞成。余深知俄国颇欲将山海关独自占有，但余却以俄国此举未免僭妄，因余应尽顾全联军利益之义务，必须将该处占领，以为参战各国共同利用故也。

因此之故，余到大沽海湾之日——在二十五日——即命令海军副提督 Bendemann 与停泊该处各国战舰之海军提督接洽，将余之意见，向彼等详细解释，并询其是否愿意共同动作。此外，余又密令 Bendemann，倘接洽之时发生困难，则即独自设法占领。余将大沽海湾驻军一大队，归彼调遣。而且余在上海之时，即早已下令铁甲战舰，开在大沽海湾集合。余曾将余之意见，详告（俄国）皇子 Engalitschew 上校，并请其电告圣彼得堡方面。惟彼以为俄国正拟拨调攻下北塘以后现正赋闲之军队，往占山海关；或者海军提督更将由旅顺方面派军相助云云。余因向彼宣言曰：该处系在直隶境内，此种军队当然隶属余之指挥之下。

昨日晤见皇子 Engalitschew。彼因闻联军战舰实行余之提议，将于日内开往山海关，故特来向余重申其意见。彼尤抱不安者，即风闻英国军队亦将同在该处登陆之说。又昨日英国将军 Gaselee 来谒，并询余是否允许威海卫驻军参与斯役，余即当面许可，并立刻通知海军（副）提督 Bendemann。该将军亦因尚须商议接洽之故，立即往谒海军提督 Seymour 而去。余深知英、俄在此之龃龉，将从此愈趋激烈。余曾令海军（副）提督 Bendemann，俟军事稍稍得手，即在归彼调遣之大队中，挑选两个中队，在该处起船，作为兵站以驻扎之。（译者按，中国军队退出山海关，系在九月三十日之中夜，因此联军占领该处，并未发生战事。）

当余将此间情形稍稍研究以后，知其现尚纷乱已极。余实毫不迟疑，以此事之咎，完全归诸俄国。因该国最先对华开始单独谈判，以致列强共同行动为其所阻，否则列强目的必能早达无疑故也。一方面，俄国将其大部分军队从北京撤退；而他方面，德、意两国却正派遣军队前往。因此，列强不能一致行动之情形，实已明白表露于华人之前。倘使美国亦将其驻华军队之半撤回，则担任其咎者，俄国实应当首屈一指也。此外，列强不能一致之情形，更将完全实现。倘若美国军队从直隶省撤退，或者不久俄国亦继其后，而同时德、法两国却正派军前往该省。至于德、俄两国军队以及两国军官团之间，尚称友睦。但余以此种表面友睦，系俄国方面故意为之，以便彼辈实际上对余所用之诡

诈推托种种手段，皆能由此遮掩其迹。

从大沽至天津之间，以及天津重要部分，已成一种不可描写之荒芜破碎。据余在津沽路上所见，所有沿途村舍，皆成颓垣废址（塘沽系五万居民之地方），已无华人足迹。从此地到北京之一段，余之参谋长 Schwarzhoff 少将，曾两次经过其地，据其报告，凡军队行经之地，但见其一片凄凉荒废而已。即北京自身，亦因烧抢之劫而大受破坏。失所流离之民，据估计约有三十万人，但实际上似或多于此数，散居于该段旁边，大半均在露天之下。在现刻良好天气之际，或尚可苟延几时；至于饥荒疫病之必先后继至，实已无疑可言。余相信此种无居无食之灾民，必将使附近居户，咸陷恐遭抢劫之不安状态。或者此项灾民竟自投身拳党。余因此之故，遂以为如此行军，则只能多多制造拳党[①]，且其制造之数，当远较战时剿杀之数为多也。

联军彼此相互之间，其关系各自不同。吾德军队与其他一切各国军队相处，均甚相得。彼辈对于吾德军士所取之态度，皆甚惊服。在军事方面，以日本军队之编制（完全依照普鲁士模范）、武装、调度及服务为最善。法国军士为一般人所轻视，甚至于俄国军士亦不愿与之交际。美国军士对于各国军士，均抱谨慎态度。就吾人所得印象而论，美国军士虽不是一种恶劣之兵，但却不是可以信任之人。大约其中所杂之冒险份子，似乎不在少数。跑到天津街上抢人，甚至于以手枪攻击法国步哨之事，皆曾发生。倘一旦该军士等解除军役以后，势将成为中国居民之巨害。（按瓦氏九月二十八日之日记，曾云：对于德军之态度，无论列强及华人，均甚赞美。此处所谓德军，系指当时曾经参与战事之六百海军而言。至于开往攻取北京之军队，并无德人在内。又现在德国派来之军队，则以其态度及军纪之佳，颇得一般赞许。）此间联军军队，一部驻在欧人租界房屋之内，一部则幕居附近。因各国司令互相协力合作之故，所有天津租界及其附近之秩序，尚称佳善。现在天气甚好，暖和，但昼却不热；凉冷，但夜却不寒。将来夜间渐凉，则当特别预备一切，如驻扎长久，并将注意及于最关重要之饮水问题。痢疾在各军队之中，业已开始发生。

十月五日之报告（时在天津）

余到大沽之后，立即通电联军各国元首，报告余已行抵直隶。现在各国均有极友谊之回答。惟美国方面，仅令国务秘书 Hay 告余："来电业已收到。"而法国方面，则更

---

① 拳党：即义和拳等民间秘密结社，同白莲教、八卦教有源流上的关系。1899 年，义和拳改称义和团。

至今未曾回答一字。

此处尚有一件可以报告之事，即法国将军 Voyron 个人，待余极为周到。甚至于向着他人埋怨某某，未能照样一如其他各种军队之听余指挥然。不过彼之参谋长（据余揣测）似常在其旁监视，以免彼溢出政府训令范围之外，过分的隶属余下。但 Voyron 却曾亲自向余要求参加保定方面之共同作战事宜。又法国将军 Frey 因病复从北京回到此地，其人颇似一位忠实军人，彼对于吾国海军人士，以及后来对于 Hoepfner 将军带往占领北京之军队，均甚为周到优待，实足令人赞扬。

俄国公使 Giers 亦于斯时抵此，并来谒余。因彼为人虚伪所得之不甚良好声名，在此次晤谈中间，可以充分从彼之举止态度及目光变动中，显露证明。彼对于攻取保定之计划，曾作警告。因彼恐（中国）太后更将愈向内地逃遁，而和议亦将因此迟延。尤有不能预料者，现尚平静无事之中部各省，是否不因保定占领之故，亦复牵入漩涡。此外，彼又以为倘若列强施用相当压力，则太后当不至犹豫下谕，毒死端王[①]以及承认其他赔偿条件。余因答之曰：关于攻取保定一事，余现刻尚未下令。

此处尚有一事应该同时报告，即余固已早与英国将军 Gaselee 计划，从北京、天津两面，共同往攻保定，但实行之期，余尚保留，而且必须保留，因德国远征队所需之服装及武器，尚未起船故也。

在余前此报告，已经述及之当初装船不善一事，现在更令人特别感觉。譬如运载第四联队全体之 Phönicia 舰，所有战场用具、军士外套，均放在舱内下层。复次，再将山炮及其他运输器具，堆置其上。最后，更以四百吨大麦，压于最上一层。一直到了昨日，始将大麦卸载。又由此到京之运输，亦感着巨大困难。现在海军步兵队之辎重，犹未准备齐全。该队大部分兵士，尚乘帆船溯向白河而上。余近思及秦皇岛港口之工作，以及由此赴站，相距三个基罗米突遥远的连络铁路之修筑，必须立刻动手（译者按，秦皇岛之港口与车站，自中国撤退山海关之消息传出后，立即由德国海军副提督 Bendemann 派遣德国海军占领），俄国方面亦将竭力为之（译者按，此句之下，被威廉第二横线，加一疑问符号）。又山海关至塘沽间之铁路，现已照旧行车。因此，余遂希望，在此冬间，对于我们此间驻军，可以得一健全基础。

关于此事之讨论，又重新引起英、俄两国之龃龉，而且颇为激烈。英国甚欲抵制俄国扩充势力范围于直隶北部之野心，遂希望山海关至塘沽间之铁路，或直接退还中国管理，否则至少亦必交与德国手中。盖此路英国曾投资甚多故也。反之，俄国方面则用全

---

① 端王：即载漪（1856—1922），清末贵族。满族，爱新觉罗氏。封端王。慈禧的侄子兼外甥女婿。1900 年 6 月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理外交。在义和团兴盛并开始“扶清灭洋”之时，曾力劝慈禧利用义和团围攻洋人使馆。《辛丑条约》签订时，在八国联军的压力之下，被指为“首祸”，发配边陲，最后客死新疆。

力图谋，早将该路及其管理，占为己有。

余对于此事，纯以军事关系为前提，并宣言曰：无论何人管理铁路，均可，倘若彼只将该路作为军事使用，而且所有联军各国皆得一律平等利用。因为在事实上，塘沽至唐山之铁路，俄国方面早已着手恢复。而且俄国又系首先利用唐山至山海关之铁路。所以，余今日允许俄国将军 Linewitsch（译者按，此人系俄国驻扎直隶军队之司令）担负恢复全路及管理该路之责。Linewitsch 将军之为人，颇似一位良好诚实之军人。彼对于一切预约之条件，皆完全承认，并作纸面条约以保证之。余对于英国要求，则拒之曰：倘英国该路企业若受损失，可向英国使馆陈述，而且此事应属于议和会议，此种要求，须俟彼时决定。反之，余请英国担任直临海岸最关重要之山海关第一要塞总司令，盖该处为英国首先占领树立该国国旗之地也。

李鸿章于今早十钟，由俄国护送，离开天津，前往北京而去。彼令人于其行后，送一名片到余处（按瓦氏十月七日之日记，有云：李鸿章——由俄国保护——与余约略同时抵津，居于华界彼之旧日衙门中，由俄国卫队保护。并有一次由哥萨克[①]兵护送，乘坐肩舆[②]，穿过租界。彼到津后，即立刻设法冀余招请。最后复使彼之俄国顾问 Korostowitsch 斡旋。余对李氏之请求，每拒绝之。又李氏往北京之时，系（十月）五日，乘坐巨大帆船而去。在北京之际，未受俄国护卫。余所带来陛下钦赐俄国少将 Stoessel（按，此人系俄国第三西比利亚东路炮兵旅之司令。德皇因其在津指挥德、俄军队有功，故赐与徽章）之徽章，于余到津之后，即在此间俄国全体军队排列之前，正式恭谨授与。该将军深觉无上荣幸，大呼陛下万岁，并请余代致恭谢之意。

军队之健康，虽尚未至可忧之境，但在远征队中，却已有七百病人。大约每个初到中国之人，照例对于该地气候，必须先缴若干贡金。所幸者所染痢疾之症，尚属不甚危险。而且防疫之法，亦已预为特别准备，以免军队传染。

最后，犹有一事附告者，即余将用全力，务使前此余曾恭奏皇上之（中国战地）破坏荒芜情形，得一止境。余因此曾要求（俄国）将军 Linewitsch，以后占领中国城镇，务宜注意斯旨。

日本军队习惯，对于此种破坏，亦复素不顾忌。因此之故，山海关一役，特令德军一个中队，先将该城正门占据，阻止日军进据。倘若该地秩序不久恢复，华人各归居

---

① 哥萨克：历史上俄罗斯、乌克兰等地一些人群的总称。13 世纪开始，部分斯拉夫人为了逃避蒙古钦察汗国的统治而流落到俄罗斯南部地区，包括顿河流域、第聂伯河下游和伏尔加河流域。15、16 世纪时，又有一些不愿忍受地主、贵族压榨的俄罗斯、乌克兰农民，迁徙到蒙古钦察汗国被推翻之后的俄南地区。这些人被统称为“哥萨克”，即突厥语中的“自由人”。哥萨克人以英勇善战而著称。

② 肩舆：即轿子。

所；又若倘遇新占之地，居民未尝出走，则吾人对于此项和平居民之私人财产，均须特别尊重；一切非法行动，均须严厉制止。

余之大本营尚未移驻北京，因运输所需之马匹帆船，尚甚缺乏故也。

十月七日之报告（时在天津）

皇上陛下，余于今日发电上奏之后，尚有与（俄国）皇子 Engalitschew 上校晤谈一事，不敢遗漏不报。

该上校今日托余之副官禀余，请求接见，并作极为亲信之密谈。该上校谓余曰：彼甚欲预防一切误会，并为俄、德利益起见，特将俄国政策说明如下：俄皇尼古拉陛下，甚愿驻扎直隶之俄军，受余节制。倘若当时余曾预定占领北京之举，应由余自率联军为之，则俄皇对此当特别满意。今因环境之故，竟由俄国将军（Linewitsch）一人，早期占领，实为俄皇陛下至为不悦之事，因彼顾念对华邦交关系故也。当其占领北京之消息传到（俄国）后，俄皇陛下以为在华政治局面，已经大变，遣送该皇子到华之举，亦已无必要。俄国对于占领北京以后，业已心满意足，不欲因为要求实行或他种条件之故，再施其他武力压迫。该皇子以为俄军撤退北京以及直隶之举，虽恰恰在余抵华之日开始实行，但此事之议决，却早在数礼拜前。今余对此若抱不快之感，彼极能喻解其意，但彼甚希望余能谅解承认此举之动机。此外，俄国方面甚愿直隶一省能划入彼之永久的、独有的势力范围。该皇子以为俄、德两国之间，对于该地势力范围问题，当不难协商谅解。盖从前彼此曾结条约，以黄河为两国势力范围之天然界限故也。至于俄、英之间，则关系大不相同。英国频年以来，不断努力，在直隶省内建筑铁道，开办矿业，从事各种贸易，以便培植自己势力。此种情形，将使俄国直到一种不堪忍耐之境。因此之故，自中国乱事开始以来，俄国即曾特别努力，将山海关、塘沽、天津、杨村、北京间之铁路及其管理（该铁路之内，英国方面曾投有大宗资本，并位置大批英人），取入手中。自（俄军）撤退北京以后（按，系从八月三十一日起开始撤退），杨村、北京一段之铁路，诚然对于俄国已无重要意义，但俄国方面无论如何必须将铁路占领，以便和议之时，已有实物在手，得以凭藉；或者竟由和议允许俄国获得永远占有该路之权。在俄国方面，最引为隐忧者，即英国在山海关及秦皇岛两处登陆军队之多，大为超过兵站卫戍所必需之数。

该上校旋复措辞曲折，并屡次声明，彼所奉告者，全系亲信之谈。继而又谓余曰：倘德国方面，对于此种与德不关重要之问题，能抱一种友谊态度，则俄国方面将特别感

激不已云云。该上校于是复用许多甜言蜜语，使余个人亦复依此方针去做。其后，彼更坦白直言，倘若德国对于中国欲施以有力压迫，最好是遣派大派军队，直向长江流域而进，必能如愿以偿。

当余与该皇子谈话之时，余大半谛听不语。惟告彼曰：吾辈十日以来所讨论之铁路问题，纯以直隶联军之行军情形为出发之点；余所注意者，只是联军在冬季之际，得一稳固基础而已。余对于俄国所欲者曾经特别迁就（而对于英、日、美三国将军之要求，则设法拒绝），使俄国得有修筑及管理该路之权，但附以下列条件，即该路须专供联军利益之用，以及该路车辆等物，得在余所命令修复之杨村——北京一段中，行驶利用。

该上校既而乞余允彼前赴旅顺，谒见海军提督 Alexejew 会谈此项铁路问题，以请该提督之允准；或者此项允准，该提督尚须先向圣彼得堡一询，亦未可知。该上校更补言曰：陆军中将 Linewitsch 诚然为直隶方面俄军之司令，但关于行政事项，则须受海军提督 Alexejew 之节制。

余因答该上校曰，余对于往谒海军提督之行，无所反对。但有一事不可忘者，即吾人条约，业已口头议定。而且在场人员，一方面为 Linewitsch 将军及该上校自己；他方面为余本人以及余之参谋长 Schwarzhohoff 少将，参谋次长 Gayl 少将，上校 Yorck 伯爵。余视该条约为已经完全议定。至于陆军上将 Linewitsch 关于此种问题，必受海军提督 Alexejew 节制之说，实使余至为惊讶。但此项条约决不能因此再有更改。

该上校旋又谈到英、俄关系。并谓余曰：余到北京将与 Sir Clande McDonald 相见，彼为仇俄最甚之人，彼之行动常使俄国受损。又该上校曾于前日在此晤见李鸿章，彼深信李鸿章曾同时密告俄、英两国，中国军队若见敌军一人踪迹，即将自行撤退山海关要塞，不复抵抗云云。

十月九日之报告（时在天津）

因为德国远征队战斗力尚未完全妥备之故，其势不能用诸广阔战区，为大规模之活动。余一直到现在，只能将北京兵力增厚两大队（第二步兵联队一，第二步兵联队二）。并得（法国）师长 Voyron 之志愿担任运河方面防务，使余之左翼因以稳固。自从现在各种重要武装运到后，余即着手组织保定远征队。盖余以为对于华人必须表示余之威权，以及应用此项威权之决心。此外，余更觉保定府实有占领之必要。该城人口众多，为北直隶之首府。据可靠消息，北京逃出大臣，多在该地。

余因获得英国方面愿受法国将军指挥之一种（令人称道的）表示，余乃转请师长

Voyron 担任天津纵队司令一职。

其在法国方面，却曾发生一些顾虑犹豫，似乎疑余或有其他特别用意。但后来法国方面，乃举出旅长 Bailloud 供余调遣。又余甚相信，此次余令德军听受法国将军指挥之举，必能邀得陛下赞许（按，攻取保定府一役，系用两个纵队。其一从北京出发，由英国陆军中将 Gaselee 率之；其一则从天津出发，由法国旅长 Bailloud 率之）。

陆军少将 Kettler（按，此人系统率德军，隶在法国旅长 Bailloud 所属纵队之下作战）之人品与法国将军之为人，以及德、法军官之互相友爱，皆足以使余相信此次远征队之出发，必无不和情事发生。余曾指令该两纵队之司令，限于七天左右达到目的地。但前进之际，必须随时联络。攻打保定之时，必须共同作战，总以骑兵张开包围为佳。倘若此役成功，余当获得一种精神上最大之胜利。余将对于俄国公使 Giers 前次向余提出之意见（谓余若占领保定，将使中国皇室愈向内地逃走云云）加以否决。其实，此君之警告，正足以证明余所取之道，完全不错。而且据此间屡次所得消息，中国皇室逃向内地之事，固已早经实现。至于对待亚细亚人，只能行使威权，只能毫无顾忌的行使威权，方足以使其感动。此种信念，仍将为余以后一切行动之指南。

余所力谋之大本营移往北京一事，颇遇困难。一方因为山海关——北京之铁路问题，只能在此地讨论解决；他方则因运载许多物件所需之运输器具，尚感缺乏。

现在，余已定于十三日开始动员。在此四日中，必须准备就绪。大部分行李，系用帆船运输，沿白河而上，约需五日。大本营之运输用具，今日尚未抵达大沽。所以，必须在此另行设法寻找他种运输器具。至于马匹一事，则仅能办到每个军官必需之额而已。

余以为此处再将大沽卸船一事，从新提及，实为余之应有义务。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预料，当第二梯团运输舰到此之时，必在第一梯团运输舰尚未卸完以前。关于驳船缺乏一事，余希望能于数日之内，设法向日本方面采办，以资救济。但当初装船不善所引起之困难，则始终不能避免。譬如四千五百箱病院用品，可以等待数礼拜再卸者，却均放在舱内上层。至于装载车辕之箱，则埋在该层之下，不能找出，以致早已起船之车身，亦均无法应用。又如大炮之车架、炮筒、炮弹、火药，分放船内四个彼此距离甚远之地方，以致各个大炮尚未全体寻出装好。此外，第四步兵联队之全体外套，尚系深深埋在舱下。如此之类，不胜枚举。据今日远征队报告，第一运输舰之卸载，除因天气关系展期不计外，在十月二十四日以前，尚不能竣事云云。当初在 Bremen 港口装船之时，其势必须迅速装载，此固为余深知。但办事者之缺乏专门智识，余亦洞悉无疑。

至于远征队之健康情形，现在可以报告者，在天津、塘沽方面，尚无严重堪忧之

处。惟驻扎北京之两个海军步队，却令人不能无虑。在天津方面，每一万人之中，约有四百二十个病人，大半均系轻微痢疾，而伤寒之症极占少数。反之，北京方面之海军步队，则有二百病人之众，且多系伤寒之症。因此，余拟等待前此增派之兵抵京后，即将海军步队由北京撤出。如无其他阻碍，余当令其前赴青岛。此间病院组织，最为优良，现在设于两所宏大学校房屋之内。关于冬日暖屋问题，至今尚未解决。染病最甚者，当为日本，即在天津方面，每日亦有五六人死亡。倘若将来夜寒开始，恐印度军队亦将不免于难。

关于山海关——北京铁路开车一事，余因俄国各种布告素不可靠之故，尚未敢决言何日可以开驶。但余希望十一月底间，或者可以开车。

余对于一切事情，无不努力活动。但因号称共同行动，而事实上却有时故作相反行动之七国，发生冲突太多，颇难扫除避免。此外，凡有关海军之事件，必须先开“海军提督联合会议”，而后始能决定。最后更加以各地消息来往，至为不便。譬如此地与北京之间，直至今日尚无电线联络（余希望五日以后，当可设好）。此地与山海关之间，直至今日，尚不能通电。由此地送一信函到大沽，约需时间二十四点钟。

现在北京方面，正在收拾前此中国皇后皇帝所居之冬宫（按，即现在总统府），以作余之司令部驻所。从本月三日起，已由陆军少将 Hoepfner 接收办理。关于此事，余亦复备受俄国之刁难与欺诳（按，瓦氏十月八日之日记，有云：余自始即曾宣言，余在北京，只愿驻居冬宫。而俄国方面，则用尽方法，提出一些不知羞耻之抗议，彼谓冬宫系在俄国保护之下。余则答曰：余若在彼处，得受俄国之保护，当甚觉安适愉快云云）。该宫为俄国所保护，曾贴有印签封锁（瓦氏原注：但常常开启，启后复封），其中大部分贵重物品，尤其是较大之件，皆被窃去（瓦氏原注：细小宝物，则已由中国皇室逃时，随身携带而去）。余既知此中情形，乃嘱咐陆军少将 Hoepfner，从俄国手中接收该宫之时，应使中国官吏参与其事，并制成一种精确什物清单，以便将来德国军队勿受窃物嫌疑。（俄国）陆军中将 Linewitsch 察知此种可畏之难关，于是设法避免，并不先将该宫直交 Hoepfner 将军，一如余之所命，乃系先行交与华人，经过三十六钟之后，然后再由华人交与该（德国）将军。

余将尽力妥慎应用宫中一切房屋。倘若中国皇室一有回銮之望，余自当立即撤出该宫。

十月十三日之报告（时在天津）

余细察此次攻打北塘要塞之情形，以及根据所得各种报告，乃知俄、华之间，必已

早有成约，以致中国全体军队，能够安然为有秩序之退出。在要塞之中，发现死尸甚少，而且未尝俘虏一人。至于山海关及秦皇岛之要塞，亦似先有同样成约，而且似乎由于李鸿章之居中媒介。在山海关第一要塞之中，曾寻出一张纸条，更使此种揣测，得以证实。英国炮舰一只派遣水兵登陆，竟将早为俄国备好之胜利，忽然夺去。因而英、俄间之龃龉情形，又复继长增高。占领北塘要塞一事，由海军提督 Alexejew 委托彼之随员陆军中将 Stackelberg 为之。其实，该中将向与直隶驻军毫无关系。大概彼（指海军提督）欲借此以助该漂亮将军（Stackelberg），获得徽章之故耳。

往攻保定之举，已从昨日起，开始进行。（法国）旅长 Bailloud 对于天津出发之军队，已下一种极合机宜之命令。而（英国）陆军中将 Gaselee——余曾派遣少校 Marschall 男爵佐彼一切——则尚未发出当相之命令。该中将曾于十一日召集各队军事长官会议，彼之参谋长常在会议之中，屡次修正彼之意见，迨会议良久之后，彼乃仅命各队军官，准于十二日开抵约距北京城南二十基罗米突（约合中国四十里）之某处。此外并无一字道及开拔时期、侦探情形、行军途径、大批辎重等等。该英国军队曾随身携载足供二十一天之粮食。当余尚未抵此以前，每值共同作战之际，各个支队辄作互相竞赛之式，此种行军方法，余亟欲避免，但现在彼辈似乎又作如此准备。

数日以来，谍报频至，谓天津、北京、保定之间，以及该处迤南一带，聚有大批拳队，从事不法行为，并对于该地居民施以种种横暴恫吓云云。此外，又复屡接消息，谓保定府驻有大批中国军队（其人数，传说至为不一），曾与拳队相战。余曾命令各军，每逢我军所到之处，均应尽力搜捕拳民，捕到之后，立即枪毙。假如将来察出中国军队确欲剿灭拳民，并无愿与我们相战之意，则我军将领当派员与中国军队长官接洽。倘使中国军队撤出保定，退驻该城南面五十基罗米突之处（约合中国一百里），联军方面当不加以攻击云云。余已将此意，训令我军将领。余之所以如此者，系欲希望或者由此预辟开始和平会议之路。

自增派之军队登陆以后，余遂拟将远征队分配如下：第一东亚旅队，长驻北京；第二东亚旅队，长驻保定；第三东亚旅队，长驻天津。又保定方面，或将同时驻扎一个法国支队。此外，法国军队并将继续担任天津南面运河一带之防务。而俄国军队则沿驻杨村——天津——塘沽——山海关铁路，特别担任护路之责。关于俄国军队数目，似乎共有两旅之众。但余现在业已养成习惯，每遇俄国方面之报告，皆不敢深信无疑。至于北京城内现在留驻一个意大利支队，与英、法、日三国军队各三四千人，以及美国军队一千四百人。因此，余以为北京一城，人口数目既远不如前此所揣之多，又复深受此次乱事损失，现在驻以上述兵额，实属十分充足，并可担负北京附近一带防务之责。在天津方面，因有租界之故，较易寻得优良驻扎之所，将留英、法、日、俄四国军队，约自二

千到五千之谱防守。所有北京及天津之外国军队详确数目，余均不易探得。因该外国军队等，迭奉本国政府之命，时时调迁变更故也。

日来德国远征队运输舰起载一事，颇有进步。因此，余希望到了十五日，可以竣事。

军队健康情形，现在渐趋恶劣。其主要病症，实为痢疾。近来夜间甚凉，对于站岗兵士，颇感外套缺乏，因而伤风者为数极多，其表现于外也，则为痢疾。从今日起，凡已起船之远征队，皆已穿服外套。

十月十七日之报告（时在北京。又以下之笔记，如未特别填有他项地点，则皆指北京而言）

司令部之从津移京，系分为两梯队，于本月十三及十四两日启程。因运输器具尚未抵达大沽海湾之故，所以，余只能利用特向（俄国）陆军中将 Linewitsch 处借来之俄国单马军车，以资转运。至于大宗行李及粮食，则用帆船由津运至通州[1]，再由通州陆运到京。所有沿途行经之路，一直至于北京城下，只是一片荒凉毁掠之景而已（据云：张家湾 Tschankiawan 从前人口，计有六万；通州从前人口计有十五万）。沿途房屋未经被毁者极为罕见，大都早已变成瓦砾之场。凡建筑较大之物，如庙宇之类，则至少内部曾受重大毁损；所有佛像以及其他偶象，皆已打成碎块。究竟此种沿着联军津、京军路之荒毁地方，其宽度计有若干，余实未能确定，但余相信当不甚宽。从大沽经过天津直到北京之路线上，至少当有五十万人变成无屋可居，散处于附近之地。数日以来，通州方面，因帆船起载下载，中国工人得有挣钱机会之故，渐有居民发现。余在天津此侧，直至该处为止，尚未曾亲眼看见过五十个华人。

十月十七日，余抵北京，乃与陆军少将 Hoepfner 约定，午前十一钟，乘马以入北京东南城角之大门。各位驻京联军将领，皆在该处迎候。计日本方面系陆军中将 Jamagutschi，为驻京联军将领中之最老者。其次系英国陆军少将 Barrow 及 Stuart 两人，美国将军 Chaffee 及 Wilson 两人。此外，法、意、奥三国，则派遣其年纪最老之指挥官来迎。至于陆军少将 Hoepfner 则更早已骑至中途迎接。

恭贺既毕，余即开始入城。并以美国及印度骑兵中队为前导，所有上述各位将领，

---

[1] 通州：金天德三年（1151 年）置。治所在潞县（今北京通县）。辖境相当今通县及三河县地。俗称北通州。

则骑马跟随余后，再后则为余之参谋人员，以及许多联军军官，最后则为日本骑兵中队。紧接余背之后，则为余之帅旗。当余初入第一城门之际，德国炮队在城墙之上，开放中国大炮，以为敬礼。而日本炮队，则在余进冬宫之时，立于宫外大理石桥之上，向余致敬。余所行经之路，需时逾一点钟，沿途皆有军队排立于旁。所有逗留北京之欧人，无不到场。即华人方面，亦复为数不少，来睹此项戏剧。余之行入冬宫，系先经荷池（按，即北海中海）上面一座狭桥，按此路线乃系特别预为选定者，盖因前此欧人，向来不许经过该桥故也。

余与各位外国军官告别以后，即入冬宫，复受使馆人员之迎接。余拟于下次报告之内，当再详细陈述该宫之地位与构造。惟此时已可奉告者，即所有外国将领，均谓余之决定选出该宫以作大本营驻所，真是一点不错。

上次曾向陛下奏报之往攻保定事宜，今日当已行抵目的之地。但余尚未得着该处报告。当联军前进之际，常常发现中国军队与拳队相战之遗迹。各个城镇入口之处，多悬已斩拳队领袖之头，以欢迎联军。余现在深信李鸿章及庆王[①]均欲用其全力，以压服拳民运动。余更相信占领保定以后，所有天津、北京、保定之间，可谓从此肃清完竣。

反之，白河左岸，尤其是上游一带，则尚为拳队猖獗之地。盖因彼处至今尚无军队派往故也。余现在要求陆军中将 Linewitsch 派遣小纵队协剿。同时复命法国、日本小纵队由此出发，以肃清之。此外，余更令陆军中将 Lessel 统带开往北京之第一东亚联军第一大队，勿沿兵站路线而上，宜取道白河左岸而行。

因欲使现在扯散之德国远征队，依然团结之故，余乃令第一东亚联队内之驻沪第一、第二中队，及驻在塘沽的第三、第四中队，各以第二梯队内之两个第九中队补充。所以，现在第一大队得以整个团结，开向北京而行。

余因应胶州总督 Jaeschke 舰长屡求暂时增防之请，乃更派第九中队一个，前往该处驻扎数礼拜。

现在中国居民渐趋安静之途，吾人可从各种迹象中见之。

十月二十二日之报告

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其驻扎地点之分配，一如当时各军攻入该城，最初各自占据之

① 庆王（1836—1918）：即庆亲王奕劻，满族，爱新觉罗氏。1894年，封庆亲王。1900年，与李鸿章同任全权大臣，与八国联军议和，次年签订《辛丑条约》。

处。其中冬宫一所，系落在俄国之手。此外，该国更于前此一日，已将位在城北十五基罗米突（约合中国三十里）遥远之夏宫（按，即颐和园）占据。

有所谓禁城[1]者，系一种高墙围绕之长方形，位在皇都中央，为前此皇帝所居。因各国公使及驻京联军最老将领协议之结果，将该禁城划在占领区域以外，只准各国军队得有通过该城之权而已。四门均被占守；直至今日，三门犹为日本所占，一门则为美国所占。余以为此种议决，实属极为有损之举。而且此中主使之人，似为（俄国公使）Giers 先生。此种规定仅能使华人得着联军虚弱之印象而已。余将设法使此种规定加以废除。因城内连日战争之故，所有全体市区，多被毁坏，但该城大部分，却尚能保存。北京街市之建筑，颇有条理，恰与其他中国城镇之狭路错杂、毫无计划者相反。北京城内并筑有数条宽路，但均未铺石。凡余所曾经见过之各处中国城镇，多系土屋相集而成；而北京城内之大部分房屋，则系以石为之。惟大多数建筑层数，仍只有一重。

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按，联军系于阳历八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将北京占领。占领之后，即正式特许抢劫三日，系自八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为止。至于德国军队，则系八月十八日及二十一日始到北京云云。译者按，此段文字，系译自瓦氏笔记之旁批，当为印行该书之人所添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但其详细数目，亦复不易调查（按，瓦氏十月十九日之日记，曾云：所幸者，德国军队当初尚未到京。至于其后开来北京之军队，又皆极守纪律云云）。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

在英国方面，关于此类行军特长，却曾被以一种特别方式，即所抢之物，均须缴出，一齐堆在使馆大屋之内，加以正式拍卖；如是者累日。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级高低，加以分派，其性质略如战时掠获金。因此之故，无一英人对于抢劫之事，视为非法行动。而且英国军官曾为余言曰：印度军队（在此间之军队，几乎全是印度人）对于战胜之后而不继以抢劫一事，实绝对不能了解。所有此地各国军队，无不一致公推印度兵士，最善于寻出各处密藏之金银宝物。

在日本方面，则对于此种掠夺之物，照例归于国家。由此所得之款，其数至为不少。据日本某将军之报告，只天津一处抢劫所得者，即有二百万两之多。

至于美国方面，对于抢劫之事，本来禁止，但美国军队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

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的打成粉碎。

此外，法国军队对于各国军队（之抢劫行为）亦复绝对不曾落居人后。

---

① 禁城：即“紫禁城”，今故宫。

关于夏宫宫中宝物，已被俄国掠去之事，余从前曾向陛下报告。倘若当初报告之中，余曾提及，俄国曾将普鲁士君主前此所赠中国各物，亦复运往旅顺而去云云，则现在余须再将此事加以更正说明，即当时事实上，确曾预将各物准备运往该处，但因陆军少将 Hoepfner 之严重抗议，业已将该物等交与 Hoepfner，现在存于德国使馆之中。当俄军撤去（按，俄军系自八月三十一日起，由北京开始撤退）以后，英国续将夏宫占据，并详细查点宫中一切余存之物（按，瓦氏十月十九日之日记，有云：各处买卖所抢之物，异常热闹。在各物之中，有〔德国〕金刚石黑鹰章一，现已落在第四人手中，最初系为俄人所得）。

至于冬宫，则系由俄军两中队驻扎保护。当该宫在太后已逃及俄军未占之数日间，其中各物或曾由仆役偷取，亦为事实之可能者，但其数当不甚大。其他各国军队，确实未尝进据宫内。但俄国却曾允许他国一些军官参观该宫，不过随时皆有俄国军官在旁伴行而已。所有宫中一部分建筑物，曾贴有印签封锁者，每值此种参观之时，则暂行撕去。

当陆军中将 Linewitsch 将该两中队撤出北京以后，对于余前此与彼约定该宫应该直接移交陆军少将 Hoepfner 之条件，未尝实行（当然系故意如此），彼系将该宫先行交与中国宫吏。至于陆军少将 Hoepfner 自接得消息至着手接收之际，其间相隔，至多只有半日，而且接收之时，并有俄国军官在旁。

就宫内情形而言，又可证明该宫最大部分可以移动之贵重物件，皆被抢去。除少数例外，只有难于运输之物，始获留存宫中。至于皇室所居之房子（因其狭小之故，不应以“宫”字名之）未尝受着损害。反之，其余附属宫中之各处房屋，如戏园、庙宇、吏室、仓库等等之曾经封锁者，均被横加劈毁，所有其中存物，凡认为没有价值者，皆抛置地下以及院落之内。

为收拾宫中房屋以作司令部驻所起见，曾用九十人，一连整理十日。现在虽已略可居住，但欲完全扫除就绪，则此刻尚不可能。所有戏台装束，浣濯用品，破碎之瓷器玻璃，打烂之什物家具，直至今日，犹堆集各处未被司令部划归应用之屋内。宫中有一座极为优壮之建筑，据云系昔日接见公使之地，现在该建筑之内以及其中宽阔天井之上，均被破物堆满，此项破物乃系前此扫除司令部用室时，所必须搬出者。余见各项破物之中，有数十个打破之摆钟，大概系因该钟之盘面或其他五色宝石，曾使当时见者顿生发财思想之故。尚祈陛下放心，余将用全力，以使一切由德接管之房舍物件，均常妥为保存。此外所有（中国）太后陛下所用之卧房及住室，余皆特别划出不用。尤其令余甚为满意者，即在进据该宫以后，立令海军大队两个，于本月二十一日，集在太后房前，举行战地祈祷之礼。

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所最可惜者，即真正对于此次战事有罪之人，反受损失极小。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

近来秩序渐渐恢复。余可以言者，即自余来此之后，除少数例外，所有（各军）非法行动，已不复发见。余之要求各国将领，注意军队纪律，爱护和平居民，亦正如余之谕令各军，严厉对待拳民一事，同样不曾放松。

十月二十六日之报告

皇上陛下，余因交通不便之故，直至今日，始得详将攻取保定情形恭奏。

由天津及北京两地出发之支队，一如原来命令，已于（本月）十八日行抵目的地之前。但其时却发现一个法国小队，从天津出发以后，曾经早期前进一段，已于十三日行抵保定。余对此并不觉得法国方面，曾有故意为此诡秘行动之心。只是该小队长官，途中未见中国军队踪迹，因而决以己意向前进行，但到城下，即行停住，未入城内。至于占据该城，则系奉 Gaselee 将军之命而行，盖该将军于两支队开到联接之后，即行担任总指挥一职故也。

该城为直隶首府，据云，共有居民二十五万。该城之占领，颇使华人得着深刻印象。盖中国一般人方面，以及据余所熟知之李鸿章个人方面，均深惧该城占领故也。保定城内，夏间曾杀戮各教牧师及中国教徒甚多；甚至于现在联军犹在监狱之内，寻出许多残酷被囚之牧师，加以释放。因此，下令严厉搜查，并将中国大吏若干捕获，余将使彼等置诸严厉审判之下。

当余初到中国境内之时，只有天津、北京两处，系用重兵驻扎，而以极稀薄之兵站线联络之。逾此以外，（中国）居民便不知有所谓联军也者。现在则情形大变。余希望不久天津、山海关、北京、保定府之间，皆将成为余之占有地带。

至于余与各联军之关系，可以奉告者，即英国人对余，随时皆极听命服从。同样，意大利人以及驻京奥国海军，亦极喜听调遣。

日本人则自视为完全隶属余之指挥之下。惟余对于该军，未尝委以何种特别使命。盖该军于上礼拜曾将其中大部分撤还日本，而担任此间守卫服役等项职务所需之数，已复不少故也。此外，该军与基督教国家之军队共同作战，亦尝发生许多不便情事。

俄国军队，在表面上，诚然承认余为总司令，所有形式上之敬礼，亦复未尝缺乏。

但因此短期经验所招之故，使余对于俄人一切言语保证，皆极谨慎承受。现在俄国军队驻扎天津、山海关一段，与余相距甚远，而且该军主要责任，系在建筑及保护铁路。因此之故，余近来对于该军（除偶尔令其派送武装小队以外）未尝委以何等特别使命。

其中最称特别的，实为余与法国军队之关系。当余初到中国之时，（法国）Voyron将军对余极为恭顺，并曾自述其希望凡遇作战之事，幸勿令其落居人后。而现在此种情形，则渐渐变更。Voyron将军尝自遣军队以作各种小战，而并不使余知之。此外，彼更将前此向余提出遣送法国军官一人前到总司令部听候差使之要求，自行撤回，并极恭敬的将此举诿之于彼所奉到的（本国政府）命令，盖该命令中未尝提及余为总司令一事故也。余从前原冀委任（法国）Bailloud将军担负从天津向保定出发并有德国军队在内之联军支队司令一职，以谋（对法）关系之改善；但是经验所得，此种办法却只能引起法军发生藉口需索之事。譬如Bailloud将军于占领保定以后，即行提出该城应归法国保护之要求。其理由则为法军一队曾最先行抵该城，（英国）Gaselee将军应（德国）陆军少将Gayl男爵迫切之请，将此种要求严重拒绝。余自此事变以后，对待Voyron将军，从此不敢疏忽。

至于美国军队，现在留驻北京者，已减至一千四百人，恰与法军一样，未归余之节制。（美国）Chaffee将军承认余为总司令之程度，只限于常常报告美国驻军人数之变迁情形，以及对余极尽统帅应得之军礼而已。

余以为前此曾经报告陛下之（北京）外交方面与联军将领间（关于禁城除外）的协定，实有反对之必要。因此，特到所谓"禁城"者一游。余偕所有驻京德、奥军官及使馆人员，并随以海军两大队所组成之战时中队一个，于本月二十三日前进宫内，参观一点半钟。

此处表现一种昔日庄严伟大之态，但亦久已趋于颓废凋残。其实，此间除夏宫（即颐和园）、冬宫（即今之总统府）两处以外，所有一切（事物）盖无不如此。即皇帝每年领受大臣朝贺，属国献贡之所，亦复颓败不堪。若此种熟视颓败不加修理之皇室，而竟据有大宗财产，此实为余（所不敢相信者也）所不敢作如是想者也。但在外交界方面，却流行一种谣言，恰与余意相反；而且此种谣言，并得驻京已有四十年、各方消息最灵通之主教Favier认为确实不虚。据云，（北京）皇室藏有三万万马克之储金云云（按，系指皇室私产而言，约合华币一万万五千万元）。盖当中、日战争之际，皇室方面曾拟将上述数目，存入东亚银行（德华银行?）及其他银行，以谋安全故也。

由此谣言又产出其他谣言，谓俄国方面曾将此项储金取去，已经运往旅顺云云。但照余之意见，此种谣传，实无确据；而且按照此间情形，储款必系现金，自余在夏宫、冬宫详细观察以后，究竟何处能够保藏此种大宗现金，此真非余所能相喻者也。

余常乘机前往位在北京西北十五基罗米突之夏宫参观。该宫之地，系一新址——距离一八六〇年（十月十八日为英军所）焚毁之（圆明园）旧址，约有一个基罗米突之遥——而且前临湖水，后倚山麓，可谓为宏壮优美之作品。（瓦氏十月二十四日之日记，有云：此处当为中国境内第一个地方能使余说："余甚乐居此处也！"）自俄军撤退以后，为时不过数钟，即由英、意两军占领。彼等（指英、意两军）审视该宫，表面既未受损，内部亦未打毁，却与冬宫内面两个处所之情形不同。但其中大部分贵重物品，亦已被人抢去。此事必非华人所为，因该宫邻近无有华人，而且从俄军撤出到英军入占之间，为时甚短故也。

现在所有余剩贵重物件，皆被聚置起来。在英军方面，则放在一个大厅之内，派人防守；在意军方面，则装在箱子之内。至于英军方面所藏者，其中固然尚有几许贵重之物，但大部分却是未具美术价值之品，而且许多已经损坏。余曾询问彼等，对于此项物件，将作何种处置。其答语则为，关于此事，尚在敬候各该本国政府之命云云。余乃作亲信诚恳之语，以使 Grierson 上校注意：倘君等真将各物运走，则将使俄人大为欢喜云云。余相信该上校当能了解余言之意。

十一月三日之报告

现在我们已可看出，攻取保定之军队，当其向前进行之际，已收沿途各地暴乱分子受其肃清之效。复因该军等声威作用之故，更获得甚为重大之影响。

余现在甚为喜悦，可以报告陛下者，即联军共同动作之事，虽前此各次必须待余调解其争端，而此次则无重大龃龉而完成。此外，余尚当报告者，即此次参谋次长 Gayl 少将之在场，实属极为有益。该少将颇能使该两纵队司令，谨依余命而行，并能促使赋性似乎软弱之 Gaselee 将军，行事变为严厉坚决。

在余所占全部区域之内，发现不少拳民。于此足见李鸿章之担保，极愿尽力除灭拳民运动一事，全属谎语。因李鸿章在中国人民之间，既具有如许势力，倘若彼能认真办理，其成效必当远甚于此故也。

当余驻扎天津之时，因遵照陛下命令之故，对于李鸿章之屡次要求晤谈，均加以拒绝。迨余抵北京以后，李氏又托一位介绍人，向余探询是否允许晤谈，并谓李氏认为此种晤谈，实有重大意义云云。余乃答之曰：假若李氏现在请求晤谈，余当可以允许云云。但李氏却迟延一个星期以后，始与庆亲王联名，向余请求，接见某某两位（中国）大臣。余对如此项请求，立即断然拒绝。当前日庆亲王往谒（德国）公使 Mumm 之时，

该亲王乃询问该使，余（瓦氏自称）能否在该使馆之内，与彼（指庆亲王）及李鸿章接谈。因彼与李鸿章对于前往冬宫谒余，甚感困难故也。Mumm 君乃依照余意答之曰：此事万难办到。

余之为此也，系由于一种根本原则，即对待中国人切勿让步，切勿表露忙态。因中国人对于每种让步，皆视作虚弱之象征，而且余料定彼辈亲到余所晤谈之请求，不久必当自行递来。又外交团内部情形，现在尚未达到与庆亲王及李鸿章切实谈判之程度，而庆、李二人亦未曾提出彼等确系议和使者之证书。因此之故，余之暂时拒绝接见，当不致迟误事机也（瓦氏十月二十九日之日记，有云：余常在外交界之背后加劲，促其强硬，并使其严厉反对（俄国公使）Giers。但余却极望自身万勿出头牵入外交谈判之中）。

自余身居中国境内五个星期，详细观察以来，乃深信俄军当时之撤退北京，与同时俄使之由京移津，以及彼等与李鸿章之往来密切，实发生极恶影响。由此所表出之列强意见纷歧之现象，又使华人胆子一壮，兴致复高。最近三星期以来，军事方面之进行胜利，及联军决在直隶过冬之明白表示，虽使华人得一深刻印象，但余尚不敢遽信华人方面业已充分屈服。（瓦氏十月二十九日之日记，有云：中国领域有如彼之大，一个省份之暂时占领，殊不足以使感痛苦。中国大多数民众对此，并无一点感觉，或者甚至于始终未曾知有此事云云。其后，瓦氏于一九〇二年，复对此事有所记述。其意略谓，中国一般人之意见，皆以为联军只向直隶开战，而山东及扬子江流域，则为一种中立地带云云。）

余认（俄国公使）Giers 先生所提停止敌视华人之建议，全系一种故意舞弄之纵横手段。余曾谓（德国）公使 Mumm 曰：余对于此项建议，决难承认。倘若竟自议决，则余将毫不顾及，凡系余认为必要之一切敌视行动，皆将继续下去。余对于停止敌视行动一事，只限于下列条件方能认可，即中国军队全体撤出联军所占之区域，而且拳民运动亦已业经肃清。

关于中国皇室回京一事，就熟悉华人情形者之观察，皆以为若北京一日握在联军手中，则回銮之举，即一日不能实行。盖皇室对于中国人民方面，甚难为情故也。而且专就禁城内皇宫，以及夏宫、冬宫两处之破坏情形而论，余亦以为恐非皇室所能驻扎。此外，回銮途中所需之期，至少须四个星期，换言之，必将达入严寒时节，亦当为现刻不能实行回銮理由之一。又据可靠消息：李鸿章曾令留驻此地之大臣，前往西安府行在（按，原文为济南府，当系印刷错误，兹改为西安府），更足以证明尚无立即回銮之事也。

十一月九日之日记（译者按，瓦氏于赴华途中及驻华之日，常作一种日记式之记述，每隔若干时日寄回德国家中一次）

余之行动，颇为英、俄两国因互争直隶势力范围而生之极端龃龉情形所厄。该两国军队间之紧张程度，业已趋到彼此相见以兵之可能。我们对外政策系不欲与任何一国发生极端恶感，因此余亦当然不应袒护任何一方。当其我们在华北方面，正欲对于英国特别亲善一点之际，而英国与我们在长江方面，却正互相猜疑最甚。至于余之个人，则一方面既负指挥华北英、俄军队之责，而他方面却又负统率长江德国兵舰之命！余暂时尚不欲将余之平素诙谐性质，骤为改变，余恐他人处此地位，或者早已愤懑不堪矣。其间最令余顾虑不已者，只有一事，即此种软弱情形，尽行表露于华人之前而已。（当时有人曾告瓦氏曰：在保定府中所捕获曾经谋杀多数牧师之三位体面华人，业已判以死刑，但后来复将其赦免。）

十一月九日之报告

余与法国远征队之关系，日前报告中曾经述及。当余初到中国之时，彼此关系颇为友善，但在近来则日趋恶劣。（法国）Voyron 将军，表面对余虽不乏相当礼貌，但终有一些秘密举动，使余极感不乐。法国军队盖欲藉此（秘密举动）以掩饰其一切行为，并设法表示该军地位，全系独立自主。余深知 Voyron 将军必受他人之影响无疑，盖彼之营中常有一种监视之人，立于其侧故也。

至于法国军队与德国军队之间，其情形极为友善。反之，法、英两国军队之间，无论军官及兵丁，却皆不甚相洽。至若英、俄两国军队之间，则其关系日趋恶劣。（瓦氏十月十一日之日记，有云：俄、英两国军官之间，有时竟至势将互相开火之情形。而且英、俄、法三国军士尝各自对余互相诋谤他国军士为窃贼，为强盗，为放火者。但该三国军士却无不同声指摘意大利军队，谓其备具上述三种罪恶。）余将尽力设法，以使德国军队脱离此种互相争吵之旋涡。余将利用礼貌，并加以相当顾虑注意，以使各国军队合作。

十一月十一日德皇威廉第二自柏林亲笔书寄瓦氏之函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十一日寄自新宫

我亲爱的伯爵！

因我们彼此相隔甚远之故，遂使我不能不从早作函寄君，以便我所致君之新年及耶诞[①]庆贺，能及时到达君处。所有此次一切经过之情形，皆一一如余所料。在东洋方面，尤其是在中国，（彼等）时间极富，（向不着急），所以（我们）亦必养成习惯，知道不能迅快进行。君之九月二十五日极为详切有趣之时局报告，昨日已到余手，余立于即晚，偕同（国务总理）Bülow详细研究一番。其中所述一切，可谓善于描写，最能给人一种极为明了之景象。俄人一切行动，仍与初时相似，全系虚伪错误，正如余之已故叔父 Waldemar von Holstein 所谓 Jalgenholz 者是也。（按，Jalgenholz 一字，似与 Galgenholz 一字相同，盖伯林土语往往将 G 字母，易为 J 字母故也。若果系 Galgenholz 一字，则当译为“绞首架之柱子”。）余对于此事，并不以为愁闷，因余早知如此，未有其他厚望于彼故也。自满洲以及彼所最爱之铁路，一时攫入荷包以后，所有其他在华事件，彼对之皆不再感丝毫兴趣。现在，彼（之所以犹且周旋其间者）只欲尽力设法使吾人之最后胜利，饱受无数阻碍而已。彼等虽曾为焚烧、抢劫、刺杀，以及“创办博物馆”诸事（其意盖谓俄国抢劫中国宝物，而自建博物馆），然而彼等却欲装作中国之“友”，不恤以损害欧人为其代价。余对于君之处置大沽、山海关铁路一事，极为欣慰。（按，十一月九日，瓦氏曾电告德皇，谓据俄国 Linewitsch 将军向英国参谋长 Barrow 之正式报告，所有山海关、杨村间之铁路，将交与瓦氏接管。瓦氏并拟将该路管理，转交英国。但附以条件，即该路应与各国以同等利用之权。）俄国之要求占有该路，实系一种不知羞耻之举；请君坚决的将该路置诸（各国）公有之下。倘若俄人意欲全体退到满洲而去，亦并非不幸之事；因为从此我们尽是“一群少女”（按原文是：unter uns jungen Mädchen，乃系德国一种俗话。其意有正反两面：正面则谓只是一群天真烂漫、洁白无疵之少女，当然不会为非作恶。反面则谓若是少女群居一处，则无论什么话什么事，皆说得出来做得出来）。君将该路交与英人管理，而以各国公用为条件，实属公正合理之至。余对于我们重大榴弹之佳良效果，不胜欣喜，而我们的步炮队，更是勇气百倍，雄视一方。余尝从各种外国人报告及函件中，得知君之驾驭各国军士，何等超卓！

---

① 耶诞：即“圣诞”。

更从联军各次战争中，得知君之鼓励将士勇气，何等巧妙！至于吾国军队与其他各国军队相处颇洽，最获余心。现在我们国内所有对外政策方针，亦复如此。尤其特别令余欢喜者，即我们军士能与法国军士如此相善。彼此共同作战，乃系一种最良之粘料。“血是一种特别果液”，昔日 Mephisto 已曾言之。（按，此语系出自德国大诗人 Goethe 所作之 Faust 剧中。）彼此互相认识，互相尊重，尤其是我们兵卒及将士之能力，务使他国知之尊之，以便他国熟晓吾国军制之优越，将所有对吾宣战之希望，从此衰灭下去。（武装的）和平保证，比较一切海牙会议[1]为可靠！我们秋操之经过，极为佳善；地点既美，天气又好。并有一位法国委员在场参观，法国久已未派委员参观，此乃第一次也。一个颇与夏日相似之良好秋季，得以赔补我们今年所过之可恶夏季。因此，所有军队皆可长远开行以及露天夜操。而且禁卫骑兵师常于夜间紧密连结，行经一百一十基罗米突（约合中国二百二十里）之遥，并包括横渡 Oder 河一段！其在白昼，则两军团中之步兵师，联接前行四十到五十基罗米突之远，亦并非罕见之事！今年天气久热，葡萄（酒）收成甚好；盖因十月天气之平均温度，犹在卢氏寒暑表十五度故也。又其间余已将国事委与一位年少而又稳妥之人（系指当时新任国总理 Bülow 而言）。

我的可怜妈妈，甚为痛苦。在四星期以前，颇使我们担忧；现在感谢上帝，伊已渐渐痊愈。惟疼痛之事，仍常常不免耳。余现在已将君之军队冬日用品，以及军官衣服，均已备定。并且除去旧有背囊，另换一种新囊，除去两大弹盒，另换一种小盒。请君特别注意饮水，以防疫病；所饮之水，必须常常蒸煮。余衷心希望，上帝佑君护君，上帝将导君进行，一如前此之时。上帝实为君之困时顾问。上帝乃系最好之同盟，为君等在外所急需者。余甚望能因健全有用之和平，以及中国皇帝之回銮，得使我们远东商业获一繁盛发展的稳固基础。请君问候各位将领，并请对余勇敢军队宣布，余对于彼等所有成绩，极为赞奖，极为感谢。上帝佑君。

君之常常忠实感谢的国王威廉

十一月十二日之日记

此间买卖当时抢劫所得各物之贸易，极为隆盛。各处商人，尤其是来自美国者，早

---

① 海牙会议：1899 年和 1907 年在海牙召开的国际会议，也叫“海牙和平会议”。会议宣称以“限制军备和保障和平”为目的，但在限制军备方面未取得任何结果，只是通过了许多有关战争、中立与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法规的公约（“海牙公约”）。参加 1899 年会议的有中、俄、英、法、美、日等二十六国。参加 1907 年会议的共四十四国，包括 1899 年会议的全体参加国。

已到此经营，获得巨利。其出售之物，以古铜、各代瓷器、玉石为最多。其次则为丝货、绣货、皮货、铜瓶、红漆物品之类。至于金银物品，则不多见。最可叹者，许多贵重物件横遭毁坏，其中常有无价之木质雕刻在内。只有余之驻所，尚藏许多宝物，一切犹系无恙。倘若我们一旦撤出，则势将落于中国匪徒之手，最后当然加以焚毁。一八六〇年之夏宫（按，指圆明园），其情形正复如此。所有当时英、法军队之未曾携去毁损者，一自彼等撤出之后，旋被本地居民（?）焚毁。

最侥幸者，德国军队当时未能参加公开抢劫之事。天津之战，我们只有三百海军参与其役，而舰长 Usedom 并将彼等聚在欧人租界之内，不准一兵前往天津（城内）。至于德国军士之到北京，则已在抢劫久过之后。余之所以谓德国军队未能参加抢劫为侥幸者，盖以司令长官若见周围各国兵士，已得各该军官允许，实行抢劫，或者各该军官自己，甚至于争先抢取其最好之物，试问将有何法处置？又若（德国）兵士之中，设有一二，颇知避去长官耳目，以满其抢物贪欲，试问又有何法阻止？倘若我们国内之人，很简单的相信，以为此间将替基督文化及习俗，作一大大宣传，而事实上无非只能赢得一种重大失望而已。吾德自“三十年战争”[①] 以及法国路易十四[②]之匪军（侵德）以后，如此毁坏之惨，尚未尝复见。余在此间，诚然已将秩序略为恢复，公开抢劫之事，已不再见；彼等并依照余命，设法以使和平居民见信。但余一人固不能处处照及，所以，现在仍往往不免发生最堪叹惜之事。凡欲对此加以批评之人，余请其切勿忘去者，即此间英国军队，除极少数之例外，皆系印度人。换言之，皆系异教徒或回教徒。而大宗日本兵队，则更是全系异教之人。（英国）Gaselee 将军于攻取保定之役，曾依照余命，将其军队驻扎城外露天帐棚之内，因彼深知，倘若驻在城内，则抢劫居民之事，便难加以阻止。

十一月十四日之报告

自庆亲王及李鸿章总督最近作函乞余赐见以后，余已允许；并约明日接见该两大臣。

此间关于侦探一事，极难着手组织。所有内地消息之探知，余多赖天主教牧师之助。而且此种帮助，系出自彼等情愿。惟其中极为老练聪明之主教 Favier，不幸已于数

① 三十年战争：1618—1648 年在欧洲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国际性战争。德意志新教诸侯和丹麦、瑞典、法国为一方，并得到荷兰、英国、俄国的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和西班牙为另一方，并得到教皇和波兰的支持。所谓新旧教之争只是借口，实际上，皇帝要加强权力，新旧教诸侯要扩充领地，几个大国则乘机进行侵略。战争以皇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和西班牙的失败告终，使德意志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② 路易十四：法国国王，1643—1715 年在位。

日以前，前往罗马，离开中国，临行之时，曾训令彼之代表（Jarlin 主教），务须尽力助余。因此，上校 Yorck 伯爵进兵（张家口）之时，曾有许多牧师随营效力相助。余以为进兵张家口一事，极感需要。盖因北京占领以后，曾有大批中国军队退往张家口，现在尚驻长城以外（按，此项长城，即曩日亲王 Heinrich 殿下曾经游过者）。换言之，尚在余所不能容忍之近侧。此外，该地更有许多天主教牧师及中国基督教徒，处于迫急状态之下。余已命令上校 Yorck 伯爵，相机便宜行事。倘若该伯爵既达张家口之后，则宜立刻仍将兵队复行撤退，盖久占张家口之心，余因其距离太远之故，实自始未尝有也。俄国方面以为占据张家口，势将惹起蒙古居民，陷于不安状态云云，余则仅视此种论调，无非有意故甚其词而已。（瓦氏十一月十七日之日记，有云：李鸿章与〔俄国公使〕Giers 氏来往甚密，李氏必曾要求 Giers 阻余进兵张家口，此实为意中之事显而易见者。）

余将趁此季候情形尚未严寒之时，派遣各种小队，开向各地巡逻。只可惜现在天气业已开始不佳，有时竟到摄氏寒暑表零下七度。余甚希望此种现象，尚非真正从此冬日开始之意。盖大沽海湾起船之事，至今尚未完竣故也。

因为设法妥为安置军队之故，尤其是建设可以生火之房屋，曾用全力以经营之。其中使人加倍不乐者，即自大部分俄军撤去直隶以后，所有留驻该地之军队，其势不能不从新调动一番。因此之故，前此已经设好之冬日军营，不得不加以抛弃，再行费力重新建置。（瓦氏十一月十七日之日记，有云：数日以前，俄国军队宣言，行将撤出直隶。而且随即任意离开彼所担任保护之一段铁路而去。后因严重电询〔俄国〕陆军大臣之故，彼辈〔指俄军〕乃不得不重新接管一切防地；已经放弃之该段铁路，又复再行占领。）余曾向（俄国）皇子 Engalitschew 上校，对于俄国此种不负责任之行动，尽量吐露。余近来愈觉与俄人共事及接洽，真是十分困难。凡有所约，皆无确实履行之意。所有一切虚谎与遁辞，辄以必须先行询问圣彼得堡或旅顺为遮饰。倘遇难于答复之事，则以电报不通为词。凡此种种，余皆必须常常计及。

十一月十九日之日记

今日余复在清朗日光之下，骑马游行甚久。余之出游，几乎无一次不发现一点新鲜趣味之事。今日余复寻得一座大庙，距此并不甚远，在荷池（似系指北海）彼岸之上。该庙余曾指令猎兵中队，作为冬日驻所之用。此间所谓“庙子”，皆非一座单独建筑物，乃系许多建筑物集合而成；外边更以高墙围之。即系寻常小村之庙，至少亦有五座建筑

物集合而成。至于庙门之外，常有一座屏风，当然系用石头建成，如欲入庙，必须迂绕而过。此项屏风乃系抵障魔鬼之用，盖魔鬼甚不喜行迂道故也。魔鬼一物，在中国国民生活中，颇有重大关系。通常魔鬼之来，系从北方，因此所有保障亦多设在北面，譬如北京北门进口之处，并非正面一直通入，必须由左或右两面，绕道而进。同样理由，皇宫北面出口，特以煤山遮置于前。此项煤山系用人力堆成，体积甚大。

十一月二十日之日记

如何而能达到和平，以及何时始可达到和平，现在余尚丝毫不能预察。欧洲各国之利害关系，彼此完全不同。一种诚心合作，实为绝无之事。即或对于某项问题，业已意见一致，然而彼此在实际上，却仍互不相信。因此，余之责任，殊不轻易。其中尤感困难者，和即法、美两军，只在某种限度之内，属余指挥之下。此外更有一事，亦复发生困难不少，即八国军队，皆各自有其特殊之行军主张、纪律训练、军官地位等等。但余相信，直到今日，余对各事之应付，皆颇得法。不过所有一切处置，往往必须与余心中所欲为者，甚相悬殊耳。余与各国之间，每日皆有发生争执冲突之可能，但究竟于事何益，因此余遂设法避免。

十一月二十日之报告

余恭奏皇上陛下，本月十五日余曾接见庆亲王及总督李鸿章。李氏首先到此，庆亲王则迟二十分钟始来。两人共在余处，计有一钟之久。

从谈话之中，余遂觉得，该两人均有急望和议开始之意。余曾谓彼等曰：“和议之事，可望于短期之内实现。”但余个人却因此间外交界内部对于议和条件协商缓慢之故，究竟何时开议，固丝毫未有把握。余并要求该两位中国大臣，宜尽彼等力之所及，以谋和议，从早议决。盖迟延结果，不但对于中国地方有害，而且亦与中国信用有关。

余对彼两人，屡次明白宣言，联军决在直隶过冬之准备，现已十分妥贴。至于余之个人，在此尤觉异常安好，此间佳美天气，与余极为相适云云。因为李鸿章先生最近曾经大胆向着使团指责联军行动，谓中国居民深受其苦之故。余乃向李氏声辩曰，现在为害中国良民之真正暴徒，不仅是尚未肃清之拳民；据我所知，即李氏自己部下之散为小

队驻在省内各地者，亦复如此。现刻已经屡次证明者，即往往全村居民，一见中国军队将到，便全体逃走。反之许多村庄居民，对于联军之来，却极为热诚欢迎。余因要求李氏，设法速将彼之余部撤出直隶而去；因直隶为余占领区域故也。如此，则余将停止一切敌视行动。至于占领区域之范围，余系以北方则自长城、山海关以至于张家口西面之山西省边境；西方则自山西边境以至于 Heischukuan（黑松关?）；南方则自 Heischukuan（黑松关?）起，东方以至于海。

李鸿章请余赐给彼之差官一种通过护照，以便前往接洽现尚存留省境之军队。余乃答之曰，余固深知彼与其部下消息，甚为灵通；但余亦可发给护照，不过必须先将该项差官所持之命令内容见告方可。彼或当（由此）了解，余对于中国官厅，必须其诚心依照余命而行者，方能容忍通融。

今日余曾前往答拜该两先生。在庆亲王处仅作一番无关重要之交谈。但彼要求从速开始和平会议之意却曾表示出来。

余给李鸿章先生一图，其上余曾划有上述占领区域之范围。李氏颇嫌其过于宽广。余因答之曰：余不能再将其减小。李氏承认余在北京方面因惩罚多数盗贼之故，已将该城秩序完全恢复，可谓成就不少。李氏又求余准彼组织机关，以帮助（联军）军事机关维持秩序。余从李氏屡次提及进兵张家口一事之中，可以明白看出，此次进兵之举，颇使彼深为忧惧。且由此又足以证明余之进兵该地，可谓颇得其道。李氏亦复求余，应用全力，以使和平会议从速开始。又李氏自谓近来未接皇室方面新鲜消息。

余相信若无（俄国公使）Giers 先生所继续酿成之种种拖延，则“和会预议”早已结束。

余毫无疑议，该两位中国使者，因其本国利益之故，甚以为应当从速议和，虽受重大牺牲（指和议条件而言）而不惜。但彼等却又甚虑反对党在皇室方面，获得优势。

十一月二十三日之日记

今日余曾到中国戏场之内。中国人极嗜戏剧。北京方面设有不少戏园，最富之人并往往筑有私家戏场。余曾被（中国）年老商人邀请多次，直到最后余将请帖领受之时，于是大演宴戏一次。余与随员人等备受优礼迎迓，并导入特设雅座之厢内，其中安置被有桌布之桌子一张，除了此地无时或缺之清茶以外，更有香宾酒、果子、糕点、雪茄烟等等，以享余等。最初开演两折毫无意义之短剧。所有女角，皆以男子代之，盖因女子素来极少在公众之前露面也。同时并杂有音乐于其间，足使石头化软；或者说得切实一

点，以便使人头痛。所有观剧之人，坐在小桌之旁，大抽烟筒，饮茶吃果，亦复同样喧哗不已。中国人常常高呼“好”字，以代替（我们）Bravo（按，即“妙哉”之意）一字。终场更以王侯、厉鬼、战士等等跳打一阵。此种跳打技术，实为余生平尚未见过者。当余挨过一点半钟以后，复坐余车之中，于是不胜庆幸（得离苦海）。

十一月二十四日之日记

此间户部尚书（立山）曾被太后垂询，是否应该继续攻打使馆。该尚书乃力谏其不可。于是太后直唾彼面，端王复以足踢之，立命拖拉出去。迨至两钟以后，此不幸者业已斩去其首矣。当时寄在庙内之尸体，现在拟改葬城外家墓之内。该家属系与庆亲王有戚谊，并曾向余请求派遣卫兵护送出葬。Eulenburg 伯爵愿任斯职，并由余给以司令部护卫骑兵随行。该项葬仪，系由早晨八钟直至晚间黄昏之时。许多送葬之人，站在庙门之外，或抽烟筒，或相话语。继而主要孝子（系死者长子，被以白衣；按白色为此地之丧色）走出庙来，将身伏在跪垫之上，开始高声痛哭。所有其余孝子，亦复同声相和。痛哭叫唤一刻钟之后，该长子遂站立起来，抛一瓷盘于空中，旋即堕地破碎。现在丧殡队伍，乃动手出发。最前行者为死者生前所骑之马，被以极为华丽之鞍勒。随即继以巨大灵柩，并用重被及皮货覆盖，系由三十二位丧夫抬运。其后更跟着三十二位丧夫，以为换班抬运之用。最后则殿以无数送葬者之丧轿。在未出葬以前，已经用过一次清茶点心，对于卫兵更享以雪茄香烟。并焚烧许多纸张，其上（当然系因乱离时代之故）曾写明此项纸张之用意何在，譬如金钱数目，亦注在其上。在此十五基罗米突长途之中间，曾停住早餐一次。每遇过桥之时，则燃烧一种纸物，抛在空中，以使魔鬼远去。既葬之后，又是烟茶详谈一次。李鸿章之秘书官某，系死者之戚属；今日特来余处，以丧家名义，向余敬谢十分友助之谊。当彼行入房之中时，遂在余前“磕头”。换言之，即是彼倒身于地，以额撞之；而且撞得有如此之猛，竟至眼镜直从鼻上落下。又此君乃系一位曾受教育之人，尝寓欧洲甚久，能说熟练英语。

十一月二十四日之报告

敬祈皇上陛下，准余在通常的电报呈奏及书面报告以外，再为下列之恭谨议述。

余自接任东亚司令事宜以来，常将占领烟台之事，放在眼中。当本年九月二十五日，余在该埠海湾之时，亦尝思及实行占领之计划。迨余熟察中国现状以后，乃得一结论，即攻取该埠之事，实不困难；加之铁甲舰队之助，尤为容易。关于军事方面之难题，只是继续占据该埠，以及防守陆地一面，两事而已。德国远征队所负之繁复责任，将因俄军不久撤退之举而益增，实无再行分兵占据烟台之余力（至少必需两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中队之众）。尤可虑者，为直隶海畔结冰一事，将使登陆军队（指烟台方面）与远征队大本营之联络为之断绝，以至于三月之久。假若政治局面无其他变化，余当于重行驶船之时，换言之，至迟当在一九〇一年三月一日，着手攻取烟台。盖因中国方面即或和约不久成立，而支付赔款之事，则只能十分逐渐缓慢实行；如此，则占据烟台一地，对于德国，实系一个最为适宜之质物。究竟其他列强实行类似手段至于何种程度，以及列强之间如何能够办到一致，余皆不能预断。因余囿居此间，对于政治局面，不能一览无余故也。

因政治方面每受军事行动影响之故（其实几乎常常如此，因为余与七国军队，皆有关系），所以余常引为己任，凡与陛下政策有碍者，皆设法避免。余常尽力，在英、俄两国利益绝对相反之间，譬如铁路问题互相激烈冲突一事，每每居中，不袒左右。并且常常声言，余对于铁路之所有权问题，决不加以断定，所注意者，只联军共同利益一点而已。

英、俄两国军官之间，其相仇有如此之甚，必须余竭全力以止双方决裂。英人与法人之间，亦不相和，英国军官颇不愿与法人交际。至于俄、法两国之友谊关系，其在中国方面，却未尝有所表现。法国第一次派遣来华之军队，全系殖民地军队，极无价值。当彼等开到北京之际，以及京中作战之时，均受一般人之轻视，尤以我国军队轻视法军形诸于色为最甚。同时法国公使 Pichon 先生，又是一位公正廉直之人，对于俄国政策，尤其是（俄国公使）Giers 先生之行动，却正不满意。以余个人经验所得而论，此间外交界盖无一人相信 Giers 先生者。余以特别周到及十分礼貌之故，现在又与（法国）Voyron 将军，极相融洽。彼似乎曾作报告，寄与本国（政府），极为赞誉余待法国军队之态度。在天津、保定以及其他各处兵站地点，德、法、两国军官之间来往，极其自然。而且一般法国军官，将军当然不在其内，尝谓报仇思想已成过去残余之物。因为联军各国利益之不同，与夫行军、军法、纪律、军官位置以及其他等等之相异，更加以余与法、美军关系之不密切，所以互相冲突之机会不少。但余以此种冲突，对于陛下利益，有何 好处，因此余除保持地位必需之争执以外，皆设法避免。余现在可以言者，即此种避免，幸已办到。余与各联军司令，皆甚相洽。彼等关于普通礼貌及军事敬礼方面，亦素不缺乏。余对于（俄国）Linewitsch 将军曾经两次严重干涉，对于（意国）

Garioni 上校，曾勒令彼撤回已经发出之命令，但彼两人，均未尝因此介意。

即或世界各国对于总司令一职，不甚加以重视。然而陛下之提议设置总司令一职，却对于全局促进不少，此固陛下可以确信无疑者也。余曾见及此间混乱状况，若无总司令之设置，只有愈趋纠纷之一途；而现在则此种混乱状况实际上业已消灭，变成一种可以令人堪受之现象。联军军事行动之统一，不但华人方面深觉不安，即俄人方面亦殊感不便。余曾令人细察 Giers 先生之行动，彼常与李鸿章不断的来往，并常代中国方面说话。彼更设法提议停止敌视华人行动。对于极有成效之保定府、张家口两处进兵事件，又复竭其全力以阻余。

俄国自占领满洲以来，十分心满意足；似将径与中国结一分割条约，或者现在此约业已结成。而法国方面则依照余之观察，大概未具与此分割条约类似之野心。该国（指法国）似有其他特别计划多种，正在进行之中。该国常常特别表示热心天主教务，设法接近罗马教皇，以冀复得异教国及回教国中天主教徒之保护职责，当然为其上述特别计划之一。此外，则扩充后印度（安南）之领土，当亦属于此项计划之中。

余之行抵大沽海湾，虽在九月二十六日（译者按，前面报告曾谓行抵大沽为九月二十五日，与此略有差异），而开始大规模进兵之举，则直至十月十二日方才动手者，其原因专系德国军队未曾准备齐全之故。盖当时尚甚缺乏可用之马匹及运具故也。余写至此处，不能不恭谢陛下，赐余此种极有趣味、最长见识之司令位置，以及由此从新表现之天恩信任。愿上帝赐余聪慧及力量，使余得尽职责，以令陛下满意。

下列一段文字，系瓦氏作于一九〇二年，题为“烟台”，因与上列报告有关，故附录于此。

当余尚未启程赴华，逗留 Wilhelms höhe 之时，余尝闻知皇上，对于海军提督 Bendemann 之行动，不甚满意。因皇上曾令彼相机占领烟台，而彼竟自未尝实行故也。皇上对于此事常常表示极为不满之意。其根本思想，当然系在大大扩充我们山东（胶州）地盘，甚望能将该省大部分均置诸自己势力之下，以作“瓜分”中国，我们应得之部。

至于余个人一九〇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之观察，则以为若利用铁甲舰队，不久可将该塞（指烟台之塞）攻下。即只用巡洋舰队，亦复可以成功。但攻取（烟台）一事，当初却尚不能谈到。盖彼时一般意见，均谓联军只与直隶开战，所有山东省、扬子江等处，皆系中立地带。因此之故，海军提督 Bendemann 在余未到中国以及铁甲舰队尚未开至以前，其力虽亦足以占领烟台，但彼却能谨慎从事，未尝实行占领；因曾顾及军事与政治两面故也。关于政治方面之原因，余在下面再述。至于在军事方面之原因，则系当时果将烟台攻下，其势必须驻军防守，而 Bendemann 之兵力，对此却极嫌不足。并且当时舰队尚有他种责任在前，如攻取山海关要塞，帮助远征队起船等事，更安有余力为此？

迨余抵华以后，余对于调用德国军队解决直隶以外之事，更复不敢思及。至于德国军队武装之未曾准备齐全，尚在权且置诸不论之列。此外，如果攻取烟台，其势必须协防胶州。而况该处德国（胶州）总督，固早已自觉其兵力之薄弱，尝请余之援助。（山东巡抚）袁世凯对待我们，颇具好意，同时并尽力剿除拳党。假若彼现在（因胶州之故）必须起而抵抗我们，则胶州势将濒于十分危殆之境。因为我们从此又惹起一场山东战争，以代替直隶战争故也。

余既知皇上此种希望，所以处置此事，最为谨慎细心。余固雅不愿自取“怯懦小子”之令名，但余亦却不愿轻启一种战争，其结果为我们所不能预料者。因此之故，余遂决定对于此事，暂勿过问。而况远征队之准备未竣，正好给余以柄。并且余亦自思，待到德国远征队战斗力全备之时，冬日已将届临，关于海战一事（因大沽海湾为水所封之故）无法进行。但皇上对于烟台却未尝一刻放怀，可于 Schlieffen 函中见之。盖该函之中关于攻取烟台一事，固未尝直接命余为之，但却向余特别解说提及。余之报告中，对于此项问题，常极小心从事。因余深知，对于皇上，若故意拖延时刻，往往可以达到目的；若直接拒绝不为，则照例不能达到目的。当时 Schlieffen 对于皇上占领之意，未尝加以谏阻，以及外交部（或者明白说一点，当时国务总理），未曾加以有力的反对，余皆至今莫明其妙。盖因占领烟台所惹起之政治影响，无论如何，必非令人可以乐观者也。

第一步，英、日、美、法各国军舰，甚或意国军舰，均将立刻开到烟台。遣兵登陆，略似上海方面情形；将使我们此后对于烟台之一切行动，皆一一受其阻碍。日本方面一定提出抗议，因该国在烟台之商务甚盛，不欲受损故也。或者英、美两国亦将提出严重抗议，因英、美两国只欲战事限于直隶一隅，以免其他中国各地之英、美商业，受其妨害故也。俄国方面似乎劝励我们力向山东扩张势力，一如我们所愿；彼之真确希望，却在促使我们与英国、日本发生龃龉。法国方面当然对于凡与我们发生不利之事均甚暗喜；或者法国（因俄国之怂恿）曾经故意劝励我们扩张势力于山东，以引我们与美、英、日三国发生冲突。于是我们竟负破坏列强勉力所成的共同行动之咎。（或者可以说是，我个人独负其咎，因我未尝奉有一定命令而为之者也。）换言之，我应该违反我所引为己任之（对待华人，应该表示列强一致的）主要责任而为之。我若为此，实为华人所希望所算定。倘若发生激烈冲突，则我们势将自取大辱而终。盖只须日本一国之力，已足以逼令我们退出亚洲，如其我们不自愿全军覆没，同归于尽。假定当时我们果真将山东大部分据为己有，试问所得效益何在？占领该省所需之兵额，即以全体远征队为之，仍嫌不足。更加以长期占领，所需经费甚多，颇难获得国会方面通过。而且我们仅因一点未定利益之故，而占领一种最易被人攻击毁损、最为战时敌人注目之地，无论如何，实系一种危险。最后还有一层，倘若中国秩序恢复以后，亟谋山东方面脱离我们

羁绊，试问我们力量果足以对华宣战事否？换言之，其结果亦无非自取其辱而已。

现在余因欲应付得宜之故，而且自信余能深知皇上之为人，于是乃用一种甚为特别之方法。自大沽海湾结冰以后，海路进兵之举，因而数月之内绝对不能实行。余乃上书皇帝，一俟冰解之时，余当立即占领烟台。余之为此（章奏），虽余之参谋长亦不知之。余在天津方面，调集两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中队，听候差遣。所需运输船只，亦复随时准备妥贴。倘若一旦下令进兵，无须长久预备。余因自思，现在皇上到此，必能对于此事，加以静思，并与他人讨论。而且国务总理或有这一点聪明，对于此事之危机，加以认识。此外，余亦深知，皇上并不欲用冒险方法以为之。余对于此次之事，幸未失望。盖在二月初间，余即奉到勿攻烟台另候朝旨之命。（余之参谋长）Schwarzhoff大为惊讶，当余向彼追述从前背彼所为之事，余实已达到余之希望，即皇上亦不能谓余为缺乏锋利之人，以作大本营中诸位先生津津乐道之材料。此次事件在历史方面，诚然可以颠倒叙述，一若余从前真有攻取烟台之心也者。而不知在实际上，余乃系力谋避免攻取烟台之人。余之达到目的，系以此事之责任归诸皇上。余相信余之此举，不仅对于德国，而且对于全世界，皆可算着一种劳绩。

十一月二十五日之日记

（今日为）星期日及死者纪念日。余在城中第一步兵旅处，参与祈祷之礼。其中大部分参与人士，一直留到晚间圣餐之时。此间情势本来令人易发深省，但据余所见，可惜成效甚少。其最大原因，当然系此间行军方法，最易使人变成野蛮之性，丧失同情之心。对于所有权之观念，亦复不甚明晰。其在德军方面，我很希望将来，总以少参加此种征伐异教民族之战争为佳。军中谴责与重罚之事，常常有之。但在他方面，我们亦不应忘去，我们兵士所处环境之难。彼等日视其他各国军队，公然出卖抢劫所得之物，以及无数华人对于本国同胞，尤其是无人留守之房屋，加以抢劫，并出售其赃物。当其我们步兵大队出征保定，离去营舍之时，因该队营舍之面积甚大、防守较疏之故，竟被华人所抢掠。

现在可以引为欣慰之现象者，即华人常赴北京请求保护，因各处拳民渐已化为盗贼队伍故也。因此曾派小队前往围攻各该地方，其结局常将犯罪之人加以枪毙。由此而死之人，究有若干，实永远不能调查。至于华人方面，对于此种处决死刑之事，很少印象。此地人士盖已养成习惯，对于一条人命，不甚加以重视。中国行刑之时，大概多在城中很窄的地方，亦不举行何种仪式；常有许多本地居民前往观看行刑，而其他偶经其

侧之人，更复泰然来往，（不以为奇）。我们所最不能了解者，即素称怯懦之华人，而能如此安然就死，无动于怀。在此无数处死华人之中，余尚未听见一人曾经略为表现一点恐惧或动情之痕迹。

十一月二十八日之报告

前此曾经简短电奏陛下之与俄协商，移交杨村、山关铁路及撤兵直隶两事，余现在可以再为续奏如下：（俄国）Kuropatkin 将军曾经向余指定正月一日为“俄国式”之最后期限，但彼亦曾宣言，如余希望早日移交，彼亦愿意照办。（俄国）上校 Engalitschew 侯爵，曾密告余曰：关于此事，在圣彼得堡方面，意见极为纷歧，直至最后，Kuropatkin 将军之主张，乃得贯彻。彼之主张系从下列论点出发：即中国长城应作为俄国势力之南界，至于直隶则宜委诸其余列强。Engalitschew 侯爵更补言曰，依照彼（指该侯爵自己）之意见，俄国自占领满洲以后，业已十分满意，其余将悉听列国各自取偿所失云云。余相信上述意见，当与事实相符。余亦相信（俄国公使）Giers 先生与李鸿章之间，业已成立一种坚定条约。彼两人之亲密来往，不仅惹余个人特别注目，即法国公使 Pichon 亦尝向余言曰，彼（指法使本人）甚相信，所有外交团内部之协议情形，李鸿章盖无不立即闻知云云。（按，瓦氏曾有一文，记述十一月三十日与 Engalitschew 上校之谈话，其中有云：俄人日与李氏来往，余相信彼辈〔指俄人而言〕曾经暗助华人迁延和议之事，以使我们及英国受损。此间俄国代表 Giers 与 Uchtomski，真是两个怪物。）在此种英国仇俄最甚之际，而且余又备见双方向余互讼日益激烈之情形，今欲避免严重冲突起见，先将该项铁路直接由余亲自接管，以后再行转交英国管理。

中国皇室预备言和之迹象，近来愈益昭著，正如今日余上陛下电奏之中所云。现在华人方面，业已确信，不但我们军队决定在此过冬，而且我们武力亦已远及京外各地。据现在业经证明者，当我们进兵张家口之时，曾有中国军队八千人至一万人，飞向山西境内奔逃。此事颇使华人方面得着深刻印象。更加以保定府之占领，法国军队前锋，一直驱至该城南面五十基罗米突左右之远（译者按，约合中国一百里），愈使印象益深。

至于占领皇陵之举，余实未曾参预。因余以为此种举动，恐有伤居民宗教情感之危故也。但现在余乃察知此种顾虑，完全错误。盖中国本朝陵墓，分为东西两处。所谓东陵者，约在北京西北一百基罗米突之遥；所谓西陵者，系在北京西南一百基罗米突遥远

之冀州[①]地方。历代皇灵，或葬东陵，或葬西陵，大抵轮流为之。所有陵地，皆在风景幽秀之处，场面极为辽阔，当作圣地看待。倘若皇陵一旦被侮，则该朝皇室势将无颜以见人民，威信从此丧失。自法国军队占领该处以来，诚然似乎不免发生一些法外行动，但对于陵墓却未损及；现在竟因此引起中国皇室之无限忧虑，盖深恐其陵墓之一旦被人毁损也。此外，最使其特别恐惧者，即因此不能照常视墓祭墓，以敬先人（若欲了解此事，当然必须先知崇拜祖先习俗之意义方可）。因此之故，此项占领之举，竟能逼使中国皇室方面，不得不偏向屈服一途，此实为此间熟悉中国情形之人，所同声承认者也。

十一月二十九日之日记

昨日得着一个甚可悲痛之结局。Yorck伯爵竟以忽中煤毒而亡。此种迅速逝世，颇使我们全体顿受深重激刺，我个人尤为特别感动，全军由此丧失一位良好多能之军官。

今日余带多数随从乘马而出，以访余到现在尚未游过之祖庙。三个大殿之中，均无佛像，乃系专用以崇敬先人者。余等行入神圣屋子之中，此处当从来未为欧人足迹所辱，或者除了皇室人员以外，只有少数华人曾经到此。几个龌龊守庙之人，屈于威力，初甚惊愕，继而乃将门户开启。每个大殿之中，皆设有壁龛，以位全体亲属；其陈列次序，系以尊卑为准。在壁龛之中，置有美丽匣子，以藏族谱家史。在壁龛之前，置有椅子，并配以刺绣甚美之丝质坐垫。当其致祭之时，则虔想已故祖先，似乎坐在椅上一样；因此间人士皆相信死者灵魂故也。此种崇拜祖先祀典，为一切华人所奉行，实有一种极美之思想，为其基础；由此以使民族团结，并用以补充该国仅仅限于伦理学说之宗教思想。倘若吾人一旦理解此种崇拜祖先之俗尚，则对于许多中国事情，皆可从此领悟。譬如生儿众多之夫妇，常是一种幸福，因父母此后常受多人之崇敬，虽至死后，亦复如此。端王斩首一事，恐难办到，盖因斩首是一种不名誉之死，而该王之子又有继位天子之望，彼将因不能崇敬纪念其父之故，而丧失天子之资格矣。中国现刻皇上是一位极为可怜之人，毫无一点势力，因彼未有儿子，永无享受后裔崇敬之日故也。

---

① 冀州：古“九州”之一，指今山西和陕西间黄河以东、河南和山西间黄河以北及山东西北、河北东南部地区。

十一月三十日之日记

余欲增广智识起见，余特乘马往访总理衙门[1]；换言之，即中国外交部是也。自俄军撤出北京以后，由德国卫兵守护，其实无非保护一座完全打毁之破烂房子而已。俄军前此曾将其痛抢一次。该衙门正与其他各大衙门情形相同，建在一条狭窄污秽横街之上，系由多数房子聚成，各房皆只有一层，而且往往互相交错成为角形，其外则绕以墙垣。余略一过眼，即已看够；当余复离此种残碎污秽之混乱地方以后，乃不胜庆幸（脱离地狱）。此处昔日曾经作过帝国外交部之衙门，若非居留北京四个星期以后，万不能令人了解者也。由使馆区域直至该处之大街，现名为克林德街，盖因卑怯之暗杀事情，系在此街所为故也。

十二月四日之报告

当余到京未久，即已使余目光注及中国国有天文台。因法国使馆人员曾访余之参谋长，并请其代为禀余，允准该使馆将天文台之几种仪器，运往法国。此项体积甚大，古铜所制之仪器（天球之直径为两个米突，以及四分仪、六分仪等等），系第十七世纪末叶，康熙在位时代，由荷兰牧师 Verbiest 所制设。此项仪器立在东面城墙之上，露天之下，已有二百余年。在科学上固已无甚价值，而在美术上则具有极大价值。因承载此项仪器之伟壮龙架，其雕刻工夫极为完美故也。又法国方面谓该项仪器之一部分，系在法国制成，或者系由路易十四赠送中国。如果此说不虚，则亦只限于该项仪器中之某一种，其形式及制法显与其他各种不同者。对于法国使馆此种请求尚未回答以前，在十一月初间，法国师长 Voyron 将军，又复递来一函，要求允其运去此项天文台仪器。余对此事之定夺，系以下列数点为前提。第一，此种仪器确系中国国有之物；其次，此种仪器系存在德军所占市区之内，依照此间通行习惯，应作德军战时捕获品看待；最后，预料将来德军提出战事赔款数目之时，其势恐难全部得偿，因此该项仪器，至少可以当作

---

[1] 总理衙门：全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清政府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兼管通商、海关、海防、订购军火、主办同文馆和派遣留学生等事务，并管辖三口通商大臣（后改称北洋通商大臣）和五口通商大臣（后改称南洋通商大臣）。1861 年 1 月由咸丰帝批准成立。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改为外务部。

赔款之一小部分代价看待。由上述种种原因之故，余遂以为如果运取此项仪器之举成为事实，则德军当首先有此权利。但余在他方面，又以为对于法国方面之希望，只要可以实行者，亦不妨让步承认。因此，余遂决定该项仪器，一部分归于德国，一部分归于法国。至于分配之事，系由余之参谋长与法国军官 Marchand 中尉，会商而行。对于法国方面，首将其中一件（或者）来自法国毫无美术价值之仪器归之。但该中尉对于该件却自愿放弃不要，而在德国方面则亦早允将该件留置北京，决不携去。此外，天球仪器一件，系为德国方面保有。其余仪器八件之分配，则对于法国方面希望，多所迁就。（按，瓦氏十二月七日之日记，有云：所有我们亲爱联军朋友们，业将一切抢来之美术财宝物品，送回〔本国〕家中而去，其中许多物品乃系属于私人产业。）

此外，尚有一件不甚重要之事，即昨晚美国将军 Chaffee 曾提出下列一种形式内容，均不合式之抗议，此事现在似已了结。

“曾闻各项天文仪器正将从天文台中取去，余之参谋处军官一人昨日曾往该处，归后乃将此项消息证实。余今忝叨荣幸，得以奉告阁下者，即敝国政府对于本国军官中，如有意图实行此类抢劫之事者，皆将加以严劾。又敝国政府更将惋惜不忍闻者，昔尝共事救助北京被困公使之某一国，今乃明认或默许部下军队，损害或取去天文台中之某项仪器或其他部分。余以参加八月十四日营救使馆四队司令之一的资格，兹特对此事件，向君敬谨抗议，并将此事，禀达敝国政府。”

余立刻将此公函，并附以下列回信，璧还。

“余忝叨荣幸，得以恭谨奉告阁下者，即今日来函所述天文台仪器一事，无论其外形与内容，皆使余不胜惊异。余对于此类宣言，殊不敢接受，因此谨将原函送还阁下。不胜恭敬之至。”

余在此处，更有一事不能忘奏者，即昨日午后吾德公使亦复来函，述及中国将军荫昌因受庆亲王之命，特来请求设法撤消此项搬走仪器之议。

十二月八日之日记（按，此日日记因与上段报告内容有关，故原书提前附印于此）

前答 Chaffee 一信之效果如何，余殊悬念不置。直至昨日，彼始寄来一函，对于此次误解，表示惋惜之意。并询余是否准彼今日十一点钟来谒，以便当面表示惋惜。余乃立刻答之曰，余对于此次事件，盖已认为完全了结，无复介怀。并请彼于十一点钟之

时，不要劳驾，请改在一钟之时，前来余处早餐云云。彼于是立即赞成。其后彼在余处坐谈两钟。吾二人分手之时，有如好友一般。余对此当然十分欣慰。究竟此次事件，是否将引起政治上之影响，余尚不能预察。余所知者，美国人于外交方面之来往，每有粗率无礼之行动。最近数年以来，如 Samoa 与 Manila 两次事件，我们亦常身受经验。一直到今日，余总算是胜利者，究竟柏林方面是否较余此处更要恐惧美国一点，不久当可证明。余并承认 Chaffee 此次了结此事之行动，全系一种“君子人也”（Gentleman）之态度。

十二月五日之日记

李鸿章命人告余，彼对于和议条件，业已略为研究，倘若将来该项条件正式咨送彼处，彼希望和议于四星期之内，可以告成。余因两月以来常与华人来往之经验，对此颇为怀疑。盖实际上每与所说完全相异。而且现在一般人之推测或者不错，彼等谓中国尚无丝毫诚意议和，现在只是故意拖延我们，以待除了俄国之外，其他各国亦复渐渐脱离共同行动，譬如美国以及日本，即有此种趋势者也。

十二月六日之日记

余往访（法国）Voyron 将军之后，又往访（英国）Gaselee 将军，以及彼之参谋长 Barrow 将军，彼等驻在一个未经破坏之衙门内，安排布置甚善。Gaselee 是一位极为和悦之人，其余大部分英国军官，曾与吾辈往还者，亦莫不温和可爱。与吾辈往还之英国人，大半皆曾服务于印度。吾辈与彼等交际较为亲密，实已毫无疑义；但此乃当然之事，无足异者。

十二月七日之日记

余闻俄、美两国报纸，曾经将余攻击，谓余对待华人未免过于强硬，因此致使和议拖延云云。此种言论无非表示彼等心中恶意，以及昧于情势两者而已。假如当初余未到

此，则今日北京三哩之外，恐尚不免敌人军队围成半圆之形，而中国人方大笑吾辈不已。只因特别强硬毫无顾忌以对待彼等之故，乃得使其就范。（按，瓦氏十二月五日之日记，亦云：余只寻得法国方面之赞助，彼等〔指法国人〕常照余意旨，对待华人，特别强硬。）

关于要求中国赔偿之数目，系由列国先行提出一种各自要求之额。但由此积成之总额，却非常巨大。据所谓“中国通”者流之推测，中国方面实无能力支付此项巨款云云。现金支付之举，当然万无其事。实际上只能抵押关税及赋税两种着手。但此处却有一个问题，即假如中国不支付，又将如何？其答案则为列强宜各自设法取偿所失，分占中国一地云云。此种答案未免过于容易。盖俄国方面固愿为此，因彼既将满洲明白据为己有，而同时又深知一旦实行瓜分，列强之间必将立即发生不可解决之利益相反问题。在我们方面，唯一之道当然是占领烟台以及一部分山东，但余殊不敢料日本方面对此竟能安然坐视。假如英国方面虽有威海卫之关系，而对于吾人行动，仍不加以干涉者，亦无非希望我们在扬子江流域，全让英国自由行动，以为交换条件耳。但此事我们却不愿为。因为我们在扬子江流域，具有重大商业，而且我们彼处商业之繁盛，业已远超英国之上。（但此语瓦氏后来曾自行更正，认为当时观察错误。）法国方面，则欲从（安南）东京方面，以扩张其势力，但在该处又将与英国互相冲突。日本方面意在占领厦门，但其余列强，又复不愿坐视日本为此。美国方面似乎希望大家皆不要占领中国。在此情形之下，究竟有谁能解此种纠纷？关于山东之价值，论者意见极为纷纭。有谓山东为膏腴之地，并富有易于开采之矿物云云。而反对方面，则又谓此种论调，一部分全系谎语，一部分则言过其实云云。余之意见，则以为无论山东贫富与否，我们可以置诸不论，宜以青岛、胶州为满足，（不必再行妄求）。我们于此得着一个煤炭站口与优良军港，皆为我们所最希望者。只图占领土地，将使我们发生无数困难，财政为之破产。倘将来中国恢复元气之后，我们实无能力独向中国开战。

十二月七日之报告

余相信联军大队人马发现于山之彼方，直入外国军队足迹至今尚未到过之地，更加以各种惩罚之举，颇使居民得着深永印象。此外，联军在直隶西北部分，亦已将中国官军逐尽。因此之故，余认为进兵张家口一事，实有极大效果。只是支队第一军事长官伯爵 Yorck 上校之死，致使此次效果，留一可痛之黑痕。

现在严冬已临，预计将有若干星期之久，始能过去。又因直隶方面似已将中国军队

逐尽，以及拳党纷扰之事亦已逐渐减少，所以余在最近期间，当不再为大规模之作战。但余欲保持军队常常活动之力，以及欲向中国居民继续表示驻有外军在此起见，将随时派遣小批军队出发。现在联军行动至是既已告一小小段落，则余对于德国远征队之情形，实不应遗漏不报。兹特恭奏如下：

所有全军盖无不兼程并进，曾历许多新而且难之境遇，而驻宿及气候之诸多不便情形，尚未计算在内。彼辈处此，颇能胜任裕如。从最老军官以至最幼兵卒，皆只有一个希望一直贯彻精神焕发之全部军队，即速赴前敌作战以尽其职而已。关于军纪一事，直可称为至佳。但其中余有认为不能避免者，即我们在此一部分暴动纷扰之国中行军，更加以联军各国兵卒所示与吾国兵卒之恶劣模范，于是竟将我们素来对于人道以及所有权之观念，不免引入艰难试验之中。余决定严厉整饬军纪，以保德国军队令名，甚望陛下对此放心。

十二月九日之笔记（按，此文不属于“日记”之中，系瓦氏另外特别记述者）

和议之事，至今犹未动手，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此间外交界已商议了许多礼拜，常须征询本国方面之意见。听来听去，永远都是这句老话：不久当可开始。其后忽有一国发生一点疑虑，或者某国之回答犹未接到，譬如英国方面近来即是如此。究竟为何如此？此地殊不明了。但其间却有一些迹象可以察出者，即我们与英国之间，必有一种龃龉发生。据余推测，其原因当与前此数次情形相同，即柏林方面未能适当进行，只是盲目摸来摸去。

因我们曾与俄国龃龉之故，大家遂以为我们可与英国协调，其实乃是万无之事。彼此互相怀疑之心，未尝一刻稍衰，其主要关系当然是在扬子江流域。（译者按，原书之上发行者曾加有小注，谓瓦氏当时对于十月十六日所结之“扬子江条约”，似尚无所知。）英国以扬子江为彼之势力范围，并欲在该处坚筑基础。在我们方面，当然是很希望其他列强均不承认英国有此特权。扬子江为中国中部最要之水道，对于所有列强，皆应门户开放。此种互相怀疑之心，使余尤为明白感觉者，即一方面我们时常在意侦察英国战舰与军队在该处之一切行动；而他方面英国每在上海看见我们船只太多，则又往往深滋不悦。至于我们与英国之间，或可维持永久友谊一事，余固始终未尝信，及现在更使余之此项意见愈益加坚。余宁肯偏向与俄亲善一途，在德、俄国元首个人之间，尽管

有所隔阂，而我们之政策，却不妨与俄国政策相辅而行。反之，我们与英国之间，因我们所抱世界政策之故，彼此时常发生冲突机会，说得切实一点，我们与英国乃系一对天然之仇敌，而且势将永远如此下法。其实世界之大，本足供给我们两国各自发展，互不相碍。无奈英国之贪欲，却时常超过令人可以容许之界限。

皇上对于此次中国事件之经过情形，势将十分不悦。赎罪之举，至今尚未履行；重要祸魁，至今未处死刑。其他列强，至少有一大部分，皆主张提出赔款，不要过多。但是皇上之意，却不仅在赔偿战费一事，而欲除此之外，还须另得一笔大宗款项。就余观察而论，若欲从外交界方面以达此愿，似乎万无其事。

其间最令人悲叹者，即各国与华人周旋，何等温柔软弱。各国对于所有残忍屠杀教徒牧师，直至最近犹复发现于山、陕境内之事，所有打毁各处教堂及牧师宅所之事，所有侮辱坟墓之事，所有自古未闻围攻使馆两月之事，均已似乎忘去。倘若皇上对此深为苦恼，余实不能加以非难。

俄国对外政策，就大体上而论，本有固定轨道，以赴一定目的；惟在中国方面，则其政策殊动摇不定。其原因当系由于（俄国两位大臣）Witte 及 Kuropatkin 意见纷歧之故。最初，俄国方面声称，天津、山海关间之铁路，无论如何必须占领云云。因而俄、英两国之严重冲突，其势不能避免。而现在俄国方面，又忽然将此问题打消，并明白宣言，彼对于直隶方面，兴趣殊少云云。俄国之所希望者，系邻接一个衰弱中国，尝受俄国势力支配。因此，俄国亦复甚望中国皇室速返北京，以立于满洲主人（系指俄国而言）势力之下。但以如此地广人众之中国，又安容忍仅距京都一百五十基罗米突之遥，即与强敌境界相接？于是俄国之政策，所能达到者，只使华人取消北京之首都资格，另建国都于中国内地，以便中国政府避免俄国势力之压迫。其结果，俄国将从此获得一个——假如中国能够恢复元气，一如余所相信者——很可注意之敌人。

十二月十日之笔记

假如余在昨日曾经发生一种感觉，似乎我们与英国方面，近来不甚相洽，则现在此项感觉，更是愈趋强显。Mumm 先生（按，此人系德国驻京公使），亦正与余之观察相同。余初以为仅是（英国）将军方面，发生一种变调而已，现在乃知 Mumm 与其同事 Satow（按，此人系驻京英使），亦正复如此。此外，今日余更从（俄国上校）Engalitschew 方面闻知，现在（英国）海军提督 Seymour，正与南京、武昌督抚会商，并以金钱接济该两督抚。该两督抚对于英国方面，当然从此特别亲近，而与我们则将愈为

疏远。

十二月十二日之报告

余曾在十一月二十一日之报告中，恭奏陛上，余将努力组织一种“统一的中央机关”于北京，以使该城之行政管理，较为划一有序。盖该城各区为各国军队所分驻，至今犹系各该军队司令，依照自己原则，分别独立管理故也。现在余已获得（美国）将军 Chaffee 同意，而（法国）将军 Voyron 则至今对此，犹复不愿放弃其独立资格。因此，自本月十日起，除开法国区域之外，对于北京全城，特组成一种“管理北京委员会”，其职责系包含一切公安秩序、军队营养、居民粮食、卫生事项、财政税务等等问题。其组织系由各国军队司令所派之委员，集合而成，而以余之参谋员陆军少将 Gayl 男爵，为其主席。余意法国区域之除外，虽使此项新组机关，不免发生困难与减少效果，但余却相信其余都中各区之安宁秩序，不久当可得着显然成绩。（按，瓦氏十二月十一日之日记有云：各国军队司令之为人，皆颇通达，倘使彼辈不受政治方面之影响，则彼此甚为容易接洽。）

十二月十二日之日记

（德使）Mumm 告余，和议开始之期限，现尚不能预察。该使之意，以为英国故意故意拖延，以使俄国大怒。大凡每次协议之中，（俄使）Giers 与（英使）Satow 两人意见，总是十分互相背驰。至于余之观察，则以为此中实缺乏一位具有魄力之人，以为指导。因此，我们殊不必引以为奇，假如华人对其仇敌，不胜取笑作乐之至。

十二月十七日之日记

李鸿章现在称病假，假如此事果确，则余将不胜愁闷，因和议之事，又将由此展期故也。但余却疑彼系故意假病，盖余近来颇疑彼实有心欺弄我们，彼只是做出那种非常恭敬而且友谊的样子而已。

李氏称病之消息，余系得自（俄国上校）Engalitschew。今日该上校复向余将英国人之罪恶，长篇讲演一次。彼谓英国尝暗中与李鸿章交涉云云。换言之，彼所言者，正与其他各国诽谤俄人之语相同。此外，著名大斯拉夫主义[①]者俄国侯爵 Uchtomski（据说系俄皇之友），到此已有若干时日。彼虽寓居使馆之内，但举动却极谨慎，此间外交界对彼，颇有诡异莫测之感。

十二月十八日之日记

只因英国方面过于精细缓慢之故，每每解释一字，不惜虚耗时日，以致直到今日，犹不能与华人开始议和。美国驻京公使 Conger，为人甚属明达，彼来谒余，并对于现在此种缓慢进行，极为不满。彼相信现在可与中国从速议结和约，以便气候一旦宜于退兵之时，立即撤出北京，于是北京方面又得成立一个正式政府。

今日余接得一种通知，使余颇为惊讶，云有一位荷兰少校来，作余之军事随员，听候差遣。此真令余深费思索，究竟彼应担任何种职务。

昨夜所到之邮信，共有三批。因此余在一时之间，忽然接得四十封信、二十一张风景明信片，以及各项到期报纸。各种邮片现尚不断的由德国各地寄来，其中含意均甚好，只可惜大部分皆望余作答。余从报上得知，余于十月中旬，曾在北京病倒。此项消息系由一位英国访员恶意为之。因彼曾到天津余寓，被逐而去。此类人惯酿不幸之事，其结果使余亲属大担其忧，不免电报往还，并使余不得不感谢德国方面关心人士，寄余治痢药品或告余治痢方法。

余每晨常于七钟即起，夜间则决不迟过十一钟上床。因余每日须听余之参谋长报告两次，须写许多回信；此外，骑马乘车游行及早晚两次用餐，均需若干时间，所以诵读工夫不多。幸而余尚得免各项报纸来扰。关于新闻方面，余读 Wedekind 通信，实已十分满足。

---

① 大斯拉夫主义：即泛斯拉夫主义。鼓吹以俄罗斯为中心奴役斯拉夫各族的思潮。19 世纪时，沙皇尼古拉一世把自己扮成斯拉夫族的解放者，打着泛斯拉夫主义的招牌，四处侵略，梦想建立一个由俄国统治的，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里亚海到北冰洋的“斯拉夫帝国”。这些主张符合俄国统治者的利益和需要，成为沙皇政府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武器，因而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都以各种方式支持泛斯拉夫主义及其运动，将其作为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

十二月十九日之日记

北京城在各种旅行笔记中，常认为世界上第一污秽之城市，可谓一点不错。所幸者余居宏壮冬宫之中，并有游行宽道围绕荷池，得免污秽之苦。只有余到本城街上，然后始觉污秽之说，并非虚语。但余前往街上之事，却不常有。北京街上之污浊，真是令人可怕，城中并无公家清道夫之设，所有一切残物皆随意抛在街头，以听犬鸟前来为之扫除。因此，城中常有大批全野或半野之野狗，饱尝人肉，因为围攻时代所积之死尸，约有十四日以上之久，未曾搬运掩埋故也。野狗之外，助以乌鸦，每于傍晚之时，但见万鸦聚集，飞坠禁城屋顶。此外，尚有许多喜鹊与猛禽，此项猛禽因其有益之故，所以不加射杀。因此，华人所爱之鸽子身上，皆系有小铃（报警），鸽子群飞则奏出一种非常新奇之音乐。此间猫不甚多。高贵人家则以饲养小犬为风尚，尤以特别娇小，可于妇女袖中藏之者，为最上。又此地大马不多，只有一类小马，但很适用，很肥阔。至于拖载之事，则多利用骡子、驴子为之。此外，两峰高耸之路驼，用作运输畜牲，尤为常见之事，每日皆可在途遇见大批结队而行。更有一种东洋车，系由一个苦力拖拉，以为运输之具，每行一点钟，其车价大约三十到四十非里徐（约合华币一角半到二角）。

十二月二十一日之日记

余对于外交团意见已归一致之乐观，未免太早，因余顷闻美国公使于昨日犹提出一种异议故也。从前各国业已公同议定，所提各项和约条件，均系“不能加以更改”Irrevocable；而美国方面，乃于最后一点钟之时，复觉得此语，未免过于强硬。现在又将为此琐事，以使时光之虚度。

十二月二十二日之报告

皇上陛下，承赐临时帅笏，实使余不胜幸福之至。此项帅笏已于今日到此。余对此美丽颁赏，惟有敬将感谢之忱，置诸皇上足前而已。并望余能勉尽厥职，以使陛下满意。

此间之所以未曾发生巨大战事者，一方面系由华人有意避免战争；而他方面则由联军各国，除意、奥两国外，皆不愿再有其他攻取行为。当前此进兵保定之时，（英国）将军 Gaselee 曾在天津向余表示自愿参加之意，但此举业已不能取得英国公使之同意。此外，该公使对于进兵张家口一事，亦复不赞成。其结果 Gaselee 将军乃向余言，倘余再有其他进兵计划，彼将不复获得（英使）准其参加之允许矣。

至于法国军队，则自始即受有本国政府之命令，对于中国军队务宜随时设法避免冲突。因谨守此项命令之故，竟至法国军队与中国军队同居天津、保定路线之旁，却彼此相安无事。（法国）将军 Voyron 虽然否认此事，但事实具在，不可掩也。俄国军队则在余初抵直隶之时，即已开始撤退，所有沿向山海关铁路一带之各次小战，仅系一种防御性质而已。盖政治方面自始即替行军方面预设无限阻碍。

因此之故，余之军事行动，只能一方面限于肃清大部分直隶境内之中国军队，彼等亦复时常迅速撤退（不加抵抗），他方面则限于安辑占领区域内部而已。对于未曾发生巨烈战事一层，所有德国远征队中，从将军以至于兵卒，实比任何人均要懊丧一些。倘一旦队中某部适与华人交锋，则无论其为属于官军或拳党，无不严厉对待，此诚足使斯地永久不忘者。因此而死之华人，其数极为不少。所有全体德军皆为一种朝气所弥漫。余对于陛下之东亚远征队，实不能不称为具有超等能力，善于应付一切之军队。

十二月二十三日之日记

昨日深晚时候，余自城里复归宫中。如此明星满天之美，实为余生平未曾见过。当余穿过皇宫寂寞深院，以达荷池岸边之时，忽闻音乐之声；第一东亚步兵联队之乐队，正在瀛台之上（是即从前光绪皇帝幽囚之地）演奏“O du selige，O du fröhliche……”一曲（译者按，此系德国耶稣圣诞之歌）。余生平听此古曲，次数何等之多，相爱何等之深，今日在此异教大城之中，其声音一直响彻无数佛庙，使余得着一种最为深刻之印象。余乃静立不动，以至最后一音已经息响之时。

（德使）Mumm 先生今日以和议条件见示。该条件明日即将交与中国议和大臣。余觉该条件十分不备，重要问题如赔款总额之类，均未加以确定。如斯作品，竟需两月工夫之久，此真足以充分表现（联军各国）之一种散漫分裂情形也。大凡同盟联合，均带几分弱点，盖三人团结，已属困难，今乃更欲十人同在一帽之下，（安能办到）？华人方面固知之甚确，倘若彼等（指华人而言）即或坚持不让，而联军亦复不能超出直隶以外大用其兵。在事实上，联军各国（余想德国亦包含在内）亦真已领教够了，只愿快快结

局，愈早愈妙。

十二月二十六日之日记

余对于教会问题之研究，曾经不遗余力。据余所信，时人每将中国排外运动，归咎于教会方面，实属完全错误。中国排外运动之所以发生，乃系由于华人渐渐自觉，外来新文化实与中国国情不适之故。铁路建筑，将使全体职工阶级，谋生之道减少（我们于此，最易联想到昔时欧洲方面，亦曾流行之相类思想），更加以筑路之时，漠视坟墓，以致有伤居民信仰情感（瓦氏原注：在中国方面，巨大坟园一如我们公共墓地者，极为罕见。乃系无数单坟，散在田野。因修筑铁路地基之故，未曾常常加以重视）。此外，了解铁路有益于国之明白人士，为数甚少，因而建筑铁路，尤易引起不良反动。近年以来，瓜分中国之事，为世界各国报纸最喜讨论之题目，复使中国上流阶级之自尊情感，深受刺激。最后更以欧洲商人时常力谋损害华人以图自利，此种阅历又安能使华人永抱乐观？至于一二牧师，作事毫无忌惮，以及许多牧师为人不知自爱，此固吾人不必加以否认疑惑者。余以后尚将再为提及此事。此次中国仇外运动之所以对付牧师最为激烈者，实以牧师在一切外侨中，最易被人捉获。所有牧师大都结为小群，散居中国全部，换言之，实系毫无防御之力。反之，欧洲商人则只在少数通商口岸，如广东、上海、天津、烟台、牛庄之类，群居租界之中，常在列强保护之下，而且租界居民自身，亦皆常有自卫之设备。至于中国内地方面，只有少数欧洲商人，彼辈虽亦设有支店，但多为华人所忽视。即在北京城中，欧洲商人亦无居住之权。

对于教会方面，我们必须将天主旧教[①]与耶稣新教[②]分别而论。天主旧教在华之年代，远较耶稣新教为久，且有严密之组织，而以大多数最称灵敏之主教统率之。彼辈皆深晓联络官厅之道。至于华人方面，本已早经养成敬畏官厅之习，倘若一位主教深知取得官阶之道，则其所给印象，当然迥与一位贫穷孤立之新教牧师不同。此外，天主教会复恃金钱及组织之力，建设病院、孤儿院、育婴堂之类，更能特别表示其伟大力量。因为天主教徒在此工作，业已二百五十年，所以彼辈已具有数代信教之中国教徒，以及中国牧师；有时全村之中，俱为天主教徒所居；更使天主教会之基，得以坚固。至于耶稣

---

① 天主旧教：即天主教，是原始基督教会的直接延续和继承者，又称罗马公教，也就是普世大公教会。

② 耶稣新教：即基督新教，简称新教，中国民间称之为“耶稣教”，以区别于天主教和东正教。基督新教是于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而形成的新宗派。

新教牧师，则必须从国籍上加以分别讨论。德国牧师殊不占重要位置，除了胶州及其附近，略有若干德国牧师外，其余仅在广东省内，而且大部分皆在广州附近，从事活动而已。此外，更有 Basel（瑞士城名）教会，亦在该处活动。无论德国及 Basel 牧师，皆曾经过一番精择，对于彼等职务，亦皆经过良好训练，因而彼等到处皆常受人尊敬。彼等虽亦曾经遇着危难，但远不如其他各地之甚。关于英、美教会事业，余实不能详细批评。但余却深信，彼等因互不相容之故，常作相反行动，每于事实有损。盖我们对于中国人，实不能责以辨别，究竟谁个牧师所传，系属真理学说。复次，美国方面，常有一种巨大错误（是否一切教会皆系如此，余实未能深知），即所委任之牧师，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此辈常以服务教会为纯粹面包问题，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兼营并进。此所以牧师地位因而为之低降，并使教会仇敌得以从事鼓动。余个人即曾亲眼见过此类牧师，彼等常以商人资格前来战时医院及军队营舍之中售卖物件。此外，余更熟知许多牧师，兼作他项营业（譬如买卖土地投机事业），实与所任职务全不相称。但此只是一种例外。至于大多数牧师，却皆系令人尊敬、富于勇气、志愿牺牲之人，此实应该加以赞许褒奖者。彼辈之所以被人搜捕者，其原因由于牧师关系者实少，由于外人关系者实多也。中国人对于宗教一事，通常极能相容。前此对待基督教徒，固未尝使其稍感不安，亦正与对待国中到处皆有之回教徒情形相同也。其后基督教徒之所以被人搜捕追逐，乃系从仇外运动中所演化出来。现在许多牧师业已归来从事工作，余甚希望彼等继续工作，怀抱勇气，一如已往；盖必如此，然后牺牲者之血液，始不枉自流去也。

十二月二十七日之日记

现在最普通之印象，即北京市况于最近数星期以来，又复日趋繁盛。因重兵驻扎斯地之故，金融流通市面，极为活泼。大多数商店，业已重新开门。因为大家已经相信，所有各物不会再被他人抢去，一切均将照价付给。我们更复尽力设法，以使华人渐为了解清洁之义。所有街上秽物，均须搬出城外。街灯之设，亦已实行。此外，每个华人，若于八钟以后出外，必须携带灯笼一个。所有烟馆赌场，一律禁止。对于贫民，则特设汤厨二十处。并为彼等设置暖房若干，一如“柏林暖厅”办法。现在此间乞丐数目，比较前此太平时候减少。其原因系由于彼等所得劳金，甚为丰厚，盖多数苦力，常从军队方面，获得工作机会故也。

十二月二十八日之报告

北京城里，因与中国官厅协力维持秩序之故，甚为安静。而且居民信任之心，亦复与日俱增。在明达华人方面，甚至于屡屡表示，深以联军离去为忧。盖彼等（指明达华人而言）相信在此撤退时期之内，势将为本地盗匪所利用，大加抢劫，陷于混乱。

现在此间发生一些困难，即中国教徒此时自觉处于安全地位，于是开始求偿前此夏间所受之非法损害，并作种种报复之举，对于其他华人往往施以暴力。而受此暴力压迫者，又复力向联军方面呼救。在教徒方面，前此曾经饱受他人之虐害、劫掠、屠杀，不免仇愤满腔。虽亦尽管自有其理由，但彼辈若向他人横施暴行，则亦碍难容忍，盖恐由此又将再酿他日被人排斥之危也。现在许多前此逃亡之牧师，又已归来，从事旧日工作。在保定府方面，天主教徒不少。余曾闻知，所有天主教士及牧师，甚或其人身居德军占领区域之内，而遇事亦皆喜向保定法国军官呈诉；有时甚至于控告德国兵士之事，亦复呈请法国军官办理。因此，余乃下令规定，凡有此类控告案件，必须由原告直接呈诉（德国）陆军少将 Kettler，方能受理。又余相信，法国在此，意欲表示该国为异教国中及回教国中基督教徒之保护人。因此，余更向（法国）将军 Voyron 提出下列要求，即所有居住德军占领区内之中国天主教徒，皆由德军自行保护照料。

十二月三十日之日记

和议之事，现在毕竟开始进行。庆亲王及李鸿章业已发出宣言，谓中国皇帝对于提出之条件，在原则上，已经表示同意云云。余就全体问题观察，以为（因余深知现在各国皆亟欲早日议结和约）北京撤兵之事，不久当可协商一致。

当余对于和议前途稍为静思之时，立刻想到俄国方面（彼现在正将移交铁路与余，但数日以来，故意迟延，不将合同交余签字），现在必将设法，仍将铁路保有。俄国深知，余已决将该路转交英国管理，此实俄国方所最为不悦者。余曾与英国委员经过辛苦协商，已将一切议结，今若不能成为事实，则英国方面势非大为喧嚷不止，而且理由极为充足。俄国于此又复大显其欺诈手段一次。余之目标，固不在促进英、俄两国之和好，盖该两国永远根本相仇，实与我们有益故也。但余必须设法，妥为对付，以免其中

一国有所借口，谓余曾经袒护其他一国。至于余与其余各国，皆甚和好相洽。余处置一切，当然不能听任余性为之。凡事均须先思而后行。但余相信，余之地位尊严，决不因此小心顾虑而有损。倘余对于此间一切争执之事，未能妥为办理，则其结果，只足以有损吾皇政策，此固无论如何必须加以避免者。余在今日固犹系一个老兵本色，现在偶作外交客串之举，此实半年以前，余所未能想到者也。

一九〇一年正月一日之日记

余以健康之躯，开始度此新年，瞻望前途，无限希望。余所处地位，极为特别；究竟一切行事，是否适当，必须将来始能看出。余将沿照迄今所行之途，更向前往，对于一切批评，决以冷静处之。尚有一事使余稍稍满意者，即余离开柏林四个月以来，未使国内何人，一受咨询之扰，甚望能如此下去，以至终局。余生平行事，最少向人咨询，偶然咨询一次，而其结果并不常常有益。因此，余在一九〇一年，仍将利赖余之五官，独自寻途而进。

今日为英国卫戍军队之阅兵典礼。该项军队之大部分，系由印度兵士编成。印度习俗常以此日为皇后庆辰，举行祝贺。（英国）将军 Gaselee 乞余代表（英国）皇后之孙，前往举行阅兵大典，指挥英国国旗行礼，高呼皇后万岁。又是一番从古未有之事！此间真是令人阅历不少。在一位普鲁士元帅指挥之下，英、印军队大行其礼而且高呼 Hep Hep Hurrah 不已！余亦不敢忘却，敬向皇后感谢之举。阅兵典礼，经过极佳。其间军装样式与兵士肉色，实表出一种五光十色之象。盖只有在东洋国中，吾人始能看见。余所乘者，系一绝美之棕色马 Hosiwu。该马驰驱最善，使人不胜惊赏。

庆亲王及李鸿章现在均抱微恙，曾派遣大吏，持片前来余处（恭贺新年）。李氏居尝语其左右，谓彼与余，极为相洽。而且彼在实际上，亦尝对余之能持正义，致其感谢之意。在余对待华人往往必须应用严厉手段之后，犹能一闻此语，殊使余不胜欣喜之至。余尝闻华人极尚正义，由此可以证明。华人认为犯罪之后，继以处罚，实系当然之事。此事，今日午后又得一个极为可惊之证明。刺死克林德之凶手，现已执行死刑。自数月以来，此不幸之人（指该凶手而言），即尝自请早日执行。至于执行死刑之地，系在克使被刺之处。换言之，系在极为繁盛之街上。虽然如此，而好奇往视之人，却不甚多。距此不及五十步远之街头摊子，仍复照旧营业不歇，在彼饮食之人，殊不愿停放其杯箸。一位说书之人，继续演述荒唐故事不绝，其吸引号召多数听众之力，实远胜于执行死刑一事。

正月三日之日记

余曾与（德使）Mumm先生，对于中国所能支付之赔款数目一事，会谈甚久。各国公使之意，至多不得超过十五万万马克（约合华币七万万五千万元）。余则主张二十万万马克之数，尽可以榨出。而且余之见解，更可加上一重佐证者，即受余嘱咐曾到李宅（指李鸿章之宅而言）交际之人，曾向余言，该总督（亦指李鸿章而言）对于列强提出之赔款总额，本来预料当系此数（按即二十万万马克）。

余渐渐认识法国军官不少，其中颇有极为明达之人。大凡从前曾经参预（普、法）战争者，现在尚多忍气吞声，不免介怀。至于后起之辈，则较能从容思索，时常明白表示报仇之想，实系毫无意义。

现在关于铁路问题一事，势将立与俄国发生冲突。俄国方面只以种种约定相许，以为延宕之计。近因为时已迫（至迟〔正月〕十三日必须将该路移交与余），余曾致电（俄国）陆军大臣Kuropatkin，提及此事。后因经过三日尚无回信之故，余今日遂不得不再为明白催促。余对此事，必须顾全英国方面之利益，以免英国人疑余有意欲将此事冷淡下去。《泰晤士报》在此地置有一位坏蛋之访员，近来已经开始攻击联军总司令部中之英国代表（Grierson上校）不尽其职。此事当然只是驻京英使之一种煽动。至于北京、天津、山海关、牛庄及逾此以外之巨大铁路，乃是中华帝国国有产业，其中诚然参有英国资本，但为数不过四百万马克而已。此外，在该路管理局中，并置有若干英国工程师。无论俄国与英国，对于该路皆无丝毫权利之可言。但现在彼此均欲管理该路。其第一步系欲由此以谋在华损失之补偿，再其次则为坚筑该国直隶方面之强大势力范围，亦即彼等主要目的之所在。

正月五日之日记

余在午后日光明媚之下，经过一处市区，余未到此者，已有数星期之久。现在市况亦复十分繁盛。余曾经过数处赌场之旁。此项赌场之中，皆系从早至晚，公开赌博。赌博一事，似为华人主要嗜好，并由各种商店所采用。即使输赢范围极为微小，例如一块肉、一个饼，以及剃头、梳辫之代价等等，亦复用以赌博。因为信任之心及营业之况与

日俱进之故，现在街上妇女已较前为多；诚然只属于下等人家一流，至于上流妇女则向无步行街上之事，时常深闭轿中，令人抬之而行。我们若欲辨别（中国）妇女之族类，可以从脚上认之。汉族妇女系用人力强成之小脚，举步极为艰难；满族妇女则对于此项习俗，未尝模仿，彼等所穿者，系一种高底鞋子。其实，该两民族之人，其脚皆不甚大，所以此地鞋匠倘若受人委托制造大靴，一如吾人通常所用者，则其势必将束手无策，不知如何着手。自满洲政府当道以来，曾迫令华人一律拖带毛辫，但对于汉族妇女之怪状小脚，虽尝严加排斥，亦复未能革除。毛辫为男子之标识，而女子则系以发缠头。男女衣服之形式，差不多完全相同，其所异者不过女子之袖宽，男子之袖窄一点而已。此外，又因妇女亦复抽吸烟管，恰与男子相同之故，所以我们每遇彼等亲族聚坐，妇女小脚未尝露出之时，极难迅速分辨彼等性别。在满洲男子方面，胡子问题亦有一点关系。大凡男子必须生儿以后，始准留一小须；抱孙以后，始准留成满须。

正月六日之报告

因为德、法两国军队，在北京、天津、保定以及各处兵站共同生活之故，所有两军青年军人，彼此来往交际，极为坦白自然，一如余在昔日报告中曾经提及者。在法国军官中，一直上至参谋人员，屡次表示报仇之念，实已早成过去思想。就余个人观察而论，彼等所言实与事实相符。余相信在法国军官之中，只是一部分从前曾经参过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之战争[①]者，尤其是曾经作过俘虏者，对于怨恨之念，尚未能加以克制。余固深知法国方面之报仇思想，最易一点即燃。凡欲与德亲善之法国政府，盖无不为其敌党所推到。若遇特别政治情形之时，实无一个法国政府，足以压服国内报仇之呼声。话虽如此，但余却相信，转机之时间，当可渐渐接近。与余来往之各位法国参谋军官中，曾因 Faschoda 一役著名之法国中尉 Marchand，亦复在其内。彼等尝公然向余表示，自认为亲德派中之人，对于我们军事设备，尤为赞叹不已。该中尉曾屡对余言，此间法国将校团对于余待法国军队之友谊及细心，均甚为欣慰。余并相信，此地（法国）公使 Pichon 先生，实系一位对于报仇思想甚为厌恶之人；而且彼因在此地尝与俄人接触之故，业已变成一位仇俄之人。

① 1870—1871 年战争：即普法战争。

正月六日之日记

我们与山东、南京、武昌三位督抚，不在交战状态之中。此三位先生颇能于（中国）皇帝及联军之间，设法应付，极为机敏，形成双方以外之（第三）势力，使人必须加以顾虑尊重。由此而产出一种极为奇特之现象。联军舰队大本营，自夏间以来，即已靠泊扬子江口，并与驻有重兵之吴淞要塞，甚为接近，可以直从海上明白望见垒上大炮，以及后面操练之军队，而且双方时常皆在准备交战之状态中。虽然如此，而各位海军提督仍与（该省）总督往来拜访。在山东方面，则该省巡抚现正力促铁路工程之进行，妥为保护该省教会，做出一种我们第一好友的样子，并曾向余拍了一个“敬祝新年”happy new year的电报。至于扬子江流域方面，其情形本可愈趋简单，倘联军各国之间，若不彼此互相猜视。盖英国欲将该地划作英国独有势力范围，而其他各国（除俄国为例外，因彼之视线，比较集中于北方一带）则不愿英国独具此种优势。因而各循英国之例，在沪派兵登陆，所以现在该处驻有日本、法国、德国支队。余对于增派德军之举（两个中队），认为必要。而且余曾迫切呈请（当局），现在勿将吾国主力所在之铁甲舰队召还，盖因柏林某方面曾有此项召还之倾向故也。两次希图召还之议，皆为余所驳回。

正月十日之日记

今日余曾与俄人辩论良久，对于此中真相，乃得明白一二。彼等欲从直隶撤退，仅留两个步兵大队、三个哥萨克队以及一个炮队而已。其实，彼等若愿全体撤去，尤为余所馨香祷祝。在天津方面，俄国只欲留驻一个中队，但彼却将许多宏大建筑物，如东武库及大学堂之类，每处可以容纳几个大队之众者，独自占有。此事将来尚不免发生问题。至于铁路移交事件，则北京、柏林、伦敦之间，电报往还不绝，但至今尚未有所决定，令余极感不乐。

正月十日德皇来电

现在英国使馆方面，曾向余反对阁下与俄所订之铁路条约。盖英国以此约实有危害该国私人权利之虞故也。尚望阁下在英国正式提出抗议并吾人对其主张详加考究以前，幸勿签字该约。此外，余以为处此令人不快之英、俄争论中，德国方面之责任，当可切实卸去。倘若阁下能照日本、英国、美国十月六日之提议（按，即阁下前此在二〇八一号之报告中，所曾述及者），从速召集各国司令共同讨论。至于讨论之问题，当为“最有效力之方法，以使（军事行动所需）之铁路，从速开始全部工作，并力谋其安全”。经过第一次会议之后，为再行减轻我们责任计，阁下最好另以年纪最老之他国司令一人，代主其席。至于德军方面，则由参谋长代表与会。关于法律问题一事，阁下暂时不必直接提出讨论。但此事终当自会牵入讨论之中。我们所持论点应为：侵害私人权利，只以军事行动无法避免者为限，而且对于此项被害之私人权利，应该许以合法赔偿。同样，所有铁路用品之取留等等，自当在讨论铁路工作能力之时及之。请将前此所拟条约内容电余。

威　廉

正月十二日之报告

皇上陛下，余现有不敢遗忘恭奏者，即余觉得美国、日本两国对于德国果然实行占领烟台一事，恐将采取一种不甚友谊之态度。而日本方面更将立刻派兵在该处登陆以答之。（德国）公使 Mumm 观察美国所得之印象，亦正与余相同。又现在发展德国山东势力一事，实际上固无即行占领烟台之必要。而况起自青岛之铁路建筑，既日有进步，则烟台之商港资格，更将丧失其重要关系矣。余并相信此种局势既成之后，则列强对于烟台或将渐渐冷淡下去，不复重视，而德国便可从此不劳而获烟台。余以为扩充德国山东方面之势力范围，以及推广德国胶州方面之占有地带，实比夺取烟台为容易办到，而且远不如夺取烟台之引人注目也。在现刻情形之下，万不可少之铁路保护一事（此事将用全力为之），正授吾人以柄。余对此事，早有从护路大队中，抽派一个中队前往青岛之意。但因直隶方面亦复需用该队之故，所以迄今未能实行。一俟北京、山海关铁路管理

事宜从新）整理之后，余将立刻对此问题加以研究进行。假如和议之事果能顺利办到，三月初旬开始撤退北京，则我们立刻便有五千人至六千人之众，以应青岛方面之用，并可利用远征队之青岛兵房以为驻扎所在。我们此种行为，无论任何一国，不能加以抗议。但对于山东巡抚，却能使其得一深刻印象，对于中国政府，亦可使其稍得几分警觉。袁世凯先生系属于明达督抚一流，彼现在竭力促进从速议结和约。据云，彼之为人“易受商量”。因彼曾经力为辅助德国铁路、矿山事业之故，可以称为一位促进德国事业之人。余以为如能暗中派遣一个外交代表，前往彼处，实极有益。

正月十六日之日记

一般人尝以下列各事，认为华人特性——爱说谎，喜偷窃，对于污秽与怯懦毫无所感。余对于华人爱说谎一层完全承认，对于喜偷窃一层亦复承认，但以苦力为限。至于污秽一层，则并非极为普遍之事。我们军队曾见过许多乡村，据云，其洁静之程度，并不下于德国、法国，至若波兰、俄国、匈牙利，则简直不能相提并论。即在北京方面，余近来亦渐渐发现许多极为清洁之房子。大多数华人在实际上确是怯懦。数百年以来，该国未尝发生巨大战事，亦无外敌压迫之患。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之短期战事，以及最后中、日一役，其战地只限于一部分地方，而大多数华人亦复从不知有此事。因此之故，所有尚武精神，渐渐丧失，而兵士地位，亦极为普通所贱视。现在确实没有一点尚武精神，以致国家衰弱。彼等为人，不喜反抗，所以易于治理。大凡一位官吏必须对于人民业已十分苛酷搜括不堪，然后始能引起反对之举。华人此种怯懦情形，诚然不是优美性质，但在一般未负执戈卫国职责之人民中，此种习性却又不失为一种善良性情。至于华人性质尚有其他种种例外，吾人可于此次拳乱中见之。即就一般被处死刑犯人之态度而论（李鸿章在广州，一年之中曾杀五万人），亦常足以证明彼等实具有毫不畏死之精神，倘有一犯露出沮丧之气，则将为其同死各犯所辱骂所讥笑。

正月十七日之报告

现在最足令人叹息者，颓唐气弱之列强，竟设法阻余越出直隶侵入山西之举。余从前之意，以为冬日之际，不能再作规模较大之军事行动，但自余观察德军所表现之精神

与能力以后，顿觉前此所怀意见，应该取消。

正月十七日之日记

昨晚余接（德使）Mumm 先生之报告，谓中国议和大使现已声明对于议和条件为原则上之接受，并已加盖御宝，因此对于和议讨论范围，从此已有一个坚稳基础。

经过许多星期之会议讨论，以及屡与柏林、伦敦交换许多无用电报以后，今日始将铁路合同，与俄议结。而且内容一如前此余所草拟者。余甚希望，彼辈或者可以从此得着一点经验，即此类关于本地情形之问题，余毕竟比较柏林、伦敦之外交部，看得清楚一点。到了最后一钟之时，余尚为俄人所烦难。盖俄人照例每于闭门之时，尚有种种反对之异议及修改之提议故也。现在，所有北京至山海关之全路，皆在余之手中。关于杨村至山海关之铁路管理事宜，余亦自俄国手中接得（译者按，北京、杨村之铁路，系已早在瓦氏手中），一俟两个星期以后，余即将该路移交英人，因彼辈急欲取得故也。余之最初论点，以该路为一种军事铁路，专谋联军利益之用，总算是始终坚持，侥幸贯彻。俄国方面尝主张“征服之权利”Par droit de conquête，可谓无耻已极。第一，此项主张仅有一部分可以算是不错；第二，俄国每遇于己有益之时，则又时常声言，彼固未尝与华作战也。英国方面则又主张该路之中，英国投资甚多，英国雇员甚众，所以该路实应属彼云云。其厚颜亦与俄国完全相等。盖英国所投之资，乃系属于英国私人及银行项下，英国雇员乃系服务于中华帝国故也。现在，余与俄国，幸已脱离。但对于英国，一定还有许多难题在后。

俄国委员，尤其是 Engalitschew，今日皆甚愁闷，并声言彼等乃系被人战败之人，而余则为手段强辣之人云云。

正月十八日之日记

在十八纪念日（按，此系德国一八七一年之统一纪念日）贺客之中，日本公使（Komura Rutaro）亦在其内。谈话之际，彼曾询余，是否愿乘离去此地之机会，一赴日本游历云云。余最后觉得，彼之为此，乃系出于窥探之意。彼最终更言，彼相信（日本）皇上如能得余为客，定将十分欢喜云云。余因作下列有限答语，即余极高兴一游日

本，但此事须待吾皇允许之命，方能决定。余从此处又可看见，日人方面实相信和议不久即可成立。

正月十九日之日记

今日为（俄国上校）Engalitschew设宴饯行。彼系一位年少有妻之人，忽然奉命派在余之参谋处行走，乃匆促束装前来。彼对于参加中国远征队一事，当然非所乐为。彼自始即未尝一刻忘归，而且声称当时曾经许彼，若届耶稣诞节之时，当已回到家中。彼对于俄国各种欺伪之举，必须参加活动，常使彼之个人，亦复深感苦痛。（俄国）中将Linewitsch亦将与彼同行。该中将系一勇敢男儿，旧式教育之军人。彼每见我们兵士之紧严态度，辄中心欢喜不已。彼之全部军事生涯，大抵都消磨于高加索、土耳其斯坦两地。现为第一东路西比利亚军团之司令将军。彼从未服务禁卫军中，毫无俄国宫廷将军之习。

（德使）Mumm先生将中国方面对于使团末次通牒之回文，给余观看。Mumm甚觉其中语气不当，并谓所提各项问题，亦复不妥云云。但余细阅回文，对于上述两种非难之点，却均未能看出。只是我们亲爱的外交官们，遇事如能稍稍强硬一点，（那就好了），盖此中确实缺乏一位领袖人物。此外，（俄使）Giers先生，更是一位永远不能望其共同行动之人。但是现在和平会议，至少总算已经开始。因此，撤兵问题亦复渐渐接近。余将动手准备一切，盖余现已深信，（法国）将军Voyron及（英国）将军Gaselee对于余之意见，业已大体同意。

现在极不明了之一点，即是日本对于英、俄两国之关系。该两国皆欲争得日本之友善。当战事初启之时，英国方面似乎处于优势。但是此种形势，近来渐渐变迁。至少俄人方面系如此主张，彼谓对日关系，已经十分安全，关于划分高丽方面之两国势力范围一事，亦复达到彼此谅解之地步云云。反之，余又从法国方面闻知，现在形势又已大变。日本国内对于俄国在满洲之行动，十分不安。盖以俄国欲在占据招牌之下，实行其并吞统治之谋也。但余现在复得俄国方面可靠消息，谓满洲现象极不可乐观。该处居民因旅顺及海参崴方面续派重兵前来之故，人心极为不安。因此余相信（俄国）撤兵直隶

之举，实与此事有关。数日前撤退之一旅（俄军），现正徒步开往奉天[①]省城。

正月二十日之日记

今日主要之事，大部分为余与中国亲王周旋。最初在我们使馆之内。来此者计有当今皇帝之兄弟三人，以及堂兄弟一人。彼等系乘马而来，随带无数侍从。因应彼等请求之故，曾派遣三位德国骑兵作其伴护。此四人者，皆系极为温雅之少年，举止优美，面貌聪俊。彼等穿得齐齐整整，其毛辫之美丽，尤特别惹人注目。彼等表示一种极有训练之礼貌。因其中年纪最长者，亦不过十有八岁之故，所以，实际上只算是一种儿童胜会。彼等极喜钢琴音乐，尤其是联队军乐。其中年纪最长之一人，似将被派为前往柏林之谢罪大使。余相信彼必为吾皇所喜悦（按，此系指 Kungjuan 亲王而言，但其后实际上所派之大使，则为醇王）。当前此围攻之时，彼等皆在北京，其后亦复匿在城中，未尝出走；直到最近，外间始知彼等尚在京中。伴彼等来此者为荫昌将军。该将军曾久居柏林及维也纳，能说流畅之德语。倘遇必要之时，尚会说柏林土话。最近有一次，彼欲穿过余之庭院，为站岗兵士阻其去路，并谓之曰："苦力，此处汝不得行走！"彼乃向该兵（打着柏林土语）高呼曰："不行，小哥，那是没有的事。"（Nee，Männchen，des ist nich.）

但派往柏林之（谢罪）大使，尚有另外两人，亦在候补之列。其中之一位，即为头等亲王之肃王[②]。彼于午后来访，此人系一个短小而肥之身材，年纪约四十左右，面貌极平常，彼似乎甚欲求得余之宠爱，但是未能得偿其愿。彼曾向余言曰，彼现有子女十人，其最幼者年仅一岁云云。余乃答之曰，当然一定还有十个子女继续而来云云。因而余遂由此献彼一句最大谀词；此种谀词，对于华人，实不妨言之者也。

---

① 奉天：府名。清顺治十四年（公元 1657 年），自辽阳（今属辽宁省）移辽阳府于盛京（今沈阳市），改为奉天府。光绪三十三年（公元 1907 年），改设奉天省，治所在奉天府，辖境相当今辽宁省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各一部分、吉林西北部和西南部一带。

② 肃王：名善耆，字艾堂、蔼堂，号偶遂亭主，封号肃忠亲王，又称肃亲王，肃王。川岛芳子的父亲。历官镶红旗满洲都统、正白旗领卫内大臣、崇文门税务监督、民政部尚书。1909 年筹办海军事务，1911 年为庆亲王内阁民政大臣、理藩大臣。能诗工画，人称晚清最贤，1922 年死于旅顺。

正月二十三日之日记

各位外交官们，现在公然大起胆来，议决送给李鸿章一个强硬通牒，将于明日投递。关于撤兵一事，必须先将祸首处死之后，始能道及。此种要求，为华人所熟悉者，已有四个月之久。每次重新申明，终不能使彼等特别注意。我们早已应该实行报复手段，譬如或者派兵占领禁城，或者提出毁破禁城之恐吓，或者拆毁一段城墙，尤其是打毁城楼一事，实为该城之奇耻大辱。但是所有一切行动，只须稍有强硬趋势，立即遇着俄国方面之困难，而且日本方面近来亦常附和其说。此外，英国方面亦不十分可靠，彼但注意占得长江流域优势一事。余尝从 Sir Robert Hart（总税务司赫德）处得以证实，英国方面确有接济长江两位督抚多量金钱之举。

在中国方面，除了皇室及其多数亲属外，实无所谓阶级之区别。贵族一物，从未有之。所有政府职官（九品官级），系由所谓“文士”之中，选拔充任。在理论上，可谓甚美，盖欲由此造成一种“学识贵族”故也。但在实际上，则全不如此，盖彼之所谓学识，实属最可悲观故也。凡有欲为官吏者，可于学习若干时日之后，往赴每年一次之考试。第一次之考试在本县举行，第二次在本府举行，第三次在本道举行（院试?），第四次在省城举行，第五次则在北京举行。并于考试地点建筑宏大房屋，以为考试之用。其中，并为每一投考人员设有一个号房，其小只足以容纳一人一桌，独坐其中。据云：北京试院之中，共有二万间号房。因为中国官吏人数，较之吾国，未免寡少之故（此处亦为中国民族易于统治管理之一证），所以，此种无数候补人员，能被任用者，比较甚占少数。其余大部分不得意之浅学人士，则散布全国之中，倾心教派，易于谋乱。此次拳党之中，此类人士为数甚多。至于幸得一官到手者，则又无不努力搜括人民，而自己则复为上司所剥削。据一般人推测，中国每年税收所入，实际上只有十分之一，系入于皇家国库。

二月一日之日记

昨日荫昌将军曾受李鸿章及庆亲王之嘱，特来余处相告，谓近来获得（美国）Chaffee 将军书面允许，往游禁城之人，屡欲侵入住有妇女之院宇。盖此种院宇至今受

人敬重，未加侵犯故也。所有其中妇女，恐惧达于极点，群谓倘若再有此种情事发生，决定自戕其身命云云。余因此事，特为往访 Chaffee 将军。彼立即赞成余之提议，出示严禁，并贴在住有妇女之处；而且因欲使人特别注意之故，特声明此事曾得余之同意云云。最可惜者，吾人在此，对于此种毫无纪律之人，有时竟非加以严重干涉不可。此类人无论何国国籍均有。至于妇女每见敌人将近，辄先闭死其子女，随即自戕其生命之事，实已屡次发生，至可叹息。

二月三日之奏议

关于近年以来，时常讨论之“瓜分中国”一事，若以该国现刻武备之虚弱，财源之衰竭，政象之纷乱而论，实为一个千载难得之实行瓜分时机。现在所欲问者，只是各国对此问题，究取何种态度。俄国方面，因占领满洲之故，在最近期间，当可心满意足。假如现在法国进据云南，日本占领福建，英国取得长江流域一部分，德国占据山东，则中国方面实无力加以阻止。因此，我们对此问题，必须十分注意，倘或一旦列强对于瓜分之事，果有妥协之望。

但余对于此事，却认为绝对不能实现。英国极不愿意法国进据云南，日本占领福建。日本方面对于德国之据有山东，则认为危险万分。各国方面对于英人之垄断长江，认为势难坐视。至于美国方面，更早已决定，反对一切瓜分之举。俄国方面若能听其独占满洲，毫不加以阻扰，则该国对于他国之实行瓜分中国，当可袖手旁观，盖彼固深信，各国对于此事，彼此之间必将发生无限纠葛故也。因此之故，急欲促现瓜分一事，实系毫无益处之举。

据余在此所能推断者，则几乎所有列强，皆欲藉建设铁路、开采矿山之事，在华直接生利以自肥。其结果则各种间接利益，亦将渐渐随之而生。譬如中国重大未辟之财源，势将由此日益发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亦将由此益增，对于各国商业工业，更将从此辟一广大活动区域。因此之故，预料各国前此参预经营之铁路事业，不久即将从新着手。此项铁路事业，在乱事以前，即已一部分实行开工建筑，一部分业经计划妥贴。

最近，余所新悉者，只有俄国对华策略一事。俄国最初用尽方法，谋得山海关、北京间之铁路。彼曾先将彼之天津租界大为扩充，直与车站地址相接，妥为之备。假如争有山海关、天津、北京间铁路之举，系英国方面获得最后胜利，则俄国势力将另自新筑一条山海关至北京之铁路。此外，俄国尚欲再筑一条北京至张家口之铁路，并拟将来再为引长，直穿过蒙古，以达 Kiachta。至于北京、保定、正定（?）间之铁路，其延长路

线系拟直达汉口。该路直到现在，系由法、比公司所建筑。惟俄国方面，现刻竭力设法收买该路股票，以便由此获得监督该路之权，并得循此轨线，以达各国商业利益烧点[①]之长江。其在他方面，则英国拟由缅甸出发，法国拟由（安南）东京出发，各建铁路，以达该处。据余观察，俄国之意，系欲使中国永在衰弱状态之中，常受俄国羁绊支配。因此之故，若谓俄国之使中国经济发达，其意系在助强中国，实为最不合理之谈。但在他方面，余实未敢遽信，中国现在已到甘受俄国保护而不辞之衰弱地步。所以余料，假如俄国永远据有满洲，其势将使中国皇室，取消北京首都资格，另建国都于他处，实属极为可能之事。

中国文化在四百年以前，常有若干方面，比较欧洲为优。但自彼时以后，遂成停顿不进之象，尤其是对于火车、轮船所引起之世界巨大变迁，未能加以理会。而且数世纪以来，未有外敌严重压迫，以致养成一种不能战争之民族。所有上流阶级，对于世界情形，毫无所知，只是骄傲自大，盲目反对白人。至于官吏人员，则为腐败之气所充塞，毫无精神之可言。其在皇室方面，则又似乎不能再行产出振作有为之人物。但吾人在此却有一事不应忘去者，即中国领土之内，除开西北两面之（蒙、藏）属国不计外，共有人口四万万。均系属于一个种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更有“神明华胄”之自尊思想，充满脑中。此外更有一事，亦复不应忘去者，即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加以备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以及守法易治。余认为中国下层阶级，在生理上，实远较吾国多数工厂区域之下层阶级为健全。倘若中国方面将来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为其领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国贡献与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则余相信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吾人若一观察日本维新之迅速与成功，则此处实值得吾人加以特别注意。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在山东、直隶两省之内，至少当有十万人数，加入此项运动。彼等之败，只是由于武装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于并火器而无之。

倘若中国一旦强盛，则受其影响者实以俄国为最。俄国将于距其中央政府甚远之数千基罗米突遥长界上，行见一个含有危险甚或势均力敌之对手产生。

若此种观察不错，则无论为德国或英国利益计，皆宜以此之故，扶助中国，使其经济发展，国力增强。而吾人商业关系，当然亦将随之而进步。至于并吞土地一事，与其谓为促进商业，则毋宁谓为阻碍商业。盖余之意，以为德国若以胶州为根据，实能享用山东利源，而且由此更将获得一个较大活动区域，假如铁路建筑，不仅天津 Funan（译

---

① 烧点：焦点。

者按，此字似为济南府之误）一段，而以直达南京为其终点。

假如现在俄国果真努力，以助中国发达，则该国之政策，可谓完全错误。近来有一中国老人，曾宣言曰："我们自四百年以来，皆在睡梦之中，但其间我们深觉安适无已。你们白人，必欲促使我们醒觉，则将来终有一日，你们对于此举，深为扼腕之时，云云。"

关于德国在山东方面并吞较大土地一事，尚有一种困难，即华人置诸德国官吏治理之下，是也。就该地大抵贫乏之居民中，欲得多数税收，可谓希望甚少；其中尤为重要者，则该地距德太为遥远。假如中国一旦复欲夺回山东，则德国方面（除开列强特为德国而设之各种困难不计外）对于此种战事，非至财政破产不可。

二月四日之报告

皇上陛下，余不敢遗忘，敬谢吾皇钦派铁甲舰队驻扎东亚直至今日一事。

余对此事，及为欣慰。一方面系由于普通政局之关系，盖现在时局犹在混乱不明之中，而且对于东洋国家示以威力，常能使其重视。他方面则系由于德国本身利益之关系。倘余在近来恭呈奏札之内，曾谓陛下之议设统帅一职，实使此次全局受益不少云云，则现在余对此语，更将扩广其意，即陛下之派遣重大海军、多数陆军于东亚，以及委任德国将军，受此统帅之职，实使德国利益，为永久不朽之增进。在我们国内，或有因政治识见短浅错误之故，对于此举，不甚加以重视；而在斯地，则此举实为一切德人深深感谢，引为荣誉，而且亦为各国所重视。

自余在此开始活动以来，即尝以为余与各国军队设法避免龃龉一事，当于陛下有益。现在余甚相信，此举业已办到，而且未尝有损余之地位尊严。余与各国，皆甚相洽；余执行统帅职权，亦无争执之事。又余与日人来往，觉得彼等似乎对于某种政治情感（系指德国迫日还辽一事），尚未完全克制，所以彼等举动，皆甚趋于谨慎一面，但近来此种态度业已完全改变。盖日人方面，对于世界各国尚未承认彼为列强之一，时常引以为忧。今在余处所得之印象，乃与其平居所隐忧者完全相反，因此彼极为感动。余对待彼等亦复极为坦白自然。而且对于彼等军事材能，屡次特别奖励，此固完全本诸余之良心而为之（非故作谄语）也。余相信以是之故，所以日本公使及日本将军Jamagutschi皆曾告余，倘余在回欧以前，一往日本游历，则（日本）皇上陛下，将甚喜悦云云。倘若届时陛下对于此事加以允许，则余将敬乞天恩，准余随带少数侍从，乘坐陛下之Hertha巡洋舰而往。至于其他战舰，是否也应开往该国一为表示，敬祈陛下

圣衷独断。

和议进行之迟缓，以有其他列强之冷淡，使余十分苦闷。余所惧者，德国所要求之赔款数目，势将不能达到，而且相差甚远。其中主要负咎之人，当然是推俄国，而日本、美国则更从而附和其说。至于英国方面，亦不能完全无过。彼不愿在直隶之内，尤其是不愿越出直隶以外，从事有力的军事行动。彼但在长江方面独行其道，常用金钱魔力，以使该处督抚受其束缚，袒彼利益。余对于和议将竣一事，既未敢置信，因而对于大多数列强代表所抱北京行将撤退之见解，亦复未敢苟同。现在要求华人处死祸魁之事，已有数月，若在此事未曾执行以前，则中国诚意言和之心，尚无法令人信任。倘若其间和议果然成立，则亦须经两月之久，然后北京撤退之事，始能办到。盖从德国方面派遣运输船只来此，势非短促期内所能抵达。至于大批军队齐集天津候船一事，则又因顾及卫生关系之故，实不应为。而且将来须俟第一批运输船只离开大沽海湾之后，方准北京军队开始乘车出发。至若军中用具，当然可以先行输运出京。

陛下饬令海军衙门长官寄余之八类航行表多种，余对此极有兴趣之赏赐，不胜敬谨感谢之至。

二月十日之日记

余因欲使外交方面略添生气之故，乃屡次宣言，余现在预备，至迟不出十四日之内，将有一种规模较大之军事行动；余欲侵入山东，同时并令法军攻取山西云云。此事果然发生了一些影响。盖美国公使方面认为此种军事行动，甚易妨碍和议进行。而（英国）将军 Gaselee 亦曾命人告余，如有关于超出直隶境界以外之军事行动，彼必须先向本国政府请得许可，然后始能参加云云。同时，华人方面既由（俄国公使）Giers 之传递消息，得知余之恶意行动。此外，俄、美、日三国又皆有希望从速议结和约之心。所以，余甚冀余之此举，或能促使双方稍为迅速一点进行。

二月十一日之日记

在华人性质中，令人可以注意者，尚有知足与节俭二种。一位成年之人，每日所需之饮食费用，未尝超过四个非里徐（约合中国大洋二分）。若值饥荒之时，赈济群众，

只须每人每日给与三个非里徐即足。吾人由此，然后对于一位苦力每日得资二十非里徐，竟能充裕养家之事，始能了解其故。此外，更加以十分节俭，所有世间万物，皆不令其废置遗弃。因此之故，对于已死动物加以埋葬之举，从未有之。无论骆驼驴子、马牛犬猫，皆可作为食品。假如该项畜牲之死，系由于染疫之故，则其肉价可以略为低减，但其尸体却无论如何非吃不可。关于烹调食品一事，中国主妇具有无限发明天才，为我们从未见过者。每件残剩物品，皆能善为利用。若到秋际树叶尚未坠落之时，则随处皆在争相采拾（余物?），而且类多小孩为之。其在高贵人家，亦复极讲经济。庆王宅内，常将杯内饮剩之茶，再行倾入茶壶，更由此以烹制鲜茶。此种办法，大约各处皆是如此。对于衣服之俭省，亦正与对于食物相同。所有精干母亲，对于一条破布或一根短线，皆知所以利用之法。每值天气温热之际，辄使其膝下孩子，一直到了五六岁左右，犹复裸体不衣，遍处走跑。倘若我们再将彼等居室一为考察，则其甘于俭陋之状，又为何如。大批人数，相与挤居于一间昏暗卑陋之屋内。因此，我们方知中国群众生活之极为便宜，乃系势所必然也。在此种居处情形之下，而欲求其洁净，当然是万无之事。从前曾有一位英国女人，向一位中国母亲问道："你的孩子，好久洗澡一次?"伊乃得着一个忿然的回答，即是："我的孩子，从未洗过一次!"

中国妇女假如已经嫁人，而且生有小孩，则其地位并不低下，尤其是假如伊曾替其丈夫生了许多儿子。但伊对于丈夫之娶妾一事，必须忍耐，至少在富家之内，确系如此。至于闺女之境遇，则远较妇人为劣。第一，伊等诞生之时，因身为女子之故，即已不受欢迎，且有被人处死之危；迨到年纪渐长之后，又有被人售卖之虞。此种处死及售卖女儿之事，其流行程度，各省不同，一以该地长官对于此事之态度为转移。其间，尝有许多皇帝虽曾下令严禁，但其效果均未能持久。其主要原因，并非由于父母之贫穷，乃系由于宗祀之观念。盖女子一旦嫁人之后，则与其母家完全脱离关系，从此不能代亲祈祷及祭祀。因此之故，女子之于父母，乃系毫无价值之物。父母既如此设想，所以对于女儿之教育等事，亦不引为己责，多耗金钱为之。早婚一事，实为此种观念之当然结果。为父母者极欲与其女儿早日脱离，并不惜花费金钱以成其事。因此媒人之在中国，竟有巨大行会之组织。此外，妇人之生活，亦复并不逍遥自在，伊等在家工作甚多，每无暇时出外。在中国某某数地，其妇人及闺女之间，常有一种自杀狂之流行，成为一时重大不幸问题。又中国青年闺女往往自结会社，规定每个会员，到了若干年纪，即须自行戕杀。

二月十二日之日记

最近数月以来，余屡被柏林方面询问，现在铁甲舰队是否可以归国云云。余尝决定，竭力反对此项舰队撤回之议。而皇上对于余之意见，亦复加以赞成。现在余所深惧者，恐因我们（国内）近来大倡亲英之故，又将从新再提此项撤回之议。余之主张，则依然未变。而且余对于英人之口头亲善，尚不敢加以信任，余必须先行听见一点亲善确据方可。盖英国政策之主要思想，无非专谋自利而已。余实毫无一刻疑惑，英国衷心欲在长江方面，痛打我们嘴巴。至于四只铁甲战舰停泊吴淞海湾一事，只能发生最好之影响无疑。盖此举一方面既足以警告英人谨慎从事，他方面又足以引起南京总督之特别注意。

现在，我们在此接得社会民主党攻击此间行军举动之消息。该项攻击材料，系根据于兵士函中所述之恐怖故事，以及许多报纸所布之无聊消息。余所不能了解者，即陆军总长何以对于此种辩论，竟愿参预。而况该总长自身对于此间情形，固亦未能深悉乎。此项传闻，十分之九，皆系无端虚造，以及言过其实。假如果有兵士曾经看见白河之内浮尸数百一事，则此事之为谎语固不难加以证出。盖我们海军步队行至彼处之时，战争之事，已经老早过去。该兵所述，当系闻之他人，而他人或更闻之另一他人。假如一位少年情感丰富之人，镇日但见焚毁之村庄，打破之庙宇，死人之尸首，动物之遗骸，更加以中国拳民被处死刑，欧洲哨兵被人刺杀之事，日有所闻，则不能无动于中，自是当然之理。此外，更因欲使国内亲友对此特别惊叹之故，于是想入非非，加以点缀，而此种恐怖故事，亦遂从兹造成。至于许多华人曾被枪毙之事，诚然有之，但彼等实是罪有应得，尤其是依照中国人（对于犯罪处罚）之观念，（一点不算过分）。对于此种观念之了解，所有吾国一般主持评论之人，皆当引以为责。

中国刑罚，极为简单。其中笞刑甚多，其次则为流刑、死刑，而无真正监禁之刑。大部分犯罪事件，皆以笞刑处之。每当坐堂开审之时，先将犯人痛打一顿，使其明白供认。复次，再将证人痛打一顿，使其不作谎语。迨到判词既下，立即将罚执行。所用厚大之竹板（其中共有大小厚薄两种），往往竟使受刑之人由此死去。至于处以死刑之事，则时常有之，每每一种罪案，在吾国只加以三四个月监禁之处罚者，而在中国则竟以死刑处之。直到现在，此间刑部大臣，犹常常向着“北京行政委员会”诉说城中不靖之状，与日俱增，尤其是美国区域之内，彼以为系因处罚过于轻微所致。因此，该大臣请将所获强盗窃贼，引渡与彼，彼当时常处以死刑。

二月十五日之日记

余曾在（德吏）Mumm 先生之处甚久，乃知和议之事，丝毫未有进步。在各国公使之中，以英使 Satow 所持之态度，最为有意拖延。究竟该使何以故意拖延，实难令人了解。或谓英使实欲由此以使我们在此多住几时，以便我们愈与英国接近，愈与俄国反对云云。余相信英国政策之中，或有此种亲善之举。

二月十六日之日记

现在余已决定，下令各国军队，从速准备一切，务于本月底间，即可开始攻击，而且能于山岳之地行之。余拟直向山西侵入，该省虽为山岳所环绕，但余相信一切难关，当可打破。现在令人悬念不置者，则为法军之态度。（法国）将军 Voyron 本人，固尝向余表示，甚愿参预战役，余亦相信彼之此语，当系由衷而出。此刻所欲问者，即巴黎方面是否另有他项训令来此。在总司令部之中，现在无不欢声雷动，盖以从此或可发生一点激烈战事，不复再度此种寂寥无味之光阴。（英国）上校 Grierson 亦向余言及，在英国大本营之中，对此亦是同样欢欣鼓舞，且为最良意志所充塞。虽然如此，余仍未敢十分放心，因余以为彼等终当一向本国政府请示故也。余之命令，已赶于昨晚发出，而且同时设法，以使李鸿章得知此事。（德使）Mumm 先生顷使人语余，谓彼对于余之此举，不胜欢喜。盖今晨曾接由西安府传来之通牒一道，其内容颇为轻佻，今以此举答之，实为恰到好处也。

二月二十一日之报告

现在余从公使 Mumm 方面得到通知，谓使团方面对于中国政府所宣言之处死（祸魁）一事，认为完全满意。因此，关于中国议和大使拒绝接受议和条件之假定，当然不复存在。所以，余已下令，暂将攻击之期，往后迁移。盖此种攻击之目的，原是只欲对于华人方面加以压迫威吓而已。假如行将付诸讨论之赔款问题，复为华人方面故意怠

慢，则余在任何时候皆可发出开始攻击之令。此次事件经过之速（从下令预备攻击之恫吓，至西安方面中国皇室之屈服，其间不到四日），又足以从新证明，凡与华人谈判，若欲得到胜利，必须具有威力，而且示以行使该项威力毫无顾忌之决心，方可。余曾设法使人将此预备攻击之令，犹在发出之同日，故意传入总督李鸿章耳中。余并探知，此项命令，曾使李氏陷于十分惊恐之状。李氏立即危词上奏西安，使其注意。同时，并应用各种方法，使余对于军队发动之事，暂缓实行。于此发生了一件从古未闻之奇事，即中国新年（此次在“阳历”二月十九日）向来只作娱乐之举者，今竟为严重之会议所滥用所虚度。各国公使，曾向余直接的或间接的致其谢意，谓余此举，实使和议前途进步不少。

此处余不敢漏报陛下者，即余之预备攻击命令，颇为各国军队所欢欣赞赏，而且精神为之一振。至于德国军队之中，现在既见有与敌人接战之机会，于是均不愿落居人后；所有营中养病之人，几乎全来报到，自谓所病业已全愈。惟有（英国）中将 Gaselee 表示一种不甚思动之态度。当余令余之参谋长，将余出兵意见告知该中将之时，该中将对于战地距离太远、动员期间太迫等等，表出各种踌躇态度。最后，彼乃将其怀疑之心明白吐露，盖彼深恐余存有直向西安前进之意也。其后，彼又似受（环境）影响，对于此项攻击计划，渐觉可以实行。余从此又复从新觉得，Sir Alfred Gaselee 之为人，诚然极有思想，但对于魄力及明察，却嫌缺乏。

二月二十五日之日记

现在，余始从报纸中得知，余曾久受英、美、俄三国报章之激烈攻击，尤以造谣总汇之《泰晤士报》为最。该报之论文，当系来自 Morrison 先生。此君似乎好作真正英国访事夸大狂，余当特别注意及之。余对于报纸攻击所得之印象，并不比较一犬狂吠为稍事夸大狂，余当特别注意及之。余对于报纸攻击所得之印象，并不比较一犬狂吠为稍多。余所惊讶者，即（大）报馆如《泰晤士报》，亦复永用此类劣败访员。此间英人对于此君（之行动）甚为惭愧，但无勇气将其遣送出境。至于俄国方面之攻击，系由 Uchtomski 侯爵主持其事，此人曾在此地勾留若干星期。又美国访员时常出入于该国使馆之门，对于外交应守秘密之惯例，往往未能严守。因此，外交团中对此极为不满。此外，各种报纸之上，又尝相传余与（德史）Mumm 先生之间，曾有龃龉之事发生，可谓没有一字，不是扯谎。余与 Mumm 自始及今，最称相得。因彼建议之故，（此间外交界人士）时常（尊重余之意见）位余第一交椅。法国公使对于此议，亦复极为赞成；而

英、俄两使，则初时尚思设法反对。现在，此种龃龉谣言，当然是造自一位英人。

二月二十七日之日记

昨日，余曾与几位外交界人士谈论，现在似乎大家已经开始觉得，关于赔款总额一事，实有速向华人提出之必要。Hart（总税务司赫德）始终坚持，中国方面之支付或缴利能力，万不能超过十万万马克（约合华币五万万元）。昨日对于使馆界域防御问题，亦复会议良久。幸因（德使）Mumm 先生之力，稍为得着一点结果。

二月二十八日之日记

自若干时日以来，余即尝建议，拟将白河自天津起，加以疏通修理，以便炮船再可直达天津。盖当一八九六年之时，炮船犹能驶至天津故也。果能如此，则将来对于大沽海湾装船一事，利益极多。至于办理此事，宜由天津“临时委员会”Conseil proviso re 担任。而该会对于此事，亦复甚愿为之。大凡头脑清楚之人，对于此种计划，虽已无可加以非难，但此事之实现，余恐仍不可期。盖因外交界方面，实有出来干预此事之意。果尔，则此种计划势将根本断送。至于彼辈出来干预此事之原因，系以该会只由军官所组成，殊非彼辈所能忍受。至若彼辈出来干预，是否于事有害，彼辈对此却认为无关轻重，不复加以注意。

三月一日之日记

昨日为公使会议，（德使）Mumm 先生曾欲使其略增活气之故，拟将赔款重要问题提出讨论，但未能如愿以偿。又彼曾建议，对于将来占领通至海滨之铁路，以及天津地方驻防问题，应请各国将军，先行拟出一种意见书云云（其实，余已老早拟出一种，且为各使所深知），亦未蒙会中通过。因（俄使）Giers 曾言，彼必须先向圣彼得堡请示，故也。此次会议之中，只有一个提案算是通过，即某某不关重要之两事。提交委员会，加以讨论解决是也。所有上述一切议案，本应在两月以前，即须议决。一俟中国方面宣

言原则上接收和议条件之后，立将各种议决通知华人。换言之，其时犹在新年时节也。进行之缓慢，直到可罚之程度。此间会议之事，须由十一国公使共同讨论，诚然不甚容易，但却不能藉此以为解嘲之地。

三月二日之日记

各国政府对于华事进行之缓慢，亦正与此间各使相同。盖彼等（指各国政府而言）现在尚未决定对华要求之赔款数目，究应为数若干。余与（德使）Mumm，皆曾设法催促柏林方面。近来余又接到一种来电，询问现在铁甲舰队是否可以返国云云。仍坚决主张，该项舰队应留此处，直至主要条件履行之时。盖此项舰队，在长江方面给余与华人之印象，极为深刻，若一旦召归，将使华人之兴致，立刻又高起来。赔款数目，以德所要求者为最多，且亦十分合理。盖以军队之数目与路途之遥远而论，皆应如此也。法国军队数目，虽然与我们相等，但其中一半人数，系由（安南）东京而来。英国军队则全部皆系来自印度。美国军队则自菲律宾方面调来。日本则又居于近邻。惟对于俄国方面，不易与之比较短长。盖该国于西比利亚铁路方面，据云受损不小，故也。该国欲与中国自行清算，而且当然系以满洲为赔偿。

美国公使 Mr. Conger 现在给假归国。但据余观察，彼或将不再回任。现刻代表该使列席和议者，为 Mr. Rockhill，此君系在夏间奉命来此，盖当时以为各国公使皆已被杀故也。（美使）Conger 及将军 Chaffee 之为人，外貌虽稍粗率，而内面却甚良好。余承认彼两人，皆系极为可敬，而且负有材干之人。

三月五日之日记

今日余曾往访城中一座喇嘛庙宇。该庙现由澳洲海军支队驻扎。引余参观之某军官，曾向余坦白言曰："我们曾将此间最好之古铜，寄呈我们女王（指英国女王）。只可惜此项物件寄到之时，已在伊死之后云云。"此外并闻尚有数十佛像，亦已运往英国而去。

三月八日之日记

现在好像是因余在此办事得法之故，反将罚余在此多住几时。盖此间人士之意，皆以为华人只是怕余一人。因此，时常都可听见人说，联军撤退二万或三万，其实都无重要关系，只要统帅本人尚留此间。若彼一旦去此，则华人立刻兴高采烈，放肆起来云云。但余现在所不敢担负者，即吾军在此，再行埋葬数百，以及再行护送若干（废兵）回国。故余特于今日致电皇上，谓战费问题，亟应从速开始讨论云云。

正月十九日威廉皇帝由柏林致瓦氏之信

当余受联军各国之托，以直隶方面外国军队总司令职权，授与阁下手中之时，余固深知，余所付君之重任，即或除开纯粹军事方面完全不计外，尚有无限非常困难发生。自彼时以来所得之各种经验，以及阁下屡次寄余之各种报告，皆足以证明余之预料不错。至于阁下尽力设法胜过一切因与各国共同动作所发生之难关，以及解决一切涉及政治方面之难题，皆能使余十分钦仰。阁下所奉为标准之视点，譬如对于凡可使余政策受其妨碍者，皆小心设法避免；其在英、俄两国利害相反之间，又能严守中立，专以军事论点为前提，真是一点不错。余甚希望此后以及直至对华军事行动终结之时，阁下皆能办到勿与联军各国之军队，发生严重龃龉，对于已经产生之争端，加以圆满调和。此种希望，实从余信阁下为人及经验之心，所油然而生者也。

自从中国暴动党徒及中国正式军队，既已表现毫无能力对抗在直各国军队，而且中国全权代表对于联军各国议和条款，又已无条件的接受，则大规模之军事行动，在此春间恐不复有。所余者，只是派遣小队以任出剿安抚之事而已。因此，君之责任却尚未完全终了。此外，逼迫中国从速履行议和条款，以及值此现正开始讨论条款详目之际，对于华人最喜玩弄之推宕手段加以抵制，在在皆需施以十分武力压迫。而此项武力压迫，又必须立于统一指挥之下。换言之，必须立于阁下总司令之下，然后始能奏效。假如各种会议皆有圆满进步，而且履行条件一事，亦已郑重开始，以及此后继续实行各种约言，虽用微小武力压迫，亦可如愿而偿之时，则阁下个人，与夫未负暂时驻防中国使命的一部分东亚军团之归期，于是乎至。（瓦氏附注：余以为联军各国，一俟中国方面正

式宣言，承认赔偿确数若干之后，则可将直隶境内军内[1]先行撤去一部。而且为谋各国军队自身利益计，甚至于实有撤去之必要。倘若必须待至支付赔款方式业已议妥之时，然后开始撤退，则其期间至少尚有数月。并且困难之点，极少产自华人，而在列强自身不能一致。正月二十一日，余曾以此意向〔德使〕Mumm 先生言之。余之为此言也，实细心观察之余，觉得使团方面之进行，真是缓慢不堪。而且此种缓慢进行情形，更以下列环境之助，愈易流于拖延。〔其中，常有数位（公使）先生，极为暗自希望，此种甚与彼等有利之占领，务使其设法拖延下去。〕彼等不敢稍下决定，只是借口必须先行请示本国，然后再行慢慢等候回信。）

阁下所筹思之占据烟台一事，假如中国北方局面不再趋于险恶一途，则无实行之必要。盖因由此所得之比较微小利益，其势将为因此所酿成之政治危害，尤其是延长吾国东亚用兵时期，以及与列强惹起纠葛之危险等等，弄成得不偿失。因此之故，关于烟台一事，尚请阁下先行静候余之命令。

又令人不快之华北铁路问题，甚希望其间业已按照余之电令了结，我们业已解除责任。计该项电令，当在此信之前先行到君手中也。英、俄两国关于该路之纠葛，我们固早已知之，但我们责任却不在将此纠葛根本扫除。至于英国投资所建之铁路，不应随便被人夺去一事，固不仅是照理应该如此，即就吾国在华政策而论，亦复完全相合。盖在东亚方面，德、俄两国占领区域之间，甚以保留一个英国利益地带为佳也。但余却不愿专为英国谋利之故，而挺身反对俄国。因此之故，关于铁路问题，英国若与俄国互相详细争辩，乃是英国本身之事。我们至多只能作一诚实掮客，对于居间努力的效果究竟何如，当然不能负责。阁下对于此后解决各项悬案之时，务宜设法注意，总以勿因军事行动有损私人权利为佳。

关于阁下是否应乘归国机会，一往日本游历之决定，余现在尚须保留。

威　廉

下列数行，为德皇亲笔所书之附笺：

信中所述事实，系由最近政局脱化而出。烟台暂时可以不必放在眼中。阁下在会议期间，对于远征队之安排，恰与余意相合。多谢阁下见赐之祝语，并于当日如时收到。此次庆辰在良好天气之下经过，备极一时之盛。余现在正拟赴英，因余之可怜祖母，其健康情形极为可忧故也。

---

① 军内：当为“军队”。

三月九日之报告

皇上陛下饬令船长 Paschen 带交之本年正月十九日上谕，已于昨日到余手中。

陛下命余占烟台一事，实令余不胜喜悦。因余之意见，亦以为如果占领烟台，或将发生种种难题，实不值得一为。余已于本年正月十二日之奏议中，略为提及。

和议之事在最近数星期中，可惜无甚进步。欲求十一国意见皆归一致，诚非容易之事；但余却以为此间使团（如果真正努力），成绩当不应止此。关于使馆区域之界限与堡垒，使馆防卫兵士之多寡，以及中国赔偿教会及私人等等之款子数目，各事本可于旧年以内，将其议决，今年正月一日即可提交中国议和大使者，竟乃直至现在，犹未一一会议竣事。因此之故，华人之埋怨列强，不为无理。盖华人常谓，中国方面深苦不得闻悉，究竟联军各国所欲向彼要求者为何如云云。余对此事，亦认为极有从速解决之必要。所以，今日曾电请陛下，早将最为重要之赔款问题，明白指示。据各方消息，皆云现在西安皇室方面，和平派甚占优势。但吾人不可不加以注意者，即国中希望继续战争之徒，势力亦复不弱。趁此和议迁延之际，不难再使性质懦弱之（中国）皇帝，受其势力影响。

就现在情形而论，武力压迫之举，实不应为；盖华人方面，固未尝有拒绝接受要求之事也。倘若将来果有实行武力压迫之必要，则其堪作此举之适当季候，系截至五月初间而止。从此以后之天气情形，最易有损军队健康，所有伤寒下痢两症，至今尚未完全衰减者，更将继长增高。至于可以实行攻去之唯一方向，为余现正筹计者，当系山西南部及河南省。但此事必须先设一个防线，以御山东，方可举行。尤其成问题者，现在所有军队，是否足敷支配。盖（英国）将军 Gaselee 只有四千人参预攻取之役，而且彼曾向余声称，不能越出直隶境界以外。此外，还有一事不可不加以考虑者，即联军各国之结合，实际上本已十分松懈，今若对华采取严厉攻势，联军各国之间，是否更将因此意见纷歧，不能团结。盖联军各国方面，大多数皆希望对华战争只以直隶境内为限，显然与余立于相反地位也。

余再三熟思之后，以为当此会议进行之际，所有手下兵力，其中尤以铁甲舰队为主要原素，皆当作为一种恐吓工具看待与利用，以促和议从速结局。（法国）将军 Voyron 与（英国）将军 Gaselee，因气候不利之关系，甚为反对大部军队驻过五月中旬以后。此外，该两将军又因中国、印度海洋风浪之故，以为六七两月运输兵队，极感不便，令余对于此事，特别加以注意。

三日十一日之日记

从保定开向山西境界之侦察队伍，到处皆把敌人打得奔向境外逃跑。华人方面留下快炮四尊、尸首二百五十，并被吾军追入山西境内三十基罗米突之遥（约合六十华里）。余以为此事必有很好效果，因山西巡抚从此对于我们军队，亦复熟为相识。倘若一任余性为之，则余将利用此种胜利机会，派遣少数支队，一直开入山西境内。但余在此间，每一举步，辄为可厌政治所阻碍。

三月十三日之日记

午后余曾到（法国）将军 Voyron 处，彼对于会议进行之拖延缓慢，亦复深感不快。彼曾告余，彼尝奉到本国政府命令，对于华人无论如何勿采攻势。换言之，倘余若有攻取行动，彼将不能参加。余甚相信，此事必受有俄国方面之影响。

三月十八、十九两日之笔记（时在 Kaiserin Augusta 巡洋舰上。译者按：瓦氏曾往青岛、烟台一次。此项笔记系在从烟台到大沽之归途中所作。）

余从电报上得知，（德国国务总理）Bülow 伯爵曾在国会中宣言，谓联军各国政府曾明白表示，希望联军总司令部留驻中国，直至条件业已履行或履行已有保障之时云云。（译者按：三月十五日，德国国务总理因要求议院通过中国远征队第二次兵费一案，曾宣言曰：我们并不欲将总司令部稍为延长保留，只是适应时局上之必需，与列强间之希望而已。倘若上述两个前提一日存在，则瓦德西伯爵仍将继续行使其职权，一如彼到现在之处事坚定，行军超卓云云。）此项电报，恐非详确。因法、美两国一定未曾表示此种希望，而俄国方面亦恐未必有此表示。至于余必留此以至中国给出履行条件确实保障之时，当然无所用其反对。而且此种主张，对于余之个人，亦复不胜奉承恭维之至。但彼辈至今不能决定，速将条件交与华人，此则余所不能了解者也。现在此事之咎，已

不在此间使团方面（使团方面前此对于各种微小问题之进行，诚然亦复迟慢不堪），而在（各国）本国政府方面。余在此地，对于此中真确情形，实未敢加以评断。

当余在塘沽登陆之时，英、俄两国严重冲突之消息，遂向余迎面而来。英国方面曾在天津车站旁面地基之上，安置铁路轨道。盖该国之意，以为此项地基所有权，系属于现在由彼管理之铁路名下故也。其后，俄人旋到该地，树上彼之国旗，并宣言该地系属于彼，曾与李鸿章订有合同云云。（英国）将军 Campbell 与（俄国）将军 Wojak，皆到车站，向余解说，各自述其理由，以及对此不能让步之情形云云。余只得向彼等说道：此项问题之于余，太新鲜，太复杂，余实不能立刻下一评断，余必须先行研究一番方可。

三月二十日之笔记（时在北京）

英、俄两国之冲突，已达极盛之点。两国方面，尤其是英国，皆各增派军队赴津。据云，英国战舰已由扬子江口，驶往大沽，现正在途中。假如俄国方面，欲由满洲抽调重兵乘坐火车前来，则英国方面当加以拒绝。（俄国）将军 Wojak（彼诚然现在尚未接到圣彼得堡方面之训令）向余言曰：此次事件，关于法律问题者实少；盖法律问题，吾人固可静待解决者也。其重要之点，乃在侮辱俄国国旗，对于此事，非实行赔礼不可。此次联军国家特在天津向着世界表演之戏剧，可谓实在不佳。许多好奇之人，特到竞争地点去看，俄国哥萨克兵与英国站岗军士，彼此如何仇视对立，以为取乐消遣之道。在第一日之中，尚有许多已经吃醉之俄国军官，加入其中，拔出指挥刀，东倒西歪一顿，直至请了 Wojak 将军前来，始将彼等撵走。

此地各位将军，盖无不深以军队纪律，备受此间情形影响为叹。所有兵士之居处状况，又复不易严密监督。做事甚少，给养极丰。至于德国军队，现尚继续出发前进，而且一部分系含练习性质，务使不流于逸。我们兵士在此，当然十分失望。盖彼等之来也，常抱一种激昂气概，甚愿实地参与战事；而现在则战争既未多观，环境亦极不佳，而且身居令人难表同情、最为彼等鄙视之居民中间。因此之故，余每闻大多数兵士，欲于兵役年限满期之后，仍回国内而去之语，殊不以为奇怪。假如此间果有真正战争发生，则彼等当然甚愿全体留此不去。可惜余在此处有不能已于言者，即我们兵士将来回国之时，其品行当不能比较出国之日为良。彼等在此，日见放肆野蛮强劫斩首之事太多，而且因与其他各国军队来往之故，不免竟与许多恶劣份子相聚。

现在和议黑暗前途之中，毕竟放出了一点光明出来！此刻我们已经知道，究竟德国

方面所要求之赔款数目为何如。余思此后一切问题，当可迅速向前进行。

三月二十一日之笔记

上半日之时间，余全为解决英、俄争端一事所费去。但此事终算侥幸成功。（俄国）将军之为人，甚为明达，在此又足以证明。与彼谈判，实远较与（俄国上校）Engalitschew 谈判为愉快。该将军系乘特别专车由津来京。（英国）将军 Gaselee 现在旅行中，其代表为 Barrow 将军。Wojak 及 Barrow 两人，曾经先后与余之参谋长谈判良久，其后余乃引领 Wojak 将军来与 Barrow 将军相会。其间适接柏林方面来电，谓英国甚希望我们善于调理此事云云。因此，更使余之（调停）职务，愈意进行。其结果办到，关于法律问题，主提开划出，直由外交方法解决。至于英国侮辱俄国国旗一事，余谓英国方面当非有意为此云云，（英国）将军 Barrow 亦极以此说为然。此外，尚有误解数事，亦皆加以适当解释。于是 Worjak 乃宣言，倘若英国方面先行发出撤退哨兵命令，则俄国方面将于明早五钟撤去站岗兵士云云。余遂对于该两将军之决断，特别致其庆贺之意。其后早餐之时，我们皆一致以为，究竟我们军人办事，远较外交人员为速。

三月二十一日之报告

皇上陛下，现在余将青岛之游，敬谨报告如下。

余逗留青岛，系在十六、十七两日。当余视察军队及建筑以后，更欲对于该处港口以及殖民地之进化情形，得一明了概念。其间令余特别欣喜不置者，即据余所得印象，胶州殖民地之进化，并未深受去年中国乱事之碍，现正繁盛向上，可以达到陛下之期望。至于德国重大舰队永住东亚一层，既为事实所不能免，而同时长江方面又将永为政治商业之焼点。因此，德国之有青岛，对于海军方面，可谓得着一个十分优良重要、现在已可利用之军事基础。若再加以修筑，则青岛可成一个军港，具备一切条件。关于青岛是否可以成为商港一事，现在议论尚属纷纭。但余之意，则以为青岛将来可成为一个极有希望之商港。即或我们对于烟台大宗商业，预料将为青岛吸收一层，现在暂且存而不论，青岛前途亦复希望无穷。此外，从前办理不善之 Jebsen Linie 轮船公司，近来业已移并于 Hamburg-Amerika-Linie 轮船公司，该公司之经理 Ballin，适与余同时滞留青

岛。更加以扩充该埠航业一事，业已拟好计划；于是往谒青岛之人因此愈为便利，而商业关系当然亦将由此促进。从前对于青岛地方有碍卫生时常引以为忧者，现已渐渐开始不成问题。盖一方面既竭力施行几项卫生条例，而他方面又寻得卫生饮水，不久即可取用。所以，预料今年健康情形，将远较去年为佳。至于该埠附近大造森林一事，现在虽然尚有若干困难，必须加以奋斗，但余以为只要忍耐几时，终可一定办到。而且森林既成，当于健康方面发生良好影响，从前香港方面亦正如此。现在铁路上之工人车辆，已可开至胶州，预计该路不久可以达到高密。因为山东省内平安无事，以及该省巡抚袁世凯努力维持秩序之故（该抚于最近六个月以来，曾杀戮暴动份子四千人左右），所以办理铁路矿山事业之人，皆甚相信继续工作进行之有望。又大港及小港之完全筑成，尚需若干时日。更因近来在小港方面，发现几处地面之下，积有岩石，必须花费一些劳力，方能除去。中国居民渐渐开始适应新环境，供给彼等许多从未料及之赚钱机会。今年此地中国新春庆贺情形，最足以表现一般幸福有加之真相。其在居留青岛之德人方面，无论其为军人或非军人，余皆觉得一种朝气活泼，充心信任，爱护祖国之象，到处弥漫。就余经验而论，此种现象实为所有居留东亚方面全体德人之一种反照，彼等因陛下实力干涉，输送如此海陆大军来此之故，无不自觉扬眉吐气。余认为此种现象，不久将使贸易事项为之促进，企业欲望为之增长，毫无疑义。至于驻扎青岛之军队，余皆觉其情形甚善，健康亦佳。

在余驶向大沽之归途中，曾泊烟台，并在该处勾留数小时。防守该港之两个要塞，直到现在，每个要塞之内，只有两尊二十一生丁大炮，三尊十五生丁大炮，以及一个大队之众，但实额至多不过二百人数而已。余以为攻取该处要塞，即无铁甲舰队之助，亦复不感困难。譬如我们攻击目标，先向其中一座易于围攻之要塞，不要先打东边那座高塞。至于青岛方面，既已日趋发达，则烟台之重要意义，亦将同时随之递减。因此，究竟烟台之于德国，是否果有重要价值，余甚为怀疑。

三月二十三日之报告

当英、俄两国冲突之时，赖双方军队维持，尚能将秩序始终保住。反之，近来驻津英、法两军间所起之仇隙，则其情形却甚为严重。

该处英、法两国租界，彼此相接，并无显然边境。法国兵士常到英国租界之内，尤其是星期日下午，作出种种不端行动。彼等时常列成长排，互相牵握，共向大街而行，全途为之占去。所有迎面而来之人，必须改向小街而行，或者转身回头而去。英国驻津

卫戍营统领 Campbell 将军，竟有一次身遇其事。彼乃向法国步兵联队卫戍营统领 Souhart 上校提议，以后法国兵士如无公事，禁止前往英界云云。盖英国兵士不得无故前赴法界一事，固已老早实行也。Souhart 上校之为人，似乎略欠魄力，对于此项提议，深恐彼之部下，引为奇辱大耻。反之，（法国）将军 Voyron 一闻此事之后，立即派遣大批官兵来津，帮助实行该项禁令。

虽然如此，而本月十七日（系星期日）终竟发生一场严重骚动之举。其性质几乎成为一种法国兵士反抗自己长官与其命令之叛乱。其在卫戍营中之海军步队方面，对于一切集会暴动之事，尚能洁身远引未曾参加。反之，驻扎该地之两个步兵大队，其兵士以巴黎人为最多，是日结队穿过大街，口中狂呼“Faschoda”（按，此系北非地名，英国曾从法国手中夺去），“打倒英国人！” A bas les Anglais！“布尔民族万岁！” Vivent les Boers（按，此系南非民族，曾与英国血战者）。英国军官 Grierson 上校等等，因从车站前往英界，必须经过法界之故，途中备受（法兵）辱骂，用石投掷，甚至于向前实行攻击。并有大批法国兵士重新侵入英界之内，直至宪兵巡哨前来，将其逮捕押解而去。在英、法两国兵士之间，曾屡次痛打其架。至于英人方面，似乎有心竭力避免，应用有色（人种）军队，抵抗法国兵士；而且预防将来再被此项顾忌所限制之故，特调英、澳军队六百左右来津，此事已于本月二十日一七一号电报之内，恭奏陛下。

（法国）将军 Voyron 既从（英国）将军 Barrow 之通知，得悉此项事变之后，立即道歉不已，并派素有魄力之（法国）将军 Bailloud 赴津，速将法国卫戍营中之散漫纪律，从新整饬起来。又 Bailloud 将军本系驻扎保定，此次适因事来京，故得奉兹使命。

余希望今后类似此项之丑事，而且专就华人方面所得印象一点而论，已属极可惋惜之行为，当可不再发生。

三月二十三日之日记

近来荷池（北海？）北端，法军所驻美丽庙宇之内，曾失火一次。法国军队当时所持之态度，实令人不敢满意。盖冬宫方面当日曾立派救火队伍，持救火器械，以及许多兵士前往。当其我们士卒方用全力救火，并继续工作之际，而法国士卒方面，旋即怠于努力，于是法国高级军官，遂静视其部下之安坐吸烟，以及德兵之卖尽气力，不复加以过问。只有一位法国下级军官，曾经勇敢向前努力救火。后来（细细探听），乃知该军官系 Strassburg 地方之人（按，Strassburg 为亚尔萨斯州之首府）。

至于法国兵士之在街上，其态度却极良好。因为余住在法国区域近旁之故，所以每

次骑马或乘车出行，时常遇见许多法国兵士，经过许多法国岗位。彼等甚为细心注意，而且努力做出整饬之状。此外，彼等亦无不识余甚熟。我们军士在此，当然常与他国军士来往，但其中却最喜与法人交游，因彼此（语言）易于了解故也。我们军士之中，间有能说几句法语者，而法军方面则有许多极懂德国语言。在法军之中，颇多亚尔萨斯、罗连两州之人，以及德国逃兵。彼等初在（法国）之外籍军营中服役，其后则编入殖民地军队之内。

三月二十四日之日记

昨日，余曾将拍电柏林一事（译者按，请参看下列一段，上奏德皇电文）告知（德使）Mumm先生。该电（系由余直接寄与皇上）对于和议之迁延及其影响，有所论述。Mumm对余此举，似乎不但不见怪，并且甚欢悦，此实令余欣喜不置者。

三月二十三日恭上德皇之电奏

根据余之详细观察，有不能不为吾皇告者，即虽经陛下公使之不断努力，而和议之事至少尚有数月迁延，倘若进行速度之慢一如今日不改，尤其是倘若各国公使对于不关重要之问题，亦以先向本国政府请示之故，每每拖宕许多星期之久。又英国公使（Sir Ernest Satow）方面，似乎有意欲将和议进行特别迁延。有许多问题，如使馆保卫问题之类，在数月以前即可议妥者，而现刻仍在委员会讨论之中。中国议和各大使，对于迁延一事，实无过错之可言，而且彼等甚希望从速议结和约，更相信只有吾皇陛下出来建议，和会条件始可克日提出。此外，彼等深惧长此拖延下去，反对党或将在（中国）皇室方面复占优势。并闻李鸿章之意，倘若到了五月中旬，尚不能大体议结，则彼将利用联军因气候关系、届时不能实行大规模军事行动之机会，设法拖延和议，以冀达到较轻之条件。联军之战争费用愈增，则中国之履行能力亦愈弱。余以总司令资格，更不能不上奏吾皇者，即各位将军对于彼等部下之久留于此，既无何等工作可言，又近不良气候时节，无不引以为忧。

三月二十六日德国国务总理之复电

陛下曾命余对于阁下一七五号电报，加以密复。陛下现在已令殖民监督 Dr. Stuebel 立刻前赴伦敦，以便与英国政府口头接洽，促其对于赔款问题努力进行。Dr. Stuebel 既深悉中国情形，当能对于英国方面反对增加关税之议，加以辩驳解释。

（国务总理）Bülow

三月二十六日之日记

每个公使皆深知本国政府所欲要求之赔款数目，但对于彼之同事（各国公使）却不能先行表示出来。此真是一种小孩捉迷之戏。在各使之中，只有法国公使（Pichon）一人，真正帮助（德使）Mumm 先生。至于英国公使方面，余现在渐渐相信，彼当接有本国政府命令，令其故意迁延此事。

天津方面，英俄两国冲突之事，现在尚未完全归于静息。余设法苦口劝解双方，为之调和。

三月二十八日之报告

现在此间军事方面，甚为安静无事。近来曾经电奏陛下之派遣小队出发一事，只是专作剿匪之用，而且几乎全系出于本地居民之请，并得地方官厅之同意而行之。所有此项出剿之事，自数星期以来，专由德国远征队方面担任。其他各国军队，则静驻所在地点，对此颇为消极。至于派遣大队出发之举，现在实无必要之可言。中国军队所持之态度，极为正当冷静。此外因为列强压迫之故，中国议和大使现已表示情愿接受一切条件，倘若我们再作各种军事行动，实将无以自解。

三月二十八日之报告

皇上陛下，余在本月二十三日电报之中，对于此间和议迁延情形，曾经冒昧上奏，以冀吾皇注意。今日余从国务总理来电之中，得知陛下已派殖民监督 Dr. Stuebel 前往伦敦，以促英国政府对于赔款问题努力进行云云，实不胜欣喜之至。以陛下之大力干涉，诚然必有效果无疑，但此后英国政府关于和议之行动，亦殊有继续注意之必要。

据余勾留中国六月之观察，以为英国方面对于和议进行，实有意使其拖延。因英国与俄利害极为相反之故，所以英国甚欲与彼同隶一个统帅之德国大军，久留于此，并且对于俄国（至少在中国境内）表示一种英、德联盟之意。（英国）将军 Gaselee 就大体而论，并非不欲（自为门户）独立行动者，彼对余只作表面上之奉承而已，但一旦与我发生争端，则彼立即承认余之统帅地位，求余帮助，而且有时仅系一些不关重要之事。余对此有必须加以特别注意者，即勿使俄人疑余故意袒护英国利益。

余尝见法、日、美三国公使及将军方面，屡屡表示希望对华和议，五月初间左右了结，可以从此撤退北京，大为减少驻防人数云云。反之，余察（英国）公使 Satow 之行动，以及英国军队之准备，皆不能发现其具有从速撤退之意。

东亚方面，尤其是直隶省内，英、俄利害既极为相反，所以余深恐吾德将因驻有德国远征队于此之故，陷入争端漩涡之危。以是之故，余认为撤退或大减德国远征队一事，只须和议情形，一旦容许为此，实有立即着手之必要。除此之外，尚有其他重要军事原因，至迟不出五月十五日，热度行将升到摄氏寒暑表三十度，有时竟至四十度。从六月十五起，在此不断炎热之中，照例更将继以降雨时节，对于军事一切行动，几乎完全不能实行。据医生意见，下痢之症行将与炎热气候同时发生，其后更将益以伤寒之疫。在此期间，尤以北京、天津、保定之卫戍，最为不适卫生。一部分军队，虽然可以设法移驻地势较高之地方，以为预防，但上述三城，终须常有重兵驻扎。

所有各位卫戍将军，皆以为军队久驻此种大多数设备不周之营舍，而且动作太少，给养过丰，对于兵士之精神，实为有损。近来各国兵士冲突之事日多，即其象征。法国军官每以兵士纪律日弛为叹。余对于德国军队之能（自始）至终保其令名，虽无丝毫疑惑，但余亦有不应缄默弗言者，即兵众道德方面，因受此间环境影响之故（彼等身居素为彼等贱视、而且面目可憎之居民中间，又常与道德极低之各国兵士往还，不恤人命，不尊重他人财产，等等），渐蒙其害。此外，德国各项军队随时皆在能征善战状态之下，对于一切职责，皆能胜任裕如，更无不一致希望杀上前敌而去。现在与敌接战之事，既

已似乎完全无望，于是一般兵士遂渴欲还乡。其中表示最为明显者，即两万兵士之中，便有一万七千人，对于兵役年限期满之后，不愿再行继役。

三月二十八日致参谋总长 Schlieffen 伯爵之函

余对阁下，有所不敢忘却通知者，即余在今日恭呈皇上陛下之报告中，对于德国远征队久居直隶一事，颇以为忧。在政治方面之原因，则系英国欲使吾人与俄发生纠葛，而冀德军久驻此间，以达目的。就余观察所得而论，英国之所以故意迁延和议，全由于此。

现在中国皇室既已有意言和，中国和议大使又复诚心谈判。向使联军各国早将条件提出，则和议之事此刻当已告竣。至于华人此种诚意，是否可以继续保持一层，余以为如会议长此迁延，实系一个疑问。盖国中尚有一种主战派竭力施其阴谋，并料定列强之间不能永久一致。近来英、俄冲突，更使此派从新充满希望。

在军事方面，余最为忧虑者，为不适卫生之季候，行将届临。据医生观察，下痢及伤寒两症，不久即将发现，当使我们饱受损失。一直至于九月初旬，所有一切军事行动，几乎均不能实行。假如必须实行，则余将究向何处前进？其第一个目的地，当然为山西。但该省之内，现正饥荒流行，占领之后，对于中国政府仍难使其感受何等影响。若再行前进，则兵力殊嫌不足，而且多数联军各国，对此势将绝对不愿合作。当余最近准备攻势之时，余所能调用者，只有德国十一个步兵大队，四个骑兵中队，四个炮兵中队，总计至多不过九千人。其次则为英国三千五百人，意国一千五百人。换言之，合计起来，至多不过一万四千人。而且每向前面进行之际，沿途皆须设立兵站，人数只有愈往愈少。届时对于指挥一职，余必须亲自担任，余亦诚心甚愿担任，但各国对于此举，是否认为与余之地位相称，则实是一个疑问。

现在军队在此所作者，只是偶尔担任剿匪事宜而已。如此种情形继续延长下去，则总司令一职，在熟识此地实况之人，当已不复认为重要。又现在俄军已难视为受余指挥之兵队。假如余欲命令彼等去作比较举行阅兵典礼稍为严重之事，彼等似乎竟将拒绝服从。在法军方面，则曾奉有（本国政府）命令，勿作敌视华人之举，对于余之军事进取行动，绝对不愿参加。此外日军方面，亦曾奉有（本国政府）命令，勿越北京以外而去。换言之，即是勿作敌视华人之举。至于美军方面，则正预计四个星期之后，离开中国。因此之故，受余指挥者，只有德国军队，只准用于直隶境内之三千五百英军，以及意、奥两军。

余所惧者，余在此所据崇高地位，曾使德国尊严为之增高者，必须渐渐萎缩下去。

又总司令部尚有一个弱点，即完全以余个人为其基础是也，并未设有代余行使职权之人。若余一旦不在，则总司令部亦即根本取消，此实应请加以注意者也。最近，余曾冒昧致书阁下，谓余之健康情形，究竟久居中国，有无损害，颇是一个疑问云云。现在，余更当敬向阁下补述者，即余近已觉察，余之健康情形，经此七月以来之繁务，实已大受损害，其势将为中国夏天完全断送。因此之故，如果总司令尚有在华多住几时之必要，对于此事，似宜加以顾及。余敬托阁下，细将上述情形奏明皇上陛下为荷。

假如和议程度，果已办到中国方面对于列强所提出之赔款数目，业已正式承认，则鄙见以为驻防军队大为减缩之时机，实已届临。至于中国方面实行支付现金赔款一层，当然万无其事。事实上所能办到者，只是抵押关税或直接付利两途而已。为保证此项问题勿受停滞起见，可以组织一个联军小队，暂驻天津、山海关以及沿着开往北京之铁路即足。余以为只要一万人数，即已十分够用。此外，再加上驻扎北京保护使馆之军队二千人左右。其在大沽及山海关方面，同时再行停泊战舰数艘。假使中国政府对内果已恢复威信，而且极愿尽力保护外侨，则除使馆区域警备队以外，其余一切军队皆可从兹撤去。

三月二十八日之日记

我们（驻日）东京代办 Wedel 伯爵，曾经向余通知，谓日皇预计，余将游日，届时彼当以上宾待余，而以著名之 Schogun 宫为余驻所。据云，外人足迹曾到该宫者，至今只有大侯爵 Heinrich 亲王，以及另一欧洲亲王两人而已。余因此事带有政治色彩之故，特向皇上奏明。其后余接皇上复谕，对于此事之裁定，现尚保留未决。

四月一日之报告

英、奥军队前来天津一事，余已于三月二十三日报告末段中奏明陛下。自彼时以后，该处德、英两国兵士，亦复常有冲突之事发生。据余所得各种报告，以及一切合法调查，皆以英国军队方面似乎负咎较多。现在双方均已设法预防此项事变再行发生。尤为可惜者，即华人方面对于此事极为注意，彼等从各次事变之中，乃推定联军之间，业

已不能一致，亟思有以利用之。此外，前此曾经报告陛下之驻津英、法兵士激烈冲突一事，亦复发现德国兵士常有数处袒护法兵方面之举，至为可惜。

李鸿章曾将中国兵队之防线形势，制成报告给余。余为审查此项报告之真伪起见，曾派开花炮火药队指挥官 Ostrowski 正军校，从天津出发，前往考查。该军校在天津西南界线以外之各城中，果然发现小队华兵。但同时却又探知彼等驻扎该处，态度确极冷静。每遇拳党出现或匪徒横行之事，则向前加以剿灭。此外，彼等对于该地牧师，亦极为相洽，而且尽力保护中国教徒，又山西边境之马将军，与天津西南之中国人，无不认为和平休战之事，已自三月中旬实现。中有一事足以表现此间情形者，即 Ostrowski 正军校曾有数次行近中国防营之时，该营兵士特为整队出迎，致其敬礼。

天津方面，英国曾组织招兵事务所一处，招募华人编入威海卫中国联队，其结果极佳。英国利用华兵之经验，似乎远较胶州方面所得之经验为佳。甚至于威海卫中国联队之一部，于占领天津之役，即已奋力与其本国同胞相战，此固为一般英国军官所同声承认者也。至于胶州方面所得经验不甚良好之故，或系由于所募本地兵士，皆是附近各乡之人，于是彼等不免常受亲戚关系之影响故也。

在各国联军之中，德国远征队最引人注目。但各国军队直至今日仅于举行阅兵之时，一见德国队伍。所以，余在三月三十日，特令全部驻京德国军队，开到该城南面皇室猎场 Haitze 之内，举行战斗实习。各国军士前往参观者甚众，尤以日本军士为最。（瓦氏三月三十日之日记有云：此间各国公使对于日本，虽不甚加以重视，但该国却值得吾人特别注意。余所能评鉴者，当然只能限于军事一面。该国军队极可令人注目，其精干之处已为此地各国人士所公认。前此占领北京一役，实全靠日军之特别努力。该军之组织与操练以及用兵之原则，皆系仿自吾人，彼等亦尝自承不讳。因彼等尚欲深造之故，特向此间吾军各面，加以根本研究。我们每军将校亦极承认日本海军之能力。该国海军在东亚方面，业已构成一个极可令人注意之要素，此乃俄国方面所最感不安者。）

四月二日之日记

余从（德使）Mumm 先生处，得悉殖民监督 Stuebel 伦敦之行，所谋已遭失败。彼之赴英也，系欲游说英国赞成加增中国关税。但此事完全未达目的。英国拒绝此事之原因，当然系增税结果，外国商人至少必须担负一半，而各国对华商业又实以英国为最大。

四月四日之日记

余曾访晤（英使）Satow 先生甚久，彼深以至今未能得悉彼之本国政府究竟对华要求赔款若干为叹。彼向政府请示，现在已有三星期之久矣云云。但此项问题，固非数星期以来始有之事，乃系三个月以前即有之事。此外，余在谈话中间，亦复觉察和议之迁延，实系英国首负其咎。究竟英国何以如此，余当然莫明其妙。余极劝 Satow 先生，尽力从速议结和约。

四月六日之日记

因应外交团之申请，余特于今日召集联军各司令会议，条陈实行和约八、九两款之法。该两款条文所规定者，系关于北京到海之交通安全，以及折毁大沽炮台与一切有碍京海交通之塞垒等事。此次会议时间仅历两钟之久，所有余之提案，皆一律通过，而且一如余在正月之中所草拟者。惟俄国代表 Wojak 将军声称，俄国对于此事，不愿参预，只在北京方面留驻三百兵士，以为保护使馆之用。此外，山海关方面之现有防军，照旧留守不撤而已。（美国）将军 Chaffee 则宣言，彼将于五月一日与其部下（除开留驻北京之一百五十人外）离华而去云云。余对于其余各位将军，则未尝一耗劳力，即已使其一致。换言之，法、英、日、意、德五国，共任保护铁路之责，其所需人数约在二千五百左右。其中最有趣味者，即俄、美两国完全与其他列强分道而驰（但该两国对于和约中之保护铁路一事，却又尝在赞成之列），以及法国不附俄国主张是也。若就（法国）将军 Voyron 语气而论，甚至于含有若干反对俄国之意。盖该将军曾言，法国对于此种既已着手之工作，实负有助其完成之义务云云。

四月七日之日记

余近来渐觉和议进行之迁延，英国公使实首负其咎。但余未十分确定，究竟此种迁延，系该使依照本国政府训令而为之欤？抑系该使资质迟钝，更加以官僚法吏之麻木习

气，年纪老迈之鳏夫情怀，种种弱点，致令如此欤？现在余乃大为明了，该使实奉有本国政府训令，令其故意迁延。同时，又因该使个人性质迟钝之故，恰好助成此种延宕之举。又该使对于此后和议进行，曾向其他各使提出一种说帖，其中充满不切实用之理想与颠倒错乱之见解，可谓出人意外之至。余曾命人替代（德使）Mumm 先生，草拟一篇复牒，余甚希望此项复牒，得到（英使）Sir Ernest Satow 之手。英国因仇视俄国之故，甚喜我们在此充当彼之盟国。以是之故，彼亦甚愿承认余为统帅。我们留此愈久，则英国愈为欢喜。数星期以来，尝使余特别感觉者，即英国将领对余极为殷勤侍候，并甚愿特别表示彼等隶余麾下之意，实与当初态度完全不同。但余对于英人忠实，却不如此容易相信，因余在此对于幕后情形，时尝加以注视故也。

四月八日致德国驻京公使之函

敬谢阁下见告一九〇一年四月英使 Sir Ernest Satow 递交北京外交团之说帖内容。余对此项说帖，曾有下列数点意见，兹特敬谨呈送阁下。究竟余之意见，是否应在外交团会议说帖或其他机会之时提出讨论，余敬请阁下代为审度决定。

该说帖之中，首令余注意者，即其主张今后和议，应与中国代表舒缓向前进行，而对于军事方面，则未尝顾及。余于昨日抄寄阁下之致北京外交团首席（西班牙公使 Cologan）一文，其中曾经表明，北京保定撤兵之举，以及开始运兵回国之事，或赶于六月十五日以前着手，或者展至秋间实行。如展至秋间实行，则战费势将与日俱增，自无待言。此外尚有一层危险，譬如天津事变业已昭示吾人者，即各国军队既已长期无事可作，而又互相逼处狭小区域之内是也。但危险之事尚有更重于此者，即夏季之中，联军身命与健康，行将大受迫害是也。盖炎暑之季，传染疫病之发生，极为可虑，尤其是北京方面。因该处去年曾有许多动物遗骸，死人尸首，于掩埋之时，未尝施以充足防疫方法故也。现在此种情形，如再延长下去，则虽用各种军事条例，减少一切灾害，而此刻身体尚属健全之兵士，仍将日趋损坏一途，此则余所深信不疑者。换言之，此种责任实不容易担负。至于现在中国皇室方面之有意履行条件一事，或因会议迁延而动摇，甚或列强坐视此种良机而不用，其结果对于大多数或一部分联军各国，是否有利，此则余所不能加以评判者也。要之无论如何，华人与吾人方面，盖无不深悉从五月中旬至秋季之间，不能实行大规模之作战计划。即或届时虽有若干列强自愿将其军队听候调遣（亦复无用）。又此刻局势，对于中国皇室方面或有感觉不便之处，而对于中国居民方面，则已不复再有特别压迫之感。盖彼等各种赚钱之机会，实远较太平时候为多也。

复次，余对于该说帖中，与军事有关之各点，再行详论如下：该说帖以为所有地方上之法律民政警察事宜，应以交还中国官厅为善。至于军队，则不妨续驻下去，而以执行卫戍职务为限云云。吾人若从军事论点出发，此说实无可持之理。盖军队占领外国土地之后，其地之一切民政事宜，照原则上时常落于占领军队之手。此事在一八九九年海牙条约[①]“关于陆战之法规及习惯”Sur les lois et coutumes de la guerre surterre，亦曾特别加以承认者也。至于外交方面之托辞，谓联军实际上未尝与中国开战云云，与此实无关系。盖果如此，则联军军队前此常将中国官吏之警察或行政事宜置于自己管辖之下，真可谓为奇怪已极。此外，该说帖中所述之理由，谓宜令中国官厅方面，得有机会以表示其具有治理地方之能力云云，此实由于所据前提，未尝正确之故。盖军队一日尚留此间，则暴乱分子时常受其钳制，不敢妄动。关于中国官厅愿意而且能够维持秩序之证据，实只有等待联军撤后方能表现。倘若英国公使仅系偶尔措词错误，而真意乃只在中国地方官厅应于联军司令指挥监督之下，尽量参加行政管理事务云云，则此种要求固完全与军事（机关之）意见相同。盖联军每遇各地中国官吏之留职未去者，固已早经如此实行也。

如果英国公使关于“管理北京委员会”（除开法军占领区域不计）之正式报告未尝接得，则此项报告在实际上亦本无提出之必要。据余所知，外交团与“管理北京委员会”之间，毫无关系。又因外交团希望使馆区域划出军事范围以外之故，则各使个人对于该会当亦不甚开心。

又英国公使主张，列强宜下令各位司令将领迁入露天营帐，撤出城乡云云。Sir Ernest Satow 之为此议，似乎根据英、印军队习俗。至于德军方面，以及余所素知其他欧洲各军之习俗，则系倘有城乡房舍可以驻扎，则不露宿营帐。又若兵房营舍果有设备比较完善适于军队卫生之处，则有时利用此类兵房营舍，亦并非必无之事。要之至少在德军方面，总以驻扎城乡房舍为原则。其在黄梅时节，则其他各国军队关于驻扎城乡房屋一事，亦复难以避免。

---

① 海牙条约：即《海牙公约》，亦称《海牙法规》。1899 年和 1907 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所通过的十三个公约和一些声明文件的总称。这十三个公约的名称，按照国际惯例排列的次序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限制用兵力索债公约》、《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陆战法规与惯例公约》、《陆战时中立国及其人民的权利义务公约》、《关于战争开始时敌国商船地位的公约》、《关于商船改充战舰的公约》、《敷设自动水雷公约》、《战时海军轰击公约》、《日内瓦公约诸原则适用于海战的公约》、《海战时限制行使捕获权的公约》、《关于设立国际捕获物法庭的公约》、《海战时中立国权利义务公约》。这些公约，除第十二个《关于设立国际捕获物法庭的公约》外，迄今一般仍视为有效。

四月八日之报告

余在四月三日，曾经电奏陛下，法国方面希望从速将其军队一部撤回。在直隶境内，只留殖民地军一旅，其由常备军所组成之一旅，则送回法国而去。至于启程之期，现虽似乎未定，但准备开拔之举，却已显而易见。倘若（法国）常备军一旅开走，则法军撤退保定之事，亦联带而生。法国军队之纪律，日益败坏。该军军官常以此事归咎于工作太少，给养过丰之故。其中尤以殖民地军步队为最甚。在天津华界方面，法国驻有一个大队于此，几乎每日皆有杀人及暴行之事发生，而法国军官对此，竟无可如何。昨日曾输送法国兵士一百一十人回法，皆系被处要塞监禁重刑者。又天津方面，英国军官屡被法国兵士侮辱一事，据法军长官之意，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英国军官对于法兵之致敬，不加以回答。

四月十日之日记

盗匪横行之事，将成最大祸患。其中一部分，系由中国逃兵所集成，而由美国逃兵所统率。

现在各国公使仍是缓步进行，预定明日会议一事，因（俄使）Giers 不愿在耶稣复活佳节工作之故，必须取消。

四月十三日之日记

现在各国公使毕竟探知，彼等本国政府所要求之赔款数目，但该使等对于此事，尚不能正式提出。此种背乎情理之行动，究竟有谁曾经见过？所幸此种不祥之举，其影响尚不甚大。盖华人对于赔款（内容）情形，早已探得故也。至于华人常由俄、美使馆方面探知一切会议讲座之内容，此事吾人固已早悉其详，无所用其疑惑。又赔款总额约在十五万万马克左右（约合华币七万万五千万元）。但美国方面之意，赔款总额不应超过十万万马克。闻英国方面颇欲附和其说。

四月十五日之日记

十二钟左右，余曾赴主教 Favier 及 Jarlin 早餐之请。在该处并遇见法国公使以及法国将军 Voyron、法国海军提督 Pottier、其他高级法国军官等等。法使 Pichon 曾举杯高祝吾皇健康。当余走入大厅之时，并奏 Heil dir im Siegerkranz 一曲（按，此系德国战前国歌）。此外，彼等对余亦复备极恭敬之至。法国人之在华者，既无对俄亲善之表示，亦乏（向德）报仇之倾向。但余固深知巴黎方面之政治方针，却不因此而有所变动。或者等待法国军官将在此间所得印象携带回国之后，可以逐渐促使法国政治改变方针。

Voyron 将军告余，彼对于余拟在 Huolu 地方攻击华军并将其逐过山西境界之计划，极为同意，现已转告巴黎云云。此外，彼并已决定，即或不得（巴黎方面）回示，亦当参加此项攻击之举。（按，瓦氏四月十六日之报告有云：Voyron 将军一直至于今日，时常声称，彼奉有本国政府命令，在上述地点，不得对于华人采取攻势云云。又法国公使 Pichon 曾谓此项命令之由来，系因法国议会方面，曾希望此后法国军队，若未先得议会之同意，不得再行实施攻取云云。）余对于 Voyron 将军此举，固早已料定。盖德国军队经过法国前哨之侧，往攻数月以来久与法军逼处之敌人，此实为法国军士所最难堪者也，所不愿坐视者也。假如现在法、德军队合作之举，果再成为事实，则余当不胜欢喜之至。

四月十六日之日记

除了法国军纪不振之外，美国军队纪律亦复极为败坏。据云：昨日曾有美兵两名，因其统率中国匪党行劫之故被捕，从津解往北京。当其慢车驶出天津一百基罗米突之后，该两兵偕其护兵（四人）跳下车去，潜逃无踪。所以，现在共有六匪合做抢劫生意，以代前此两匪。此事对于我们兵士，十分不好。因彼等眼中所看见之坏事太多，而且常与许多不良分子聚首。

四月二十日之报告

皇上陛下，余敬谨报告四月十七、十八日夜间之冬宫失火情形如下：

当余听见外面院内火警之际，其时余方安寝未久。余之石绵行舍前面（按，此项石绵行舍，系由德国寄华，置在北京冬宫院内，因其易于暖温之故，遂作瓦氏居所之用），站有复哨，其中一人当巡行该舍之际，忽见正房方面（指宫内房子而言）食堂旁边之厨室两个窗内，火焰向外射出。彼乃立刻警报余之两个听差，其时彼等尚未安寝，坐在自己房中。然后该哨兵又跑到军官大厅之内，传递消息。因为中国房子建筑上之关系，火势蔓延，极为迅速。在发现失火之后，为时不过数分钟，即已遍布全体草盖木架；按此项木架（凉棚），本系用以遮蔽日光张于建筑之上者也。再过数分钟之后，因为焚烧之草盖木架，向下坠落，于是所有六间正房以及石绵行舍，差不多同时陷于火焰之中。现在上面巨大横梁之仅用绳索拴在凉棚架上者，又复开始下坠。因此之故，救护此项建筑，以及其中所藏物件之举，自始即无希望。至于余个人，则于仓卒着衣之后，以及帅笏与少数衣服救出之后，必须取道余之石绵行舍窗子，以往近傍军官大厅而去。该舍房门之朝着 Schwarzhoff 将军居室者，业已不能通过。其后，该火复窜入与此正房紧接之两处厢房内面。但此后不复再为蔓延。盖因此处建筑，系用围墙圈住，幸与其他各宫屋宇完全隔断故也。余所引为欣慰得向陛下报告者，即所有各国军队，尤其是法、英、日三国，无不竭其全力速施救护。其中，更以法国军队在 Marchand 中尉细心努力指挥之下，力使火势限缩以至于扑灭，极为可以赞美。

至于余之参谋长 Schwarzhoff 陆军少将殉命一事，现在已经调查确实者，即在失火以前数分钟，彼曾离开住室，前往荷池散步。后因火焰高张之故，乃急返该处。总司令部中之三位军官，曾接连先后前往该处助彼救火，而且该三军官之中，正军校 Groeben 与 Frankenberg 两人差不多同时赶到，少校 Marschall 男爵则系随后赶来。彼等曾将危险紧迫情形，警告该参谋长，请其从速离开该屋。少校 Marschall 男爵并派遣第一东亚步兵联队第四中队兵士两名，前入该屋之内。据最后曾在 Schwarzhoff 将军旁边之兵士所言（一如今日〔二〇二号〕电报中业已上奏陛下者），即该参谋长或在横梁下坠塞闭房门之时，尚到彼之写字台前。因其久居火焰烟气充满之室内，于是倒地不省人事。其时，大家虽然立即觉有所失，但救济之举，在当时情境之下，实已无能为力。彼之尸首为火所焚，直至于不复认识辩别，系于四月十八晨早寻出。彼之暂时埋葬事宜，一与从前对于（已故）上校 Yorck 伯爵所举行者相同。今日午前十钟，在全体外交团

以及各国军队将校吊唁之下，并有许多军官以及此地天主教要人之伴送。从举行丧仪之地，以至千福庙（?），各国军队两旁排队致敬。Schwarzhoff 将军系暂厝于该庙之中，一如当时 Yorck 伯爵。（按，瓦氏四月十八日之日记有云：彼〔指 Schwarzhoff 而言〕之死去，使余受一最大打击。因彼乃系一位最有价值、为余素所尊敬之僚属，以及极为超群之参谋长。彼具有非常之智慧，又复富于办事经验与世界智识。此外，更能熟操法、英、意三国语言。换言之，彼真可谓作余在此地最为需用之参谋长也。）

其间，余认为侥幸者（计有二事）：一为此次失火之时间，幸未向后展迟一二钟头（以至夜阑人静之时）；二为余之参谋次长陆军少将 Gayl 男爵，陛下之传令使 Boehu 中尉与 Lauenstein 少校，均在保定之南参加攻取 Huolu 关口之役，此事已于最近报告之中恭奏陛下。此三人者，本与余之副官 Wilbery 正军校、退职排长 Rauch，以及余之个人，同罹火灾之危者也。现在幸因出差之故，得免于难。否则，此次被其牺牲者，或当不止余之参谋长一人已也。

陆军少将 Gayl 男爵，因受余之电召，已于今午到此。

关于失火原因一事，余曾立刻命人仔细考查。现在业已调查明白，而且华人方面并无恶意放火之嫌疑。至于失火之原因，当系由于铁炉之火，延烧壁上之木皮纸面所致。该炉系在正房方面食堂旁边厨室之中，立于壁前，而且因为保护该壁之故，从前曾于炉与壁之间，隔以石绵一大片。现在冬宫主要部分，虽然被焚，而余之大本营，尚可设置于此（不必搬出）。

四月十八日之日记（此系后来补记者）

余之衣服，在火灾之后，初极不备，其后到了 Evxhaven（德国汉堡附近之港口），更是完全破坏。当火灾之后，余之换洗衣服，系得之于正军校 Blottnitz 以及司令部几位军官，军帽系得之于司令部卫兵，军衣系得之于骑兵，靴子系得之于高等军法审判官 Gelpcke，裤子系得之于司令部骑卫，腿套系得之于（德使）Mumm 先生，军刀（系在德国制造之中国式军刀）系得之于萨克逊[①]邦步兵军官，军刀之革带等等则得之于 Stuart 将军。余令 Rengal 矛骑联队裁缝 Buddah，采用英国材料，新制一套极为讲究之

① 萨克逊：又译萨克森、撒克逊（英语 Saxon；德语 Sachsen），原属日耳曼蛮族，早期分布于今德国境内的尼德萨克森（Niedersachsen）地方。公元5世纪中期，大批日耳曼人经由北欧进入大不列颠群岛，包括盎格鲁人（Angles）、萨克森人、朱特人（Jutes），经过长期的混居，逐渐形成今英格兰人的祖先。

深褐色衣服，又向中国鞋匠定制高靴。

四月十九日之日记

攻取 Huolu 一事，现正全力进行。李（鸿章）、庆（亲王）二人竭力请余下令停止。盖因刘将军前此虽不奉行北京方面之命令，但现在已由西安方面令彼立刻退后。余乃命人答复李氏，假如刘氏自愿退后，则彼当然不会遭遇意外之事，但联军方面却无论如何，必须进至城墙之下。

外交团方面，对于余所条陈之警卫事宜、铁路占领等等，以及过渡期间只留一万二千人驻华之事，终竟加以采纳。现在所欲闻知者，即各国政府对此当作何语。

余对于我们此次火灾之事，尚未完全去怀。盖此次火灾之印象与结果，常使思想受其影响，对于中国事件之趣味，大为减少。此外，余对于各国政府以及此间几位公使之无聊情形，渐渐十分厌恶。更加以余对于此间事件，不能出来干预。所有对华全部问题，其关于政治方面者，余固久已认为完全弄错，而且同此思想之人，当不止余一人已也。

四月二十三日之日记

余接到许多来电，其中对于 Schwarzhoff 将军之死，以及余之侥幸得救，颇致其同情之意。计所收到者为 Lord Roberts，Lord Lansdowne，以及印度部长 Lord Hamilton。此类慰电颇令人感动，但（此种纸上人情）亦未免过于便宜。至于彼等友爱之谊，余固未尝因此而相信。

四月二十五日之日记

因相隔甚远，以及一部分不通电报之故，所有山西边境消息，到此甚为缓慢。现在业经证明者，即德国四个纵队，已于二十三日行抵城墙之下。其间，虽与华人方面接火数次，但彼等未曾加以严重抵抗。至于法军方面，对于此役，本不欲用全力为之，故其进行似乎甚为谨慎从事。（法国）将军 Voyron 今日告余云，现在彼欲将其军队，直从

该处撤回，然后一直至于定县（?）（约在保定南面一日之程），完全撤退，听华人前往占领云云。如此一来，则此次之役，除了一点精神上的胜利以外，实无何等重要意义。余对此事可谓无能为力。盖 Voyron（将军）可以自行其是，（无法制止）故也。但就此事之本身而论，亦并非十分不幸之举。盖吾人终有一日须将占领之地，仍行放弃故也。余甚希望其程度业已到了如此之远。

四月二十六日之日记

所有各国军队，对于和议进行之迁延，无不愤懑日增。在各国利害关系如此悬殊之下，必需许多时间，加以商议，固为当然之事。此外，偶有一二国家，故意摆布种种难关，亦系或有之事。但此间（各使）工作竟有如此之慢，则真是完全出人意料之外。一部分责任，应由西班牙公使 Cologan 先生担负，因彼为外交团领袖，决定开议日期，行使主席职权故也。彼未尝具有一点威望。彼之同事（各使），时常向彼讥侮。迨至和议事毕之后，彼之（公使）位置，即将取消，盖西班牙（政府）现有废去（驻华）使馆之聪慧念头故也。因此之故，对于 Cologan 先生，实不胜愉快之至，倘和议结束之事，若能往后再为拖延。

四月二十七日之日记

倘法国方面对于华人，果欲待以友谊，则其原因必系由于俄国方面之影响。但英、日两国亦复无意再有何等（军事）动作。大家皆将撤退直隶之事，放在眼中，着手准备一切，但彼此均互不相信。在此种情形之下，以扮演统帅一角，并非十分开心之事。

五月三日之日记

余所拟要求赔款问题应与支付方法问题分开办理之条陈，未蒙柏林方面之赞成。现在战争费用，当然与日俱增，愈为向后拖延，则愈使中国难于支付。如果柏林方面相信，所有此次远征费用，皆可全由中国赔付，则实为一种错误之见。

五月五日之日记

余曾屡言夏季之来，将带许多病症而至云云，但此语却未被人加以注意。现在如不从速结束，则我们势将塞满此间坟园墓地，更将输许多废兵回国。而其所以致此之原因，则无非由于外交界方面之不幸争执而已。

此后恐已不复再有较大军事行动，此间现已渐渐成为一种驻防生活之情形。北京方面为各种游历者所充塞，每个军官当然皆欲一到此间看看。所有物价渐趋昂贵，许多商店因此赚钱不少。（按，瓦氏原注：依照我们见解，此间土产物品之价值，仍极便宜。一只肥羊，只值五个马克〔约合华币二元五角〕；一只野鸡，只值五十非里徐〔约合华币二角五分〕；一只鸭子，只值三十非里徐；十五个蛋，只值二十非里徐。）所有工资，较之寻常，至少增涨三倍。因为对于苦力，亦算是一种好日子。更加以联军对于中国，未尝责以供给，所有百物，均系给现购买，而且按照甚高之价付给。因此之故，此间现驻联军六万，对于本地居民，实际上殊无痛苦可言，其中许多居民，生涯之善更往往胜于平时。

八国共同作战之事，本系一种幻想。而此种实情未被（中国）群众完全看破，以及联军各国之间未尝公开冲突，此则不能不算为余之小小功劳。

五月六日之日记

美军已于昨日开始撤退。至于法军方面，则尚未完全定夺。但余决不疑惑（法国）将军 Voyron 将于五个星期之内，装运九千军队而去，因彼曾经向余如此通知故也。假若俄、法、美三国皆相信，无须大军驻此，亦可获得赔款到手，则我们又何尝不可如此相信？现在，我们似乎成为一种担任强制执行之人，此事余深引为不甚光荣者也。此外，尚有一事可以认为满意者，即现有几位外交人员对于余之意见，开始加以附和。

五月十日之日记

在法国军官之中，对于本国政府严禁攻击山西境上中国军队一事，极不满意。此种情形之所以发生，实为最易明了之事，盖彼等现在必须袖手静视我们如何活动进行故也。余相信（巴黎）后幕之中，实有俄国阴谋在内。俄国方面明知我们与法军之间，在此极为相洽；假如（德、法）共同作战胜利，则当然更使两军现有友谊愈为进步，或者甚至于法国国内亦难免不受影响。

我们陆军部中，现在亦复着手研究撤兵问题。当远征队（从国内）出发之时，（部中）对于用钱一事，未尝加以丝毫限制。而现在则主张万事皆宜从俭，尤其是不欲多赁船只。换言之，我们务将每只运兵船上塞到不可再塞。此事对于兵众方面，当感无限痛苦，尤其是在此不良季候之时。

余对于总司令部之回航一事，拟用医舰 Gera，而且已于四个星期之前通知柏林。现在陆军部方面来电，谓 Gera 舰上可以附载一千二百人，若余独自占有该舰，则将多增一百万（马克）支出云云。余当即回复一电，略谓余甚愿意附载三百养病之人，因彼等不能利用军队运输舰装运故也。但（部中）却不能强余乘坐运输军队船只，以作旅行。此外，余并请转求皇上，定夺此事。

五月十二日之日记

昨日（英国）上校 Grierson 曾来余处报告，谓英国公使曾接 Lord Lansdowne 来电，其中对于撤兵一事，英国可以同意，只要中国承认列强所提赔款总数云云。换言之，英国方面对于余之提议，业已采纳。但余对于该上校，却有缄默不肯明言者一事，即柏林方面之想法完全不同，尚欲要求中国提出保证是也。假如英国方面对于撤兵一事，果已决意实行，则余相信柏林方面终当让步。此种永久飘摇不定之局面，逐渐发生不便。因为政治方面完全错误，以及各国政府毫无气力之故，究竟何时结束，真是不能预料。尤其是未有一人对于中国皇室方面情势，稍稍懂得一点。现在每刻之中，皆可以发生出人意外之事。

顷得消息，华人方面业已承认赔款总额四万万五千万两。换言之，即是十三万万五

千万马克。现在总算是向前进了一步。

昨晚，（法国）将军 Voyron 及公使 Pichon，曾设一个规模宏大、结果甚佳之宴会。而且该项宴会系设在大理石桥西边皇宫内面一座庙子之中，其中一切房舍尚系完全整好，所有（各国）公使、将军、高级军官，皆在被邀之列。其间令余惊讶者，即庆亲王、李鸿章二人亦在座中。彼二人随带侍从甚多，当开宴之际，该侍从人等皆在彼等主人背后，或站立，或坐在地下，大部分皆在抽烟。所有法国人士皆极亲切可爱。其余在座诸人，亦无不如此。法国中尉 Marchand 系为此次宴会之提调。其中一切安排，确是极为精当。至于座次问题之支配，其情形如下：余伴领（法使）Pichon 夫人并坐在伊之右旁，庆亲王则坐在伊之左旁。该亲王对此极为满意，因华俗尚左[①]故也。（法国）将军 Voyron 朗诵席间祝词，对于华人备极侮辱诽谤之至。其中念到“可恶可畏之犯罪行为”Crime abominable 一语，更以扬厉之音出之。其后，庆亲王以华语作答，但并未加以翻译。李鸿章一点也不吃，惟大抽其烟不已。庆、李二人对于此次设宴地点，原来不知，当其被人抬到庙内之时，乃大惊不已。盖该庙为上行皇帝举行丧礼之所，视为特别神圣者也。应用此地以作跳舞宴会之所，并请中国大臣列席，在实际上真可称为一种暴行，本应加以避免者也。（按，瓦氏五月十三日之日记有云：余曾在暗中探知，究竟庆亲王、李鸿章二人对于此次庙内设宴之观感如何。彼二人在实际上对此极为愤怒，但以其为真正华人（天性关系）之故，旋即想开（不复介意）。彼等以为，“欧洲人可谓蠢到极点，竟不知此庙系何等神圣之地。我们对于欧人此种不可思议之愚昧，应该加以原谅”云云。）

五月十三日之日记

专门家如 Robert Hart（总税务司赫德）之类，皆以为假如列强之间，对于中国支付赔款方法，业已归于一致，则和约不久即可成功云云。换言之，即系余自四个月以来时常不倦言之者，困难之点并非出自华人，乃系由于列强自作是也。余之所以不断的催促进行者，诚以现在中国皇室方面趋向和平之空气，恐有一旦归于消灭之虞，其结果我们不免竟将恰好时机错过。近来拳党忽又猖獗起来一事，或者更足以证明吾言不虚。

---

① 华俗尚左：中国自先秦至明清，大多时候以左为尊贵。《老子》三十一章有言：“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礼记·檀弓篇》记孔子有姐之丧，郑注云：“丧尚右，右，阴也；吉尚左，左，阳也。”

(德使) Mumm 先生近来十分引为不幸者，即各国公使对于支付赔款方法，尚未接有一定训令。但是此项问题何以不于正月初旬之时，即行加以努力讨论？现在大家均不欲担负其咎。此种列强合奏大会之可悲现象，实可谓自古及今未有过于此者。假如我们只是能得一个相当下场（即可算是如天之福）。我们在此实已无可希冀，但是对于我们极为不便之纷乱，却可一朝成立。又保定之南，曾有数千拳党，竟将派往该处之中国官军击败。法国军队现方设法援助此项中国官军。现在，余已居然自认为攻打拳党之中国官军统帅矣！

五月十六日之日记

昨日皇上拍来一电，使余不胜欣喜。盖因该电之内，皇上对于余所条陈之减缩远征队一事，加以认可故也。但愿上帝保佑，此种决议不再变更。余之为此条陈也，曾经详细思维，并自知所负责任之重。现驻直隶之六万人，实无异一个警察大队，但为华人执行宪兵职务而已。我们国内之人，当然以为此项军队，应该留驻中国，以便对于中国政府实施压迫，但却不思此项压迫究竟如何实施。中国皇室现住距离此地一千基罗米突之远，假如我们再向该处前进，则该皇室只须再往内面避走而已。但此种前进之事，实际上绝对不能实行，因为大多数联军国家，无论如何不愿共同行动故也。于是，余之手中只有八九千德人，或再加上二千意人而已。此外，俄、美两国，或者尚有抗议提出。于是，联军之间不免互相争论起来，此固为华人方面时常希冀者。即就军事方面而论，此种攻取行动，仅以如此微少之兵力为之，亦系毫无意识之举。盖因攻击目标，距离太远故也。

至于直隶方面，并无何种（攻击）目标能因其陷落之故，足使华人大感不便者。其实，我们现在全为将到眼前之不良季候所束缚，不能行动自由。现在，天气业已开始炎热，不久更将继长增高，以至于军事行动，大感不便。此外，再过四个星期之后，行将大落其雨，所有半个直隶，皆将变成沼泽。此种情形，至少当延到九月初旬方止。我们届时果应再行采取攻势吗？有谁愿与我们合作呢？此项攻势之目标，究竟应在何处？战争费用，与日俱增，究竟谁人担负？我们在此，已无可为，离开此地，愈速愈妙。余不能在笔墨之上尽情吐露，到处传播（我们国内）政策之紊乱，当局之特别，余最好是（师学金人），三缄其口。

十三日，余在（德使）Mumm 先生之处。彼为（美国）将军 Chaffee 饯行。因此之故，列席诸客全是美人。该将军为余在华所识之勇敢男儿。是日，彼曾发言，对于彼与

余之关系情形，每以极为详恳亲切之语出之。最后，所有在座美人，皆一致请余，无论如何，必须取道美国 San Franzisko 而归。彼等更言，余只须行抵该处而已，其余一切，自有彼等办理，可以不管，惟举行凯旋典礼一事，则余必须准备参与，不得辞□。此外，彼等对于此种旅行在政治上之重要意义，曾加以郑重讨论。并谓自古巴战争仇视德国以来之彼此隔阂情形，皆可因此旅行而扫去云云。余当时颇为彼等之言所感动，但余却自思，最好仍是取道原路而归。所谓凯旋典礼，对于美国人当然是一场娱乐，对于新闻家当然是一场忙碌，对于我个人却是一场痛苦。最后，余尚须前赴各城勾留，以便喜看热闹之人前来参观。余对此只好衷心感谢。余现在只有一个希望，即是从速到家而已。但余心中不胜欣喜者，即余在此地，能与美国人士欢然相别（未尝凶终隙末）。至于余与法人方面之相洽情形，亦可谓与此相似。（法国）将军 Voyron 因将启行赴津，曾来余处辞行，并向余云，彼将来极愿时常回思与余共事之日。此外，对于余之时以优礼相待，更为感激不已。尤有令彼十分满意者，即关于评论此间时局一事，彼常与余之意见相同云云。此语可谓一点不虚。又余从毫无关系之第三者方面闻知，此间英人对余亦极满意，彼等在余统率之下，甚觉十分愉适云云。至于日人方面，则余知之甚确，即彼等对余之明白赞扬日军材能一事，极为欣慰不已。尤其是余对日军常以平等资格相待之举，最令彼等满意。

一切情形，皆甚美满。余之心中，亦极欣慰。虽然如此，但余却相信，总司令部解散之期，实已到临，不可再缓。倘若余在此间之重要位置，必须听其自行毁腐，此实对于一般利益不能无损者。

近来英、美两国军官，彼此甚趋接近亲密。此事无论如何，当系由于本国政府之训令使然。最初之时，此间英国人士对于美军态度，本不甚表同情，而现在英人则又主张彼等乃系同种，而且因利害相同之故，实应互相倚助云云。假如英国在南非方面，军事不曾如彼失败，则彼或当不至如此讲美国友谊。

五月十八日之日记

昨晚，余赴（德使）Mumm 之宴。盖是日各国公使因与法国公使饯行，皆在该处聚会故也。当（法使）Pichon 举杯敬致谢辞之际，曾以极为亲热之语，提及余之个人以及德国军队。法使此举之最足令人注意者，即当着各国公使以及俄使在场，而为此言也。余对于 Pichon 之去，不胜惋惜之至。彼在此地，常与 Mumm 合作，而且时常联成共同战线，以抗俄、美两国。余相信 Pichon 对于法国几种政策，皆不赞成，甚希望对

德保有永久和平关系。

五月十九日之日记

赎身之期，毕竟逐渐接近！自余与皇上（彼现在 Urville）及伯爵 Schlieffen 屡通电报之后，于是皇上现乃告余，彼已发出命令，租雇运兵回国船只。而且对于余所条陈之驻防旅队组织办法，业已采纳。此项命令，八日之后，即可办好。此外，铁甲舰队并将同时召回云云。由此可以看出，皇上对于此种不良局面，已有加以结束之心。至于总司令部，现在当然应在解散之列。余所希望者，只是不要再行将余紧留此间，以待北京撤兵结束之后。

（德使）Mumm 对于柏林方面拍来一电，殊感不乐。盖该电内容系令该使加倍催促和议进行云云，却不一思该使究竟何从着手。此时过错，乃系全在各国政府，对于支付赔款方法，不能一致之故。至于 Mumm 在此作事，实无时不在勤奋之中，并时常皆愿和议进步。

五月二十日之报告

余于本月十四、十五两日，曾经前往检阅德国第二步兵旅，以及该旅所属他种武装。余系于十四日早晨乘坐法国专车，前赴保定。（法国）将军 Bailloud 与其参谋人员，皆在该处参预正式欢迎之举。此外，本城以及邻县之（中国）官吏，亦皆来此祝贺，并献余东洋习俗流行之礼物，以及旗伞五十左右。伞上并书有对余赞美之词，感谢余之已往保护，以及请求余之继续保护云云。余并于即日前往审视卫戍方面之一切设备。计已检阅者，为战地医院、骑兵营盘（系在城之东北）、炮队营盘及兵房。此外，更与 Bailloud 将军，交相拜访一次。该将军对于彼之本国政府所下法军不得攻击华人之训令，认为极不适当，颇露怏怏不乐之意。此种（袖手旁观之）可怜态度，对于敢作敢为不安于逸之该将军，实属难堪已极。其中，尤以最近几次城下之战为甚。盖其时彼虽手持军器，立于战场之旁，却不能上前接战故也。该将军之意，以为倘若法国军队当初采取严厉手段，则保定南部之拳党活动，早已压迫下去，并可使山西中国官军，得一较深之印象云云。又该将军颇疑彼之本国政府出此态度，系受俄国方面之影响。不过，该将军对

此事，措辞稍稍谨慎，但令人领会其意而已。若据余之个人观察经验，则甚觉该将军所料，可谓完全不错。

五月二十日之日记

余曾到火车站，为（法使）Pichon 全家送行。在该处之时，余得与（英使）Ernest Satow 晤谈。彼谓余曰，彼相信和议之事，至迟六月底间，可以结束云云。此语真使余不胜惊讶之至。其后余乃闻知，彼之本国政府现已促彼从速进行云云。又（英国）将军 Gaselee 曾将彼之本国政府来电示余，该电之内，彼曾被其政府咨询，究竟余（瓦氏自称）之方面，是否认为开始撤兵之时机，现在业已到临。英国方面不欲单独行动，愿与我们同其步骤。

各位公使先生看见北京撤兵之期日益逼近，不胜恐惧之至。因为对于彼等，现在又将另辟一个时代。彼等从此又将缩居污浊使馆区域之内。其中虽有二千军队与彼等共同居住，但彼等之生活情形，却很难因此增色。不过，就余个人之意而论，则以为各位（公使）先生如能提前三个月，即过此种生活，实远胜于数百勇敢兵士在此死亡，以及常罹疾病。

五月二十一日之日记

今日，Dschofu（周馥?）曾来余处要求数事，余已允许几件。彼系一位识见通达之人，在（中国）议和代表中，为余最喜悦者。

五月二十二日之日记

关于总司令部解散一事，柏林方面仍无丝毫动静，或者现正与其他列强商议此事，亦未可知。但余之意，总疑当局对于此事，未能毅然有所决定。

外交家之两副舌头，今日余又领教一次。某国（余在此处，不愿直指其名）曾向柏林方面通知，彼对于四万万五千万两之（赔款）要求，完全同意云云；但同时却又令彼

之此地公使，设法再将此数大为减少！

五月二十三日之日记

假如余果相信，留驻此间，实为必要，则余甚愿将余所有最后一点精力，为之牺牲不辞。但余既已深悉，外交方面若稍有一点力量与先知，和议之事固早已结束，则今日余之留此（乃系被人牵累所致），实无快乐之可言。现在世界缺少一位俾士马克，倘若他还活着，则此间局面，当与今日大不相同。

五月二十五日之日记

皇上今日电余，谓彼已下令撤回铁甲舰队云云。此项撤回之议，余最近亦已表示同意。至于撤回之真因，余将于以后再谈。数月以来，国内某某数方面，即已不断设法运动，速将舰队撤回。一部分系由于个人关系，一部分则由于其他微小顾忌。究竟舰队一物，此地是否需用，则先生们殊无暇过问，不以为意。至于皇上个人，则始终主张，究竟撤回之期是否已到，须听余一人决定云云。（按，五月十一日德皇曾从 Strassburg 电告瓦氏云：春初所计划之御前秋操，将在 Danzig 举行。并以大批军舰共同动作，如登岸演习军队操练之类。铁甲舰队必须加入其中。俄皇对于舰队演习一事，已拟届时列席参观。铁甲舰队必须于本月之中或本月底间航回（德国），阁下能否放回该项舰队？舰队训练一事，因此地种种意外之事以及船只缺乏之故，直至今日未能实行。假如战舰最后不能重行联合起来，则秋操之举行，将陷于危险云云。此即上文所谓撤回之真因是也。）

数日以来，屡与柏林电商留驻此间军队之组织问题。对于运兵回国之事，亦已讨论及之。余竭力避居旁边，（不愿多所主张，）只是保持总司令地位所应有之论点而已。至于其余一切细目，皆系德国远征队司令（Lessel）之事。此外，余对于该司令之（繁难）责任，真是不敢加以羡妒。在两万人之中，只有三千人自愿留此。我们对于兵士此种态度，实不应加以非难，纵然我们给饷丰厚，亦无责备彼等之理。

五月二十六日之日记

倘若有人曾相信，此后已无意外奇妙之事再行发生者，则此人现在必当增长一些见识。外交团在昨日一天之中，竟开了三次会议！盖彼等曾奉本国政府命令，赶快进行。究竟从前那种长期拖延，乃是完全出于必要吗？此次和议情形，实为外交无能、政治短见之一种可悲现象，可以传诸百世而不朽者也。

五月二十七日之报告

假如中国首都尚在联军重兵占领之下，则中国皇室回京之事，余以为绝对不能实现。但是，中国皇室如一日不到北京，则该皇室一日立于各种（排外徒党）势力之下，为我们在此无从加以监督者。而且据余之意，可以令人信任几分之中国实际政府，因此亦复一日不能成立。以是之故，余相信撤兵北京一事，可以促进皇室回銮之举，对于中国局势之安定，当有极良影响。至于中国皇室对于具有重大国际兵力之外交团势力，当然不能完全逃避摆脱。

五月二十七日之日记

余在昨日深晚之时，从（德使）Mumm 处闻知，皇上业已通告联军各国云，彼因现在已无重大军事行动之故，认为召还总司令之时机，业已到临云云。

余已将铁甲舰队解（去驻防之）职，定于三十一日由吴淞启程（回国）。

五月二十九日之日记

自从二十六日晚间，（德使）Mumm 先生见告撤回总司令部之事以后，余对于此事，遂不复再有所闻，此实令余殊感不快。盖余必须先奉归国命令，然后始能预备行装

故也。自昨日上午以来，路透电乃证明撤回之举，确系事实！

五月三十日之日记

撤兵之事，现已决定，而且本来亦已动手实行。此事竟能在偿付赔款方法尚未解决之前，先行办理，实可称为余之胜利，以及战败外交人员。（德国）国务总理对于此事，亦不得不俯首相从。余相信当有许多人士对余致其感谢，盖此种甚难解决之问题，若待其最后决定，（至少）需时数月也。

五月三十一日之日记

关于余之行止问题，今日仍在不可捉摸之中。余曾接到柏林私人电报，述及余之召还事件，又报纸电报，亦曾报告此事。此外，驻京各使亦皆知有其事。惟柏林官界，竟无一处觉得（此事确有）对余通知（之必要）。如果国内之人真相信，余只须往乘火车向上一登而已，则又足以证明我们国内对于此间情况之如何隔阂。

关于偿付赔款方法之讨论，仍是继续缓缓而行。更因天气大热之故，进行益为缓慢。盖所有与会之人，皆少工作兴趣故也。俄、美两国公使，已偕其家属搬到山上赁庙居住，彼等甚不喜欢，时常必须跑回北京参与会议。

顷间以前，（德使）Mumm 曾经电余云，彼已奉到国务总理命令，令其通知中国政府，现余已被（本国政府）召还云云。因此，余之职务算是从此终结。但余在未奉皇上命令之前，却不能径行启程。

六月一日之报告

皇上陛下，现在余既已奉到陛下停止总司令部职务之令，兹特冒昧将余驻华九月所得之印象，敬谨陈奏如下：

现在中国皇室方面，主张从速议结和约立志改造中国以谋救治之人，似乎渐占优势。联军所提和约条件之轻微，当然愈使此派张目。此外，中国从前曾有利用联军彼此

原有的龃龉以及屡次表现的冲突，再将和议条件减轻之希望，现在业已不再作此妄想。至于中国方面可以偿付列强所提赔款数目，而且不至因此陷于精疲力尽之途，此则为余所深信不疑者。

至于中国与列强之关系，则余相信俄罗斯一国将被中国视作最为危险之敌人，虽李鸿章个人似乎曾受俄国之贿，常以中、俄两国合作为言，但此间人士之对俄态度，却正在变化之中。满洲占领一事，在一般具有远识之华人看来，皆认为将来不免渐由占领变成合并，此事将使本朝皇室陷于极险之境。盖该皇室之威信，经过此次拳变之后，固早已大受影响故也。满洲为本朝发祥之地，其祖先陵墓亦在奉天。自明朝倾覆以后，满人即行入主中国。假如满洲终于完全丧失，则本朝前途命运，势将成为疑问。现在，中国许多地方已有汉人自立朝代之宣传。北京与满洲边界相距，只有一百五十基罗米突之遥；倘若北京直接常受俄国压迫之危，则其首都地位，势难支持下去。现在（华人方面）甚希望一种日、英同盟，对于（俄人）完全合并满洲一事，能加以防阻。其在日本方面，近亦渐渐相信，与华和平合作，可达到福利之途。至于美国方面，则只希望对华商业发达，以使彼之工业得到巨大销场，并常特别努力运动和议条件减轻，以开两国亲善之端。

英、法两国自一八六一年战争以来，在东亚方面所取得之重要地位，因受去年事变之影响，不免大为摇动。至于该两国驻直军队之未作有力行动，其在英国方面，则令人想见其军力之薄弱；其在法国方面，则归根于俄国之影响。

当英、法威信向下坠落之时，而德国之声望则却特别上升。对于东方人，只有强大势力，以及具有应用此项势力之决心，始足引起彼等注意。（德国在华）陆海军力之扩张，而且训练之佳，常为联军各国兵队所承认。更加以（德国）战斗舰停泊南京之前。德国军队虽在严冬亦复不断努力，无论对待拳党、官兵，皆以严厉手段行之。德国骑兵之发现于蒙古，深入于山西，以及如有必要之时，尚将向着山西方面大取势攻，或者竟直越过山西，再行攻入（他省），以上种种，皆使华人得着一种深刻印象。倘若余谓，在各国军队之中，常使华人引为忧惧者，当推德国远征队云云，实非过甚之言。而且余更确信不疑者，即此种印象当不易于转瞬忘去。究竟我们如何利用此种机会，以使我们对于铁路、矿山让与及商业优先利益之希望，得以实现满足，此则非余职责之内所应加以主张判断者也。但余相信可以直言者，即经陛下主张遣送海陆军队，以及议设（联军）总司令一职而由德国将领担任之后，德国东亚方面之势力，大为增涨（编者按，即“增长”）。因而德国商人及工业家发展企业之欲望，亦复同时并肩而进。

在直隶方面，耶稣新教牧师之活动，系最近数十年来之事；而天主教牧师在此工作，则已有数百年之久。因此之故，此地教徒当然以属于天主教会方面者为多。其结

果，余对于中国教徒及教会牧师，如有保护加惠之举，大抵皆落在天主教徒身上。天主教主教对于此事，向余极为感谢，而且公然向余表示，彼等对于法国军队之帮助不力，至为失望云云。余从主教 Favier 谈话中间察知，（罗马）神圣教皇对于此种情形，亦已得悉。余希望天主教会方面，当从此次情形得知，陛下凡是关于保护教徒之举，固不问其属于何种教派，而一视同仁也。

六月二日之报告

据此间所表现之各种征候看来，中国皇室回京之事，似已决定，并已定在九月。至于回銮之先决条件，若照中国人民意见，则为联军本部必须先行撤退北京。倘若中国皇帝此时实行回銮，无异立于外国军队保护之下。则据华人意思，彼将从此“丧失脸面”。换言之，永远不足有为。（此外）余更有确信不疑者，即中国方面必定还要设法要求减少留卫使馆之军队人数。但余却深知，假如我们坚持不让，则中国皇帝亦将知其无可挽回，安然下去。又因使馆区域并不甚大之故，彼在实际上对于外国军队之行动，亦复无从知之。至于中国皇帝回京一事，余亦认为必要。盖直隶省内至今尚未全熄之拳民骚动，彼当可加以最后肃清故也。

余从可靠方面闻得，俄国占领满洲一事，曾遇不少困难。该地居民本来即不驯静，远较其他纯粹汉人居民为勇迈。更因俄人之暴虐残忍行动，达于极点，以致该地居民深受刺激，极为不安。常有武装完备之骑兵数百成群，袭击俄军，使其坐卧不宁。

六月五日至八日之日记（时在 Hertha 舰上，由大沽到 Kobe 之途中）

关于余之召还一事，在柏林方面似曾犹豫不定。国务总理致与（驻京德国）公使之电，其后继以陆军总长、参谋总长之电，皆曾言及总司令部解散与其归国之事。此外，（奥国）皇帝 Franz Joseph 更有一个极为亲切之电报，足以证实果有其事。又大部分驻京各国公使及各国军队司令，亦无不知有其事。只是皇上始终未有命令给余。至于拍与（德使）Mumm 之电，其用意所在，无非使余不能由此得有把握，以定一切行动。二日晚间，（参谋总长）Schlieffen 伯爵，乃来一电，谓皇上因余熟识（此间）情形之故，关

于启程日期，由余自定云云。余于三日前往天津，四日复在该处，接得皇上一电，其内容与上述电文相同。余固深知，余之卸去帅职以及启程离华，乃系一种重要行动，而且担负一种巨大责任。但余对于一切，皆会静自思量，仍照原来主意，决定离华而去。余与各国军队，皆以书面作别。此外，更电告俄皇、奥皇、日皇、英王、意王，陈报余之卸去帅职事件。当拍寄维也纳之电尚未发出以前，奥皇 Franz Joseph 已来一个极为亲切之电报，对于余之照料奥军一事，致其谢意。

此次余对于余之隆高地位，不但自始至终保持不坠，而且尚有两点，特别使其提高：一为外交团方面，初时对余尚不愿俯首相从者，最后无不受余势力所支配；二为华人对余，不但是畏敬无已，而且是乐与接洽。换言之，余之应付一切，当系恰到好处无疑。至于华人之天性及教育，皆极重礼貌，对于形式上最为讲究；但其为人虚伪欺谎，夜郎自大，如果别人不加干涉，听其为之，盖彼等只是服从势力而已。余之对待彼等，极为礼貌，备为尊敬（如优礼接待、军队致敬、遣兵护送之类）。对于私人有所请求，亦常满口承应为之；惟在公事之上，则极为严厉，有时竟至残酷而不辞。余固深知，彼等实际上虽然不能爱余，但现在对余之去，却亦非所乐视。

其在军事方面，本有一些暗礁当途，但余幸而从旁通过。直至临别之时，未有何等恼怒，未受何等打击。尤其令余十分满意者，即在德、法两国军队之间，余曾辟立一个亲善基础。即就（法国）将军 Voyron 个人而论，彼虽对于 Sedan 一役所受伤痕以及身为俘虏之事，尚未完全去怀，而且极喜自行己意，但其后对于余之声威地位，终竟承认，并且逐渐与余相亲相信。到了最后临别之时，更是亲热无已。至于 de Grandprey 与 Marchand 两位（法国）中尉，在北京之时与余来往甚密。当余启程前一日，来相作别，最为动情。Grandprey 曾向余云：“贵国皇帝遣君来此，可谓‘善于选材’Coup demaître。所有此间法国军士，皆以受君指挥作战为荣。对君之尊敬，实是与日俱增。我们对于君之相待以诚，十分感激。君在我们兵士脸上，当亦可以看出彼等如何爱君云云。”Marchand 则谓余曰：“君或尚不自知，究竟君与我们在此，成就了一些什么；君已将一切现尚根深蒂固之成见与恶感，完全扫除。君所架设之桥梁，实为一切头脑清楚之法人所愿走。余相信（此次）中国（一役），实可以看作我们两国关系之一个新段落。其所以能够致此者，实君一人之力也云云。”余固深知，此间德、法两军之亲善关系，实际上并不能影响法国政治方针，只须巴黎方面随便一点机会，即可立使报仇呼声依然四起。不过，余却相信，此间共同生活一番，毫不发生一点良好效果，亦恐系必无之事。

至于余与英人亦复甚为相洽。只是余对于英国政治（内幕）过于洞察，以致在此对英，颇难表示同情。英国自南非一役完全失败以后，遇事不免中妥，此固吾人不应加以

责备者。至于英人自身彼此绝对团结，则吾人更应加以赞许。惟彼等有时推拒旁人，虽用大胆之扯谎、可厌之虚伪而不惜。只要彼等相信由此可以达到目的，则虽毫无顾忌而不辞。现在世界之人对于英国此种行为，于南非战争之中，固已完全看破，盖英国方面常极力宣传帮助万国流氓结晶的 Uitländer 人之权利故也。余在中国境内曾遇许多事件，可以引作比喻。余将于他次，再为详谈。近来因为柏林方面，曾有改善德、俄关系之努力，于是吾人在此，立觉此间英人最近之态度及行动，每有引人特别注意之处。因为余恐在此最后钟头，犹与彼等发生冲突之故（此种冲突，当然以避免为善），亦为余欲速去原因之一。

撤兵北京之事，实行颇不容易。盖因只有一种单行轨道，而且设备不丰之铁路，足以应用故也。正是此种事件之中，余与各国将领恐将不免发生争执。因余甚疑各该将领颇有逐渐脱离余的势力范围之意，彼等时常托辞，谓装船一事，因奉本国政府之命令，不便违抗云云。但德国总司令部之善始善终离开此地，实为吾国利益计，尤其是为皇上利益计，所应加以努力者也。余对于此事，亦复认为应该速去的原因之一，务勿待至发生困难之时。

六月三日早晨八点四十五分，已为余备下一列专车。七点三十分，余离开冬宫。最初先行阅视门前排列之总司令部队伍，其后再行阅视宫中卫戍营、第一步兵联队中之第一步兵大队、猎兵中队、骑兵联军中之第二骑兵中队（此队列在荷池东岸），并向彼等略致作别之辞，然后堂皇车驾，始动手出发。最先前行者，为 Bengal 矛骑中队；其次则为 Enlenburg 伯爵与本部骑卫，系在余车之前。该项骑卫皆穿着新衣，骑着美马，看去甚为壮丽，彼等（执行职务）颇能显其材干。在余车之旁边，则为 Bengal 矛骑中队队长乘马随之而行。其后并有总司令部中之军官若干人，紧紧跟随。至于余之车辆，系以棕色美马驾之，并有 Gayl 将军坐在余之旁边。车辆之后，则为骑兵联队中之第二骑兵中队，该中队所有之过去成绩，实为历史中所不多见者。最初穿过属于德国军营之元帅街，在此街之中，我们最称精干之警官 Jena 中尉，曾令全街居民排立，并令彼等高呼 Hurra（此种欢呼之声极为整齐，必是曾经加以特别练习无疑），然后经过禁城以及三个美丽大门，最后一直前行，穿过御街，横截瓦德西街，以至天坛[①]旁边之大场，该处即为车站所在之地。余从此处乘马先行，驰过一个日本步兵大队与一个日本骑兵中队，以及三个意大利步兵中队，然后转向德国卫戍营方面而去，盖该营早已列队待余故也。当余驰过该营阵线以后，乃与该营军士告别，径向车站而去。在该站之上，更有德

① 天坛：位于北京故宫正南偏东的城南，正阳门外东侧。始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 年），是明、清两朝历代皇帝祭天之地。

国中队、印度中队各一鹄候。所有全体外交团，全体德国将校团，大多数英、日、意、奥军官，以及一部分法、俄两国军官，均曾到场。此外，年纪老迈之 Sir Robert Hart（赫德）与几位外交界夫人，亦曾来送。至于华人方面，则为议和使者 Dschofu（周馥?）与李（鸿章）、庆（亲王）二人代表，以及其他几位华人。若欲一一作别，真是不甚容易。当此之时，尚有一些亲切友谊之辞，来余耳底。其后火车慢慢开动，该处礼兵，举枪致敬，日本炮队，开散礼炮。其时（德国）将军 Trotha 站在右翼，于是大呼 Hurra；而（英国）将军 Gaselee 与英国各将校，则站在左翼，高呼 Hep hep Hurra。最后，火车穿过城隙而去，北京已在余之背后矣！

一直至于天津，沿途落雨不止。若从车中望去，则当见此间土地之浸渍，何等迅速。沿途车站，皆有印度礼兵，排队致敬。余于二钟左右抵津。该处复受德、英、法中队及将校团之欢迎。惟该处现正不甚安静，因昨晚曾有一个英国岗警，向着法、德兵士开枪，结果打死三个法人，打伤五个法人、三个德人故也。（法国）Voyron 请余担任仲裁之职当余向彼推谢，略谓余在此地已不能再为发言，彼乃向余言曰："君在此间，享有无限声望，足使我们全体服从。只有阁下始能将此最为不快之事，加以圆满解决云云。"余遂着手切实调查此事真相，并与（法国）Voyron、（英国）Campbell 两位将军谈判甚久，终得一个双方满意之解决。因此，余对于余之原来旅行计划，不必加以更改。

此次事变，系由法人惹起，而德国兵士则上前附和法人。换言之，彼等实有不合。但英人竟如此残忍，擅用火器，确是一种可鄙行为。该英人等不管一切，直向群众之中放击，其结果当然只是无辜之人，身受其害。英人在此，时常自讨各国军队之厌憎。自从英国从香港方面将 Welsy Fuseliers 一个步兵大队调来此地之后，反对英人之恶声更是继长增高。余现在已不复记忆，究竟余生平曾否遇着过一种军队，其外形与态度之不适余意，恰有如该军者。该军系由英国居民中之（流氓）污垢所组成。当彼等开到之时，因其举动轻佻之故，立即为众所憎。更使德国兵士与法国兵士之结合，愈较前此亲密。余希望在我们军队方面，当可使其忿气渐趋平静，再加以严厉管束，勿使重蹈故辙。但在法国军队方面，则余却没有把握，甚为怀疑。盖法国兵士性情，比较活泼易动，而且远不如我们兵士之在长官手中，听其约束故也。（法国）将军 Voyron 现欲禁止部下前往英国租界之中。（其在英国方面）则将令 Welsy Fuseliers 兵士，少出外去。假如此种红衣兵士，晚间跑到英国租界之外，余深恐彼等将为法国兵士所袭击。吾人若就此次事变而论，亦可以看出联军撤回本国之期，实已不可再缓。

四日晨早，余曾参预法国兵士之葬仪，（德国）将军 Lessel 亦在彼处，此外并派有德国代表列席。（法国）将军 Voyron 甚为感动与感谢。十一钟左右，余到车站。在白

河右岸之上，列有一个法国中队待余，以表彼等敬礼。余曾在 Heil Dir im Siegerkranz（按，此系战前德国国歌）音乐之下，步行该队阵线一周。因为各处地点皆成泥淖之故，余乃令德国军队排列车站附近一个相当的坚实地基之上，即在该处与彼等作别。至于车站之内，则列有印度、日本中队各一，以及一个意大利山兵队。所有将校人等与法国军官全体，皆在该处欢送。

（法国将军）Voyron 极为亲热，并用最诚恳之言致其谢意。彼谓吾等在此共同生活之期间，以及余待彼之个人与其部下（种种友谊）情形，誓将永不忘去云云。十一点三十分左右开始出发，一点三十分左右遂到塘沽。因为俄国军队亦驻该处之故，曾有一个德国乐队以及一个日本乐队（系由日本将军 Jamagutschi 从北京方面遣送来此），大奏其乐。二点左右，离开海湾，站在岸上之兵士数百，以及泊在附近之 Luchs 船上水手若干，一齐大声欢呼 Hurra，而停在该处之战舰，则开始大放礼炮。大沽海湾情形，又复可怕已极。塘沽港长甚至于对余驶往 Hertha 舰上之举，加以劝阻。五点左右，余算侥幸达到舰上，十分满意，将有几天安闲日子可过。余曾给（余之副官）Wilberg 下列一个题目，以作彼之冬日（消遣）工作："试论此种无数礼军礼炮，其影响及于人之性质将为何如。"

五点三十分左右，拔锚开行。顷刻之间，中国海岸余痕，逐渐离开吾之眼帘。余在该国居留及活动者，已有九月之久，此后吾眼当永不能再见该国矣。余若静思在此所过之期间，则余当十分感谢上帝。上帝时常佑余无病无灾，并使余对于许多图谋之事得如其意，对于重大不快之事得以避免。当余离开德国之际，前途本极茫茫，现在余则可以满意而归矣。

余常被国内方面询问，余所寄回报告，何以如此之少。其在报界方面，更因其有权要求供给新闻之故，类于此种之责备，愈是不胜枚举。但余却在每次邮运出发之时，皆有报告寄与皇上；若欲再为多寄，其势实有所不能，只有敬请报界方面自派"新闻邮船"运送一法而已。此外，余于拍电一事，更未尝有所懈怠，最后一次由塘沽拍寄皇上之电，其号数为二五一。当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之时，所接到者，常为"巴黎方面，并无新闻。Podbielski"，而余则几乎每日皆有新闻寄上。现在竟有新闻记者出来主张，谓当时所供给之新闻消息，实远较今日为多云云。

六月十一日之报告（时在东京）

皇上陛下，余在五月十九日及二十五日所发之二三四号及二四二号电报中，曾敬谨

条陈，对于上海驻防之德军，宜将步兵数目增加一倍，并添派一个山炮中队加入其中（关于加派山炮中队一事，系由于上海附近，并无可以铺载野炮轨距的道路之故）。余甚引为荣幸者，即陛下对于此事业已加以允准。余之上此条陈也，曾经熟思再三，而且曾与陛下公使 Mumm 先生及海军副提督 Bendemann 先行商议。

余固深知，英国方面似曾希望德军全部撤退，今见此种增兵之举，当然非所乐视。但余以为我们正于此中，可以得着指南，增兵之举，实为必要。假如法、日两国军队继续驻沪不去（余料该两国有意为此），则我们与英国之关系，当无独趋紧张之危，盖因多数列强（余在此处拟将美、俄两国亦算在其中）于此特向英国表示，长江流域应为万国公开故也。余以为将来和议完全竣事以后，若英国撤去上海驻兵，则德国始可撤退驻沪军队。假如英国重兵（一旅之众）独留沪地，更加以该国逐渐增派之东亚海军，则该国对于长江两位督抚，极易行使操纵之权，盖现在该国与该两督固已尝在亲密接洽之中也。

在中国和议完全竣事及秩序稍为恢复以前，余以为德国重大海军驻防东亚军港一事，极有必要。此外，常派几只战舰泊在吴淞海湾及长江流域，甚为有益。至于德国巡洋舰队减至四大艘一事，余认为实已缩到最少之数，究竟是否可以设法增至六大艘，则余只有冒昧敬祈陛下裁夺。

六月十二日之报告（时在东京）

皇上陛下，余在五月二十七日所发二四四号电报之内，曾经条陈陛下，对于天津及其附近，应该长期置于国际管理之下一事，认为极有必要。现在敬祈陛下，准余对于此事理由，再行详解一番；盖余近闻大部分北京外交人士对于余之意见，加以反对故也。余意以为，假如天津地方一日尚在六千联军占领之下，则该处行政事宜，现以联军“临时政府” Gouvernement provisoire 名义行之者，则亦应一日不能裁撤。倘若此项（驻防）联军必须时仰中国官吏鼻息以为生，则事之可骇，当未有过于此者。其结果势将酿成无数争端，而北京外交团实身负调解之责，平空添出许多工作。关于此种必然结果，在北京外交团方面，似乎至今尚未明了也。余之条陈，在原则上完全不错，实可于下列两事证之：其一，即联军各国司令无不一致赞成余之主张；其二，即一八九九年海牙会议曾经规定，凡占领敌地之后，其地之行政事宜，即当置于占领军队监督之下是也。因为由津至海之交通，对于列强极为重要之故，余曾详细思维，乃于初冬之际，即将天津四围辽阔地方，尤其是白河沿岸一直至于河口，皆置在“临时政府”管理之下。余之此

项处置，现在更足以证其不错者，即在此地带之内，计有两个法国铁路兵站，而且兵站司令部即设在白河岸上，此外联军各国之军用仓库亦在斯地。若不置于联军管理之下，则其势将为华官势力所左右。至于修浚白河一事，对于北京之安宁，天津之商业，皆有重要关系，余现在业已令其着手进行。倘若中国势力一旦复占上风，则余此种计划，立将归于停滞，或者永无实现之一日。余认为此项（修浚白河）问题，极为重要。据余之意，即此一事，实已具有设立“临时政府”之价值。

据余细心观察所得，北京外交团一部分人士之所以反对“临时政府”者，乃系顺从天津领事团之请求。天津领事团之领袖为法国总领事（Du Chaylard），其人甚为虚浮。该领事团之自矜其位，一如吾人常在外国各处所习见者。该领事团曾与“临时政府”之人员，在交际场中发生冲突，其重要原因当然应在（互争）等级位分关系中求之。其后，因（该团）曾将此事上诉北京公使之故，遂得北京使团方面之容纳。余与陛下公使Mumm先生，皆认为此类争端，不宜过于看得太重。假如未到演成公开冲突之程度，则最好置之不问。至于双方职务权限问题，本是并行而不悖，盖领事团之活动范围系在天津租界之内，而“临时政府”之活动范围则在天津华界之内故也。因为双方住所皆设在租界以内之故，所以互相冲突一事，当然容易发生。

至于英国公使Satow先生之所以反对“临时政府”者，除开彼之充分官僚习惯弗敢破例而行不计外，其原因当在该项“临时政府”之主席，因位分关系之故，恰恰落在俄人手中，而且是落在一位最为英人所恨之（俄国）将军Wojak手中。但就余之印象而论，该将军却是一位聪明而又有经验之人，执行彼之主席任务，亦复极为得法。据闻该将军在俄国方面，似已另有他用（行将归国）。果尔，则此后主席一职另行推举别国，固非困难之事也。

六月十四日之报告（时在东京）

自从皇上陛下令余离开直隶，将余之联军统帅一职宽去以后，余现在不揣冒昧，将余在职期间所留下之印象若干，敬为陛下陈之：

（一）德国声望之在东亚方面，现已大为升高，毫无疑义。同时，英国声望却大为降下。至于英国声威下落之原因，一则由于该国在直隶方面之行动，未免过于萎缩，二则由于该国欲得美、日两国宠爱之情，日益明显增高，最为其余各国所不齿。又中国方面因与俄国接壤数千基罗米突遥远之故，对于俄国虽然最为恐惧，但德国此次派遣如此重大海陆军队前往东亚，以及德军各种有力行动，却使中国得着特别深刻印象。盖中国

从此当知，德国不仅是能派重兵来此，而且是无论何时皆愿应用全力对付。余以为，只有德国军队之积极行动与中国当局之恐惧思想（相信无论何时皆有被人猛攻之可能）两事，始令华人发生敬畏之心，此固吾人不必夸大其辞而可以直言不愧者也。又法国军队之行动，因其素受俄国影响早为华人熟知之故，所以亦复不能获得华人敬畏之心。至于联军各国军队隶属德国统帅一事，虽其中法、美两国仅在某种条件之下，然德国声望之在东亚方面，毕竟大为增高，即在其余世界各国之中，亦当引起几分注意。关于德国企业欲望及资本运用两事，将来当能在东亚方面充分利用陛下所辟此项最良机会。

（二）德国军队与其他联军各国军队共同生活，几乎将达九月之久，以及由此互相认识，余深信对于德国声望，实有益处。从前反对德国之种种成见，现在多已消灭。德国之能干，而且（就大体而论）优于他人，已为一般所公认。不过，表示方法各有不同，大部分仅系间接表示佩服，但直接公然表示景仰者，亦不罕见。

其中最令人值得注意者，当为法军方面。许多法国军官与德国相处之日愈久，则相亲之情亦愈增。彼等对于德军之能干，曾经公然表示承认。而且彼等并谓报仇思想在法国军队之中，现正日趋衰退，（再加以）此次在华共同生活之影响，其势更将促其迅速消灭云云。倘若我们除开一些年纪较老之（法国军官）先生不计外，则法国军队仇德根德之说，实已不复存在。反之，法国军队方面，对于英国及其军队，既已恨入骨髓。同时，法国军官方面，对于俄国及其军队，亦无真正同情。

（三）德国远征队之组织，所有国内各联邦无不按照其人口数目，派加其中。各邦军队之官长与兵卒，在远征队各部分中，联成一体，相处一年，而且共同作战，与敌周旋，对于全德民族一致精神之养成，不能无所影响。因此之故，派遣远征队于东亚一事，对于德国内部之进化，亦有良好效果。

（四）又派遣远征队于东亚一事，曾使陆海两军对于大批军队装船手续一层，得着极富经验。盖此次装运既极辽远，起船又遇困难故也。此外，陆军方面对于武装、衣服、粮食、运输等事，亦得着许多极有价值之经验。盖此次战地情形，无论天气及土地方面，皆与欧洲战场迥然不同也。当此我们殖民地政策前途蒸蒸日上之时，余相信此次海陆两军共同活动之东亚远征队，对于德国将来发展，当有重大关系。至于数百陆军仕官，因其见闻阅历不少之故，对于彼等智识，必将有所增进，余亦认为此次良好效果之一。



六月二十一日之报告（时在长崎）

皇上陛下，余谨将余在日本逗留期间所得印象，报告如下：

自俄人占领满洲并准备久留该地以来，日本民意经此刺激，不安达于极点。余曾有机会，得与日本国务总理（桂太郎子爵）、陆军总长（儿玉男爵）各位高级军官，前驻柏林公使 Aoki 伯爵等等久谈。因而察得，彼等无不深觉现正处于困难决定之际。刻下日本财政之困难，当为现在尚不能毅然决定之主要原因。但日人方面，固已深知，倘若坐待俄国西比利亚铁路完全开车之时，则对俄开战之适当时机，不免从此错过；于是，不但中国势将屈于俄国重大威力之下，而且日本亦复从此无力单独向俄开战。据现势而论，假如只是日、俄两方对战，他国不与其事，则日本实具有向俄宣战之能力，此固一般有识日人自信不疑者也。近来日人对于（法国总长）Delcassé 先生前往圣彼得堡一事，极感不安。盖日人误疑此君将在彼处，对于东亚问题，密结俄、法同盟条约故也。

自中、日战争以来，日本对德之恶感（译者按，此系指三国干涉还辽事），现在渐已改变。群谓当时因顾虑政治关系，未易全然洞察之故，当然对于德国不能无所介怀，但其后情形大变，不复如此矣。所有日本各方，皆曾向余明言，报纸论文之中，亦复时常流露，大意无非表示，日本方面深信德国对日之友善态度，并且希望，倘日、俄开战，德国当可保持中立云云。

余曾得机会，一与东京俄使 Iswolski 先生久谈。此君为人甚属聪明。惟余在此有一事不能不特别提出者，即余从此位细心观察之公使口中，发现一种极为忧愁之语气辞意。彼曾向余云，若与日本老政治家周旋，尚能彼此相洽，但该国之新辈，则将近年胜利之事充满脑中，日益增长不已。其中，更有一部分竟自罹了夸大狂。此外，并有一些日人，公然追寻黄种伟大前途之梦云云。

若专就纯粹军事方面而论，则余相信，假如日本果能筹得必需之款，现在确实完全可以使俄痛受巨创；而且此项战争之结果，当大有影响于中国将来对俄之态度。除开日本海军实力绝对超过俄国海军不计外，余以为陆军方面，日本亦系俄国之劲敌，而且日人具有巨大便利，即能在本国近旁作战是也。此外，日本新制之野战快炮，假如对于弹丸方面若干缺点，果能加以改善之后，则在炮队方面，日本更有绝对胜过俄国之把握。

除了满洲以外，高丽之前途，亦为日、俄两国间之重要问题。

日人之意，以为日本、高丽两国，不仅是人种、宗教两事，彼此甚相接近，而且是地理、经济两途，关系亦极密切云云。此种意见固亦有其相当理由，吾人不能加以否认者也。（近年）日本人口之大增，颇需国外大批粮食之供给。假如高丽方面许多未垦土地，皆为日本移民所垦，以为日本之用，则日人对于粮食供给问题之解决，实以此为最捷之径。

俄国方面对于日本占领一部分高丽之事，虽或可以许可，但若日本果然完全吞并高丽，则俄国势将决不承认。俄国之意，以为海参崴与旅顺之间，必须有一安全坚稳之连

络路线，并以马山浦一地（在高丽东南角上），为最适于建筑巨大军港之用。俄国图谋马山浦之心愈急，则日本反抗此举之情亦愈烈。余从可靠方面闻知，倘若俄国果将马山浦占领设防，则日本即以宣战作答。

若就两方论点言之，皆各自有其理由，不能加以抹杀。因此之故，余遂觉得，若有一方希望此事速决，则其势立可引入严重解决之途。据余之意，俄国军港直对日本海岸一事，确非日人所能安视容忍。反之，余却相信，俄国方面倘若放弃海参崴、旅顺间之连络，对于俄国之利益，并不必大有所损。因为赤塔、吉林、大连间（大连系在旅顺东北四十五基罗米突左右，至于旅顺本身，则当专作军港之用）铁路之占有，于是西比利亚巨大铁路之终点，遂直达中国海面。俄人更复努力筹集巨资，欲将大连筑成伟大商港，将来此港或将大为减削海参崴方面商业之势力。

因为东亚方面时局变化，在最近将来甚为重要之故，余觉得东京方面，亦应按照现在北京之例，置一年长军官，随时观察军事情形变化；尚祈陛下准余谨将东京使馆应设海军随员一位之议，恭呈陛下，以引陛下圣心注意。

六月二十二日之报告（时在长崎）

余在中国每与俄人接谈，彼等均谓中国业已完全瓦解，即在和议正式完竣以后，中国亦复不能安宁，势将永陷混乱状态之下云云。俄人此种众口一辞之情形，尤其是自从（俄国）侯爵 Uchtomski 来到北京以后，使余特别感觉。因而余相信其中，必是曾经先行约定，同作此语。大约各种俄国机关，均曾受有命令，一律依照此旨发言。

据余之意，今日尚无一人，能够对于中国之最近将来，以及此后前途，下一确当断语。至于余之个人方面，却不敢相信，中国业已到了逐渐瓦解之境。中国领土非常之大，中国人民属于同一种族，几乎全体相信同一宗教，而一般群众，身心既极健全，指导又甚容易（因此种种之故），实难迅速土崩瓦解。假如天为中国降一有力君主，其人既能根本铲除中国一般上流阶级之腐败情形，又能同时利用西方之文明，则中国前途正是未可限量。余甚至于相信，中国将来或当成为俄国一个最为危险之敌。

至于俄国之利益，在于得一虚弱中国为邻，此固系当然之事，（不待智者而知）。因此，彼虽对华极讲口头亲善（此种亲善效果，在实际上只使中国土地日蹙月损而已），而其方针却在努力保持中国虚弱现状，或者更使此种虚弱程度愈为增加。又中国自身对于俄国方面确是最为害怕，假如中国不得他国之助，其势亦必逐渐屈于俄国巨大威力之下无疑。

因此之故，假如他国果愿参加压迫中国之举，实为俄国衷心所希望。余相信俄国方面正设法促使勾引法国，将其安南领域界线，再向北方进展。同样，俄国亦极乐视德国扩充山东省内地盘。因为如此一来，则法、德两国势将与英，甚或与美发生争端。法国并吞中国南部之事，颇为安南总督 Doumer 先生所热心经营，但此事甚为法国军事当局所反对。

余以为，恢复中国安宁秩序，赞助中国经济发展，实为德国之利。（关于此点，德国与英、日、美三国以及真正明达的法国之利益，完全相同。）所有上述各国，尤其是德国，皆欲在中国方面，为本国工业出品，觅得销场，为本国商业航业大谋其利；此外，对于中国至今向未发现之丰富宝藏加以开发利用，实为各方之益。因此之故，上述各国之利害，恰与俄国相反。盖俄国所希望者，系一个衰弱无力的、情愿服役的中国。反之，倘若中国经济发达，尤其是政治兴旺，实使俄国发生恐怖之心。

在各国中，对于中、俄关系前途之进展，受其影响最多最早者，当然要推日本。现在，俄国对于日本，当已不能不视为东亚方面之巨敌矣。因此，余以为德国政策（或者联合英国而为之）似宜努力设法，暗中小心帮助日本，并向日本特别保证，假如日、俄开战，德当严守中立云云。倘若日本为俄所败，则俄国东亚霸权从兹达到。反之，倘若日本打胜，则俄国势将倾其全力用于该国极东边境。盖因该国东亚方面久费经营之全部势力，业已陷于危险，故也。

至于东亚人士所梦想之黄种前途希望，即或此次俄国打败之后，亦尚十分辽远，现在实无加以详细讨论注意之必要。

此外，余认为甚可注意者，尚有一事，即东京方面曾经向余咨询，倘若日本派遣军事教官前往中国，则德国对此将取何种态度云云。余对此问，未曾加以回答，但余相信，此事已在北京方面讨论，已成为会议谈判中之题目。

六月二十四日报告（时在 Gera 舰上）

皇上陛下，余不敢遗忘，继续余之六月八日报告（按，此项报告内容，系瓦氏恭报离开北京及直隶之举），再为恭奏如下：

六月八日三钟左右，余偕中尉 Boehn、少校 Marschall 男爵、正军校 Wilberg、中尉 Eulenburg 伯爵、卫士 Nasser 及 Müller 等等，行抵神户港口，沿途平安无恙。当该船入口之后，立即来到船上者，计有（日本）第十师长 Kamamura 男爵、Settfu 总督 Hattori、德国使馆之中尉 Ritter 与译官 Thiel、在余营中充任名誉职务之（日本）少校

Oba 及 Oi，以及德国领事 Kiern。

晚间六钟，余乃登陆。在起岸之处，又有神户总督及行政长官，率领无数该地有名绅士来接。此外，神户青年军团及各种学校，皆排队欢迎。该地行政长官前致祝辞，并恭呈神户市民贺贴。当余往谒领事馆及德国俱乐部片刻之后，随即略览神户几处名胜，然后复回 Hertha 舰上。

六月九日午前六钟，余乃乘车前往京都[①]。该车之上，特为余与随从人员挂有花车二辆。余之随从之中，除上述各位先生外，尚有（德国）舰长 Derzewski 在内，该舰长乃系由余邀请偕往日本者。在大坂车站，（日本）第四师长 Ogawa 男爵与其参谋人员，特来贺余。在京都地方，因参观许多有趣名胜之故，占去镇日时间。余并利用机会，置一花圈于攻取大沽炮台阵亡之（日本）舰长 Hattori 墓上。晚间八钟，余复继续旅行，前往东京而去。系于六月十日午前十一钟左右，抵达该地。

在车站之上，前来欢迎者，计有（日本）第一师长伏见（Fuschimi）亲王、总督、铁路总监、行政长官、在余营中充任名誉职务之将军 Fukuschima 与礼官伊东（Ito）；其次则为陛下公使 Arco 伯爵，与其公使馆中各位先生，以及德国驻横滨总领事 Coates 等等。此外，车站内外，更有许多人众表示热烈欢迎。余从车站乘坐宫车，前往 Schiba 宫，该宫乃系指定为余及随从人员驻节之所者。余到该宫之后，（日本）参谋总长大山元帅，陆军总长儿玉男爵，高等礼官 Sanomyia，立即前来拜谒。

六月十一日午前十一钟三十分，余与随从人员，得蒙皇帝皇后陛下赐见皇宫之内。晋谒之后，并继以宴会。当其往谒之时，第一禁卫联队曾派礼兵中队一个，列于宫外致敬。其后用宴之际，宫庭乐队所奏者，几乎全系德国调子。是日午后，余曾往拜皇太子，以及其他数人。晚间，余赴太子嘉仁（Kanin）殿下之宴。

六月十二日午前，（日本）皇帝陛下曾赐恩准余参观仕官学校及武备学堂。余由军事教育总监 Teraontsi 中将及武备学堂监督 Takagui 少将引导参观，其结果使余深悉该校之组织及办理，何等完善。正午，余赴（德使）Arco 早餐之请。（日本）皇子 Komatsu 及嘉仁殿下，（日本）内阁大臣及高等宫吏，大部分（各国）公使，均在座中。（日本）皇子 Komatsu 曾高呼（德皇）陛下万岁，举座之人，无不热烈同声相和。午后，德国使馆之内，复设一花园大宴，其中曾有许多居留东京与横滨之德侨及其夫人，被邀列席。晚间，又赴（日本）陆军总长儿玉男爵之宴，其间曾遇着许多能操德语之军官，颇使人特别注目。该陆军总长曾为（德皇）陛下三呼 Hurra，余乃高呼日本军队及陆军

---

① 京都：日本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于公元 794 年被定为日本的首都，当时名为“平安京”，此后多次成为日本首都，是日本的政治及文化中心。“首都”在日本当时称为“京之都”，因此，“京都”后来成为此城市的专有名词。

总长万岁以答之。盖以日本军队因受陆军总长之优良训练，乃能如此精干善战故也。

六月十三日午前，余赴（日本）皇后陛下特别招请，往谒贵胄女子学校。该校系在皇后陛下庇护之下，约有三百贵族女子，肄业其中，年龄系自五岁以至于十八岁。正午，余赴（日本）皇子 Komatsu 殿下之早宴，该宴系设在彼之宫中。午后，余赴红十字医院看视病卧该院之（日本）将军 Tamura，此君当为陛下在柏林方面素所熟习者。是日晚间，余到德国俱乐部之中，此处使余不胜欣喜者，即余觉得，此间德人之商业及生活，亦复何等优良卓越是也。

六月十四日早晨，高等礼官 Sanomyia 奉（日本）皇帝陛下之命，赠余极有价值之礼物，一架屏风，两个铜瓷瓶，皆系日本美术优良作品。（德国）公使 Arco 伯爵复将分给余的随员及卫士之徽章交余。午前十一点三十分，余曾忝叨荣幸，得向（日本）皇帝皇后陛下辞行，蒙其赐见。余乃借此机会，对于日皇屡次天恩，致其深深感谢之忱。晚间，（日本）参谋总长大山元帅复在帝国饭店设宴请余。大山元帅曾高呼（德皇）陛下万岁，余乃致辞恭贺日本参谋部。余并将该部对德特别友善之关系，格外提出，然后再向参谋总长致其贺意。

六月十五日，乃往横滨一游。余在该处，备受德国俱乐部及万国俱乐部之欢迎，并在德国总领事 Coates 处早餐。

星期六（六月十五日），日本皇帝陛下曾赐天恩，准余得在 Schiba 宫内设宴请客，共计发出请帖四十二张。列席之人，计有（日本）皇子 Komatsu 及嘉仁、国务总理桂太郎、外交及内务总长（小村及内海）、元帅 Saigo 及大山陆军总长及海军总长山本、高等礼官 Sanomyia，以及其他显爵。（日本）皇子 Komatsu 殿下曾高呼（德皇）陛下万岁，余乃忝叨荣幸，大呼日本皇帝陛下万岁以报之。余在此处，更欲再为提及者，即（日本）皇帝陛下之天恩，使余何等深深感动是也。经过此次宴会之后，余之官式勾留日本一事，既告结束，乃于六月十六日前往日光（按，此处系日本名胜之地，距东京四点半钟火车之遥），并在该地勾留，直至六月十八日上午。

六月十八日正午，余复到东京。在车站之上，又受在余营中充任名誉职务之各位（日本）先生，以及（德使）Arco 伯爵之迎接。余在使馆早餐之后，即赴车站而去。该站之上，并有（日本）参谋总长、陆军总长以及其他高级官吏，前来作别。晚间六点三十分，余乃续往神户，复蒙（日本）宫内省之优待，为余特挂卧车一辆，在余之随从人员内，随余营中效力之（日本）少校 Oi 及 Oba 两人，亦在其间。此外，（德使）Arco 伯爵及舰长 Gühler，亦复同行。

六月十九日午前十一钟，余抵神户。复在该处车站，备受总督 Hattori 以及官厅之迎接。出站之后，一直乘车前往市政厅。凡余所经街道，皆有青年军团，列队于旁，见

余车来，则举枪致敬。在市政厅之中，余复承赠银钵一个，以作余勾留日本之纪念。所有神户著名绅士及全体外国侨民，对于此项赠品，皆曾参有分子在内。至于呈授该项赠品以及代表发言之人，则为日本商会会长山本。

是日早餐，系受德国俱乐部 Concordia 之请。列席者，除余及公使以外，尚有该地代表、总督，以及他国侨民数人。恭贺（吾皇）陛下与日皇（陛下）之时，举座无不热烈同声相和。

午后三钟左右，余到 Hertha 舰上，乃与 Arco 伯爵及（日本）各位名誉职员先生相别。三点三十分，Hertha 舰遂向内海驶行。

最后，余尚有一事恭奏吾皇者，即余旅日期间之内，凡有所遇，无不十分礼貌，特别殷勤。每日皆有皇恩厚遇下及。从皇帝陛下直到各部长官，甚至于居民之间，皆令人觉得，彼等对于余之游日，极为欣慰不已。而且每人皆欲直向吾身以表示间接尊崇陛下之意，并将其倾向之情，特别表出。

八月五日德皇致瓦氏之函（时德皇正在太后病榻之侧。后数日，太后即行逝世）

致余之侍从武官长、大元帅瓦德西伯爵。

使余最为心痛惋惜者，即余久怀（俟君一旦归国）定将亲致问候之意，今竟不能实行，因为现在正值阁下（去国行将一载，曾在东亚方面获得胜利成功，但同时亦复身经战争，勤劳、忧虑不少之后）重履德国故乡之时也。请君确信自己万事皆可称为模范之已往军事成绩，既不自利，又喜牺牲，甘愿立在中国战役之前锋。阁下曾以聪慧天资，见事深透，手段敏妙，遇事沉毅，并能忠实对待阁下所领为宗教文化而战之各国军队，得将所负重大艰难之责任，办理极为妥洽，对于祖国以及文明世界，实算一种劳绩，此种劳绩在近代史中，定将永远不忘。余以极热之皇帝谢忱，欢迎阁下回国。余将时常忆念阁下及军队，如何忠实情愿以听余之（君等最高军事主宰之）命令。阁下与其部下军队，关于余对阁下之信赖，真是何等十分无愧。

一九〇一年八月五日自 Friedrichshof

威　廉

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之报告（时在 Hannover）

皇上陛下，余对于巴黎《晨报》Le Matin 十月二十七日所发表的中国远征期内（法国）将军 Voyron 致余之函件，相信颇有略加解释上奏吾皇之必要。

余之意见，固然以为此项函件之发表，当非 Voyron 将军本人主动，乃是由于法国政府指使，或者至少系得法国政府同意，而由接近政府之人士所发表。因此项人士，现正努力对于国内一部分狭义爱国及天主教徒人民，方思有所顺迎其意故也。但是，无论此事之发动情形如何，而实际上此项函件足以引起德国社会方面对于余之（由陛下议设之）统帅地位，加以误会。因为不明反对党在报纸上及国会中的行动之故，此项函件最易成为恶意攻击陛下政府之把柄，以及对余个人加以批评之资料。

因此之故，余现在谨将有关兹事之军令等等，以及回答此项军令之函件（按，即《晨报》上所发表者），恭呈陛下，并且敬加解释。

因为 Voyron 将军不在余指挥之下的原故，所以余极细心对待，勿使彼发怨言，谓余曾有干涉彼的权限之心云云。凡有关于共同作战之事，余皆先行与彼口头或书面商定。此外，余对于其他各国军队所下之命令，亦尝将其内容通知彼与美国将军 Chaffee 两人。盖法、美两军军队既不在余指挥之下，对于此项命令，当然特别注意故也。彼等接到此项通知之后，亦复时常复信感谢，证明收到。此种办法，确系妥当。因该两将军从未对于余之调度情形，加以埋怨故也。但在他方面，余又不能不对于麾下所属各国军队之权利，加以庇护。对于法人所提之保护权要求（译者按，如法人要求保定独归法军保护之类），加以拒绝。

至于余个人与法、美两将军之关系，却自始至终，皆极相洽。而且彼等对于余之建议，亦有多次极表赞成。只是对于（法国）将军 Voyron 方面，往往不免发生困难，盖该将军之当面口头约定，每每与其后来宣言内容，不尽符合故也。因此，普通揣测（一如余在一九〇〇年十月五日二〇三九号报告中，曾经上奏陛下者），以为 Voyron 将军之参谋长（Cluzcau）常在其旁监督彼之行动，所有彼之良好意见，每被该参谋长引证法国政府之命令与意向，时常暗中加以破坏。

该项致余之函件，当然亦系出自此君（指该参谋长而言）手笔，而且或者握笔之时，即已预备公布社会之用。至于当时余对此类函件之回答，当然仅以有益于事者为限，（固不能一一加以答复）。

在实际上，Voyron 将军曾屡次向余个人以及（余之参谋长）Schwarzhoff 将军言

曰，倘若彼能隶余指挥之下，一如其他各国军队（司令）将军，则在事实上确较有益；即据彼个人之老兵经验资格而论，亦宁愿归余调遣云云。此外，彼又时常求余，若有规模较大之攻取行动，勿使法国军队落后云云。以是之故，乃有共同攻取保定之举，以及（法国）将军 Bailloud 担任由津出发的联军纵队司令一职之事（该纵队系由德、英、法、意四国军队所组成）。但该司令行抵（保定）城外之时，又归由京带军前来之（英国）将军 Gaselee 节制。以是之故，其后复有各国军队担任分防北京、天津、保定附近各地之举，以及保定南面法军前进护余左翼之事。

至于余之下令干涉悬旗一事，实因当时余对于各国军队，尤其是法国军队，以及中国居民之滥行悬旗达到极点，故不得不加以干涉。在各国军队方面，系以为将旗悬在城门或庄舍，当可由此多得驻扎之所。在中国居民方面，则以为悬上某国国旗，当可得着某国保护。其选择旗帜标准，当然系以最有利益者为先；通常则系彼等若如某国军队正向该处前来，遂选悬某国国旗。当其联军往取保定之时，曾有许多法国天主教牧师随营前往，以便复回彼等旧居。而且其中一部分，更往往身先军队而行，彼等随带大批法国国旗，分散各处城乡。因此之故，各国军队每当行近城乡之时，即已见有法国国旗临风飘扬，无不十分惊讶之至。

如果 Voyron 将军自谓中国居民对于法国军队，特别表示同情云云，则此项言论只算是法人虚浮自负（习性）之一种产品而已。中国官厅对于法军不守纪律，抢掠劫取，尤其是强奸妇女之怨诉，时常不绝的来余耳中。至于各国军队，确是无不对余感谢实行干涉滥悬旗帜之事。即 Voyron 将军于其函中，对于此种滥悬旗帜之事，固亦自行承认者也。倘若当时对于彼之长篇函件，详细答辩，则其结果只是引出许多笔墨（官司），实以避免为善（更因预防各国军队互相冲突以及保护安分中国居民之故），于是，余乃建议组织一种国际委员会，以管理北京。

从此项文件中，当可充分看出，余当时并未有意利用“预拟任命一位将军以作该项委员会主席”之机会，直将该委员会作为余之附属机关，管理全部北京警政事宜，由此以使各国军队司令之警察权限受其限制。不过，就当时北京情形而论，余以为无论为联军各国军队利益计，或为此种百万人口大城之居民利益计，均应设置一个“常驻国际委员会”，规定若干各国共同遵守之原则，以处理一切公共问题。至于该项委员会所办之事，只限于“公共安宁秩序事宜，卫生及军队给养事宜，人民粮食问题，筹款以作此项开销问题”，一如当时通告书中业已详言者也。

（余之参谋长）Schwarzhoff 将军，曾奉余命，将余条陈，先与（法国）Voyron 将军及（美国）Chaffee 将军两人接洽。既经接洽之后，余遂相信，该两将军对于余之条陈，当能加以同意。因而余在十二月三日，特备公函，连同该项通告书，一并咨送该两

将军，请其正式发表同意宣言云云。其后，Chaffee 将军遂直接宣告美国军队加入该项委员会合作。而在 Voyron 方面，则于十二月六日，作函备述彼之种种异议，其中彼甚引为忧虑者，即如果任命一位德国将军以作该项委员会主席，则德国势将处于优势地位是也。后来，Schwarzhoff 将军又复再向 Voyron 将军详细解释，该项机关必须组织之理由，与其毫无政治意味之关系。但其结果，终不能使 Voyron 将军对于彼所悬想之本国政府命令，换言之，即是对于“德国将军”为主席一事，以及巴黎方面势将由此引起疑虑等等，一旦去怀。因此之故，如果欲使 Voyron 将军转圜，则只有一法，即余对于身在统帅地位势所不能避免之任命委员会主席一事，加以放弃是也。但余在此，固不仅是代表德国一国，同时更须代表隶余麾下之各国军队，因此不能（随便）放弃上述职权。而且余以为再与 Voyron 将军继续辩论，实无目的之可言。

因此之故，管理北京委员会之组成，并无法国军队代表在内。其结果，该委员会之条例及决议，对于法军占领之市区（只是一个狭小之地）当然不发生效力。但其后该委员会对于军队及居民幸福之增进，不久即大显成效，即在华人方面亦复屡次公然承认。此种幸福更因相形之下特别令人感觉者，即其时法国区域之内，永是一种最污浊、最黑暗、最不安宁之世界，为人人所欲避行是也。在此种关系之下，因而该委员会对于各种决议及设备，亦复不愿通知 Voyron 将军。又该将军在十二月六日函中，虽曾特别声明，对于一切财政税收问题，决不愿受该国际委员会之束缚云云，但该将军却不怕羞，竟于二月之内，屡次向余呈请，转饬该委员会，准彼分润该会存款云云。盖此项存款乃系北京城方面缴与该委员会以作开销者也。余因避免嫌疑，勿使 Voyron 将军误疑余的个人势力影响该会议决之故，乃将此项呈请，直接交由该委员会自行办理。其结果，该委员会对于该将军之请求，当然加以拒绝。

此外，《晨报》所公布之第三封信，其发出日期为十二月三十日，乃系关于庇护中国教徒问题之来往文件。

在保定府方面，法国牧师 Dumont 曾特别努力搜集中国教徒控告德国兵士之诉讼，以便送交法国将军 Bailloud。（德国）将军 Kettler 当时方在保定指挥德军，乃向彼之法国同事（Bailloud 将军）请求，转饬 Dumont 牧师，凡有控告德国兵士之诉讼，宜直接呈交德国机关办理云云。其后，Bailloud 将军回信，乃不能不自承，彼因实行 Voyron 将军所下训令之故，曾通谕保定附近全体中国教徒，所有彼等利益，专由法国军事机关庇护云云。于是，Kettler 将军乃将此情禀余。余遂立刻电命 Kettler 将军，拒绝法国方面（关于此项诉讼案）之居中媒介。此外，余又致函 Voyron 将军，略谓此种办法，实与联军彼此平等之原则不合，其中当系由于误会所致。甚望将此误会从速扫除，并将解决此事之训令见示云云。未几，余遂接得十月三十日一函，是即《晨报》上所公布者。

该函之内曾经保证声明，无论 Voyron 或 Bailloud 将军，皆未存心破坏联军彼此完全平等的权利云云。

对于 Voyron 将军之高谈数百年来法国保护天主教会之遗习种种政论，余则故意置之不问，以保护余之纯粹军事地位与纯粹军事要求。只要余之要求业已办到，余即心满意足。在实际上，此项要求亦已果然办到。不仅是依照余之请求，Favier 主教特将 Dumont 牧师直从保定召回，而且是 Bailloud 与 Kettler 两将军之间，对余所立彼此对等原则，立刻完全依照，彼此和衷共济，不再发生障碍。

当保定府十月二十日由联军占领之时，Bailloud 将军曾在行将占领之前，为满足法国庇护欲起见，提出该城全归法军庇护之要求。后因当时正驻该处之（德国）将军 Gayl 男爵的紧急抗议，于是其时指挥该地联军之（英国）将军 Gaselee，乃将法国请求不仅是严重驳回，而且任命了一位德国军官（Wyneken 少校）为警察总监，在彼之下另由参与该处军事之四国（英、法、意、德）各置副监一人（请参阅一九〇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二〇七九号之直接报告）。又当时保定方面之国际法庭，系为审判残杀教徒最有关系之中国官吏等等而设。亦因德国方面要求的原故，Bailloud 将军之被 Gaselee 将军委充斯职，曾经附以下列条件，即由该庭所下之判决，须受余之核准方可是也。因为争执之事，即由 Kettler 与 Bailloud 两位将军之互相辩论，迅速直捷了结。所以，余对于 Voyron 将军不合事理之报告，所谓“十月二十日保定城前高级军官会议之中，Bailloud 将军举动并未被驳”云云，不复再行加以讨论，盖已与事实无关故也。

至于法国（所谓）传统的直隶天主教徒保护权，其中有须特别注明者，即 Voyron 将军在北京方面行使此项保护权限，实际上仅限于彼所占领之市区内面，而且已在北堂法国天主教会解围之后。盖北堂法国天主教会饱受拳民压迫与围困，直到北京攻下两日之后，始由日本军队（并非法国军队）将其解救。此外，法军方面对于北京西北及正北两边，以至于蒙古界内之许多天主教会，亦未加以丝毫保护。直到（德国上校）Yorck（伯爵）统率纵队往攻张家口，与（德国）将军 Gayl 男爵复将军队由该处开回，以及（德国）中尉 Pavel 与（德国）将军 Trotha 之出征，再加以（德国）Kirsten 与 Kummer 两位中尉之神妙骑巡等等，始将上述各地天主教会置于安全之下。而且保护之周，尝为 Favier 与 Jarlin 两位主教所深感不已。又该两主教对于法军之保护不周，时常致其十分不满之意。

最后，余尚有不能不再为恭谨上奏者，即是虽有上述（法国方面公布之）函件，而德、法两国军队之间，相处却颇融洽。（至于该项函件，不过证明法国与我们之间并不十分亲密〔报仇思想，并未完全忘去〕而已）。所有德、法两军官长与兵卒，皆未尝发生冲突一次。不但未尝冲突而已，并且两军兵卒之间，时常互相订交；官长之间，极为

互相敬让。其在小部驻防之处（如杨村及山海关之类），两军官长甚至于极相友爱。曾有许多法国军官向余言曰，彼等极愿在余指挥之下，开向敌阵而去云云。当余行将启程之前，天津方面英、法两军之间，曾发生冲突一次，颇带严重性质之象。（法国）将军 Voyron 尝乞余从中调停，并谓余曰："君之威望如此隆重，无论何人，对于君之裁断，皆将听命服从云云。"当六月二日天津分手之际，该将军特别对余感谢在此远征期内余（待法军）之忠实无偏态度，彼并特别声言，余之此种态度，极为彼之（在华）同胞所心感不已。

美国与满洲问题

译自德国外交文件汇编

题记：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俄、日两国分割了我国东北。美国政府为争夺中国利权，想方设法插足东北。先是提出所谓“保持中国在满主权”以及满洲方面“门户开放”政策，以使各国“同享商业机会均等”；其后，1909年底，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又向各国提出“满洲铁路中立化”的计划，主张东北的所有铁路由各国共同承购股票，或者由各国借款给中国将现有铁路赎回，实行“中立化”制度。针对美国的提议，各列强因其自身利益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俄、日两国为了保护自己在东北的既得利益，相约“维持现状”；英国最初赞成，后以英日同盟、英俄协约关系中途变卦；法国也以俄法协约之故表示反对；而德国则表示赞成。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中国东北（满洲）实际上已成为“群雄逐鹿之地”。

王光祈将《德国战前外交文件汇编》（1871—1914）第三十二册之第二百五十、第二百五十一两章，翻译汇编成《美国与满洲问题》，集中反映了德国与各列强对上述问题的态度，是研究当时列强在我国东三省角逐争斗的极好材料。本书于1929年4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目　次

二十九日自圣彼得堡寄）

十八、德国驻日大使 Mumm von Schwarzenstein 男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正月八日自东京，二月四日到柏林）

十九、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二月七日到柏林）

二十、德国外部秘书 Schoen 男爵之说帖（二月十日）

二十一、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致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之训令（二月十五日自柏林寄）

二十二、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二月十八日到柏林）

二十三、德国驻日使馆头等秘书 Montgelas 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正月三十一日自东京寄，二月十八日到柏林）

二十四、德国外部秘书 Schoen 男爵致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之电（三月一日自柏林寄）

二十五、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三月四日到柏林）

二十六、德国外部秘书 Schoen 男爵致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之电（三月六日自柏林寄）

二十七、德国驻华公使 Rex 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二月十四日自北京寄，三月四日到柏林）

二十八、德国驻日大使 Mumm von Schwarzenstein 男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二月十六日自东京寄，三月十一日到柏林）

二十九、德国驻日大使 Mumm von Schwarzenstein 男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二月十九日自东京寄，三月十一日到柏林）

三十、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四月十五日到柏林）

三十一、德国外部代理秘书 Stemrich 致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之电（四月十五日自柏林寄）

三十二、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四月二十一日自华盛顿寄，四月二十二日到柏林）

三十三、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四月十八日自华盛顿寄，四月二十七日到柏林）

三十四、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七月一日自 Manchester 寄，七月十三日到柏林）

三十五、德国驻日大使 Mumm von Schwarzenstein 男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五月六日自东京寄，五月二十五日到柏林）

译者叙言

本书系译自一九二六年出版的《德国战前外交文件汇编》（1871—1914）中之第三十二册。按此书所载，多系战前德国秘密外交文件，并尝有德皇威廉第二御笔朱批在上，读之颇可察见战前国际形势真相之一斑。

本书自第一篇至第三十四篇，系全译该书第三十二册中之第二百五十章，章名为

“美国关于满洲铁路中立事件[1]之突起以及德国所持态度”。计自一九〇九年十二月起，至一九一〇年七月止。自第三十四篇至第四十五篇，则全译该册中之第二百五十一章，章名为“一九一〇年七月四日之俄日满洲条约”。

一九〇九年十二月，美国提出“满洲铁路中立条约”条陈，同时并与英国商筑锦州—齐齐哈尔—爱珲铁路，直穿俄、日两国势力范围。此事最初英国方面本来赞成，后因日、俄两国反对之故，于是英国以英日同盟、英俄协约关系，遂亦中途变卦。法国则以俄法协约之故，亦在反对斯议之列。惟德皇威廉第二对此则极表示赞成。中国政府方面对此亦复甚为欢迎。盖德国欲借“门户开放”[2] 之佳名，以破俄日垄断之局面。中国则欲用“满洲国际化”之政略，以避日俄日瓜分该地之危机故也。其后，美国提议搁浅。俄日两国为对抗美国起见，遂于一九一〇年七月四日订结满洲条约。其条约表面，系俄日双方共同维持满洲现状，并共同抵抗第三者之破坏此种现状。而且同时将此约文，通知各国。但此外尚有一种密约，曾由俄国政府秘密通知伦敦政府，其中规定实无异俄日两国实行瓜分满洲。当时欧洲国际风云，业已渐趋紧张之际。于是英国则由集中力量对德之故，所有俄日两国希望，无不欣然乐从。德国则又欲竭力拉拢美国，以为牵制英国之计。迨至一九一〇年七月四日俄日满洲条约告成，俄国遂无东顾之忧，从此锐意西进。故巴尔干斯拉夫民族[3]一闻满洲条约成立，无不额手称庆。（参看本书第四十五篇德国驻塞尔维亚代办之报告。）因而欧洲大战之机，遂有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矣。孰谓满洲问题仅仅限于东亚方面哉！

至于今日则何如？德国业已一败涂地，德皇威廉第二[4]逃往荷兰锯木去矣。俄国业已变成共产，俄皇尼古拉第二全家悉被枪毙矣。英国则因对德目标已失，不复再行联俄联日矣。日本则眼看头等军事国家之德国，居然亦可打败，不敢擅开战衅矣。美国则因

---

① 满洲铁路中立事件：1909年，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向各国提出所谓“满洲铁路中立化”的计划，主张中国东北所有的铁路由各国共同承购股票，或者由各国借款给中国将现有各铁路赎回，实现“中立化”制度。

② 门户开放：1899年11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分别向英、俄、德、日、意、法等国，提出了一个关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其主要内容为：美国承认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在所有势力范围内享有通商自由，享受低税率和一切特权利益。1900年7月，海约翰再度照会六国政府，主张把“门户开放”政策应用到“中国一切地方”去。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目的，是企图通过“机会均等”的手段，一方面缓和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另一方面保持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自由开放。

③ 斯拉夫民族：操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诸语言各族的总称。主要分布在欧洲东部，部分散居在西伯利亚和美洲。分为三支：东斯拉夫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西斯拉夫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卡舒布人、卢日支人），南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黑山人、波斯尼亚人）。多数信东正教，少数信天主教。

④ 威廉第二（1859—1941）：德意志帝国皇帝、普鲁士国王。在位时，德国正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统治时期。他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1897年强占中国的胶洲湾，1900年出兵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参与瓜分中国的竞争。1914年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11月德国革命爆发后逃往荷兰。

欧战之赐，掌握世界经济霸权，无敌与争矣。中国则于其间发生共和革命、军阀割据等事，直到今日居然渐趋统一矣。世态变迁，可谓剧烈之至！虽然，满洲问题却未尝因此一变而随之解决！不但未曾解决而已，并且成为今日之第二巴尔干半岛。稍一不慎，又将成为各种民族鲜血涂抹之地。

盖满洲问题，不仅为中国生死存亡所系，而且与日本生存利害有关。倘使现在世界上只有中日两国者，则其势必将出于一战，战必为日本所夺去，殆无疑义。然而，其中却有一位长袖善舞之美人[①]在，以致日本方面对于满洲，欲得而不能得；中国方面对于满洲，欲保而不能保。其结果遂变成一种国际问题，为众目所集之点。近年以来，日本借入美款甚巨。美国明知日人借款，并非全数用于日本国内，实有一部分用于满洲事业。换言之，即是美国对于满洲各项事业，遂由此取得间接债权。倘中国方面始终无力自强者，则美国将借日本之手，以取余利，决不愿满洲方面有所骚动。此所以当党军势力尚未达于北方之时，美国对于日本处置满事之悍行，不愿多所过问，当时曾使党军甚为失望，职是故也。但党军势力一旦达于北方之后，于是美国首先承认国民政府。盖前此假借日本之手，以向满洲取利者，今将改用“满洲国际化”之旧日策略，以游说中国当局矣。而中国现在既无实力以脱离日本在满之压迫，则亦只有“国际化”一法，可算彼善于此。更加以英国联俄、联日之政策已变，上次英国外相张伯伦[②]在下院宣言不承认日本在满具有特殊地位一事，固已露骨表示。如此，则满洲今后势将成为群雄逐鹿之地，“满洲国际化”之呼声，势将日益增高，而主持其间者仍为美国。至于德、法等国，则当在愿附骥尾之列。因此之故，吾人实可断言：“美国与满洲问题”并非过去陈迹，乃系未来大事。尚望国人及早加以注意。

中华民国十七年十月九日王光祈序于柏林 Steglitz，Adolfstr. 12

一、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上德皇威廉第二之奏札（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柏林）

美国（驻德）代办（Reynolds Hitt）曾交来说帖一件，兹特敬谨抄呈。该代办甚愿一闻陛下政府对于说帖所陈原则之态度。

该说帖之大意如下：

美英两国对于投资建筑锦州—齐齐哈尔—Aigun（译者按，此地在俄满交界之处，

---

① 美人：喻指美国。

② 张伯伦（1863—1937）：即奥斯汀·张伯伦，英国保守党大臣，约瑟夫·张伯伦之子。1892 年当选下院议员，历任邮政总长、财政及印度事务大臣。1924—1929 年任外交大臣。

是否即系爱珲?）铁路之举，业已彼此同意。

美国方面，随后曾向英国提出下列条陈：

（一）为保持中国在满主权之安全，以及满洲方面“门户开放”政策之发展起见，应使中国政府能将该地铁路（换言之，即是俄、日两国所管理之巨大铁路）收为己有。参与华事之列强，应该贷款与华，以作赎路之用。而中国方面则应许给上述列强监督该路之权利，以及若干其他优先权利。

美国方面相信，俄国、日本（德皇威廉第二旁注:?? Na! na! 译者按，此二字乃系表示不信之感叹词）对此计划，当能表示赞成。（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决非出于乐意。）此外，美国更谓，俄国方面对于此举之好意，现在业已略为表露。

（二）假如此项条陈不能见诸实行，则美、英两国对于上述投资建筑铁路之举，必须加以赞助。而且美、英两国为使满洲完全成为“商业的中立化”起见，应当邀请参与华事之列强，参预此种投资建筑该路、或其他路线之举。并设法促进中国方面赎回现有铁路之举。

英国方面对于该项说帖所陈各种普通原则，业已表示同意。美国政府希望此种原则，亦复获得陛下政府之惠然赞成。（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当然一定。）

据臣愚见，我们须步英国后尘。（德皇威廉第二旁注：不错。）

从政策论点出发，则我们甚望俄国能在远东方面，日益稳据，以便与日多生冲突机会。（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是呀。）惟就满洲方面近来情形观之，却又并不如此，俄、日之间对于满洲问题，彼此随时皆能妥协一致。（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是呀。）尤其是中东铁路问题一事，我们时常均见日本党于俄国一方。而在实际上，此事亦复极为自然。盖日本欲俟俄国为其铁路谋得权利之后，日本亦将要求（中国）给与同样权利故也。

俄国方面近来实无与日再以兵戎相见之意，而欲设法与此岛国互相谅解。俄国财政大臣之赴满洲游历，当系为达此项目的起见。其所以未获结果者，只因伊藤早期被刺而死之故耳。（原书旁注：伊藤侯爵于十月二十五日，在哈尔滨恰值〔俄国财政大臣〕Kokowzow 到满之际，被一韩人刺击。）但圣彼得堡方面对于此项计划，仍未加以放弃。

满洲问题恰恰给与（日俄）两国彼此接近之机会，或者竟至于彼此由此结成一种普通同盟。假如日俄两国对于满洲问题，只与衰弱的中国一面发生交涉，则上述日俄两国结为同盟之事，极属可能。反之，假如日俄两国察觉美国，尤其是英国，对于日俄在满企图，意欲竭力加以反抗（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反对彼的日本盟国），则日俄两国希望彼此合作之热情，势当大为冷淡下去。（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此事英国将在印度方面抵偿。）美国条陈对于此点，实曾加以注意。因之，专就此项理由而论，该项条陈亦已值得表示同情。（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是呀。）

若从商业政策出发，则美国此项条陈我们更应十分欢迎。盖中国统治主权及领土完全，如能保持不变，所有全国皆为我们商业开放，则实于德国在华商业最为有益。（德皇威廉第二旁注：不错。）关于此点，我们实与美国完全相同。盖美国与我们一样，对于取得中国土地，以及瓜分中国成为势力范围之举，皆非所愿。反之，其他列强，尤其是日本、俄国、法国以及英国，则其目的却与德美不同。因此之故，我们对于中国问题，似以结纳美国重要盟友为妥。（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必须如此。）美国方面对于满洲问题，特别注意。而我们在该处亦复具有利益不少，尤其是哈尔滨方面，我们商人极占重要地位。彼等之为俄国官厅眼中之刺，可于前次曾经奏明陛下之俄国官厅，对于哈尔滨方面德俄合组的酿酒公司加以强制执行一事见之。此外，类于此项之事变，实可日日发生。并由报纸照例加力描写传播，常成毁损德俄两国邦交之材料。若照美国条陈，对于满洲问题加以解决，则此类事变，不至再行发生。我们因为顾虑俄国之故，对于满洲问题，至今皆采稳慎态度。（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彼并不感激！所以我们现在亦不必如此。）但美国方面对于满洲问题，如欲加以有力干涉，则据臣之意，此举实与我们自己利益相符，我们似应追随美国之后。（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同意。可让美国前行。关于发生冲突仇视之事，亦可由彼担在肩上。）

至于美国政府之意，以为俄日两国对于此种条陈，当可欣然赞许云云，似乎太为乐观。（德皇威廉第二旁注：余亦以为如此。）日本方面对此，一定不甚欢迎。即在俄国方面，亦未必恰合口味。但此种情形，我们实可不必加以重视。盖日本盟邦、俄国好友之英国，并未因此障碍，拒绝美国条陈故也。（德皇威廉第二旁注：不错。）倘对英国此种行动一为考察，则吾人关于美国条陈之一切疑虑，尚未完全扫去者，均可置之不愿。此次之事，显系适与陛下驻美大使前此所谓（美国）总统 Taft 主张对于处置华事务与我们合作之说恰合。而且国务卿 Knox 亦复力赞此项主张。（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此实为主要之点！盖由此日耳曼①与盎格鲁撒克逊②国家互相合作之举，虽只限于异邦〔中国〕之内，此实为第一次故也！所获甚大！）倘若我们对于美国条陈加以拒绝，则将使我们与美之良好邦交，陷于危险，并促美国往亲英国方面。至于我们接受美国条陈，亦不至显然与俄为难。盖此举并非由我们发起，只是临时赞成美国一种偶然提议而已。（德皇威廉第二旁注：不错。）而且此种提议，固与中国“门户开放”原则相合。此项原则，

① 日耳曼：约自公元前5世纪起，分布在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日德兰半岛、波罗的海和北海南岸的一些部落。语言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自称德意志人，克尔特人及罗马人则称之为日耳曼人。

② 盎格鲁撒克逊：古代日尔曼人中的盎格鲁、撒克逊、朱特等部落集团。分布在北欧日德兰半岛、丹麦诸岛、德国西北沿海一带。公元5至6世纪，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渡过北海移居大不列颠岛。盎格鲁和撒克逊两部在7至10世纪期间结合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经过长期战争，征服并同化岛上大部分克尔特人，建立了七个早期封建王国，又与后到的丹人、诺曼人结合，逐渐形成近代英吉利民族。

俄国至少在理论方面，亦尝主张者也。

陛下前此曾因（驻美德使）Bernstorff 伯爵报告美国总统 Taft 对华政策之机会（译者按：请看篇末“原书按语”），命臣凡有关于此事之美国条陈，均宜表示赞许。（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是呀。）因此，臣敬祈陛下，惠然朱批旁注，使臣有权对于说帖所陈普通原则，用政府名义，加以赞成。（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是呀，必须如此。）

V. Bethmann Hollweg

（德皇威廉第二顶批：）很可欢喜！朕完全同意。威廉。二四、一二、一九〇九。终竟有此一种宏大国际眼光与远眺！真是美满可喜！日耳曼种族（译者按：中国旧译为条顿民族）能在东洋合作！蒙古人与鞑靼人[①]势将带上一种酸色面孔！（译者按：犹言皱眉皱眼，有苦说不出之意。）

（原书按语：）十一月十五日，Bernstorff 伯爵报告，曾与美国总统 Taft 谈话。其内容略谓：“Taft 先生闻余近又获得皇上陛下与（总理）阁下之训令，命将我们对于东亚事件甚愿与美合作之意代为转达云云一事，不胜欢喜。该总统并谓，国务卿方面不久即将向参与华事之列强提出条陈，其目的在使中国‘门户开放’政策愈趋实现之途。但其中详情，Taft 先生却未提及。不过，就其谈话观之，彼对于东亚事件，似乎愿意居于领袖主持地位云云。”德皇对于此项谈话，甚为赞许，而用“好”与“是呀”诸字旁注其间。

附件

说帖原文：（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由美国驻德代办 Hitt 呈递）

“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十七，美英两国对于投资建筑锦州—齐齐哈尔—爱珲铁路之举，业已彼此约定互相合作。美国政府曾告英国外部：美国方面愿与不列颠帝国政府，对此关于中国进步与商业发展均极重要之事业，诚意合作，互相协助。美国政府并言：为商业发展利益均沾计，当设法再将此事扩及其他与华有关之列强。彼等之加入，当为中国方面所欢迎。而且彼等亦尝自愿赞助商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以及保持中华帝国领土之完全。

无论如何，美国政府在继续商定该约以前，先请不列颠帝国政府，将其对于下列备选的、宽括的草案之意见，一为见告。

---

① 鞑靼：古族名。又作达怛、达旦、达靼、达达、塔塔尔等。最早见于唐代记载，为突厥统治下的一个部落。突厥衰落后，鞑靼逐渐成为强大的部落。蒙古兴起后，鞑靼部为蒙古所灭，但西方通常仍将蒙古泛称为鞑靼。

第一：或者保持中国在满主权，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同享商业机会均等，力促该地发达进步之最良方法，似宜将满洲铁路置在一种经济的、科学的、没有党派的管理之下。此项管理计划，现正向华提出，拟由列强之愿意参与路股者投资为之。此项借款须与以宽裕年限，并使其妥当安稳，以便能于规定期间之内支付。而且借款条件，应使银行家及投资者均乐于参与其事。此项计划之中，并宜预先规定，投资国家在此债期之内，得有派员监督该路之权。所有投资国之人民与材料，在此期限之内，得享通常优先权利，而且彼此之间公平享受。

此种计划之实行，当然需要中国、日本、俄国之合作，（如）关于满洲现有铁路之归还与让许诸事（是也）。同样，亦需英国、美国之合作。盖英美两国在此新结锦州—爱珲铁路条约之上，具有特别权利故也。

此种计划对于日俄两国，皆有效益可睹。该两国（既尝愿好意庇护满洲“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政策，又尝愿确保中国主权之完全）当能欢迎此种机会，将其向来保护彼等商务以及其他利益所负之特别义务、责任、费用，转由列强公平组织之团体担负。同时，该两国又能按照彼等利益比例，置身此项团体之中。美国政府甚信此项计划能得俄国方面之惠然赞助，并信美人投资参与之举，必能实现。

第二：假如此项提议不能实行，则英美两国当尽力协助锦州—爱珲铁路条约。更邀请列强惠助满洲完全商业中立化之举，并参与投资建筑上述铁路以及商业上必要之其他支线。同时，筹集款项，以作中国赎回现有铁路之用，如其此项现有铁路可以出让括入上述路线计划之内。如此，则吾人所希望之目的，倘不能达，亦可渐为接近。

美国政府希望上述提议中之原则，可以荐之于不列颠帝国政府。同时并指出该项原则，尚有下列附加理由佐证：即此项计划之完成，可以避免一切由各银行家与中国政府直接谈判无法稽查所产生之困恼情形。而且在华重要关系国家之互相联结，当使合作之举更易，以促中华帝国政府现在十分注意之改良国库币制问题，趋于简便一途。

大不列颠政府对于上述普通原则，业已表示赞成。美国政府欲请德意志帝国政府，亦复注意于此，并望此项原则能得（德国）帝国政府之同样惠然赞成。

二、德国外部秘书 Schoen 男爵致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之电（一九〇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自柏林寄。**）

答复 A 字第一八三号报告。（按，即驻美德使 Bernstorff 十一月十五日之报告。请看前篇篇末所附“原书按语”一段。）

美国大使曾将本月十七日说帖，交给我们。其内容为（美国）总统 Taft 所提关于促进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一事，尤其是关于满洲方面。此项条陈并与投资建筑锦州—

齐齐哈尔—爱珲铁路一事有关。请告美国政府，我们对于彼所提出之普通原则，完全赞成。倘若彼因实现此项原则起见，有所进行，我们极愿附和追随。

对于美国大使方面，已将此意告知。

V. Schoen

（原书按语：）德国政府方面对于美国说帖，最初未以书面回答。其后，因应美国方面之希望，乃于二月二十一日，特用公文答复。其中有云："德意志帝国政府对于说帖中所列普通原则，极愿表示同意。盖因此种原则，实与德国政府所采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完全相符故也。"

三、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一九〇九年十二月自华盛顿寄，十二月三十一日到柏林。）

答复第一四七号电报。（按，即上列第二篇。）

余于今日，曾依照训令，向着国务卿表示我们意思。彼闻之极为欢喜。彼并将美国驻英大使（W. Reid）与美国驻日大使（O' Brien）来电，念与我听。

英国政府回答之中，曾言：彼甚欲先行一知，究竟俄日两国对于美国条陈，系采何种态度。

美国驻日大使之意，则谓日本对于南满铁路国际化一事，当可允许云云。

国务卿觉得此种计划，极有重大意义。盖由此可于俄日两国之间，置一缓冲地带，以使（国际）和平及"门户开放"两事巩固。

国务卿更以为日本方面或者真是心口如一（德皇威廉第二旁注：一定不是），愿意满洲门户开放。如此，则日本行将解脱满洲铁路之管理责任，并由此得着（赎路）款项，以改进彼之财政困难状况。（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此在日本方面实将引为十分幸福者也。（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恰恰相反！只算是恶剧之中强作欢颜而已！）但是，如果日本方面并非心口如一，则此种计划正足以强迫日本暴露本相。（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希望如此。）国务卿并曾应用下列一种吐属，略谓我们在此事件之中，可将日本熏干。（德皇威廉第二旁注：用英国烟气乎？此真可以算作一场趣剧！）

Bernstorff

四、德国驻日大使 Mumm von Schwarzenstein 男爵致柏林外部之电（一九一〇年正月二日，自东京寄。）

美国（驻日）大使曾于上月十八日，依照训令向着（日本）外务大臣 Komura 伯爵

提出条陈，主张满洲所有已成未成铁路均当收归（中国）国有（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好呀！）并参加国际资本，置诸国际监督之下云云。Komura 先生曾答以此事关系重大，在内阁会议以前，不能表示任何意见云云。

英国（驻日）大使（Sir Claude M. McDonald）与法国（驻日）大使（A. Gérard）曾接本国政府通知，谓美国在伦敦与巴黎方面，亦有同样之行动。

美国（驻日）大使相信，英国政府对于美国条陈，当抱好意态度。但英国（驻日）大使向余则表示一种十分慎重保留之态度。（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彼当显出一副好看面孔。）

余以为日本方面，无论从政治上与军事上理由着眼，对于现在已经筑成或者已经允许之铁路，当无赞成美国条陈办法之事。余更怀疑，英国政府愿照美国意旨，向着彼之盟国（日本）加以何等压迫。（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如此则美英两国之间，势将发生不调情形。英国处此黄种盟友与白种兄弟之间，势将进退维谷！）

五、德国驻俄大使 Pourtalès 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〇年正月四日，自圣彼得堡寄）

余从美国（驻俄）使馆参赞（M. Schuyler）处闻知，美国政府曾交与俄国政府计划书一件。此项计划书，曾由美国使馆秘密给余参考，兹特附呈。按照该项计划，则满洲境内铁路，将由一种“国际组合”加以收买。Schuyler 先生并谓，现在已有英美两国银行，愿意对于此事投资。而且预料德国资本，亦将加入云云。究竟此间政府对于此项条陈所抱态度如何，该参赞尚不能详细确实告余。惟就彼所得印象而论，似乎此间重要人士，对于此项问题意见，甚为分歧。

其间，余更从他方面闻知，近来（俄国外长）Iswolsky 先生与美国大使 Rockhill 之间，曾开谈判数次，讨论此事。并闻 Rockhill 曾经声言，假如俄国对于此种满洲铁路国际化之条陈不愿接受，则该项“国际组合”或将建筑一条铁路，以与东部西比利亚铁路之满洲一段，互相竞争。（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是呀。）Iswolsky 先生之精神，现在又复饱受刺激。彼认为美使此种声称，乃系一种恫吓之举。于是激烈争辩不已，竟使美使 Rockhill 先生忿而言曰，倘若该总长以后仍持此种腔调，则该使将来与彼只用书面来往（不复再作面谈）矣云云。（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恭喜恭喜！Iswolsky 应该小心一点！关于金钱之事，与美洲佬打交涉，不是一桩好玩的事情呀！）

因为上述各种情形之故，于是近来新得一种消息，颇可值得注意，即奥匈使馆武官（Spannocchi 伯爵）曾从可靠方面闻知，现刻中俄两国之间，正在磋商将满洲里一城割与俄国之举。如此项消息果确，则俄国方面对于出卖西比利亚铁路满洲一段之事，似乎

已在打算之中矣。(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卖与日本？抑卖与中国?)

F. Pourtalès

六、德国驻日大使 Mumm von Schwarzenstein **男爵致柏林外部之电（一九一〇年正月自东京寄，正月十一日到柏林。)**

继续第三号电报。(按，一九一〇年正月九日，德国驻日大使曾拍第三号电报，报告柏林，略谓所有日本报纸，无不反对美国条陈云云。)

日本内阁总理 Vicomte Katsura 曾经声称，没有一位日本部臣，敢于接受美国条陈。(如果接受，则）日本国民势将立焚大臣府第。

但答文之中，对于美国条陈，在原则上却极十分敬仰。

Mumm

七、德国驻英大使 Metternich **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〇年正月十日，自伦敦寄。)**

今日余与 Sir Edward Grey 之私人秘书（Tyrrel)，谈及美国国务卿在报上发表之满洲铁路计划一事。但余却故意不令该秘书察出，余已从柏林方面得知此事内容。

Tyrrel 先生言曰：英国政府对于美国条陈，仅仅原则上加以赞成。并曾特别声明，此事须先求俄日两国政府同意方可。其后，(美国国务卿) Knox 先生乃转向俄日两国政府接洽。直到现在，彼只接得俄国方面一种推托答复，略谓俄国政府对于此项计划，尚须详细加以考虑云云。至于东京方面，则至今未有回答。

Tyrrel 先生对于美国国务卿报上公布之举，至为诧异。彼并以为日本舆论之严重拒绝，实属最易明了之事。

该秘书又言：依照美国计划，则此种由美德英法从日俄手中购得之满洲铁路，应该交还中国政府，由中国方面加以管理云云。彼甚疑惑能够筹得必须款项，以购此种预备交还中国纯由华人自行管理之铁路。

究竟此处，是否仅系 Tyrrel 先生之错误，余实不能评断。盖因余未向彼相告美国政府交与我们之计划，其内容实与彼所言者不同故也。

P. Metternich

八、德国驻俄大使 Pourtalès **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〇年正月十二日，自圣彼得堡寄。)**

俄国政府对于美国所提出之满洲铁路说帖，虽然尚未表示确切态度，现在业已表现

之舆论情形，虽然尚欠明了；但今日已经可以断言者，即美国条陈之在此间，就普通一般而论，并不受人欢迎是也。（德皇威廉第二旁注：请稍待！此时即加以评断，不免太早。此事环境甚好，俄皇对此甚为倾向！）不过，亦有一部分舆论以为，此种计划，果然实现，则对于俄国方面，实有利益可期云云。

至于反对美国此种条陈之重要意见，则为：假如俄国接收此种条陈，则无异自将远东向有地位，加以放弃。（德皇威廉第二旁注：俄国自己固极欲如此。）其结果不免大失威望。余相信俄皇尼古拉陛下，以及军人方面，皆为反对接收美国条陈之主力。（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否！恰恰相反！俄皇已无恋恋远东威望之心。对于美国条陈表示同情。）此外，对于满洲国际化一层，此间亦复不甚欢迎。最后，更极反对一切扶助中国经济、文化进步之举。（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在俄皇方面却不如此！）盖俄国甚惧中国将来或有成为俄国险敌之一日也。

（反之）主张美国计划有利俄国者，则以为：俄国如果接收美国条陈，则对于此项实际上不能永远享有之铁路，可以换得一种巨款（德皇威廉第二旁注：不错，卸去重担），可以大做一笔生意。此派之中，尤其是大斯拉夫主义一流，对于俄国东亚政策，素为眼中之钉。所以希望，如果东亚企业一经清理解决之后，则俄国从此可以将其“传统的近东责任”，加倍努力为之。

至于（俄国外长）Iswolsky先生，对于美国计划之态度，则常为个人利害关系所左右。该总长对于此种将被许多方面责以丧失俄国威望之步骤，颇难加以决定。此外，Iswolsky先生又系一位极端反对满洲国际化之人。所以反对此事之原因，大约该总长对于俄国政治重心，由远东移置欧洲一事，虽亦表示同情，但对于满洲方面以后事务，却仍喜专与日本一国接洽。（德皇威廉第二旁注：但美洲老以及其他各国，却恰恰不愿如此。）据各种朕兆（编者按，当为“征兆”。下同）观之，则伊藤侯爵前此到哈尔滨时所拟画之俄日谈判，并未根本取消。日本驻俄大使Motono男爵之父，虽已死去数个礼拜，而该使却仍勾留本国，尚未赴俄回任。因之，此间皆以为，该使关于俄日在满协调一事，必有所接洽无疑。（原书旁注：在实际上，因为美国举动之故，日俄两国确曾立即开始接洽，以谋彼此协调。其结果遂订成一九一〇年七月四日之日俄满洲条约。）假如此种揣测不错，则此间政府对于美国条陈之感不快，可以由此想见矣。

当（美国驻俄大使）Rockhill先生近将本国政府说帖一份，递与（俄国）外交、财政两位总长之时，（财长）Kokwzow先生但将此项说帖接收而不表示意见。至于（外长）Iswolsky先生，则认为此项问题，对于俄国非常重要，必须子细长久研究方可。而且该总长每逢谈判之时，对于其中各点，尤其是对于应用外资以助中国筑路之理想，十分反对。（德皇威廉第二旁注：该总长之见解，恰与彼之主上相反！）该总长并表示一

种“十分忿激不安”very excited之态，一如美使向余转告者。该总长曾谓：俄国若以一个强大中国为邻，对于俄国方面何等危险。(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如此，则俄国正应对于中国加以友善帮助，互相联络，以抗日本!)而(美使)Mr. Rockhill之意，则以为该总长之恐惧中国，不仅是毫无根据，而且是恰与事实相反。盖一个国力强壮、经济发达之中国，实系对于维持远东和平之最好保障(德皇威廉第二旁注：不错)，以及对于各国自由贸易之切实担保。该使并引中国历史从无侵略他人之举为证。而日本则以其人口过剩之故，最易被迫出于侵略政策一途。(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是呀！势将如此。)至于俄国所谓中国若与日本联结，则对于俄国方面极属危险云云。而在该使观之，则又认为万无其事。(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或有其事。)依照Mr. Rockhill意见，则中日两国之利害相反，中日两族之仇恨深大，均非可以办到互相合作者。(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希望如此。)所谓“黄祸”程度增高一说，未免距离事实太远。因此，一个文明进步之中国，实为抵抗日本侵略东亚大陆之堡垒。(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希望如此。自相分裂，则易于驾驭。)

又此间常以接收美国计划，则海参崴方面之陷于危险地位，当愈较今日尤甚为忧。(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毫无意义。)而美使对此，则认为未免过虑。该使之意以为：和平之时，俄国在此中立铁路之上，关于运输军队火器各种权利，当可获得允许。其在战争之时，则战争双方对于满洲铁路中立之不能加以尊重，固属当然之事，不能避免者也。(德皇威廉第二旁注：不错。)

最后，余更有不欲忘述者，即此地人士对于彼等英国盟友与美合作一事，不免顿起怀疑英国远东政策之念。(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可喜之至。)此间某外交界甚至于业已发现朕兆，谓俄国方面现在颇忧英国附和美国行动，阻止俄日两国协调云云。(德皇威廉第二旁注:?)至于(驻俄)英使(Sir Arthur Nicolson)对于美国条陈之所以不甚表示欢迎者，其原因系由于Sir Arthur Nicolson觉得美国此种计划，有危彼所注重之英俄同盟一事故也。(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当然。)(美使)Mr. Rockhill曾向余言曰：英使似乎不甚愿意设法运动此间政府接收美国计划云云。其在(英使)Sir Arthur方面，则又时常向余表示十分排斥美国计划之意。并谓该项计划，只算一种幻想而已。彼更以为日俄两国必无接受此项条陈之事。(德皇威廉第二旁注：该使行将禁止俄国或〔俄国外长〕Iswolsky为之。)

现在，此间对于美国计划之论调，虽不甚佳，而美使却相信，俄国政府衡量得失轻重之后，终当趋于接收该项计划一途。又该使以为即就减除俄国与其他列强冲突机会，譬如现在哈尔滨情形一事而论，对于俄国方面已极有益。此固斯地人士不能闭目否认者也。

但余对于美使此种见解，似乎未免过于乐观。不过余却相信，在原则上，此项出售满洲境内俄国铁路之理想，即在此间政府方面，亦复颇有表示赞成之人。因此，俄国对于此项计划之最后决定，实与购路出价多少问题甚有关系。（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此事对于美洲佬一点不难。）

F. Pourtalès

补陈

当余写完上列报告之后，偶与（俄国外长）Iswolsky 先生相见，彼向余颇表示其对于美国计划不满之意。彼直谓该项计划未免“幼稚”，该总长以为日本方面万无表示赞成此项条陈之事。此项条陈既因日本之反对而搁浅，则俄国方面实无理由起来参与此种毫无实际之对日示威举动。

除此以外，从俄国方面着眼，对于美国此项计划亦不能不加以指摘。盖吾人所不应忘怀者，即俄国对于彼的东亚地位，牺牲金钱、身命何等之多。如果接收美国条约，则无异将此地位根本放弃。（德皇威廉第二旁注：Iswolsky 对于此种地位，固已老早放弃矣！现在彼尚可由此换得金银！）

该总长最后更谓，俄国答文数日之间当可递给。至于该文内容，现尚未曾确定。但彼却不相信，该文将表示赞成美国条陈之意。（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彼之主上想法，却与此不同。）

至于德国方面，仅为本国商业起见，原则上表示赞成“门户开放”。因此，该总长对于此举，完全谅解。

九、德国驻法大使 Radolin 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〇年正月十三日，自巴黎寄。）

此间报纸对于美国政府所提满洲铁路国际化之条陈，曾屡次加以讨论。至于法国政府对于美国建议所采之态度，据各报所述，大概系取静待态度。

（法报）Temps 首将依照美国建议解决满洲铁路问题不免发生之种种巨大困难，先行论列一遍。然后乃言法国对于此项问题，并不特别直接注意。彼所最为系念者，惟保持中国领土完全，以及维持东亚方面俄日英三国同盟两事而已。（德皇威廉第二旁注：? 新同盟！）盖此项同盟最足以保证法国安南领地安全故也。（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如此，则此项保证，最不可靠！）不过，法国方面如遇必要之时，却亦愿意投资参加。（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换言之，即是既不击亦不刺。）

此外，（法报）Le Siècle 之论调，亦与上面所述相似。该报以为法国态度，将以彼

等盟友俄罗斯与日本盟友英吉利之态度为转移。(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换言之，即是唯日本马首是瞻。日本竟能指挥欧洲三国行动!)假如美国条陈将来果然造成一种国际经济组合，则法国决计一如从前对于（西亚）Bagdad 地方铁路问题所要求，换言之，即允许法国资本参加之额，至少必与其他最惠国家相等。

最后，(法报) Petit Parisien 乃言法国当其未知英俄日三国对于美国条陈所抱态度之前，决不先行定计云云。(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呸！大大大国!)

Radolin

十、德国驻俄大使 Pourtalès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一九一〇年正月十五日，自圣彼得堡寄。)

与第八号报告有关。(按，即上列第八篇。)

(俄国外部属吏) Sasonow 先生曾告此间某外交家，谓俄国阁议一致反对接收美国计划。(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可怜的俄国！将来当要后悔!)关于递给美国方面之答文措词，现刻尚在精究之中。

十一、德国外部秘书 Schoen 男爵之记录（一九一〇年正月十九日柏林。)

陛下曾向余言，彼与俄国大使 Osten-Sacken 伯爵，对于满洲问题一事，曾作长时间之谈话。Osten-Sacken 伯爵向彼声称：俄国方面反对美国条陈。盖俄国现在系采对日妥协政策，尤其是对于满洲问题，希望与日谅解一致。Osten- Sacken 伯爵并明言，俄国政府目的，系在停止远东冒险政策，以便全力集中近东方面。

当陛下向彼言曰，果尔，则俄国将与从前所抱亲华政策，背道而驰云云。于是，该使答曰，日本危险程度，实较中国危险程度为大云云。

陛下遂由此断定，我们从此更应与美合作，以使白种团结。此种政策即英国方面，最后亦必加以承认云云。

(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旁注：陛下今日亦曾以此意向余言之。)

V. B. H. 20. I

(原书旁注:)皇上在一九一〇年正月十九日寄到柏林之（德国）驻华公使 Rex 伯爵正月二日报告篇末，曾照此意下一长批：“我们必须与美订一保全中国领土之约——共同协作 Common concert。而且此约，他国亦可随意参加，维持中华帝国领土完全。就该报告观之，中国急需外力帮助，因此，美国举动一点不错。据附寄之（Wolff）电文来看（按，该电系报告中国政府正式赞成与美订结建筑齐齐哈尔—爱珲铁路之约),

则美国方面自始即未尝期望彼之条陈，可以见诸事实。盖齐齐哈尔—爱珲新路，乃系（原有）满洲铁道之竞争路线故也。（驻俄美使）Rockhill 曾向（俄国外长）Iswolsky 明言：倘若俄国对于满洲铁路国际化之条陈，加以拒绝，则美国当筑此项新路（与之竞争）。

此事将使日本极感不快。彼与华盛顿方面之关系，亦将不能改善。

该（德）使所谓日本在大陆方面预备战争一事，实足以证明我们常从军事各方所探得之报告，确实可靠。日本欲有海参崴，而且必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以前有之！盖在此年之中，日本或者必将与美开战，以争太平洋（霸权）。开战最迟期限，必当在巴拿马运河[①]筑成以前。因此河一成，则美国大西洋舰队可以驶入太平洋内，于是美国太平洋方面之优势，遂从此永远确定。因此，我们之友谊，实为美国所急需。我们宜在此种论点之下，与美协商税则问题。俄国之意，欲将其东方关系清理了结，以便前往（巴尔干半岛），而不知其间黄人却将跑到（俄国）或者再往前进。威廉。”

十二、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一九一〇年正月，自华盛顿寄。正月二十日到柏林。）

答复第九号电报。（按正月十七日柏林方面曾将上列第十篇驻俄德使电报内容，通知 Bernstorff 伯爵，是即第九号电报。）

国务卿亦从圣彼得堡美使处闻知，俄国拟将条陈拒绝。但对于说帖中之备选条陈，或将接受云云。该国务卿现正静待日本方面之拒绝。在实际上，我们乃系唯一助彼之人。盖英国方面只是原则上表示同意，未尝多所赞助故也。美德两国现在遂成为唯一无二实际保护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之人。（德皇威廉第二旁注：不错。）该国务卿之条陈虽然搁浅，但彼却不后悔曾提斯议。盖俄日两国由此必须将其本相暴露故也。（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是呀。）该国务卿现在并信，日俄之间行将订约瓜分满洲。（德皇威廉第二旁注：英国当加以庇护，以便自己可将扬子江插入荷包之内。）不然，则日俄两国对于此次美国条陈，必当十分欢迎之不暇。盖俄国从前曾有意欲将彼之满洲铁路卖与中国，而日本亦曾拟将彼之满洲铁路卖与美国 Harriman 会社，该国务卿固尝深悉其详故也。

Bernstorff

① 巴拿马运河：位于美洲巴拿马共和国的中部，横穿巴拿马地峡，全长 81.3 公里，是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重要航运要道，被誉为世界七大工程奇迹之一，有“世界桥梁”之称。

十三、德国驻日代办 Montgelas 柏爵（编者按，当为“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一九一〇年正月二十一日，自东京寄。）

据美使密告，日本政府对于美国所提满洲铁路问题之条陈，已于今日表示拒绝。反之，对于参加锦州—齐齐哈尔铁路一事，却原则上表示赞成（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很聪明），但未加以详细讨论。（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哪，伦敦?!）

Montgelas

十四、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一九一〇年正月二十一日，自华盛顿寄。）

（美国）总统今日复又谈及彼所心爱之中国“门户开放”问题。彼云：“余甚欲其开，但余现在看见，彼等皆欲其闭。余殊奇怪（不解），究竟英国所欲得之于日者为何。”（德皇威廉第二用英文旁注于下云：彼〔指美总统而言〕须以金钱或其他方法为其政策而战。）

盖总统与国务卿近来已将英国回答当作拒绝看待。该总统最后并言：“当余最后一次看见（俄国外长）Iswolsky 之时，与彼相聚期间甚促。余曾向彼言曰：阁下从前赞助日人，不顾我们。现在，阁下对之究竟何如?”

Bernstorff

原书注语：（美国总统）Taft 从前尚任军事秘书之时，曾于晚秋时节，由海参崴前往圣彼得堡旅行。此处所谓最后一次看见 Iswolsky 云云，当系指此。

十五、德国外部秘书 Schoen 男爵上德皇威廉第二之奏札（一九一〇年正月二十三日，柏林。）

皇上陛下，余不敢遗漏怠慢，谨将此间俄国大使交来之备忘录一件，恭呈御览。此项备忘录之内容，乃系（俄国外长）Iswolsky 先生回答驻俄美国大使关于满洲铁路中立问题之公文。

附件

备忘录

余奉命通知阁下，昨日 Iswolsky 先生曾向美国大使发出宣言，以答华盛顿政府最近关于满洲铁路中立化一事之条陈。帝国政府之意以为，满洲现在情形，无论对于中国统治主权或“门户开放”原则，均无陷于危迫之事。因此，帝国政府未便接收美国计

划。在实际上，此类计划之实行，对于中东铁路公司，不免有损。对于与此有关之许多私人利益，亦然。在他方面，此种铁路乃系联络我们远东领地之线，所以我们对于铁路所经区内变更管理事务之举，必须十分谨慎。至于锦州一爱珲铁路之计划，帝国政府允于原则上加以研究。而且我们对于此种计划之促现，是否参加，当以我们先知此种企业之基础组织为先决条件。盖此种基础组织，我们至今一无所知故也。同样，对于锦州一爱珲国际会社或欲建筑之其他路线，帝国政府亦当预先保留，一俟考察计划内容以后，再行决定参加（与否）之权。

十六、德国驻日大使 Mumm von Schwarzenstein 男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gweg 之文件（一九一〇年正月二日自东京寄。正月二十四日到柏林。）

余既由各种痕迹现象，察得此间必有何等外交行动之后，乃从而探听，得悉上月十八日，美国大使曾向日本外务大臣递一通牒，主张满洲已成未成铁路，收归（中国）国有，并且参加国际资本，应受国际监督云云。因十二月十八日为星期六之故，该牒似乎直至上月二十日，始到日本大臣之手。至少十二月二十日某处早餐之时，该大臣对于通牒内容，犹自谓毫无所知。当上月二十三日接见外国使臣之际，美国大使曾向（日本外务大臣）Komura 伯爵谈及该牒之事。但该大臣只答以此事关系重大，非先行提交阁议之后，彼不能发表任何意见云云。

英法俄三国驻日大使，曾由本国政府电知，谓美国驻英、驻法、驻俄各使，曾有同样行动云云。又上述三位驻日大使并曾闻知：北京政府亦当接得同样通牒。究竟柏林方面是否亦有同样通牒之递给，则虽美国大使自己，亦复不能向余确答。但余却相信，柏林方面必有此项通牒递给无疑。纵然法国驻日大使曾向余言：美国此种在日、在俄、在华行动，之所以特别通知伦敦、巴黎政府者，或者只是因为英法与日俄有同盟关系之故而已云云。（但余终信柏林方面，亦有此项通知。）

关于牒文内容，美国驻日大使则以未有本国政府训令允许之故，不能交余阅看。至于法国驻日大使，则谓巴黎方面曾将美国条陈择要电示云云。而且此项巴黎来电，似乎与（美使）O' Brien 先生口头向余相告者，不甚符合。

现在最关重要之问题，当然是日本政府对于美国条陈，究采何种态度。据余所见，则美国此种行动，将被此间政府很恭敬的，但是很坚决的拒绝，实属毫无疑义。

余之个人，当可不为人所怀疑，谓余久居黄种之间，业已变成亲日派。因此之故，余可静将余之下列意见发表：即美国此种对日奢求，可以视为一种幼稚轻率之举动，而且此种举动实为缺少外交训练之华盛顿政府所常常不免者也。美国此种行动颇令余觉得，好像一位小加尔（Karlchen）跑到一位小亨士（Hänschen）那里去，提出建议：

两位共将苹果瓜分。而小加尔自己却未尝带有苹果来此，以作瓜分之用！主张满洲以及各地“门户开放”，诚然是一桩很美之事。但此种原则之实行，则常为各国现有特权所限制，只能达到某种程度为止。此种特权，无论由于事实上的或由于条约上的，均可。余意以为吾人若从公道上说，对于日人方面，实难令其未有何等可靠交换权利，遂将自己特权先行放弃。盖日人此项特权，固系由于战胜所得，并当着美人面前，特订条约，加以证明者也。日人之得有南满铁路，也系由 Portsmouth（日俄议和）条约所规定。至于安东—奉天铁路之权利，则系由于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北京条约所得。吉林—Hoi-rjöng 铁路之权利，则系由于去秋中日条约所得。所有上述各种铁路，对于日本控制邻居大陆，无论在政治上及军事上，皆含重要意义；并与高丽、旅顺两地，构成日本势力之台柱。

但是美国人，虽在自己家中，时常努力辩护门罗主义[①]，而现在却带着一副十分天真烂熳之面孔，前来向着日人建议，请将各种铁路惠然让出，以利公众云云。倘若日人果然为之，则必系彼等曾经大饮墨水无疑！（译者按：系谓必系疯了之意。）

美使 O' Brien 先生诚然向余游说，谓日本如果出让，对于日人实有种种利益。譬如日人将由此换得许多金钱，以整理国内财政；又如日人将由此得以避免此后与华、与俄之纠葛。盖彼此冲突机会，因此大为减少故也；此外，投资建设满洲铁路之列强，尚将给与日本关于防俄侵略之保证，于是，日本将成一个永远不能被人攻击之纯粹岛国云云。吾人对此，首先有所欲言者，即南满铁路至少依照日人方面声称，乃是一条十分赚钱之铁路。因此，财政原因一说，实不能作为放弃该路之理由。至于日本对俄、对华关系一层，如果日本方面宁愿依靠自己铁路以及护路军队之助，而不愿依赖国际保证之举，则余对此，无论如何，殊不敢谓其失计，加以非难也。最后，日本自己并不愿意永作一个纯粹岛国。彼将中国东北视作彼之势力范围。当彼既将高丽获得之后，于是自认具有资格对于南满地方行使一种统治主权。日本移民南美洲与菲律宾之举，在大体上既已认为效益很少；而同时移民北美与澳洲之事，又为该地政府所阻限。于是，日本移民之大潮流，乃由政府加以赞成与奖励，群向亚洲大陆而来。倘若日本竟将该处所属铁路放弃，则对于日本移民事件，以及日本势力全部，势将受一重大打击无疑。

假如一个商人某甲，向着其他一个商人某乙建议，彼此商店合并为一。则某甲对于

---

① 门罗主义：1823 年 12 月 2 日，美国第 5 届总统 J. 门罗在致国会咨文中宣称：美国将不干涉欧洲列强的内部事务或它们之间的战争；美国承认并且不干涉欧洲列强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保护国；欧洲列强不得再在南、北美洲开拓殖民地；欧洲任何列强控制或压迫南北美洲国家的任何企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的敌对行为。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史称“门罗主义”。此为美国对外扩张政策的重要标志，它在实际上宣布了拉丁美洲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

此种新组商店，必须安置一些资本货物进去。但是美国对于此项所拟创设之铁路组合，究竟将投何物进去？最多只有彼与英国共有之锦州—齐齐哈尔—爱珲铁路建筑权一项，可以算作彼之份子。但此项权利，据此间所知，尚未得着（中国）皇帝谕旨允许。更因该路所经，皆系人口稀少、土地贫瘠之区，究竟是否有利可图，现在尚是十分可疑。

至于其余各国，对于美国条陈之态度如何，余此时仅能根据此间各国使臣之表示，加以推断。

此间美国大使关于此事情形，似乎始终未得本国政府详细相告。据该使之意，则英国政府对于美国条陈，系抱好意态度。但余从此间英使所持十分稳慎冷淡狐疑的论调观之，余却未尝察得英国对此系抱好意态度。关于锦州—爱珲铁路问题，英人诚然愿与美国合作。盖英人在此察得现在日人反对锦州—爱珲铁路之情形，远不如从前反对新民屯—法库门铁路情形之烈。因而，英国政府对于此事，或将顺迎 Pauling 会社之意，亦未可知。盖该项会社前此因为英国政府对于法库门铁路采用稳慎态度之故，曾大受损失故也。但英人对于美国条陈之赞成，其程度亦只限于此点，逾此以外，则非彼所欣然欢迎也。据余之意，无论如何，英人决不因为赞助此项条陈之故，向其日本盟友，施用任何压迫。

反之，中国政府似乎愿意接收美国条陈。盖该政府希望由此可以恢复彼之满洲完全主权。至少余从（英使）Sir Claude McDonald 之谈论中，可以看出中国方面似乎有此意向。盖该使尝大胆讥笑“中国愚蠢政府”引以为乐。彼谓中国政府只遇一点黏质（指欧人所用捕蝇黏质而言），亦必去甜一下。于是，现在情愿以一个洋鬼子，去掉换半打洋鬼子；其所换得者，则为此项洋鬼子允许投资筑路云云。

至于法国大使（Gérard）言谈取笑之间，则谓美国外交界此种愚蠢行动，甚令人想起一条狗在瓷器店中之行动。彼并将日本方面不能接受美国条陈之各种理由，一一列举。

关于俄国方面之意见，余直接未有所闻。盖余与俄国大使直到现在，尚未谈及此事故也。余尝向法使言曰：俄国方面对于美国条陈，似应比较日本欢迎。盖此项条陈，虽使俄国放弃满洲铁路，他方面却能藉国际助力，以阻彼之敌人来攻云云。但法使之意则以为，余之主张如果中肯，则必在俄人已将 Kuenga—Chabarowsk—海参崴铁路筑好之后，而现在俄国对于美国计划，当亦不在赞成之列，盖此项计划足以夺去彼之北满优势地位故也云云。

最后，若就此事对于我们而论，则依照余意，即或美国计划实行，将来不免影响我们山东铁路，但此事大体上对于我们总算有益。盖此种计划，实将满洲开放，作成国际自由竞争之地故也。因此，我们实无理由，以拒美国计划实行。然在他方面，余又不主

张，我们因为赞助美国计划之故，向着日本政府积极活动。盖由此将使我们变成一位代取死胎之产婆，并将由此招引日人仇怨，此实为帮助美国计划之结果所必不可避免者也。

A. V. Mumm

十七、德国驻俄大使 Pourtalès 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一九一〇年正月二十九日，自圣彼得堡寄。）

（俄国外长）Iswolsky 先生昨又向余谈及美国所提满洲铁路说帖一事。就其论调观之，足见该外长对于美国条陈，犹有几分不快印象遗留。

Iswolsky 先生曾言，彼实不解美国何以能够提出此种条陈，明知俄日两国势必加以拒绝。（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只拒绝了一半。）

俄国政府诚然表示愿意对于锦州—齐齐哈尔—爱珲铁路建筑计划，加以考虑。但由俄国方面论点出发，对于此项铁路，实有种种危虑前来眼底。试问美国何以能够要求俄国赞成一种横穿俄属满洲铁路之路线，而且此项路线将与俄属满洲铁路作经济方面之竞争，同时并与俄国军事方面特别紧要之 Blagowjeschtsche sk 一地相接！在 Amur 铁路未成以前，俄国万无赞成建筑此路之理。惟吾人引以为怪者，即美国发出此次全部计划之前，并未先与俄国一为协商。盖美国方面固非不知，俄国所有利益将受何等影响者也。

美国条陈亦有一种好处，即彼将俄日两国利害一致之情形，暴露于世人之前。（德皇威廉第二旁注：Nicholson！哈哈！译者按：此人系英国驻俄大使。）同时并使可笑谣言所谓日本具有作战之意者，亦复归于消灭。（德皇威廉第二旁注：驴子！译者按：言其蠢如驴子也。）

就大体情形而论，余觉得 Iswolsky 先生昨日对于美国条陈之非难口气，远较我们最后一次晤谈之时为烈。或者此事与余近从可靠方面所得消息有关，即尼古拉皇帝陛下对于该总长答复美国建议之内容，不以为然。（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全不如此！）盖（俄皇）陛下希望此种拒绝答文之措词，应该再为尖锐简短坚决一点，有如日本方面之答文。（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恰恰相反！）

美使（Rockhill）对于俄国此种拒绝，稍感不快。现在彼亦自承，此次事件办理稍嫌仓卒一点。但彼个人对此却无过失可言。Rockhill 先生在此初次登台失败，当然不甚愉快。

此外美使并谓，俄国不能看到美国条陈于俄有利，实属眼光短浅。（德皇威廉第二旁注：不错。）彼又言：曾有一位俄国高级军官向彼谈及，此间参谋部在四年以前，对

于建筑齐齐哈尔—爱珲铁路问题，曾经特别加以考虑。（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是呀。）足见此路对于俄国军事方面，亦有大益。（德皇威廉第二旁注：不错。）实与 Iswolsky 先生主张完全相反云云。

F. Pourtalès

十八、德国驻日大使 Mumm von Schwarzenstein **男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〇年正月八日，自东京寄。二月四日到柏林。）**

秘密。

直到今日，余均觉得，不便直向（日本外长）Komura 伯爵谈及美国所提满洲铁路条陈一事。一则因为此种题目，当非该外长所欢迎之谈话材料，故余对此特别谨慎；二则因为余既一旦将此题目提出，则余其势很难避免对此一为表示我们态度之举。

反之，最为好事之法国大使（Gérard），对于此事，却不能自禁，特向日本外长叩其所怀意见。据 Gérard 先生告余云，Komura 伯爵曾答以日本在满地位，系由国际条约获得。日本所有南满、安奉、吉林、Hoi-rjöng 各种铁路权利，亦均建在此项条约之上。此种权利乃系由于日本兵士流血所取得，日本政府实无权将其放弃。反之，关于锦州—爱珲铁路一事，则情形略有不同。盖日本对于该项铁路以及此后新添路线之“国有”计划（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国际化”计划），并不反对故也。（译者按：所谓“国有”，系指中国收归国有而言。）此外，关于建筑锦州—爱珲铁路日本投资参与一层，Komura 却未言及。据 Gérard 先生之意，则以为此事当不甚可靠。

法国大使并向余言：日本之所以不愿对于锦州—爱珲铁路特别反对者，实因该路建筑之举，尚系一种疑问。即或最后中国加以允许，而其他具有利害关系之列强，亦将加以阻碍。例如，俄国对于建筑此路之事，即绝对不表同情。盖齐齐哈尔与宽城子[①]间一段之交通，将为此路所吸故也。因此之故，俄国政府方面很难协助该项英美会社，取得此种筑路之权。

Gérard 先生继而又评美国此次行动之方式。彼以为此种行动，真可算是一种奇怪外交手续。如此尚未成熟之条陈，毫无把握期其实现，今竟采用正式公文手续，直向外国政府递交。假如满洲尚系一张未曾书写之白纸，无论俄国与日本均未具有条约上之权利，则美国此种条陈，当然可以提出。而现在情形固不如此。因之，美国政府此举，不是太晚，便是太早。所谓“太早”者，Gérard 先生之意，系指此种满洲铁路收归“国有”，参预国际资本，并由国际监督之举，必须待到各种铁路条约将近满期之时方能谈

① 宽城子：吉林长春市的旧称。

及。但现刻距离此项期间尚远。盖据一八九六年之日俄条约（译者按：当系“中俄条约”之误），则满洲铁路权利，尚有三十六年左右之久。（译者按：此处原文似有错误，“尚有”当改作“计有。”）至于安奉铁路权利，则尚有十二年左右之久。

最后，Gérard 先生并谓，彼觉得美国提出此种条陈，并不十分严重认真。无论如何，彼不觉得美国政府具有实现此种条陈之决心，以及一旦被拒之时，采用严重外交行动之决意。美国政府之所以为此者，不过意欲先期预示彼之将来论点而已。

A. V. Mumm

十九、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一九一〇年二月，自华盛顿寄。二月七日到柏林。）

（美国）国务卿在昨晚宴会席上，与余并肩而坐者数时之久。彼时常谈及中国，盖该国实已成为彼之兴趣中心故也。彼对于俄国、日本以及英国，极为不满。并谓英国实为日本所驱使云云。尤其使彼忿然者，即俄国顷又要求，凡有关于满洲铁路问题之事，均应向其咨询云云。至于俄国此举，其间当已为阁下（此语系该使向着柏林外部长官而言）所闻知矣。国务卿又谓：俄国此种要求，实违（日俄）Portsmouth 议和时之一切宣言。中国时常备受俄日两国之威吓，因为中国太弱故也。吾人对于中国必须加以扶助。但此事固只有（德美）“两个无私国家”所能为也。

现在此间空气，对于我们甚好，实为近年以来所未有。其表示于外者亦复最为热切。（美国）总统与国务卿对于关税问题之解决，曾向余表示十分满意。（原书旁注：美国政府于二月二日与 Bernstorff 伯爵谈判之结果，对于德美商约一事，遂完全妥协。）余对于中国问题，当然不敢多所讨论，仅言此类思想，余在从前曾与（美国前总统）Roosevelt 先生谈过一次而已。兹特敬请阁下（指柏林外部而言）裁夺，余是否应将旧日谈判重行继续。盖此项谈判，在十五个月以前，当美国与日缔约之时，曾经归于停顿者也。

Bernstorff

二十、德国外部秘书 Schoen 男爵之说帖（一九一〇年二月十日。）

我们在一九〇八年，曾与华盛顿政府，对于德美华三国政治谅解问题，加以详细讨论。我们当时曾主张，彼此互发宣言，首由中国商请德美两国，赞助彼之政策。此项政策内容，即系该国不再割让领土与任何一国，并为各国商业开放门户云云。反之，德美两国则向中国政府宣言，赞成此种政策。同时并向彼约言，此后德美两国政策，将以维持中国完全独立与整个领土为志云云。

此种办法之在当时，似无何等危虑可言。盖此举一方面系由中国发动，他方面则系追随英日、俄日、法日各种约协之后。因此，此种协约，曾由上述各国互相结订，只是中国方面未曾加入而已。

此项计划，因为美国反对而搁浅。其实，此事之最初动议，本系美国方面（而非德国方面）也。当时（美国）总统 Roosevelt 曾将自己主张，加以变更，并向（德国）前任大使 Speck von Steruburg 男爵以及（现任大使）Bernstorff 伯爵言曰，彼对于此类与华协约之议不能采用。盖由此或将诱引中国采行仇日政策故也。倘若中日之间发生战事，则中国方面实属毫无武备可言，而德国与美国又均不愿因此代华御日。德国既不能派遣舰队到太平洋去，美国亦不能为华而开战衅，盖美国舆论决不赞成此类战争故也云云。美国在一方面既反对我们提议，而在他方面却不迟疑顾虑，竟与日本于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一日同签一种宣言。其内容系表示美日两国志趣，恰与上述各种协约相同，决定维持太平洋之现状，以及中国领土之完全。

Bernstorff 伯爵建议，重行继续一九〇八年之谈判一事，此时实有许多不便之处。美国现刻政府对于此事，诚然似乎比较彼之前任，愿意商量一点。盖总统 Taft 与国务卿 Knox 欲将中国作为彼等政治活动场所故也。现在彼等关于满洲铁路中立问题，既遭失败，于是彼等或者觉得，美德华三国若能共结关于保全中国领土之条约，当可补救此次失败。但是其中已可大令吾人怀疑者，即美国舆论方面，对于本国政府此种举动，是否赞成是也。尤其令人缺乏把握者，即美国现刻政府之后任，对于此种条约，是否表示同意，并决心贯彻实行。更加以我们所处情形，全与美国不同。美国政府因其所处地势之故，所有政策之决定，毋须顾及欧洲方面，而在实际上，彼亦未尝顾及欧洲方面。反之，我们则常与欧洲列强有关。此项列强对于我们，又复时时皆在猜疑之中。因此，彼辈对于我们原则上赞成美国所提满洲（铁路）中立条陈一事，业曾设法利用，以作攻击仇视我们之具。此外，尤应顾及者，即英国方面最初对于美国条陈表示赞成，全与我们相同；其后，因为顾及彼之日俄两友的原故，遂将初意大为变更。而日俄两国对于远东问题，又复极为相协，携手而行。至于法国，则追随上述列强之后。

如果我们竟自愿与美国、中国共结此种领土保全条约，则我们势将陷于上述欧洲列强以及日本方面之反对地位。而且预料此后所有美国远东政策，其势皆将成为我们远东行动之唯一指南。此外，更因我们前此赞成日俄两国最为憎恶的满洲铁路中立条陈之故，于是一腔仇恨，直落我们身上。其结果，我们欧洲方面之国际关系，益趋恶劣。而与美妥协一层，却只能算作一种毫无把握之抵偿。至若关于欧洲政治问题，我们将来或可获得美国实力赞助一层，则我们无论如何，千万不宜作此妄想。

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万无再向华盛顿提议订结保全中国领土条约之理。（德国国

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旁注：决不再作此项提议。）反之，倘若美国政府偶然向着（德国）钦命大使提及此议，则我们可以表示容纳之好意。（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旁注：有何目的?）但同时却声明，此事必须英国合作方可。

从上面所述各种理由观之，是否可向华盛顿（德国使馆）寄给下列训令?

倘若美国政府偶然提出一九〇八年之思想，即请好意承受。并于讨论之时，引用从前（美国总统）Roosevelt 回答之语。略谓我们对于 Roosevelt 所举理由，亦复深以为然。因此，我们对于缔结保全中国领土条约一事，原则上虽始终赞成，但至少必须英国参加此项条约，始可促进吾人和平目的。假如英国方面业已运动成熟，当可易使中国向英提出此类动议。如此，则英国方面因为顾及俄日两国之故，所抱各种危虑，当可从此扫除。又美国政府若向伦敦运动此事，最初之时，请其千万不要提及我们，以免（美国）此次行动之效果，自始即因英国怀疑我们之故，成为问题，无效可睹。

V. Schoen

二十一、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致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之训令（一九一〇年二月十五日，自柏林寄。）

回答本月六日第四十五号电报（按，即上列第十九篇），以使阁下密悉政府意旨。

实现一九〇八年思想之举，此时对于我们甚为不便。盖我们若结德美保全中国领土条约，则将引起欧洲列强怀疑我们。而且（美国）Knox 先生已遭失败之满洲条陈所引起的仇恨，更将落在我们身上。因此，我们再将十五个月以前所开之谈判，重行继续一层，似甚不合机宜。反之，假如美国政府偶然向着阁下提及此事，则我们即就保有美国政治家友谊关系一端而论，已应表示一种似乎惠然赞成之意。并且宜向美国政府声称：我们对于德美一致行动以维持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一事，时时皆愿乐从。惟对于直接提议订结保全中国领土条约一层，则我们甚觉一九〇八年总统 Rossevelt 曾向我们提出之各种疑虑理由，实有考虑价值，不可加以忽视。

倘若察出美国政府果能严守秘密，不向英国转告，则阁下或者十分谨慎，一为试探，言曰：我们以为缔结保全中国领土条约一事，至少须得英国加入此约，始可实际促进吾人和平目的云云。但余（国务总理自谓）相信，英国加入之事，却极不可靠。倘若美国欲向伦敦政府窥探意旨，则请千万不要提及我们，以免美国此种行动之效果，自始即因英国怀疑我们之故，成为问题，无效可睹。

V. Bethmann Hollweg

二十二、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一九一〇年二月，自华盛顿寄，二月十八日到柏林。）**

继续第四十五号电报。（按，即上列第十九篇。）

（美国）国务卿向余言曰：中国政府对于锦州—爱珲铁路计划，业已表示同意。

日本曾通知中国方面，谓只要中国允许日本由南满铁路筑一支线，直与上述新路相接，则日本对于建筑该路计划，并不反对。而且愿意投资该路，参与其事。

英国方面则声称：如能先向俄日两国咨询，（得其同意），则英国始能参加此项铁路计划。国务卿谓：英国此种态度，系基于一种英俄协约。（德国外部秘书 Schoen 旁注：俄国亦曾要求我们，在京发表同样宣言，一如英国所为。但我们已将其拒绝。）盖照该协约，俄国方面承认英国在中国中部自由建筑铁路之权，其交换条件则为英国方面尊重俄国满洲铁路云云。

国务卿以为，英国此种主张，实属不合事理，如果俄国竟因此得有否认锦州—爱珲铁路建筑之权云云。国务卿又云，彼固愿请求俄国参与其事，但不愿俄国竟有否认之权云云。

国务卿继又谈及中国衰弱，以及日本侵略中国之事。并令余诵读驻德美使 Hill 报告，其内容系关于 Hill 与皇上陛下正月一日之谈话。（参阅余之正月二十七日第三十号电报。）略谓：陛下对于 Knox 所提满洲（铁路）中立计划，认为十分优善，并称为大政治家举动，云云。国务卿屡将彼之东亚方面美德应该合作的希望，向余表示，但未提出何种确切条陈。

Bernstorff

二十三、德国驻日使馆头等秘书 Montgelas **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〇年正月三十一日，自东京寄。二月十八日到柏林。）**

日本回答美国所提满洲铁路中立之条陈，其结果一如此间舆论方面自始所希望，以及熟悉日本情形之人自始所预料者。换言之，即拒绝其请是也。此间人士尤为欣慰者，即俄国政府之拒绝答文，系与日本答文，同时在华盛顿递给。此种同时递给，必系日俄两国政府预先约定无疑。日本自去秋以来，时常寻觅机会，以使因为最后一次中日条约所引起之俄国心中不安情形，加以扫除。现在，日本当然应该感谢国务卿 Knox 赐给日本最为盼望之日俄接近机会。（德皇威廉第二用英文旁注：彼等必须将手示人！）此次 Knox 条陈所生之唯一实际效果，即为日本确向俄国接近一事。当其已故伊藤侯爵与俄国财政大臣在哈尔宾（编者按，即“哈尔滨”）相会之时，即已有意力谋日俄接近，以为抵抗美国在满图谋之举。诚然，此种接近期间，不必永久。以及（此处请用〔俄国外

长〕Iswolsky先生自己所发之言）俄国所行之远东“拮据政策”，乃系由于困难所迫，未能依照己意行事。一俟自觉力量充分之时，仍将积极进取。（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日本对此，当预为防范，俄国将生为时已晚之感！）然而，该两国现时携手抵抗第三敌人，坚护彼等权利之事实，却是彰然存在，未尝因此有所影响。

美国大使最初以为，日本对于美国条陈当能表示好意，本极乐观。近来与余晤谈，乃不能不自承，华盛顿方面对于日人国家情感，太不注意，实属错误。又该使之意以为，现在美国条陈既已落在桌下，则华盛顿方面对于此事，当可搁置不复再提。（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否！）

但余个人方面则觉得，美国政府对于满洲问题，恐不能因遭俄日两国之拒绝遂从此罢休。（德皇威廉第二旁注：不错。）余宁愿相信，此次美国条陈只能算是美国此后对满行动之一种开场锣鼓而已。（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是呀。）余就日人口气之间观察，似乎彼辈亦与余意相同。此外，更据尊处惠赐之报告，得悉（美国）国务卿Knox曾向（德国）钦命驻美大使言曰，美国业已决计，倘若日人拒绝美国条陈，则（美国）定将满洲日人设法“熏干”云云。愈足证明余之所见，不为无故。但此种方法，是否果如国务卿Knox所想像那样简单易办，余实不能无疑。无论如何，此处依照著名样本，只有两种，即是一为熏人者，一为被人熏者。至于日人方面，则无论如何，必定决意用尽方法，以碍美国之“熏干”行动。

因钦命大使他往，特代报告如上。

A. Montgelas

（德皇威廉第二篇末注语：）不错！日本小鬼与美洲佬之间，因此冲突日增，真是好极。

二十四、德国外部秘书Schoen男爵致德国驻美大使Bernstorff伯爵之电（一九一〇年三月一日，自柏林寄。）

俄国拒绝锦州—爱珲铁路之计划，并请求我们赞助彼之张家口（Kalgan）—库伦（Urga）[①] —Kjachta（在俄蒙交界之处，是否即恰克图[②]?）铁路计划。而且，自张家口

① 库伦：旧地名。自公元17世纪中期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所驻，始建城栅，蒙古语称城圈为“库伦”，即以为名。清代设库伦办事大臣驻此，管理对俄罗斯通商事务，并统辖土谢图汗、车臣汗二部，归定边副将军节制。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称乌兰巴托。

② 恰克图：城邑名。历史上曾是中国境内的中俄通商要埠，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于此。本为一城，条约签订后，两国以恰克图为界，以旧市街归于俄，清朝别建恰克图新市街于旧市街南中国境内。汉名买卖城。今在俄罗斯境内之街区仍名恰克图，在蒙古境内者已改名阿尔丹布拉克。

至库伦一段，由外国资本家办理；从库伦至 Kjachta 一段，则由俄国资本家担任。

我们已拒绝其请。盖此项（张库）铁路计划，中国方面似欲自行建筑，不愿利用外资。而且此项路线，无利可图。

委托阁下，如遇国务卿 Knox 询及之时，可将此事十分秘密告彼。

V. Schoen

二十五、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一九一〇年三月，自华盛顿寄。三月四日到柏林。）

绝对秘密。

与第一七四号训令（按，即上列第二十一篇）及第三八号电报（按，即上列第二十四篇）有关。

国务卿云，彼对于锦州—爱珲铁路计划，将继续坚持，盖此项条约已由中国政府批准故也。倘若英国政府对于此项计划，果然决计退出，则彼（指国务卿而言）尚当详细思索：究竟是否应将此事根本取消，抑或将助他方继续向前进行。——所谓他方，当然系指我们。（德国外部秘书 Schoen 男爵旁注：牵入政治漩涡，实与我们不便。）——国务卿又言：（英相）Sir E. Grey 曾向 Whitelaw Reid 直接自承，彼对此次事件，最初未免轻忽一点，盖彼将对俄应负之义务，竟自忘去故也云云。国务卿又极埋怨英国，并谓现在合作一事，可算绝望。彼以为，或者俄日英三国曾经密约，共同打消（美国）此项铁路计划。英国政府现在已无勇气，毅然决断。是以该国对于坎拿大关税问题，海牙公断问题，均作出无限困难。

国务卿又提及（驻德美使）Hill 新近电报。据云曾与皇上陛下谈话，谓皇上对于美英德三国共同保证中国领土完全一事，认为解决中国问题之最良方法。皇上并言，因为英国猜疑德国之故，实以美国出头动议为是云云。余因国务卿暂时显然尚欲静待英国情势变迁结果之故，所以余只是默然静听而已（未尝有所表示）。

Bernstorff

二十六、德国外部秘书 Schoen 男爵致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之电（一九一〇年三月六日，自柏林寄。原书按语：此电因与前电有关，故提前录之。）

答复第六二号电报。（按，即上列第二十五篇）

凡可引起国务卿动念，以使我们赞成锦州—爱珲铁路，反对其他列强之举，均宜设法避免。假如国务卿竟自着手运动，则请阁下将下列意思，作为个人自己意见，向其表示，即美国对于此事努力活动，乃系当然之理。盖美国为参预（此项筑路）权利之国故

也，而我们则未具有此种合法地位。因此，俄国请求我们助彼反对此项铁路计划，我们曾以此种理由，在京加以拒绝。倘若我们现在独与美国公然尽力此项铁路计划，则我们将与上面所列理由，自相矛盾。对于俄国直是一种非友谊的行动。在此欧洲国际局面之下，实属大不妥当。

二十七、德国驻华公使 Rex 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〇年二月十四日，自北京寄。三月四日到柏林。）

因美国满洲中立条陈所引起之波澜，现在业经汹涌过去。吾人已可一用明眼，观察此事现刻之结果。倘若美国政府此次条陈，其意只在探测时局真相，一如此间代表Knox先生政策者之言，则现在对于日本舆论之大为激昂，以及俄国当局愿将彼之东亚折本生意预备保存，皆非出乎意外。至于日本对于彼之满洲地位，视为艰难苦战所得之国光，决意拔剑以卫，实为毫无疑义之事。在此种情势之下，确使英国政策能够自由活动之地甚少。至若俄国态度，似乎并非各方一致，余觉得该国之于 Knox 条陈，只是对其方法上及手续上，甚感不快而已。

美国此次条陈，曾给与俄日两国双方均极重视之教训，即该两国暂时对于满洲问题，或者甚至推及其他利益问题，彼此共同行动是也。此种联合之结果，对于中国方面，当极不利。尤其使中国不能乐观者，即俄国方面似乎对于锦州—齐齐哈尔铁路权利让与一事（按，该路往下筑至爱珲一层，此时似不注重），业欲迁怒中国。盖此项铁路计划曾触及许多问题，最为俄国方面所憎恶者，例如满蒙疆境防御问题是也。

据余从（中国）外务部方面闻知，日本现在对于锦州—齐齐哈尔—爱珲铁路计划一事，业已回答。而且日本之赞成与否，系以下列条件为转移：（一）须允日本资本、物料及工程师，参与其事。（二）须允日本筑一支线，以联络上述铁路与南满铁路。

俄国方面尚未回答。

中国方面以为，如果俄国表示反对该路筑至爱珲，则暂先筑至齐齐哈尔亦可。即或最初数年之内，该路无利可赚，但以后当逐渐有利可图。直到最后，终将逼着其他铁路，出于拍卖一途。

关于 Knox 所提（满洲铁路）中立计划一事，华人方面尚未能洞悉：究竟美国政府是否尚有其他继续行动。就现在情形而论，美国方面似乎甚为沉静。但华人之意却以为美人对于此次事件，未必从兹罢手。

至于俄国方面，据余所见，则该国此次严重拒绝 Knox 条陈之举，实属错误。该国对于此次事件，至少须用延宕手段，而以直接拒绝之仇，让诸日本身上。此次俄国举动情形，又复证明该国对其东亚实力，有所误解。满洲铁路之中立化，实无异在日本与西

比利亚之间，树一栅栏。乃俄国对此竟不知欣然欢迎，反而表示与日利害相同，彼此合作。俄人竟自如彼盲目相信：日本将永与中国平分满洲。（译者按：原文“中国”二字，当系“俄国”二字之误。）迨至（俄国）Amur 铁路筑成以后，则中东铁路之于俄国，势当失去重要意义。究竟届时能否寻得一位买主，愿出俄国所要求之价值以购该路，余实甚为疑惑。反之，现在俄国政府方面，（如果接受美国条陈），却可作成一笔良好生意。据余所见，俄国对于美国东亚方面之活动，加以如此拒绝，实属不甚聪明。

A. Rex

二十八、德国驻日大使 Mumm von Schwarzenstein **男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〇年二月十六日，自东京寄。三月十一日到柏林。）**

秘密。

数日以前，余曾与此间英国大使（Sir Claude McDonald）谈及美国所提满洲铁路中立条陈一事，其中使余发现一些不少趣味之点。

Sir Claude McDonald 首谓：当国务卿 Knox 向人转述英国赞成美国条陈之时，对于英国所提必俟俄日同意方可之保留条件，却加以撇开不提。Sir Claude 之意以为，当去年十一月伦敦方面接洽锦州—爱珲铁路计划之时，英国对于此种中立化之条陈，不过临时表示在原则上可以赞成之意而已。而美国国务卿实无权竟将此项英国赞成，通知其他列强，如此特别表出。假如 Knox 先生必欲引举此事，则至少必须忠实的附述：英国政府于十一月谈判之时，即曾表示彼之赞成，系以俄日同意为转移云云。

Sir Claude 继而又言：当彼前此闻知（最初由英国驻华公使来电通知），北京方面美国驻华代办曾向中国政府提出（满洲铁路）中立化条陈，并谓英国业已无条件的赞成云云之时，即深致疑惑。但因当时 Sir Claude 尚未接到伦敦方面关于美国行动的报告之故，所以彼即直接电询伦敦，其中曾对于美国驻华代办之责任问题，略为表示怀疑之意。后来（英相）Sir Edward Grey 答彼，略谓英国政府关于赞成美国条陈一事，曾特别声明，系以俄日两国同意为转移云云。

此种特别声明之保留条件，后被路透电以及此间许多亲英报纸大为利用，大书特书。至于上月二十六日曾经拍电报告尊处之《北德普通日报》所补登的半官宣言，略谓德国亦以关系最切的俄日两国同意为“当然的”先决条件云云。但此举却已不能再将此间舆论对于我们最初表示完全赞成美国条陈之不良印象，扫除净尽。

倘若阁下惠然准余发表个人意见，则鄙见以为，如果我们当初表示赞成美国条陈之际，同时即将上面所谓“当然的”先决条件，特别声明，则我们一方对于美国之关系，既不会因此伤损；而他方对于俄日两国之邦交，却易借此遮饰。（德国外部首席参事

Zimmermann 旁注：我们实不能提出此种保留条件。盖依照美国通知，即日本盟邦俄国友人之英国，亦未曾提出此项保留条件故也。英国之提出此项保留条件，乃系后来之事，此固人所共知者也。）至于我们未能一如英国，自始即行提出此种保留条件，据余在此所观察，则（美国）国务卿 Knox 当然独负其咎。盖彼对着我们以及其他各国，皆谓英国之赞成此事，并未附有保留条件者也。

Sir Claude 随又自行向余证明此间报纸所登北京消息，谓驻华英使曾向中国政府劝告，在允许锦州—爱珲铁路权利之前，宜先询俄日两国政府意见云云，确有其事。Sir Claude 之意以为，如此一来，则该项铁路计划，因其无利可图，本少实现希望者，从此更将永远打消废置矣。就余所见，则英国政府此种对于该项计划最初完全赞成、继而又复变卦之举动，将使华盛顿方面大为不怿无疑。在事实上，此间美国大使亦复曾经向余大为埋怨英国政府之不可令人信赖。彼更谓英国此种变卦之举，当系由于日本政府曾在伦敦提出抗议之故云云。此外，英美合组之锦州—爱珲铁路建筑会社，因为英国政府变卦之故，当然很受影响，于是该项会社，一如从前英国会社关于 Fakumen 铁路问题之例，立刻在报上竭力争论，以免彼之计划竟成画饼。兹特剪下一二，附呈阁下。反之，此间日本报纸对于英国政府“顾念盟谊”之态度，不胜尊敬与感谢，此固（当然之事），毋须详陈者也。

当余与英国大使谈话将终之际，余更提及报上某项消息，据云俄国方面为报复锦州—爱珲铁路计划起见，曾向中国政府要求，将有期的中东（北满）铁路权利改为无期的让与云云。Sir Claude 以为此项消息当系不确。虽然，锦州—爱珲铁路计划之出现于世，以及中国政府在大体上表示欣然接受，曾使圣彼得堡方面大为不乐，此固毋用迟疑者也。近来，奥匈（驻日）大使（Call 男爵）亦曾向着（日本外务大臣）Komura 伯爵提及上述报纸消息。该大臣亦复力言此项消息，当不可靠云云。但据 Call 男爵相告，则该大臣当时曾微笑继续言曰，倘若俄国对于彼极憎恶之锦州—爱珲铁路计划作此反动之举（亦系情理中事），并非出于意外，足以令人惊异者也。

最后，余并向英国大使言曰，美国（满洲铁路）中立条陈，自遭此次俄日拒绝之后，当可沉寂下去云云。而 Sir Claude 则谓，（日本外务大臣）Komura 伯爵心中却不甚安，以为美国政府或者对于日本拒绝之回文，尚将有所报答。至若（美国）国务卿 Knox 对于（日本）此种拒绝，势将缄默容纳，不复再言一层，此间人士因知 Knox 个人性情之故，殊不敢安然相信。

A. V. Mumm

二十九、德国驻日大使 Mumm von Schwarzenstein **男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〇年二月十九日，自东京寄。三月十一日到柏林。）**

自俄日拒绝美国所提（满洲）铁路条陈以来，业已经过一些时日。所有美国此次行动之效果，现在已可确切看出一二。

此次效果，除开一些不关重要之附带情形以外，则为俄日两国之接近，及美日两国之不睦二事。

关于俄日接近，当为美国行动之必然结果一层，余在美国条陈发表之后，初次电陈阁下之时，即尝论及之矣。在事实上，（美国）国务卿 Knox 确不能再寻一种较善方法，以使满洲方面最有关系之日俄两国彼此合作，有如此次提出一种条陈同时危及两国重大利益之举。至于各种日报、外报之上，对于俄日对满同盟一层，则认为一已经完成之事实。前此久经停顿之铁路接轨谈判，据云行将迅速达到签定之境。（原书旁注：当美国条陈呈递日本政府之后，日本外务大臣 Komura 伯爵即曾立刻向着俄国驻日大使 Malewsky-Malewitsch 言曰：俄日两国在一九〇七年曾为彼此接近之第一步骤，现在更当决定再作第二步骤，而且基于两国在满共同利害之上。自此以后，两国继续谈判，以至一九一〇年七月四日，订结条约。）

在他方面可以注意者，则为美日两国之不睦。纵然日本报纸曾作两国始终亲善之种种论调，以惑耳目，而真相终不可掩。盖一种条陈，将令日本战胜俄国所得之最要果实，大有被人削夺之危，其为日本人士所痛心，乃系当然之事。反之，日本方面对于美国条陈，立刻加以拒绝，其为美国人士所不怿，亦系情理中事。日本报纸为掩饰此种实情起见，诚然故作许多虚语，浪费无限印刷油墨，高唱两国历传友谊之说，以至于读者两耳厌闻。此外，该报等对于美国政府此次动机之纯洁，亦复故意赞扬不已，然而此种空言虚语，却不能将狗从炉后诱出。盖日美两国政府同望最近数年之内，对于两国均所不欲之战事，无论如何，设法加以避免。因而指导报馆主笔作此种种论调，但吾人于字里行间，却可以察出究竟著者心中之真正思想为何如者。

三十、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柏林外部之电（一九一〇年四月，自华盛顿寄。四月十五日到柏林。）**

（美国）国务卿今日谈及彼之东亚政策，态度远较前此坚决。因而，余遂揣测，外间谣传彼将辞职一事，其结果乃使彼与总统会谈一次，反将地位弄得更稳。彼对于锦州—爱珲铁路问题，决计“继续进行”，并已通知英国，谓彼对于俄国反抗举动，认为不合事理云云。彼并向余密告曰：行将向着俄国政府方面提出一种同样意义之通牒。满洲境内之铁路，必须加以建筑。倘若素无领土野心之列强不愿为此，则其他素有领土野心

之列强，必将为之。其结果，则现刻此种不良形势，只有愈趋恶劣之一途。英俄协约并不能束缚中国方面。假如英国不愿共同行动，则只好请他在门外站着。

但在英国方面，现刻正有一种严重反对（英相）Sir E. Grey 亲俄政策之运动。

Bernstorff

三十一、德国外部代理秘书 Semrich 致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之电（一九一〇年四月十五日，自柏林寄。）

答复第一〇七号电报。（按，即上列第三十篇）

据秘密消息：谓俄国对于锦州—齐齐哈尔铁路之反抗态度，终将自行取消，假如允彼参加建筑该路之事，云云。为避免俄日两国对满同盟之危险起见，宜劝美国向俄探试，并对于俄国参加此事之举，表示若干让步。今特委任阁下，将此思想向着美国政府发出，但不要显然为之。至于德国曾作此种劝言之举，千万不要使人知道。此外，并宜小心避免者，即美国方面关于满洲问题，可以利用我们对抗他国之印象，是也。

Stemrich

三十二、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伯林外部之电（一九一〇年四月二十一日，自华盛顿寄。四月二十二日到柏林。）

答复第六四号电报。（按，即上列第三十一篇。）

余曾获有机会，依照训令，向着美国政府表示。盖国务卿因为我们对于东亚问题所抱态度之故，每与余晤，辄秘密谈及此项问题故也。今日彼将顷间送交俄国大使之说帖，念与我听。其中系用十分友谊诚恳之语调，辩护美国论点。略谓俄国实系无权阻止中国利用外资在满建筑铁路之举。但俄国如果对于建筑锦州—爱珲铁路事宜，有所希望，则定当顾虑及之云云。

国务卿亦复获有消息，足令彼可由此测知，俄国行将取消反抗态度，并愿参加建筑该路之举。盖俄国方面对于与日永久同盟一事，认为不能实行故也。因此，国务卿遂希望铁路筑到齐齐哈尔一事，不久定可着手为之。而且俄法德英皆将参与其事，盖英国其势不能站在门外故也。美国在华财界代表 Straight 之意，以为第一段铁路之合同，当可不久订成。

Bernstorff

三十三、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〇年四月十八日，自华盛顿寄。四月二十七日到柏林。）

密函。

绝对严守秘密。

（美国）Abraham Lincoln 政府时代之国务卿 William Seward，曾有一次言曰，太平洋与其海岸海岛，以及彼方浩大陆地，将为今后世界大事之重要舞台。此种将近五十年前所发之言论，实可当作现在 Taft 政府外交政策之方针看待。但此种转向太平洋而来之趋势，并非仅仅美国政府方面如是，即美国群众意识方面，亦复日益倾向于此。此间《泰晤士报》访事，近来曾在该报发表议论，略谓现在“门户开放”一语之在美国，已比“门罗主义”一语，更为受人重视云云。此言可算中肯。至于国务卿 Knox 之实行此种政治思想，办法稍有未当，以致引起国内反对声浪。因为此种实行方法，除开德国一个例外，曾使列强备感不快故也。但此种反对声浪，无关宏旨。盖美国人民只责政府行动之方法，有所未善，而对于“门户开放”政策一事，则固始终完全赞成。并且美国人民此种不怿情形，现在逐渐集中英国方面。盖美国对于俄日两国方面，自始未尝存有奢想，而对于英国所持态度，则不免大为失望故也。

据余所见，美国之东亚政策方针，在最近期间之内，当无改变之事，或者仅仅形式方面可以略趋缓和而已。现在所欲问者，只是究竟英国将向美国一面偏来呢？抑或英美隔阂更将日益扩大呢？此项问题，在数年以前，本易回答。盖因当时英国凡遇彼之美国堂表弟兄手招，无不欣然乐从，以冀获得美国好感故也。其后，英国因惧德国之故，于是倒向俄法臂中而去。此种政策正与（英相）Sir Edward Grey 之亲俄趋向，恰恰相投。并与英国传统思想，所谓专抗欧洲最强国家者，完全相符。其间，与此政策相辅而行者，则谓英国所有兵力，逐渐集中于欧洲海洋。英国对于世界政治舞台，暂处消极地位。

倘若英国果然察出，在此第二十世纪之中，所有欧洲各国彼此对抗问题，实较世界政治问题为轻，则英国或可一变其政治方针。而现在美国之行动，则确易促成此种英国对外战线之变迁。盖余实不相信，英国社会方面能够永远坐视美国堂表兄弟此种不怿情形，安然忍耐下去故也。因此，余以为现在情形，正给我们一个良好机会，以使我们近年以来对外政策中之主要问题（回复德英通常邦交一事），得以圆满解决。假如我们果能赞助鼓励美国之东亚政策，则其结果，依据鄙见，当只有促进我们对英邦交者。德美共同行动，或可驱使英国离开俄日，加入德英联合之内。从此，德英两国共同利害之业已多年断绝者，又可重新结合。并且最使我们不便之英俄媚爱，亦可由此终结。

即或上述各种效果，不能实现，则德美共同行动，亦足使令我们欧洲地位大为改善。假如我们能得美国同情，则英国一定不与我们开战。至于俄法之不愿启衅，固已于

去年证明之矣。因此，余觉得赞助美国之东亚政策一事，对于我们，只有益处可言。世界注意之点，将由北海以转向其他方面。至于俄国对此不怿，却不甚关重要。盖自三十年以来，我们对于俄国虽然备尽友谊，而俄国对于我们之感情状况，却是永远如此故也。此外，余亦不信，日本将受德美联合之驱迫，竟自早期开战。盖在德国友谊态度之下，美国可将舰队集中太平洋内。即或不能超越日本，至少亦可与日本势均力敌故也。

至于我们赞成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所获之经济利益，则系最易明了之事，毋庸余再细述。而且今世一切健全政策，皆以一国经济利益为前提。用尽方法以促进此种经济利益，实为今日一切政策之主要目的。

直到今日，余之行动，因为依照训令之故，对于国务卿 Knox 方面，当然随时均极谨慎，以免彼再向余有所提议。但余却不相信，如果前此余抱另一态度，则此刻彼已向余提出一种确切条陈。不过，此种条陈将来终当到来，或关于参加锦州—爱珲铁路之事，或关于其他类似之举。于是，我们必须依照上述政策方针，谨慎着手进行，静待美国自行前来亲近我们，尤其是当其英国尚系站在旁边之时（我们态度更应如此）。余之所以不敢疏忽，谨将上述意见恭陈阁下者，实因国务卿 Knox 自从皇上陛下向着（美国驻德大使）Hill 与（美国前任副总统）Fairbanks 两位先生表示意见之后，对于美德英华四国共同维持“门户开放”政策之理想，从事研究不已。此举若成，在美国人眼中，实认为一种巨大胜利，可将迄今一切反对国务卿之论调，从此根本加以铲除。因为英国目下仇视我们之故，以致此种思想不能见诸事实。但吾人若一细察英国历史，则英国对于他种民族之爱憎，均只算是该国民族感情表面上之一时波绉现象而已。此种波绉现象之所以产生，只是由于一时政治利害关系之故。因此，吾人殊不必对于时局转机之望，全然断绝。惟此种转变有一前提，即在政治或经济方面，必须对于英国确有利益是也。英人对于我们之为世界强国，终有一日相安下去。彼此久经紧张之关系，终当解决，一如英国历史之中所常见者。换言之，即英国政治之特性，对于每次政局变迁，无不先以外交手腕反抗，迨到后来，又复以其变为“已成事实”而承认之。

Bernstorff

三十四、德国驻美大使 Bernstorff 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〇年七月一日，自 Manchester 寄。七月十三日到柏林。）

当余在给假离职以前，曾请国务卿 Knox 约期相晤告别。于是，彼乃请余前赴彼之美丽别墅 Valley Forge 一聚，其地系在 Philadelphia 附近。至于是日谈话之内容，其大部分余已直接电陈。惟有一事，余至今尚未提及者，即 Knox 先生是日亦曾谈及彼所最感兴趣之问题（东亚问题）。彼谓外间传言，彼于哈尔滨纳税问题，曾经大为让步云云

（一如俄国报纸所描写者），实属不确。彼仅于保留一切权利之下，暂时承认美人纳税一事。但在实际上，却毫无关系；盖该处差不多可以说全无美侨居留故也云云。

继而余乃直询该国务卿曰，彼为此举，是否有意以使俄国对于锦州—爱珲铁路问题，容易商量一点。彼乃微笑应之。（但彼继续补言），此举却无何等大效。盖（俄国驻美大使）Rosen 男爵近来身体健康，业已大概回复，曾来谒彼多次，劝彼将其计划自行打消故也。惟彼决意不为该使所动，并决信该路初段，定可着手建筑。届时，彼当再行通知我们，以便我们参与其事，如果我们愿意为之。

国务卿之望我们参加彼的东亚企业，其恳切情形，余可从彼之半诙半谐言谈中察出。盖彼曾云，法人之所以助俄反对建筑上述铁路者，系以（筑成之后），俄国势将派队保护该路，调军前往东亚；而法人方面则宁愿俄国此项军队，驻在德国疆境之前故也云云。

Bernstorff

三十五、德国驻日大使 Mumm von Schwarzenstein **男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〇年五月六日，自东京寄。五月二十五日到柏林。）**

（德国）钦命驻华大使曾将驻华俄使（Korostowez）之谈话，向余通知。据该项言论观之，则俄日两国之间，将有更为接近之行动。又此间著名报纸 Jiji Shimpo，上月三十日亦曾登有一篇社论，其内容颇与此种趋势有关。兹特择译数段附呈。

就表面上看来，此间近来并无何等表现，足以令人察出俄日两国政府有所接洽之举。如果必欲搜索此项迹象，则由欧报传来此地之消息，所谓（日本外务大臣）Komura 伯爵前往哈尔滨继续从前伊藤侯爵所拟议的日俄谈判者，可以聊备其数。在（去年）十二月底间，当（美国）国务卿 Knox 提出著名的铁路中立化条陈之际，此间对于俄日两国特别接近一事，形诸言语笔墨之间者，固非常众多。但自此以后，舆论方面对于此种计划，又复完全沉默下去。

俄日两国特别接近，固非必无之事。如果有之，则此举现在仍可认作 Knox 突击行为之结果。盖因此种突击行为，曾使俄日两国许多利益，同样陷于危境故也。阁下或尚记忆，余在初次报告 Knox 条陈事件之时，即曾谓昔日仇敌之俄日两国，从此互相特别接近，或为美国条陈之必然结果云云。此种新协约之举，无论如何，乃系针对美国而发，纵然不必明白特别表出。而且俄日两国由此互相承认，彼此在满“善意所获”之权利。或者在此机会之时，俄国并将特别表示赞成日本“合并”高丽之举。

当一九〇七年七月三十日，俄日两国订结第一次协约之时，报章之上曾屡次揣测，尚有秘密条款在内。据云依照此项条款，则日本除承认其他各种外，并承认俄国在蒙特

殊地位云云。究竟此次新协约，是否包含此类承认条款在内，实属不易预言。如果有之，则此项条款，势必特别小心巧为措词。盖日本政府既曾向着美英以及其他各国，正式发出堂皇宣言，维持中国领土完全，其势不能公然令人侵略中国在蒙主权故也。

A. V. mumm

三十六、德国驻日大使 Mumm von Schwarzenstein **男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〇年五月六日，自东京寄。五月二十五日到柏林。）**

在本月四日接见外交人员之时，余曾特别小心提及上月三十日日报 Jiji 那篇论文。该文内容系言日俄两国特别接近之事（前曾择要译呈），当为阁下所深悉者也。

（日本外务大臣）Komura 伯爵随即长篇纵谈，词气活泼。彼谓日俄两国之间，战斧当可从兹掩埋。而且，现在两国之间，彼此互相信托极深。彼又谓在去秋之际，尚有一种十分可笑之谣言，所谓日本方面具有攻击俄国之意者，曾经流行一时，竟使彼认为，非在议会之中加以辩明否认不可。而现在，则俄国对日之怀疑，幸已烟消云散。此外，两国政府并极忠实的努力，以使从前战争时节所余之一些未了争点，加以解决；对于铁路接轨、运输价目、以及其他各种问题，亟谋彼此所以妥协之道。

关于目下两国政府将结特别政治协约一事，Komura 伯爵却是一语未提。但就彼之特别声明两国亲善关系观之，则关于两国互相坚结以抗共同美祸之可能情形，至少未尝根本否认。

美国各政治家，譬如总统 Taft 近在 Pittsburg 之演说，显然仍抱旧日主张，对于满洲“门户开放”问题，不愿从此罢休。对于满洲铁路中立事件以及锦州—爱珲铁路建筑事件，尚欲加以讨论。兹将电报所传演说大要，附呈左右。（原书旁注：此项附件，系剪自 The Japan Daily Mail 报上。据其所载，则美国统统〔编者按，当为“总统”〕Taft 五月二日在 Pittsburg 演说，特别声明保持中国“门户开放”政策：“我们不能默认东亚方面与华有关之任何一国政府，暗用方法以毁此项政策。”）究竟美国此种举动，是否聪明，余实不愿加以评断。因为美国政府对于俄日在满实际产业，常于报上不断加以攻击之故，于是迫使俄日两国政府互相接近，并下共同抗御之决心。至于我们方面，则就余所知，我们工商两业之在满洲境内俄国治下者，时常均极安好。其在日本治下者亦然。现刻南满已成为我们一个巨大销场。究竟此种良好情形，在美国势力一旦扩及中国东部之后，是否尚能同样保持，却不易于确断。无论如何，俄日两国之间，若由现在松懈协约更进而变成一种坚固团体，则对于我们政治与军事方面，均非有益之举。

A. V. Mumm

三十七、德国驻英大使 Metternich **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四日，自伦敦寄。）**

Daily Telegraph 报馆之圣彼得堡访员，常能直从俄国政府方面获得真确消息。今日电告彼之报馆，谓俄日两国将于最近期间之内，签定一种条约，对于两国现在利害相反各点，在保持现状基础之下，加以调和解决云云。（德皇威廉第二旁注：瓜分中国!）该访员并谓：此即美国所持东亚政策以及中国所抱态度之结果。盖此种政策与态度，常使俄日两国同觉深相结合，实属有益故也。（德皇威廉第二旁注：中国之满洲将由日本夺去，蒙古则由俄国取去；但在此际，英国势将背日而去，〔因为英日同盟始终是一桩蠢事〕。假如美日两国冲突，则英国势将助美。于是，俄国行将不得不在亚洲〔印度〕方面，帮助日本。否则，彼将失去海参崴以及蒙古东部西比利亚各处。我们之赞助美英，乃系当然之事，如果实现，则我们将正式与俄立于反对地位。由此，则余在一九〇八年所宣布之意见，谓“黄祸”一旦来侵欧洲，则斯拉夫人不但不起而抵御，并将助之以攻欧洲者，又得为之证实矣。）

P. Metternich

三十八、德国驻法代办 Lancken **男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〇年七月五日，自巴黎寄。）**

与 Quai d' Orsay（译者按：系法国外部所在之街名）有关之报纸，对于俄日条约皆加以详细研究。并一致以为，此项条约对于国际形势，亦有重大意义云云。其间，更频频表示者，略谓法国对于此项条约，实有种种原因，应该喜欢不已。盖此约可使俄国关于欧洲方面之活动，多多顾及故也云云。或者直如 Echo de Paris 报纸所云，“以便好在欧洲监视”云云。

Lancken

（原书旁注：）此项条约自一九一〇年春季即已开始进行。到了是年七月四日，于是完全议结。请参阅下列第一一七〇七篇之附件（按，即本书下列第四十篇之附件），并参阅 Siebert 之 Diplomatische Aktenstücke zur Geschichte der Entente-politik der Vorkriegsjahre 第二六四页等等。其中，曾载有此项条约草案，以及他种未尝通知柏林但曾通知伦敦之密约草案，此项密约乃系实际瓜分满洲之约。

三十九、德国驻俄大使 Pourtalès 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0年七月八日，自圣彼得堡寄。）

（俄国外长）Iswolsky 先生在最后一次接见之时，曾向余言曰：现在俄日之间，业已订成一约。并已知照（驻德俄使）Osten-Sacken 伯爵将其内容通告（柏林）帝国政府云云。该总长对于法国报纸，在该约尚未正式发表以前，竟将内容披露一事，稍感不怿。该总长并谓，彼之本意，欲在该约内容宣布以前，先向各国政府通知云云。（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恰恰相反。彼实有意令人惊诧，使人出于意外。）

因为柏林俄使当已向着阁下提出此项通知之故，所以余在此处，只将 Iswolsky 先生关于该约之几点普通表示，照实禀呈。该总长谓，此项条约乃系一九〇七年夏季俄日协商之补充条约。但此次所达到之妥协，却有较大意义，并非仅仅解决几项特殊问题而已。此项条约首即表示，俄日两国甚望维持满洲现状之意。（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满洲乃系属于他们俩的！）而且，两国若遇此种满洲现状被人危害之时，立即彼此交换意见，商量所采手段云云。因此，足见各报尝谓该约带有防御条约性质一事，并非无稽之言。至于此种性质确为该约之基础，以及此种防守条约确系针对中美两国而发，均可直从该总长向余解说此项条约时所持之论调中见之。

该总长开始第一步，即对于华人加以激烈攻击。彼谓华人不愿尊重现有条约，近来竟在满洲方面，开始自由行动，毫无顾忌。（德皇威廉第二旁注：真是闻所未闻！该地乃系中国自己领土，中国皇室祖籍呀！）为抵抗华人此种自由行动起见，俄日两国均一致觉得，实有坚决维持彼等在满善意所获各种权利之必要。而且此项权利界限之画分，俄日两国之间，固无丝毫意见隔阂之处。（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强盗！分赃。）

该总长并明白表示，据彼所见，华人因受第三者之影响鼓动，乃作此种有意行动云云。（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希望如此。）于是，Iswolsky 复又谈及（美国）Knox 先生满洲中立条陈。彼并略带一种怒态，言曰："美国人欲使我们不要忘去，满洲并非属于俄日两国。（德皇威廉第二用德法两国文字旁注于下：不错，是的，先生。）我们与日本现在必须表示，我们两国在满洲方面曾用大牺牲所得来之地位，决不愿再行放弃。"（德皇威廉第二旁注：不知廉耻。）

此外，该总长更特别声明：各国对于此种新约，实无须怀疑不安。盖满洲"门户开放"原则，固完全依旧存在故也。（德皇威廉第二旁注：! 废话。）

该总长对于此次订约之事，大体上极为满意。（德皇威廉第二旁注：请稍待！）又此间舆论，对于该约大体表示欢迎，亦为使彼满意原因之一。在事实上，此间大多数人对于今次俄日新协约，确是认为 Iswolsky 先生外交之极大胜利，尤其表示满意者，为一般希望俄国在远东方面务必设法减少束缚，以便集中力量于"切要"外交问题之人。换

言之，以便对于近东问题，更能加倍从事是也。

究竟此间英国大使对于俄日谅解成立一事，曾否从中协助，余实未有直接证据。余所能确言者，只是当去冬美国提出满洲铁路条陈之时，此间美国大使（Rockhill）曾谓，此事因为英国政府赞助之故，英国资本界对于锦州—齐齐哈尔—爱珲铁路计划，必能参加云云。反之，（此间英国大使）Sir Arthur Nicolson 对于此项铁路计划，则同时却极表示非难之意。余并相信，当时英使对于（俄国外长）Iswolsky 先生之论点，完全表示同情。无论如何，该使固未尝稍稍出力，以使俄国政府猜疑美国之念，为之缓和。因此之故，当时（美使）Mr. Rockhill 曾屡次表示对于英使态度极为失望之意。彼并非难英使，万事皆带着“英俄协约的眼镜”去看云云。由此观之，此间英使对于俄日谅解成立一事，至少必曾加以间接协助。（德皇威廉第二旁注：不错。）盖该使与此间大斯拉夫主义派同具一种目的。换言之，即是英俄协约对于巴尔干半岛以及波斯方面所具之共同目的是也。

F. Pourtalès

四十、德国外部秘书 Schoen 男爵上德皇威廉第二之奏札（一九一〇年七月十一日，自柏林寄。时德皇正在北欧游历。）

俄国大使以及其后日本大使，均于今日将新订满洲条约内容，抄示我们。兹特敬呈陛下。该两使皆谓，此项谅解，乃系一九〇七年七月三十日所结俄日协约之补充条约。对于维持远东现状与和平一事，又复从新加上一重保证云云。而（俄使）Ostew Sacken 伯爵并特别声明：此项条约既非反对中国（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此言即他自己亦不相信），亦非反对其他任何一国。

余曾向该两使表示感谢此项通知之意。并言我们对于东亚方面所最注意者，既是只有经济利益一项。所以，我们对于此项新约，亦只能从经济论点，加以评断。若是该约对于“门户开放”原则，并无何等妨碍（德皇威廉第二旁注：此固绝无之事。译者按：其意系谓“门户开放”原则，势必受其妨碍也），则我们对于该约，当然无所反对。惟所谓“经济机会均等”一事，不当是仅仅形诸言语而已，并宜的确见诸事实云云。

V. Schoen

附件

《俄日协约》一九一〇年（俄历六月二十一日）七月十四日在圣彼得堡签字。

俄国帝国政府与日本帝国政府，诚意欲使一九〇七年（俄历七月十七日）七月三十日两国所结协约之原则，趋于稳固。并望该约关于保持远东和平之效力，日益发展。于

是，协同将上述约定，再用下列条款以补充之。

第一条：为达两国交通便利及商业发达之目的起见，订约国双方应各负责，互为友谊上的合作，以谋两国在满铁路之改善，并促其联络办法之完成。更应负责，避免一切有损之营业竞争，以实现上述目的。

第二条：订约国之一方，应负责维持尊重满洲现状，一如俄日之间，或俄日两国与中国之间，迄今一切条约、协约，以及约定所构成者。（德皇威廉第二用德法两国文字旁注云：中国，请了！）而且俄日之间，应将此类约文抄录副本，彼此交换。

第三条：如遇有危上述现状之时，则订约国双方，每次皆应交换意见，以便协商彼此认为维持上述现状必须采用之手段。（德皇威廉第二旁注：中国不得收回其祖籍地方。）

下面署名之人，曾由本国政府授与全权，兹特签字盖章于此项协约之上，以昭信守。

订于圣彼得堡，一九一〇年（俄历）六月二十一日，（西历）七月四日，即明治四十三年七月四日。

（签名者）Iswolsky（盖章）　　（签名者）Motono（盖章）

四十一、随侍德皇行在之参议 Treutler **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电（一九一〇年七月十三日，自** Bergen **寄。其时，国务总理寓居** Hohenfinow。）

皇上陛下对于俄日协约成立一事，甚为注意与忧虑。因此，陛下令余电达阁下如下：

该约趋势，显然系为俄日两国将来瓜分中国领土蒙古、满洲之地步。关于俄国方面如何越分滥用彼之铁路权利一层，固已早经暴露世人之前。至于现在彼之目的如何，我们可从 Popow 将军所著书中见之。该书常为大学教授 Schiemann 所征引。据该将军之意，俄国对于蒙古西比利亚境上甚富煤炭与矿砂之某地，应该置于俄国权利范围之中云云。吾人尝由经验察得：俄日两国虽曾发出一切保证约言，而彼之势力区域以内，对于第三国之商业，仍将竭其力之所至，加以闭拒。因此，最令吾人可虑者，即中国其他重要领土，如果亦渐被人夺去，撤消“门户开放”原则是也。陛下以为，吾人对于此类事故，亟宜设法防其将来发生。我们对于此项问题，实与美国同舟。从前关于中国铁路借款问题，我们尝赞助美国要求，此举实足构成一种良好基础，可以往下进行，以使德美两国利害相同之形势，愈较前此明了。或者更将中国拉入其中。此外，破坏蒙古领土完全一事，据陛下所见，亦属有违“扬子江条约”。因此，如果成为事实，对于英国方面，

亦不能无害。

陛下以为，此事宜与卸职中国驻德公使（荫昌）一商，当甚有益。陛下在旅行以前，并尝有意亲与该使一谈。

陛下欲请阁下发表对于此项问题之意见，以及拟采何种手段。

Trentler

（原书按语：）中国驻德公使荫昌将军，当时方奉调任中国陆军大臣之命，行将离德而去。该使辞别德皇，系在八月初间。见面之时，德皇曾对于中国回复俄日两国之答文，向着该使深表贺意。按此项答文，系中国方面回复俄日两国通知满洲条约之来牒，并于七月二十四日，由中国驻德使馆将中国答文内容通知柏林外部。此项答文措辞，确极巧妙，并将此次日俄协约视为一九〇七年日俄协约之补证。盖一九〇七年之日俄协约，固尝明白承认满洲方面之中国统治主权与列强机会均等，以及中国促进本国在满工商所采之一切手段故也。至于中国政治家与中国报纸，以及上海发行之英国报纸，虽然未悉日俄之间尚有不祥密约存在（参看上列第三十八篇篇末之“原书旁注”），心中却皆十分明了，所谓保持中国在满主权与门户开放主义者，只是一种虚言空话而已。（德国）驻沪总领事 Buri 在七月十八日报告之中，曾引举英国半官报纸 North China Daily News 之论调，以及 Shanghai Times 与 National Review 两报之言论，该报等无不明白表示，此次日俄满洲条约，实无异于日俄两国瓜分满洲，以及取消“门户开放”主义。

四十二、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上德皇威廉第二之电（一九一〇年七月十六日，自** Hohenfinow **寄。时德皇正驻跸于** Bergen。）

恭请陛下，准余对于俄日条约报告如下：

此项条约只限于满洲一处，对于蒙古方面，并未提及。而且据可靠消息，蒙古一地始终未作此次俄日谈判之题目。

至于该约之趋势，系在俄日两国将来瓜分满洲，固已毫无疑义可言。但就政略方面观之，假如俄国在远东方面由此重新稳住，成为日本紧邻，其结果多造（俄日）两国将来严重冲突机会，实是对于我们只有益处可言。其在他方面，我们对于此项条约，又无可以借口反对之处。盖订约国双方固尝特别声明，保持满洲现状。（德皇威廉第二旁注：现刻的状况！换言之，即是占领中国〔皇室〕最古的祖籍！）对于该地之法律关系，与该地之隶属中国，并不加以变更。（德皇威廉第二旁注：彼等既占领满洲，对于隶属中国一层，当然加以变更。）更向我们特别保证“门户开放”故也。因此种种事实之故，于是逼着我们在上次俄日两国大使通知我们该项条约内容之时，遂不得不作那种答辞。

此项答辞，固早已陈明陛下矣。既已给与那种答辞，现在又作反对该约之行动，似乎有所未便。而况近据各种消息，关于反对该约之举，不仅英法方面有意避免，即美国方面亦在设法避免之列也。至于美国此种态度，今后或将有所变更一层，吾人实不敢深信。盖美国其间对于哈尔滨美侨纳税问题，曾向俄国让步故也。美国既有此举，则我们向美国对于此次条约事件，有所动议，实觉甚属不便。因此之故，我们似宜先行静待此次事件之变化，同时细察美英两国之态度。

中国如可救助，则只有该国自行表示具有一种努力自强之精神方可。余敢敬迄（编者按，当为“乞”）陛下，在接见荫昌以前，先将陛下对于此次问题之圣意，再行见示一次。

Bethmann Hollweg

（德皇威廉第二篇末注语：换言之，即是：等待与观望！我不愿贵重时间失去，我不愿我们商业销场失去！）

（原书按语）电中所谓“该约趋势，系在俄日两国将来瓜分满洲，固已毫无疑义可言”一语，实非过甚其词。吾人可从（俄国外长）Sasonow 一九一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之说帖中，见之。此项说帖曾载于 Siebert 的 Diplomatische Aktenstücke 第二八二页等等。该说帖之中，曾历引中国政府近年以来对于俄日利益之反抗行动。并谓：“中国此种反抗行动，当时曾使俄国政府发生一种思想，即利用武器力量，并吞并中国数地，以使俄国远东地位特别稳固，对于东亚前途变乱不复加以恐惧。将来如遇必要之时，便可将其力量，用于他处。但分割吞并中国土地一事，我们却时常视为一种最后（不得已）之手段。惟就现在时机而论（译者按：其时中国正在革命），似乎只用外交方法，不必武力吞并中国土地，便可达到我们所希望之目的。”

四十三、德国驻俄大使 Pourtalès 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〇年七月十三日，自圣彼得堡寄。七月十八日到柏林。）

（俄国外长）Iswolsky 先生今日将（驻德俄使）Osten-Sacken 伯爵来电，念与我听。其内容系该使报告，前向柏林外部通知俄日条约约文之时，与（外部秘书）Schoen 男爵先生之谈话。该总长对于柏林方面对待该约之态度，大体上甚为表示满意。彼所惊讶者，惟一大部分奥匈报纸以及几家德国报馆，对于此项条约之成立，颇露不安之状而已。盖该报等不能因为俄国欲在东界方面，设法求一安定基础之故，遂断定俄国将在西界方面，采取侵略政策云云。

余对于该总长此项谈话，未曾直接发表己意。只是向彼言曰：余对于 Mentschikow

数日以前在 Nowoje Wremja 报馆发表之论文，甚为欣慰。盖该文之中，曾谓俄国方面所持之武力对德政策，实为巨大错误。因为此种政策，只可算是俄国代人火中取栗而已云云。Iswolsky 先生亦承认该文内容，所含理性确是不少，惟该文所据之前提（所谓武力对德政策者），则实毫无意义（毫无根据）云云。

F. Pourtalès

四十四、德国驻俄大使 Pourtalès 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〇年七月十九日，自圣彼得堡寄。）

俄日条约一事，现在仍为此间报纸之中心问题，继续加以讨论。

据 Rjetsch 报纸之意，此约之动议，当在伦敦（政府）方面。因此，该报对于英法两国之欢迎该约，认为当然之事，不足为奇。盖该约能使俄国东亚兵力挪出故也。因为近来德英两国外交方面大为变动之故，于是，该报遂推定德英之间，势将日益紧张。

该报又谓：假如对于此次俄日条约，仅仅视为东亚关系，则其中将有令人不解者，究竟此约系为何种目的而结？盖此约对于一九〇七年之条约，不仅是无所增补，即对于最关重要之“门户开放”原则一事，亦复缄默忽略过去故也。反之，此项条约却能给与俄国机会，将其战线转向西方而来，采取一种积极政策。然则此项政策为何？即“巴尔干吸收”政策是也。换言之，即报仇政策，续与 Aehrenthal 伯爵决斗是也。

为此种诱人希望之故，俄国对于彼之前此不良东亚政策，所谓势力范围政策者，安可往下行去？盖此项政策，曾使俄国陷于十分危险之中故也云云。

至于 Nowoje Wremja 报纸之论调，则与上述 Rjetsch 报馆论点，以及极右派机关报 Russkoje Snamja 之仇视态度，大不相同。Nowoje Wremja 报纸今日曾表示，其对于“北德通报” 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之言论甚为满意。该报并谓：“北德通报”能以实际政治家之见地，冷靖观察此次俄日条约云云。此外，该报又谓，远东和平既已稳固，则俄国便可应用全力，注意内政改革，以恢复前此强国地位云云。惟俄国对外权力，既为左派所不喜，而筑于正义自由之对内权力，则又为右派所不悦。因此之故，两派对于此项条约，彼此各有不满之处。

F. Pourtalès

四十五、德国驻塞尔维亚代办 Bray-Steinburg 伯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Bethmann Hollweg 之文件（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日，自 Belgrad 寄。）

对于俄日条约成立一事，所有此间政府机关报 Odjek，以及常与外部有关之报纸 Politika，均认为极与巴尔干斯拉夫有益，尤其是极与塞尔维亚有益。此项条约可使俄

国前在远东方面冒险浪用之力，转而注意中欧与巴尔干方面。盖巴尔干固为俄国长久主要利害所在故也。俄国迄今所持之亚洲政策，其影响于巴尔干也何等不祥。就 Bosnien 事件中俄国所持态度观之，便可一目了然。此次俄国政策之变迁，可使俄国在欧得有自由活动之余地，足令塞尔维亚之民族运动前途，富有十分希望云云。

Bray

三国干涉还辽秘闻

题记：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4月，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条约中有中国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的规定。沙皇俄国认为此将严重损害其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于是联合德国和法国进行干涉。1895年4月23日，即《马关条约》签字后的第六天，俄法德三国驻日公使各奉本国政府训令，分别照会日本政府，要求退还辽东半岛。三国海军亦同时出现在日本海面，制造紧张局势。三国的联合干涉，使日本政府十分惊慌，自忖无力与三国作战，急向英美两国求援。但英美两国都不愿意日本势力在华过分膨胀，所以劝告日本接受俄法德三国的要求。在此情况下，日本被迫让步，同意退还辽东半岛，但以“还辽”为名向中国索取三千万两白银。尔后，俄法德三国以干涉还辽“有功”，强迫清政府给予租借军港、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等特权。

德国柏林大学汉文教授（O. Franke）所著之《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四年列强在东亚（的情形）》，颇为详细地描述了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的情形。王光祈将其中第一篇之第五、第六、第七章译成中文，又从《德国外交部文件汇编》中译出《德日关于辽东问题的协定之原文》，遂成《三国干涉还辽秘闻》。

本书于1929年7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目　次

译者序言

此书乃译自柏林大学汉文教授 O. Franke 所著之《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四年列强在东亚（的情形）》（《Die Gross mächte in Os' asien von 1894 bs 1914》）一书。但所译仅限于"三国干涉还辽"一段，系原书第一篇中之第五、第六、第七三章。至于本书所译《德日关于辽东问题的协定之原文》，则系选自《德国外交部文件汇编》（《Die Diplomatischen Akten des Auswärtigen Amtes 1871—1914》）。

O. Franke 曾任德国驻华使馆译官多年。当三国干涉还辽之际，彼正在中国。是以对于各国当时纵横捭阖情形所知甚详。彼于原书序中，曾有言曰："中有数事，余认为甚有将其真相表露之必要者，尝特别加以详述，尤其是特别关于马关抗议问题一举。在此时势命运之下，更有一事随之而生，即所有当日参加讨论接洽此事之德人、华人、日人，现在只有余一人尚系生存（其余均已死去），因此，余遂引为己责，至少余必须设法以使世人关于此事误解之烟雾，为之散开。盖此项烟雾，对于当时德国初次参加世界政治舞台之举，至今犹笼照其上，（使人模糊不明）故也。"

中华民国十八年三月五日，王光祈序于柏林国立图书馆内。



一、日本议和条件内容与列强互相接洽情形

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国全权代表李鸿章，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①]、陆奥宗光[②]，在日本内海入口之马关[③]，开始预谈和会问题。后以李氏被人刺击之故，谈判之事稍稍延滞。（因为刺击事件之结果），于是日本方面对于允许停战一事，最初本来附有强硬条件者，至此乃为无条件的允许停战。其后，复因各方屡次催促，日本代表乃于四月一日，将议和条件正式向中国代表提出。其中，除要求“高丽完全独立自治”外，并要求割让盛京[④]南部（原注：普通称为辽东）与旅顺、大连以及台湾澎湖诸岛（原注：澎湖诸岛在台湾与中国福建省之间）。此外，并须赔偿战费三万万两。而且现时暂将山东省内威海卫一港占领，以作赔款之保证。其余要求条件，则为开放若干通商口岸，给与各种商业利益诸事。

当此项条件消息传来欧洲之际，其时列强态度犹能勉强一致，但坚决行动之心，却未具有。盖其时列强对于干涉之举，均欲设法加以避免故也。其在俄国方面，则 Lobanow 侯爵（系正月新故俄国首相 Giers 之后任）曾努力与英密通声气，而俄皇尼古拉自己，亦复尝与（英使）Sir Frank Lascelies 始终联络。其在法国方面，则愿附英、俄两国骥尾。但法国在一方面对于台湾割让之虞，虽然不顾，而在他方面却与英国一样，甚望德国参与其事。盖法国之意，正有如（法国外长）Hanotaux 先生所云：“倘若列强态度能够保持一致，则将来对日行动，始有效果可言云云。”此外，无论何处，盖无不希望此种昏暗局面，从速了结。至于俄相 Lobanow 之诚实态度，尤无令人怀疑之处。盖彼于三月二十日，曾向德使言曰：“此外，我们直到今日，无不严守中立态度，正与君同。余并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保持此种态度云云。”而且（英相）Lord Kimberley 亦尝以为：“就（俄相）Lobanow 侯爵论调观之，决不能推出，彼有出头干涉中日事件之

---

① 伊藤博文（1841—1909）：日本首相。长州藩士出身。早年参加“尊王攘夷”和明治维新运动。在执政期间，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夺取中国领土台湾及澎湖列岛，并将朝鲜置于日本统治之下。1909 年，在中国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刺死。

② 陆奥宗光（1843－1897 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内阁外务大臣。是日本发动甲午侵略战争的主要罪魁之一。当时日本外交冠以“陆奥”之名，被称为“陆奥外交”。“陆奥外交”规定了后世日本外交的走向，迄今仍然有其巨大影响。

③ 马关：今日本下关。1895 年，清政府“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此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④ 盛京：今辽宁沈阳。

意云云”此语并非无稽之谈。至于（英相）Lord Kimberley 本人之态度，据（驻英德使）Hatzfeld 伯爵三月二十四日所报告，则谓：“英相并无十分倾向干涉之心。其所以如此之原因，据彼向余密告，则为此间舆论对于斯举，直到现在，均觉不甚赞同故也云云。”舆论一物，实为 Lord Kimberley 个人及其全部政府之行动方针！至若列强内部，本不一致。而表面犹能至今互相团结者，实因当时彼此均有一种隐忧在心，即是假使中日之间共结一种同盟，或者中国全为日本所征服，则此后（黄色人种）势将造成一种统一的重大的势力。倘欧洲方面若不互相团结起来，实无力加以对抗。但此种情势，却又迫令各国自觉，非中国获得土地若干，其势不能稳固自己地位。而此种争获土地与其不可逆料之在结果，又有破坏列强联合阵线之虞。换言之，即是一种不详的循环，（没有出路可言）。因此，各国以为：假如欲避此种循环局面，则只有力使列强在华势力现状，勿因日本和议条件影响，过于变动迁移之一法。柏林政府在此，遂遇一种巨大难题，不易决定。盖该政府衷心希望东亚难关，速由一种正当和平加以解决一层，固已于上述三月一日致与驻英德使之训令中言之。现在的问题即是，假如此种难关并无和平解决之望，而列强扩张势力之心，又复愈来愈盛，换言之，即将远东方面开始夷为殖民地。如此，则德国应该站在旁边，以便一如从前非洲、南洋情形，徒兴机会又误来时又晚之叹吗？其实尚不仅此，究竟德国对于世界政治前途，是否应该积极参加，取得一种相当地位，为德国民族经济力量分所当有？抑或德国应该聪明自足，只将双眼注意本国所居地势，时常皆在危殆之中，务须谨慎自足，但保现在所有，同时并将德国兵力集中，不宜移置远处？如果德国参预东亚某种干涉行动，其结果不免偏亲欧洲某国，或某某数国团体，则吾人预料柏林政府决定此种大计之时，仍将保持自足态度，不去参预。就一八九五年三月情势而论，德国之谨慎知足态度，在当时具有重大海外利益之列强中，实为唯一无二之国家，不愿参预东亚方面欧洲列强共同行动者。而且德国此种态度，常违其他列强希望，尤其是英国希望。盖彼辈均认德国最宜担负调和之任，并能使列强共同行动为之稳固故也。其后德国政府决定方针之时，确受列强此种主张之影响不少。德国最初所抱态度之不能继续保持，其咎实应首由日人负担，已如前面所述。至于其他对此应该负咎之人，则将于下面叙述之中见之。

（德国）国务总理 Hohenlohe 侯爵曾上德皇说帖一件，其中有云：“我们政策标准，在一方面，对于只与他国有利之行动，固然不应早期加入。而在他方面，则对于参加此类行动之权利，却当预为保留。盖此项行动能使欧洲列强之东亚势力分配，为之消长变动故也。”此种见解与决定，实与三月一日致与伦敦德使之训令中所言者，完全相同。德国当时既向伦敦方面表示愿与英国共同行动之意，现在事隔三礼拜之后，更向圣彼得堡方面为同样的表示。三月二十三日，（德国）驻俄代办曾接柏林训令，略云：“请君转

告（俄国外相）Lobanow侯爵，谓君曾接柏林训令，其中略言：我们对于东亚时局前途，亦复甚为关心。我们对于俄国论点，亦复完全赞同。（原注：譬如主张列强应用外交手段，从速促成和议。）而且我们相信，东亚方面，德、俄两国利益，并无冲突之处。因此，我们甚愿常与俄国交换意见，或与俄国共采一致行动。”是月二十五日，柏林方面接得答复，略谓Lobanow对于德国此种通知，非常欢喜，并言彼亦甚愿与英合作云云。”二十七日，（德国）驻俄代办又来报告，略云：“Lobanow侯爵告余，俄皇尼古拉陛下对于我们条陈，欣然接受。该侯爵并谓，俄国甚望东亚战事早日结束。彼更相信，我们亦具同样目的。彼常与此间英使不断的接洽，对于法国方面，亦复同样融协。”至于英国方面，对于德国此种决定之态度，则驻英德使曾于四月一日报告柏林，略云：“（英相）Lord Kimberley顷向余言，两三日以前，驻俄英使曾来电报，略谓据（俄相）Lobanow侯爵之报告，（德国）钦命驻俄代办曾向该侯爵声称，德国愿与俄国以及其他各国，协力参加关于中日事件之行动云云。又谓Lobanow侯爵对于德国此种通知，表示非常满意，而且据该侯爵揣测，伦敦、巴黎方面亦将接得德国此种通知云云。英相并向余言，当余今日谒彼之时，彼曾希望余将向彼作此通知，果尔，则彼当十分欢喜云云。而在实际上，德国对于伦敦、巴黎两处，却始终未发此项通知。大概德国当时之所以未向巴黎通知者，实以法国方面当然附和俄国态度，故德国不必再作此种通知赘举。至于伦敦方面之所以亦未通知者，则因当时柏林外部中心人物Holstein先生，对于英国政府之不可信赖，正在十分忿怒之际。盖当时英国Lord Rosebery之飘摇政府，行事有如草茎，只随“舆论”风向转移弯折而已。但柏林方面对于英国合作一事，终是认为必需，认为当然，吾人可于后此数日之举动中尽量见之。诚然，要想伦敦软性政治家之思想坚持不变，乃是一桩极不容易之事，尤其是在紧要关头之时。日人方面最初坚持，在中国未曾承认停战条件之前，决不宣布议和条件，云云。其时，英国方面，不知究系出于自己动机，抑系由于华人怂恿，曾出头邀约俄国政府，共向东京宣言，在议结停战条约之前，先将议和条件向华宣布，实为妥便（reasonable）云云。于是，俄国政府遵从此项英国邀约，乃赐给俄国驻日公使关于此事之训令。同样，德国政府又因俄国方面之转约，亦复赐给德国驻日公使关于此举之训令。反之，最使大家惊异不已者，即驻日英使却始终未得本国政府何等训令是也。其后，（英相）Lord Kimberley力将此种不幸“误会”设法解释，其所据理由则为，中国全权代表对于停战节略，既已自愿放弃，以便直接开始和议，其结果，各国催促日本宣布和议条件之举，遂成赘疣云云。究竟英国此种辩释，是否正当，尽可置之不问；而英国此种态度，却不能不使其余各国，大为不怿，大为怀疑。其在俄国方面尤甚。盖（俄相）Lobanow曾向德国驻俄代办言曰：我们之为此举，全系追随英国提议，“以免我们与英分驰而已”。盖共向日人表示，列强关

于东亚政策，实系彼此一致之举，甚为重要故也云云。至于（柏林外部方面）Holstein先生，则更情不自禁严责英人，在最后一秒钟之时，不应忽然跳开。英国此举，显然有意对于凡使日人不乐之事，均欲设法加以避免。其结果只使俄国日益向法接近而已云云。

在此动摇不安局面之中，日本议和条件适于是时宣布。其在柏林方面，则由日本公使 Aoki 于四月二日通知（德国）国务员 Marschal，该使对于割让辽东一事，曾为之解释曰："为保证高丽独立，以防中俄侵略起见，割让该地之举，实为军事上所必需云云。"此外，该使向着（德国）副国务员 Mühlberg，则更明白宣言：日本非占辽东半岛不可。"旅顺港口须成为北洋海湾之直布罗陀 Gibraltar[①]"。俄国可以获得北满以及 Possiet 海湾（译者按，在满韩俄三方交界之处）。英国可以占领舟山群岛。"德国很可以在中国东南方面，占有一个省份。此种占有之价值，实远较德国全部非洲殖民地之价值为大。德国在该省之内，当可与其他列强，接洽妥当"云云。究竟日使 Aoki 此种谈话，是否奉有本国训令？如其有之，是否全与训令内容相同？我们对此均可以置之不论。惟该使此种谈话，很难令人人郑重视之。倘若有人向着该使提出下列问题，究竟彼所推荐之"东南省份"，系指何省而言，是否即系台湾对岸之福建？吾料该使必定立刻陷于狼狈情形。此外，吾人更可用语提醒该使，彼所言及之 Possiet 海湾，其时早已属于俄国，业有三十四年之久矣。

至于日使 Aoki 此项谈话，其影响于柏林方面者为何如，吾人可于四月四日柏林政府电致驻英、驻俄、驻法三位德使训令中见之："旅顺港口如果变成直布罗陀，则将使中国，至少将使中国北方与其京师，成为日本之保护地方。此种夸大要求，将令中国国家继续存在之问题，以及欧洲列强向华争求土地之问题，立刻发生。其结果对于与此有关之各国，势将酿成一种不可小视之战争危险。此外，余（译者按，系柏林当局自谓）更有应向阁下密告者，即日人相信，假如俄国方面提出抗议，则即以北满及 Possiet 海湾让与俄国，作为西比利亚铁路之起点，如此当可运动俄国，取消抗议云云。"其后，柏林方面并决定与（英俄法）三国政府，互相交换意见。其在英国方面，则见解正与上述相同，而效果却完全两样。（德国）钦命（驻英）大使曾于四月三日报告云："此间认为最大危险者，不在日本合并土地扩大疆域，而在中国政治方面或将从此全仰日本鼻息，其方式或用中日同盟，或用其他各种均可。如果日本能使中国输入物质文明，发其无穷富源，而为日本之用，则日本更将逐渐形成一个极大势力云云。英人既已看出此种

① 直布罗陀：直布罗陀海峡位于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最南部和非洲西北角之间，北岸为西班牙的直布罗陀（现被英国占领），南岸为摩洛哥。全长约 90 公里。两岸山势雄伟，景色优美。是连接地中海和大西洋的重要门户。

危险，其自然结果，即是：此间对于日本方面，虽然未增何等同情，但极努力设法，凡可以使日本对英发生严重永久不怿情形者，无不加以避免。”俄国大使对于英国此种深恐中日联成一气之隐忧，极表同意。至于柏林方面对于此次事件之忧虑，大抵根据Brandt先生说帖。盖Brandt先生曾于其间以顾问资格，参加此事之讨论，并于四月八日作成此项说帖。彼对于日本之占有旅顺港口一事，亦复认为极与中国独立有妨。此外，彼对于此种屈服寡助之中华巨国，因环境的压迫，不得不依附日本一层，亦复认为极与欧洲有害。此项问题之政治方面，尤有应该注重者，则为俄国在欧地位一事。倘若法国不与俄国共同行动，则法俄关系不免从此松弛。反之，假如法国赞成此举，愿意合作，则英国方面对此很难独居例外云云。该说帖又谓：此外，我们若与俄国共同行动，或者乃系唯一机会：即我们可向感激不已之中国（关于中国感激一层，我们当然应该设法令其必须如此），要求割让或出租一地，以作我们舰队或装煤之站口。所谓割让或出租，名词虽异，而在实际上当然是一样的云云。Brandt先生最后又引举西洋各国历来共同保护在华利益一事，收效至大。于是乃下一结句曰，此种公共保护相同利益之制度，可以抵抗日本对华和议之过分要求，可以确立东亚方面之永久安宁云云。当时德皇思想，正为“黄祸”[①] 二字所浸透，于是Brandt该项说帖，遂大为德皇所赞成。此外，该项说帖并建议柏林政府，对于是日（四月八日）俄国递来之条陈，宜表示同意。先是四月六日俄国驻德代办曾向柏林政府声称，（俄相）Lobanow侯爵甚欲一闻（德国）帝国政府对于现今时局之意见云云。当时（德国）国务员Marschall对于此种探询，乃答之曰：对于日本欲在大陆之上，割得土地一事，甚觉不妥，尤其是关于旅顺方面。如果日本占据该地，则日本控制中国之举，势将成为事实。但黄色人种若在日本领袖之下，互相联络起来，则对于欧人利益，却极有关。因之，对于此事，似有彼此交换意见之必要云云。又俄国方面对于伦敦、巴黎两处，亦曾作同样之探询。其后，复由俄国驻德代办于四月八日，将俄国条陈递与柏林政府。此项条陈，乃系由交换意见进而为共同行动之第一步骤。盖该条陈主张：用友谊的态度向着日本政府，表示欧洲列强旁观之意见。略谓：“日本如并旅顺，则将为恢复中日两国友善关系之一种障碍，而且东亚和平亦将永受其危。”

---

① 黄祸：西方“种族主义”谬论。19世纪初叶，英国学者戴维斯《中国人的历史》、沃尔尼《古老帝国的遗迹》、德籍英国传教士郭实拉《中国史》等书中曾将蒙古西征称为“中世纪最大的黄祸”。“黄祸论”的始作俑者是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俄国人巴枯宁，他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开始宣扬“黄祸论”；此后英国殖民主义者皮尔逊在《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一书中又进一步发挥，使得“黄祸论”基本形成。1894至1895年甲午战争后，西方帝国主义者们最大的梦魇就是庞大的中国龙即将在已经西化的日本带领下崛起。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代表，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就所谓的“黄祸”问题不断通信、交流。殖民主义者由此煽动对亚洲民族，尤其是对中国的偏见。

我们如欲明了俄国此种条陈在英所受之待遇情形，则我们必须先从数个星期以前说起。当二月底间三月初间之时，英国社会方面对于东亚问题之意见，曾发现一种骤然变迁之痕迹。盖是时英国人士又复开始思虑俄祸；对于（东亚）时局，亦以此种眼光观察。中国堡垒现在既已崩溃，究竟将来谁应填补此种防俄之任？可以语此者，只有一个日本。但英国方面现在对于日人，却已弄成一种深仇死敌关系。英报《Pail Mall Gazette》二月二十二日曾发表一篇忧形于色之论文，其中有云："此实为时局前途之不良征候。倘若日本竟与俄法谅解，而以中国为其牺牲之品，则英国究将如何？诚然，英国方面亦可分得一部掠夺，但是缓冲地带却从此因而丧失。向使英国前此举动聪明，则今日当可属于日本盟友之列云云。"于是，英人遂以其素具之政治天才，将其政策，悉行改照此种方针而行。在三月十五日俄报《Nowoje Wremja》之上，曾载有一段伦敦消息，略谓："英国社会，忽然之间，对于日本一切事物，均感非常兴趣。曾开日本图画展览大会。此外，设宴庆贺日人之举，亦复不少。伦敦人士显然发生一种有利于日之意见变迁。而且彼等对于日人统治中国一事，亦复认为可能。吾人对于英国社会此项意见变迁，颇有注意之必要。盖此种变迁，实受有政府方面影响。因政府方面对于某种计划，似已成熟，或将要成熟故也云云。"从此时起，英国报纸遂明白表示英国政府意向之所在。三月十五日伦敦《泰晤士报》曾登载一篇论文，言系寄自东京，而实际上当是系在伦敦作成。文中曾指日本政府，宜防一个欲想报仇而又能报仇之中国为其邻居。并谓："日本必须造置一种防御铁甲，以防此种可能之事；或者日本将在辽东半岛之上，以寻此种铁甲。日本既据该地，则对于一部分北洋海湾可以控制，遂将中国侵略高丽之基础，从此夺去。西洋方面对于此种和议条件，很难加以拒绝云云。"文中所谓"西洋方面"，在英人宣传用语中，其意即系"英国"。至于文中所谓"中国"，则宜改作"俄国"诵读。该报在二月七日之时，犹提出一种恫吓，略谓："欧洲当不允许日本，能在大陆之上，合并一寸中国土地云云。"而现在却向战胜之日本，提出此种建言，倘若该报未在东京方面已经得有一种稳确基础，则二月七日与三月十五日两种思想之悬殊，实未免太大！三月十八日，英报《St. James Gazette》更远瞩将来，下笔言曰："假如日本意欲成为第一等强国，欧洲方面实无法加以阻止。英国政策必须承认事实，力求所以心安意满之道。日本尚有许多年日，不能为我之害。我们对于日本在太平洋之舰队问题，实无须加以反对。诚然，俄国方面必将深感日本压迫之危，但此事与我们何关？倘若日俄两国高兴，大可去打一仗。至于我们方面，则是：假如日本能去抵抗那种一臂掩尽亚洲北部之可怖国家，对于我们实无害可言。……我们毋须设法维持现状，因现状业已不复存在故也。我们只愿状况变迁以后，勿因变迁之故，竟受损失而已。我们在中国海岸方面，香港以北千里之遥，需要一个港口以及一个舰队站口。如得日本同意，我们

便可占有云云。”（原书旁注：俄皇于一八九五年九月十一日，曾向德国国务总理 Hohenlohe 侯爵谈及该报此项言论，并云所谓一个港口者，“乃指我们这里而言”。（Mais ce se ait chez nous.）

究竟英国社会此种意见变迁之主动安在？是否果如俄国人士所揣测，“实受有政府方面影响”？抑或恰恰相反，社会方面实欲政府受其影响？现在吾人均无从加以判定。所可断言者，即政府内部，此种思想亦复甚为活跃而已。恐惧俄国，恐惧日本，恐惧俄国地位之加强，恐惧黄种联络之增进，乃是（南北）两极，当时（英国）Lord Rosebery 政治，常动摇其间，不知所从者也。此种内心不定之情形，吾人可于当时该国所采毫不彻底之手段，以及屈意听从他人主张等事见之。就英国地位而论，本可本该居于领袖位置，解决此项东亚问题。然而该国却不如此，永远迟疑弗定，以便最后只好将眼闭住，一点不干。因此，吾人对于（是年）三月俄国怀疑英国态度之心与日俱增一事，殊不引为奇怪。而且俄国此种怀疑之心，更因伦敦政府是月月底对于停战问题所持恶劣态度之故，愈为增长。盖当时圣彼得堡方面，曾竭力设法与英合作。俄国此种动机，诚然是大抵由于本国方面一切未尝就绪之故，但就当时俄皇及（俄相）Lobanow 侯爵之意见与希望而论，倘若英国果愿居于有力的领袖地位，则俄国必将追随其后。在东方方面，决不去作逆英意旨之进取，虽受国内亚洲局署之逼迫亦不为之，此固毫无疑义者也。然而实际行动之期愈近，则伦敦政府之态度愈为含糊，共同行动之希望愈为减少。（俄国）侯爵 Ucetomski 当一八九一年之时，尝伴俄皇东亚之行，现在乃在报上严刻批评时局情形，并于三月底间建议，略谓：“我们只须倡言将向 Herat，Balck 各地（在阿富汗斯坦北部）进取，则其势必能迫着英人来与我们合作，早日促成中日和议云云。”至于伦敦态度之混沌不明，即素来善于观察之（德使）Halzfeld 伯爵，于四月四日犹不能察出究竟，吾人可于该使是日电致柏林之下列报告中见之。按其时系在日本和议条件业已公布之后，但俄国干涉条陈尚未交到之际。

“英相（Lord Kimberley）个人，亦以为割让旅顺之结果，中国地位势将等于日本保护，中国生存势将大受危险，列强割地势将层出不穷。但彼却至今不信，俄人对于中国瓦解一事认为有妨俄国利益。彼亦不信，俄人对于时局前途，有何干涉之意。彼又谓：法国方面对于中国之衰弱，并非不欢迎者。

据余所得印象而论，则英法俄三国之间，直到现在，似无何等协定，既无关于要求（中国）割地之约束，亦无关于列强共同行动之约束。

如果圣彼得堡方面欲向日本奉劝，将其强硬态度改为缓和一点，并向日本表示割让旅顺一事，绝对不能同意。则据余所见，伦敦方面当可附和俄国主张，不持异议。反之，假如圣彼得堡方面对于此事采取冷淡态度，则英国政府独自出头干涉之举，却极不

可靠。果尔，则今后所余者，只是列强对于彼此争割土地一事，互相妥协谅解一个问题而已。”

次日，柏林政府关于“日本新直布罗陀”之意见，既已达到伦敦；俄国政府叩问英国方面对于和议条件所抱态度之咨询，亦达到该处。于是，驻英德使又复报告柏林如下：“（英相）Lord Kimberley 曾立刻致电圣彼得堡英使，令其从新与俄交换意见。换言之，此事之决定，现刻全在俄国方面。倘若英俄意见趋于一致，则该两国所希望之土地保证问题，势将不久成为讨论中心。我们必须乘此机会，以实现我们希望。并向英国声言：倘若英国对于我们参与列强讨论一事，认为必要，则英国必须赞助我们，得偿其愿云云。”其实所谓“土地保证”问题，在伦敦政界方面，固早已思之甚熟，确比任何一国思之尤熟。关于此事，天真烂漫的 Lord Kimberley，某次偶与（驻英）德使谈话之时，曾泄露许多极有趣味之资料。该使尝于四月六日将其内容报告柏林，略谓：“从 Lord Kimberley 之谈话观之，彼极不愿作有损中日两国任何一方之行动。割让辽东一事，虽然有危俄国利益与高丽独立以及北京安全，但日本方面尽可将其要求缩小，只限于（辽东）半岛南端小小部分。如此一来，危险虽未大减，但中国政府如能将其京城移往旧日首都之南京，却可使危险程度为之减轻云云。彼又谓：英国利益大都集中于上海方面及其邻近一带。倘若列强要求中国让与土地，彼言至此，乃视地图上面某处，并谓此处‘不甚重要’的地方，实为此间所需用云云。（原注：其意系指舟山群岛，为英国五十年前，曾经一度占有者。）现在伦敦政府方面，关于英国应采何种态度一事，行将加以决定。”吾人若就英相此种“不错”与“但是”之论调观之，实可以一方面看出伦敦政府之没有确切办法，他方面又可以看出英国其他政派之野心计划。倘若当时 Lord Kimberley 果知此种论调之影响为何如者，则彼必不至于贸然言之矣。换言之，即是：中国首都移往南方长江旁边，而长江入口之处，又为英国势力所在的上海以及英国舰队所驻的舟山所控制。至于中国北方则直接委之日本。此即一般在野政客之目的。此辈政客实较 Lord Kimberley 会做生意一点，盖由此又有一种防卫堡垒以抗俄国，并将中国中央政府同时置诸英国兵舰炮口之下。换言之，即是置诸英国保护及势力之下。衰落之中国，便可从此开始印度化。此种鼓吹论调，正与从前（英人）在北京方面，主张继续战争下去，直至日人疲劳为止，以及放弃北方迁都内地之意相同。据此看来，英国方面确有一部分在野政客，比较政府中人为进取。至于（英相）Lord Kimberley 仅以一种“不甚重要的地方为此间所需用者”，作为英国唯一要求之知足态度，只能使一般与彼一样不悉东亚情形之人，得着一种良好印象。但英国此种伟大之计划，持与俄国仅欲在高丽海岸得一不冻港口之希望相较，其相差程度为何如者！

英国方面之见解既是如此，因而列强共同行动之希望，确极罕少。据四月五日圣彼

得堡消息：（俄相）Lobanow 侯爵对于当时局面，认为十分严重。（驻俄英使）Sir Frank Lascelles 对于本国政府态度，本来不甚满意，现在却不能将其忧虑强为遮饰。究竟列强彼此谅解一事，是否尚有成立可能？同样，（法国外长）Hanotaux 先生对于列强妥协一层，亦复认为希望甚少。盖彼以为俄国方面既保守一种神秘的缄默，而英国论调又极有利日本故也。其在柏林方面，对于此事前途变化，亦复不甚乐观。（德国外部参赞）Holstein 将此事之咎，完全归诸英国动摇不定之态度，可谓不错，但该参赞却不断的设法，以使伦敦圣彼得堡之间接近。彼于四月五日答复（驻英德使）Hatzfeld 伯爵四月三日报告之际，曾引用伦敦方面当时深忧俄国怀疑英国日甚之资料，而且怒不可遏的责备英国。并谓该国显系深恐干涉之结果，竟与日本成仇云云。彼又言：吾人对于中日同盟一事，必须加以顾虑防备，盖欧洲方面如果弃置中国不管，则中日同盟一事，确为中国最后自救之法故也。彼所疑者，只是英国之所以持此稳慎态度，系由于恐惧日本呢？抑系英国相信，如果全力帮助日本，实与英人有益呢？至于德国对于此项问题，则有两种目的：第一，亟欲预防黄色人种，在日本领袖之下，互相联络起来；其次，则欲使英俄两国之冲突，减至最小限度云云。同时，该参赞又在圣彼得堡方面，令人通知俄国政府，略谓英国在未与他国妥协稳当之前，对于东亚事件，当不加以干涉云云。在实际上，柏林方面确是希望保持列强历来共同行动，未抱任何特别目的。即就希图获得煤站港口一事而论，柏林各方意见亦不一致。吾人试阅四月六日寄与伦敦德使之训令，犹谆谆然以保持（东亚）大陆现状为宗旨。其中有云："对于德国最为有利者，即是：如果能将日本（议和）条件向下压抑几分，以至于其他各国将来不能用为口实，各向中国要求割地云云。"虽然，此种努力，结果皆归无效。（驻英德使）Hatzfeld 四月六日所预告之英国政府行将讨论所采态度一事，其后果于四月八日实行议决。据该使是日来电报告如下："首相（Lord Rosebery）顷向余言：今日阁议决定，此次日本议和条件，对于英国东亚利益，并无十分危害之处。如果实行干涉，殊乏理由根据。而且实行此项干涉，其势非用压力不可。至于（俄相）Lobanow 侯爵真欲对于日本稳据大陆，尤其是稳据旅顺一事，加以抗议一层，该首相并不相信云云。"于是，俄国条陈遂遭英人拒绝。而且彼辈深信，列强共同抗议之说，势将从此根本取消。（原注：该德使在其电报之中，特将"首相并不相信"句中之"不"字，加一横线于下，特别令人注意，并非无故为之。）盖俄国方面固自有其重要理由，至今表示不愿积极行动；而法、德两国态度，则又无鼓励俄国积极行动之意。至于法、德两国独自出头干涉一层，则更为万无之事。因此，日本大可在此新得基础之上，将其大陆势力发展，并可由此造成一种抵抗俄国南延之新堤。至于黄种联络之危险，则很可大胆一肩担起，凡熟悉（东亚）情形之人，当深知此项担负为何如者。倘若列强群起要求中国割地，则英国当然不愿空手而去。即或英

国此种思想果然不错，然而吾人犹有十分怀疑者，即英国此种内阁议决，是否真系最后决定？盖此项议决本来已为该国之积极政治家所不赞成，如果该国政府预知俄国行将不顾英国，独与德、法两国出来干涉，或者将其议决变更，亦未可知故也。其后数月之间，关于此点，曾有无数痕迹，表现于外。

英国拒绝俄国条陈以后，最初显然曾使各国发生一种失望停顿之象。只有柏林方面，从前虽曾久抱稳慎态度，现在却坚守自己决议，毫不迟疑。而且，即在此最称多事的四月八日，换言之，即是俄国递到条陈以及伦敦议定拒绝之日，直将德国赞成俄国条陈之意，电达圣彼得堡，并同时在伦敦方面公布。于是，德国政府明白宣言：愿与俄国方面共作俄国政府条陈之步骤。并令东京德使，应与俄使同时齐在彼处发出宣言云云。德皇根据 Brandt 氏说帖理由，遂对此项行动表示同意，而且对于此项行动之影响，甚为了悉；不过，对于此举“全部影响”，则嫌未尝确切洞察耳。盖当时柏林方面，诚然知道，或者将与一个战无不胜之敌人，在远隔重洋之地方，开始军事冲突，而且派遣陆海兵士前往，必需海程两月；作战之时，又无一定天然根据。但是却不知道，德国已在前途难测之世界政治舞台中，作了第一步骤。就当时德国关于此种方面之幼稚经验而论，其势亦不能知道。至于柏林当局之所以如此决定者，实有数种原因：第一，恐怕日本之努力奋斗与中国之巨大财源，合在一手之中，其结果欧洲利益势将不免受其危害，而前途甚有希望之德国利益，当然亦在被迫之列；第二，德国决计，如遇列强再行瓜分海外殖民土地之时，不再站在旁边，空手而去；第三，德国政府心中，或者欲藉此项机会，与俄接近，并使俄、法亲密关系，为之松懈。惟德国当局平素既竭力设法与英亲善谅解，因而上述第三原因，当然只占次要地位。当四月九日 Brandt 觐见德皇之时，德皇曾语之曰：我们与俄合作，则我们东陲情势，便可缓和一点，假如同时能够促使俄国势力多向东洋方面发展，并在该处牢牢拴住云云。柏林方面之为此步骤，并非出于轻心，吾人可于德国屡次向日表示希望之中见之。盖德国尝希望日本方面，自将议和要求条件减轻，以使列强出来干涉，结果很难预测之举，根本失其必要故也。只因此种希望之故，乃有三月六日向日警告之事。倘若英国方面不用暧昧动摇态度，直将此种压迫之效根本取消，或者该项警告，竟收效果，亦未可知。因为英国态度之故，于是遂使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两人抵抗日本国内军阀一派之力量，亦复大为挫弱。

其后数日之间，因受英国拒绝影响之故，列强并无何等行动，惟紧张程度显然逐渐增长而已。其时，德国方面已将彼之决议，向众宣布。反之，俄国方面却开始犹豫起来，而法国方面则又灰心失望。当时德俄法三国无不竭力设法运动英国改变态度。在四月七日之时，换言之，即是英国阁议决定态度之前一日，（驻英德使）Hatzfeld 伯爵为挽回局势起见，犹复提出条陈，假如列强妥协不能成立，则应向伦敦、巴黎、圣彼得堡

三处建言，开一会议以讨论之。各国并宜各自负责，不在东亚方面图谋己国特别利益云云。（德国外部参赞）Holstein 先生于四月十日曾令（英国首相）Lord Rosebery 注意英国孤立之危。并谓此种孤立危险，将因该相“软弱态度”之故，愈为增长不已云云。其在巴黎方面，更是慌乱失措已极。（法国外长）Hanotaux 先生初时竟信：日本方面业已获得俄国同意。此外，该外长对于英国参与一事，如何重视，吾人可于彼对德使之谈话中见之。盖彼曾谓，关于三国共同行动而无英国参与一事，彼现在尚须加以熟思，暂时保留决定之权云云。诚然，此种决定并未久为延搁，盖在四月十二日法国阁议之时，即已决定接受俄国条陈。而且 Hanotaux 并已宣言，即或英国不与其事，彼亦愿与俄德两国对于此事继续协商谅解云云。但是，同时却令伦敦法使再请英国政府注意该国脱离欧洲联合战线所发生之责任。其在俄国方，在势本来应下决定者，现在反闭口不言，一如从前之缄默情形。其原因，大部分系由于圣彼得堡方面之个人关系。盖（俄相）Giers 已于久病之后，在是年正月病故。继其任者为 Lobaow 侯爵，乃系一位七十年纪之人，亦复甚为多病（原注：彼在次年死去），而且对于东亚问题毫无经验。当时亚洲局长 Kapnist 伯爵乃是唯一了悉此项问题之人，但彼却故意不告。其时，外部实际主持部务之长官 Schischkin，使其茫无所知。而该伯爵自己又不能直向俄皇奏陈。因此，当时俄国政治遂陷于一种停滞危险之中。此外，圣彼得堡普通方面，对于此项问题未能毅然决定者，似乎受有英国脱离事件之影响。四月十日，驻俄德使曾来报告，略谓现在仍然未下最后决定云云。四月十五日又来报告，略谓（俄相）Lobanow 现在尚望英国加入，因为（英相）Lord Rosebery 态度现又动摇不定故也云云。据四月十六日伦敦传来消息，亦谓现刻英国方面完全不知俄国真意之所在，此间当局正与法国大使讨论列强会议事件云云。

二、马关抗议与其直接影响

其间，日人对于欧洲各国此种意见纷歧之情形，曾设法加以利用。四月一日，日本所提之和约草案，诚然未被华人正式拒绝，但是却被华人竭力争驳。中国方面因望欧洲列强出来干涉之故，特向各国政府通告，略谓中国对于日本和议条件，业已拒绝云云。其后，因为中国争论的结果，伊藤博文乃于四月十日（陆奥宗光伯爵因病未能再与会议），又向创疾已愈之李鸿章提出新草案。其中关于割让大陆土地一层，愿减至只割盛京南部一小部分。关于战事赔款一层，愿减至二万万两。其余各种条件，则大体未有变更。日人方面宣言：此项新草案，乃系要求最低限度，对于其中细目，当然可以磋商，

但是绝对不能再行减轻。并限定四日之内答复，或接或拒。盖日人深知和议延宕之危，并相信从速弄成已定事实，以使欧洲列强现尚犹豫之干涉举动，完全搁置。于是，最后一次会议，乃于四月十五日照定时刻开会。开会之时，李鸿章遂以不卑不贬之态度，表示让步。此项和约乃于四月十七日，在马关签字。其内容大体，悉照日本最后一次草案。关于交换批准公文一事，系定于五月八日在烟台举行。

于是，中日战事从此遂告终结。倘若列强现在欲阻此种已成之结果，则恰当时机，实未免已经错过。其在伦敦政府方面，则于四月八日内阁会议之后，为时未久，而态度又复从新动摇不定。四月十日，（驻英德使）Hatzfeld 伯爵曾来报告，略云："（英相）Kimberley 伯爵，曾将彼与余之最后一次谈话内容，转告（驻英）法使，并言余所提出之各种理由，曾使彼之向来意见，略为动摇云云。此外，Courcel 男爵与余皆以为，假如俄国当初若不坐待英国此种软弱小心内阁关于中国请求调停和议之决定，而是先与其他各国协商一种共同行动基础，然后再请英国政府于二者之间，自择其一，或者参加共同行动，或者自愿完全孤立，则此事之在伦敦方面，当较现在情形为佳，亦未可知。盖如此，则英国政府易向国内舆论方面为其政策辩护云云。"当中国（驻英）代办于四月十日既已向英通知中国业将和平条件拒绝云云，于是（英相）Kimberley 以为继续战争一事，实属可能。并谓果尔，则将另成一种新局面，可使英国将其见解与决定为之变更云云。因此，彼极望与其他各国继续为友谊上的交换意见。德国当然亦在其内。据此，则四月十五日（俄相）Lobanow 犹望英国加入合作一层，实非完全无因。而俄国态度之所以延迟不决者，亦可由此得知其故。到了四月十七日，换言之，即是马关和约[①]签字之日，俄国方面终竟毅然决定。（德国）驻俄代办致电柏林，略谓："Lobanow 侯爵向余通知如下：英国脱离合作之举，遂使俄国不能不将责任担起，独力保护俄人东亚利益，以及欧洲方面之东亚利益。俄国政府现已决定，最初先用友谊的态度，请求日本对于永久占据大陆方面中国领土一事，加以放弃。Lobanow 侯爵预料德、法两国，一定参加此种行动，并已于昨日训令柏林、巴黎两处俄使。倘若日本不愿遵从此种友谊劝告，则俄国预计，即由俄、德、法三国战舰共向日本开战云云。"同时并按照此种决议内容，训令北京俄使，劝告中国政府，对于签字和约之事，不要太忙云云。于是，德国政府即于同日电致东京德使 Gutschmid 下列训令一道：

① 马关和约：即《马关条约》，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关于结束甲午战争的不平等条约。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4 月 17 日，清政府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共十一款，附有《另约》、《议订专条》各三款。这个条约表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

"（一）俄国（驻德）代办曾向我们通知：

'考察日本和议条件之结果，遂使俄国政府深觉日本要求占有辽东一事，实令中国首都永久受其压迫，同时并令高丽独立成为一种幻想 。因此，此项占领，实为东亚和平之永久障碍。（是以特令）东京俄使将上述各语向日通知，并同时劝其放弃永久占领辽东之举。'

假如东京俄、法两使方面，一旦奉命发送此类宣言，即请阁下亦复立刻向着日本政府，为同样之表示。

（二）附录，以作阁下措词资料。

去年十月七日，英国方面即已提议：列强对于中日纠纷，应该加以干涉。当时德国因为对日友谊之故，曾拒绝参与。

惟现在日本所提和议条件，却未免过甚，实属有伤欧洲利益，对于德国利益亦然，纵然德国所受损失比较微小。

因此，我们现在不能不共同抗议。如遇必要之时，我们对于此种抗议，并将给以有力后盾。

日本必须让步，若与三大强国相战，前途实无侥幸希望。假如日本政府对于让步一事，只以召集会议讨论一种办法，为唯一无二的不是被人屈服的方式，即请阁下将此立刻电告本处。"

（东京）俄使同时亦接（本国政府）同样训令，而（驻日）法使（则是很可令人注意的），直到四月二十三日始接（本国政府）训令。

此种（对日行动之）步骤，顿使英国方面大受刺激。其后数日之间，确曾令人得着一种印象，似乎英国方面仍将参与列强共同行动之举。至少驻英各国大使皆曾得有此种印象。（驻英德使）Hatzfeld伯爵在四月十八日，甚至于在四月二十日，犹向柏林报告云："英国加入列强（行动）之可能性，至今仍未消失。英国政府现又开始详细思考。法国（驻英）大使之意，以为伦敦内阁意见，现正改为趋向加入一途云云。"又据圣彼得堡方面传来之消息，亦谓（英相）Lord Kimberley对于英国此种完全孤立之局势，甚为不怿，似正趋向改变方针一途云云。（驻俄英使）Sir Frank Lascelles对于兹事之如此经过，常表示惋惜之意，不稍隐瞒，而且明白向人言曰，彼甚不懂英国此种态度云云。但伦敦方面主张英国今后行动，必须顾及日本，而且日本最足以代替瓦解的中国担负抗俄的责任之一派，乃占优势。究竟英国此种改亲日本之行动有何目的，吾人可于四月二十三日《Daily Chronicle》所载之论文中见之。该项论文显系出于重要政治人物之手笔，其中曾爽快明白言曰："假如日本果能承认英国确有应在北方得一舰队支点之必要，则英国便可成为日本之友云云。"此种思想，并非新物。盖我们已于三月中旬，尝

在英国报上见之矣。大约此种思想，系发之于海军界中。因彼辈尝要求得一港口，以作不适于用的 Port Hamilto 一港之补偿故也。至于四月二十九日《Standard》报上以及其他各种报上之论列，则吾人只能认为上述真正动机之表面装饰而已。盖该报等曾言：“英国虽是欧洲一个国家，但同时亦可算作亚洲一个国家。因此事实之故，我们如遇亚洲方面发生任何一种纠纷危险，或者我们应当独自加以处置，或者我们对于一种共同行动，必须担负指挥及监督之责云云。”英国脱离（列强彼此共同行动）之举，从此遂完全确定。

四月十八日，（驻德日使）Aoki 奉命向柏林外部通知（中日）和议告成一事，并表示希望德国继续其友谊态度之意。（德国）国务员 Marschall 乃答彼曰，德国去年拒绝参加（英国方面所条陈的）干涉行动之友谊态度，可惜未得对方同样之友谊报答。日本并将今年三月德国所进之良善忠告，当（着耳边之）风吹过一样云云。（日使）Aoki 承认此种责难之言，并非无因。而且自言，曾经屡请本国政府采择德国忠告云云。吾人若就德、日两国至今良好关系（此就日使之谈话中，可以见之），以及德国利益确受此次东亚事变之直接影响最少两事而论，当然德国对于此次向日抗议之举，宜取一种形式，足使中、日两国人士，皆认为德国此次之参加，实与彼等有益。换言之，即是：只要环境许可，德国宜自居于调人地位是也。此种调人地位，幸于前次三月六日（德国向日）秘密警告之时，业已早为之备。盖当时日本方面则感谢德国之通知，中国方面则感谢德国之玉成故也。当时，日本方面对于德国此种暗示，虽未尝加以注意，而德国地位却不曾因此而弱。不过，（德国外部）Holstein 先生对于此种必要情形，当然不能洞察，盖彼于东亚问题，向无所知，且极冷淡故也。当时，彼欲立向日人提出限期答复之要求，以表示（三国）干涉之举，并非儿戏。但是，聪明的（驻英德使）Hatzfeld 伯爵，曾经向彼特别警告，略谓：德国态度切勿比较俄、法尤为强硬。否则，所有日本仇怨，皆将落在德国身上。盖俄、法两国希望英国加入之心，既未尝完全断绝。而法国参预此举，又只是由于对俄友谊关系一点云云。至于德国方面可以自行表示其为温和份子之机会，亦确不少。其后，日本政府以三国此举，将使日本国内发生各种困难情形之故，乃向圣彼得堡方面，请将三国所提要求，自行撤回。而（俄相）Lobanow 侯爵对于日本此请，当然加以拒绝。但四月二十九日，（驻俄）日使向（驻俄）德使 Radolin 侯爵所提出之条陈，主张退还辽东而以加增赔款数目为条件，其在赔款未付以前，则由日军暂行占领该地云云；在柏林方面却颇有惠然容纳之意。到了五月一日，（驻德日使）Aoki 复奉命提出同样条陈，并加以下列扩充，即旅顺港口应归日本永远占有是也。柏林方面对于日本希望永远占有旅顺一事，诚然加以拒绝，但对于日本其余希望，则允代为说项。此外，日本政府希望为保持日本名誉体面计，所有前此预定之换约一事，仍须照旧举行云

云，亦得柏林方面之谅解。于是，五月四日（柏林外部当局）Marschall 男爵，乃向驻德日使通知，中国当于换约之后，特向日本提出请求，自愿加增赔款数目，赎回辽东云云。其后数日之间，中国政府对于此事，亦复表示同意。惟此项问题当时曾遇极大难关，若非德国政府特别坚持，其势颇难解决。盖俄国从前曾向中国劝告，对于批准条约一事，切勿过急云云。因而，北京政府依照此种劝告，对于前此约中预定五月八日（烟台）换约一层，殊不愿如期实行。此外，北京政府更惧正式换约之后，则要求退还辽东一事，势将成为画饼，不胜迟疑之至。于是，德国方面乃于五月五日，特向北京通知：换约一事，决不许有所迁延。次日，柏林外部对于中国驻德代办之抗议，亦复不为之动，照旧坚持。而就日本当时对于此事所持之态度而论，亦使三国政府其势不能辞责。盖东京政府曾于五月五日，特向柏林、圣彼得堡、巴黎三处通知，略谓日本因顾及三国友谊劝告之故，对于永远占有辽东一事，自愿加以放弃云云。于是，抗议目的可算达到。所有其时三国舰队司令，在中国海面所准备之军事行动，当然亦归无用。但在俄国方面（此为圣彼得堡方面新起一种风势之表现），却相信关于换约问题一事，尚须采用特别压力。俄国战舰十七只齐集烟台港口，特向日人表示一种军事示威运动。其意若曰：假如日本因为中国拒绝换约之故，从新采取攻击行动，则俄国方面决不能再行忍耐云云。此外，德国驻扎东亚之巡洋舰两只，其时亦泊烟台港内。反之，法国舰队则驻在 Nagasaki 方面。至于烟台方面，法国却只留巡洋舰一只驻泊。盖法人方面似乎不愿于抗议目的既达之后，再行追随彼之盟友，更作其他举动。而当时俄国对华所下之（缓批条约）劝告，既未尝撤回，于是北京方面陷于一种困难情形。其时，俄法两使，均未接有本国政府任何训令，以向中国政府建议关于换约问题应采之态度。而德使方面，却坚持换约一事，非照期实行不可。当时，中国全权大使业已随带正式约本，前往烟台；惟北京政府却迟迟不下实行换约之令。到了五月八日午后，（北京）德国使馆之内更大演一场戏剧。中国大臣以极热烈之情感，将所有东方向来中庸习性，尽行忘去，力请德使共与俄、法两使一致行动；并求其允许换约一事，展至辽东退还问题业已解决之后，再为举行云云。其后，北京政府确信德使态度坚决，无可挽回，乃将训令拍往烟台，实行换约。（由此可见，德国地位之何等重要。）是日，彼此交涉争持，几将全日时间占去，直至夜间十一点半钟，然后始行换约。因此，日人“面子”乃得顾全，而华人关于改约一事，亦复得有相当担保。于是，中日双方皆应感谢德国之助。此项东亚问题，经三国之出来干涉，得以迅速解决，实系出乎意料之外。并使其后数月之间，局面为之特别变换。（按，最后一刻之间，西班牙曾力请加入，成为四国，但此事在实际上并无重要意义。）因为此次日本反抗力甚为微弱，出人意料以外之故，于是俄、法两国一反其向来之犹豫消极，而变为强硬态度。并且，其时俄、法两国对于德国之参与其间，殊感不

便，显然亟欲将此第三者摆脱，仍为两人团体。该两国此种举动，实使一般对于此次东亚共同行动专从欧洲政治（大局）着眼者，大为失望。当时，俄国一部分政界及其报纸，曾发生一种思想，其意以为，德国方面只欲利用俄国之助，以便关于非洲问题以及其他殖民地问题，得有一种凭借，以对付英国。而俄国方面对于东亚问题，却完全不必需用他人之助，可以处置裕如云云。（此种议见发生之晚与骤，均可令人注意。至于法国方面，本来对于此次东亚共同行动，直到而今均只算是勉强合作，殊非心甘情愿者，而现刻却似乎饮食之际，胃口忽然大开。当其中日和约既已批准之后，于是中国方面乃提出建议（当然系由法国之助），法国应该出来干涉日本占有台、澎之举云云。但俄国方面对于此种干涉，却不愿加以赞助。不过在（俄相）Lobanow 侯爵个人方面，对于法国是否能够取得台、澎诸岛几许一事，虽然不甚注意，但彼却不愿法国背彼而去，于是竭力避免将来法人野心不遂，因而归咎俄国之虞。盖法人此种野心，因时局已无危险，不免大为增长故也。因此，该俄相甚希望法国此种企图，能因德国之反对而搁浅。在实际上德国对于再向日本续提抗议之举，确曾加以拒绝。盖此类抗议，实超出原来范围之外，因原来范围，只限于大陆问题故也。至于 Lobanow 侯爵个人对于法国此种野心之真实意见如何，吾人可于一八九五年九月十一日，彼在德国使馆饭后，向着其时方正勾留圣彼得堡之德国国务总理 Hohenlohe 侯爵所发表的言论中见之。彼云："我们之尽力（劝告）法国，实是对于欧洲作了一大功绩。只有上帝知道，假如我们不将他们（译者按，系指法人而言）缰辔拉住，他们将做些什么勾当出来。"此外，俄国报纸尝明白要求政府，利用机会占领一个高丽港口。或者力为西比利亚铁路终点，谋得一块土地云云。而德国方面对于俄报此种要求，因有种种原因之故，完全采取中立态度。既不加以鼓励，亦不加以反对。无论如何，当时日本伊藤内阁地位，既已如彼困难；而日本国内群众，因为三国干涉所引起之愤慨情形，又复如此激烈，政府竭力设法安慰，始稍稍归于平静，现在却不应再提何种抗议，以使日本国内难关，再行增剧。因此之故，德国方面乃屡劝俄国稍为缓和一点，其结果，德、俄两国之间不免发生意见纷歧之事。当是年九月十一日，德国国务总理 Hohenlohe 在 Peterbof 谒见俄皇之时，俄皇曾以此为言，并谓（德国外部当局）Marschall 先生对此实应负责。此种意见纷歧之处，据俄皇自言，当时已经解释明白，所有东京方面之讨论，只是了结其余未了之事云云。在此情形之下，于是与日接洽退还辽东一事，进行殊不如此顺利，一如一般人之所想像。中国方面最初拒绝加增赔款一层，李鸿章并屡向日本提议，此项问题宜由中、日两国直接谈判，以避免三国参与为善云云。相传李氏因忧俄国压迫日甚之故，甚至于向日提出，自愿允许日本建筑一条京津铁路，并结一种中、日同盟，以为补偿云云。日本方面对于李氏此种提议，加以拒绝。同时，又因德国亦不赞成无偿的退还辽东之故，于是，俄、德、法

三国乃于十月十九日，在东京方面，与日结成一种协定。依照该协定，日本可以多得赔款三千万两，而辽东日军则应于中国缴付此项赔款之后三月以内，尽行撤去。此外，日本政府并承认台湾航线为国际交通要道，日本决不垄断独占。最后，日本政府更负责宣言，澎湖诸岛永不割与其他各国云云。于是，中日两国乃于十一月八日在北京方面，实行正式订结关于上述诸点之协约。

三、三国抗议事件对于德国政治前途之关系并评论其得失

此次重大事件，遂如此告一段落，成为世界大势前途发展中主要根苗之一。而德国当局（在俾士马克[①]退职以后）对于自己今次决定，究竟前途影响如何，本未完全洞悉者，现在亦复牵入漩涡而去。至于德国政府之意，一方面欲使德国在华前途根基稳固，而他方面则又希望对日友谊之牺牲，万物[②]超过必要程度。惟德国当局此种心意，在此次干涉行动之中，实未充分表示出来，迥与从前所持态度相异。其实，将此心意充分表示出来之举，就当时情形而论，确为可能，确为必要。德国之调停温和态度，其在干涉以前，与夫干涉以后，即在日本方面，亦未尝不加以承认。其所以未能将此优良境遇尽量保持利用，一如吾人所希望者，实由于举行此种干涉所采之方法，太不善耳。本来（德国）国务员 Marschall 以及（德国驻英）大使 Hatzfeld 伯爵，对于此次干涉行动，皆尝有深思熟考之主张，但此种主张，不幸竟为当时主持其事之（外部）秘书参赞 Hostein 与夫（德国）驻日公使 Gutschmid 两人，将其功效之大部分牺牲丧失。盖该项（寄往东京）措辞强硬之训令，即系出自 Holstein 手笔，用作驻日德使谈话资料者也。（译者按，Holetein 虽只系参赞，但在外部中极有势力。）凡（德国驻英大使）Hatzfeld 所警戒勿为者，此处无不恰恰相反为之。其结果，此种毫无目的之武力恐吓举动，本为俄国条陈之中所无者，竟使德国挺立前面，仿佛自己在诸国中实为受损最大之国一样。其实，此种浪费气力之举，尽可委诸俄、法两国为之，一如（驻英德使）Hatzfeld 所希望者。至于（德使）Gutschmid 之为人，则系属于下列一种外交家为吾人所习见者，即其人只知道显露自己头角，促进自己官阶为服职之目的，而对于此种外交要务自身，则

① 俾士马克：即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和德意志帝国宰相。任首相期间，推行铁血政策，发动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1871 年，帮助法国凡尔赛政府镇压巴黎公社。任德国宰相期间，对内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镇压工人运动；对外采用结盟政策，确立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

② 物：应为“勿”字之误。

却丝毫不懂，亦无一点兴味是也。该使若能谨守上面所述主要思想，先与俄、法两使相商，然后自行草拟一种措词方式，则其势必较由柏林方面所草拟者为佳，然而该使却不如此。同时，更因该使个人态度之故，反将 Holstein 恐吓举动的程度，大为增加。该使对于德国在三国中之地位关系，丝毫不管，竟自挺身立于俄、法两使之前，自认为此次全部举动之主要人物。盖当时（俄使）Hitrovo、（法使）Harmand 两人，对于 Gutsehmid 之自负态度，显然察出，颇知所以利用故也。Gutsehmid 自己尝于四月十九日报告柏林云，俄、法两使曾推彼往见日本外务次长（Hayaschi），要求陆奥宗光子爵立回东京（时陆奥正在 Kyoto 皇宫），以便接受某种重要外交公文云云。当时，俄、法两方曾要求该使于提出三国抗议通牒之际，宜以领袖资格，首先发言云云；该使对此要求，虽然拒绝，而愿以首席让俄，次席让法。但彼在提出抗议之际，却自知立于万目齐集之地，大出风头。当俄、法两使将其责任，出以友谊形式，迅速轻便办理了结之际，而（德使）Gutsehmid 则不恤应用郑重堂皇的手续以为之。时陆奥宗光因病未能到场，该项抗议，遂于四月二十三日午后，直由（日本外务次长）Hayaschi 接受，（德使）Hitrovo 先生于递交劝告之后，并附以解释。略谓彼甚希望，日本政府如果对于永久占有辽东半岛一事加以放弃，当可使彼到日本以来所促进之俄、日两国友善关系，更将向后继续保持不已。而且直向三大强国“抵抗”résistance（俄使并未如余，直用“开战”〔lutte〕一语）一事，前途实系毫无希望。彼自数月以来，即常屡向日本政府警告，切勿合并大陆方面之土地。盖此种合并之结果，其势只使日本趋于衰弱而已。最后，该使又言，希望日本对于俄国此次宣言，视为俄国对日友谊之又一新确证据云云。

至于法国公使，则紧接俄国公使之后，将其宣言交递。此外，仅仅说了几句普通忠告，与夫法国友谊之语。

余在递交吾国宣言以后，曾依照训令发言，并略为补充曰：“余在本年三月八日，因奉本国政府训令，曾向日本劝告，速以轻宽条件，订结和约，以避各国干涉之危。而且特别声明，假如日本要求割让大陆方面土地，则最易引起各国干涉（此种劝告，可惜未为日本所注意）云云。余之此项言词，颇使日本外交次长 Hayaschi 得着一种深刻之印象。该次长（初时）似甚惊惶，直到余（待）使馆译官将宣言及附语译成日文诵读完竣以后，并从而为之解释，该次长始稍安贴。盖余当时曾加以解释曰：此项附语之用意，无非欲使日本政府明了时局情形之十分严重，与夫拒绝我们劝告以后势将发生之（不祥）结果而已。余甚希望日本政府只将上述忠告，视作德意志帝国政府对日真确友谊之又一证据云云。倘若余之语言口气，或者稍较俄、法两使为强硬一点，则余之此举，其意无非欲使日本特别注意时局严重情形，并令该国对于答复三国一事，特别详慎思维而已。”

该使于上列报告之内，并附录宣言及附语原文如下：

宣言及附语原文如下：

余之最高政府，曾寄训令与余，命余发表下列宣言："考察日本和议条件之结果，遂使德国政府深觉日本要求占有辽东一事，实令中国首都永久受其压迫，同时并令高丽独立成为一种幻想 。因此，此项占领，实为东亚和平之永久障碍。是以德国敬劝日本政府，对于永久占有辽东半岛一事，加以放弃。"

余并奉命，于上列宣言之后，附以下列附语。

"日本于此次战事期间，固尝屡次获得德国对日友谊之证据。去年十月七日，英国曾提出列强出来干涉中日战事之议，当时德国因对日友谊之故，尝加以拒绝。此外，（德意志）帝国政府又于今年三月八日，劝告日本政府，从速订结和议，减轻和约条件云云。当时因念列强或因中国方面恳请，行将出来干涉和议，于是德国乃向日本进言，谓日本若以轻宽条件，直接与华议和，不待他国出来调停，实于日本方面，比较最为有益。并曾特别明言，要求割让大陆方面土地一事，最易引起列强干涉云云。可惜日本于此种毫无私心之劝告，未尝加以注意。

现在日本所提和议条件，却未免过甚，实属有伤欧洲利益，对于德国利益亦然，纵然德国所受损失，比较微小。

是以（德意志）帝国政府现在不能不共同抗议，如遇必要之时，对于此项抗议，并将给以有力后盾。

因此，日本大可以让步，盖向三大强国宣战，前途毫无希望故也。"

该使于四月二十六日，又继续补报，谓彼在交递宣言之后，曾向（日本外务次长）Hayaschi 言曰："假如日本政府对于让步一事，只以召集会议讨论一种办法，为唯一无二的不是被人屈服的方式，则彼（指德使而言）曾奉训令，立将此种日本希望，电告柏林云云。"究竟该使是否真正曾将此种思想（原注，此种思想，系发自〔驻英德使〕Hatzfeld 伯爵已于上文言之），一向日本政府言之，吾人实不能无疑。无论如何，日本政府方面实始终未尝利用此种思想。

吾人若于（德使）Gutschmid 此项报告之外，再将（日本外务次长）Hayaschi 所作报告，曾刊行于彼的笔记之中者，一为比较参阅，实非（毫无兴趣）不关重要之事。吾人对于该次长之记载，可以推断不疑者，即其中颇有故意加倍描写之处，颇受彼之后来排德思想所支配。但在他方面，吾人又可以相信不疑者，即此项记载，当能将（德使）Gutschmid 彼时所持态度，深印之于日人脑中者，照实写出。此项印象迥与该使报告（伯林）外部者不同，或者迥与该使自己所想像者不同。（日本外务次长）Hayaschi 记载之中有云："关于（三国）抗议时节，德国政府对日之态度，吾人可于下述一段有

趣情形之中，得着一些概念。当三国抗议之时，外务总长陆奥宗光伯爵正在 Kyoto 地方。所有部务，皆由余手代行。因此，关于三国公使接洽之事，亦由余手办理。某次，(在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俄、法两使前来部中谒余，同时带来一种用法文草写之简短宣言书，对余念读，并将其留存余处，以便余之审阅。

同日，但在午后时节，德国公使亦来访余。该使对于英、法两国语言虽然深谙，但彼似乎觉得，用上述两国语言草写宣言，未免不称。同时，又因余不懂德文之故，于是彼乃带来一种用 Romaji 写就的宣言书（原注，换言之，即是用拉丁字母拼成之日本文所写就的)，并命彼之秘书（Weipert）先生向余念读。该秘书对于日本通行之文字，虽然十分认识，但现在彼必须大讨苦吃，拿着一篇素不通行之拉丁字母所拼写的日文诵读。盖该项宣言原文，本系用汉字所草成者也。因此，该秘书诵读该项宣言之时，无论该使，以及该秘书本人，彼此皆未懂得其中一字。此固十分明白，(不待智者而知）者也。至于余之个人，虽然特别专心注意谛听，但对于宣言书中之意，仍是一点不能了解。

至于法、俄两使所留下之宣言书，其内容只是几句简单建议，略谓日本政府宜将马关条约所得土地，退还中国。其所以进此劝告之理由，则谓完全出于邻国友谊关系。反之，德国公使则言，日本若与俄、德、法三国开战，可谓毫无胜利希望。因此，对于日本方面，实以接受三国劝告为最善之道。

余当时系站在桌旁，对着德国公使，并向其言曰：阁下贵同事俄、法两国公使，曾来此处，并交余一种友谊劝告，其内容系以保持和平为目的。该项劝告之措辞，十分友谊，反之，阁下宣言之用语，一若此项问题将以武力为解决之道也者。倘若阁下之意果如此，则对于（日本）国家之尊严及国民之感情，必须加以注意；至于宣言中之措辞(侮慢)，吾人此时姑且置而不论。大约此项宣言，系用日本语言草成，而阁下对于此种语言，又非娴习，因而选词用字，不免错误云云。

该使于是向余回答，措词及态度均极拙劣（awkward)。略谓宣言内容意义，果如余之所言，则实非出于彼之本心。倘若宣言之中果有此项意义，则系由于日文误译所致云云。彼愿将此宣言撤回，并请余关于德国宣言之内容，即以俄、法两使宣言内容为准云云。随后，(日本外务次长）Hayaschi 更将俄、法两国宣言附录于下。俄、法宣言内容，全与当时俄国（向德、法）所条陈者相同，毫无一点恐吓之意。诚然，当俄、法两使面晤日本外务次长之时，或者口头曾言倘若“抵抗”三国劝告，实际毫无用处云云，此固非必无之事。而（德国外部参赞）Holstein 与（德国驻日公使）Gustchmid 两人却直用“开战”一语加以威吓。至少 Gustchmid 于其报告内面附注之中，曾将“抵抗”(résistance)、“开战”（lutte）两语，特别提出。无论如何，俄、法两使，一如当时俄

国条陈之意，系用一种友谊形式为之，实较（德使）Gutschmid 措词态度为温善。至于（日本外务次长）Hayaschi 此种笔记，其中亦颇有不合情理之处，但此事有一前提，即此项笔记之西文译本，完全不错是也。盖照该项笔记所言之情形，在事实上万不能有故也。德国使馆译官 Weipert 博士，乃系一位对于日本语言文字、日本交际仪式，极有研究与经验之人，当不至于发生此种无意识之思想，将一篇本系日本文字草成之宣言，而改用拉丁字母拼音以书之。又该笔记所谓，该译官对于自己所读、所译之宣言，并不能懂云云，亦系万无之事。关于当时经过实在情形，可惜现在似已不能得其真相，因三位当事之人（译者按，系指日本外务次长、德国公使及译官三人而言）均已死去故也。不过，吾人可以相信不疑者，即此种甚为重要极关得失之会晤中间，德国曾留下一种印象，实与彼之真正态度不符是也。

此外，更有一种影响尤甚之现象，足以大损对日邦交者，则为下列著名标语之产生，即“欧罗巴各民族呀，保护尔等最为神圣之遗产!”（Völker Europas，wahret Eure heiligsten Güter）是也。此种标语更将此次抗议之事，增色不少。于是，幻想中之“黄祸”，为西洋各国，尤其是为英、俄两国舆论界所流行者，遂使“欧洲诸国（一如〔我们威廉〕皇帝美术家所自言者）各以本国神灵作其代表，为天上遣来的头等天使 Michael 所召集，共商如何联结，抵抗佛教异端野蛮的侵略，以保护十字架之道。” Die europäischen Mächte，jede durch ihren Genius vertreten，zusammengerufen durch den von Himmel gesandten Erzengel Michael，wie sie sich im Widerstande gegen das Eingreifen des Budhismus，des Heidentums und der Barbarei zur Verteidigung des Kreuzes vereinigen.（原注，一八九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德皇威廉第二致俄皇之函。）德国于此又复甘作一种理想之先锋而不辞，其实此项理想之实际利害关系，德国却远不如其他各国。而且此项理想之基础，系建筑于一种错误历史观念之上，对于他种富有自尊思想的文明古族之感情，势必深为伤损，此固大可不必者也。于是，此种标语，遂与原来意旨相背，成为西洋各国妄自骄傲夸大，不谙异种文明之永久纪念。至于德国当时对待日本，极宜表示一种亲善之态，此又明了易见，不待智者而知者也。

此次抗议之实行手续，曾使日人对于德国真实态度，无从洞悉。而且不知德国参加此项已成事实之抗议，实与日本极有益处。（日本外务次长）Hayaschi 于其记载之中曾言：“吾人可以揣知者，即俄、法两国之所以提出抗议，只为吾国扩充领土一事而已。至于德国则不然，在和约尚未议结以前，早已存心干涉，而且甚望所结和约，恰与彼之心意相投云云。”该次长此项主张，实与从前彼之自己记载，大相矛盾，乃是一种毫无根据之谈。其实，该次长对于德国所发一切言论，吾人皆可以作如是观也。但在他方面，吾人又可以想见，日本国内对于德国政策之误解为何如者。

虽然如此，而吾人对于“日本仇视德国最深”以及“马关条约以后，日本对德永成仇敌”之言，仍然不能相信。盖当抗议提出之际，日人感情饱受刺激，诚然已达极点。但吾人竟谓，此种仇视情形，德国实首当其冲云云；则无论在一八九五年，以及其后数年期间，所有日本报纸与夫日本政界，皆无何等仇德言论，足以证明此说之不虚也。吾人所习见者，只是日人方面始终不能了解德国参加之动机与关系。其所以如此者，当然德国政府与驻日德使，应首负其咎。盖德国政府与驻日德使，未曾努力，或未曾充分努力，以使因办理不善而掩蔽之事实真相，彰然于世故也。至于日本政府方面，消息本较灵通，如果具有诚意，亦未尝不可设法使此真相为之显明。一八九七年德国占领胶州一事，当然从新引起日本国内之重大刺激，但在日本政界当局方面，对于德国此举，却不引以为奇。假如（驻德日使）Aoki 四月二日之言，并非随便而发（译者按，该使曾于四月二日，面劝德国外部当事，占领中国东南一个省份，以为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之交换条件），则现在日本政界当局对于德国此举，当然不复引为惊奇，（此固显然易见者也）。日本之真正仇敌，以及对于日本扩充领土之真正障碍，实为俄国。当时日人之心中，固无不如此作想。其结果怨德情形，不免为之大减，以至于无关重要。直到一九〇二年之际，日本国内始逐渐对德疏远所有报纸攻击及政府态度，皆尝有此痕迹发现。但此种疏远，实有其特别原因，全与一八九五年抗议事件无关。日本著名政治家 Okuma 伯爵，系一九一四年之日本内阁首相，曾于一九一〇年春季，对着 Ostasiatische Lloyd 代表曾有下列谈话，可谓极与实事相符。彼云：“德国提出反对马关和约之抗议，现在业已经过十有五年。所有当时日人对德之不怿情形，现在实已早经忘去。余于近来，曾向（德国）退职大使 Holleben 言曰：东京方面早已洞悉，当时德国所从事者，仅为欧洲政治问题，其针锋系专对俄、法两国。纵然德国对于东亚方面亦复有所举动，自彼时以来，德国政策早为日本当局所了解。现在两国经济政治关系，竟如此发达进步，直使日本国内从前对于抗议事件的真相尚不明了之人，此刻关于抗议旧事，亦复忘去无余，云云。”出外[①]，更有一位德国新闻记者曾言，一九一一年（日本）侯爵 Katsura 尝向彼云：“日本真正政治家，对于德国参加抗议事件之举，毫无仇视之意。盖吾人倘若一旦反省，则知一八九五年获得辽东半岛全部一事，对于日本并无幸福可言。”诚然，吾人对于东洋政治家此种谈话表示，就大体而论，其可信赖之程度，尤较欧洲政治家的谈话表示为少。而况 Okuma 伯爵更是一位著名善说与谎语之人。不过，该伯爵此次谈话表示，却为 Kato 男爵所间接证明，确是真实不虚。盖 Kato 男爵者，Okuma 内阁之外务总长也，其为人极属谨慎。当彼一九一四年九月五日在国会演说，以辩护日本加入世界大战理由

① 出外：应为“此外”之误。

之际，曾列举若干多多少少不甚明了之理由。但对于马关和约抗议事件，却一字未提。吾人于此可见，抗议之仇，对于一般社会已无重大意义，不足以列为证据，得着国会多数同情。我们现在知道：日本政府当时所抱之仇德政策，以及对于青岛加以攻击之举，曾在国内方面，遇着不少反对。此外，尚有一事，更足证明日本对于德国参加抗议事件，未尝十分介怀者，即一九〇一年与一九〇二年之交，日本政府所持态度是也。盖其时日本对于德、英、日三国之关系，正欲从新加以整理，我们对于此项问题，以后尚须详细研究。现在所欲言者，即此处又足以证明日本对德之旧日信用与亲善，并未因马关抗议之影响而有所伤损，以两国邦交成为永远愁闷之象也。

但德国方面，当时却深信日本仇视之心，实无挽回希望，于是听其自然，酿成种种恶果，直与一九一四年开战以前之全局有关。究竟德国此种根深蒂固之心理，原因何在？其答案实往往令人惊讶不已。盖此事全系英国神妙宣传作用所致。而且此项宣传，在世界大战之时，更一直侵入德国各界人士脑中。纵然德国从事政治之人对于英国宣传作用，早已知为英国政府之最要策略，但一般德人之甘受其鼓吹也，仍然如故。此种宣传，自然首先利用一般人之感情作用，以使此类毫无判断能力之“社会舆论”，作彼某种政治方针与行动之响应。英国破坏德国世界地位之计划，系从一八九六年起，始有雏形。至一九〇二年以后，则渐成一种坚定形式。于是，德国在东亚之地位愈进，则英国唆使日本仇德、破坏日德关系之心亦愈急。欲达此项目的，则德国参加马关抗议一事，实是最好材料，以使日本时常忆及旧事，昔日被人侮辱之国民自尊感情，从新鼓动，逐渐趋于实行报复一途。现在，最关重要之事，只是（如何设法）尽将当时抗议事件真相掩没，并使德国成为抗议一役之真正发起人物，真正主要人物。因而英国从事宣传之人，常向日人耳中，造作德国种种政策之谎语。所有东亚方面之日报外报，无不依此意旨，以使“社会舆论”受其影响。其结果，日本政府自一九〇二年将其本国运命完全追随英国世界政策以后，对于事实真相，虽然尽知，但亦不能再将不愿再将上述英国所造谎语，阻止传播矣。至于英国报纸书籍，从前在抗议事件大收效果以后，本来对于本国政府 Rosebery 之可悲政策，曾加以严厉攻击，谓其不应坐令英国袖手旁观，以失指导地位云云。而现刻却在大局变迁之后，利用世人易忘之习，于是不惜宣言，当日抗议事件，乃系一种极为可恶之暴举云云。关于此类英国论调，实有无数例证可举，现在吾人仅举一件，以例其余。Sir Valentine Chirol 尝任英国《泰晤士报》之政治编辑主任多年，曾著书一本，名为《远东问题》（The Far Eastern Question），于一八九六年出版。其中有言：“英国方面曾于（中日）战事初期之时，提出条陈，其目的在阻止双方继续敌视，而此项条陈，尝为欧洲各国所拒绝。……最后，交战国双方遂将和约条件，彼此商妥。此约对于英国政治商业利益，即或未尝直接损害，但至少关系不小，而当时英国

政府却似乎站在旁边，不愿过问。反之，俄、法、德三国，则挺身立于一种地位之上，换言之，即是英国所让出的远东领袖地位之上。……即在后来为时稍晚之际，英国如欲担任独立行动恢复和平之责，犹属可以办到，且无何等危险；实不应专作促使他国同来负责之工夫，而结果仍无成效。”在该书之一九四页上，又言：“倘德国对于彼之俄、法两同事，果可以实行一种调停手段，以使彼等勿作过甚行为，则吾人（指英人而言）对于德国之决意参加，至少不应加以反对云云。”到了一九一四年，该记者又作一书，名曰《德国与俄人恐惧》(Germany and the Fear of Russia)。在本书第九页之内，该记者却言：“即或德皇威廉并未实际唆使俄国，阻止日本对华胜利之收获，一如日人所悬揣深信者，但无论如何，当时德皇极愿诚心与俄合作，即因此而竟下仇恨种子于日而不辞。此项仇恨种子，现因日军围攻胶州之举，可谓已达成熟之境云云。”吾人于此又可以看出英国宣传政策所用方法为何如者！此种鼓吹既经年不断的行使，当然易使未有政治训练之日人，对于德国态度，充满一种完全错误之观念。此外，更因二十世纪之初，德国在华经济文化势力之发展，尤其是在山东方面，遂使日本政府认为此种情形，最与彼之自己（对华）政策有碍（一如日本外务总长 Kato 于一九一四年九月五日之演说中所言者)。盖此时彼之劲敌俄罗斯，业已于一九〇四年之役大受创伤，已无危险故也。虽然如此，该总长辩护日本对德宣战理由一事，却未征引上述“仇恨种子”，而以盟国英吉利之请求相助为宣战最要理由。

英国此种宣传作用，在德国方面尤较在日本方面收效为大。据吾人素来经验而论，世间万事，盖未有更易于鼓吹德人一事，以使彼等深信，彼之本国政府曾对于他国政府施以不当行为。此种德人习性，于今又为英国宣传政策之最好工具。英国宣传所谓“仇恨种子”、“日人永久仇敌”、“德国所行虚伪政策”、“夺去青岛，为马关事件之报复”等语，世界上实无一国国民，其相信此等谎语之程度，有如德人之深且遍，甚至于日本人方面亦当望尘莫及。其中，尤有令人惊异者，即此种谎语，有时竟为德人某某数辈所深信。盖此辈对于斯役真相，照理应当有所深知者也。（原注：最令吾人惊讶者，即〔德国国务总理〕Bülow 侯爵自己，亦尝于其所著《德国政治》(Deutsche Politik) 一书之中言曰：“此种（抗议）思想，可谓不幸之至。吾人只因欲得法、俄两国之秋波一盼，不惜酿成日本对德不怿与疏远云云。”足见 Bülow 对于此项问题，亦复未从政府论点方面，加以探究，只是轻听英国所造谎语而已。）因此，德国方面并不设法反对英国此种宣传，而是尽力赞助此项谎语，并作极不适当之自行认错。以使日本政治家关于彼等因受英国唆使而采行之仇德政策，容易加以辩护。历史上造作谎语之例，当无再较上面所举之例，更能令人增长见识者。

倘若吾人关于德国参加马关抗议问题之得失，意欲有所评论，则吾人应当先行研究

一种基础问题：即德国加入海外政治舞台，一如一八九五年所实现者，究竟是否对于德国为必要、为有益是也。就吾人最近过去时间所得之经验而论，现在大家似已得着一种信念，即是：德国国内党派之分裂情形，政治行动之豪无纪律，思想方面之偏重成见，民族精神之不能统一等等，根本上实不足以采行一种大规模之政策。而况德国版图地位之危险，更使此种大政策，难于实行者乎？俾士马克侯爵对于彼之本国民族性质最为深知，并尝用明利眼光以观将来。彼在当时，固已显然认定上述种种事实，并加以适当处理。彼之政策目的，只在巩固时常均在危险中之德国疆域。对于经营海外一事，因世界大势进化之故，使彼不能不有所行动者，彼终是踌躇迟顿，直到最后，始违背本意一为而已。因此，彼对于德国参加抗议一举，称为"跳入黑暗之境"（Sprung ins Dunkle)。并谓："若在德国旧日外交方针之下，此种参加抗议、反对日本之举，似当不致发生；或者此事对于德国果有确实利益之时，然后始一为之。" unter dem alten Kurs-wäre die Bete Iigung an de Einmischung gegen Japan wahrscheinlich überhaup nicht erfolgt，oder doch nur gegen sichere Verteile für Deutschland（原文注：见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之"汉堡新闻" Hamburger Nachrichten。）由此观之，大凡深信德国加入海外政治舞台并非属于必要之人，盖无不对于一八九五年参加抗议行动一事，加以排斥。当时德国政府对于英、华两国二、三两月之请求，应当根本拒绝。关于保持欧洲共同行动之思想，亦当加以不问。在此情形之下，德国应当一如意、荷、奥以及其他诸国，静观时局变化。诚然，德国与上述诸国，微有不同之处，即德国势将由此失却许多因抗议事件而引起之机会，以为本国在华重大商业发展之基是也。至于实现德国国内殖民海军方面人士之多年希望一层，此处尚在存而不论之列。

但在他方面，倘若有人细心一为观察当时德国工业航业正在开始蒸蒸日上发达甚猛之情形，则其势必将发生一种思想，即是无论好歹，德国均须力谋获得海外销场。而海外销场之中，又以东亚诸国为销路最善之地。德国在此决不应甘愿受人排去。即或由此而发生战事危险，亦在所不恤是也。凡抱此种思想之人，当然以为德国之不能随便拒绝列强邀约（干涉马关和约）一事，乃系必然之理，毫无疑义者也。此种思想盛行于（柏林）外部之中，或者只是（该部参赞）Holstein 先生一人应为例外。盖此君对于欧洲政局以外之事，不能有所洞察故也。最后，此项思想遂成为中心主张。诚然，彼辈当时因为误解中国时局情形之故，以为危险之事，在乎"他国起而干涉"，不在乎"中国被人摈弃弗管之后，因而不免大怒，德国实为最易受其损害排斥之国"。于是，柏林方面决定，对于此后时局变化，不要立在后面弗管；一切行动并均照此方针以进行之。吾人若欲对于德国此种行动之是非加以批评，则有两个问题必须分别观察：第一，究竟提出抗议反对和约条件之举，是否确系保护欧洲各国利益之适当方法？第二，假如抗议之举果

然实行，则德国究应参与其事呢，抑愿与英共同行动，退出不管呢？倘若吾人今日回顾当日之后来各种变化情形，则将毫不迟疑，对于第一问题加以否定。盖当时参与其事之各国，对于抗议一举，均非十分热心为之。彼此皆以为：抗议一事应由全欧（各国共同）提出。迨其后英国于最末一刻忽然退出之际，于是抗议之事遂成为问题（大有搁浅之势）。直到最后圣彼得堡方面亚洲一派对此加以催迫并获得优势之时，俄国乃与英国相反，自行其是。因此，抗议一事遂变成另自一种性质，换言之，已非原来所计划之“欧洲全部共同行动”，乃是一种由俄指挥领袖与俄关系独大之抗议行动。因抗议胜利之故，于是圣彼得堡方面毫无忌惮之大侯爵以及陆海军人派，遂骤占优势，大行其冒险投机之东亚政策。一般无耻之辈，相信可以践踏他人一切权利而不顾。其结果，竟使俄国弄成如彼凶终。世间最为危险之事，盖无过于欲令一种活力甚富向外发展之民族，有如日本民族者，受己威力箝制。尤其是加倍危险者，过视自己能力，而轻视对方能力。向使俄国当初未尝铸成此种不祥大错，则俄国至迟应于英国退出（共同行动）之后，即与日本设法谅解，以利俄国东亚地位之发展，一如俄国后来所为者。（译者按，“后来”二字，当系指日俄战争[1]以后之事。）十分聪明之伊藤（侯爵）对于此种（日俄）谅解之事，殊极希望，此固彼于其后数年之间所时常表示者也。果尔，则英国远东地位之受重大打击，当未有再过于此者。其结果，不仅东亚历史，即欧洲历史，亦当另成一种面目。但圣彼得堡方面既已一旦决计提出抗议，则是时德国如竟退出（共同行动），势将对于本国在华在欧利益，均有损害。而且此种退出之举，一如英国之例，在最后一点钟之时，始行宣告，则德国在表面上遂不得不与俄国破裂，而偏向英国一边。此种亲英政策方针之完成，即在伦敦方面，亦复无人相信或盼待德国如此。世人常言，德国一八九五年参加抗议之举，乃是一种实际远英政策之表现云云。甚至于俾士马克侯爵对于此举，亦复认为“显系一种反对英国之变动”（Autiällige antienglische Schwenkung）。（原注：见一八九五年五月七日之《汉堡新闻》〔Hamburger Nachrichten〕。按，该侯爵对于事实真相，当然不能有所闻知。彼因英国所持态度之故，而有此印象，实属极为自然之事。）就吾人从前所述各节观之，则知上面一般世人之揣测，实为一种无稽之言。反之，德国果曾临时退出（共同行动），则实际上确成一种根本亲英之举动。此种结局，甚易想像：第一，欧洲两种同盟对峙之情形，将日益剧烈；第二，在东亚方面与俄为敌，而又未有战备足以抵抗。此外，更有一点应当注及者（按，此点为一切研究此项问题之人所未注及，真是可谓出人意外），即此种退出之影响，将使德国在华利益受害。

---

① 日俄战争：1904 至 1905 年，日本和沙俄为重新分割中国东北和朝鲜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战争主要在中国东北境内进行。1905 年 9 月，经美国斡旋，日俄两国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沙俄获得在中国东北的支配权。

此事最易看出，盖华人对于英国所持态度，曾大为愤慨恨怒不已故也。其后数年之间，海军强国在华威严曾经降至零点。英国当时东亚势力尝坠至最低之度。关于此事之实际影响，吾人当于此后再为详述。不过，英国势力系建筑于十分巩固基础之上，当然不能久陷于危者。而势力甚弱之德国，将因中国盛怒之故，十倍受危。所有政治经济两方，均将从此失势无疑。俄、法两国之在中国，本来早已做作华人唯一无二的、最有势力的友人与保镖。本来对于中国仇德态度，早在背后力助。现在此种情形，当然更将远较从前加增。至于英国方面，其嫉妒德国工业发展之心，当时正在开始渐成仇憎形式之际，其势对于俄、法两国此种行动，纵不立刻附和，不久终当加入。据正月二十五日李鸿章通知德国驻津领事之言观之，则英国公使 Sir Nicholas O'Conor 在战事期间，即已屡向中国大臣声称，所有一切列强调停之举，只因德国态度关系之故而搁浅云云。如此，则中国中央政府与各省官厅，对于德国商业向抱好意者，势将不久全改面目。此外，极与政治有关之借款问题，德国亦将从此被人排去，不能参加。中国方面对于德国获得天津、汉口租界一事，亦将永不允准。关于德国欲得一个海军根据地一层，则因俄国在中国北方所抱仇德态度之故，毫无希望；而在中国南方，则更不能说及此事。所有德国在华一切发展机会，均被他人束缚之损失，决非日本空空洞洞友谊所能补偿。至于德国此后纵抱谨慎知足态度，而时局前途之发展，终不能有利于德。盖英国仇德计划，始终不能有所更改。除非德国决定，对于世界上任何一地之英国商业，均不加以竞争，并自愿在东亚方面，担任抵抗俄国势力之工具，（或可一使英国仇德政策为之变更）。因此之故，一旦果有抗议行动之举，则德国除参加外，实无他途，此固毫无疑义者也。其应当研究者，只是如何尽力，以使此项参加，形成有利之举而已。因实行此项抗议的手续不善，以及其他种种情形（关于此种情形，余将于后面叙述）之故，于是，遂将此举效用大损。如果英国以其消极态度曾得大效，则德国方面亦无依样模仿之必要 Post hoc propter hoc。当然，此种见解固与德国一般人所怀意见相反。当时英国政策之动摇不定，可叹可悲情形，吾人固尝见之矣。嫉妒、恐惧、不知足，种种原因，遂使该国政策不能下一决定。假如当初抗议一事，能照原定计划，为英国领袖下之一种欧洲各国共同行动，以保持（东亚）大陆现状为宗旨，则英国所不愿见之局面，当可根本阻其发生。而英国计不出此，于是时局之转变，遂大出彼之意料，俄国由此获得意外大洋势力之扩充。此种势力，决非英国所能再行铲除。假如俄国能够洞察大局动力所在，立与日本谅解，不必等到十五年以后始行为之。（译者按，此指一九一〇年左右日、俄合作之事而言。）轻率与骄傲，遂使俄国失却最大机会。只因此种缘故，英国乃得以成功，决非出于英国自己先见之明也。吾人于此又可以看见，英国政策之侥幸，乃他国自己愚蠢使然，而英国政策自身则实毫无理性可言。

至于俾士马克侯爵对于此次大规模之举动，系立于反对地位，已如上面所述。但彼尝坦白自认，彼对于此次行动之理由与计划，毫无所知。因此，彼实不能下一确定判断云云。所有德国许多小评论家，实应以此伟大评论家（之言）为模范。

附录：德日关于辽东问题的协定之原文

（译自“德国外交部文件汇编”）

德国驻日公使 Gutschmid 男爵致德国国务总理 Hohenlohe 侯爵之文件（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日自东京寄，十一月二十九日到柏林。）

余于本月十六日既蒙钧处授与向日交换公文之全权，乃于十七日偕同俄、法两使，前赴日本外部，并交与该部总长 Saïonzi 侯爵关于辽东问题公文之草案一件，为余等三人所协拟者。

当（俄使）Hitrowo 先生将该草案宣读之后，该总长乃言，彼对于该项草案之形式内容，均表同意。但请余等将其留下一份，以便彼转陈内阁会议。并将依照此项草案内容，制成答牒草案一份，于（本月）十八日通知余等。

本月十八日，日本参议 Motono 君将日本（答牒）草案，带到俄国使馆。余与俄、法两使均在该处会集，以便接受此项日本草案。又日本参议 Motono 君系为此次全部交涉期间之担任翻译事宜者。余等对于日本草案，并未提出异议。并依照（日本外长）Saïonzi 侯爵建议，再将我们公文中之关于台湾方面运河自由航路一事者，悉照日本宣言词句改定。此外并约定：我们公文应填（本月）十八日日期，日本答牒则填十九日日期。更将交换公文一事，订于昨日下午二钟举行。（译者按，即十月十九日下午二钟。）

因此，余等乃于昨日预定之时间，前赴（日本）外部，并在该处与（外长）Saïonzi 侯爵，实行交换公文。

当辞别之际，该总长乃言，彼代本国政府，感谢余等对于此次解决辽东问题一事的好意合作（Concours bienveilant）。其后，余遂用德国政府名义，向该总长感谢日本政府此次让步之美意。因此让步之故，遂使此次事件如此容易获得一种各方均极满意之结果。

我们此次谈判，计自四月十九日起，迄于今日，为时恰恰六个月。兹特谨将我们往来牒文（余之公文系抄本，日本答牒则系原件），附呈阁下。

V. Gutschmid

附件一：

（德使公文）抄本。

一八九五年十月十八日东京。

下面署名之德国帝国政府特命全权公使，曾将（日本）两种宣言，报告本国政府；此项宣言乃系（日本）外务总长 Saïonzi 侯爵先生阁下用日本政府名义向彼（指德使而言）发出者。其内容如下：

（A）系七月十九日所发出者：

“日本帝国政府承认台湾运河为国际自由航路。而且此项运河，该国既不置诸检查之下，亦不据为自己独有。该国并愿负责担保所有台湾及澎湖诸岛，决不割与任何一国。”

（B）系十月七日所发出者：

“日本帝国政府现已决定：（一）退还辽东半岛之偿金，自愿减至三千万两。（二）不以撤退上述半岛驻军一事，为与华订结通商行船条约之一种条件。此外，撤退上述驻军一事，应从中国完全付清三千万两偿金之日起，三月以内实行。”

下面署名之人（指德使而言，下仿此），曾奉（本国政府）通知，略谓：德国帝国政府接得上述（日本）宣言之后，对于（日本）此种聪明温和（行为）之新证据，只有敬向日本帝国政府，致其衷心庆幸之意而已。

关于此事，因奉（柏林方面）本国政府训令之故，已于从前报告（日本）外务总长阁下。下面署名之人，敬请贵总长得着此项公文之后，赐一收到证据，并借此机会，一向贵总长，从新表示其十分敬仰之忱。

（署名者）V. Gutschmid

附件二：

（日本答牒）原件。

一八九五年十月十九日东京。

下面署名之外务总长，忝叨荣幸，得向德国帝国政府特命全权公使 Gutschmid 男爵先生阁下，证明业将昨日十月十八日来牒收到。该牒之内，系向余通知，彼之政府对于（日本）两种宣言，深致衷心庆幸之意。按此项宣言，即下面署名之人（指日本外长而言，下仿此）用本国政府名义，向彼（指德使而言）发出者，其内容如下：

（A）系七月十九日所发出者：“（日本）帝国政府承认台湾运河为国际自由航路。日本既不将其置诸检查之下，亦不据为自己独有。（日本）帝国政府并愿负责担保所有台湾及澎湖诸岛，决不割与任何一国。”

(B) 系十月七日所发出者:“(日本) 帝国政府现已决定:(一) 退还奉天半岛之偿金,自愿减至三千万两。(二) 不以撤退上述半岛驻军一事,为与华订结通商行船条约之一种条件。此外,撤退上述驻军一事,应从中国完全付清三千万两偿金之日起,三月以内实行。”

下面署名之人,藉此机会,一向德国公使先生阁下,从新表示其十分敬仰之忱。

侯爵 Saïonzi



西藏外交文件

题记：1903 年 12 月，英国利用沙俄侵略我国东北和日俄矛盾激化之机，一面支持日本与沙俄争夺东北，一面派遣以荣赫鹏、麦克唐纳为军事总指挥的侵略军，向我国西藏地区大举进犯。西藏地区军民英勇抵抗，多次打退英军的进攻。但因敌众我寡，江孜、拉萨等相继沦陷。1904 年 9 月，英军强迫西藏地方官员签订《拉萨条约》，规定开放江孜、噶大克、亚东三地为商埠，赔偿英国兵费五十万镑，自印度至江孜、拉萨的炮台和山寨一律拆除。这个条约，实际上把西藏变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严重地损害了我国的主权，清政府不敢予以承认，《拉萨条约》终未换文生效。1905 年，清政府曾派唐绍仪去加尔各答与英国当局谈判，但无结果。1906 年 4 月，在英国的压力下，双方在北京重订条约，英国取得了《拉萨条约》中规定的许多特权。但条约中规定英国“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英国人 Bell 号称“西藏通”，曾作为英国驻哲孟雄的政治委员、英军所占藏地之行政长官、西姆拉会议英国全权代表之藏事顾问以及英国外交代表等，居于印藏边界前后达十九年，有《西藏之今昔》等多种著述。王光祈为让世人充分了解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以及英国侵略西藏的原委，特从《西藏之今昔》中译出十三篇文件，并辑录《旧唐书》、《新唐书》、《卫藏图识》、《西藏图考》和王桐龄《东洋史》、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等相关史料，同时又从德国柏林大学汉文教授 O. Franke 所著之《列强在东亚》中译出部分内容，汇编成《西藏外交文件》。

本书于 1930 年由中华书局公开出版发行。

目　录

译者序文

本书所载文件十三篇，系译自英人 Sir Charles Bell 所著之《西藏之今昔》（Tibet Past and Present）。此书系于一九二四年出版。书末载有附件十四篇，皆系与西藏直接的或间接的有关之重要文件。除其中俄蒙条约（民国元年）及中俄条约（民国二年）两篇，因与西藏无直接关系，未曾加以翻译外，其余十二篇，皆悉数译出。此外，民国三年中英藏协约草案一篇，系译自该书第十六章，合之遂为十三篇。

著者 Bell 曾任英国驻扎哲孟雄[①]之政治委员者十年（自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八年）。此项政治委员之职责，系在代表英国关于哲孟雄、西藏、布坦等地之利益。光绪三十年英军侵藏之时，该著者尝奉英国政府之命，选择适宜地段，为建筑印藏铁路之用。其后并任英军所占藏地之行政长官。宣统二年，英国之合并布坦，该著者实为手订该约之人。民国三年，中英藏在印度 Simla 地方会议[②]，该著者又任英国全权代表之藏事顾问。民国七年，该著者辞去英国驻哲政治委员之职，退居大吉岭[③]，增改彼之二版《西藏文法》，并编辑《英藏字典》一册。民国九年，英国政府复请其再任驻哲政治委员。是年，因达赖喇嘛[④]之屡次邀请，该著者遂以外交代表名义，前往拉萨；逗留一年之久，备受

---

① 哲孟雄：即今日之锡金，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坡，是印度的一个邦。北部和东部同我国相连，东南部和不丹交界，南与印度西孟加拉邦和阿萨姆邦毗邻，西与尼泊尔接壤。公元 7 世纪，哲孟雄是吐蕃（西藏）的一部分。9 世纪时成为独立的部落，但其境内的寺院仍隶属于西藏各大寺。早期西藏移民称为登疆，意为稻米之谷。

② Simla 地方会议：即 1913 年 10 月至 1914 年 4 月在印度北部西姆拉召开的所谓“中英藏会议”。英国侵略者勾结西藏的一小撮分裂主义者，企图通过这个会议，使西藏地方与中国分裂。英国代表麦克马洪提出所谓“外藏”与“内藏”，抛出一个条约草案，强迫中国代表签字。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当时的中国政府也拒绝接受。1914 年 7 月 3 日，英国勾结西藏地方卖国分子私行签订非法的“西姆拉条约”。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这个条约上签字，并正式声明：凡英国同西藏地方政府本日或他日签订的条约或类似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予承认。会议宣告破裂。

③ 大吉岭：印度西孟加拉邦的一座小城，位于喜马拉雅山麓的西瓦利克山脉。“大吉岭”这个名称是由两个藏语词 Dorje（“霹雳”）和 ling（“地方”）合并而成，翻译为“金刚之洲”。

④ 达赖喇嘛：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黄教）的两大活佛之一（另一为班禅额尔德尼）。“达赖”为蒙语音译，意为“大海”；“喇嘛”为藏语音译，意为“上师”。明万历八年（1580 年），土默特蒙古俺答汗尊格鲁派领袖人物锁南嘉措为达赖喇嘛（即达赖三世，前二世是追认的）。顺治十年（1653 年），清朝中央政府册封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地位。此后历世达赖喇嘛转世，必经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

藏人欢迎。光绪三十二年，彼并尝受班禅喇嘛[1]之招请，前往日喀则[2]。该著者居于印藏边界者，前后总计十有九年之久，实为英国之“西藏通”。因此，彼所著之《西藏之今昔》一书，在欧洲甚有名。德国方面于该书出版之次年（一九二五年），即已将其译为德文行世。

本书所译文件十三篇，系自唐代宗广德元年吐蕃[3]入寇长安一役起，至民国三年中英藏会议解决西藏问题止。不但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外交、留心解决西藏悬案之人甚有价值，即对于专治古史者，亦当不乏兴趣。其中除（五）（六）（七）（八）（十）五篇，系照该约汉文原文抄录，并未另译外，其余八篇，皆由余译自英文。并将十三篇之英文原文，一一附录于后，以资比较。盖条约之中，往往注明“如有疑义时，以英文为标准”之字样；而中国方面，除外交部出版之《英文条约汇编》，价昂不易购买外，关于此类条约之英文原文，殊不易得。其实，不但英文原文殊不易得而已，即商务书馆出版之汉文《国际条约大全》，于本书所译各篇亦多未曾载入。此外，余以为吾国法政学生，学习英文，与其诵读《英文五十故事》等等，不如诵阅条约原文之为善也。

余因恐读者对于各种条约之产生原委，或有不尽详悉之处，乃参考各书，撰成“译者导言”七章。其中材料，除一小部分采自《旧唐书》、《新唐书》、《卫藏图识》（乾隆五十七年，马少云、盛梅溪合著）、《西藏图考》（光绪十二年，黄沛翘著）以及近人王桐龄所著《东洋史》、陈崇祖所著《外蒙古近世史》外，其余大部分则系译自德人 O. Franke 所著之《列强在东亚》（Die Grossmachte in Ostasien von 1894 bis 1914）以及上述英人 Bell 所著之《西藏之今昔》。对于吾国研究近代外交史者，或不无一臂之助。余迄至今日止，已译此类外交史料六种。其著者皆为当时参与其役之人，实系史乘中最可宝贵之材料也。

中华民国十八年八月三十日，王光祈序于柏林国立图书馆中

---

① 班禅喇嘛：即班禅额尔德尼，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黄教）的两大活佛之一（另一为达赖喇嘛）。“班”，梵语意为“精通五明的学者”；“禅”为藏语音译，意为“大”；“额尔德尼”为满语音译，意为“宝”。清顺治二年（1645 年），和硕特蒙古固始汗尊格鲁派领袖人物罗桑却吉坚赞为班禅（即班禅四世，前三世是追认的）。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清朝中央册封班禅五世罗桑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正式确定了班禅额尔德尼的地位。此后历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必经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

② 日喀则：位于喜马拉雅山北麓、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年楚河的汇流处。藏语意为“最好的庄园”，是“西藏的粮仓”之一。日喀则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是历史上后藏的政治、宗教、文化中心，也是历代班禅的驻锡之地。

③ 吐蕃：中国古代藏族政权名。公元 7 至 9 世纪时在青藏高原建立。是由雅隆（在西藏山南地区）农业部落为首的部落联盟发展而成的奴隶制政权。在赞普松赞干布时，降服苏毗、羊同等部，定都拉萨，建官制，立军制，定法律，创文字，形成了以赞普为中心的集权的奴隶主贵族统治。计传位九代，历时二百余年。生产以农牧业为主，有冶炼、毛织等手工业，接受大量汉族工艺技术。原信本教，后崇尚佛教。文献有大量碑铭、文书，及汉梵医术、历算、佛经等藏文译本。

上编　译者导言

一、关于唐广德元年吐蕃入寇长安及建中四年缔结藏华甥舅联盟之经过情形

……唐贞观八年，其赞普弄赞（原注：赞普王号）[①] 遣使朝贡请婚，太宗不许。吐蕃率众屯于松州之西境，入寇。太宗命将，率步骑五万，击败之。弄赞大惧，引兵退，遣使谢罪，因复请婚。太宗以宗女文成公主[②]下嫁，（光祈按，时在贞观十五年。）令江夏郡王道宗持节送之，弄赞亲迎于河源而归。别为公主筑城，立栋宇。公主恶其人皆赭面，赞普遂令国中权罢之。亦自袭纨绮，释毳羯，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文士，典其疏表。高宗立，授弄赞为附马都尉，封西海郡王。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则天时，弄赞元孙弃隶缩赞[③]立。复请婚，中宗亦妻以所养雍王女金城公主[④]。帝幸始平县，设帐于百顷泊侧。引王公宰相及吐蕃使入宴。酒阑，命吐蕃使前，谕以公主孩幼割慈远嫁之旨。上唏嘘久之。因命学士李峤等十七人赋诗饯别。改始平为金城县。又改其地为凤池乡怆别里。公主至吐蕃，亦别筑一城以居。睿宗时，杨矩受吐蕃厚赂，为代请河西九曲以为金城公主汤沐地。与之，未久而叛。元宗十七年，吐蕃恃强，表疏悖慢。帝怒，遣将大破之。复请和，遂令使臣往视金城公主，吐蕃复进表朝贡如初。公主亦别有进献，并奏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亦与之。正字干休烈疏谏，不报，卒与之。二十四年，常侍崔希逸以杀白狗为盟，诳吐蕃，计破于青海，复绝朝贡。二十八年，寇维州，又破之，得安戎

---

① 弄赞（617? —650）：新、旧《唐书》中的弃宗弄赞，或弃苏农，即松赞干布，吐蕃赞普。在位时先后兼并西藏地区诸部，定都逻些（今拉萨），发展生产，创文字，定法律，立官制、军制，建立吐蕃奴隶制政权。唐贞观十五年（公元 641 年），与文成公主联姻。遣贵族子弟赴唐都长安（今西安），入国学，请唐人掌其表疏，接受汉族先进生产技术，促进汉藏经济、文化交流。贞观二十三年，唐朝中央政府封其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

② 文成公主（? —680）：唐太宗养宗室女。贞观十五年（公元 641 年）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联姻。在她的影响下，汉族制碾磨、陶器、纸、酒等工艺，以及历算、医药等相继传入吐蕃。其对西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对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交往，做出了重要贡献。

③ 弃隶缩赞（704—755）：即墀德祖赞，与唐联姻，娶金城公主入藏。

④ 金城公主（? —739）：唐中宗养雍王女。景龙四年（公元 710 年）与吐蕃赞普弃隶缩赞联姻。她不懈致力于唐蕃和好，促成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 733 年）唐蕃在赤岭划界立碑，并开展商贸往来。金城公主曾将杂技百工、龟兹乐，以及《毛诗》、《左传》、《礼记》、《文选》等汉籍传入吐蕃，对汉藏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城，诏改为平戎。二十九年春，金城公主薨。吐蕃来告，仍请和，上不许。乾元后，吐蕃乘唐间隙，尽有戎境。肃宗年间，吐蕃遣使请盟。郭子仪令于鸿胪寺插血[①]，以申蕃戎之礼。广德元年，吐蕃以京师失守故，因降将高庭晖入长安，立广武王为帝；旋为郭子仪设疑兵，悉众遁去。建中二年，吐蕃请以贺兰山为界。四年，遣官盟于清水[②]，即大诏前甥舅联盟碑也。……（光祈按，见《卫藏图识》之《西藏源流考》篇中。）

……大诏寺[③]廊，有唐公主、吐蕃赞普及赞普妾白布国王女[④]神像。俗云：唐公主好善，修大小诏。白布国王女同参净业，因并祀焉。……大诏前，有唐碑二：其一为德宗盟碑；一为穆宗盟碑，即长庆碑[⑤]。（原注：见齐次风《西藏诸水考注》）今惟有德宗碑文尚存，然亦剥蚀不可读矣。……（光祈按：见《卫藏图识》之《摭记》篇中。）

……会德宗初即位，以德绥四方。征其俘囚五百余人，各给衣一袭，使（韦）伦统还其国。与之约和。敕边将无得侵伐。吐蕃始闻归其人，不之信。及蕃俘入境，部落皆畏威怀惠。其赞普乞立赞谓伦曰："不知是来也，而有三恨，奈何！"伦曰："未达所谓。"乞立赞曰："不知大国之丧，而吊不及哀，一也。不知山陵之期，而赙不成礼，二也。不知皇帝舅圣明继立，已发众军，三道连衡，今灵武之师，闻名辍已，而山南之师已入扶文，蜀师已趋灌口，追且不及。是三恨也。"……（建中）四年正月，诏张镒与尚结赞盟于清水。将盟，镒与结赞约：各以二千人赴坛；所执兵者半之，列于坛外二百步；散从者半之，分立坛下。镒与宾佐齐映、齐抗，及会盟官崔汉衡、樊泽常、鲁于頔等七人，皆朝服。结赞与其本国将相论悉颊藏、论藏热、论利陁斯、官者论力徐等亦七人，俱升坛为盟。初约，汉以牛，蕃以马。镒耻与之盟，将杀其礼，乃谓结赞曰："汉非牛不田，蕃非马不行；今请以羊豕犬三物代之。"结赞许诺。塞外无豕，结赞请出羝羊，镒出犬及羊。乃于坛北刑之，杂血二器而歃。盟文："唐有天下，恢奄禹迹。舟车所至，莫不率俾。以累圣重光，历年惟永。彰王者之丕业，被四海之声教。与吐蕃赞普，代为婚姻，固结邻好，安危同体；甥舅之国，将二百年。其间或因小忿，弃惠为

---

① 插血：应为"歃血"。

② 清水会盟：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正月，唐朝与吐蕃在清水（今甘肃清水县北）举行会盟。依盟文，大体上黄河以南，自北往南一线，从今六盘山中段开始到陇山南端（中间穿过泾水源头、渭水中游），然后穿西汉水、白龙江，循岷江上游西到大渡河，再循河南下，在此线以东归唐管辖，以西归吐蕃管辖。清水会盟揭开了唐蕃历史上由战到和的新一页。

③ 大诏寺：即大昭寺，位于拉萨市中心。又名"祖拉康"、"觉康"（藏语意为佛殿），始建于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由藏王松赞干布创建，后经历代修缮增建，形成庞大的建筑群。大昭寺融合了藏、唐、尼泊尔、印度的建筑风格，成为藏式宗教建筑的千古典范。大昭寺在藏传佛教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各教派共尊的神圣寺院。

④ 白布国王女：即尼泊尔尺尊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联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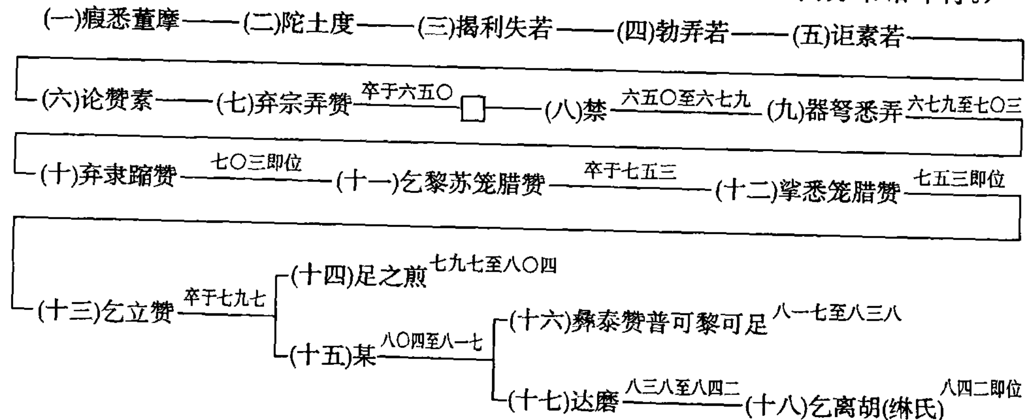
⑤ 长庆碑：即"长庆会盟碑"，又称"甥舅和盟碑"。唐长庆三年（823年），吐蕃赞普可黎可足为纪念长庆元年至二年间的唐蕃会盟而建。此碑今在拉萨市大昭寺前，碑上用藏、汉两种文字铭刻盟文全文及唐蕃参加会盟人员的职衔、姓名。长庆碑是汉藏两族亲密关系悠久历史的宝贵见证。

仇；封疆骚然，靡有宁岁。皇帝践阼，愍兹黎元，俾释俘隶，以归蕃落。蕃国展礼，同兹叶和，行人往复，累布成命。是必诈谋不起，兵车不用矣。彼犹以两国之要，求之永久；古有结盟，今请用之。国家务息边人，外其故地，弃利蹈义，坚盟从约。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及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西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其兵马镇守之处，州县见有居人，彼此两边；见属汉诸蛮，以今所分，见住处依前分为定。其黄河以北，从故新泉军，直北至大碛，直南至贺兰山骆驼岭为界。中间悉为闲田。盟文有所不载者：蕃有兵马处，蕃守；汉有兵马处，汉守。并依见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马处，不得新置，并筑城堡耕种。今二国将相，受辞而会，斋戒将事，告天地山川之神，惟神照临，无得衍坠。其盟文藏于宗庙，副在有司；二国之成，其永保之。”结赞亦出盟文，不加人于坎，但埋牲而已。盟毕，结赞请镒就坛之西南隅佛幄中，焚香为誓。誓之毕，复升坛饮酒，献酬之礼，各用其物，以将厚意而归……（光祈按：见《旧唐书·吐蕃传》）

……刑牲坛北，杂其血以进约：“唐地泾州右尽弹筝峡。陇州右极清水。凤州西，尽同谷剑南，尽西山、大度水。吐蕃守镇兰、渭、原、会，西临洮，东成州，抵剑南西磨些诸蛮。大度水之西，南尽大河，北自新泉军抵大碛。南极贺兰骆驼岭。其间为闲田，二国所弃。戍地毋增兵，毋创城堡，毋耕边田。”既盟。……（光祈按：见《新唐书·吐蕃传》）

吐蕃世系表：姓勃窣野氏，自瘕悉董摩始见史册，至弃宗弄赞国始强大。传十七世，至达磨而系绝。綝氏之乞离胡继之。国遂衰，不能复通于中国云。

（光祈按：右列一段，系录自王桐龄氏新著《东洋史》初版，商务书馆印行。）



……在（西历纪元后）第七世纪之时，有藏王名 Song-tsen Gam-po（光祈按：即弃宗弄赞）者执政，是为西藏文明之破晓。其时，佛教传入西藏，虽已有二百年之历

史，但信徒极为罕少。新王（弃宗弄赞）登基之际，年仅十三；登基之后，执政甚久。彼尝征服缅甸北方及中国西部，并尝压迫中国皇帝，妻以公主。除此之外，彼更娶一位尼泊尔公主为妇。（光祈按：即所谓白布国王女是也。）因两位公主皆系佛徒之故，于是，此位幼王亦复受其感化，皈依佛教。而且该王并用全力，以谋佛教普及藏中……在第八世纪下半期之时，西藏又有一位著名国王名为 Ti-song De-tsen（光祈按：挲悉笼腊赞?[①]）者，制定民法刑法。……藏人性质中，尝含有若干民主主义思想，吾人可于次位藏王 Mu-ni Tsem-po（光祈按：不知何指）之行为见之。彼曾下令：所有居民，对于国家财产，须一律均等分配。而且此项分配之举，亦尝实行。但均等现象，不久即归消灭。该王绝不气馁，复为第二次之分配，惟结果不均之象更胜于前。盖贫穷之人，其间因过好日子之故，均已变成懒惰，现在穷况，更复较前为甚。当该王实行第三次（分配）尝试之后，遂为其母所毒死。……在第九世纪下半期，藏王 Ral-pa-chan（光祈按：彝泰赞普可黎可足?[②]）执政之时，从印度方面，输入模范度量衡之制。年仅四十八岁，为其弟 Lang-dar-ma（光祈按：即达磨?[③]）所弑，并继承其王位。但新王在位仅三年，又为一位喇嘛所刺。从此西藏王统遂绝。……Song-tsen Gam-po，Ti-song De-tsen Ral-pa-chan，三位为西藏最有名之国王。……（光祈按：上段系译自英人 Bell 所著之《西藏之今昔》书中。）

光祈按：本书所译唐时碑文二篇，一为西藏征服中国西部纪功碑，一为藏华两国甥舅联盟碑。前者当系唐代宗广德元年（西历七六三年）吐蕃人寇长安一役。后者当为唐德宗建中四年（西历七八三年）清水联盟遗迹。但纪功碑上，所谓 Ti-song De-tsen 者，究系何位藏王？乞黎苏笼腊赞乎？挲悉笼腊赞乎？抑乞立赞乎？殊难确定。据《西藏之今昔》所述，则国王 Ti-song De-tsen 有一中国母亲。果尔，该王当为弃隶蹜赞之子；因弃隶缩赞尚金城公主故也。而且英文 Song 一音，亦与苏笼之音相近。但《旧唐书》上却又明明白白记载，"天宝十四载（按照《辞源》当为西历七五五年，与王桐龄氏所谓七五三年者稍异）赞普乞黎苏笼腊赞死，大臣立其子婆悉笼猎赞为主，复为赞普"云云。《新唐书》亦有同样之记载，惟不称婆悉笼腊赞而称挲悉笼腊赞耳。如此，则乞黎

---

① 挲悉笼腊赞（742—797）：又称乞立赞，即墀松德赞，吐蕃赞普。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 年）即位。其在位期间为吐蕃最强盛时期。西攻大食，南人天竺，对唐时战时和，曾联合南诏、回鹘，攻占河西陇右诸州。晚年颇致力于唐蕃和好。

② 可黎可足（803? —838）：又称彝泰赞普，即墀足德赞，号热巴坚。吐蕃赞普。唐宪宗元和十年（815 年）即位。唐穆宗长庆元年（821 年）、二年，先后在长安（今西安）、逻些（今拉萨）东哲堆园与唐盟和，并建"唐蕃会盟碑"。极力发展佛教，重用僧人钵阐布掌政。开成三年（838 年）被反佛贵族谋杀。

③ 达磨（? —842）：又称朗达玛。吐蕃末代赞普。唐开成三年（838 年）为反佛教贵族拥立。即位后下令废佛教，从此约百年佛教在藏几乎绝迹。会昌二年（842 年）被僧人刺杀，统治集团内部分裂，随后奴隶、属民起义，吐蕃政权瓦解。

苏笼腊赞之死，系在广德元年以前无疑。入寇长安之事，非彼为之。此外《西藏之今昔》又谓：Ti-song De-tsen 系第八世纪下半期之国王。查此期内，依照王桐龄氏所列吐番世系表，计有国王二：一为挲悉笼腊赞，一为乞立赞。究竟 Ti-song De-tsen 系指前者或后者，亦殊难确定。盖挲悉笼腊赞之死，是否在广德元年以后，表中固未列出；而新、旧《唐书》之中，余亦未能寻得（或者，余读得不仔细，亦未可知）故也。

至于藏华两国甥舅联盟碑，当为清水之盟所遗无疑。据新、旧《唐书》所载，主持此事之藏王为乞立赞，正与联盟碑上所谓 Ti de-tson 者，音节颇相近似。《西藏之今昔》称此碑为第八世纪上半期遗物，并将其列在上述广德元年吐蕃纪功碑之前，当系错误，盖乞立赞为第八世纪下半期之藏王故也。惟藏王世系，果如王桐龄氏所列，则乞立赞似为弃隶蹜赞之曾孙。弃隶蹜赞既系唐中宗之婿，而德宗又系中宗之玄孙，如此，则乞立赞与唐德宗实系表兄弟，不应当称甥舅。但《旧唐书》上乞立赞却又明明自言"不知皇帝舅圣明继立"，似乎当时中国与外夷和亲，永远自称舅舅，而外夷方面则永远自称外甥，并不严格依照亲属关系定尊卑也。余曾因碑上称呼不甚切合之故，亦疑该碑或系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西历七三四年）遣将军李佺于赤岭与吐蕃分界立碑之遗物，其时或者乞黎苏笼腊赞已立（?），所以称玄宗为舅舅；而《西藏之今昔》所谓第八世纪上半期者，亦复不错。但余此种假设，根据殊少，所以只好仍定为德宗时代产物，一时[①]《卫藏图识》所云：即大诏前，甥舅联盟碑也。……大诏前，有唐碑二……今惟有德宗碑文尚存……云云。

此外，《西藏之今昔》所述之藏王年代，往往与王桐龄氏所言者不同。譬如藏王达磨在位年代，照王氏则为西历第九世纪上半期，照《西藏之今昔》则为第九世纪下半期，是也。

二、关于乾隆五十七年中国平定廓尔喀以及咸丰六年廓尔喀第二次侵藏之经过情形

……廓尔喀[②]者，本巴勒布国。旧分叶楞部、布颜部、库库木部。后又兼并哲孟雄作木郎洛敏汤诸部落，吞并为一，遂与后藏[③]以交易滋事。由后藏行二十驿，至济咙之铁索桥，为藏地极边。逾桥而西，则廓尔喀。自古不通中国。于乾隆五十五年，内犯西藏。侍卫巴忠将军鄂辉成德等，调停贿和；未交一兵，而糜饷百万。次年，廓夷再举，

① 一时：原文如此。

② 廓尔喀：即今尼泊尔。

③ 后藏：西藏旧分康（喀木）、卫、藏、阿里四部。清雍正年间划康部宁静山以东地归四川省，以西与卫部合并称前藏；藏部称后藏。

深入后藏札什伦布[①]西南。左有曲多江巩，右有彭错岭，峭壁连冈，咽喉天险。贼步卒数千，自聂拉木[②]人。其时番汉官兵，若分两路，一扼曲多江巩遏其前，一绕赴彭错岭截其后，则廓夷深入无援，可不战溃也。驻藏大臣[③]保泰，奏请移达赖于西宁，移班禅于前藏，欲以藏地委贼。而仲巴呼图克图先遁。刺麻济仲札苍等复托言，卜诸吉祥天母，不宜战。众心遂溃。贼大掠札什伦布。全藏大震。时鄂辉为四川总督，成德为四川将军，拥兵四千赴剿，按程缓进。上知二人不足恃，乃命嘉勇公福康安为将军，超勇公海兰参赞，调索伦满兵及金川屯练土兵进讨。明年二月，将军参赞由青海至后藏。闰四月，索伦兵二千，土屯兵五千，并藏内官兵三千，皆集。五月，连败其屯界之贼，尽复藏地。六月初，大举深入。遣领队大臣岱森保总兵诸神保等，各出左右一路，以分贼势。而大军出中路，海兰察将三队为前军，福康安将二队继之，大破贼于距济咙八十里之铁索桥。入廓夷界，追剿百六十里，至协布鲁；又百数十里，至东觉岭；六月九日，至雍雅山，廓夷震慑，乞降，不许。复三路进攻，六战六捷；杀贼四千，涉贼境七百余里，将近其国都。廓酋再遣人诣军前，哀词乞降。时已八月，恐过后大雪封山难返，乃允之。尽献还所掠藏中财宝，贡驯象番马乐工，请永遵约束。班师，留番兵三千、汉蒙古兵一千戍藏。自是二大臣仪注行事，始与达赖、班禅平等，事权归一，此乾隆五十七年事也。后藏至廓尔喀有定结大道，必绕布鲁克巴等部，迂道月余。故我师由济咙近路入，左壁右湍，不容一骑；将军参赞，亦时步进。故所贡象，绕大路，次年春，始至前藏。自大创以后，至今贡献不绝。西藏始永无廓夷患。……（光祈按，见《西藏图考》之《西藏源流考》篇中。）

……当（西历）第十八世纪上半期之际，尼泊尔方面许多小王国之中，曾有一国，名为廓尔喀者，位于尼泊尔京城克提门都（Katmandu）之西北。至一七六九年，廓尔喀酋长，遂将尼泊尔全部置于势力范围之下。未几，此项好战民族，复将目光移向西藏方面。一七八四年，该族遂向哲孟雄进攻。而其时哲孟雄乃系对于西藏政府每年进贡之国家。一七八八年，廓尔喀又借口多端，直将西藏领地之与尼泊尔接壤者，占领数处。但其后彼此订立密约，（西藏方面）允许每年进贡若干，于是廓尔喀复将所占地方退还。

① 札什伦布：喇嘛教格鲁派著名寺院之一，在西藏日喀则县境内尼色日山下。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建立，从清初起即为历世班禅额尔德尼住持之寺院。

② 聂拉木：藏语意为大象颈脖，人们通常理解和汉译为“地狱之路”。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与拉轨岗日山脉之间，今属西藏聂拉木县。元朝，聂拉木同西藏一道正式划归元朝疆域，受中央管辖。

③ 驻藏大臣：全称“钦差驻藏办事大臣”，又称“钦命总理西藏事务大臣”，清政府派驻西藏地方的行政长官。设正副二员，任期三年。主管西藏所有高级僧俗官员的任免，稽查财政收支，指挥地方军队，督察司法、户口、差役等事项，负责巡视边境，办理一切涉外事宜，并监督达赖班禅及其他活佛转世的抽签，主持达赖班禅的坐床典礼。

后因进贡一事，未曾履行之故，廓尔喀又于一七九一年占据西藏大城日喀则（Shigatse），该城与班禅行宫（Tashilhunpo）相距仅有两里之遥。惟其时廓军方面忽然发生时疫，因而大部分军队及其军官，不得不退回本国。藏人之中，尝将此次时疫，称为神之谴责。中国政府对于前此廓军进攻之事，固未尝一接中国驻藏代表报告；现在始着手遣派华藏合组之大军一队，于是年冬季取道西藏前进。并于一七九二年春间，与留驻藏中之廓军，交战数次，将其打败。最后，（长追直入），距离廓京只有数里之遥，为城下之盟而还。廓尔喀于他种条件之外，必须每五年遣派进贡专使，前往北京一次。……一八五五年，廓尔喀复为第二次之侵入。其理由则为藏人虐待廓侨。战事结果，遂许尼泊尔得于拉萨方面，置一常驻代表。此外西藏更当每年缴纳一万卢比。而且廓人在藏享有自由营业与治外法权（光祈按：即领事裁判权）种种权利。至于廓尔喀政府之交换条件，则为对于西藏政府如受外敌侵犯之时，负责加以赞助云云。照此条件，议结一约。……（光祈按，此段系译自《西藏之今昔》。）

三、关于光绪十六年中英订结哲藏条约[①]以及光绪十九年续订该约通商交涉游牧三款[②]之经过情形

……哲孟雄一国，本为西藏喇嘛治下之附庸。因此，该国遂间接的成为中国之属国。西藏政府尝得中国政府之同意，将哲孟雄北方大道封锁。其后数年之间，印度政府方面，时常设法运动该道开放，但均无效。一八七六年之烟台条约[③]，诚然许可英人得从印度方面，派遣一种限于商业目的之远征队，前往西藏；但因西藏居民所持态度，势将引起无数困难之故，于是英人终将此项计划打消。在上述一八八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北京条约[④]之中（光祈按，即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中英所订缅甸条约），曾对于此种

① 中英哲藏条约：即《藏印条约》，英国强迫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1890年（光绪十六年）3月17日，清政府驻藏帮办大臣升泰与英国印度总督兰斯顿（Henry Charles Keith Lansdowne）在加尔各答签订。共八款。主要内容为：（1）规定哲孟雄（今锡金）归英国保护；（2）规定中国和哲孟雄的边界；（3）对于游牧问题、通商问题、交涉问题留待以后谈判。英国借此条约侵占了哲孟雄，并向中国西藏地方伸展侵略势力。

② 藏印续约：即《藏印议订附约》，或称《藏印条款》。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93年（光绪十九年）12月5日，由清政府参将何长荣和英国政务司长保尔（Alfred Wallis Paul）在大吉岭签订，作为1890年《藏印条约》的附加条款。共十二款。主要内容为：开放亚东为商埠，准许英国派员在此驻扎；亚东自开放日起，五年内藏印贸易互不收税；限制中国西藏人民在哲孟雄的传统的游牧。

③ 烟台条约：1876年（光绪二年）9月13日，英国公使威妥玛与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烟台签订，又称《滇案条约》或《芝罘条约》。共三部分十六款，附有《另议专条》。这个条约扩大了英国对中国的侵略特权，并使英国得以侵入我国云南、西藏地区。

④ 北京条约：即1886年英国驻华公使在北京与清廷总理衙门签订的中英缅甸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英国吞并缅甸的事实，英国答应代替缅甸照例向中国进贡；同时还规定“会同勘定”中缅边界，“其边界通商事宜亦应另立专章”。英国通过该条约初步打开了中国的“后门”，实现了其侵入中国云南、西藏等西南边疆的野心。

事实，特别加以声明：中国政府应负责在西藏居民方面，促进与印通商事件云云。至于英国之所以取销派遣远征队到藏，并将经营西藏计划加以搁置者，当系英国对于北京政府承认英人兼并缅甸一事之交换条件，此固明了易见者也。但其间藏人方面，因与尼泊尔商人又起争端之故，复将通过大吉岭之大道，以及现属印度之喜马拉亚山南侧，加以占领。一八八八年春季，印度政府遂决议，采用武力，以逐藏军。其后，此举未遇何种困难，便已达到目的。于是遂在孟腊（Calcutta）（光祈按，系印度都会）、北京、拉萨之间，往来交涉。中国方面，既已于秋间派遣著名税务司英人赫德[①]之兄弟 James Hart 为中国代表，前往印度参加讨论，最后乃于一八九〇年（春季），议结一种条约。中国方面承认哲孟雄为英之保护国，并将哲、藏疆界划分清楚。所有印、藏通商问题，以及英人特别渴望之直接与藏中官厅来往问题，则留俟后来，特任委员加以磋商。此项委员会，由（英人）James Hart，与一位华人以及另一英人所组织，商议至于三年之久，乃有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五日通商新约之结果。依照该新约，则位居 Chumbi Valley 南端，紧靠印、藏边界之亚东允为英商开放。至于官厅来往一层，则其所规定者，无非关于印度政府与中国驻扎拉萨大臣，彼此如何接洽之方法而已。约中并言，五年之后，可以修改一次云云。于是，英国方面，除了孟雄东界之布坦一国尚为西藏及中国的属邦不计外，所有喜马拉亚山南坡全部，与西藏胸壁之要道，皆已置诸自己权力之下矣。……（光祈按，此段系译自《列强在东亚》一书。）

四、关于光绪三十年英藏条约[②]、光绪三十二年中英条约[③]、光绪三十三年英俄条约[④]以及光绪三十四年中英修订西藏通商章程[⑤]之经过情形

① 赫德（1835—1911）：英国人，字鹭宾。1853年毕业于女王大学，1854年来华，先后在英国驻宁波和广州领事馆担任翻译和助理。1863年11月起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总计长达48年之久。在主持中国海关的近半个世纪中，赫德不仅制定了由外人管理的海关制度，控制中国的财政收入，而且其活动涉及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以至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从中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是英国侵华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② 英藏条约：即1904年9月7日英军上校荣赫鹏强迫噶尔丹寺长罗生戛尔曾等人在拉萨签订的《拉萨条约》。这个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条约，遭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清政府不予承认。

③ 光绪三十二年中英条约：即《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4月27日，由清政府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与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1843—1929）在北京签订本约。正约共六款。约中，英国"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不得不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在西藏地方的领土主权。

④ 光绪三十三年英俄条约：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8月，英俄背着中国政府和人民秘密谈判后签订的"协定"。这个协定是英俄两国瓜分伊朗、阿富汗和我国西藏的分赃协定。"协定"中关于西藏问题的规定，破坏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充分表明英俄的侵略野心及其对中国人民的敌视。

⑤ 中英修订西藏通商章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中方代表张荫棠和英方代表丰礼敦在加尔各答签订了《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十五款。按照该章程，英国商民可以在江孜商埠内租地建筑房栈，英国可以在江孜、亚东的商务代办处派驻名为卫队的武装部队；除印度边界土人向来在藏居住贸易者外，其余英国商民及货物不得从商埠绕入西藏腹地。

……为谋抗英人侵入计，于是达赖喇嘛乃向俄国亲近。俄国距离西藏虽然甚远，但俄国在蒙、藏两地之威望，却比任何一国为高。当时达赖喇嘛之使者为佐治野夫（Dorjieff）氏。其人系属于 Buriat 一族，该族虽为蒙古种，但居于俄属西比利亚领土之内。在藏人之间，佐氏则以 Tse-nyi Kem-po 一名，著闻于世；换言之，即“玄学教授”（Professor of metaphysics）之意。彼为达赖喇嘛少年时代的教习之一，尝以能干见称。……当佐氏既膺专使之命，往谒俄皇，于是，俄报 Messager Official 遂于一九〇一年七月登载“皇帝陛下曾接见西藏达赖喇嘛特别专使”云云。该专使与其随员，并曾拜访俄国外、财两部总长。所有俄国报纸，对于该使无不加以欢迎，视为此乃达赖喇嘛承认俄国为“唯一无二的国家，足以毁灭英人诡计者”（the only Power able to frustrate the intrigues of Great Britain）之表示。俄国外交总长虽曾向（驻俄）英国大使加以声明，谓该专使之来，只带纯粹宗教性质云云，但在东洋方面，宗教与政治常有极密切之关系。而且英国政府现在明明看见，达赖喇嘛一方对于印度总督之公函，则拒绝接受，而他方对于俄皇，则不仅是写信而已，并且大派其专使。其后该使回拉萨所带各物之中，更有若干俄国枪械子弹。除此之外，尚有许多美丽俄国袈裟，为全俄皇帝赠与西藏佛主者。……一九〇二年，中国报纸曾记载，中俄之间新结一种密约。俄国方面允用全力，担保中国领土完全。而中国方面则以西藏归诸俄国势力范围，为其交换条件云云。……俄国势力之侵入西藏与拉萨，同时并受中国方面之善意相待，其势将使印度深受严重压迫，毫无疑义。……因此之故，（印度总督）Lord Curzon 乃于一九〇三年正月，（向伦敦）建议，宜在武装保护之下，遣派专使前往拉萨，以与达赖喇嘛直接交涉。所有英藏关系问题，全部加以解决，并置一常驻英使于拉萨云云。……其后伦敦政府遂允此项（英国）专使，可以往至喀白钟（Kampa Dzong）地方。该地乃系一个小小区域，位于哲孟雄界外数里之遥。该使受武装保护，立于上校荣赫鹏（Younghusband）指挥之下。该上校乃系对于边政素有经验之军官也。并派哲孟雄政治委员 White 为该上校之随员。大尉 O'Connor 则为该上校之传达军官，其后并任秘书一职。该大尉乃系一位少年炮队军官，谙悉西藏语言及政治，于其所任职务，可谓特别合宜。该专使从一九〇三年七月至是年十一月，皆驻在喀白钟（Kampa Dzong）地方，毫无一点成就。藏人方面拒绝与彼谈判，并要求彼仍回哲界。至于华人方面，则竭力表示彼之（对英）友善态度，并言因藏人反对甚力之故，彼实无法加以干涉云云。……于是，英军遂取道 Chumbi Valley 向着江孜进攻。因为藏人采取敌视行动之故，英国方面必须多增军队。现在专使行辕，业已一变而为远征军事机关。勾留于通纳（Tuna）地方者，直至一九〇四年三月月底。该地系在 Chumbi Valley 彼侧数百里之遥。……其后荣赫鹏远征军，从通纳（Tuna）出发，打到江孜；未几，复打到拉萨。其间藏人之勇敢，颇使英军出于意外。但彼等未

尝一受军事教育，而且大部分所用者，只是一些本国自制之前膛枪老军器。此项枪械以及彼等所持刀剑，当然均不足以抵抗近代火器。至于英、印军队方面则又转战于距离大本营甚远一种严寒不毛之地。其最大难题，即在运输辎重车辆一事，盖必须由印度行经一千三百里，逾越藏中高山峻岭之险道，穿过为风所扫之平原，始能达到目的地是也。……达赖喇嘛及其亲近，逃向蒙古首都库伦而去。……在拉萨方面，得中国驻藏大臣、尼泊尔代表以及布坦国 Tongsa Penlop 之助，于是英人藏人之间，遂结一种条约，由此以使英藏两国政府关系从此密切。……一九〇四年之远征军队，既已回印，于是英国政府设法运动中国，共同签字于此次远征军队所订之条约。但此次远征之举，甚使中国政府为之不安。该政府欲将中国在藏势力，设法加以恢复。一九〇六年四月，英华两方遂在北京订立一约。此约对于拉萨条约，加以下列限制，即保持西藏领土完全问题，应系中国自己之事。而且除中国外，他国不得在藏享有让与权利是也。……一九〇七年，英俄两国之间，议结一种范围广大之条约。其内容系关于波斯阿富汗斯坦、西藏，其目的系在避免两国在亚之冲突。……此项条约，本来甚为有利；盖其基础系建筑于“俄英合作”之上，以使两国免受他国压迫（光祈按，所谓他国，系指德国而言），印度免受他人攻击，并使后来欧战，能获胜利故也。惟约中条件，规定两国关于藏事之谈判，除少数例外，均须经过中国之介绍云云，实将西藏更深深的置诸中国势力之下。……其间张荫棠[①]与英国代表，复议西藏通商新章；因续开江孜噶大克为商埠，另订新章一事，甚感必要故也。此项新章，系于一九〇八年四月议结签字。……（光祈按，此段系译自《西藏之今昔》。）

五、关于宣统二年英国合并布坦之经过情形[②]

六、关于民国三年中英藏议定协约草案之经过情形

……当一九一二年（光祈按，即民国元年）达赖喇嘛既回西藏之后，于是中部两省各区，奉命各派四位代表，条陈彼等对于外交以及内政各种应行兴革之意见。并饬该代表等，不得借词“余居卑位，对于此类事件，实一点不懂”云云。（I am a man of no position and do not understand these things.）

---

① 张荫棠（1864—1935）：字朝弼，号少卿，又号憩伯。广东南海人。曾以灼文为名中举。先在京候补，后任内阁中书、驻日本参赞、驻美国参赞。1906年10月，作为钦差西藏查办事件大臣抵达拉萨，次年提出新治藏政策大纲，经清政府采纳成为治藏新纲领。任驻藏大臣期间，积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1908年任外务部右参议。1909年任出使美国钦差大臣，兼使秘鲁、墨西哥、古巴三国大臣。1912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外交代表、驻美公使、驻美全权公使等职。1935年在北平家中逝世。

② 译文略。

在此项代表会议之中，其所讨论之问题，约有下列数端：（1）西藏应与那一国，或那数国亲善？（2）军队是否应行增加？如果增加，则军费应如何筹集？（3）法律方面是否有改良之必要？如有，则请一一条举云云。对于第（1）个问题之普通答案，即是：（a）宜与英国亲善，因该国距离拉萨最近。（b）任与何国亲善均可；但外交方针既决定亲善某国之后，便应永远亲善该国，切勿动摇不定。（c）宜与中国亲善，因该国强大，人口繁多；如果君等未能确为西藏谋得其他强国之助，则中国将来必向西藏报复。……

当中国内部局面稍稍平静之后，于是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夏间，四川政府遂派兵入藏，以恢复中国主权。英国乃向中国提出说帖，略谓英国对于中国积极干涉西藏内政之权，不能承认；对于袁世凯总统之命令，提出抗议。中国方面得有派员驻扎拉萨之权，英国虽不加以反对，但若中国派遣无限军队到藏，则非英国所能默认云云。因此，英国要求中国，照此说帖意义，为书面之协商。中国政府对此，初时加以拒绝。但其后彼既洞察西藏地位之强固，于是强作笑颜，赞成开会商议。并且对于会议地点，由北京移往印度一层，以及对于西藏派一代表参与会议，其权须与中英两国代表平等一事，亦均表示同意。……最后，此项会议遂在 Simla 举行。印度外务长官 Sir Henry McMahon 为英国全权代表。英国驻华领事 Archibald Rose 为该全权代表之华事顾问。余则为彼之藏事顾问。……一九一三年（即民国二年）十月，遂在 Simla 开始会议。……讨论计有六个月之久，所有西藏问题，无不加以磋商。到了一九一四年（即民国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三位全权代表遂将此项暂时协定，共同签字。（光祈按，请阅本书之末所载协约草案。）……签字两日之后，中国政府忽将该国代表之全权委任撤回，不给该代表正式签约之权。六月六日，驻京英使乃向中国政府言曰，英藏两方对于此次暂时签定之协约，认为已经正式议结；彼等将不顾中国参加与否，自行正式签字云云。七月，西藏中国两代表，遂离 Simla 而去。两三星期之后，欧战遂启，西藏问题因而搁置。此次会议之所以破裂，其唯一暗礁，即在划定华藏界线问题是也。……英国方面尝从中提出一种调停办法，即将西藏分为外内两部，已如前文所述。至于外藏内藏之界线，当以一七二七年（即雍正五年）西藏中国两方所划定之界线为标准。惟纳隆（Nya-rong）一地，应由西藏移交中国；按该地系在中国界内，但直至今日，皆由西藏管理；又此处界线系位于巴塘之西，再向北方以及西北而进，西藏方面反对达格（Derge）、纳隆（Nya-rong）两处富庶区域之丧失最力。中国方面则对于巴塘、里塘以及其他区域之并入“内藏”范围一事，竭力拒绝。盖巴塘等地为中国所征服者，将近二百年，早已视为四川行省之一部分故也。最后，西藏方面虽已表示愿意接受英国之调停办法，以促条约成立，而中国方面却坚执己见不变。但中国当局尝向英国通知，略谓中国对于此次协约草案，除划定界线一事外，其余各点均愿接受云云。……一九一九年

(即民国八年)三月，余遂离职。未几，中国政府乃向北京英使提议，重将前此 Simla 会议停顿之谈判，再为继续。该政府要求藏东之巴塘、里塘、打箭炉[1]，合并于四川省内。反之，格打(Gya-de)(光祈按，此字似为格马打〔Gyamda〕之误)、察木多(Cham-do)、莽克(Mang-kam)、他野(Tra-ya)各地，则许其属于西藏自治区内。此外，该政府并要求，得派中国委员于"外藏"区内江孜、亚东、噶大克三处商埠之权。……英国政府诚然对于中国此种条件，并无必须接受之义务，但英国政府却声言此种条件，可以作为讨论基础云云。其在西藏政府方面，则直至八月，始有人征询其意见；该政府对于中国一切修正提议，皆加以拒绝。而其时中国政府自行撤回提议之消息，亦复同时传来。……(光祈按，此段系译自《西藏之今昔》。)

下编　文件内容[2]

下列(一)(二)(三)三种附件，系译自拉萨(Lhasa)地方之石柱碑文。此类石柱碑文，存于拉萨地方者，共有八种；存于 Sam-ye 地方者，计有一种。西藏政府对余十分优待，特将此项石柱打扫干净，以便易于诵阅。余赖具有学识藏人之助，得将各种碑文一齐译出。但因本书篇幅有限之故，只将其中三种附录如下(光祈按，原书次序，系将甥舅联盟碑列为第一，纪功碑列为第二。现在将其次序更换，以二为一，其理由已详前)：

一、西藏征服中国西部(纪功碑)　时在西历纪元后七百六十三年。(光祈按，即唐代宗广德元年。)碑文系刻于石柱南面。该柱在达赖喇嘛宫殿之下。(原书注：该柱为四方形，约有七米突之高。〔光祈按，约合中国二丈二尺余。〕立于三个石级之上。其中两个石级，系用铁带围之。石柱上方，覆以尖顶。)[3]

二、中藏条约　结于西历纪元后第八世纪上半期。(光祈按：如系甥舅联盟碑，则

---

① 打箭炉：今四川康定。相传诸葛亮南征，命部将郭达造炉打箭于此，因而得名。实则其地为达、折二水汇流之处，藏语谓汇流为"渚"，故称达折渚，音讹附会为打箭炉。

② 此编译自《西藏之今昔》。

③ 译文略。

当为建中四年，等于西历七八三年，应为第八世纪下半期。）碑文刻于石柱西面。在拉萨庙宇附近。（原书注：柱为四方形，约有四·二〇米突之高。〔光祈按，约等于中国一丈三尺余。〕）立于石墙屋壁之后。有垂柳二株悬挂于上。此项垂柳，藏人称为 Cho U-tra；换言之，即“君发”（The Lord’s Hair）之意。[1]

三、廓尔喀（Gurkhas）败北（纪念碑）　西历纪元后一七九二年。（光祈按，即乾隆五十七年。）此项碑文，系在达赖喇嘛宫殿下方，石板之上。

国王亲书。

十次成功之纪念碑。

现在廓尔喀（Gurkhas）既已降余，皇师亦已撤退，所有今回第十次光荣勋绩告成一事，已于函中详述。惟此项勋绩之名声虽属不小，而表彰之举究嫌未尽。兹特撰刻此文，以作人心轨范。

犹忆昔日余常为 Yükur 经典信徒。按照 Cheukur 典籍，所有令人敬爱的大臣（光祈按，指中国驻藏大臣而言。原文为 Amban，系满州语，有大臣或好官之意），与无所不能的国主之一切伟绩，无不书之于此。在 Lü Au 某章之中，曾有言曰：如果思想健全，则思想行为可以合一。无论如何，凡能依据上述规令行事者，则可邀得天朝护主（原书注：指中国皇帝而言）之允许，并能获得奖赏。余既依法行事，于是乃有此项劳绩，以使十次战役，得一胜利结束。现在理应将此劳绩，刻于纪念碑上。

十次劳绩如下：

两次战胜 Chungkar。（原书注：似指 Oelot Mongols 而言。）

一次战胜 Hui Se。

两次战胜 Tsala 与 Chuchen。

一次战胜 Tai Wan。

两次战胜 Mihantan 与 Antan。

现在余既与廓尔喀交战两次，将其打败，彼等并已向余请降。因而十次之数，于兹完成。此外尚有对内战胜三次之事，但不甚重要。

至于雌土鸟年（原书注：西藏历书，系用五行与十二动物合成。〔每十年之中〕，五行各自重复一次，而以雄雌两性别之。譬如：一九二四年为雄木鼠年，一九二五年为雌木牛年，一九二六年为雄火虎年，一九二七年为雌火兔年，一直轮到第十年，是为雌水鸟年，五行之循环遂终。于是又复从头算起，譬如第十一年为雄木犬年，第十二年为雌

---

① 译文略。

木豕年。到了六十年，五行及十二动物两项，皆同时告竣。总计十二动物各轮流五次；五行各轮流六次〔每次复分雄雌两次〕。从第六十一年起，又为雄木鼠年，如此类推下去，一如前例。〔光祈按，五行而别以雄雌，其结果计有十种，实与吾国之甲乙丙丁……数目相等。至于十二动物则与吾国之子丑寅卯……数目相等，故西藏每六十年为甲子一周，亦与吾国相同。〕）廓尔喀投降一事，当时彼等虽尝率军前进，意图掠劫 ü 与 Tsang 两省。（原书注：均为西藏最要之省份。拉萨即位在 ü 省之内。日喀则 Shigatse 则位在 Tsang 省之内。）而 Au Hui 既不勇敢；同时 Pa＝chung 做事又不彻底，只是一味慌忙。因此廓尔喀得以安然不惧。

彼等既于去年掠劫以后，旋又卷土重来。于是乃将邪臣免职，并遣有名之 Chang chum 前往。此人对于粮饷一事办得十分丰厚，所有 Tu-kang 人士，甚为重视余之赏赐，而且毫无劳倦恐惧之感。

当去年冬季，复由 Solon 及四川两地火速派兵前来。（原书注：Solon 一地系属于西藏行省克隆（Gya-rong）上部之内。一八六三年为中国所并。由此可以看出，战胜廓尔喀之军队中，实有藏兵在内。此外似乎尚有若干西藏军官，参与斯役；其中如 Do＝ring Shap＝pe，Yuto Shappe，以及 Changlo-chen De＝pön〔上校〕。队伍陆续开拔，不绝于西宁 SiNing 道上。遂在今年五月，行抵贼地。（原书注：系指廓尔喀而言。）当彼等开到之际，立将 ü 与 Tsang 两省夺回，并将贼地占领。彼等登高山，越险阻，如履平道。涉宏波，经窄峡，如过小涧。彼等攀至山顶之后，又复越岭而下，向前追赶。彼等既将各处重地占领，同时并将险隘要道夺回。彼等七战七胜，而未一伤手足，贼军于是为之大震。

当大军既到 Yam-bu（原书注：即克提门者 Khatmandu，为尼泊尔之首都）附近之后，彼方乃派贼酋前来输诚投降。并自言愿遵我军命令行事。其后彼等（光祈按：指贼军而言）虽然奉行（我方）大帅命令，但我方仍不允准彼等前入我军营盘；其原因系由于去年彼等尝用欺诈方法，曾将 Ton-dzin-Pal-jor 及其同伴拘禁故也。因此，现在我方不准彼等前入我军营盘。（原书注：Ton-dzin Pal-jor 系指 Do-ring Shap-pe 而言。据云：华人方面曾派彼随同 Yu-to Shap-pe，Chang-lo-chen De-pon 两人为议和使者，到廓尔喀。但廓尔喀方面，却将彼等拘禁，并押到尼泊尔而去。）

贼众因大军英勇绝伦之故，无不计穷策尽，弗知所为。我军本可将贼一网打尽，不使一人脱逃；但此举固非吾天朝护主所希望者。即或尽将各地占领，而此项地方距离 ü 与 Tsang 两省疆界，既有一千余里之遥，亦复难于着手开垦与防守。而且普通质朴国民，即或偶有所得，其结果仍将一无所获。（原书注：其意若曰，即或尼泊尔合并于藏，而藏人亦复无力长此保有。）因此之故，我军乃下令受降，班师。于是大功告成。（原书

注：欧洲著作家中，常依据中国书籍，估计当时廓尔喀军队，其数当有一万八千；反之中国军队则有七万之众。但据藏人方面一般估计，则当时廓尔喀军队只有四千之谱，中国军队则亦只有九千左右。至于中国军队之中，至少当有一半，或一半以上系藏人。）

从前 Thang Tha-i Tsung 当政之际，曾与 Chi-li 开会一次。（原书注：所谓 Chi-li 者，似系指英人而言。藏人称呼欧人为 Chi-ling。）其后因见彼等（指廓尔喀而言）战败而无力，于是彼（指 Chi-li 而言）乃声称，彼等将与中国永远亲善。（原书注："声称" Said 一语，乃系一种轻视口气。此语仅用之于对待平常国民。现在用之于此，所以表示鄙视 Chili 代表之意。）吾人不应以 Chi-li 为模范。（原书注：其意系指英人将印度占领以后，从此据为己有。）ü 与 Tsang 两省疆界，与中国版图并非接近，彼等（指廓尔喀而言）因恐身命不保，于是被迫投降。若只虚伪乞降，以谋和平，当然不能认为满足。现在却是大得胜利；贼方业已向我诚心乞降，我方亦已相信接受此项降意。兹事并已按照 Thang-gur，Tha-i Tsung 国王三条办理。

余果有再将前此 Tor-gö 一役，（原书注：Tor-gö 为中国所征服的蒙古种族之一。）究竟彼等如何畏惧我们，以及如何服从我们，书录于此之必要乎？至于彼等之如何与我们协商，如何对我们臣顺各节，固已于从前记录矣。现在廓尔喀既已自认其罪过，望保其身命，畏惧我们，服从我们；于是彼等遂与我们协商一致，并愿归顺我们。因是之故，两类从此完成。（光祈按，此语不知何指。）错误系在彼方，彼等亦已自认其罪，此即兹役之实在情形也。

倘若吾人一为细心考察，则当察觉：ü 省人民之不讲武备，专治文学，于是彼等变成有如无力之躯，此实不当。倘若一种民族，自将武备放弃，而专以文事为主，彼等势将无力维持其旧有地位。此则吾人所必须知之者也。

至于往来举动（原书注：系指人类行为准则而言），固已于《星宿》（The Planets and Stars）一书中详述。现在对此宜加以讲求，万勿忘去。（原书注：在实际上，藏人之中，除极少数例外，并此项碑文，系记载攻打廓尔喀之事，尚有所不知。彼等只知此项碑文，系从前一位中国大臣传留下来者。）如遇战争之时，更宜再三体察，当有益处。

因为五十五年战争所得经验之故，于是十种勋绩，于兹完成。此乃天朝护主所赐。因此，天朝护主皇恩，可谓非常之深。余亦对此信赖凭恃。彼等（指廓尔喀而言）初以为可用暴力，侥幸成功。但天朝护主之皇恩，却终久存在。尚望此种皇恩，更将彼等化为正人。此外实无他言。

此文系由国王于天朝护主在位五十七年，即雄水鼠年，孟冬月上半期（原书注：犹言上半月之内）书撰。

四、西藏尼泊尔条约　订于西历一八五六年。（光祈按，即咸丰六年。）译自藏文。[①]

五、中英关于哲藏之条约　时在一八九〇年。（光祈按，即吾国所谓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订于光绪十六年。本篇系依据该约汉文原本抄录于此，并未另译。）

兹因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大君主五印度大后帝，实愿固敦两国睦谊，永远弗替；又因近来事故，两国情谊有所不协之处，彼此欲将哲孟雄、西藏边界事宜，明定界限，用昭久远。是以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大君主，拟将此事订立条款，特派全权大臣议办。由大清国特派驻藏帮办大臣副都统衔升，由大英国特派总理五印度执政大臣第一等三式各宝星上议院侯爵兰，各将所奉全权便宜行事之上谕文凭，公同较阅，俱属妥协。现经议定条约八款，胪列于后：

第一款：藏哲之界，以自布坦交界之支莫挚山起，至廓尔喀边界止；分哲属梯斯塔及近山南流诸小河，藏属莫竹及近山北流诸小河分水流之一带山顶为界。

第二款：哲孟雄由英国一国保护督理，即为承认。其内政外交，均应专由英国一国径办。该部长暨官员等，除由英国经理准行之事外，概不得与无论何国交涉来往。

第三款：中英两国互允以第一款所定之界限为准，由两国遵守，并使两边各无犯越之事。

第四款：藏哲通商，应如何增益便利一事，容后再议，务期彼此均受其益。

第五款：哲孟雄界内游牧一事，彼此言明，俟查明情形后，再为议订。

第六款：印藏官员因公交涉，如何文移往来一切，彼此言明，俟后再商另订。

第七款：自此条款批准互换之日为始，限以六个月，由中国驻藏大臣、英国印度执政大臣各派委员一人，将第四、第五、第六三款言明随后议定各节，兼同会商，以期妥协。

第八款：以上条款既定后，应送呈两国批准，随将条款原本，在伦敦互换，彼此各执，以昭信守。

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年三月十七日，在孟腊城，缮就华英文各四份，盖印画押。

六、中英所订哲藏条约关于通商交涉游牧之续约　时在一八九三年。（光祈按，即吾国所谓中英会议藏印续约，订于光绪十九年。本篇系依据该约汉文原本抄录于此，并未另译。）

---

① 译文略。

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年三月十七日，藏印立约，未结通商交涉游牧三款；现已议订章程，接附前约。

通商：

第一款：藏内亚东，订于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开关通商，任听英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由印度国家随意派员驻寓亚东，查看此处英商贸易事宜。

第二款：英商在亚东贸易，自交界至亚东而止，听凭随意来往，不须阻拦；并可在亚东地方租赁住房栈所。中国应允许所建住房栈所，均属合用。此外另设公所一处，以备如第一款内所开印度国家随意派员驻寓。其英国商民赴亚东通商，无论与何人交易，或购藏货，或以钱易货，或以货换货，以及雇用各项役马夫脚，皆准循照该处常规，公平交易，不得格外刁难。所有该商民等之身家货物，皆须保护无害。自交界至亚东，其间朗热打均等处，已由商上（光祈按，“商上”二字似为“西藏官厅”四字之误）建造房舍，凭商人赁作尖宿之所，按日收租。

第三款：各项军火器械暨盐酒，各项迷醉药，或禁止进出，或特定专章，两国各随其便。

第四款：除第三款所开应禁货物外，其余各货由印度进藏，或由藏进印度，经过藏哲边界者，无论何处出产，自开关之日起，皆准以五年为限，概行免纳进出口税。俟五年限满，查看情形，或可由两国国家酌定税则，照章纳进出口税。至印茶一项，现议开办时，不即运藏贸易。俟百货免税五年限满，方可人藏销售；应纳之税，不得过华茶人英纳税之数。

第五款：各项货物到亚东关时，无论印度货物藏内货物，立当赴关呈报请查，开单注明，何项货物多少，及分量若干，置价若干。

第六款：凡英国商民在藏界内与中藏商民有争辩之事，应由中国边界官与哲孟雄办事大员面商酌办。其面商酌办者，固为查明两造情形，彼此秉公办理。如两边官员意见有不合处，须照被告所供，按伊本国律例办理。

交涉：

第七款：印度文件递送西藏办事大臣处，应由印度驻扎哲孟雄之员交付中国边务委员，由驿火速呈递。西藏文件递送印度，亦由中国边务委员交付印度驻扎哲孟雄之员，照章火速呈递。

第八款：中印两官所有往来文移，自应谨慎呈递。及来往送信之人，亦应令两边委员照料。

游牧：

第九款：从亚东开关之日起，一年后，凡藏人仍在哲孟雄游牧者，应照英国在哲孟

雄随时立定游牧章程办理。凡该章程内一切，须先晓谕通知。

另款：

第一款：中印各驻扎委员，如有议事意见不合之处，应由各委员呈报该管上司议办。倘该上司意见仍属不合，应由各上司请示本国国家议办。

第二款：自此次条约议定之日起，于五年后，如查其中有应行变通更改之处，必须于六个月之前声明，以便两国各派员议办。

第三款：藏印条约第七款内载，由中英各派员将第四、五、六三款言明随后议订各节，公同会商等语，现经两国派员，公同将以上通商交涉游牧三款，议订九条，并续款三条。言明，应与原约视同一律；其实力奉行之处，亦与逐字载入原约无异；彼此会同画押为凭。

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在大吉岭，缮就中英文各四份，画押。

大清国二品顶戴奏准会同画押四川越隽营参将何长荣。

大英国待派政务司保尔。

大清国赏戴花翎头品顶戴双龙二等宝星奏准会同画押税务司赫政。

七、英藏条约　时在一九〇四年。（光祈按：即光绪三十年。其后该约附入光绪三十二年所订之中英新订藏印条约内面。又本篇系依据该约汉文原本抄录于此，并未另译。）

案查光绪十六、十九年中国与英国所定两次藏印条约，因其意义，并切实施行，均有疑难之处。又查英藏历年和好，近因事故，情意未洽，今欲重修旧好，将所疑难之事，全行解定。兹大英国政府，特派边务全权大臣荣赫鹏，与噶尔丹[①]寺长罗生戛尔曾暨噶布伦并色拉[②]、别蚌[③]、噶尔丹三大寺之呼图克图[④]，兼与西藏民教诸首领，代表西藏议定条款，开列于后：

第一款：西藏应允遵照光绪十六年中英所立之约而行。亦允该约第一款所定哲孟雄与西藏之边界，并允按此款，建立界石。

---

① 噶尔丹寺：即甘丹寺，在拉萨市达孜县境内，位于县驻地东北、德庆乡旺固尔山卓日窝切的山坳里，距拉萨57公里。“甘丹”意为喜悦。全称“卓甘丹南巴杰卫林”，亦称“甘丹朗杰林”。有的译为“噶丹寺”、“甘当寺”、“噶勒丹寺”、“噶尔丹庙”。甘丹寺由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于1409年亲自筹建，可以说是格鲁教派的祖寺，清世宗曾赐名为永寿寺。

② 色拉寺：喇嘛教格鲁派拉萨三大寺之一，在西藏拉萨市北郊。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兴建。

③ 别蚌寺：藏传佛教规模最大的寺院。又称哲蚌寺。位于拉萨市西北5公里的半山坡上。与甘丹寺、色拉寺合称拉萨三大寺。

④ 呼图克图：蒙古语音译。“呼图克”意为“寿”，“图”意为“有”，合称意为“有寿的人”，亦即长生不老之意。清朝中央政府授予藏族和蒙古族地区喇嘛教大活佛的封号，是仅次于达赖和班禅的大封建领主。

第二款：西藏允定于江孜、噶大克及亚东，即行开作通商之埠，以便英藏商民，任便往来贸易。所有光绪十九年中国与英国订立条约内，凡关涉亚东各款，亦应在江孜、噶大克一律施行。惟嗣后如英藏彼此允改，则该三处应从改定章程办理。除在该处设立商埠外，西藏应允所有现行通远之贸易，一概不准有所阻滞。将来如商务兴旺，并允斟酌另设通商之埠，亦按以上所述之章程，一律办理。

第三款：光绪十九年中英条约所有更改之处，应另行酌办。西藏允派掌权之员，与英国政府所派之员，会议详细酌改。

第四款：西藏允定除将来立定税则内之税课外，无论何项征收，概不得抽取。

第五款：西藏应允所有自印度边界，至江孜噶大克各通道，不得稍有阻碍。且应随时修理，以副贸易之用。并于亚东、江孜、噶大克及日后续设之商埠，各派藏员居住。英国亦派员监管各该处英国商务。如欲赍送公文信函于藏官，或驻藏各华官，均责成商埠居住之各该藏员接收转送。复文回信，亦一律责成此员妥送。

第六款：因西藏违约，英国派兵前往拉萨责问；又因英国边务大臣暨其随员护兵等被侮被攻，是以西藏允兑给英国政府英金五十万磅，合卢比银七百五十万元，以赔补兵费及无礼侮攻各情。此赔款应在英政府随时所定之处，或于藏境内，或于英境大吉岭札拉白古里等地面内清缴。每年西历正月初一日，兑银十万卢比。七十五年缴清。于何处收兑，英国政府预先知照。第一期应在西历一千九百零六年正月初一日，照数兑交。

第七款：俟以上所述之赔款照数缴清后，并第二、三、四、五等款内所称商埠，切实开办三年后；英国政府于未办之先，仍于春丕驻兵暂守作质，至赔款清缴或商埠妥立三年后最晚之日为止。

第八款：西藏允将所有自印度边界至江孜、拉萨之炮台山塞等，一律削平。并将所有滞碍通道之武备，全行撤去。

第九款：西藏允定以下五端，非英国政府先行照允，不能举办：（一）西藏土地，无论何外国，皆不准有让卖租典或别样出脱情事。（二）西藏一切事宜，无论何外国，皆不准干涉。（三）无论何外国，皆不许派员或派代理人进入藏境。（四）无论何项铁路、电线、矿产或别项利权，均不许各外国或隶各外国籍之民人享受。若允此项利权，则应将相抵之利权，或相同之利益，一律给与英国政府享受。（五）西藏各进款，或货物或金银钱币等类，皆不许给与各外国或籍隶各外国之民，抵押拨兑。

第十款：此约共缮五份，由商定之员，在拉萨，于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即西历一千九百〇四年九月初七日，画押盖印为凭。

英国边务大臣荣赫鹏印。

达赖喇嘛印。（此印乃噶尔丹寺长所钤。）

噶布伦印。

别蚌寺印。

色拉寺印。

噶尔丹寺印。

西藏首领印。

英藏各员现行声明，今日所立之约，以英文为凭。

大英国边务大臣荣赫鹏印。

达赖喇嘛印。（此印乃噶尔丹寺长所钤。）

噶布伦印。

别蚌寺印。

色拉寺印。

噶尔丹寺印。

西藏首领印。

印度总督喳士尔签押。

此约西历一千九百〇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印度新辣，由印度总督当堂批准。印度政府外部大臣费礼夏签押。

印度总督所声明之款，附于已经批准之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即西历一千九百〇四年九月初七日所订英藏条约之内。

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即西历一千九百〇四年九月初七日，英国所派边务大臣荣赫鹏代英政府与噶尔丹寺长罗生戛尔曾暨噶布伦并色拉、别蚌、噶尔丹三大寺之呼图克图，兼与西藏民教诸首领，代表西藏所立之约，现经印度总督批准，并惠允饬将该约第六款，西藏应赔补英国入藏兵费，由原定七百五十万卢比，减为二百五十万卢比。又复声明：该约所定之赔款，初缴三年三期之后，所派占守春丕之兵，可以撤退。惟该约第二款所立之商埠，西藏须按照第七款开妥三年，并须按照该约内各节，一一认真遵办。

印度总督喳士尔签押。

此款于西历一千九百〇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由印度总督当堂签押。

印度政府外部大臣费礼夏签押。

八、中英条约　时在一九〇六年。（光祈按，即吾国所谓中英新订藏印条约，订于光绪三十二年。本篇系依据该约汉文原本抄录于此，并未另译。）

正约：

案查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及十九年十月十八日，中国与英国所定两次藏印条

约，其所载各款，西藏并未认为确实，亦未允切实遵办。英国政府惟有设法保卫该两约所享利权，旋于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在拉萨定立英藏条约十款。嗣于光绪三十年十月初五日，由印度总督代英国政府将该约批准，并将当日所声明之条款更订之文据附人。兹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全境大皇帝兼五印度大皇帝，因欲固存两国友睦，历久不渝，大清国大皇帝特派钦差全权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大英国大皇帝特派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功赐佩带头等迈吉利宝星萨道义，各将所奉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之敕谕，互相校阅，俱属妥善。现议各款，开列于后：

第一款：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英藏所立之约，暨其英文汉文约本，附入现立之约，作为附约；彼此允认，切实遵守。并将更订批准之文据，亦附入此约。如遇有应行设法之时，彼此随时设法，将该约内各节，切实办理。

第二款：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

第三款：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英藏所立之约第九款内之第四节所声明各项权利，除中国独能享受外，不许他国国家及他国人民享受。惟经与中国商定在该约第二款指明之各商埠，英国应得设电线，通报印度境内之利益。

第四款：所有光绪十六、十九年，中国与英国所定两次藏印条约，其所载各款，如与本约及附约无违背者，概应切实施行。

第五款：此约分缮中文英文，业已细校相符。惟辩解之时，仍以英文为准。

第六款：此约须由两国大皇帝批准画押。自两国全权大臣画押之日起，限三个月在伦敦互换。此约中文英文各缮四分，共八分。两国全权大臣画押盖印为凭。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大英国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功赐佩带头等迈吉利宝星萨道义，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四日，西历一千九百〇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立于北京。

附约：

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即西历一千九百〇四年九月初七日，在拉萨定立英藏条约；又印度总督代英国政府签字所声明之款，附于已经批准之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即西历一千九百〇四年九月初七日所立英藏条约之内。

九、英俄条约　一九〇七年（光祈按，即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八日在圣彼得堡签字。

大不列颠爱尔兰联邦国王、海外不列颠殖民地国王、印度皇帝陛下，与全俄皇帝陛下，诚心希望，彼此协意解决亚洲大陆方面两国利益有关之各种问题，决定缔结协约，以阻止英俄两国间各项关涉问题之一切误会原因。因此之故，特各任命全权代表如左：

大不列颠爱尔兰联邦国王、海外不列颠殖民地国王、印度皇帝陛下特派驻俄全权大使贵爵 Sir Arthur Nicolson；

全俄皇帝陛下特派廷臣外交总长 Iswolsky；

各将全权文凭交阅，俱属妥善，彼此协定如下：

关于西藏之规定：

大不列颠政府及俄罗斯政府，皆承认中国在藏之主权。又以事实上大不列颠帝国因地理关系之故，对于保持西藏外交现状一事，特别注意。两国政府乃协定条款如次：

第一款：结约国双方当互相尊重西藏领土完全，不得干涉西藏内政。

第二款：依据承认中国在藏主权之理由，大不列颠帝国及俄罗斯帝国，除由中国政府介绍外，皆不得直与西藏实行交涉。但此项约束，不能影响英国商务委员与西藏官厅之直接关系，为一九〇四年九月七日英藏条约第五款所规定，并为一九〇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英华条约所证明者。又此项约束，亦不能变更上述一九〇六年英华条约第一款内之协定。

此外，尚有明白声明者，即英俄两国佛教徒，关于纯粹宗教事务，得与达赖喇嘛以及藏中其他佛教代表，直接来往，英俄两国政府各自负责，不使此项直接来往，损及本约规定。

第三款：英俄两国政府相约，各不派置代表到拉萨。

第四款：结约国双方相约，不得为自己或本国国民，在西藏要求或取得铁道、马路、电报、煤矿以及其他权利。

第五款：两国政府约定，所有西藏国赋，无论为物产或现金，皆不得向英俄两国或其国民折押或让与。

英俄所订西藏条约之附件：

大不列颠帝国证明印度总督阁下所签押之宣言，曾附载于一九〇四年九月七日条约之批准文件中者。该宣言曾云：驻扎春丕（Chumbi Valley）之英军，当于（西藏）将其二百五十万卢比之赔款，业已缴付三年三期之后，实行撤退。但必须该约第二款内所言商埠，业已实行开放三年，而且其间西藏官厅对于上述一九〇四年约内各款，均已一一认真实行方可云云。现在应加以明白声明者，即是：假如占领春丕之英军，于上述宣言中所定之期限，因为某种原由未尝实行撤退，则英俄两国政府，可以对于此事，为友谊的交换意见。

本约应由两国政府批准，并从速在圣彼得堡交换约本。

为昭信守起见，两国全权代表各于本约之上，签名盖印。

此约系于一九〇七年八月十八日（三十一日），在圣彼得堡，制成两份。

十、西藏通商章程　时在一九〇八年。（光祈按：即吾国所谓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订于光绪三十四年。又本篇系依据该约汉文原本抄录于此，并未另译。）

大清一统帝国大皇帝，大英国兼五印度大皇帝，今因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四日续订藏印条约第一款内开：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英藏所立之约，及其英文汉文约本，附入现在之约，作为附约，如遇有应行设法之时，彼此随时设法，将约内各节切实办理，等语；又据光绪三十年拉萨约之第三款内开：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中英条约所有更改之处，应另行酌办，等因。现值应行更改此项章程之时，是以大清国大皇帝特派张荫棠为全权大臣，大英国大皇帝特派戴诺为全权大臣，会同商议。及西藏大吏选派噶布伦汪曲绝布为掌权之员，禀承张大臣训示，随同商议。大清国钦差大臣张，大英国钦差大臣戴，各将所奉全权文凭，互相校阅，并藏员掌权文据，一并查阅，俱属妥善。改定章程如左：

第一款：光绪十九年所定通商章程，与此次章程无违背者，仍应照行。

第二款：江孜商埠界内全地：（甲）界线起自江孜堡垒东北之曲迷荡桑，自此曲行过背郭阙堞大寺之后，至峡东冈，自此直越逸阳河，抵匝木萨止。（乙）自匝木萨，此界线向东南接行，至拉极多为止。沿此线内田庄，如拉和格火格错东穷席拉布冈等处，均在界内。（丙）又自拉极多，此线循行至玉驼，经甘卡尔席全地，直行至曲迷荡桑为止。各商埠内，向有难得合宜房栈之情事，兹允英国人民亦得在各商埠内，租地建筑房栈。此种建筑地基坐落之处，应由中藏官，在每埠与英国商务委员特行商酌画定。英国商务委员与英印人民，除在此处外，不得在他处建筑房栈。但此种办法，不得有一毫侵害中藏地方官于此处之治理权，亦不得损及英印人民在此处以外租赁房栈居住存货之权利。凡英印人民欲租建筑地基，应转由英国商务委员，向工部局声请租地文凭。其地基之租价年限与合同，应由租客与地主自行和平商订。如地主与租客因租价年限及合同等事，意见不合，应由中藏官商同英国商务委员调处。其地基租定后，应由工部局中藏官会同英国商务委员勘定。又未经工部局给与租客建筑文凭，该租客不得兴工建筑。但约定工部局给发建筑文凭，不得任意延宕。

第三款：各商埠治理权，应归中国督饬藏官管理。各商埠商务委员与边界官，均须合宜品级。彼此往来会晤以及文移往返，应互以礼貌优待。凡商务委员及地方官因意见难合，不能断定之事，应请拉萨西藏大吏及印政府核办；印度政府照会之意，应并行知照中国驻藏大臣。如拉萨西藏大吏与印度政府仍不能断定之事，应按光绪三十二年北京条约第一款，由中英两国政府核办。

第四款：如英印人民在各商埠与中藏人民有所争论，应由最近商埠之英国商务委员与该商埠裁判局之中藏官员，会同查讯，面议办法。其会同面议之意，系为证明实情，

公平办理。如有意见不合之处，应按照被告之国法办理。凡属此种交涉案件，均有被告之国之官主审；其原告之国之官，只可会审。凡英印人与英印人，因身家产业之权利而起之事，俱归英国官管理。英印人民在各商埠及往各商埠之商道中，有犯罪者，应由地方官送交最近犯罪之商埠英国商务委员，按印度法律审讯惩办。但地方官于此种英印人民，除应行拘禁外，不得格外凌虐。中藏人民有对于各商埠内或往各商埠之道中之英印人犯罪者，应由中藏地方官拿获，按律惩办。两面审办之法，俱应至公且平。凡中藏人民到英商务委员处控诉英印人民，中藏官得有派员往英国商务委员公堂观审之权利。凡英印人民到商埠内裁判局控告中藏人民之案件，英国商务委员亦得有派员往裁判局观审之权利。

第五款：西藏大吏遵北京政府训令，深愿改良西藏法律，俾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无论何时，英国在中国弃其治外法权。并俟查悉西藏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亦即弃其治外法权。

第六款：英军撤退后，所有由印边界以达江孜一路，英国所建旅舍等房屋，共计十一处，应由中国照原价赎回；仍以公平租价，租与印度政府。每旅舍，一半留为英国经管由各商埠至印度边界电线之官役之用，并存储材具。其余则留为中、藏、英、印体面官往来站宿之用。一俟中国电线，已由中国接修至江孜，英国可酌量将由印边界至江孜电线，移售于中国。当未移售以前，中藏人之信，当由此印政府所修之电线，妥为接收传寄。又未移售以前，应由中国担任保护，由各商埠至印边界之电线。兹约定，所有人民，如毁伤此电线，或如何阻挠看管经理此电线之官役，应立由地方官严惩。

第七款：凡因信借揭欠倒闭而起之控告案件，应由该管官查讯，设法追索赔偿。但如欠债者报穷，无力赔偿，该管官不任赔偿之责，亦不得将公产官物扣抵。

第八款：驻寓西藏现在已开及将来新开各商埠之英国商务委员，得安排往来印边界，传递邮件。所用传递夫役，于凡所经过之处，应由地方官尽力相助，与藏官所用传递文件之夫役，同受一律保护。俟中国在西藏妥立邮政，中英两国可即酌议裁撤英商务委员之传递夫役。英国官商雇用中藏人民作合法事业，不得稍加限制。此种受雇之人，亦不得稍加扰害。于西藏人民应享之权利，亦不得因此稍受损失。但此种人于应纳赋税，不得豁免。如有死罪情事，应归地方官按律惩办，雇主不得稍加庇匿。

第九条：凡往各商埠之英国官民以及货物等，应确循印藏边界之通商大路前往，不准擅往商埠外各地。不得由亚东、江孜，无论由何道路绕入藏属内地，以往噶大克，亦不得由噶大克，无论由何道路绕入藏属内地，以往江孜、亚东。惟印度边界土人，向在藏属居住贸易者，因习惯既久，仍得照旧按通行规例来往贸易。但此种人如是往来贸易时，应仍按向例，服从地方官管理。

第十款：凡官商往来藏印，其公私财产货物途中被劫，应即报明巡警官，巡警官应立即设法拿获劫盗，交地方官立即审办追赃。如盗犯逃至巡警局地方权力不及之地，不能缉获，则巡警局及地方官咸不任偿失之责。

第十一款：为保公安起见，凡存放大多数之火油，及所有易燃危险之物，应用池栈，应安设在商埠内远距民居之处。英印商人未经按照章程第二条禀请合宜地基，不得开筑火油池栈。

第十二款：英国人民可任便以货物或银钱交易，任便将货物售与无论何人，任便由无论何人购买土产货物，任便雇赁运载夫马，并任便照地方常规，办理一切贸易事宜，不得格外限制刁难，亦不得抑勒强逼。凡英官商在商埠内及往各商埠道中之身家产业，应随时由巡警局及各地方官实力保护。中国允在各商埠及往各商埠道中，筹办巡警善法。俟此种办法办妥，英国允即将商务委员之卫队撤退；并允不在西藏驻兵，以免居民疑忌生事。英国商务委员与西藏官民，或通函件，或面会往来，中国官并不禁阻。凡西藏人民至印度贸易游历居住，所享权利，与此章程给与在西藏之英国官民之权利相等。

第十三款：此次章程自两国全权大臣及西藏代表员签押之日起，应通行十年。若期满后六个月内，彼此俱未知照更改，此章应再行十年。每至十年，俱照此办理。

第十四款：此次章程华藏英文字俱经详细校对。遇有因解释此章字句而起之辨论，以英文作为正义。

第十五款：此项章程由中英两国大皇帝批准。应自签押之日起，六个月后，在北京及伦敦互换。此章由两国全权大臣及西藏掌权员签押盖印为凭，以昭信守。华藏英文各缮四分。

十一、英布条约　订于一九一〇年。（光祈按：即宣统二年。）系于是年正月八日在布坦（Bhutan）**（光祈按，或译为布丹）境内** Punaka **地方签字，并于同年三月二十四年在孟腊城** Calcutta **批准。**

兹因欲将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即布坦 Shing Lang 年九月二十四日英、布两国政府在 Sinchula 所订条约之第四、第八两款，加以修改。一方则由印度总督 Sir Gilbert John Elliot-Marrny-Kynynmound 伯爵授与驻扎哲孟雄政治委员 C. A. Bell 先生以全权，他方则由布坦国王 Sir Ugyen Wangchuk 殿下，共同协议，修改条文如下：

下列一段增补文字，应附入一八五六年 Sinchula 条约第四款之中：

“英国政府愿将每年津贴布坦政府之五万卢比，从一九一〇年正月十日起，增为十万卢比。”

一八六五年 Sinchula 条约第八款，业加修改，其修改之文如下：

"英国政府允许，决不干涉布坦内政。在布坦政府方面，则承认关于外交事件，愿受英国政府指挥。倘与哲孟雄及 Cooch Behar 国王发生争端，或者对于该国王等加以控告，则此项问题均宜听候英国政府之判决。英国政府当依照法律必要手续办理；并勒令上述该国王等，遵其判决。"

本约系于一九一〇年正月八日，即布坦土鸟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布坦 Punaka 地方，制成四份。

十二、蒙藏条约　时在一九一三年。（光祈按，即民国二年。）据云：是年正月在库伦签字。①

十三、中英藏协约草案　时在一九一四年（光祈按，即民国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印度 Simla 议结。

第一款：西藏全境，应分为"外藏"、"内藏"两部。"外藏"系指与印邻近一带而言，并包含拉萨、日喀则、察木多三地在内。"内藏"系指与华邻近一带而言，并包含巴塘、里塘、打箭炉以及藏东大部在内。

第二款：承认中国在西藏全境之主权。但中国方面约定，不将西藏地方改为中国一个行省。

第三款：大不列颠国约定，决不合并西藏任何地方。

第四款：承认"外藏"之自治。中国约定，决不干涉该地内政（光祈按，专指"外藏"而言），由藏人自行办理；中国并约定，既不派遣军队到该地，亦不在该地设置文武官吏（惟下列第六款所述者为例外）。更不在该地建设中国殖民地。大不列颠国约定，对于西藏全境（光祈按，指"外藏"及"内藏"而言），愿受本款所举各种限制（光祈按，即不在西藏全境派兵、置官、建设殖民地等等）；惟大不列颠国之商务委员及其护兵，应允其驻在藏中。

第五款：关于"内藏"方面，凡西藏中央政府在拉萨之现有权利，其中如监察大多数寺院、任命地方长官之类，仍应照旧保有，但中国方面却具有派遣军队或官吏到该地，以及在该地建设殖民地之权。（西藏国务总理曾向余言曰：在"内藏"方面，最良之人势将获得胜利。我们政府必须派遣诚实可靠之人前往该地；征税宜轻，并使该地居民之尚武精神保持不坠云云。）

第六款：恢复中国驻扎拉萨之驻藏大臣。其护兵之数，不得超过三百人。

第七款：大不列颠国驻藏商务委员之护兵，其数不得超过拉萨所驻中国护兵人数的

① 译文略。

四分之三。

第八款：大不列颠驻扎江孜之商务委员，如遇在江孜地方不能了结之事件，得有前往拉萨将其办理之权。

附：与邵循正[①]君书（附邵君答函）

循正先生大鉴：读七月十八日《大公报文学副刊》内先生批评拙译《西藏外交文件》一文，不胜感佩与惭愧。以乾隆御制《十全武功记》如此不朽之名作，仆竟未能于藏文英文辗转翻译全异本来面目之后，立即将其察出，其为"译学界空前之大笑话"，殆毫无疑义，将来该书如有再版机会之时，仆当商诸书局方面，将《十全武功记》原文刊入，并志先生指示之厚意。但拙译之文，仍将令其继续保存，毫不删改。一则用以纪念鄙人孤陋寡闻之过；二则用以证明一国文字，若经再三转译之后，将与原文面目相差至何等地步，倘非积学如先生，殆难令人察出；三则由此可以看出该篇汉文意义，在藏人英人眼中，系作何种解释，亦为极有兴趣之问题。

仆之专业，系在研究音乐历史，惟以国命危殆之故，间亦拨冗翻译外交史料七种，以供国人参考，如《瓦德西拳乱笔记》、《李鸿章游俄纪事》、《库伦条约之始末》、《美国与满洲问题》之类。其取材系以当时直接参与该役者之著述为限。Bell 为英国之"西藏通"，现在藏中一切纠葛，均与此君具有若干关系，仆之译此，原欲借此引起国人对于西藏问题之注意。又仆所译各书，皆系通俗性质，固非先生所谓"伟业"。因此之故，"根本可以不译"之文件，竟翻译之；"根本可以不作"之导言，竟编著之。其意无非为先生以外其他对于藏事素无研究之人而作也。而且译述之时，系在柏林国立图书馆中，案上堆积新旧《唐书》、西藏专著以及西文著作数种，占地甚多，业已逾出馆规之外；自非如国内编著之能多得材料，详细斟酌者可比。更加以当时个人处于经济万分压迫之下（仆留德已逾十二年，未受任何国家、私人、家庭之资助，全恃卖文为活，至今未尝废学一日，亦未尝负人一钱），健康十分受损之际（终日头痛。十余年来，著译书籍三十余种，以及中外报纸杂志论文一二百篇，多系一手按着头部痛处，一手执笔为文所

---

① 邵循正（1909-1973）：字心恒，福建福州人。1930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1934 年赴欧洲留学，先后在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德国柏林大学研究蒙古史。1945 年，应聘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教授。1946 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持编辑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的《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著作主要有《中法越南交涉始末》、《邵循正历史论文集》等。

成。直至去年宿疾齐发，卧床数月不起，现在始告痊愈），疏误之处，势所难免，但望国内读者时加指正而已。仆生平为人，最喜“笨干”。近又不自量力，为中华书局编译“国防丛书”，业已译就军事书籍数种。此种不度德不量力之“勇气”，势将更使先生“齿冷”。虽然，仆宁愿饱受他人齿冷之辱，而不愿自己陷于血冷之境也。国难方殷，尚希为国珍重！专此，即颂著祺。

弟王光祈上言 八月三十一日，柏林。一九三一

光祈先生史席：曩读尊著《西藏外交文件》，颇感失望，因为文评之，并正书中笔误数事。仆非好为诋诃掎摭也，亦以责备贤者，古人之义，而国内读先生书者众，微末之疏，影响或巨；又际西防紧急之时，借此提倡研究，亦一道耳。先生著作甚富，脍炙人口，瑕不匿瑜，疵不掩醇，“文副”[①] 编者谓，先生学行之笃，远非时辈所及，仆聆之神往。今读惠简，不以寻疵见责，反以积学相誉，愈见虚怀雅量，使仆感怍无似！闻先生在德政治、乐律甚精；中华人民造国逾二十年，即国歌尚未备；扬民族之元气，振华夏之天声，此仆之所谓伟业也。若能更以余力，时就欧陆新出外交材料，钩玄提要，以利国内学子探讨，则国人受惠实多。仆何人，尚敢不自揣度，妄加齿冷乎？国内出版界风气日以漓坏，坊间触目者，十九为投机作品，摽窃割裂、数典忘祖者，更仆难详。先生旅外久，恐不知此情状耳。仆为文评尊著时，适有所感于中，快意发之，遂不觉词气之间，多所触犯，尚希鉴宥！来函谓尊著再版时，当并录《十全记》原文以资参照，不弃刍荛，甚感！惟书中所载“藏华两国甥舅联盟碑”，先生误以为唐德宗建中四年清水联盟遗迹，其实系穆宗长庆元年唐蕃会盟碑也。碑之原文见《大清一统志·西藏记》，文有缪氏艺风堂拓本甚精，陈寅恪先生曾据以考定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正两《唐书》之误，谓此“逻逤片石，实为乌斯赤岭之大玉天球”。推重若此，此治中古国史者所宜亟知者也。英人贝尔之误，先生已指出之；先生之疏，实沿《卫藏图识》数语之失。惟国内近日关于西藏之应时著作，沿先生下而一误再误者，以仆所知，已不少其人。尊著再版时，愿急为改正。又先生所译《库伦条约之始末》中（四三页），译 Chung Ying 名误，当作“钟颖”。此亦关于西藏者，附以奉告。编译“国防丛书”，亦当务之急，何日脱稿，先读为快。深望为学珍重，敬候起居不一！

弟邵循正顿首　九月二十七日，北平。

（天津《大公报》）

① “文副”：指《大公报文学副刊》

库伦条约之始末

题记：1911年初，在沙俄的策动下，库伦的政治局势日益动荡。外蒙古的分离主义者挑动各部抵制清政府在外蒙古境内推行的军事和行政改革活动。12月，外蒙的活佛和王公在沙皇俄国策划和支持下宣告“独立”，驱逐中国官员，组成亲沙俄的傀儡政府。1912年11月，沙俄与外蒙古签订《库伦条约》（即《俄蒙协定》和《商务专约》），对外未称外蒙独立而名之曰“自治”，“俄国政府扶助蒙古政府现已成立之自治组织，以及蒙古自行编练国民军之权利”，同时，“不许华军开入蒙境”，而沙俄则取得了在蒙“自由居住移动”、经商、货运、开设银行、“租赁地段或购买地段”等种种特权。

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作为沙俄政府全权代表，奉命自圣彼得堡出发，秘密前往库伦，全程参与并主持和外蒙政府的接洽，并最终亲手订成《库伦条约》。他在后来撰写的《从成吉斯汗到苏维埃共和国》一书中，详尽地记载了当年前往库伦谈判签约的经过情形。王光祈将该书德文版之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八诸篇翻译成中文，取名《库伦条约之始末》。

本书于1930年11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32年9月曾再版一次。

目　次

（二）彼等反对中国宗主权，而且要求全蒙独立

（三）反对派之大喇嘛，以及会议中断情形

（四）圣彼得堡方面拒绝蒙古要求条件

（五）蒙古王公所据之理由，但圣彼得堡方面仍继续拒绝蒙古要求

（六）中国设法阻止俄蒙结约

（七）英国议会中之质问

（八）俄蒙条约及通商章程之签字

译者序言

此书系译自欧战前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Korostovetz）所著《从成吉斯汗到苏维埃共和国》（Von Cinggis Khan zur Sowjetrepublik）一书中之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八诸篇，关于俄蒙缔结库伦条约[①]一事，故名之为《库伦条约之始末》。

廓索维慈于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之间，曾任俄国驻扎旅顺司令官 Alexejew 之外交秘书长，并其后与中国官厅谈判关于庚子拳变以后俄军占据南满之事，一九〇五年更被任为俄日和会中俄国全权代表维得（Witte）之秘书。自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二年，则为俄国驻华公使。该氏系于一九一一年冬季回国，其时外蒙方面适有宣布独立之事。于是，俄国外部乃以该氏担任与蒙订约之责，并于一九一二年九月，由圣彼得堡出发，秘密前往库伦，与外蒙政府接洽。其结果遂于是年（即民国元年）十一月三日，订成《库伦条约》。

《从成吉斯汗到苏维埃共和国》一书，系用德文著成，于一九二六年在柏林出版。著者既系手订库伦条约之人，故对于此事经过，言之甚详。该书本有全译之价值，但余翻译此书，系在课余为之，故只能译出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八诸篇。而且在第十五、第十六两篇之中，并将无关该约之数节，略去未译，以免本书篇幅，过于冗长。

又本书译名，多采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一书所用之译名。

---

① 库伦条约：即 1912 年沙俄与外蒙傀儡当局非法签订的《俄蒙协约》及附属《通商章程》。

外蒙问题，至今为中俄两国间主要纠纷之所在。推原祸始，实以库伦条约一役为起点。凡留心蒙古问题者，对于此种最有关系之史料，万不可漠然置之也。

中华民国十九年五月十九日，王光祈序于柏林国立图书馆

第一篇　库伦革命与外蒙宣布独立

（原书系第十二篇）

内容：（一）蒙古问题之发生。（二）蒙古派遣代表到圣彼得堡，请求助彼抵抗中国。（三）余与中国迪克推多袁世凯之谈话。（四）关于蒙古事件之俄国方面报告。

当一九一一年中国发生革命之际，外蒙东部（或称喀尔喀）[1] 与中国其他各地一样，同时宣告独立。至于蒙人脱离中国之理由，则以满洲皇室既已覆亡，藩属关系亦当然因而解除为根据。其实，中国革命一事，不过仅为库伦独立之一种导火线而已。盖此种独立之酝酿，实自北京政府蓄意兼并喀尔喀以来，即已早趋成熟故也。华人之欲削剥蒙人自由，吞并蒙古地方，固图谋已久，不自今始。（北京政府）为达此项目的起见，尝于一八八〇年之顷，开始在东蒙方面实行“将王公领域夷为殖民地”之政策。该政府利用大部分旗人负债中国银行商号之机会，遂将蒙人土地分给中国该处移民。盖当时旗人向中国银行商号借款，皆以自己土地为其抵押故也。华人并在居有中国移民之地，组织中国管理机关。其后，此项地方遂渐渐变成中国政府领土。

此种政策，初行之于内蒙东部，旋即用之于喀尔喀方面。同时，并沿着通达库伦之主要邮道一带，以及与俄疆域接壤之地，实施殖民手段。当二十世纪开始之际，（华人方面）遂决将吞并喀尔喀一举，加速进行。并使治蒙事权，集中统一。派驻蒙古之中国戍兵，亦特别增加。又规定该地蒙人皆有学习华语之义务。此外，华人更在该处开办一个银行，一家报馆鼓吹蒙古应行完全合并中国云云。在此种北京宣传影响之下，于是蒙

[1] 喀尔喀：初见于明代，为蒙古六万户之一，共十二部，其中内喀尔喀五部，外喀尔喀七部。内五部清初居住于兴安岭东南，编为巴林、札鲁特、敖汉、奈曼等四部五旗，属内札萨克（内蒙古）。外七部清初并为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三部，雍正三年（1725 年）又从土谢图汗部分出赛因诺颜汗部，共成四部（八十六旗），属外札萨克，仍袭用喀尔喀蒙古称呼。

古王公 Karacin 与其他几位业已变成华人之内蒙古王公，特向北京政府呈递愿书，自行请将地方政权，交与中国一位特派督臣，并以齐齐哈尔为该督臣驻节之所云云。其在北京政府方面，又复竭力利用报纸之助，以使社会舆论受其影响。其实，社会舆论方面，虽无政府此种鼓动，亦早已自愿对于促进华人在蒙势力之必要情形，加以宣传鼓吹；并尝引举俄国种种侵略计划以耸观听。略谓俄国久在该地煽动蒙古脱离中国，既以军火供给蒙人，又派俄军前往该处云云。此外，关于俄人在蒙阴谋之消息，外国报纸，尤其是德国、日本报纸，亦多记载及之。该报等尝将俄国吞并蒙古之鬼祟行动，加以刻意描写。

至于俄国方面，对于帮助喀尔喀独立自治一事，并非始终坚决。直到后来，俄国几次设法与华妥协皆遭失败之后，始下决心为之。中俄两国会商改正一八八一年圣彼得堡条约（译者按，即同治七年伊犁条约）一事，既无丝毫结果，于是遂使俄国发生直接与蒙交涉或可度出难关之想。并采用最简便之手段，以保持俄国在蒙之既得权利。其时，外间颇有一种流言，所谓俄国政府意欲利用中国革命机会，直将蒙古据为己有云云。实属一种无稽之谈。吾人只举下列一例，便可为之证明。即谈判蒙古问题一事，系在一九一一年春季开始，换言之，其时尚在中国革命之前也。当时俄国要求中国者，为保持外蒙现制，减少中国驻军，缩小移民范围诸事。而中国政府方面，则以俄国此项条陈，有关中国内政为理由，直将俄国要求断然加以拒绝。

办事大臣三多，为中国驻在库伦之代表，同时并为主张同化政策一派之领袖。彼因采用严厉手段以及粗野态度对待活佛之故，曾引起蒙古王公喇嘛方面之仇怨。于是，蒙人不满中国之心，渐渐增长。其表现于外者，最初之时，或在街上示威，或在各处暴动。其在华人方面，则又积极预备抵抗之法。假如中国在蒙军力一旦充足之际，其势必将采用最严厉之手段，以对付蒙人。此固毫无疑义，十分明了者也。从一九〇八年起，中国方面即在库伦开始建筑营房，以为安置华军之所。

蒙古王公既恐双方势将发生冲突，于是，遂在活佛主席之下，开一秘密会议，决定向俄求援。会议之结果，乃于一九一一年岁初，派一代表团前往圣彼得堡。其团员为素抱俄蒙亲善主义之杭达多尔济亲王与活佛之金库员司车林齐密特（Cering Cimet），以及大喇嘛 Da Lama 内蒙人员 Haisan 等等。在圣彼得堡方面，最初颇不愿接待该代表团，因恐由此惹起中国误会故也。其后，乃向北京（俄使）征询对于此种蒙古代表（应否接待）之意见，于是俄使答以应该接待，并引从前俄国既尝赞助蒙人要求，且负有若干精神上之（援助）责任为言。

当蒙古代表团既抵圣彼得堡之后，乃向俄国政府请求赞助蒙古独立之举，并愿以“承认俄国保护”为交换条件。至于蒙人具体希望，则集中于财政上、军事上加以援助两层。换言之，即希望俄国借与款项，供给军械是也。（俄国）外部方面，对于局面

（忽而）如此转变之举，显然未曾料及。于是，乃向该代表团指陈对华断绝政治关系之危，并劝彼等应与北京方面谋一妥协之道。此外，又与该代表团相约，俄国当代向中国政府进言，并运动该政府将预定之对蒙计划加以取消云云。当时，俄国政府曾暂行议决，供给少数军械与蒙，以作自卫之用。并将库伦俄国领署卫队，加至二百人。当蒙古代表团离开俄国之际，不免有点失望。初时，彼等竟自不敢决定再回库伦，因彼等甚惧华人报复故也。至于北京方面对于蒙古联俄行动，当然十分不满。向使俄国不代该代表团力为说项，则彼等之旅行，势将感着无限困难无疑。

蒙古代表团之到圣彼得堡也，虽曾留下若干印象，但俄国外交界方面，即仍望中蒙纠葛一事，可由俄国之好意调停，得以和平解决。因此之故，钦命驻京俄使乃得（本国政府）训令，将俄国前次所提外蒙事件条陈，（再向中国政府）提出。其时，余适任驻京俄使之职，必须依照此项意旨，一与中国外长相商。（因此），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八日，余致中国外务部公文之中，曾言：俄国对于中国在蒙所采手段，不能淡然置之。盖此项手段，有危蒙古地方现状，摇动邻居友好关系故也云云。（此外），余并提出建议，主张彼此共同协商此事。其后，（中国）外务部回文之中，乃言中国在蒙所采手段，实未妨害俄国利益。并尝饬令库伦方面中国办事大臣，勿用压迫方法云云。所谓“外务部”者，是即后来中华民国改称“外交部”之北京外务衙门是也。余与外务部部员胡惟德爵士，对于此项问题，曾有一度谈话。彼言：北京政府以为将俄国所提条陈加以谈判一事，实属不可能。因此项条陈，无异干涉中国内政故也。但为愿全两国友谊起见，北京政府愿将库伦华军数目，加以减缩。而且对于改良蒙政及移民计划两端，暂时不再进行云云。换言之，即是对于我们调停之举，根本加以拒绝。圣彼得堡方面对于此项回答，认为不能满意。因欲压迫华人再行让步之故，俄国方面乃向蒙人宣言，彼等之独立自治运动，当可获得俄国助力云云。

其时北京之注意点，虽为中国革命运动扩大一事所引去，但中国政府对于蒙古事件之留心，却仍继续不已，并积极预备完全合并喀尔喀一事。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因为武昌革命事起之故，于是遂将现被放逐之袁世凯召还（北京）。摄政醇亲王[①]为上行皇帝光绪之兄弟，现在乃命袁氏解决此项难关，担任组织内阁，并授以一种几乎类似迪克推多之全权。袁氏因欲探知各国对于中国时局之态度。此外，如为情势所许，彼尚欲获得各国助力，（以解决中国时局）。以此之故，袁氏到京之后，立即遍访各国公使，余亦其中之一。当彼与余谈及现时交涉事件之际，乃谓余曰，彼甚望满洲事件，能够加以解

---

① 醇亲王：即载沣（1883—1951），满族，爱新觉罗氏。封为醇亲王。宣统帝父。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任摄政王。罢免袁世凯，将军政大权集中于皇族集团，任用大买办盛宣怀，出卖路权，大借外债。1911年成立皇族内阁，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10月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先后宣布独立。次年2月，被迫承认清帝退位。

决。彼并引蒙古扰乱之事为言，希望俄国因对华友谊之故，幸勿赞助该地混乱局面云云。余遂答曰：俄国在北蒙方面，据有政治经济利害关系，并与该地有历史渊源。因此，对于该地之运命，不能淡然漠视。但我们所希望者，仅仅限于维持该地现状，节限中国移民，减缩中国驻军，诸事而已云云。于是，袁世凯乃反驳曰：蒙古者，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也。中国对于该地，当然具有依照己意将其办理之权。但是假如俄国所提条件，果有接受之可能，彼（指袁氏而言）当进言（中国）政府，将其接受。

关于中国革命一事，（袁氏亦复谈及）。彼谓，彼将采用一切手段，以保护帝制。盖此种政体，与中国历史实有密切关系，并与中国现刻进化程度，甚为相合。至于彼之个人，只算当今皇室之一位仆役。彼将应用全力，以助当今合法皇帝，以保现在大清皇室。据彼之意见，共和政体，在华万无存在之理由。此种政体，在中华民族之中，未尝具有根基，而且全与中国国民思路不合。彼对于中国将来或成南北分裂局面，或成完全瓦解现象两事，绝对否认。盖如此则将与种族、语言、宗教素来相同之各省、各区利益，全不相符故也。现在各省分裂一事，不过一种暂时现象而已。此种现象仅系地方局部情形所造成，将来甚易加以协商解决者。彼对于唐绍仪①以及其他政治领袖人物主张中国有改成共和政体之必要一事，甚不赞成。彼谓此种主张趋势，乃系由于外人势力使然。

袁世凯方面虽然表示愿将蒙古问题设法加以解决，但中国部臣方面，却将谈判之举故意迁宕，一直延至蒙古已在活佛领袖之下宣言独立之际。此项宣布独立之事，系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举行。其结果，尽将中国官厅逐出库伦以外。于是，中国官吏及其护兵，相率逃避于俄国领署之内。其后，更由俄国方面保护彼等取道赤塔回华。此种库伦新政府，系由一般最老 Aimak 王公（译者按，Aimak 系族名）所组织。内阁总理为牙萨克图可汗（?）（Jasaktu Khan），内务总长为大喇嘛（Da Lama），外交总长为杭达多尔济亲王，即一九一一年岁首曾充任代表前往俄国者也。但牙萨克图可汗担任内阁总理不久，即行去职，因彼对于中国表示同情故也。据云，其后彼为人所毒死。继彼长阁者，为一位年事甚少之三音诺颜可汗②（Sain Noyan Khan）。当余逗留库伦之时，彼犹担任斯席未去也。

北京方面得到库伦独立消息，不胜愤怒之至。群谓此事，乃系俄国从中作祟云云。初时，中国政府方面，对于此事，认为不甚重要。大约系希望蒙古此种热烈爱国运动，

① 唐绍仪（1860—1938）：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字少川，因避清帝溥仪讳，曾改名绍怡，辛亥革命后，恢复原名。曾留美，历任清政府天津海关道、外务部侍郎、署邮传部尚书、铁路总公司督办、奉天巡抚、赴美专使等。辛亥革命时，代表袁世凯参加南北议和，1912 年 3 月任国务总理。1938 年在上海被刺死。

② 三音诺颜：外蒙古旧部名，即赛音诺颜汗部。清雍正三年（1725 年）分土谢图汗部西境置，乾隆中加汗号，为喀尔喀四部之一。所部二十四旗，会盟于齐齐尔里克。

可以渐渐冷淡下去。蒙人方面当不至于竟与中国为最后之决裂。吾人对于华人此种乐观情形，可于下举一例见之。当一九一二年二月之际，换言之，其时华人失去北蒙势力者，差不多已有三月之久。而南京新共和政府[①]仿佛对于库伦独立一事，尚未有所尽悉，乃对于北蒙方面发出一种檄文，通告清室颠覆，由汉、满、蒙、回、藏五族，创建共和之举。至于蒙古宣言独立一事，南京政府却丝毫置之不理。于是，库伦方面遂以实行征收华货入口税一举，为表示报复南京此项民国檄文之道。

华人方面为搜求此事祸魁起见，于是，一般报纸无不开始攻击俄国。并谓俄人暗中帮助蒙古作乱，更借口调停美名，以使蒙古脱离中国云云。其后，圣彼得堡方面遂发表一篇俄国对蒙政策之官式报告，以为答复中国报章攻击之举。

当时俄国政界方面，对于蒙古问题，虽然认为不甚重要，因而兴趣亦复不甚浓厚，但十二月二十六日之政府宣言，却曾使彼等得着若干印象。于是，报纸之上，尝有讨论蒙古问题之论文，并主张俄国对于蒙古事变，不应袖手旁观。关于中国合并蒙古之举，不应安然听之云云。同时，我们国中学者，对于蒙古问题，亦复细心加以研究。素负盛名之著作家 Uchtomski 侯爵，曾致皇上一函，实开此次讨论蒙古问题之先河。该侯爵建议，派遣一位特别亲信之人，前往蒙古谈判，并设法赢得蒙人对于“白种皇帝”之同情。此外，该侯爵又言，我们领事所具之威望，不足以当此重任。因而彼乃推荐现正担任华人职务之俄人 Croth 男爵，堪任斯职。此君从前曾任蒙古金矿公司总理，并为华俄银行催索蒙人欠款，采用严厉手段，尝使蒙人群起而攻，集矢于彼。换言之，彼实不堪担任此种和平使者之重责。至于 Uchtomski 侯爵本人，则尝一度充任驻华特别专使之职。并于一八九六年前往库伦，代献俄皇奉送活佛之礼物。但彼对于此项使命，却未尝完成而去。盖彼对于谒见活佛一事，不愿依照蒙古礼仪，因而旋即启程离去，未曾一见活佛故也。

Uchtomski 侯爵之条陈，虽然未尝发生效果，但此举似乎对于皇上，终竟留下几分印象。当（俄国）外交大臣萨善诺夫（Sasonow）（其次）奏陈皇上之时，曾建议俄国对于蒙古时局，应采冷静观察态度云云。而皇上乃于札面加一朱批曰：“冷静观察，但不要因此竟将机会错过。”

上述（俄国）政府关于蒙古事件之宣言，在日本方面，亦复引起若干注意。东京政府曾用极恭敬之态度，一请圣彼得堡勿忘一九〇七年及一九〇九年之条约。（原注：即系关于满蒙势力范围者。按一九〇七年之日俄条约，曾于一九〇九年及一九一二年加以补充，其内容系划分俄日两国在满之势力范围。其中有云：俄国对于内蒙方面，未有利

① 南京新共和政府：即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

害关系。但同时却望日本，亦不干涉外蒙事件云云，其势力范围界线，系以经度一百一十八为准。）并请详细确定俄国所谓“蒙古”这个名词，其含义究竟如何云云。其后，俄国遂答日本，略谓俄国对于该名词之含义，其解释当一如日俄条约中所引用所声明者。而且对于此种解释，决计照旧保持云云。（未几），日本驻俄大使 Motono 男爵，复向我们外交大臣发表若干关于满蒙问题之意见，并谓日俄两国在上述区域内之实际地位，殊有从速确定之必要云云。但日使此种暗示，却未获得（俄国外相）萨善诺夫 Sasonow 之注意。该外相只言俄国对于远东方面之和平，甚望其能够继续保持。尤其是因为巴尔干形势不稳之故，俄国对于历来所抱（远东和平）政策，不愿加以放弃云云。于是，（日使）Motono 男爵遂谓，假如俄日两国合作，以致与华发生冲突之时，则俄国驻扎 Irkutsk 及 Primorsk 两区之兵力，实足以勒令中国回到理性行动云云。

上文曾言，蒙古宣言独立一事，在圣彼得堡官界方面，并未获得何种回响。俄国政府深知，此事将使俄华关系趋于紧张之途。而且亦不相信，蒙古能在活佛之下，建立一个国家。此外，俄国政府并惧此种新设之蒙古政府，当然十分缺乏款项，势将转求俄国相助。此实与当时（俄国）首相 Kokowzew 所抱减政主义，殊属不合者也。就大体而论，俄国实希望中国照旧保有在蒙主权，并未期盼蒙古竟与中国脱离政治关系。但是，俄国官界对于库伦情形，虽然抱了几许怀疑态度，而俄国陆部却于其间制成一种规模宏大之计划，即组织蒙古军队，由俄国军官加以指导是也。并拟派遣军事教官团一批，由上校 Popow 带其前往。此外，更于春间，先派骑兵大尉范西礼夫（Wassiljew）及哥萨克下级军官数位，前往库伦。并同时寄去由 Irkutsk 兵工厂所造之旧式 Berdan 枪数百支，以为此举之先声。

其时喀尔喀方面，东西两 Aimak（族名）之间，开始发生权限之争。即在库伦一隅，亦复党派纷歧。当蒙古实行驱逐华人宣布独立，以及华人大施抢劫之际，曾使一般蒙人情感一时十分热烈。但继此热烈情感之后，反动势所难免；对于前途命运，亦复顿然怀疑。亲华一派，就人数而论，就历史遗传而论，皆极强盛。彼等虽暂时退在旁边，却未尝一刻忘怀政争。至于蒙古独立以后所组成之亲俄派，又因为时未久，实力不充。诚然，活佛及其妻室均属于亲俄一派，但蒙古王公及喇嘛等等，却皆保持一种观望态度。此外，只有几位具有觉悟之蒙人，系赞成组织一种半独立区，由华俄两方共同保护。

一九一二年正月，Barga（在 Chinesisch-Hulun-Buir 之内，为满洲之一部）亦复依照喀尔喀之例，宣布独立。Barga 居民对于中国所采之吞没疆境土地手段，以及该国从一九〇六年起所施行之殖民政策，久已不满。中国为实行此种政策手段起见，曾任命

Taotai（道台[①]?），并派遣军队前往。Barga 人民因恐丧失独立之故，尝对此事提出抗议。Barga 人民曾于一九一一年九月，召集国民会议。该会议要求中国撤退军队，停止殖民，并将行政事宜，交与 Barga 人民手中云云。因此，双方发生冲突。其结果，该地人民实行驱逐华官华军出境，并向俄国求援，更与库伦方面设法开始谈判。俄国政府因为 Barga 一地接壤中东路线关系甚为重大之故，于是对于此次双方冲突之举，认为实有出来加以干涉之必要。并向中国方面表示，自愿担任调停之意。其后，俄国公使遂与中国外部开始谈判。并于一九一五年十月，签定 Barga 一约，始告了结。依照该约，则 Barga（Hulun-Buir）合组一独立自治区，而立于中国中央政府之下；由中国置一副都统以治理之，其权与五旗统领（换言之，即是由五旗公选之统领）相等。并置乡军以维持本地治安。但中国方面得有派兵前往该地之权，不过须先期通知俄国方面而已。所有该地一切税收，均须用之于本地事业。惟"盐业专卖"之税捐，则须缴与中国国库。所有该地中国居民与 Barga 居民，均一律享有平等权利。但关于"中国移民事件"，必须先得本地官厅允准方可。至于建筑铁路一事，则当以中国政府批准为前提。（原书注：Barga-Hulun-Buir 为黑龙江省之一部，在 Hing-an 山之西。其地居民为 Burjāten 人及 Öleten 人，系由通古斯族[②] Dauren、Solonen、Orotschonen 等等所混合而成者。其区域系分为"新 Barga"及"旧 Barga"两种。前者为八个旗 Hosun〔旗名〕所组成，后者为九个 Hosun 所组成。在清代，此项 Hosun 系按照"旗营"之例所编制。换言之，每旗之中，各置一位 Uherit 以领之；每两个 Hosun 则共置一位 Golda 以领之。至于每个 Hosun 之中，复分为 Somun 等等小部分；每三个 Somun，则由一位 Hosun Janggin 统率。）

当蒙人于库伦宣布独立，将彼等宗教首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③]戴为可汗之先，曾向俄国方面请求赞助。当时俄国帝国政府于回答蒙人之际，尝劝以和平从事，宜与中国设法妥协，订结一约云云。俄国驻库领事，更百计从中调停，以阻止张家口、赤塔间电线之破坏，与夫库伦大清银行支店之抢劫，而且力助中国大臣三多取道俄国以离蒙境。

未几，北京政府所任命之对蒙交涉委员桂芬，遂向俄国驻京公使询问，该使是否愿意

---

① 道台：官名，亦称道员。初设于明朝。清乾隆十八年（1753），废参政、参议、副使等官衔，专置分守道主管一省内若干府县政务，分巡道主管全省提学、屯田等专门事务，守、巡诸道多加兵备衔，长官皆称道员，俗称道台，尊称观察。

② 通古斯族：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的鄂温克族，在新中国成立前被称为"通古斯"，1957 年恢复鄂温克族的称呼。在西方和日本，有些人对操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人，泛称为通古斯人。

③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喀尔喀蒙古最大的活佛和封建主。第一世生于 1635 年，为喀尔喀部土谢图汗滚布多尔吉之子。1691 年由于准噶尔部的进攻，喀尔喀部在他的坚持下归顺了清朝，以后各世哲布尊丹巴均受清王朝册封，在外蒙古进行统治。1911 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在沙俄怂恿下宣布"独立"，自称"大蒙古皇帝"。1921 年，外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政权，以他为立宪君主。1924 年病逝，"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从此废除。

出任“友谊调停”之举。同时，蒙人方面亦复请求俄国政府出来调解蒙华两方争执之事。

俄国政府对于华蒙两方请求，欣然应允。但俄国政府之意，却以为中国方面如不承认蒙人照旧保存自治政府，则华蒙妥协一事，势难成立。而且俄国政府相信，或者终可寻得一种方式，以使蒙人关于中国抛弃干涉蒙古自治政府一事，得一确实保障。盖蒙人方面，尝视中国政府在蒙所采三种政策：（甲）设置中国官厅，（乙）驻防中国军队，（丙）移殖大批华人，为存心干涉蒙事故也。

因此之故，俄国政府于答复北京政府代表桂芬之时，曾将上述三点特别提出，谓为华蒙条约中亟应解决之三种重要问题。

但俄国政府却深知，如果欲使蒙人心安，则对于蒙人方面，不可不令其彻底了解者，即蒙古境内举凡一切有关该地进化之施设，无论俄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皆将与以赞助是也。而且俄华之间，对于蒙古问题，彼此毫无隔阂可言。

盖俄国政府之意，以为俄国如能力助蒙古实行一切有关政治经济之施设，则此举无论对于俄国方面、中国方面或蒙古方面，均极有益。

俄国政府之应允出任调停，实以上述各种条件为前提。因此之故，俄国驻京公使，乃将上述各种条件，通知中国政府，并附言曰：倘若能在上述各种条件之下，恢复华蒙关系，则俄使自愿努力游说蒙人，令其勿与中国断绝，履行一切义务。至于中国政府之有无诚意，则视中国方面接受或拒绝俄国此种调停条件为转移。俄国殊不愿干涉中国内争之事，而且毫无侵略蒙古之心。但俄国对于西比利亚邻境秩序恢复一事，却甚为注意。因该境之内，俄国颇有商业利益故也。是以俄国方面甚不希望华蒙两方发生军事冲突之事，以危俄国利益。因此之故，俄国帝国政府乃不避困难，允任调停之责。而在他方面，俄国因在蒙境具有重大利害关系之故，对于蒙古方面现在事实上之政府，又不能强作聋盲，谓为不知。倘若蒙古脱离中国之举，果成事实，则俄国政府虽有尽力调停华蒙争执之诚意，然为情势所迫，将来终不能不与蒙古政府设法保持外交关系。

第二篇　外蒙过渡期间俄国对华之外交

（原书系第十三篇）

内容：（一）俄国外长对于蒙古局势之意见。（二）一八八一年圣彼得堡条约（即同治

七年[①]伊犁条约）之修改。（三）决定承认外蒙自治。（四）俄国外交人员意见之不定。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余从北京初抵圣彼得堡之后，即向当时（俄国）外长萨善诺夫（Sasonow）氏报告蒙古事件。该外长曾向余问曰："蒙古实行自治，以及获得中国承认之事，须如何始能办到?"余乃答之曰："吾人应该坚持从前所提条件，换言之，即是维持蒙古现状，禁止华军入境，阻止中国移民，要求中国承认蒙古自治是也。"该外长遂言："此项条件既已为华方拒绝，现在照旧坚持，实属无益。而且蒙人对于实行自治一事，现在尚无此项能力，不过是替我们煮了一碗好汤，叫我们慢慢哽咽而已。换言之，我们对于蒙古势必从此担任保护之责，或者甚至于非将外蒙加以合并不可。"于是，余复答之曰："余亦反对合并。盖俄国现在对于西比利亚一带，业已不能措置裕如，何能再行合并外蒙？如此冒险办去，只能促成俄华交恶而已。其结果更将使我们财政支出大为增加，而吾国在欧之地位，亦恐从此衰弱焉。"

因为叙谈蒙古事件之故，该外长旋又提及 Uriyanghai（乌梁海?）问题。彼谓："（俄国）军阀逼着政府合并乌梁海[②]一事，实属错误。如果合并，其势将使吾人对于重要问题（译者按：系指巴尔干问题）之注意力，反而减少。俄国之重要利益，系在巴尔干半岛及土耳其海峡，而不在 yenissei 与 Schwarzen Irtysch 地方。俄国必须成为一个'欧洲强国'，不应成为一个'亚洲强国'云云。"该外长继又言曰："诚然，该地从前尝为俄国之属国，但现在吾人却缺乏理由再将划界问题从新提起。盖此项划界问题，固已于一七二一[③]年（即雍正五年）《恰克图条约》[④]，加以解决者也。该约之内，曾规定以 Sayan 山脉一带为界。"（原书注：乌梁海属于蒙古西部，与俄国 Irkutsk Tomsk，Jenisseisk 各地为邻。）

余遂再向该外长言曰："俄国如向蒙古方面扩张势力，实无引他国疑虑不安之虞。甚至于我们旧敌（英国）在该地之内，亦无'不列颠帝国利益'可言。至于日本方面，则因（从前俄国外长）Iswolski 曾将'势力范围'明白划分之故，亦当不致发生何种冲突。"

但余此种陈述，殊未获得该外长之赞许。彼称余此种说法为"巧辩"，殊不足为

① 同治七年：应有误。《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于光绪七年（1881）。

② 乌梁海：亦作兀良哈，明时居河北省长城外，即蒙古东部地方，为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后徙外蒙古西北部，其种为突厥族，语言风俗则似喀尔喀人，自称东巴，居唐努山、阿尔泰山之间，分为三部分，一曰唐努乌梁海，二曰阿尔泰乌梁海，三曰阿尔泰诺尔乌梁海。

③ 一：应为"七"字之误。

④《恰克图条约》：中俄两国政府于清雍正六年（1728）签订。条约规定了中俄在蒙古北部边界（中段边界）以及政治、经济、宗教等诸方面的相互关系。

“冒险政策”之辩护云云。

余继而又谓该外长曰：“划界问题，现在固已从新提起；而且华人方面对于此事，固已自行着手研究。盖余前此与北京外务部谈判之际，曾有机会，得悉彼等现正注意此事故也。倘此项问题长此迁延下去，则在该处以租地及采金为业之俄人，从前既已备受该处官厅压迫者，现在更将愈趋愈下，以至于无法生存。因此之故，在此项问题未根本解决之前，似宜在该地之内，组织一种‘俄华行政委员会’，或者直由俄国派一‘领事’，或派一‘边界委员’，亦无不可云云。”该外长闻余此语之后，只答以：“如此办去，将使此事范围过于扩大；现在最好是对于划界问题，暂行不要提起。”

一九一二年正月，余与该外长又复谈到此项问题。按其时中国方面业已宣布共和政体。此次谈话，却是该外长自己先行开口，提及承认蒙古自治问题及乌梁海划界问题两事，并谓不久将向北京方面有所提议，现在已将训令寄与吾国驻华公使 Schtschekin 云云。

此外，余亦尝有机会，得与内阁总理 Kokowzew 氏接谈。该氏从前曾到远东游历。余以为该氏或能了解远东事件之重要，能使吾国得益。当该氏向余询及华蒙局面之际，余遂将从前曾向外长萨善诺夫（Sasonow）陈述之言，再向该氏缕述一遍。并言中国内部，恐非一时所能和平统一，外蒙若能变成一种“缓冲国”，实极有益。吾人宜先从承认喀尔喀自治入手。并通知华人方面，我们拟将一八八一年圣彼得堡条约（译者按：即同治七年[①]伊犁条约）满期后再行延长十年之意云云。

此项（伊犁）条约系到一九一一年满期。年前因应中国请求之故，乃由俄华两方派员会商改约之事。俄国方面愿将该约延长十年，但以中国承认下列几个要求为先决条件，即扩大俄国在蒙商业之范围，取消西比利亚沿边五十俄里之自由地带（原注：在此地带之内，俄人、华人、蒙人皆得自由经商，不纳关税），添设几个俄国领事之类是也。而华人方面，则坚持另订新约之议。并主张取消俄国在蒙一切优先权利，尤其是免纳关税、自由营商之权。中国政府方面为预备此种过渡手续起见，尝于一九一〇年对于俄国在华西一带之商业，勒收关税；并违犯条约，加以种种限制。其结果，遂使俄华关系特别紧张。最后，乃由吾国驻华公使提出最后通牒。于是，华人方面不得不加以让步。一场争执，始告终结。至于改约一事，则在圣彼得堡方面，继续向前谈判。担任此项谈判者，在华方则为陆征祥[②]；在俄方则为 Malewsky-Malewisch，此君系从前俄国驻日大使。

据 Malewsky-Malewisch 所拟新约草案，则俄国方面允将在蒙免纳关税、自由营商

---

① 同治七年：应为光绪七年。

② 陆征祥（1871—1949）：中国近代外交家，天主教修道士。上海人。1884 年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后入北京同文馆习外文，尤精俄文。1893 年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翻译官，1906 年升任中国驻荷兰特命全权大使。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应袁世凯电命返国出任外交总长，并推动中国现代外交机构之改革，将清代外务部改为外交部。

之重要优先权利，自愿加以放弃。但俄国虽然如此让步，而华人方面却仍不肯将其各种要求撤回。此即当日余受政府委任，接代 Malewsky-Malewisch 之职，继续担任谈判时之情势也。

北京政府对于谈判蒙古问题一层，故意加以避免。同时，并采取严厉手段对待蒙人。中国方面尝派遣军队前往蒙古西部一带。按该地亦尝有分裂运动之发生，后以蒙人于一九一二年正月占领乌里雅苏台①之故，始行告之一段落。中国大臣（译者按：乌里雅苏台大臣?）乃向领俄国领事 Walther 先生求助，该领事遂挺身出来，保护中国官署人员，并将彼等送至俄国边境地方名为 Kosch-Agatsch 者，再由该地改乘西比利亚火车回华。是年八月，蒙人复将科布多②加以占领。至于内蒙方面，则大部分王公，仍是忠心于华，不为喀尔喀之宣传所动。其中，可以称为例外者，则仅有 Jerim 一族，盖该族尝加入喀尔喀之革命运动故也。此种革命运动，亦尝传入满洲境内。该处洮南府一城，曾为蒙人所占领。不过，满洲境内，中国军队较多。此项革命运动，不久即被华人应用极残酷之手段，加以扫灭，洮南府复为中国军队所占。

因鉴于华人存心仇俄之故，于是俄国政府乃令驻京俄使，再将从前要求，向华提出，并加以声明，如中国再行拒抗，则俄国将采其他手段，以保护自国利益云云。但其后此举结果，亦与从前各次举动一样，不为中国所注意。于是，圣彼得堡方面遂决计采用进一步之手段，以迫中国让步。当一九一二年四月，（俄国外长）萨善诺夫（Sasonow）在国会宣布外交方针之时，曾言俄国万难容忍外蒙境内某军事强国之势力日益增大。（译者按：系指中国而言。）因此之故，俄国现正设法促进承认喀尔喀自治一事。惟欲自治之事果能安全进行，则非维持该地政治组织，禁止中国派军移民不可云云。该外长并谓，俄国方面，关于调停华蒙争执之事，愿意出头担任云云。

据上述宣言，俄国方面对于蒙古问题，现在虽已有一定表示，但吾国外交人士，却仍持一种观望态度。盖犹希望能与中国寻得一种妥协之道，同时并欲设法保留“谈判自由”。当余与远东司长 Kasakow 某次谈话之际，确尝使余得着此种印象。盖该司长曾谓余曰，我们现已决定助蒙，但（华蒙）交涉之事，若无我们参与其间，势将不能逼迫中国让步云云。彼又言，关于将来承认蒙古政府之事，以及派遣俄国军事教官及军队部伍前往库伦之举，现已准备云云。就大体而论，所有上述种种，均只算是“布置了一半”，

① 乌里雅苏台：旧城名，清雍正年间筑，为定边左副将军与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的驻所，即今蒙古国札布汗省省会札布哈朗特。亦指驻扎于乌里雅苏台城的定边左副将军的辖区。乾隆中叶后统辖喀尔喀四部和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二区。清季通称外蒙古。

② 科布多：旧城名，1730 年于科布多河畔建成，清乾隆后为科布多参赞大臣驻所，现为蒙古国科布多省省会。亦指清朝科布多参赞大臣的辖区，统管阿尔泰山南北两麓厄鲁特蒙古诸部和阿尔泰、阿尔泰诺尔两乌梁海部落，归驻札乌里雅苏台的定边左副将军节制。

并不彻底。盖因我们国内，仍在永远希望蒙古事件终可从该事件之自身，得一自然解决之道故也。

此种乐观论调，吾人可于其间外部所举行之“对蒙会议”中见之。此项会议，系由外长秘书 Neratow 君主席。在议事日程之中，所规定者为发展俄蒙商业问题，蒙境内河行船问题，疆境界线问题，利用矿山问题，建筑铁道问题，修筑马路问题，设置电线问题，筹办兽医问题等等。就此议程内容观之，诚然含有吾国在蒙享受政治经济特殊地位之意义。但此种问题，究竟是否须得中国同意，始能解决，抑或不管中国对此如何，吾人便可自行解决，却未尝一为明言。盖该项议程之中，对于“华蒙关系”、“蒙古独立”各种根本问题，完全置之不论故也。

（俄国）财部代表 Lwow 君曾在此项会议中发言，略谓吾人在讨论如何发展在蒙利益以前，须先对于“政治情形”以及“俄蒙关系”、“华蒙关系”有一明了概念方可云云。依照该代表之意，若不先行制定一种根本计划，并使中国明白承认俄国在蒙权利，则前面所提各种发展方法，其势皆将不能实现云云。于是，我们此次辩论情形与外长前次宣言内容相异之处，遂完全揭出无遗矣。当时列席人士，对于财部代表 Lwow 君所提出之问题，虽未加以解决，但在第二次会议之中，却认为我们对蒙各种希望，实有利用“商约”方法以表示之必要。换言之，即将一八八一年圣彼得堡条约（译者按：即同治七年[①]伊犁条约）范围加以扩大是也。而且当时会议席上，并谈到订结“新约”问题。此项“新约草案”，系由财部方面提出。但此次会议之中，对于俄国直接与蒙订约一事，却毫未提及。

其间，由北京方面传来之消息，皆谓中国政府之论调，至今未有变更。华人方面对于我们所提调停条件，始终抱一拒绝态度，现正预备武力征蒙之事云云。余与中国公使陆征祥谈话之时，亦尝得有此种印象。盖该使对于蒙古独立之事实，似乎认为不甚重要，而且直称彼处变动，只算是一种“喇嘛造反”。彼并谓：凡此种种，对于俄华两国关系，当然不致发生任何影响。至于中国方面，则对于破坏蒙古历史上的属国关系一事，当然不能容忍。彼对于（俄国外长）萨善诺夫 Sasonow 之国会演说，表示承认外蒙（喀尔喀）自治之举，认为仅系一种示威运动，欲由此以迫中国让步。关于改订一八八一年（即同治七年[②]）条约一事，彼以为依照中国所提各种基本条件，未见得遂无谈判余地云云。盖其时余已继 Malewsky-Malewitsch 之后，担任“改约”谈判事宜故也。

余对于该使此种自信，尝设词以动摇之。盖余当时曾对彼言，我们因为所提调停条

① 同治七年：应为光绪七年。
② 同上。

件谈判无效之故，现将自行撤回，不复再为磋议云云。余并谓我们之所以为此者，中国现在变更国体，由帝国改为民国，亦为原因之一。盖从前与我们开始谈判者为大清帝国政府故也。此外，该项条约，又与蒙古有关。而现在蒙古却已脱离中国，正在过渡期中，（亦复无从讨论）云云。余之此言，虽使陆君似乎不能不稍为仔细思索一番，但彼仍是自信不疑的向余表示，以为温厚如俄国政府，当不致乘中国政局混乱之时，故造种种难关，以便从中利用。彼又谓新任袁世凯，现方以外交总长一席许彼。一俟彼到北京之后，彼将立刻提起（中俄）条约问题，并用全力，以使两国间一切争执悬案，为之解决云云。

虽有陆君此种友谊论调，然而吾人却十分明白，此项北京新设共和政府，将为“爱国狂潮”所引诱，继续采用拖延手段，并设法在俄蒙之间，播下许多争端种子。此外，中国或者竟求列强之助，或者直将外蒙商场向世界万国开放，以便利益均沾。二者皆非俄国所愿。因此，俄国政府遂决定将前此宣言承认外蒙自治一事，用直接与蒙订约之法以证明之。俄国商约草案，早由财部方面拟就，现在更加入一种关于承认蒙古自治之政治特约，以补该项商约之不足。

关于与蒙谈判一事，（圣彼得堡方面）拟派一位全权专使，前往库伦办理。但当时俄国当局尚无径用此项断然手段之意。盖以为中国经此“俄蒙直接订约”之恫吓，当能自行就范，接受调停条件。至于派使与蒙谈判之举，当时部中曾有令余担任之议。

第三篇　俄国内阁总理 Kokowzew 关于对蒙政策之训令（附记西藏事变情形）

（原书系第十四篇）

内容：（一）余被派前往库伦，与蒙接洽。（二）内阁总理 Kokowzew 之训令，以及彼之对蒙政策。（三）自由竞争与门户开放。（四）北京政府之论调。（五）外蒙、西藏政治地位之相等。

关于俄国承认蒙古自治之计划，（圣彼得堡方面）当然曾向俄国驻京公使库朋斯齐（Krupenski）先生通知。该使从前亦尝报告本国政府，谓华人对于蒙事只是故意拖延，

因此极劝本国当局直接与蒙交涉，以迫北京政府让步云云。余于上文曾述西部蒙古脱离中国之事。最初脱离者，为乌里雅苏台，其后复继之以科布多。圣彼得堡方面对于西部蒙古此种运动，不胜欢迎之至。盖因此种运动，足使行将成熟之外蒙自治区域版图，沿西比利亚界限一带大为扩张故也。据当时所拟议之联合计划，系将内蒙全部，换言之，即蒙古东南一带，完全划出范围之外。因为内蒙地方，与俄国对蒙政策不甚相适。而且（若将内蒙划在联合范围之中），俄国势将与华、与日，发生极严重之冲突。此外，俄国又因与日曾结有“势力范围条约”之故，当然不能不受束缚。

关于与蒙谈判一事之最后决定，现在系以我们内阁会议为转移。老实说来，便是系以内阁总理 Kokowzew 一人为转移。该总理关于余之被派前往库伦一事，早已知之。但因彼与外部方面，对于蒙古问题，彼此意见颇不一致之故，于是，彼乃召余前往相晤，以便对于此项问题，得一明确观念。当彼偕余，尽将外交、条约、通商条约加以研究之后，彼乃向余言曰：俄国既以好意出头代蒙说话，甚至于愿以武力为蒙后盾，则蒙古必须对俄提出若干权利以报偿之，尤其是应当允许俄人得有在蒙殖民、在蒙购地之权利云云。此外，该总理又言：俄国虽亦需用“自由营商免纳关税”之权，以便能与他国商敌竞争。但彼对于俄国垄断蒙古商业一事，却极反对。而且，外商在蒙与俄竞争，其结果甚至于有利俄国。盖由此可使我们已成僵形之商人，平素专靠国家帮助以为生者，至是为外力所迫，可以多添一点活气云云。该总理随又言曰：“我们万不可将蒙古门户关闭，一如我们从前之欲关闭满洲门户然。”该总理主张蒙古自治区域之中，应将 Barga 地方包含在内。因该地居民为蒙古人种，且与俄境接壤，为中东铁路所经之地故也。惟（俄国）外部方面，则甚反对 Barga 地方合并于外蒙之举。盖该地方为海拉尔（Hailar）[①] 城及 Mandschuria 站所在之处。该项城站早为外商开放（如果合并于外蒙），其势将与列强发生龃龉故也。

该总理并警告余，千万不要误以为政府对于此次交涉，可以多多耗费金钱为之。彼素来反对“国家行善主义”。彼甚不愿再蹈从前波斯满洲事件覆辙。盖上述两地之俄国势力，纯系耗去俄国人民千百万金钱始行买得者也。彼愿允许蒙人一笔借款，但须以监察用途为条件。最后，该总理更为结尾之言曰：“其实，阁下此次所往之处，乃系一种既无政府，又无财政，更无司法之地。其中并极简单之国家组织，亦复无之。实际上，只有一块土地，只有一个游牧民族。所有政府一切组织，现在尚在待创之列。但余决不

① 海拉尔：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是呼伦贝尔市政府所在地。因城市北部的海拉尔河而得名。海拉尔是由蒙古语“哈利亚尔”音转而来，意为“野韭菜”，因海拉尔河两岸过去长满野韭菜，故取名为“海拉尔”。海拉尔城建于 1734 年，当时称为“呼伦贝尔城”，也称“呼伦城”，历史上曾为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饱经忧患。海拉尔东连东北经济区，西接俄罗斯、蒙古，素有“草原明珠”之称。

愿意因为组织蒙古国家之故，以使俄国国库新增任何担负。阁下必须使蒙人完全明白，现在不是我们需用蒙人，乃是蒙人需用我们之时。因此，蒙人接受我们最低度极客气之要求，以换得我们实力相助，乃是对于蒙人自己十分有益之事。假如蒙人不愿与我们同行合作，则我们只好对于蒙人前途命运，不复再为援手，听其自然变化而已。”上述诸语，即为余与该总理两次谈话之内容大意。除了正式训令不计外，此项谈话大意，实为余后来主持俄蒙交涉之根本方针。

关于俄蒙条约草案，及派余前往库伦两事，在内阁会议之时，未尝遇着何种难关。其后，阁臣遂将此事奏明皇上，得蒙圣意允准。关于此次旅费，以及购买赠品用费等等，系由国库拨出十万卢布，交余带用。

俄国决定与蒙协商一事，虽然严守秘密，但报纸之上，却时有谣言发现。未几，竟有俄蒙条约业已签字之记载。华人方面，因恐俄国干涉蒙事之故，深为不安。于是设法与蒙谈判，以谋妥协之道。为达此项目的起见，乃派内蒙王公 Noyantu（诺颜图?）为代表，前往库伦，运动呼图克图以及外蒙王公。（原注：内蒙王公诺颜图系出自喀尔喀，属于“中国化的蒙古”之内，并担任蒙藏院总裁一职。）但蒙人方面却阻止该代表前来库伦。并向中国政府条陈，华蒙问题，宜请俄人担任居间调停之责云云。至于北京政府方面，设法由中国铁路及西比利亚铁路运兵前往蒙古之举，则未能如愿而偿，因俄国方面拒绝其经过铁路地带故也。

其间，俄国驻京公使复向本国政府报告华人继续坚执己见之情形。该使并希望，俄蒙条约宜从速订结。据该使报告所言，则中国政府自革命发生以后，与国际银行团所磋商之大借款一事，进行似乎甚为顺利。因此，中国政府可以借此款项，派兵前往库伦。此外，因见英国政府对待西藏问题采用强硬手段之故，遂使我们觉得对待蒙古问题，亦有仿英办法，采用强硬手段之必要。盖伦敦政府曾向北京政府宣言曰，西藏地方万不能与中国本部视为同一性质。否则，英国对于袁世凯所希望之承认中华民国问题，决定不表同意云云。

俄使库朋斯齐之报告，对于余之出发一事，影响极大。按派余前往库伦之举，在九月初间，却已完全决定，至是遂见诸实行。在出发之前，余曾到外交总长萨善诺夫处请示。该总长当时正在预备启程前往英国，会晤英国外相 Sir Edward Grey。在分手之时，萨善诺夫曾问余，对于运动蒙人同情于俄一事之进行方法。盖蒙人对俄同情之举，该总长认为不甚可靠故也。余当时曾答之曰，余之计划，系在游说蒙人，使其倾心相信，此项条约对于俄蒙两方，均极有益。至于条约签字方法，则只能办到先由蒙古政府人员签字，再由呼图克图加以批准而已。盖散居各旗之王公，吾人不能将其全体聚集一处故也。为遮掩世人耳目起见，乃对外声称，余此行之目的，在整顿库伦俄国总领事署，以

及调解该总领事与恰克图俄国边务委员间之误会。

此外，余曾晤见以“蒙古学”著名之俄国学者 Kotwitsch。彼从前曾为科学目的，前往蒙古，掘采 Orhon 河底古物。现方由该处回到俄国。余从彼处闻知，库伦方面亲华派势力日增，并获得北京帮助。至于俄人方面，则以太不活动之故，渐将前此所得信仰失去。盖当前此库伦革命驱逐华人之际，俄人曾深得蒙人信仰故也。Kotwitsch 亦主张俄蒙直接订约。但彼却以为我们“双面和平政策”换言之，一方面既欲保持对华友谊，他方面又欲巩固喀尔喀自治，似乎难于实行。

余于上文曾将英华两国之西藏谈判一为提及。此项谈判，因其颇与俄国对于外蒙事件或喀尔喀事件的谈判情形相似之故，所以吾人对之，当不乏兴趣。而且当时英国外相 Sir Edward Grey，于一九一二年九月，在 Balmoral，与（俄国外长）萨善诺夫相谈之际，曾将蒙藏政治情形相似之点举出，以使萨善诺夫注意。此次谈话内容，萨善诺夫曾详细报告皇上。余现在将其报告内容，节录如下：“关于西藏问题，Grey 曾向臣保证，英国对于该地，实无何等野心。该国对于俄英前此所订关涉西藏之各约，亦无加以变更之意。但 Grey 却引举去年英国致华通牒之言（此项通牒内容，当时英国亦尝抄示我们），向臣详为解说曰：英国对于中国派遣多数军队到藏一事，万难允许。假如中国不顾此种警告，继续派兵到藏，则英国方面势将被迫亦复派遣英军入藏，以阻华军侵略之举。但伦敦政府如有关于此项派遣英军入藏之举，事前定当先行通知俄国云云。当我们谈及藏事之际，Grey 亦复提到俄国在蒙活动之事。彼并竭力设法将俄国在蒙与英国在藏之地位，相提并论。但臣对于 Grey 此种相提并论之举，却根本加以反对。臣更明白告彼曰，关于西藏问题，英国曾与俄国有约，英国当然应受一定限制。至于蒙古问题，则俄国对英固未尝订有何等约束。而英国在蒙，事实上亦并无何种政治经济利益可言也云云。Sir E. Grey 对于此种理由，显然无可驳诘，因亦不再答臣。但臣为维持现在俄英两国友谊关系起见，却以为宜将俄国对蒙方针大略，以及实缺顾问廓索维兹（Korostovetz）被派前往库伦之事，用非公式的方法，一向 Grey 言之。”

西藏地方，久为中印两政府政治逐鹿之区。盖双方皆欲于藏中获得优势地位，并利用各种条约，以保障自己权利故也。当一八九〇年（即光绪十六年），印度政府因藏人寇边之故，乃有藏哲条约之结。（按，即西藏哲孟雄条约。）但后来藏人方面既反对此约，英人方面又欲确定该国在藏之商业权利。其结果，双方遂不惜以兵戎相见。英国远征军队在 McDonald 将军及 Younghusband 上校指挥之下，将拉萨占领。并于一九〇四年（即光绪三十年）迫令藏人签约，将藏印两地直接关系，从新恢复。此项条约，由西藏第二位大喇嘛名为班禅喇嘛者，代表西藏签字。盖达赖喇嘛当英军抵藏之时，即已逃往蒙古故也。依照该约，则西藏政府对于哲孟雄边界，应加以尊重。并将江孜、噶大

克、亚东三处，开为商埠。允缴赔款五十万磅。此外，更承认永远不将藏地割与任何一国，永远不将藏事容许他国干涉，永远不将税收送给其他国家，永远不派藏使于外国，永远不让权利与外人等等。当时，中国方面对于此项条约，曾提出抗议。并谓订结此约之时，既未经中国参与，则当然应归无效云云。因此之故，中英两方乃开谈判，解决此事。遂于一九〇六年（即光绪三十二年）议决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其后，更于一九〇八年（即光绪三十四年）续订一约以补充之。依照此项条约，中国得以宗主国资格，派遣军队驻藏。其在藏人方面，则为保持闭关主义之故，无论对于俄人或英人，皆存一种疑忌之心。此固为世人所熟知者。英人方面为侦探西藏消息起见，曾利用一般 Pundits 为之。所谓 Pundits 者，即印度人、那大克人（Ladak）、布丹人（Bhutan），在英人指挥之下，所组织之侦探团体是也。平素由英人教以西藏语言、宗教习俗等事，或装成游行喇嘛，或假作进香和尚，或扮为乞丐之人，随时混入藏境，将藏情密报印度政府。西藏中地方官厅，却未尝察觉彼等之为秘密侦探。至于英国对藏贸易，并不甚大，仅在居有英印商人之处，一作货物交易而已。

其间，逃赴蒙古之达赖喇嘛，则曾在甘肃、山西五台山以及库伦各地勾留。在库伦一处，便住了将近四年之久。当达赖喇嘛复归拉萨之时，曾于一九〇八年（即光绪三十四年）秋季，偕其随从人员，先到北京逗留几时。彼在中国首都，备受华人敬礼。但彼之一言一动，却皆在华人严格监视之下。

余当时正任驻京（俄国）公使之职，一如其他各国公使，得有谒见此种“喇嘛教会天皇”之机会。余与达赖喇嘛相见，系带一种完全官式性质。其地点在北京北城黄寺之内。并有西藏高僧及中国官吏为伴。该活佛乃系一位棕色皮肤之少年，面有微须，坐在佛垫上，接见余等。（换言之，即余与使馆译官 Kolessow 先生。）其宝座系由五个佛枕所砌成。达赖喇嘛之头发，剃得甚短，其上并未带有帽子。其袈裟为深红大衣，被于左肩，所有颈项与右臂，皆露在外面。（除此之外），余并未发现何等装饰或标记。在右手之中，拿着一个檀香木所制成之玫瑰花冠，细细玩弄。而左手则放在膝上。余与活佛互相致敬，问候起居，以使一般在旁监视之华人大为失望。盖彼辈甚欲窃听我们对谈秘密政治意见故也。继而摆上清茶糖食，以及曾作供献之核桃等物。在宝座左右，有高僧若干。佐治野夫 Agwan Darji 亦在其中。此君系俄属 Burjate 人，为达赖喇嘛所最信任。关于此君对于俄藏接近一事如何活动之情形，吾人将于后文详述。佐治野夫常到俄国使馆之中。据其谈话，则达赖喇嘛对于国际政治，极为留意。尤其是英美俄三国，以及三国对华之关系。彼之为人极为庄重，而且欲将若干藏事，加以改良云云。

同余谒见达赖喇嘛之各国公使中，美国公使 Rockhill 最引人注意。当该使与达赖喇嘛相见之时，竟用藏语与之谈话，颇使一般在旁窃听之中国官吏，大为惊讶不已。盖

该使不仅是一个外交家而已，并且对于亚洲语言及西藏风土，皆有深厚之研究，素负盛名于世。并尝扮作“进香喇嘛”，亲到藏中探察故也。（原注：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曾任美国驻俄大使甚久。并著有《喇嘛之国》The Land of the Lamas 一书，于一八九一年，在纽约出版，可以取来参阅。）

当达赖喇嘛逗留北京之际，适值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同时物故，以及幼主宣统登位，由其父醇亲王摄政之举。此种重要事变，遂使北京政府对于西藏问题以及达赖喇嘛本人，均不似前此之注意。而达赖喇嘛亦于是时不动声色，离开北京，以便复回拉萨。未几，华人方面对于中国在藏势力缩小一事，甚不满意，竭力设法以将旧时地位恢复。于是，乃命素有魄力之赵尔巽[①]总督西藏邻省之四川，并宣布改革西藏之上谕一道。为实行此种改革计，乃任赵尔丰（原注：此人系川省总督之弟）[②] 为钦命驻藏大臣，前往拉萨。

达赖喇嘛深感赵尔丰压迫之若，乃求助于英国政府。而华人方面亦同时请求英国政府，允许华军假道印度入藏。但英国方面则因深惧赵尔丰此种侵略政策，将使哲孟雄、尼泊尔、巴丹三国同陷不安之故，于是断然拒绝中国之请。并向北京政府声言：英国殊不愿西藏方面发生政变之事，以免危及上述三国。虽然如此，而中国进军之计，仍不稍变。赵尔丰既将川边秩序恢复，并将本地人压迫下去，同时更在打箭炉、察木多间之交界处，驻扎华军若干。一九一〇年（即宣统二年），复令一千华军，移驻拉萨，再将中国旧日势力恢复。至于达赖喇嘛，则不待中国兵至，即已逃往印度大吉岭而去，请求英国官厅保护。于是，中国政府即借口此举，直将此位不幸喇嘛之职革去。但华人方面，对于另任喇嘛继任达赖一事，却不敢断然为之。因而西藏宗教首领，遂暂时留寓印度。其在拉萨方面代理达赖喇嘛职权之人，则为上文曾经提及之西藏第二个大喇嘛，即所谓班禅喇嘛者是也。

中国方面发生革命推翻满清，以及赵尔丰为人所刺杀两事，遂使西藏（无复顾忌）又复揭竿而起，反对华人。中国兵士竟被藏人将其武装解除，戍边华军亦为倡乱藏人所围攻。于是，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春季，北京政府袁世凯乃宣布汉满蒙回藏五族永远联合之策令。此项策令颇引起英国政府方面之反对。盖英国政府主张维持西藏现

---

① 赵尔巽：（1844—1927），字公镶，号次珊。清末汉军正蓝旗人。祖籍奉天铁岭。世居莱州。同治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安徽、陕西等省布政使，署理山西巡抚、湖南巡抚。任职湖南期间，抵制外国侵略者攫取湖南的矿权，倡导教育改革，将长沙所有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后历任户部尚书、盛京将军、湖广总督、四川总督及东三省总督。武昌起义后避居青岛。1914 年，北京政府委任他为清史馆总裁，主编《清史稿》。

② 赵尔丰（？—1911）：清末汉军正蓝旗人，字季和。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任建昌道，旋充川滇边务大臣，在川边实行改土归流，设立三十余县。1908 年任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1911 年（宣统三年）署四川总督，镇压保路运动，屠杀请愿民众，激起四川各县人民的武装反抗。武昌起义后，成都宣布独立，赵尔丰被杀。

状，要求华军离藏故也。虽然如此，而华人方面，仍由四川派遣兵队前往拉萨，以解该处被困华军之围，并从新恢复中国已失之势力。但中国此次远征之结果，乃大为不利。该国驻藏大臣 Chung Ying（钟英?）竟不能不向藏人乞降。中国方面于是自知，非暂行让步，与藏言和不可。至是年八月，中国驻防拉萨之军队，乃得取道印度以回家乡。同时，中国政府对于达赖喇嘛复回拉萨之事，亦复表示同意。而该喇嘛旧日之权利，亦一一恢复焉。

中国此次远征之举，虽然大受创伤，但华人与英争执之事，却依然坚持不变。华人方面对于中国以宗主国干涉藏事之权利，以及中国得派军队之权利，丝毫不愿放弃。直到了最后一刻钟，华藏双方始行承认英国调停之举。乃于一九一三年（即民国二年）十月，在印度西漠拉（Simla）地方，由中英藏三政府开会讨论西藏问题。会议不久，华藏双方即因划界问题，大起冲突。藏人所提出之界线要求，系根据西历纪元后第九世纪（即唐穆宗时代左右）之藏华条约，当时曾刻之于石（以垂不朽）者也。（译者按：是否即长庆碑，请参阅拙译《西藏重要外交文件》。）反之，中国方面则以西藏现在所有境界，与夫西藏久已臣服中国两事，为立足之点。依照一九一四年（即民国三年）四月所拟之条约草案而言，则西藏当采内蒙、外蒙之例，亦复分为内藏、外藏两部。所有川边区域若干，以及久隶中国之蒙地[①] Tsaidam 与 Kuku Noor 两处，均划归“内藏”范围。中国对于全藏具有宗主国之权利。但中国却承认，永不将藏改为中国行省。华藏双方对于藏事，皆不得私行互相接洽，或另与其他外国谈判。中国既承认英国在“外藏”地方具有特殊利益，则中国以后不得再向该地派军、置官、移民。英国对于该地，亦同样应受“不得派军、置官、移民”之限制。除此之外，英国并应宣言，永不合并西藏。又英国方面得有派遣一位委员，驻扎江孜，并可往游拉萨之权。对于中国方面，则允其在拉萨地方，得有驻扎一位中国大员，并随带军队若干自卫之权。

此项条约既经三国政府议定，遂将西藏历来闭关主义加以破坏，实为英国政策之最大胜利。从此，“内藏”一地，位于新疆云南之间（将中国与“外藏”隔开），成为一种“缓冲地带”。中国虽然有权恢复其旧日势力，而“西藏不可分”之原则，却未尝受其影响。至于“外藏”方面，则成为自治区域，立于中国“主权”与英国“保护”之下。

俄国政府对于西藏方面，从未要求任何政治权利。对于藏事，始终未存干涉之心。俄藏间之非公式的关系，则仅有 Burjāten 人与 Astrachan-Kalmûcken 和尚等等，前往拉萨以及西藏其他各地，进香瞻佛而已。至于公式关系，则亦只限于略与达赖喇嘛一作外交礼节周旋而已。诚然，从前俄国“帝国地理学会”以及“帝国科学学会”曾有遣派

① 蒙地：应为“藏地”。

"远征团"前往西藏之举，但其性质皆限于纯粹科学方面，而且大部分只在四川邻境 Kuku Noor 以及 Tsaidam 一带而已。在俄国研究藏事之各学者中，其最著名者，如 Prshewalsky，Potanin，Grum-Grshimailo，Pewzow，Roborowski，Beresowski，Koslow 诸人，以及其他几位 Burjāten 人，如佐治野夫 Dorshejew，Zybikow，Zerempylow 之类。

俄国对于藏事关系极少，已如上文所述。但英国政府因其自己意在垄断西藏之故，对于俄藏每有接近企图，辄生疑忌之心。甚至于俄国派遣科学远征团前往西藏之举，亦复引起英国使臣之质问与抗议。尤其是最令英国神志不宁者，即上述 Burj? ten 人佐治野夫，受达赖喇嘛之托，挺身而出，以促进俄藏双方关系自任一事是也。

因俄国对日战争所得不祥结果之故，俄国政府不得不将远东政策方针一为变更。于是，英国方面更从而利用之，务将俄国在藏一切可能之竞争，皆根本加以铲除。为达此项目的计，乃有一九〇七年（即光绪三十三年）俄英两国关于西藏问题之条约。依照此约，则英俄两国互相承认中国在藏之宗主权，以及尊重西藏领土不可侵犯之原则。英俄双方若与西藏官厅发生交涉事宜，则必须先经中国政府之介绍方可。此外，不得各派代表前往拉萨，不得私向西藏要求权利，不得组织"远征团"前往西藏。总而言之，对于西藏内务，不得加以干涉云云。但英国方面却声明，保留由一九〇四年及一九〇六年（即光绪三十年及三十二年）条约所得的直接与藏交往之权利。至于双方不得派遣"远征团"一层，在实际上，乃系专为俄国而发。盖英国方面既在藏中握有商务设有委员，对于藏中某某数地，殊无派遣"远征团"之必要故也。

当今达赖喇嘛 Dschebdsun Dschamtso Rinpotsche Nawang Lobsang，在彼长期执政期间之内（原注：彼现在大约五十岁左右），颇能表现其特别政治材能与非常外交手腕。关于西藏政治地位，虽仅由中英俄三国互相接洽，而拉萨并不与闻其事；但达赖喇嘛却能常从间接方面，设法参与其议。彼既深知自己政治军事之衰弱情形，于是，彼乃时而求助于英，以抗中国，时而又求助于华，以抗英国。彼为挫弱中国侵略政策起见，常唆使藏民对华革命。而在他方面，则又为抵抗英国要求起见，乃用俄国干涉幻术，并与圣彼得堡暗送秋波，为解脱之道。彼虽屡受各种不幸命运之厄，譬如逃亡、降服、驱逐以及长期流离国外之类，但在佛国世界之内，对于此类现象，固只认为超越，而不视作沉沦者也。当今达赖喇嘛，享寿甚为长久。就通例而言，彼之前任各位活佛，若非设法求得北京政府方面与夫藏中各大喇嘛之欢心，而同时自己又无独立精神之表现，则往往被人狠干脆的送归天上而去了事。当今达赖喇嘛则不然，彼能深解避免中国大臣、西藏喇嘛暗算之道。实足以享受"不能伤害"之名而无愧。

在西藏宗教政治中，坐第二把交椅者，当推上述之班禅喇嘛。寓于藏中 Schigatze

地方之 Taschilumbo 佛宫中。如果认真说来，就宗教地位而论，彼与达赖喇嘛实属平等；就政治地位而论，则彼却在达赖喇嘛之下。酷爱和平之班禅喇嘛与贪权好名之达赖喇嘛，从前彼此之间颇能相安无事。但到后来，两人冲突之事，却时常发生。其原因则由于个人竞争，以及宗教政治两派交恶日甚所致。据云，班禅喇嘛常利用达赖喇嘛之屡次离藏，暗将其政治权力，夺为己有。此外，达赖喇嘛为拉萨进步派之首领，系受印度政府之扶助，以输入欧化为己任。反之，班禅喇嘛则为守旧派，反对此种改革，并以亲华著名。在一九二四年（即民国十三年）之际，达赖、班禅双方冲突情形甚烈，竟使班禅宁愿及时退开西藏，藉口祈祷圣地，前往中国而去，以为明哲保身之道。班禅喇嘛行抵中国之后，颇得华人相当敬礼。并为中国总统上宾，在华勾留甚久。其在华人方面，当然不肯放过机会，尽力利用两位喇嘛竞争，以使西藏内部党派相争之事，继续下去，以便再将北京在藏业已摇动之势力，设法令其稳固。

第四篇　余抵库伦之情形以及蒙古首都之现象

（原书系第十五篇）

译者按：本篇第（四）段至第（九）段未译。

内容：（一）余在 Irkutsk 地方勾留之情形。（2）Knjasew 总督与 Ebelow 将军。（三）Werchne-Udinsk 与恰克图。（四）蒙古之驿路旅行。（五）余抵库伦之情形。（六）俄国总领事署及其组织之内容。（七）最初之印象。（八）蒙古之首都。（九）蒙古市场与监狱。

余于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九月初间，离开圣彼得堡，乘西比利亚快车，越 Wologda 而去。余对于启程一事，曾尽力设法避去世人耳目。盖余之委任，乃系一种秘密性质；而且当局方面，亦殊不欲因此引起世人注意故也。在余动身前数日，驻俄华使曾到我们外部探询，外间所传余将被派前往库伦一事，究竟是否确实。当时外部曾答以余此时尚在外国羁留云云。余彼时亦确在法国勾留，（并不在俄）。虽然如此，而外部此种遁辞，在实际上，亦终嫌过于幼稚。盖华人方面，当然终可寻得机会探出余之行踪故也。大约当时我们外部方面，其意只在免与中国公使发生一场令人不快之口舌战争故也。

余向远东旅行之事，此次并非第一次，因此余亦不甚感觉何等新异。余等车行六日，即达 Irkutsk 地方。其间并未发生何等意外之事。其时，西比利亚第二路线，业已修筑。余乃不知不觉的想道，此事当可作为最好论据，以与我们东方邻居交涉云云。

余在 Irkutsk 地方，得遇余之旧日同事 Eltekow 君。其时，彼正任该地总督 Kujasew 之特别随员。彼对于此次得以秘书资格偕余前往蒙古一事，不胜欢喜之至。盖彼与余从前同在旅顺服务，因而不禁回思往事故也。彼对于 Irkutsk 地方生活，似已十分厌倦，亟欲另寻一个新境。此外，彼之为人，不但是一个外交家，而且是一个美术家。因之，彼对于此次偕往蒙古之举，即从美术方面着想，亦复快乐无已。

余对于该地总督 Knjasew，以及总司令参谋官 Ebelow 将军（按，其时 Ewert 将军正在假期之中）两人，当然前往拜谒。并将余之任务向彼等言之。该总督乃系一位对于国事极有远见之人，此次待余备极殷勤。对于余之所言，亦复极为留心。彼在西比利亚服务已久，对于该地情形，最为熟习。彼既闻余详述蒙古问题之后，对于承认蒙古自治一事，表示十分满意。并谓此举将与西比利亚经济进化前途，极为有益云云。

余对 Ebelow 将军则言，因为华人在蒙古西部所采仇视态度之故，我们将来恐须派兵前往该处云云。余并请彼及早准备派兵之举，以便能于严寒之前，开抵乌里雅苏台。（原注：该处在库伦之西一千俄里。）但该将军对于余之所言，似乎甚为冷淡。彼并论及冬季之时，行军如何困难，沿途如何不便，粮草如何缺乏，天气如何寒冷云云。总而言之，余与该将军会谈之后，觉得将来关于军事机关全力相助一层，似无何等希望。

Irkutsk 地方风景，甚有画意。但亦如其他大部分俄国省城一样，破败不堪。城中主要风景，即为 Anggara 一河。该河系由 Baikal 流来，宽而且深。该城居民颇以彼等所过社会生活、精神生活骄人。据云，其原因系由于该地住居政治犯后裔甚为不少故也。余当时实无闲暇机会，对此加以考察。盖余在此西比利亚都会，只有几日勾留，并已定于九月十五日，即偕 Eltekow 续向 Werchne-Udinsk 一城而去故也。Werchne-Udinsk 城，位于另一美丽河道名为 Selengga 者之旁。居民以 Burjāten 人为最多。街道异常宽大，但两旁配以极为矮小之木屋，更参以若干荒芜之广场，有如沙漠一片，遂使 Burjāten 都会，呈现一种荒凉颓败之象。

当余等正饮茶休息之际，该处地方长官既闻余等到此之消息，乃送来“三马大车”两驾供用。此地有一邮路，直达恰克图方面。但同时亦可利用 Selengga 水道前进。不过，余甚愿从邮路而行，以免迁延过久。余等方出城界之后，立用渡船，横渡 Selengga。从此以后，遂入 Transbaikalien 之山谷。是日，天气晴明清寒，健马拖着重车，向前急跑不已。穿过风景如画之山林，间有 Burjāten 乡村以及俄人庄舍，点缀其中。此项俄人多系旧教信徒，并面带康富之色。是晚，余等遂在 Obokum 村中过夜，并与其

他旅行之人，共宿于邮站内唯一屋子之中。

次日，天色刚明，余等复行动身，行了一日之后，直至 Selenginsk（尼布楚[①]?）地方，始行歇足。此地（从前系边界城池），与俄华旧日邦交历史以及蒙古历史，皆有密切关系。在莫斯科皇室之下，俄国使臣及商旅，皆以此地为出发之点，取道库伦，前往张家口以及北京。现在，此地则为 Burjāten 民族喇嘛教徒之中心。距此地不远，有一佛寺，耸立鹅湖之滨。俄国喇嘛教主，名为 Kanbo Lama Gombojew 者，即住居于其中。该教主对于彼之属地以内，虽然具有独自管辖之权，但在宗教事项方面，却为库伦呼图克图之附庸。此项佛寺之内，附有学校一所，名为 Dacang。举凡一切关于经典宗教事项，皆须请示库伦，彼此时常均有联络。库伦呼图克图之居于统辖地位，吾人可于其赏赐俄国喇嘛佛号及徽章一事见之。譬如一八八九年（即光绪十五年），上述俄国喇嘛 Gombojew，即尝由库伦呼图克图赐以 Maidari Nomun 可汗及 Mergen Kanbo 喇嘛两种名号。此外，Burjätisch，Kirgisisch，Kalmûckisch，各种进香拜佛之人，每年尝达数千以上，亦为联络尼布楚、库伦两处关系之要素。此项进香拜佛之人，大部分系往库伦，其余一部分，则续向拉萨而去，以参谒活佛。换言之，即是参谒达赖喇嘛。并在 Dacang 之内，参与佛经辩论，以及访谒各种佛寺。其后，复归故土之时，则随带佛经、佛像、符咒，以及织有魔图之丝货。（原注：即所谓 Hadaks 者是也。）总而言之，彼辈随带各种关于宗教事宜之用品以归，不惜在拉萨方面，耗费大宗金钱。

余等到恰克图之时，业已夜深，随即前往俄国边务委员 Chitrowo 上校住所。时该上校早已得知余等来此，虽在深夜，犹备各种冷食鲜酒，款待余等。该上校向余详述库伦时局情形。并言趁铁尚红之际，亟宜将其锻炼成功。盖因蒙古王公之受中国诱约者，现正开始摇动故也云云。彼极赞成俄国径将蒙古置诸保护之下的主张。并希望蒙古将来渐渐合并于俄。

……

当余行抵库伦之日，蒙古总理大臣三音诺颜可汗（Sain Noyan Khan），即来领事馆中访余。此人为蒙古最有势力、最有声望之王公。来时身穿橙色礼服，头带皮边小帽，饰以孔雀羽毛。彼之态度甚为简朴，但极庄重可敬。彼之年纪虽尚幼少，但面上却显出一种温和有识之象。此种温和有识之美质，其后固屡经证明，并非余之个人私评也。当余向彼详述此行目的之后，彼极表示满意。并言彼个人深信余为蒙古之友，而且蒙古执

① 尼布楚：俄国称涅尔琴斯克市。位于俄罗斯联邦赤塔州的一个城镇。该地西邻贝加尔湖，南邻蒙古国，东邻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是中、俄、蒙三国交往的重要交通要道之一。雅克萨之战以后，1689 年（清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在此签订《尼布楚议界条约》，同意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为界。中国由此失去了尼布楚以东、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广大地区，尼布楚城被划入俄国版图。

政诸王公，亦无不愿意速与余等开始谈判云云。

第五篇　蒙古王公与俄国教官

（原书系第十六篇）

译者按：本篇第（三）段至第（六）段未译。

内容：（一）与蒙古王公初次会议。（二）彼等不知究应亲俄乎？抑应亲华乎？（三）各王公之性质。（四）俄国教官与蒙古军队。（五）呼图克图之武官长 Toktoho Gung。（六）蒙古印刷所之设立。

第一次会议，在俄国领事馆中。所有蒙古执政王公，皆曾列席其中。计有上述（总理大臣）三音诺颜可汗、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亲王、内务大臣大喇嘛（Da Lama）、度支大臣土谢图郡王札克都尔札布（?）（原文为 Erdeni Wang Namsarai）、陆军大臣达赖亲王（Dalai Wang）等等。大喇嘛及杭达多尔济，为一九一一年派赴圣彼得堡之专使，余已于前文述及。至于三音诺颜可汗，则自 Jasaktu 可汗死后，最近始任总理大臣之职。此次各位王公来此参与会议，均系身穿礼服，乘马而至，随带仆从甚众。此项仆从，群居该馆外厅天井之中，耀武扬威不已。

至于我们方面，则参与会议者，除余以外，计有总领事 Ljuba，Popow，Eltekow 以及 Burjäten 人 Zerempylow 四位。Zerempylow 系领事馆之译官，其后余亦屡得彼之相助。此人常在呼图克图宫中来往，对于蒙古政府中人，颇具一点势力。盖彼对于王公中之为华人重利剥夺欠债甚多者，常用金钱以接济之故也。余从前常有机会，与前往北京之蒙古王公相晤，因此对于彼等朴实头脑，颇能了解一二。余并知现在执政各位王公，虽具大臣头衔，然与一般普通蒙人固相差不远。此项与余谈判之蒙古政府代表，当然属于蒙古智识较充之阶级无疑。在彼等色暗骨宽之面上、细而且长之眼中，表出一种十分注意、十分好奇之心理。仿佛彼等面前立有一位演奏魔术之人，正向彼等卖弄手法一样。与此辈天真烂漫之人谈判，当然用不着何等外交诡计，总以愈简单愈明了为佳，务使彼等健全头脑，能够彻底了解为是。

余于是开始发言，略谓俄国以及常为蒙人好友之白种皇帝，自闻蒙古脱离中国发生

种种困难之后，因此亟欲前来帮助蒙人。倘若蒙古能与我们结一条约，以使两国素来邦交愈为亲密坚固，以使俄国得有机会赞助蒙古自治，则俄国助蒙之事，当更易于进行。余曾奉命担任此种谈判之责，盖因余从前曾任驻华俄使，常有机会得知蒙古情形故也。

其后，（蒙古内务大臣）大喇嘛（系一完全秃头之和尚，〔其余王公则拖有辫子〕，面纹甚深，颇带苦修色彩）乃代表各王公向余答曰：蒙古方面固甚愿与俄国订约，但在缔订之前，却先愿知道：此种条约将来影响于蒙华关系者，究系如何？中国方面现亦愿与蒙古订约，并派蒙古王公诺颜图（?）前来商议。但蒙古政府因候俄国方面表示之故，于是对于诺颜图之来议一事，遂加以拒绝。此外，蒙人不但对于外蒙方面主张联合起来，即对于内蒙方面亦欲并为一家。盖因内、外两蒙之关系，素来甚为密切故也。

余乃言曰，余奉命谈判者，只是关于外蒙或喀尔喀问题。至于内蒙问题，则暂时尚不能提及。又蒙人方面如果与华订约，则其结果势将等于自行取消独立。我们之所以愿与蒙人接近者，只为双方利益起见耳。盖我们之意以为，蒙古若能组成一种“缓冲国”，则可以成为我们疆界藩篱，以抵抗中国侵略故也。俄国现在之所以取此步骤者，实由于北京政府态度所促成。至于我们现在所提与蒙甚为有利之各种条件，蒙人是否能够利用，则惟有静听蒙人自行取决而已。

（蒙古总理大臣）三音诺颜可汗，直至此时，未发一言。现在乃向余答曰，蒙人对于现刻时机之重要，深知宝贵利用。余之谈话以及余之条陈（译者按：此系俄使自谓），彼均将立刻转陈呼图克图云云。此即余与蒙古各位大臣第一次相晤之结局也。

……

第六篇　俄蒙举行库伦会议以及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三日之库伦条约

（原书系第十八篇）

内容：（一）与蒙古王公会议条约。（二）彼等反对中国宗主权，而且要求全蒙独立。（三）反对派之大喇嘛，以及会议中断情形。（四）圣彼得堡方面拒绝蒙古要求条件。（五）蒙古王公所据之理由；但圣彼得堡方面仍继续拒绝蒙古要求。（六）中国设法阻止俄蒙结约。（七）英国议会中之质问。（八）俄蒙条约及通商章程之签字。

在开会之前一晚，蒙古王公乃将彼等对于我们条陈之意见书，送来余处。至是余乃发现，蒙古外交当局方面，自行提出一种条约草案，与我们所拟者完全不同。此项草案系以下列各语开始："蒙古脱离中国之羁绊，并宣告在本国可汗至尊统治之下，自组独立国家。俄国首先承认蒙古独立，而且负责保护。"此外，并有"承认蒙古对外独立"之语。殊与俄国原来所拟"承认喀尔喀内政自治"，以及"蒙人选举呼图克图为 Ejen Khan 之后，换言之，即选为政治元首之后，俄国当与以承认"者，大相径庭。又蒙古草案中，更有下列各种要求，即蒙古方面得派一位本国外交代表，前往圣彼得堡。俄国方面亦应派遣一位大使，来驻库伦。俄人不得在蒙收买土地。（原注：对于此点，本已口头协定。）不得在蒙以物交易，换言之，即是不得用物换物，须以金钱买卖。此外，并不得在蒙经营放债生意。据云，上述营业方法，俄人曾使蒙古大受其害故也。又俄国人民到蒙旅行，必须先领护照。俄国官吏关于驿邮所用马匹数目，须有一定限制，每月某段之中，当以马匹一百、骆驼三十为度，不得超过此数。

此即蒙人答牒之大意。所有我们主要希望，无不一概拒绝。余在会议之前一夕，曾接（俄国外长）萨善诺夫（Sasonow）一电，系回答余之询问者。该电之内，令余对于圣彼得堡前此所拟之草案，不得多所变更。而且关于蒙古要求政治独立，以及要求划入内蒙两事，绝对加以拒绝。

有此一电，遂使余一切迟疑态度，完全扫除净尽。于是，乃向列席诸王公曰：君等所拟此项草案，俄国不能接受。盖我们订约之目的，曾经圣彼得堡专门人士再三加以研究，然后确定者，现在均被此项草案完全推翻矣。余并将萨善诺夫（Sasonow）电中所举"俄国万难即时承认蒙古完全独立"之理由，一一为彼等述之。余并举埃及与摩洛哥两事为例。此外，余又言：民族之联合，并非顷刻即可办成之事，必须取途于历史演进方可。譬如，巴尔干半岛各国脱离土耳其羁绊之举①，乃系渐渐完成，并非一蹴即几。直到今日，尚有许多民族未能联合起来，只能附属于各大国家之中。譬如奥匈联邦②之中，含有德人、格鲁达人、捷克人、匈牙利人等等种族。又如土耳其国家之中，实含有各种基督教民族。即如俄国 Transbaikalien 地方，亦含有蒙古种之 Burjāten 人。因此之故，蒙古国家主义者，如欲联合全蒙，则不但将与中国开战，并将与俄国开战。盖俄国方面恐难因为玉成蒙古国家主义理想之故，甘愿自将 Transbaikalien 一地放弃故也云云。

---

① 脱离土耳其羁绊之举：即 1912 年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四国为反对土耳其组成巴尔干政治军事同盟。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同盟战胜了土耳其。根据《伦敦条约》，土耳其欧洲部分除保留伊斯坦布尔及其附近的一小块土地外，其余全部割让给巴尔干四国同盟。

② 奥匈联邦：即奥匈帝国。1867 年根据奥匈统治阶级间的协议，在奥地利帝国基础上建立的二元帝国。奥皇兼为匈牙利国王和帝国元首。奥匈各设政府和议会，外交、国防和财政则由帝国政府统一办理。奥匈帝国于 1918 年瓦解，分别建立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个国家。一部分领土则归波兰和南斯拉夫。

（蒙古总理大臣）三音诺颜可汗于是乃向余答曰：阁下所言，皆含至理。但蒙古所努力者，不在求得自治。盖此种自治，蒙人殊不重视故也。蒙人之意乃在求得真正独立。换言之，即是完全取消中国在蒙宗主权。当一九一一年蒙古代表逗留圣彼得堡之时，俄国各部大臣对于蒙古完全独立一事，曾给以确实保证。彼等并向蒙古代表建议：不要仅仅联合喀尔喀而已，必须将全蒙一齐联合起来方可。当时，俄国总理大臣Kokowzew伯爵、陆军大臣Suchomlinow两人，亦与上述意见相同。而现在俄国所提各种条件，殊与前此约言不符。而且，承认中国在蒙宗主权一层，实无异于恢复中国统治蒙古之权，实无异于逼迫蒙人永为奴隶，实无异于直将蒙古瓜分为二——其中一部分，只是空悬独立之标帜；其他一部分，则势将从此化成中国领土云云。

（蒙古内务大臣）大喇嘛在旁极力赞助三音诺颜可汗之言。并特别说明外蒙不能脱离内蒙之理。此外，更谓蒙古现在既已成为独立国家，当以平等资格，订结条约云云。

于是，余复言曰，关于一九一一年圣彼得堡约言一事，余实无所闻。如其果有此言，则亦不过我们外交当局，意欲利用外交势力，以制止中国对蒙采取严厉手段而已。诚然，俄国方面固亦愿将内蒙加入条约之内。但就现在政局情形而论，却不允许吾人为此。假如我们现在所议之俄蒙条约，果能告成，则将来喀尔喀方面不难设法再与内蒙从容协商。至于俄国方面，则固早已宣言承认蒙古自治，并允助蒙对华。但此种宣言，系以订结俄蒙条约为先决条件。因此，余甚欲知：究竟蒙古政府是否有意与俄订约？抑或宁愿保持历来局面，径与中国代表诺颜图亲王（?）交涉？此外，余并尝从（驻华俄使）库朋斯齐处得悉，蒙人曾允诺颜图前来（蒙古总理大臣）三音诺颜可汗部落（Aimak）之中。

继而大喇嘛又复发言，而且语气极为激昂。略谓，蒙古政府绝对不愿订结任何条约，将中国在蒙宗主权，从新加以证明。喀尔喀宁肯与华一战，以保独立。战而不胜，则愿与内蒙同其命运。换言之，即彼此仍旧同为北京属国是也。倘若喀尔喀坐视南蒙、东蒙成为奴隶，以作自己获得自由之代价，则不如全体蒙人联合起来，大家死在一处之为善。此外，现在所谓俄蒙条约，对于蒙人并无实利可言，只将蒙人置诸铁砧之上，铁锤之下，任意敲击而已。并有人谓此种条约用意，无非俄国欲将蒙古暗中置诸自己保护之下，以使蒙古成为Buchara（译者按：俄国地名）或高丽第二而已。因此之故，蒙人必须仔细思量，究竟联络何国比较有益：亲俄乎？抑亲华乎？蒙人虽然贫而无教，但极爱自由，殊不愿脱离中国奴籍之后，又变为俄国奴隶。而且，俄国政府并无丝毫诚意与蒙磋商条约，乃是勒令蒙古无条件的接受俄国要求而已。因此，彼主张蒙古政府宜待中国代表诺颜图到来之后，视其所提条件如何，然后再行择其与蒙最为有利者，以定方针云云。

因余既察见大喇嘛毫无让步之意，如再继续与之争辩，势将对于俄国声望，有损无益。于是，余乃言曰，余之被派到此，并非来与中国代表比赛手段。假如中国代表果来库伦，则余决将会议停止进行云云。同时，余将桌上蒙古所拟条约草案取到手中，随即掷诸地上。并起身向该王公等言曰，余因大喇嘛出言侮辱之故，决意停止谈判云云。

关于此次事变情形，余曾向圣彼得堡外部大臣报告，并警告彼曰，就现在局面而论，蒙古方面对于我们所提一切条件，恐难全部爽快承认。倘若我们欲将条约订成，势非略为让步不可云云。此外，余并言，此项条约，实际上恐难如圣彼得堡原来计划，直与喀尔喀四大王公订结。盖因现在蒙古国政，系由呼图克图及内阁人员代表，而且曾经各部王公加以承认故也。各位王公多住居于各自部落之内。其中有一部分，或者年纪太大，或者年纪太小，其势不能前来库伦。

于是，（俄国外部大臣）萨善诺夫先生，乃复余曰："蒙人方面若欲于所述疆域之内，换言之，即在内、外两蒙疆域之内，建立独立国家，则俄国政府对之，殊无所谓赞成反对。盖俄国政府对于蒙人此种运动，固不能担任巨责许以武力相助故也。但吾人必须力使蒙人彻底明白：若无俄国实力之助，则联合全蒙成为一家之举，绝对不能成功。其最大原因，即为中国势将起而反抗是也。就俄国论点而言，则蒙古此项要求，殊无接受之可能。但俄国政府方面，亦殊不愿游说蒙人，谓联合之如何不可能，独立之如何不容易。所可以相告者，只是俄国所拟草案，对于蒙古现时局面，甚为相适而已。倘若喀尔喀势力渐趋坚固，则自可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中坚，然后联合蒙古各族成为一家云云。"

此外，并令余向蒙人声明，若无俄国之参与，而蒙古径与中国订约，则俄国政府对于此种条约，决不加以承认。俄国因其在蒙利益关系之故，即使中国将来能向蒙人给以若干许诺，而俄国方面亦殊不能认为满足。盖俄国政府明知中国此种许诺，将来不能实践云云。最后，并允余应用"外蒙"二字。其结果，蒙古自治区域之疆界问题，从此遂成为一个悬案。

蒙古亲华派于是利用余与大喇嘛之冲突一事，运动停止俄蒙谈判；并造作俄国帝国主义计划之说，以为鼓吹。为此种煽动之中心者，当然是大喇嘛本人。盖彼对于余之抵抗，似乎极为愤怒故也。关于此种煽动诡计详情，余系闻之蒙古亲俄派杭达多尔济亲王。情势虽然如此，而亲俄派终占胜利。最后，呼图克图乃命三音诺颜可汗继续与俄谈判。据云，呼图克图此举，系由其妻劝告所致云云。其后，更因余之建议，并将大喇嘛暂时遣去。

数日之后，我们谈判果然从新开始。余为避免无味争辩起见，乃向各王公建议，立即着手草拟条约。但其后却发现此项办法，不甚妥当。盖各王公之间，往往自行互相争

执不已，有时竟从座中跳起，直向译官 Zerempylow 及 Dschamsaranow 两人建言故也。因此之故，余乃委托 Ljuba、Popow、Eltekow 三位先生担任草拟条约之责。其在蒙古政府方面，则派部员 Cering Dorji 及 Sui Tsi-jui 两人，参与其事。此二人曾在中国住过，得有一点官场训练。

其间，圣彼得堡方面显然业已明了，与蒙订约实较与华订约为易。因此，（俄国）外部方面曾来一电告余，谓 Werchne-Udinsker 军团现已准备遣一炮队，前往库伦以及乌里雅苏台地方。并令余利用此种机会，以使蒙人接受我们条件，并与北京断绝谈判云云。此外，我们对于蒙古方面之希望，亦复应允若干。譬如，承认呼图克图为 Ejen Khan，换言之，即承认其为政治元首之意。又"王公"二字可以取消，而用"国民政府"四字以代之。并令（驻华俄使）库朋斯齐向华声明，关于俄华条约之基础，我们仍是保持从前所提三点。至于在蒙建筑铁路之权，则可不必论及。盖因我们果与蒙古订约，则此项权利之获得，当然不成问题故也。同时，又嘱库朋斯齐宜向华人忠告，早与内蒙及 Barga 两处，设法妥协。并将实行报复以及强并 Barg 之心，加以放弃云云。

（俄国当局）此种决议，显然与欧洲政局变化有关。盖当（俄国外长）萨善诺夫电报到达之际，差不多同时又接电社一电，报告土耳其与斯拉夫，现已断绝外交关系；巴尔干方面恐将发生战事云云。

当余既已察见库伦当局方针，又已转向亲俄一途之际（据云，为北京方面中俄交涉顺利之谣言所影响），余乃邀请各王公，公同再将该约作最后一次之讨论。并望此次或可不再发生严重冲突。其后，各王公果然全数出席，甚至于大喇嘛亦在其内。彼对于前次冲突之事，向余致其歉意，并言，"先吵后和"，实较"先和后吵"为善云云。

余因回答蒙古王公质问"何以必须维持中国在蒙宗主权的理由"之故，乃声言曰，俄国因受俄华条约之束缚，对于中国土地完全之原则，不能不加以严守。因此，对于蒙古脱离中国之举，实不能加以赞助。但俄国政府对于蒙古自治一层，却愿尽力帮忙。此外，中国为保有蒙古起见，不但允许俄国由一八八一年俄华条约（即光绪七年伊犁条约）所获得之优先权利，照旧享有；而且似乎有意再许俄国若干新权利，譬如建筑铁路、开采矿山之类。惟圣彼得堡方面，却以为与蒙直接订约，对于俄国利益比较有益。因此之故，现在正是蒙古自行决定之时：究竟蒙古应与俄人携手，保持自治现状，抑或应与袁世凯合作，换言之，即是回复从前原状云云。

该王公等承认，袁世凯确有警告蒙古勿与俄国订约之举。此外，袁氏并允许蒙人独立，以及其他各种权利云云。会议之时，大喇嘛又复大露头角。彼除提出各种质问外，并尝询余：何以俄国如此坚持此项条约，必须呼图克图以及各王公签字，而不主张此约直由蒙古政府署名？盖自库立独立以后，蒙古王公之地位，固已早由蒙古政府取而代之

云云。余乃答曰，此次会议之事，既由各王公出席主持，因此，余以为约中遍列王公之名，似较只列一个不注姓名之政府为佳云云。大约大喇嘛因彼自己不是贵族之故，颇不愿意各位王公在政府之中，自成一种特别团体。

此外，各王公希望在条约之中，提及蒙古自治之举，系由蒙人自行宣布云云。余为满足彼等希望起见，于是共同议决：另由蒙古政府正式致余公文一件，通知自行宣布自治之事。（原注：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九日，蒙古政府致俄国全权代表之公文，其内容如下："蒙古国民因欲保持历史上的疆域范围，以及宗教习俗之故，乃宣告脱离清朝羁绊，自组一个独立国家，公举喀尔喀宗教首领哲布尊丹巴喇嘛为蒙古国民之宗教的、政治的元首。并将此次变革之举，通知列强。因此，敬请阁下接到此项通知后，即以全权代表大臣之资格，转达贵国政府，并力助蒙古政府，勿令华军开入蒙境一步。关于此事，吾人并已同时知照其他各国政府矣。Olana Ergũ gdeksen〔译者按：此系蒙古年号〕二年季秋月十四日。"）其后，各王公复向余质问曰：俄国在条约之中，何以不提及蒙古领土不可侵犯之原则，以及俄蒙界线之问题？盖无确定界限与领土，则所谓蒙古独立者，不过等于虚设而已云云。其间，大喇嘛更以激昂语调，设法证明：蒙古领土自古即属于蒙古人民，未尝一属中国。蒙人从前只与满洲大清皇室联合，固未尝一与中华帝国联合。现在满洲皇室既倒，则蒙古之臣属关系，当然亦随之消灭。至于俄国方面援引"国际公法"为言，殊欠精确。盖依照"国际公法"，则人民与土地两事固属于"帝国"概念之内故也。（原注：此种误解，显然系受我们 Burjāten 地方一般聪明人士之影响，因彼辈尝以〔德国学者〕Bluntschli 之"国际公法"为根据故也。）现在，俄国政府乃欲不顾事实上业已成立之蒙古国家，并将其领土亦复加以否认云云。此外，大喇嘛并欲一知：究竟俄国对于"自治"二字，系作如何解释？换言之，所谓"自治"者，系指取消蒙古对华臣属关系乎？抑或此项臣属关系，仍旧继续保存乎？如系第二种解释，则此项"自治"，蒙人殊不感需要云云。

余因不愿再与大喇嘛发生冲突之故，于是仅仅声明，蒙人所提"俄蒙界线照旧不变"之议，无非表示对于俄国所抱无私政策尚不信任而已。但在俄国方面，却已尽心竭力，以使蒙古不受侵犯，自然，此种不受侵犯之程度，亦有一定范围云云。各王公闻余此言，不禁起而申辩，略谓蒙人所提"界线问题"，并非系对俄国而发，乃系专对中国侵略而言云云。

其后，余乃请求彼等告余：究竟内蒙地方，计有几处愿与喀尔喀合并？盖余颇闻内蒙王公多人，左袒中国方面，而其他地方，如 Gorlos，Jerim 之类，又复早为华军所占故也。而且现在满洲境内 Kuan-Cheng-tze（宽城子?）地方，正有许多内蒙王公在彼聚议。其中，并有（内蒙教主）Kandschur Gegen 以及中国代表在内，讨论关于与华订约

之事。因此，吾人现在必须首先确定，诚心愿与俄国携手者究有若干，曾与喀尔喀合并之王公，计有几许，以及内蒙一部分地方，是否确已归附中国云云。

于是，（蒙古总理大臣）三音诺颜可汗乃向余答曰：许多蒙古部落，因惧华人之故，曾秘密与喀尔喀联络。倘若彼等一闻俄蒙条约成立之后，必将立刻正式宣言加入（外蒙）自治区域之中。至于宽城子之蒙古王公会议，则只限于与华疆界紧接之若干蒙古王公而已。因彼等必须承认中国统治，否则将与 Jao Uda 及 Jorim 两族，同其运命。盖该两族因附和喀尔喀之故，曾被中国将其土地占领故也云云。余从该王公等语气中察知，彼等自己并不确切明了：究竟各处蒙旗附和库伦者，计有若干？归附中国者，又有若干？

最后，该王公等乃向余请求，贷与蒙古政府二百万卢布，以关税、矿税为抵押。余因从前曾得（俄国内阁总理）Kokowzew 允许，如果条约订成，可以贷款与蒙之故，所以现在余乃立刻回答彼等，此事当可办到。于是，颇使彼等欣然色喜，盖彼等初未料及，余能应允如此之快故也。

至于蒙古方面之反对党首领，则始终为大喇嘛。彼曾想尽方法，以使会议破裂。此事使余最不了解，盖大喇嘛固系蒙古独立派有力领袖之一，素以力争蒙人自由为志，而且主张缔结俄蒙联盟者也。余在上文曾言，当一九一一年蒙古遣派代表团前往圣彼得堡要求赞助之时，大喇嘛即为该团代表之一。

此次俄蒙会议地点，多在领事馆食厅之内举行，盖该厅为馆中最大之室故也。并利用食厅餐桌，以为我们工作之处。最初，各王公对于此种素未习惯之环境，甚觉局促不安。但后来却渐渐习惯，不再以我们在座为碍。彼等互相纵谈，大抽其烟，吃茶饮酒，有如在家一样。其中最为彼等欢迎者，实为（余之秘书）Eltekow 君，因彼每当会议之时，辄握笔描画在座诸人之肖像故也。各王公无不聚精会神，以视彼之铅笔动作；其欣喜之情，恰有如小孩看见画家绘像成功一样。在各王公之中，发言最多者实为大喇嘛、三音诺颜可汗、杭达多尔济亲王三人。其余各位王公，则只在旁静听，并用喝好声音“Dsa”（咱?）以表示其赞成之意。至于各王公之随从人员，则在外厅之内等候，并散布一种不甚好闻之气味。余在此领事馆食厅之内，真不知过了多少烦闷时间！所有一切极简单之事实，而在彼等却完全不能了解者，余均须一一加以解释！

至于我们外交部方面，则始终主张拒绝蒙古要求，对于圣彼得堡原拟条约草案，不得更改一字。同时，拍电告余曰，蒙古所拟草案，不能接受。因该草案欲将蒙古造成独立国家，而由俄国保护故也云云。此外，电中并言“我们对于承认蒙古脱离中国一节，始终未尝提及。而且以为，此种承认于俄实无利益可言。盖此种承认之举，殊与保全中国领土完全原则相抵触，势将引起列强抗议故也云云。

在上述强硬电报之后，复继以另一电报，系纪述（俄国外长）萨善诺夫与中国公使之谈话，稍将（俄国对蒙之）强硬态度变为缓和一点。盖该外长曾向中国公使言曰，俄国因中国拒绝讨论蒙古问题之故，乃命廓索维慈（Korostovetz）先生，（前往蒙古）讨论如何与蒙直接交涉之法云云。其后，因中国公使直谓俄国此种行动为干涉中国内政之故，于是该外长乃复答曰，倘若北京政府欲将蒙古改为中国行省，或者意图变更我们行将订结之俄蒙条约，或者存心破坏蒙古国民之政治组织，俄国方面皆万难加以承认云云。此外，该外长并抗议中国派兵前往蒙古西部之举。更向其警告曰，中国此举，势将逼着俄国不得不将其对于“蒙古宣布自治问题”，以及“蒙古扩张领域问题”之原来态度，加以改变云云。该外长所以发出此种明白宣言之用意，显然系欲威吓中国方面。而科布多及乌里雅苏台两处俄国领事之报告，或亦为重要原因之一。盖该两领事曾向政府报告中国派兵之事，并谓北京政府晓谕该处居民，切勿附和喀尔喀，否则将加以严重惩罚云云。

当外部训令寄到之后，余乃请亲俄派王公杭达多尔济亲王，前来余处，告以圣彼得堡方面对于蒙事之观察为何如者。并警告彼曰，倘蒙人再有其他变卦之举，则会议势将难免破裂之虞。该亲王乃向余言曰，亲华派虽极从中阻挠，而呼图克图却始终坚持与俄接近之议。对于此项条约，必能加以批准。甚至于对于约中俄国所提各种限制，亦将加以承认云云。

虽有杭达多尔济此种乐观论调，而余对于此次对蒙交涉之效果，终甚怀疑，尤其是读了（驻华俄使）库朋斯齐报告之后。盖该使曾来报告云，中国内阁在袁世凯主席之下，曾经议决求助于美德两国，以为抗俄之计。并以开放蒙古商业为交换条件。至于担任与俄谈判之事，业已派定总长 Liang Tun-yen（梁通彦?）及唐绍仪两人。盖二人素具外交才干，久为外人信任故也。为运动蒙古亲俄派中最有势力之呼图克图、杭达多尔济、Toktoho 三人计，并决定利用官衔、金钱等物，以作特别褒奖彼等之具。假如此举仍不能收效，则决计派遣军队，由诺颜图亲王带往蒙古。此外，又拟派遣和平使者若干，其中并有上述（内蒙教主）Kandschur Gegen 在内，前往（库伦）运动。该教主曾到北京俄国使馆一次，并告俄使曰，彼将前往库伦，运动呼图克图承认中华民国云云。

据中国各报消息观之，则华人方面尝用尽各种方法，唤起一般国民之爱国运动。北京街上，遍开反对俄国奸计之大会。各种报纸大声疾呼：全国应该联合起来，以保护昔日中国在蒙版图。至于余之被派前往库伦一事，彼等则视为乃系俄国外交手段，以逼中国承认俄国所提条件云云。

同时，又得电社方面消息，除报告巴尔干同盟各国战胜土耳其外，并有关于西藏、蒙古之纪载。略谓英国下院议员 Giunel 先生，曾向外相 Sir Edward Grey 质问俄国政府

在派遣廓索维慈先生前往库伦游说蒙古勿为中国所服之先，是否曾与英国政府接洽云云。于是，Sir Edward Grey 乃答之曰，彼（指 Grey 而言）对于派遣廓索维慈先生之事，一如 Ginnel 先生顷间所言者，实无所知。而且，彼亦未有何种根据，得以妄自揣测，俄国具有破坏外蒙现状之意云云。英国下院此种质问，颇能描出俄国东方政策之受英拘束为何如者。

至于西藏问题，则据上述电社传来消息所云，中国业已恢复达赖喇嘛旧日一切职权云云。当余将此消息转告蒙古各王公之时，彼等乃言，华人此举，不过意在利用达赖喇嘛之例，以影响呼图克图心理而已。换言之，即华人方面欲借此表示，只要呼图克图果能自行脱离俄国势力，则中国政府对于彼之罪过，亦将不咎既往是也。

其后，蒙人对于我们所提条件，犹豫不决者，复有数日之久。据 Ljuba 、Zerempylow、Moskwitin 三人报告，则蒙古亲华派，现在正用其全力，以破坏彼等最所憎恶之亲俄政策。并设法游说呼图克图及其妻室。当余未闻蒙古亲俄一派占得最终胜利之前，几乎对于此次会议一切希望，业已完全断绝。(迨其后俄党终占胜利)，于是，余乃接得蒙古外部通知，谓蒙古政府现已决定签约，并请确定签字日期云云。

签约之事，系在十月二十一日举行。其进行程序如下：当蒙古各王公前来（俄国）领馆签字之际，其时已届深宵，余已不复再待彼等。此种迟延之咎，系由内廷占吏所致。盖彼欲特别选出一个吉时，以便举行签字之礼故也。是以各王公来后，乃向余欣然告曰，此日晚间签字，最为吉祥。于是，余等立刻对照条约字句，并即加以签定。蒙人对于此种仪节，实为初次经历。因此，彼等所持态度，亦最为郑重。一面静听他人发言，一面细心用墨签字。事毕，乃共饮香宾酒，余并举杯恭祝蒙古自治，以及俄蒙友谊。其时，各王公无不大为感动，紧握余手，连呼 Dsa（好呀?）不已。并由三音诺颜可汗前致数辞。此外，蒙古财政大臣更用诙谐之语发言曰：此次订约一举，实为第十三世纪蒙古侵入俄国以后之第一次恢复蒙俄直接关系。现在蒙人大可不必再为自国担心，盖俄国及俄自对于蒙古，当不至发生何种卖友行动故也云云。

余等聚谈之时，该王公等曾坦白向余言曰，彼等对于签约一事，直至最后五分钟，犹复迟疑不决。其后，因为呼图克图亲自催促签字之故，乃下最后决定云云。至于蒙人之所以迟疑不决者，实由于新自北京来此的 Larson 先生一场谈话之故。盖该氏之到库伦，在表面上则称专为商业而来，在实际上乃系由北京政府派来运动蒙人中止俄蒙谈判。此外，该氏更带有一部分资本家之委托，意在谋得自张家口至库伦间之铁路建筑权。但蒙古方面对于该氏所提各种笼络蒙人之条件，无不一一加以拒绝，并向该氏明白宣言曰，蒙华交涉之事，须在俄蒙条约订结以后举行，而且当以对等资格谈判云云。

在条约条文之中，虽已注明该约签字之后立即发生效力，但圣彼得堡方面却主张必

须经过呼图克图之批准方可。因此，余乃向各王公言曰：君等前此曾经共同表示，关于批准一事，已于君等被委全权之时说妥。但俄国方面如有要求呼图克图特别批准之举，则蒙古政府当然亦有权要求俄皇加以批准云云。

其后言谈之间，余乃察出该王公等，甚为希望由此条约即可以获得俄国借款等等利益，以为填补中国从前对蒙所给津贴之计。

此事殊可以发生误会，于是余乃认为大有阻止彼等乐观之必要。因向彼等言曰：蒙人方面似乎欲让俄国完全担当接济、保护蒙古之责，而自己则前往幕帐之中，坐享清福。而不知俄国政府对于保护蒙古之责，虽然一肩担起，但以蒙人能够对外自行抗御，对内自行维持，尤其是财问题必行自行整理，为先决前提云云。各王公闻此之后，神色似乎甚为错乱不安。但彼等却与余相约，蒙古政府当能采纳我们此种建言云云。最后，乃共同议定，此后数日之间，彼此再行聚集，以便讨论其余尚未了结之事。

翌日，杭达多尔济亲王前来领事馆中，以呼图克图名义，表示对于条约签字之庆意。彼并向余述及宫中欢喜情形，以及亲俄派如何高兴等等。至于亲华派竭力设法破坏此次成绩，现已大遭打击云云。于是，余乃赠送杭达多尔济亲王五万卢布，以作“慈善事业”之用。此外，并送给各王公钟表、金烟盒、花瓶等物。关于接受赠品之事，在蒙古方面，并不受人抨击。余之微薄礼物，亦复未尝因而发生一点贿赂痕迹。

圣彼得堡方面对于此次会议之如此迅速了结，似乎出于意外。闻讯之初，不知所措。当（俄国）外部既闻签字之后，只是向余通知：此项条约行将公布于世，并特别知照英法日三国。此外，并令（驻华俄使）库朋斯齐将俄蒙订约之事，通知中国政府。并表示希望中国亦复加入此约之意。倘若中国政府加以拒绝，则该使可以直向中国政府宣言，此后俄国对于承认蒙古独立之事，当更有再进一步之表示云云。

关于余之个人方面，则余在数日之后，曾得（俄国）外长下列简明电报一件：“自余（系外长自称）向陛下将君与蒙订约情形，恭谨上奏之后，陛下乃屈尊御批‘朕甚感谢廓索维慈’数字。余敬贺阁下得此皇恩天奖。”

俄国政府所公布之订约情形及条约原文如下：

（俄国）外长于十二月八日，曾向法长通知：今年（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即西历十一月三日），实缺顾问廓索维慈曾由皇上准其直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全权代表，蒙古政府及在职王公，共同签定条约一件，以及通商章程一件。（俄国）法长乃于十二月十三日，将此条约章程，咨送议院宣布。

该约导言，略谓蒙华两方旧日关系，现已取消。俄蒙两国代表，因为俄蒙双方旧来友谊，以及深感俄蒙通商事件颇有详细规定之必要，于是彼此同意，协定条文如下：（译者按：下列条约及通商章程，原书系用德文。中国译文系依据陈崇祖氏《外蒙古近

世史》书中所录，并未另译，惟稍有更改。）

（1）俄国政府扶助蒙古政府现已成立之自治组织，以及蒙古自行编练国民军之权利。此外，并不许华军开入蒙境，以及中国在蒙殖民。

（2）蒙古元首及蒙古政府，允准俄国臣民及俄国商务，照旧在蒙享有此约所附通商章程内开各种权利，以及其他特权。至于其他外国臣民在蒙所享权利，当然不能超过俄国臣民在蒙所享权利。

（3）假如蒙古政府以为，须与中国或其他外国订立条约时，则无论如何，该项条约如未经俄国政府同意，不得有违或变更此次所订条约及通商章程内列各种条款。

（4）此项友谊条约，自签字之日实行。

通商章程十七条，系规定俄国臣民在蒙所享权利及特权，以及蒙古臣民在俄所享权利及特权。

第一条：俄国属下人等，照旧享有利权，得在蒙古境内各地，自由居住移动并经理商务、工业以及其他事项。此外，并得与各个人、各货行，以及俄国、蒙古、中国及其他各国之公私处所，往来协定办理各事。

第二条：俄国属下人等，并得照旧享有利权，无论何时，可将俄国、蒙古、中国及其他各国出产制作各货，运出运入；免纳出入口各税，并自由贸易；无论何项税课捐，概免交纳。惟中俄合办之营业，以及俄国属下人等伪称他人之货为自己货时，不得援用此条。（此条与德文译本全同，但较法文译本为详。）

第三条：俄国银行有权在蒙古开设分行，与各个人、各公司会社，办理各种款目事项。

第四条：俄国属下人等，可用银钱买卖货物，或互换货物，并可商明赊欠。惟蒙古各王旗及蒙古官帑，不能担负私人债款。

第五条：蒙古官吏不得阻止蒙人、华人向俄国属下人等，往来约定办理各种商业。并不得阻止其为俄人或俄人所开商店工厂服役。蒙古境内，无论何种公私会社机关以及个人，皆不得具有商务制作专卖权。其在未订此约之前，已得蒙古政府允其具有此种专卖权者，则在该项期限未满以前，仍可保有其权利。（此条中德译本，较法文为详。）

第六条：俄国属下人等，有权在蒙古境内各城镇、各蒙旗，租赁地段或购买地段，建造商务制作局厂，或修筑房屋、铺户、货栈。并租用闲地，开垦耕种。此种地段或买或租，以为上开各项之用；自不得以之作谋利之举（指买而转卖言）。此项地段要须按照蒙古各地现有规例，与蒙古政府妥商拨给。其教务、牧场地段，不在此例。（此条中德译本，较法文为详。）

第七条：俄国属下人等，可与蒙古政府协商，关于享用矿产、森林、渔业及其他各事项。

第八条：倘俄国政府认为蒙古境内某某地方有设置俄国领事之必要时，俟与蒙古政府协商后，得有派遣俄国领事驻扎该地之权。蒙古政府若于帝国沿界各地，认为有设置蒙古政府代表驻扎之必要时，俟与俄国政府协商后，亦可派遣蒙古政府代表驻扎该地。

第九条：凡有俄国领事之处，及有关俄国商务之地，均可由俄国领事与蒙古政府协商，设立贸易圈，以便俄国属下人等营业居住之用，专归领事管辖。无领事之处，则专归各商务公司会社之领袖管辖。

第十条：俄国属下人等，有权在蒙古各埠之间，以及各埠至俄国边界之间，自行设立邮政，以及运输邮件货物。此事可与蒙古政府协商办理。如须在各地设立邮站，以及别项需用房屋，均须遵照本约第六条所定章程办理。（译者按，本条系照德文翻译，与法文、华文译本，略有出入。）

第十一条：俄国驻蒙各领事，如须转递公件，遣派信差，以及别项公事需用之时，可用蒙古台站。惟一月所用，马匹不过百只，骆驼不过三十只，可勿给费。俄国领事及办理公事人员，亦可由蒙古台站行走，偿给费用。俄国属下办理私事之人，亦有享用蒙古台站之权。惟此项人等应偿费用，须与蒙古政府商定。（译者按：此系德文、华文译本相同；比较法文译本为详。）

第十二条：凡自蒙古域内流至俄国境内各河，及此诸河所受之河流，均准俄国属下之人，乘用自有商船，往来航行，与沿途居民贸易。俄国政府当帮助蒙古政府整理各河航路，设置各项需用标识等事。蒙古官吏当遵照此约第六条所定章程，于此各河沿岸，拨给停船需用地段，以为建筑码头货栈，以及备用柴木之用。

第十三条：俄国属下人等，于运送货物，驱送牲只，有权由水陆各路行走。并可商允蒙古官吏，由俄人自行出款建筑桥梁渡口；且准其向经过桥梁渡口之人，索取费用。

第十四条：俄人牲只于行路之时，可得停息喂养。如遇停息多日之时，地方官并须于牲只经过路径，及有关牲只买卖地点，拨给足用地段，以作牧场。如用牧场时间，超过三月以外，即须偿费。

第十五条：俄国沿界居民，向在蒙古割草渔猎，素已相沿成习。嗣后仍照旧办理，不得稍有变更。

第十六条：俄国属下人等，及其所开处所，与蒙人、华人往来约定办理之事，可用口定，或立字据。其立约之人，可将所立契约，送至地方官厅呈验。如地方官厅以为呈验契约有窒碍之处，当从速通知俄国领事；并与该领事会商，将所出误会，公同判决。今应暂行定明：凡有关于不动产事件，务当成立约据，送往蒙古该管官吏，及俄国领事

处，呈验批准。如享用天然财赋（指矿产、林业等而言）之契约，必须经过蒙古政府批准方可。如遇有争议之时，无论因口定之事，或立有字据之件，可由两造推举中人和平解决。如遇不能和解时，再由会审委员，共同判决。会审委员，分常设、临时两种。常设会审委员会，于俄领事驻在地设置之，由领事或领事代表，以及品级相当之蒙古官吏一人组织之；临时会审委员会，于未设领事之处，酌量所出事件之紧要情形，暂行开设，由俄国领事代表，以及被告居留或所属蒙旗之蒙王代表组织之。会审委员会，可招蒙人、华人、俄人为会审委员会之鉴定人。会审委员会之判决，如关于俄人，即由俄国领事从速执行；其关于蒙人、华人者，则由被告所属或所居留之蒙旗蒙王执行之。

第十七条：此项通商章程，自签押之日实行。

（此项友谊通商条约，系于俄历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即十一月三日〕在库伦签字。并于同日，续签通商章程一件。见于《俄国政府法令全书》第二百五十五号。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即一九一三年一月一日〕发行。）

附录一

王光祈年谱

（一八九二年十月五日至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二日）

韩立文　毕 兴

目　录

前 言

赵 沨

王光祈，现代中国音乐学的开拓者。用历史的眼光来评价他的成就，在现代音乐史上应该和肖友梅、黄自并列，而在音乐学的领域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

王光祈为人、治学、处世，都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这两个字就是“真诚”。

首先，王光祈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他参加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目的在于救国。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改学音乐，其目的还是在于救国。因为他深信开发民智、振奋国魂要从音乐做起。这虽然可能是受了儒家的“礼乐治国”主张的影响，但他的主张无疑地比儒家大大向前进了一步。

其次，王光祈在政治上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没有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也是一个真诚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他的一些同时代的政客们不同，不是高喊“社会主义”作为沽名钓誉或者做官的敲门砖，而是真诚地相信空想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可能也是受到儒家“大同社会”主张的影响，但无疑他也远远地超过了儒家。

第三，作为音乐学家，他是尊重科学和实践的。有人对他的《中国音乐史》曾经有过不公正的评价，但我们认真地看看他的原书，他以乐律研究为中心，探讨中国乐制的根本问题，通过前人的科学实验，加上自己在艰苦条件下作的补充实验，来阐明中国历代乐律问题的症结，可以说是第一个用科学实验方法和现代数学计算方法系统整理几千年来中国乐律问题的音乐学家。这一点，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中来考察，也是很难能可贵的。比如他把中国乐制作为世界上独特的乐制来研究，即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也还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我不记得谁说过，本世纪之初，有一个“读书的音乐界”，意思是说：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少音乐爱好者，只有通过读书来自学音乐。在当时，丰子恺的一些著作，通俗地介绍了一些西洋音乐知识，起到了普及音乐知识的巨大作用。与此同时，王光祈的一系列著作，相比之下，在“读书的音乐界”所起的作用，远比前者更为深刻和久远。

过去，在阶级标签满天飞的时日，由于王光祈在早期的政治活动中，曾经和曾琦、

左舜生有过来往，并且由于他没有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对于他的学术成果的评价也不够重视和公允。这是我们音乐学界应该引以为训的。

一九八四年六月，第一届“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四川音乐学院召开之后，编选出版了《王光祈研究论文集》，现在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四川音乐学院韩立文、毕兴同志经过几年来广泛收集资料编写成的《王光祈年谱》一书。这不仅是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学的开拓者、奠基人王光祈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而且对于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王光祈在政治上走过的道路，吸取其经验教训，研究他在音乐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继承和发扬他在这一领域中所作的工作，都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

一九八五年十月

勤于探索，苦斗一生

——介绍著名音乐学家王光祈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二日傍晚时分，著名音乐学家王光祈怀着拳拳爱国之心，在德国波恩，悄悄走完了尚未及满四十四年的短暂而光辉的人生旅程，和亲爱的祖国永别了！

王光祈是我国“五四”时期颇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是现代中国音乐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为振兴中华，辛勤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艰苦奋斗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尽管，迄今他离开我们已经有五十个春秋，但他在历史上的卓越贡献和功绩，仍是我们永远不能忘却的。

王光祈，字润玙，笔名若愚，出生于清朝正在衰亡的一八九二年，那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多事之秋，家道衰落，生活清苦，靠着寡母做手工活和自己放牛割草来贴补家用。在具有传统文化素养的母亲和塾师熏陶下，他很小就知道川人革命先驱者如戊戌六君子中的刘光第、杨锐，十九岁在上海入西牢而瘐死的邹容，奋不顾身炸良弼的彭家珍等人的革命故事，萌生了强烈的民主爱国意识。

一九〇八年，王光祈在成都第一小学堂高年级就读一年毕业后，考入师资力量雄厚的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从小好学深思的王光祈，来到天府之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成都府，大大开阔了心胸和眼界。他用功苦读，接受了许多思想开明而博学的良师的培养和影响。在同学中，他从不轻易和人交往，只喜欢结交有学问、有见识的人。如同班同

学中的郭沫若、周太玄、李劼人、魏嗣銮、曾琦等，当时与他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常常邀约漫游成都的武侯祠、杜工部草堂、浣花溪、望江楼等名胜古迹，一起议论时事政治，围坐"撞诗钟"，"对神仙对子"，作诗唱和，以抒发自己愤世嫉俗、立志奋飞的思想感情。他们正是一批青春年少，风华正茂的热血男儿。郭沫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这些人在当时都是"同学中的佼佼者"，而王光祈在其中又名列首位[①]。一九一一年夏秋之际，四川的保路风潮无情地冲击着清王朝在成都的统治，有志青年都在开始探求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出路，都在开始考虑什么是真正的救国救民之道。王光祈在这段时间里，除学习四书五经、唐宋八大家等大量传统文化外，还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识。他一方面看到辛亥革命推翻了黑暗腐朽的满清王朝，民主共和的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但同时也深深痛苦地感到，四川同全国一样，政权由清王朝转到地方政客和军阀手中，封建势力并未彻底打破，天府之国依然民穷财困，巴山蜀水仍在一片黑暗之中。王光祈在"成都兵变"后陷入赤贫的境地，他在衣食交困中挣扎到一九一二年底始毕业于成都府中。素有宏图大志的王光祈，毕业后面临的却是失业、贫困和饥饿的折磨，这使他对中国不彻底的革命，现实的黑暗，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他在痛苦中追求，在求知中探索，决心离开四川，"要彻底打破现状，创造新路子"，朝着理想奋飞！就是在这个革命的转折时期，王光祈已初步具备了民主爱国主义思想。他的挚友李劼人说："大凡他后来那种'打得粗'、'吃得苦'、'跑得路'、'打落牙齿连血吞'、'咬紧牙关不求人'的坚强性格和积极进取精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②]

一九一四年，王光祈告别家乡，乘船东下，在飞渡夔门时，触景生情咏诗抒怀，表达自己"千载忧难已，深宵剑自鸣；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的勇气和决心。后从上海到北京，任清史馆书记员。同年秋，考入中国大学专门部法律本科。王光祈在大学学习的四年，正是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四年。他先后任《京华日报》、《四川群报》、《川报》的编辑和记者，还悉心研究《国际公法》和《中国外交史》。这样的环境，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充实了思想。对内忧外患的祖国，对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常常忧愤难眠。但他又找不到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常常感到孤掌难鸣，窘迫无计。他曾在一些诗中感叹自己像"枯柳飘蓬"，虽有报国之志，但"落拓都门"，只有"相对欷歔"，仰天长叹了。

王光祈于一九一八年七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在此之前，由于做报纸的编辑工作，他和周太玄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高一涵等人，与他们常有往还。王光

① 郭沫若：《少年时代》。

② 李劼人：《诗人之孙》，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祈和周太玄称李大钊为“知心的老大哥”，虚心向李大钊请教，彼此间推心置腹，常作深谈，因而获益不少。李大钊对王光祈的印象亦甚好，他说：“光祈是一个能想、能行的青年，极有志气。”① 是年冬，陈独秀和李大钊发起创办《每周评论》，这是一个密切配合政治斗争，和《新青年》互为补充，在“五四”运动的思想准备方面起重要作用的刊物。王光祈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并为创刊号写了《国际社会之改造》的社论。文中热情地欢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这在“五四”运动的前夜，起到了宣传和推动的作用。此后，他还发表了若干文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军阀的黑暗统治。

“五四”运动时，王光祈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他积极参加了这场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亲自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游行行列。并于当天晚上，热情洋溢地将北京的情况写成长篇通讯寄发成都《川报》，这一消息报导，大大促进了四川爱国运动的开展。后来，李劼人在回忆中说：“北京‘五四’运动之所以及时传到成都，使成都青年得以及时看到这线光明，就不能不归功于王光祈了。”②

“五四”运动之后，各种进步刊物和社团纷纷出现，振兴中国，追求民主解放，形成了一股不可抵挡的洪流。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由陈淯、张尚龄、曾琦、李大钊、周太玄、雷宝菁、王光祈等七人发起筹备的著名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正式成立。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王光祈被选为执行部主任，主持学会工作，并负责编辑出版《少年中国》与《少年世界》两种杂志。还亲自介绍了毛泽东、赵世炎、张闻天、恽代英等人入会。学会的活动对当时的思想界、文化界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国外的各种思潮，纷纷传入我国。王光祈这时贪婪地学习着新文化、新思想。他吸收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及“无政府主义”，欧文、圣西门、傅利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和日本武者小路的“新村主义”，创建了“工读互助团”。他发表文章，四处奔走，终于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思想文化界名流的支持，联名募捐，筹措经费。北京“工读互助团”终于成立，这在青年知识界中引起了轰动，得到社会上的广泛关注。同时，对在国外勤工俭学的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九二〇年二月，毛泽东在北京参观了女子“工读互助团”，很感兴趣。随后即与陈独秀、王光祈等二十六人联名发起“上海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团”之所以名噪一时，受到欢迎，是因为它具有“五四”时代中国式

① 傅斯年：《追忆王光祈先生》，载《王光祈先生纪念册》，文海出版社。
② 李劼人：《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所由成立》，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当时进步青年痛恨旧社会，痛恨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向往光明、美好的社会的反映。

王光祈通过“少年中国学会”、“工读互助团”苦苦探索改造中国的良方。但由于其主观空想性质，及团体内部无法克服的思想分歧和内部斗争，这两个组织相继分裂解散。尽管如此，王光祈在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仍不失为是一个大胆探索者，是一个在历史上不应被忽略的人物。

“工读互助团”的解体，使王光祈的内心很痛苦，他决心远涉重洋，到当时正致力于战后复兴的德国去考察学习，以获得较有系统的学问，以学术上的奋斗，来继续实现“少年中国”的理想。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他以《晨报》、《申报》和《时事新报》特约通讯记者身份，与魏嗣銮等由吴淞启航赴欧，于六月初抵达德国的法兰克福。

到达德国，是王光祈新生活的开端，也是他在学业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他加强补习德文，攻读政治经济学，并利用晚上时间与魏嗣銮一起翻译德国各大报纸的重要新闻分寄回国。同时，还为国内各报刊杂志撰稿。在德初期，他完全靠稿费收入维持生活。

王光祈赴德不到三年，即放弃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改学音乐。在一九二七年进入柏林大学音乐系深造以前的短短四年中，已经在国内发表出版了《德国人之音乐生活》、《欧洲音乐进化论》、《东西乐制之研究》等十二种有关音乐的著述，显示出他在音乐学研究方面的才能，引起国内音乐界的瞩目，也使得反对他改习音乐的朋友们感到意外和惊讶。

王光祈改习音乐，是受到爱国心的激励和驱使的。当他在德国实地看到欧洲国民对于音乐的热情，“以至非有音乐不能生活的境地”，因而得到启发，认为要改造中国，即应先行改造人心，而改造人心，就必须从恢复“礼乐”开始。王光祈十分尊崇孔子，尊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礼乐”观。王光祈认为“礼乐”与中华民族的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礼乐’不兴，则中国必亡”。他十分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认为音乐是“最足引起‘民族自觉’之心”，具有“陶铸‘民族独立思想’之功”[①] 的艺术，特别强调“音乐化人”、“寓教于乐”。他表示自己从事音乐的目的，正在于“欲借此以唤醒‘中华民族本性’，为抵抗外国文化侵略之工具”[②]。王光祈的这些观点，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儒家“礼乐观”的继承和发展。他热情洋溢地宣称：“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固有之音乐血液，从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因此之故，慨然有志于音乐之业。”[③] 王光祈就是这样抱着用“音乐再造中华民

---

① 王光祈：《中国音乐史》自序。
② 王光祈：《国人能力破产之可惊》，载《醒狮》三十二号。
③ 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自序。

族”的宏图大志，以“焦头烂额死而无悔”的决心，开始他从事音乐研究的学术生涯。他先后师从霍恩博斯特尔、舍尔林、沃尔夫、萨克斯和席德迈尔等教授。由于刻苦钻研，用力至勤，王光祈在音乐学研究，特别是在音乐史学方面获得了较高的造诣和成就。

王光祈旅德期间，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人所受到的歧视，有着切肤之痛。他在德国虽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但却怀着浓厚的民族感情，始终立足于自己祖国的民族音乐。他身处异国，在中国音乐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仍毅然从事整理、研究和总结祖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工作。他在《中国音乐史》这部专著中，对中国音乐的乐律、调式、乐器、乐队、诗乐、器乐以及音乐思想等均作了归纳和整理。特别是对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律学发展作了比较系统的叙述和探索性研究。他还另作短史，向欧洲人介绍中国音乐发展的概况，充分表现了他的民族自豪感。王光祈所做的这些工作是他理想的第一步，即：以促进创造“引起民族自觉心”的“伟大国乐”。这样的国乐，即是他在《欧洲音乐进化论》一书中所指出的“要建筑在吾国古代音乐与现今民间谣曲上面”的。因为，他认为“这两种东西，是我们的‘民族之声’”。既然音乐作品须建筑于“民族性”之上，那末音乐艺术就决不可以像引进其他科学技术那样照搬西洋的一套，决不能“以西乐代庖”，更不能依靠那些“黄面黑发”的“洋音乐家”，而必须在传统音乐的基础上进行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他主张一面先行整理、学习我国的古代音乐遗产，一面辛勤搜集民间音乐，然后再运用西洋音乐的科学方法，创造出一种具有民族性的新音乐。这种新音乐能够参加世界音乐之林，与西洋音乐成一个对立形势，并使之“跻于国际乐界而无愧”。王光祈渴望祖国独立富强，他的深沉的爱国主义和炽烈的民族感情融铸在音乐研究之中。

但是，王光祈在音乐研究中的一些观点也是带有局限性的，如他认为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无识”、“无业”，在性格上存在缺点。因此，他主张普及教育和发展实业可以治疗社会弊病，再就是利用西洋的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用以唤起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完成我们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不是通过革命，从根本上改造社会，而是想用改良的方法去改造社会；他把音乐置于单纯的伦理道德范畴，过分强调了音乐作为教化的手段，不适当地夸大了音乐的社会功能，认为音乐可以“立国”、“兴邦”等等，企图借助音乐的手段，实现他那梦寐以求的理想王国——“少年中国”。

王光祈致力于音乐学研究，是在六十年前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他从时代、社会和自身的需要出发来积极探索复兴祖国的新路时，他的探索和研究是基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要求，因此，他的一些主张和观点，无疑地带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性。

王光祈从事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很广。他从一九二三年改习音乐开始，通过译著编选有关著作，坚持比较全面、系统地向国内介绍西方音乐文化，一方面介绍西方各国人民的音乐活动状况，一方面介绍音乐科学与作曲理论。这些著作的出版，对于音乐知识相当贫乏和眼界比较闭塞的二三十年代的国内青年，是具有启蒙意义的，促进了当时国内青年对西欧音乐文化的学习和了解。他还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撰写了《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等著作，向国内介绍了二十年代在德国也属于新兴科学的比较音乐学，对我国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从一九二六年起，王光祈又开始将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介绍到西方。他先后在德国发表了用德文写成的介绍中国音乐文化的文章和专著，还为《大英百科全书》、《意大利百科全书》的重新修订撰写了有关中国音乐的条目。一九三四年，他以《论中国古典歌剧》的论文获得波恩大学博士学位，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早在欧洲为祖国争得荣誉的音乐学家，也是我国最早获得世界承认和肯定的音乐学家。王光祈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其他领域也做了大量工作。早在一九二一年，他就与魏时珍、宗白华等人发起组织留德学生“中德文化研究会”，其宗旨即是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中德两国民族的同情和了解。

王光祈在留德期间生活相当艰苦。他曾说自己“是一个极穷的小子，未曾受过家庭一文的遗产，也未用过官厅一文的公费”，他的生活来源是依靠半工半读。他非常勤奋，治学严谨，主张研究问题要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不惜以毕生之精力从事”。他往往为研究一个问题，查阅一条资料，翻译一个名词或几首古谱而在图书馆里耗费数月心血。他在《中国音乐史》一书自序中说：“余留德十余年，皆系卖文为活，自食其力，即本书一点成绩，亦系十年来孤苦奋斗之结果。”王光祈旅德专习音乐仅十三年，但其论著竟达三十四种之多，国内正式出版的就有近二十种。他在音乐史学、音乐美学和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面作出了诸多贡献。作为一个先驱者，他做了不少探索性的工作。此外，他“以译著事业，报效祖国”，利用业余时间编译了中国近代外交史料七册，《国防丛书》一套，以备国人参考，这亦属于爱国的举动。他作为记者撰写了数百篇通讯文稿。由于过度勤奋于研究著述，他患有胃溃疡、贫血病和头痛症，竟数次昏倒在图书馆，终至脑溢血突发客死在波恩。王光祈清贫一世，孑然一身，始终怀着对祖国的赤诚，在海外孤苦奋斗十六年，坚持着他的学术生涯。

王光祈的一生，是和祖国民族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一个热诚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名字和著作，在当时曾影响了许多青年走向社会和从事音乐，其影响也远及海外。他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述，是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在延安

时，曾对王光祈的业绩作了高度评价。他说："我们不能忘记一位埋头苦干死于柏林①的中国音乐理论家王光祈，他遗下给我们许多宝贵的著作和翻译，推进了新音乐运动的发展。他的刻苦耐劳是我们从事中国新音乐的模范。"② 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吕骥为《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书写了"王光祈的全部音乐论著都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辉"的题词，四川老革命家张秀熟为建立在四川音乐学院的"王光祈墓碑亭"撰写了"革命先驱，少年中国；蜚声寰宇，音乐名家"的楹联，这些都是对王光祈的光辉而短暂的一生的最好评价。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说　明

一、本年谱简要地记载了王光祈的社会经历及著译活动。当时国内外大事，除与谱主有直接关系者外，一般从略。

二、年谱中记载的社会活动及著述，凡涉及王光祈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的主导方面，皆略作提要式的说明。一般不具体介绍。

三、年谱中的著译，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写作时间不详的按发表时间编入。日子不详的编入本月月末；月日不详的编入本年年末。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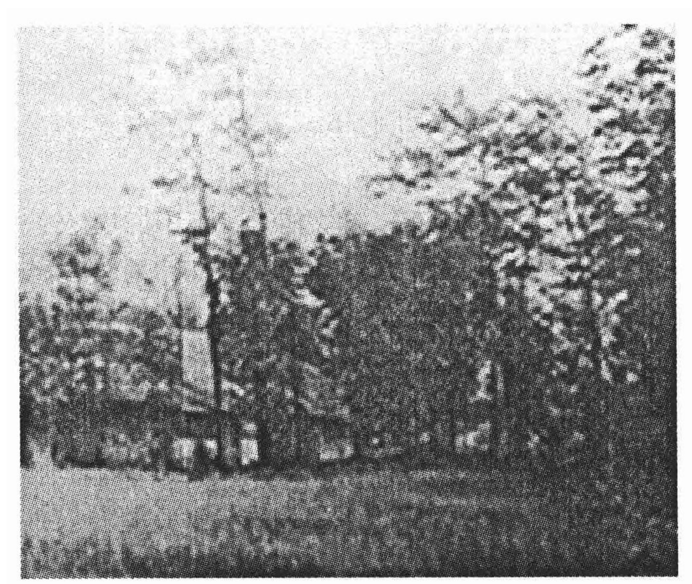
① 柏林：波恩之误。

② 冼星海：《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

一八九二年

十月五日（旧历八月十五日）王光祈出生于四川省温江县城西门外鱼凫镇小河村。

其祖籍原在湖南。高祖王宏信，约在清朝乾隆年间经商（铸锅业）入川，始定籍温江[①]。



王光祈故居



宣統元年仲夏月鐫

溫江縣鄉土誌

板存官高小學堂

《温江县乡土志》

① 《温江县乡土志》，宣统元年仲夏月镌。

祖父王再咸，字泽山，能诗善文。清代咸丰壬子科举人。后两次进京会试未第，滞留北京教馆，过着寄人篱下的教书生活。曾作过后来相继出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赵尔丰两兄弟的授业老师。五十二岁，卒于北京。著有《泽山诗钞》二卷。

父亲王展松，字茂生（或梦生），本县秀才。曾在清政府内阁供职，后弃职回家经营锅厂。在王光祈出生前两个月，客死隆昌旅次。

光祈是王家的独生子，出生时家道衰落，家庭生活陷于困境。仰仗孀母劳动和叔伯们不时接济，勉强度日。

一八九七年（五岁）

光祈的母亲罗氏，出身“书香门第”，知文能诗，是一位具有传统文化素养的妇女。光祈五岁时，母亲便教他识字念诗。光祈秉性聪慧，有很强的记忆力，一经教读，便能琅琅上口，经久不忘，母亲十分钟爱。

一九〇〇年（八岁）

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光祈帮附近农家放牛。这时，他已经跟母亲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孝经》以及《唐诗三百首》等书，并且能够对联语，一次其母戏出“以天下为己任”，王光祈脱口而出，对以“视富贵如浮云”①。

一九〇一年（九岁）

其母卖掉家里仅有几亩园林和院落，迁居县城西门外麻市街，并送光祈到相距不远的三官庙侧一所私塾上学。

塾师蒋春帆，是一位饱学之士，推崇康有为、梁启超诸人，常向学生讲述戊戌六君子的故事，川人刘光第、杨锐慷慨就义的事迹，在童年时代王光祈的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① 见戴尧天：《王光祈温江故乡生活志略》。

有一次蒋春帆教师出“观今鉴古”一联，王光祈立即对出“除旧布新”，教师十分满意①。

一九〇七年（十五岁）

是年，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通过查访，得知光祈母子生活拮据，度日艰难。赵念及王再咸教诲之恩，将光祈母子接到成都相见。并从四十八家当铺罚款中，指拨纹银一千两，存入东、南门两家最大的典当商铺生息，每年可支息银四十余两，供他们母子生活。

由于这一偶然的机缘，王光祈才得以离开温江，于当年以同等学历进入胡雨岚创办的成都第一小学堂高年级。赵尔巽命他每周交一篇作文，“亲自给他改削，同时并给他报捐了一个同知前程。”②



王光祈就读于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名册

① 见戴尧天：《王光祈温江故乡生活志略》。
② 李劼人：《诗人之孙》，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同知”是可以补实缺的官。

一九〇八年（十六岁）

王光祈考入成都有名的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与郭沫若、李劼人①、周太玄②、

① 李劼人（1891－1962），原名李家祥，笔名老懒、抄人、菱窠，四川成都人。1908年考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先后与王光祈、周太玄、魏时珍、郭沫若、曾琦等同班就读。他既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法国小说翻译家（是福楼拜名著《包法利夫人》的第一位中文翻译者），又是一位杰出的小说作家，曾创作《死水微澜》、《大波》等长篇小说。

1915年底至1919年初，在成都从事新闻编辑工作，先后任《四川群报》主笔、编辑和《川报》社长兼总编辑。他怀着“复兴民族精神”的热望，在古老闭塞的成都开辟了新文化阵地。1919年6月，应王光祈之邀，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并率先在成都成立分会，出任书记并主编该会刊物《星期日》。《星期日》和《川报》对新思潮在四川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19年8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并在周太玄、李璜主办的“巴黎通讯社”任编辑。1924年秋回国后，他怀着实业救国的愿望兴办工厂，先后出任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担任成都《民力报》总编辑、《新川报》文艺副刊主编，同时还进行文学创作。他一生发表各种著述及译作约六百万字。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副市长、四川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四川分会副主席等职。

② 周太玄（1895－1968），原名周焯，号朗宣，后改名周元，号太玄，四川成都人。我国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科学家、诗人和翻译家。1912年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与王光祈、李劼人、魏时珍、曾琦、郭沫若等系同班同学。1916年秋，与潘力山在北京共同创办宣传新思想的《京华日报》，同时任《中华新报》编辑。1918年6月，参加创办“少年中国学会”的筹备工作，并担任文牍。1919年2月，赴法勤工俭学。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后，即在巴黎设立分会，由周太玄负责分会工作。当时留学日本、美国以及南洋的少中会员均由巴黎分会领导。周太玄实际上是“少年中国学会”留学生中的核心人物。1919年2月到巴黎后，他邀请李璜共同创办了“巴黎通讯社”，从而打破了国内传媒的国际新闻全由外国通讯社长期垄断的局面，这无疑是对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一大贡献。1919年5月4日，第一个将巴黎和会消息发回国内的便是“巴黎通讯社”。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操纵下，通过了由日本接替德国在我国山东权益的决定，顿时点燃了中国人民心中的反帝怒火，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就此爆发。

1920年秋，周太玄偕妻王耀群来到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大学学习，周太玄攻读博物学。1924年获得该校教育学硕士后，进入巴黎研究院，专门研究细胞学和腔肠动物。留法十年耕耘，周太玄完成了七部专著、四部译著和数十篇论文，并荣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

1930年冬，周太玄回国，除长期担任大学教授外，还曾任西康经济研究所所长和香港《大公报》顾问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和文教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重庆大学校长、中国科技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还曾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等职，为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魏时珍 ①、蒙文通、曾琦 ②等先后同班。

---

① 魏时珍（1895—1992），名嗣銮，四川蓬安人，我国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1912 年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与王光祈、李劼人、周太玄、郭沫若等同班就读，1918 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电机科预班，后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0 年与王光祈同船赴德留学，师从著名数学家希伯特和柯朗，学习偏微分方程，在当时的数学物理领域前沿做了深入的研究。1922 年 9 月，朱德赴德留学，次年 5 月，他与好友孙秉文从柏林移居哥廷根市，这时魏时珍是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会长，他主持了中国留学生为朱德举办的欢迎会，因此而结识了朱德、孙秉文。此后，朱德、孙秉文曾随魏时珍学习了两年德语。1925 年，魏时珍在哥廷根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学成归国，历任同济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及成都大学、四川大学理学院院长等职，创办川康农工学院、国立成都理学院并主持院务。魏时珍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

魏时珍是中国数学界元老，1935 年当选中国数学会理事兼杂志编委会委员，是我国最早研究偏微分方程的学者之一，著有《偏微分方程论》、《量子论的数学基础》、《人类进化面面观》、《康德与马克思对话》、《孔子论》等学术著作及哲学思考论文若干，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1983 年，魏时珍在海外的朋友和学生收集了他流传海外的著作，汇集出版了《魏嗣銮先生科哲论文集》。

在促进中德文化学术交流方面，魏时珍十分积极，贡献良多，他曾与“少中”会员王光祈、宗白华、张梦九等人发起组织法兰克福留德学生“中德文化研究会”。他是最早沟通当时作为世界数学中心的哥廷根学派与中国数学界联系的学者，也是最早向国内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学者之一，爱因斯坦曾具函致谢。1975 年，德国哥廷根大学向魏时珍颁发了获得该校博士学位五十周年的金禧证书，以表彰他为科学事业，为促进中德文化学术交流所作出的贡献。

1986 年，魏时珍当选为四川省政协第五届委员。同年，在成都参加由四川音乐学院主办的第一次全国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并作了《忆王光祈》的发言。

1992 年 6 月，魏时珍因患食道癌病逝于成都，享年 97 岁。依照他的临终嘱咐，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骨灰撒入江河以回归自然。

② 曾琦（1892—1960），字慕韩，四川隆昌人。1912 年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与王光祈、李劼人、魏时珍是同班同学。1916 年秋，赴日人东京大学攻读法政科。1918 年 5 月，怀着爱国热情的曾琦、张梦九等千余留日青年学生，为抗议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中日秘密军事协定》，愤然从日本罢学回国。此后，与王光祈、周太玄等七人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少年中国学会”逐渐分化，曾琦开始向右转变。1919 年 8 月赴法留学。1923 年底，留法学生中，部分人组织“国家主义青年团”，曾琦任委员长。1924 年归国，任上海大厦大学教授，发行《醒狮》周报，鼓吹国家主义。1929 年，“国家主义青年团”更名为“青年党”，曾琦是该党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支持国民党政府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1946 年底，公开投靠蒋介石，被任命为国府委员，聘为总统府咨政。1948 年 10 月赴美，1960 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



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监督刘士志先生。史学家，革命党人。为人正直，思想开明，对王光祈及其同学有深刻的影响。（照片选自王嘉陵、郭志强：《李劼人图传》。）

刘豫波先生（1857—1949）。清光绪拔贡。尊为成都“五老七贤”之一，道德文章，名重一时。是王光祈中学时代最崇敬的老师。（照片选自王嘉陵、郭志强：《李劼人图传》。）





李劼人（1891—1962）



周太玄（1895—1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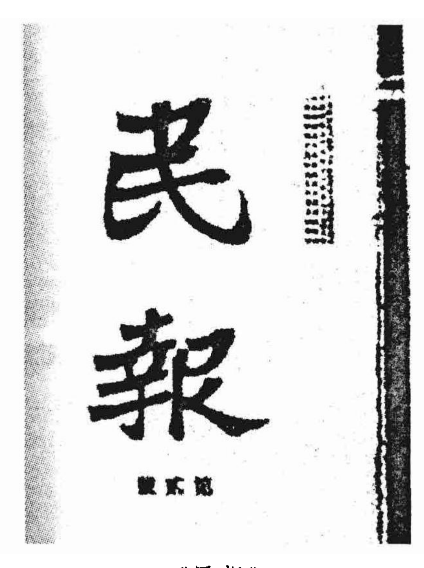
魏时珍（1895—1992）



曾琦（1892—1960）

这是一所旧制五年制中学。当时的“一代名流”如刘士志、刘豫波、王铭新、杨沧白、刘咸荣等，先后在该校任教。他们热心提倡新学，秘密在学生中鼓吹“排满兴汉”，倡导学生阅读鼓吹改革、宣传推翻清朝的《新民丛刊》、《民报》、《神州日报》、《民呼报》以及严复的《天演论》等进步书刊。教导学生要“薄于自奉”，“勇于治学”。

王光祈在良师的栽培下，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识。他学习努力，思想活跃，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在这个时期，他初步奠定了民主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



《民报》

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一书中，记述了他们当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学习生活，称王光祈是“同学中的佼佼者”。

一九〇九年（十七岁）

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虽然有以校长刘士志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提倡新学，鼓吹改革；但也有以新任监督（即校长）都敬阶（绰号“都喇嘛”）为代表的守旧派，坚持旧的封建教育方法、效忠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王光祈对学校设置的那些禁锢思想、旨在复旧的课程和管理方法极为蔑视。事为都敬阶所知，在第二年开学时，以“桀骜不驯”为由，不准他和另一同学魏嗣銮住校。后经多次说情疏通，学校才撤销了这一决定。

一九一〇年（十八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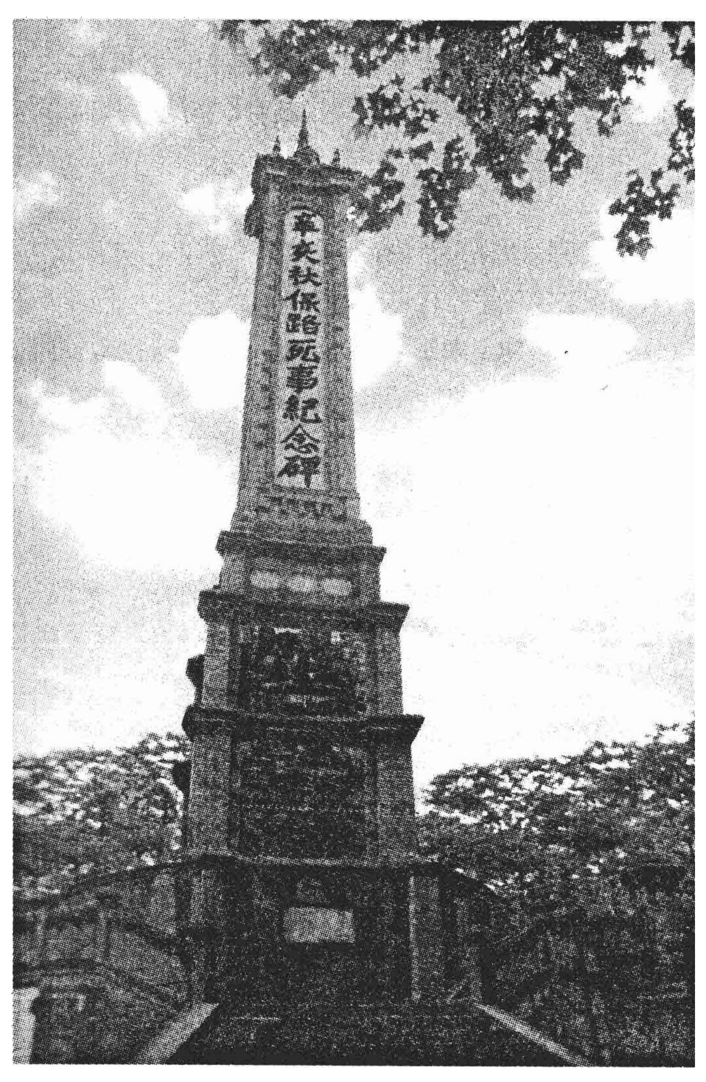
在其母包办下，与罗次玙结婚。

罗次玙比光祈小一岁，温江镇子乡人。知书识礼，温柔贤淑。且长于刺绣，善于操持家务，婚后夫妻感情尚好。

一九一一年（十九岁）

夏秋之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王光祈以高昂的热情投入了保路运动的洪流，和同学们一起听四川省谘议局副议长、四川保路同志会副会长罗纶激动人心的演讲，高唱《保路歌》，加入了罢课和游行的行列。十月十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王光祈立刻剪掉了自己头上象征腐朽落后和屈辱的辫子，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希望。

是年，罗次玙生一子，数月后夭殇。



坐落在成都市人民公园内的保路运动纪念碑

一九一二年（二十岁）

三月　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由于经济困难而停办，原丙、丁两班，合并到成都府中。王光祈也随之进入该校，编入第九班即新乙班学习（见《石室纪事》）①。

辛亥革命后，由于成都兵变，藩库、商行、当铺及大小公馆，一夜之间被叛兵、土匪、流氓纵火焚烧，洗劫一空。这场浩劫，断绝了王光祈一家赖以生活的四十两息银的来源，使他顿时陷入赤贫境地。在衣食交困中，他挣扎到当年十二月，毕业于成都府中（见《石室纪事》）②。

李劼人在《诗人之孙》一文中说："大凡他后来那种'打得粗'、'吃得苦'、'跑得路'、'打落牙齿连血吞'、'咬紧牙关不求人'的精神，就是在这时节养成的。"

一九一三年（二十一岁）

春　在重庆与曾琦、郭步陶、宋小宋等人编辑《民国新报》，意图一展抱负。辛亥革命后，四川政局混乱，他思想也很苦闷，常和报社同人，作诗消遣，曾作有《清明词》三十首。不久，报馆关门，他又到成都一家无聊的报社作主笔，空暇时间，常和李劼人一道在少城公园相对闷坐，连说笑的兴致也没有了。由于他不愿"随波逐流的鬼混"③，没有多久，他便挟起小包裹，回到他的家乡温江。

王光祈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说："我家里又经成都兵变，家产荡然，搬到乡间一个顶坏的房子居住，我的母亲又在病中，当时受了孔方兄的压迫，真是实行不用仆役主义，我自己烧饭、炒菜。……而且一面烧饭，一面读书，竟读完了陶、谢、王、孟、韦、柳各家的专集，还看了许多经史的书籍"④。这一段时间的潜心钻研，为他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在温江，他和赵君凯、崔干臣、彭云生等经常往还，或作诗唱和，或纵论国事。光祈的诗才、辩才，常为同辈倾慕。曾远侯在给许孟余的信中曾用"润玙旧相识，遗词潘

① 《石室纪事》，甲子5月2日成都联合县立中学校编。
② 同上。
③ 见王光祈《致黄霭女士》，载《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
④ 同上。

陆美”的诗句来赞美王光祈[1]。

他的母亲由于长期劳苦忧虑，于是年病逝。一岁半的女儿，也在当年死于天花。

一九一四年（二十二岁）

春　李劼人的舅父官任泸县知事。李劼人任秘书兼文教科长。王光祈到泸州李劼人处小住，筹措赴京旅费。

在泸州他致函在上海读书的周太玄，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表露了许多惊人而宝贵的见解。结论是“要彻底地打破现状，创造新路子”[2]。

春末　赴重庆，乘船东下，飞渡夔门。沿途触景生情，写下了《夔州杂诗》六首[3]，描写了故乡人民的苦难，倾吐了自己心中的抑郁和不平。

（一）

今夜孤城外，悲风战马嘶。
猿声过峡断，人语入舟低。
蜀道仍荆棘，秦军自鼓鼙。
居民苦行役，闭户水东西。

（二）

白帝城边树，春来处处深。
征吴存大义，入蜀系天心。
髀肉今难抚，夔巫日又沉。
遥怜东逝水，终古尚阴阴。

（三）

万里瞿塘水，滔滔怒不平。
中原还逐鹿，竖子竟成名。
千载忧难已，深宵剑自鸣。
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

---

① 见戴尧天：《王光祈温江故乡生活志略》。
② 见周太玄：《王光祈先生与少年中国学会》，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③ 《夔州杂诗》，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四）

不知云外路，已作峡中人。

水落鼋鼍怒，风微日月真。

野花迷古渡，幽草送残春。

独有青城客，劳劳滞此身。

（五）

两崖如壁立，一线漏青天。

乔木临风倒，苍藤带雨悬。

乾坤浮不老，云雾暗相连。

祇合同僧住，时携买酒钱。

（六）

雷声才着壁，风已过夔门。

四面奇峰乱，千年怪石尊。

江湖如有讬，舟楫漫招魂。

无限浮生事，凄凉未忍论。

当他辗转到达上海吴淞车站时，他的朋友几乎不敢相信。魏嗣銮回忆王光祈到上海的情景是："一身破旧衣裳，一个脸盆，一部杜诗，布鞋后跟烂得像鱼尾巴一样拖起了。"[①]

王光祈到上海还给周太玄、魏时珍两位好友"带来了两件宝贵礼物，一件是同窗李劼人赠送的近照，背面还有他即兴题写的诗句。内容诙谐，充分显示出李劼人的性格，另一件便是王光祈过三峡时写下的《夔州杂诗》"。（载《魏时珍先生纪念文集》第21页。）

其后，他到青岛，复回上海再到北京。在赵尔巽（时任清史馆总裁）的帮助下，到清史馆任书记员。月薪八元，后升为三十元。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赴德留学时为止。

是年夏秋之间，写《寄内》（七律），表达了寄人篱下的失意心情[②]。

《寄内》（七律）

万里依人计已非，百年出没寸心违。

敢夸秋思如明月，错把春愁诉夕晖。

① 《访问魏时珍教授谈话记录》，1983年。

② 《寄内》，载《少年中国》第1卷第11期。

天上浮云终有变，客中残梦不须归。
断蓬身世无消息，摇落江头雁又飞。

是年秋　考入北京中国大学专门部法律本科。着重研究《国际公法》和《中西外交史》，寓居北池子一间狭陋不堪的小屋，过着半工半读的艰苦生活。

一九一五年（二十三岁）

王光祈继续在北京中国大学专门部法律本科学习，并趁在清史馆工作之便，接触了大量清政府与各国所订的条约。他潜心披阅、研究，为后来从事社会活动及有关近代历史和近代外交方面的著译事业打下基础。

夜晚到青年会补习英语。

是年秋　袁世凯大造帝制舆论，准备复辟称帝。

王光祈目睹内忧外患的祖国，十分苦闷和愤慨，发誓要为国家民族尽炎黄子孙的一份力量。时值中秋佳节，王光祈二十三岁生辰时，与友人黄廷锐登陶然亭，议古论今，思绪纷然，赋诗二首，遥寄温江挚友崔干臣：

（一）

举世如狂乱象生，
独来亭畔听秋声。
直言已愧苏推事，
临眺应怜阮步兵。
南国干戈他日泪，
西风芦荻故乡情。
年年江海都成梦，
此日休疑节序更。

（二）

西台痛哭谢皋羽，
东观淹留定远侯。
投笔声威闻万里，
临风涕泪亦千秋。

布衣常笑轻秦帝，
残照相看类楚囚。
枯柳飘蓬无限意，
还如王粲赋登楼。

全诗铿锵有力，既表达了对班超、谢翱（字皋羽）爱国精神的崇敬和为国效力的宏图壮志，也流露出了一些对黑暗现实无能为力的忧愤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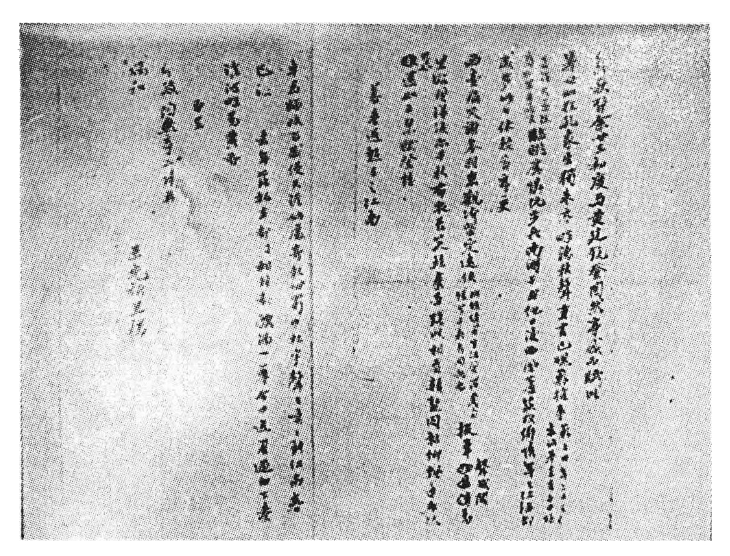
除以上两首外，还有：

《暮春送赵三之江南》（二首）

车马临歧百感侵，天涯何处寄秋心。
蜀中杜宇声声唤，唤到江南秋已深。

去年落拓去都门，相对欷歔酒一尊。
今日送君过白下，秦淮河畔易黄昏。

（以上四首存有王光祈手迹，原件现存四川师范大学崔宗复教授处。）



王光祈寄崔干臣诗词手迹

他的生活十分俭朴。这一年冬天，他每日生活费仅用四个铜元。早晚两餐均在极便宜的饭摊上与一般人力车夫一样，啃一个铜元的窝窝头，吃半个铜元的小米粥，半个铜元的小菜。后来他对恽代英回忆这段穷苦生活时说：“如是者两月，我才晓得在号称生

活昂贵之北京，每月有一两元的生活费，亦可以过活。”①

一九一六年（二十四岁）

由《四川群报》主笔李劼人介绍，王光祈兼任该报驻京通讯记者。他每天向成都寄剪报、发消息，从事反袁护国斗争和介绍新思想、新文化的活动。李劼人回忆说：他所写的“反袁世凯帝制和反张勋复辟的消息和文章又快又多而又有力”②。



中華民國四年十一月廿二號　四

四川羣報

原名四川公報

原第九百九十三號

現第四十八號

本報招登小廣告

新刑律彙解出版

論說

《四川群报》

九月二十五日　北京专电：《冯国璋劝告张勋》。

是年秋　周太玄由上海至北京，与潘力山共同创办《京华日报》，王光祈在该报任编辑工作。两人同在一个报馆，经常工作到深夜，理想和报负便成为这时倾心交淡的主题。他们深感“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决心“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他们决定：首先，要坚持发扬志气，艰苦奋斗，绝不同流合污，得过且过。其次，一定要奋勇向前，为国家民族找出一条道路。第三，只依靠少数人的一点友谊还不够，必须扩大圈子，使有为的青年都能团结在一起。他们还设想，要有一个不单在学问方面，还要在事业方面共同奋斗的团体。他们把以上这些想法，以通信的方式和在东京留学的陈淯、曾琦、雷宝菁等进行讨论③。

王光祈这时正醉心于国际外交的研究，有一次，他得到稿费二十元，按理应寄给乡居的妻子，但是，经过一夜寻思，他毅然决定买了一部商务出版的《外交月报》全份。

---

① 《王光祈致恽代英》，载《少年中国》第 2 卷第 11 期。

② 李劼人：《自传》，载《李劼人文集》第 1 卷。

③ 周太玄：《关于参加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一九一七年（二十五岁）

春　《京华日报》停办，周太玄到北京《中华新报》工作。王光祈继续在清史馆任职，并兼任《群报》驻京记者。

五月　四川泸县陈淯（愚生）从日本回国。他和王光祈早有书信往还，北京会面后十分高兴，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砥砺品行，探讨国家前途。

夏　由于报纸编辑工作的关系，也由于陈淯的介绍，王光祈和周太玄结识了李大钊（李于一九一六年六月自日本返京后，担任《晨钟报》主编，九月辞职。一九一七年一月，担任《甲寅》日刊编辑），彼此十分投契。李大钊年长王光祈三岁，思想成熟，气魄宏大，为人谦和，有长者风度。在交往中，王光祈、周太玄十分敬重李大钊。李大钊虽然工作异常忙碌，但对和王光祈、周太玄接谈却十分重视。每次约集，一定早到，而且谈话不限时间。曾有两次谈到深夜两三点钟。周太玄回忆说："由于他（李大钊）这种感召力，又由于他对这种结合的认真和虚心，很快我们便把他当作一个知心的老大哥，真是相见恨晚。"①

七月　张勋、康有为拥溥仪复辟。段琪瑞向北京发起进攻，讨伐张、康，张勋失败逃跑，段琪瑞入京重新执政。这一段时间，王光祈积极向成都发专电，写通讯，揭露张勋复辟的丑剧。

八月　（旧历七月七日）七夕之夜，王光祈邀彭云生、周太玄夜游陶然亭，吟诗二首：

（一）

客舍浑如梦，深闺漏正长。
百年一弹指，千里九回肠。
蟾影中天静，虫声永夜凉。
西风吹白露，秋意已茫茫。

（二）

细检平生事，无如此日闲。
秋心疏柳外，归思远峰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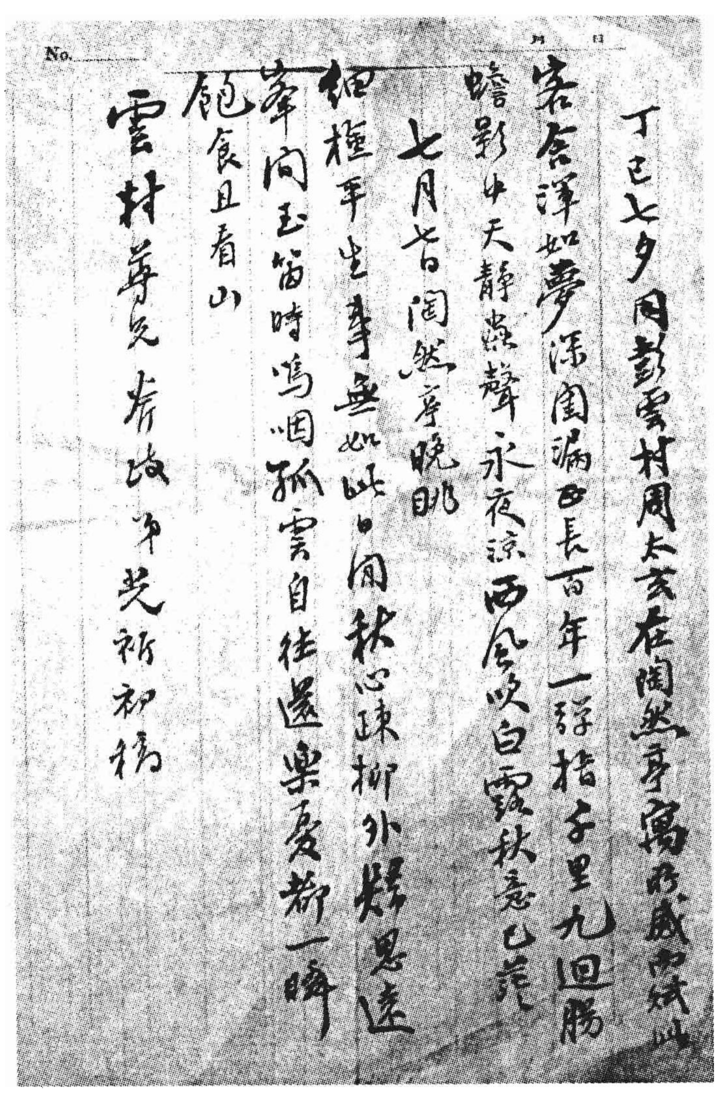
① 周太玄：《关于参加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玉笛时呜咽，孤云自往还。

乐忧都一瞬，饱食且看山。[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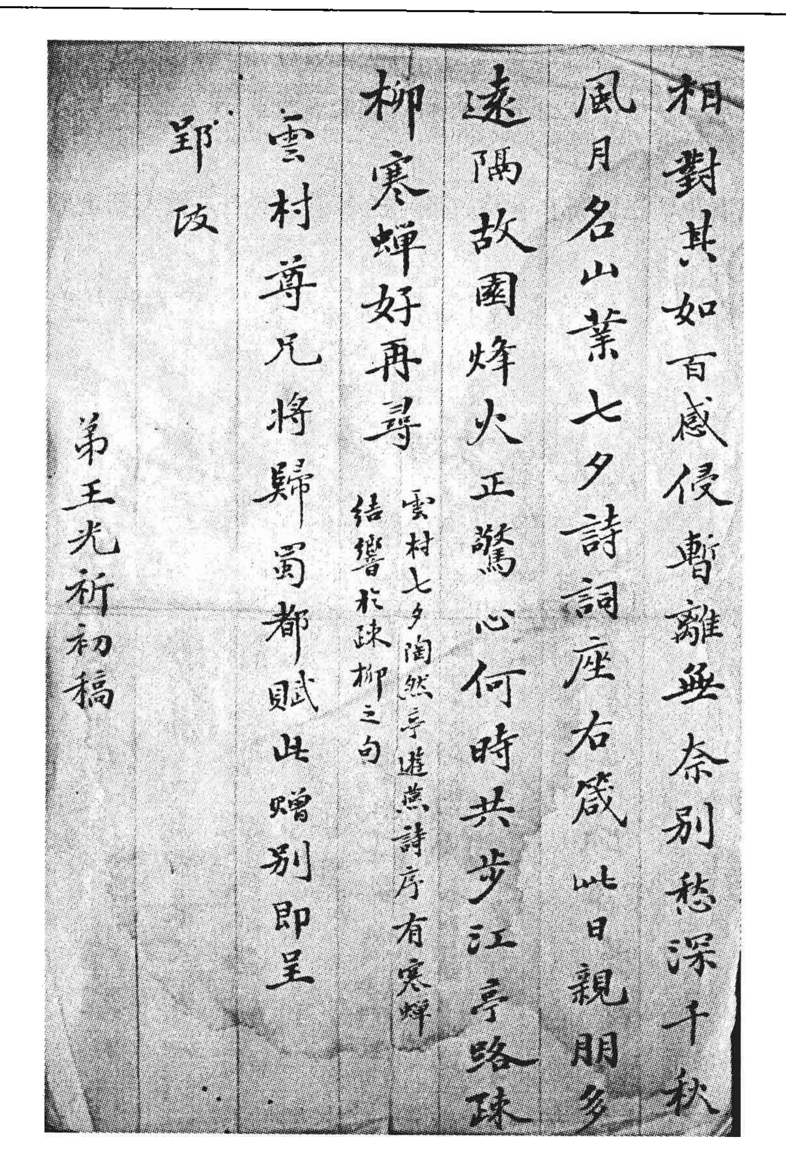
从诗中可以看出，王光祈在动荡、混乱的军阀统治下，找不到出路，心情黯淡、情绪低沉。

（本诗手迹由“少中会员”崇州彭云生之孙女彭庸女士收藏近百年，本次刊印为首次公开。）


No.
月　日
丁巳七夕同彭雲村周太玄在陶然亭寓所感而賦此
客舍渾如夢深閨漏正長百年一彈指千里九迴腸
蟾影中天靜蟲聲永夜涼西風吹白露秋意已茫
七月廿四陶然亭晚眺
細推平生事無如此日閒秋心疏柳外烟思遠
峰間玉笛時嗚咽孤雲自往還樂憂都一瞬
飽食且看山
雲村尊兄削政　弟光祈初稿

王光祈赠彭云生诗词手迹

① 两首诗均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第 2 版。


相對其如百感侵暫離無奈別愁深千秋
風月名山業七夕詩詞座右箴此日親朋多
遠隔故園烽火正驚心何時共步江亭路踈
柳寒蟬好再尋
雲村七夕陶然亭進燕詩序有寒蟬結響於踈柳之句
雲村尊兄將歸蜀都賦此贈別即呈
郢政
弟王光祈初稿

王光祈赠彭云生诗词手迹

十一月、十二月　上海《民国日报》、《申报》、《东方杂志》等均开始报导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王光祈密切注视有关报刊介绍的情况和文章。

一九一八年（二十六岁）

一月　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大量增购宣传介绍新文化、新思想的书刊，把北大图书馆办成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阵地。王光祈、周太玄经常到这里阅读书报，吸吮新的知识，并向李大钊请教。李大钊常对人说："光祈是一个能想、能行的青年，极有志气。"[①]

五月至六月　我国留日学生因反对北京军阀政府国务总理段琪瑞与日本秘密签订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罢学，先后归国者达三千人。雷宝菁（眉生）、张尚龄（梦九）等从日本回到北京。王光祈常邀周太玄、陈淯、雷宝菁、张尚龄等在南池子陈淯的住址或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商榷"出处进退"，谋求救国之道。王光祈初步提出了建立"少年中国学会"的设想，并草拟了学会规约大纲数十条。

六月二十五日　曾琦（慕韩）自日罢学归国，在京与王光祈会晤。王光祈认为，曾琦等人在留日学生中倡导罢学运动，声势虽大，但多感情用事，以此而言救国，则办法未免简单。他对曾琦说："我们皆在青年求学时期，救国最好在早做基础的准备工夫，而准备工夫不外两事：一为人才，二为办法。但人才已不能求之于已成势力中，则应早日集结有志趣的青年同志，互相切磋，经过历练，成为各项专门人才，始足以言救国与建国的种种实际问题的解决。至于办法，也非浅识玄想，东想西抄便可以适合国家真正需要。因此，必须每个同志都去增进自己的学识，从事各种研究。而今日之研究学术，又必须本科学的精神，方不致流于空疏。"[②] 此议得到曾琦的赞赏，遂商议发起创建"少年中国学会"事宜。

在讨论学会的宗旨时，曾琦坚持要以"少年意大利党"为模式。王光祈认为："十九世纪之'少年意大利党'、'少年德意志党'所创造之'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在当时视为少年者，在今日吾人视之，亦老大意大利，老大德意志而已。""吾人所创造非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之'少年中国'，实为适合二十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也。"[③] 由于王光祈和曾琦私交甚好，虽然互有争执，但多采取细谈的方式求得一致的结论。

六月二十六至六月二十九日　王光祈会同曾琦、周太玄、张尚龄、陈淯、雷宝菁等

---

① 傅斯年：《追悼王光祈先生》，载《王光祈先生纪念册》，文海出版社。

②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二章《"五四"运动与少年中国学会》。

③ 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载《少年中国会务报告》第三期。

六人，讨论修改由他起草的“少年中国学会”意见书，即《吾党今后进行意见书》，意见书提出：“同人等欲集合全国有为青年，从事专门学术，献身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知改革社会之难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奋斗，继之以实践；知养成实力之需时而不可以无术也，故持之以坚忍，而终之以俭朴。务使全国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风，常怀改革社会之志，循序以进，悬的以趋，勿为无意识之牺牲，宜作有秩序的奋斗。”①

王光祈起草的这份意见书，代表了当时一批青年志士的救国理想，是“少年中国学会”建会的理论基础。

六月三十日下午　王光祈与周太玄去曾琦住处，并约同陈淯、张尚龄、雷宝菁共六人，在顺治门外南横街岳云别墅张文达祠，商议正式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公推王光祈为起草员，草拟规约章程，组织筹备处，为郑重起见，筹备期预定为一年。

夏　《四川群报》被封，成都昌福印刷公司樊孔周又约请李劼人另行主办《川报》，王光祈受聘担任《川报》驻京记者。除每天寄剪报、发专电外，每周至少写通讯报道一至二篇。李劼人说：“他的通讯写得很好，解剖当前时事，既透辟而又颇有见解，深受读者欢迎。”②

七月八日　王光祈以优异成绩（第二名）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并从北池子移寓南池子磁器库八号，与北京大学的林德扬、黄秉礼、郭有守同住。房子由后门出入，狭陋不堪。因无门牌，故钉一木牌，题名“蓬庐”以示之。李大钊、陈独秀、高一涵等经常来这里与王光祈晤谈。

七月十二日晚　王光祈邀约周太玄、曾琦、陈淯、张尚龄、雷宝菁等，在中央公园继续讨论他起草的“少年中国学会”规约，至十时始散。

七月十四日晨　王光祈、周太玄在南横街岳云别墅与曾琦、陈淯、张尚龄、雷宝菁继续讨论有关事宜。

七月二十一日午后　王光祈、周太玄同去曾琦寓所，抄写“少年中国学会”章程，并邀请李大钊前来指导，纵谈至晚十时始散。

经过这一段时间数次商讨，“少年中国学会”规约七十条全部制定。列名发起人为陈淯、张尚龄、曾琦、李大钊、周太玄、雷宝菁、王光祈。大家一致推举王光祈为“少年中国学会”筹备处主任兼会计，周太玄任文牍，李大钊为临时编辑部主任。并决定与李大钊“商榷一切”。自此以后，王光祈精神抖擞，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贡献于筹备组

① 周太玄：《王光祈先生与少年中国学会》，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② 李劼人：《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所由成立》，载《“五四”时期的社团》(一)。

织和发展会员工作。

九月五日　在《时事新报》副刊发表《学生赴欧参战队进行手续之商榷》。

十月　毛泽东经杨昌济教授介绍，到北大图书馆与李大钊会见，并在图书馆工作了四个多月。通过李大钊的关系，王光祈结识了毛泽东。那时毛泽东是高个子又黑又瘦的湖南青年，学会的早期会员李璜后来回亿说，毛泽东在聚会中很少发言，偶一发言则冲劲甚大，且相当的坚持其见，性格冲动又重实行。

冬　李璜从上海至北京办理赴法留学手续，他以“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身份并持有魏时珍的介绍信，到南池子会见王光祈。由于李既是会友，又是四川同乡，王光祈接待格外热情，当即偕李璜会见李大钊和陈淯，安排李璜在李大钊家暂住一宿，次日又带李璜搬迁至陈淯家。第三天，李大钊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约请部分“少中”会员吃烤鸭，先到者有陈淯、李璜、邓中夏、易克嶷。王光祈因去约请毛泽东、赵世炎[1]与李璜交谈赴法留学事，最后才匆匆赶到。席间，王光祈严肃地对李璜说：“今日政治黑暗，社会腐败，我们青年此刻虽无如之何，但应集合有志者，树立风范，徐图进展。‘少中’所以标出坚忍、奋斗、实践、俭朴四大立身标准，其意在个人生活有别于旧社会，然后始能言改革旧社会，而有所创造也……”。在王光祈谈风正浓时，毛泽东、赵世炎到来。王光祈向李璜介绍说：“两友有意赴法求学，闻你将往，愿一谈。”

由于赴法船期尚有两月，李璜应李石曾之请，在留法预备学校讲初级法文。毛泽东、赵世炎也前去听讲。王光祈因忙于事务，间日会面一次。王光祈曾对李璜讲，他将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李璜曾担心无工可做，王光祈笑曰：“两个子儿一件衣裳总可揽来洗也。”[2]

十一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英、美、法等战胜国宣布于次年一月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

十二月二十二日　陈独秀、李大钊发起创办《每周评论》。这是一个密切配合政治斗争，和《新青年》互为补充，在“五四”运动的思想准备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刊物。王光祈是该刊主要撰稿人之一。他为创刊号写了社论《国际社会之改造》。在文章中，

---

① 赵世炎（1901—1927），号国富，笔名施英，四川酉阳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1914 年随兄赴京，后考入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开始接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18 年，经王光祈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并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创办并主编《少年》半月刊、《工读》半月刊等。同年 12 月，邀王光祈到校作《团体生活》专题讲演。1920 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 年参加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同年，与周恩来等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 年，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成立，赵世炎任书记。1923 年赴苏联学习，次年回国，先后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浙江区委第二书记，参加并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 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被任命为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同年 7 月 2 日，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军警逮捕，7 月 19 日在上海英勇就义。著作收入《赵世炎文集》。

② 李璜：《我所认识的王光祈》，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他热情地欢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无情地揭露了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的虚伪性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文章也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想，比如主张打破国界、人种偏见、打破现状、扫除资本家、军阀、贵族的权威，建立一个由各地方自治团体联合起来的理想社会。


每週評論
The Weekly Review
第二號
中華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國外大事述評
▲和平會議與公開
▲威爾遜總統在蘇爾朋大學之演說
▲遠東與日本

《每周评论》

一九一九年（二十七岁）

一月十二日　在《每周评论》第四号发表《无职业的人不得干预政治》。

一月十八日　巴黎和会开幕，这次会议很快就暴露了帝国主义国家强盗分赃的性质。

一月二十一日　由于周太玄、李璜即将赴法留学，上海会员电邀王光祈赴沪，筹商会务。王光祈于是日抵沪。

一月二十三日　上海会员在吴淞同济学校举行了吴淞会议（筹备会），王光祈任会议主席。他在会上详细地阐明了学会宗旨。在讨论学会的主义信仰问题时，王光祈认为：“现在同人研究学问，思想极宜自由，主义亦不必一致，将来大家切实研究之后，有决定之必要时，再为讨论决定。”到会者一致赞成不必统一会员的主义信仰。会议还讨论了“印刷局办法”，通过了“印刷储金简章”；同时欢送周太玄、李璜赴法留学。周太玄和李璜等赴法后，创办了“巴黎通讯社”。

二月初　由沪返京，取道金陵，曾与左舜生会晤，讨论“小组织”问题。并在游览了莫愁湖风光后返京。

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日　在《晨报》副刊发表《择业》。文章说："二十世纪是社会主义盛行的时代，是讲究全国皆工，要是终日坐在家里毫不做事，……仗着自己的金钱，掳夺他人的生产，那就完全是强盗行为了。"他提出择业的标准，是要为"大多数人谋幸福"，不能"有害他人"。

二月二十三日　在《每周评论》第十号发表《国际的革命》。文章指出："协约国联合起来，攻打德国……不能叫做国际革命。"因为战争结果，"强权既未打倒，自由亦未获得"。"国际社会党的活动，最大目的就在求人类大多数的幸福。他们所最根的就是强权。只要是强权，不问国界、人种、宗教、语言、文字的分别，都要去革他的命。他们所最爱的就是自由，只要是自由，不问他是强、弱、大、小的民族，都要去帮忙的"。

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　在《晨报》副刊发表《学生与劳动》。文章认为"现在是二十世纪劳动主义盛行的时代，只吃不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提倡一面工作，一面读书；终身工作，终身读书"。认为这样做可以"养成独立生活"，"熟悉社会情况"，"养成耐劳习惯"，"养成强壮身体"。

三月一日　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一期，发表《复赵世炯（子章）》，主张"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各尽所能，各去所短"。"会员性情有偏重于学术者，则尽力发挥他的本领去研究学问。有偏重事业者，则尽力发挥他的本能向事业方面发展"。

三月一日至二日　在《晨报》副刊发表《俄罗斯之研究》。文章对上海某报登载俄国实行"妇女国有"的荒谬消息进行了批判。文章建议发起"俄罗斯研究会"，搜集材料，用"正确的眼光，作有系统的记载"。

三月二日　在《每周评论》第十一号发表《今日之梅特涅》。文章讽刺了在巴黎和会上"很出风头"的邱吉尔。指出他想走十九世纪初期奥国首相梅特涅的老路，组织新的"神圣同盟"，扑灭世界革命。文章结束语说："列位要知道他的将来，就请看梅特涅的过去。"

三月十六日　在《每周评论》第十三号发表《兑现》。文章揭露巴黎和会"全是五强国的世界，什么叫做永久和平，不过是一张不兑现的支票罢了"。

三月二十三日　由邓中夏等人发起正式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王光祈是讲演团最早一批成员之一。

三月二十七日　在《晨报》副刊发表《朝鲜革命与外蒙骚乱》。文章认为，欧战以来，"民族自决主义的潮流，已经流到东亚"。"朝鲜是自动的革命……为爱自由而流血，因争自治而牺牲，在人类进化史上，添了许多光彩。""外蒙是被动的骚乱……受了别人的愚弄，做了他国的机械，糊里糊涂，盲动一阵……脱离甲国的统治，而入于乙国的羁绊……是损坏民族自决的好招牌。"

四月四日下午　出席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东便门内蟠桃宫举行的演讲会，发表了《什么是“善”》的演讲。他认为对“公众有利益”的事，“就是善的、好的”，也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为“少数人快活”，“就是不好的”，也就是“我们应该反对的”。据载：“是时，黄沙满天，不堪张目，而其听讲者之踊跃，实出乎意料之外。”演讲的内容后整理成文，连载于四月二十六到二十七日的《晨报》副刊。



晨報

THE MORNING POST

律師劉崇佑啓事

北京朝陽大學招生

《晨报》

四月十五日　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四期发表《工作与人生》。文章认为，工作就是“以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于人的事业”。批判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提出“为共同生活而工作，以创造未来之世界”。

四月二十日　在《每周评论》第十八号发表《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文章除介绍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外，较为客观地、概略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四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　在《晨报》副刊发表《读梁乔山先生与某君论社会主义书》。文章除谈到他对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解外，还提到社会主义“强大的国家权力，究竟与个人自由有无妨碍”，希望讨论解决。

五月　王光祈受张澜之聘，和李大钊、瞿秋白担任《晨报》编务，在《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

五月一日　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三期发表《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文中提出：“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吾人最终目的，即为创造‘少年中国’。……故‘少年中国学会’者，中华民国青

年活动之团体也。”

同日　在《晨报》副刊发表《劳动者的权力》。文章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历史。指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事就是：“田主、资本家终日快活……雇我们劳动者替他们做奴隶、做牛马。”“我们劳动者终日辛苦所得的生产物，都被他们掳夺去了”。文章提出，劳动者“应该抱定宗旨，挺起身来”，“要求生产机关（如土地、机器）应归公有，要求教育平等”，不达目的，“决不甘休”。

五月三日　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四期发表《致慕韩（曾琦）信》。

同日，在《晨报》副刊发表《社会主义的派别》。文章介绍了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异同，对无政府主义介绍尤为详细。

五月四日　第一个将巴黎和会消息发回国内的，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周太玄和李璜主办的“巴黎通讯社”。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操纵下，通过了由日本接替德国在我国山东权益的决定，激起了我国广大群众的愤怒。北京学生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巴黎和约签字”、“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游行群众放火烧掉了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匿身曹宅的章宗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爆发了。

王光祈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游行。作为《川报》的驻京记者，他当天下午即将游行情况，专电发回成都。晚上，他又满怀革命激情为《川报》写了一篇富有鼓动性的通讯。此后，他密切注视运动的发展，不断地向成都发消息，有时一天连发两三封通讯。张秀熟回忆说，这一阶段他写回的通讯和文章，总共约有五十余篇[1]。

五月七日　成都《川报》在简要新闻栏用大字刊出王光祈发来的关于“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

五月十一日　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一号发表《为青岛问题敬告协约各国》。文章提出：“欧洲此次和会，高唱民族自决主义，所有欧战以前一切不自然的处置，皆应本诸民族自决主义、民主主义的精神，为公平的改正，谋永久的和平。今乃以关系世界和平的青岛问题，置诸议和草约之外，任凭抱军国主义自命德意志第二之日本自由处置。此次和会价值，实等于零。西方德意志虽败，东方德意志又起。”“吾中国人士，亦以酷爱和平闻于世，然欲铲除东方德意志之军国主义，亦不得不暂弃和平主义。中国政府虽麻木不仁，中国青年则可以‘背城借一’。”

同日　参加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东、西、南、北四城宣讲所组织的讲演会，发表了《青岛交涉失败的原因》的演讲。

---

① 张秀熟：《“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回忆》，载《“五四”运动回忆录》。

五月十六日　成都《川报》登出了王光祈在“五四”夜晚写的长篇通讯。

五月十七日早上七点，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大食堂里，学生们正在吃早饭。忽然一个学生跳上饭桌，手里拿一份前一天的《川报》高声朗读起来。他读的正是王光祈写的有关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的长篇通讯。顿时，“似乎火山爆发了，几百个学生嚷成一片，食堂变成了会场，一致通过立刻拟发电报，声援北京学生，声讨卖国政府，拒绝巴黎和会签字，要求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亲日派卖国贼。饭后，成都各大中学校学生数千人不约而同地齐集在高师校致公堂前，略经酝酿，即整队出发，游行讲演”。中共早期党员、原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秀熟在九十高龄时还能清楚地回忆起那些激动人心的情景。

王光祈发表在《川报》有关“五四”运动的通讯，“在成都许多人——尤其是在前进的含有革命性的知识份子圈子中，真无异是投下了一颗大的炸弹!”李劼人回忆说：“北京的“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及时传到成都，使成都青年得以及时看到这线光明，就不能不归功于王光祈了。”①

五月二十日　王光祈致君左书，言及他在留意世界大势时，“不知不觉地就中了社会主义的魔术”。还说：“要研究社会主义，非研究经济学不可，故近来极欲研究经济。”并主张：“将来的组织，是宜在个人自由主义之下，为一种互助的、进步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同日，在致幼椿、太玄的信中，询问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派学说趋势，在欧洲方面孰占优势”?“这两种以外，还有其他较善之学说否”?

以上两信以《王光祈致君左》、《王光祈致幼椿、太玄》发表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四期。

六月十三日　清华学校“仁友会”与“少年中国学会”开第一次恳亲大会，王光祈等三人代表赴会，并在会上致词。

六月十五日　“五四”运动后不久，王光祈写信，邀约李劼人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并要李在成都发展会员。李劼人入会后，在短短半个月中，又发展了九人入会。经王光祈和北京总会筹备处同意，成都分会于是日正式成立，公推李劼人为书记兼书报管理员。

七月一日　“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上午十时，在京会员齐集回回营陈愚生宅举行正式成立大会。王光祈任大会主席。他首先报告筹备经过，接着讨论规约，选举职员，研究今后进行方法。在讨论规约时，李大钊、王光祈等六人提议，将规约第二条原文“本学会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宗旨”，

---

① 李劼人：《“五四”追忆王光祈》，载《川西日报》，1950年5月4日。

修改为“本学会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关于选举职员一事，由于各地会员投票，未及全额之半，到会者主张暂缓发表。在未选出职员以前，所有会务仍由筹备处主任负责办理。月刊编辑职员，亦暂由筹备处主任兼办。“少年中国学会”就这样诞生了。

“少年中国学会”筹备期间，王光祈捐献大洋一百元。从七月份起每月捐洋十元。

七月，在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积极筹划和帮助下，在成都创办了《星期日》周刊，这与王光祈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王光祈是北京《每周评论》的主要撰稿者。他热情地向李劼人等介绍了《每周评论》的特点，认为它能密切跟随形势发展，用进步观点分析问题，提出意见。尖锐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颇具革命性和战斗性。同时，建议在成都办一类似的刊物。后经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会友讨论决定创办了《星期日》周刊。李劼人说，由于王光祈“有力的宣传和鼓励，成都出刊《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

成都的《星期日》刚一创刊，王光祈就通过他实际编辑的《少年中国》杂志进行宣传。该杂志指出："《星期日》系成都出版的周刊，它的内容形式与北京《每周评论》一样，亦是一种传播新思想的出版物。"① 王光祈还从稿件和购置图书等各方面支持和帮助《星期日》周刊。

《星期日》周刊从一九一九年七月创刊到一九二〇年四月停刊，共出了 36 期，它对于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特别是对于四川新思想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著名作家巴金回忆："我那时不过十四岁半，我也跟着大哥二哥一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川报》、《星期日》。"著名作家艾芜当时还是一名小学生，他说："成都出版的《星期日》真可说达到了狂热的地步。"

七月十五日　由北京总会负责编辑的《少年中国》创刊出版。编辑主任李大钊和副主任康白情，均因事未能执行职务，实际负责编辑工作的是王光祈。

同日　在《时事新报》副刊发表《致左学训》。

七月二十六日　撰写《少年中国之创造》，提出"要使中国成为未来的大同世界的一部份，使中国人民的风格、制度和学术生活等等都能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②。后发表于《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

七月中下旬　王光祈致函左舜生，讨论"小组织"的提倡问题，后以《与左舜生书》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文中构想在离城不远的乡间，租种一个菜园，半工半读，过世外桃源式的生活。这一讨论曾引起了一般青年的热诚关注。

七月三十一日　作《致黄霭女士书》、《致泗英（刘正江）》。后发表于《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

八月一日　在《致冰先生书》和《致裴山先生》两信中，主张新生活一定要联系到妇女解放问题。

在《致夏汝诚先生书》中，王光祈说自己"是一个极穷的小子，未曾受到家庭一文的遗产，也未用过官厅一文的公费。我所有已过去的生活，都是半工半读"。他深信"这个世界是我们活动的舞台，一切不平等、不自然的束缚，我都要彻底的脱离"。信中对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十分推崇。

这一天还写了《致李贯诚先生书》、《答黄仲苏先生书》。以上函件，后均发表于《少年中国》第一卷二期。

八月上旬　"少年中国学会"选举投票人数已逾会员全额之半，选举结果王光祈当

① 李劼人《给王光祈的信》，载《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

② 载《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

选为执行部主任，负责学会对内、对外一切会务。

八月十日　在《每周评论》第四十三号上发表《司法独立与教育独立》一文。

八月十二日　“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雷宝菁（眉生）的灵榇由日本运归北京，停放陶然亭畔，王光祈在灵旁写了悼诗《哭眉生》。

他在序中说：雷眉生是我的好朋友，是中国的好少年，是少年中国学会最忠心的会员，不幸于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在东京病故了！可怜他才活了十九岁！他的意志十分坚强，他的才思异常富锐。如今他虽是死了，我们更应该努力向前以实现他的理想。……

王光祈在深秋的陶然亭畔，萧萧的芦苇声中写出了《哭眉生》的新诗。这首新诗首次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二期。

八月二十五日　《王光祈致时珍（魏嗣銮）白华（宗之櫆）书》后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三期。

九月三十日　在《晨报》副刊发表《总解决与零碎解决》。文章认为，胡适和他的教师杜威，对社会问题主张零碎解决，“其流弊必使我们人类没有一个共同最高的理想，陷于一种极陕隘、极无味的事实上面”。他认为：“凡人都应该有一个理想目的，都应该有一个下手的地方。”“简单说起来，就是总解决中的零碎解决”。

十月五日　复 M. R. 先生信，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四期。

《对大学开女禁问题的意见》，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四期。

十月九日　“少中”北京会员在嵩祝寺八号开会，到会有王光祈等十七人。讨论组织学术谈话会、筹办通信社、筹办义务夜校及月刊印刷编辑各事。

十月中旬　“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正式成立。该部各股职员，皆由王光祈推荐。

总务股主任　王光祈兼

会计股主任　孟寿椿

文牍股主任　黄日葵

交际股主任　徐彦之

庶务股主任　邓　康

十月十二日　上午八时，“平民教育讲演团”召开第二次大会，欢送许德珩、陈宝锷赴法留学，修正简章，讨论进行方法。王光祈出席了大会。会议决定为讲演便利起见，今后分四组进行，每组设书记一人。王光祈当选为小组书记。

十月二十五日　王光祈前往武汉、南京、上海、济南、天津各处接洽会务。并在上海送别李劼人等赴法留学。

十月二十七日　晨，抵武昌。上午游黄鹤楼、抱冰堂诸名胜。下午，应恽代英之请，到武昌中华大学作了题为《动的训练》的演讲。并介绍了恽代英等三人加入“少年

中国学会”。是夜，乘舟东下。

十月二十八日　晨，抵九江。登岸游览了甘棠湖。

十月二十九日　抵南京，赴四象桥与左舜生、黄仲苏晤面，随即前往高等师范与南京各会员讨论一切。决定《少年世界》编辑事务，由南京会员承担。黄仲苏回忆说：他“沉默端重，不苟言笑，每一论及学会旨趣，会友道义，则意兴横溢，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反复言之，唯恐未尽者”[①]。

十月三十日　抵沪，寓华盛顿里。与七年不见的李劼人、沈君怡等相见，讨论会务。

十月三十一日　与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订立《少年世界》印刷出版合同。

十一月三日　复回南京。

十一月四日　偕会员王德熙，会晤南京女界同志十余人，征求对妇女问题的意见。随后由王德熙陪同，游览鸡鸣寺、胭脂井诸名胜。下午偕同左舜生游秦淮河及雨花台诸处。夜至秦淮河复成桥赏月。左舜生为王光祈指点古迹，十分详尽，告诉他哪里是朱雀桥，哪里是乌衣巷，哪里是旧院、市隐园，引起他诸多感想。

十一月六日　乘津浦车北上。

十一月七日　抵济南。与会员郑尚等相见。蒙山东教育界省议会新友数人招待，共游大明湖。

十一月八日　至天津，与会员章志、葛洋、陈道衡等相见。

十一月九日　返回北京。

十一月二十三日　《答 A. Y. G. 女士》，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六期。文章主张组织女子互助社。认为：“凡是受不了家庭压迫的，均可到这个社来服务。一方面可以顾全生计问题，一方面可以在万恶社会中自为风气，既不受家庭压迫，亦不受社会压诈。”

十一月二十四日　《致太玄、幼椿、慕韩、调元》，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六期。

十一月三十日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李超，受家庭虐待摧残，忧愤成疾而亡。蔡元培、李大钊于是日主持追悼大会。王光祈参加追悼会之后，发誓立愿要为苦寒的有志之士，寻找一条能够读书深造的道路。

十二月二日　在《晨报》副刊发表《改革旧家庭的方法》。文章认为，李超女士的追悼会，是借个题目向旧家庭、旧社会作一种示威，他提出：“我们应该有一种家庭革命的实际运动，救出现在将死未死的女子。”他提议：一、组织女子周刊；二、组织女

---

① 黄仲苏：《哀辞》，载《王光祈先生纪念册》，文海出版社。

子互助社，“向旧社会开展总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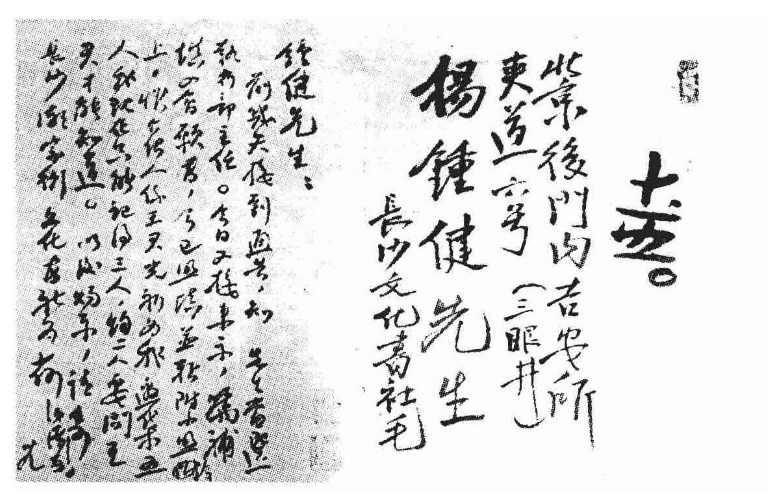
十二月四日　在《晨报》副刊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提出在城市中组织男女生活互助社，为苦学生开一个生活途径，为新社会筑一个基础。文章说：“这种团体的名称可以称为‘工读互助团’，因为在这种团体里的成员，必须具备两种资格，一作工，二读书。”“工作所得之收入，为团体公有之财产。团员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皆由团体供给。”他表示：“我很愿意费些时间，专门奔走此事。”

十二月五日　应赵世炎的邀请，到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少年学会”作了题为《团体生活》的演讲，后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六期。

十二月十五日　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六期上发表《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王光祈在文章中特别强调团体生活和劳动习惯的重要性。他说：“譬如中国人最缺乏团体的训练，我们学会便提倡组织种种团体。又如中国知识阶级大多数不习惯劳动生活，劳动阶级又无机会得受教育，故我们提倡半工半读，使读书者必做工，作工者亦得读书，务使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打成一片。”

十二月中下旬　王光祈在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十七人的支持下，发起成立轰动全国的北京“工读互助团”。王光祈亲自草拟简章，编制预算，召开发起人会议，租房子，制家具，接洽团员，向外募捐。不到半月工夫，“‘工读互助团’遂居然产生于‘首恶之区’的北京城里了”。

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的消息一传出，就有数百人报名参加。由于条件限制，只吸收了三十余人，成立了三个组。一面从事体力劳动，一面在各校听课。王光祈认为，只要坚持工读，不断扩大影响，将来把各地的小组织联合起来，实行“小团体大联合”，就有可能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工读互助的社会”。



毛泽东至杨钟健的信

十二月　湖南人民展开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前往北京。在京期间，毛泽东和王光祈、邓中夏等常有交往。经王光祈介绍，毛泽东亦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同一时间，王光祈还介绍了张闻天、赵世炎、沈泽民等加入该会。

一九二〇年（二十八岁）

一月四日　在成都《星期日》社会问题号第三张发表《一个社会问题》，向四川青年介绍北京的“工读互助团”。

一月五日　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七期发表《工读互助团》，认为：“‘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他表示：“这种组织除在北京先行着手外，将来在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各处都要设法推行。”

年初作七言律诗《无题》。

《无题》

竟日摩挲百炼刀，几回起舞首频搔。
岂将壮志销红粉，莫遣雄心付绿醪。
万里风云思猛士，一楼烟雨读离骚。
何当投笔从戎去，不使人间叹二毛。

（此诗由王清如女士提供。一九九二年王光祈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前夕，四川音乐学院教授朱泽民、毕兴走访了王光祈的再从妹王清如。此诗是她早年看到王光祈题写在寄其妻的照片上的，因当时印象很深，尚能记得。此诗系根据她的回忆背诵录出。王清如当时在四川师范学院工作。）

一月二十四日　《吴虞日记》载，楷女（即吴若膺）来信言：“前星期我们在《少年中国》上看见王光祈的著作，我们便去会他，后来我们慢慢地商议，也就定了主意，出去工读。桓（即吴辟疆）由潘力山帮助到美国，我则同王光祈及北京大学几位先生到南京、西湖一游，再到上海，过南洋新加坡募捐及创办通讯社与演说，要提醒那边华侨。我觉得这样出去奋斗较在本国预备好得多。……我们此次出去，都由我们自己奋斗出来的，不是靠别人帮助的。”

吴若膺是四川教育界名流吴虞之女。吴虞在“五四”时期，以猛烈攻击封建礼教出名。陈独秀称他为“蜀中名宿”，胡适说他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时，吴若膺与其妹吴辟疆（又名吴桓）均在北京协和女子大学读书。姊妹二人（人称“浣花姊妹”）慕王光祈才学，大约一九一九年底在一次宴会上结识了王光祈，并与之交往密切。王光祈还常将她们姊妹带到他的社交活动中。

一月二十九日　《吴虞日记》载：“王光祈、王德熙、吴芳吉、孟寿椿、康白情、康纪鸿……诸人，集合同志、砥砺学行，对于四川青年，谋文化上的交通，以创造新四川，使其适应为新世界的一部份，发起《新四川》杂志社，并作其他种种的文化运动。”“其社约：一不嫖，二不赌，三不娶妾。其信条：一真实，二奋斗。”

二月一日　《吴虞日记》载：“楷女寄回王光祈介绍楷女入‘新四川杂志社’书及‘新四川杂志社’章程一份。”

此时，吴若膺与王光祈已建立了感情，并已商讨出国留学事宜。

二月三日　《川报》刊登出新四川杂志社章程。

二月十一日　晨八时半，王光祈偕吴楷（若膺）出京，十一点半到天津，十二日午后一时到浦口渡江，乘马车至南京。

二月十三日　参观游览鸡鸣寺。《吴虞日记》载：“楷来信言……到鸡鸣寺游览古迹，亦无甚大味。南京城凄凉荒芜，不及北京之整洁繁华。”

二月十四日　至上海。

二月十五日　《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八期“少年中国学会消息”栏“会务纪闻”载：“本会于去年七月创刊《少年中国》时，即已组织编辑部。惟当时推定编辑主任李大钊、康白情两君，均因事忙，未能执行职务，所有编辑事宜，暂由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君代理。现王光祈君将赴美留学，特于出京之前，开会讨论编辑事宜，议决组织编辑部，由李大钊、康白情、张崧年、孟寿椿、黄日葵五君任编辑事宜。”

又：“本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君定于阳历二月赴美留学，并拟先行前往南洋欧洲一行，与各处会员接洽会务。王君去后，所有执行部职务由副主任陈淯君代理。”

同日　在《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八期发表《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文章说：“去年七月一日，本会开成立大会，又蒙同人委以执行部主任之职，忽忽半年，毫无建树，清夜思之，汗如雨下。加之，一年来，无暇读书，思想破产，直欲赴郊外放声痛哭一场。”文章提出：“此行先赴南洋，约住两月之久。次赴欧洲，约住一月，再次赴美洲留学。”“目的有三：一、联络世界各地华侨之优秀青年。二、筹办华盛顿通讯社。三、个人求学问题。”文章表示：“我此次出国，亦是最末一次之洪炉，若是仍毫无所得，最好是到太平洋里与鱼虾作伴侣，永远不要再与诸兄见面了。”

王光祈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五期《旅欧杂感》一文中所提到的"我曾有四首忏悔的诗"应即是此诗。

《忏悔》（四首）

我生久伏危险性，纵马危崖却怨谁。
空过九千七百日，做人今始筑根基。

真忏悔者唯自杀，每思此语血如焚。
且将毁誉随流水，从此襟怀伴白云。

每接良朋责难书，始知身已堕泥涂。
而今百事都如梦，独向苍茫觅故吾。

名士英雄毒已深，良朋一语刺吾心。
从兹打破关头去，苦学勤工惜寸阴。

二月二十七日　全国各界联合会在上海召开，到会者有陈独秀、王光祈、汪孟邹、左舜生、康白情、陈宝锷、张国焘、刘清扬、宗白华、涂开舆、戴季陶、沈玄庐、彭璜、肖子章等二十余人。会议报告了北京、天津等地"工读互助团"的进展情况，着重讨论了有关"工读互助团"的宗旨和办法，并筹备在复旦、南洋等校附近建立"上海工读互助团"。陈独秀、王光祈都在会上作了发言。"上海工读互助团"列名发起人计有陈独秀、王光祈、毛泽东、彭璜、肖子璋等二十六人。

二月下旬　毛泽东在北京曾参观了"女子工读互助团"，他在给陶毅的信中说："今日到'女子工读互助团'……觉得很有趣味！"[①]

三月十四日　毛泽东在北京给周士钊的信中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②]

三月三十日　王光祈在上海松社参加了巨型踏青会，与会者有彭璜、魏嗣銮、王德熙、张闻天、张国焘、宗白华、王独清、李一龙、翟蕴玉及康白情等七十一名男女青年。这是这批热血青年在"五四"运动后纷纷出走留学前夕的聚会，既是告别，又是互相激励的一次活动。

---

① 《毛泽东致陶毅》：1920年2月，载《新民学会通信集》（一）。
② 《毛泽东致周士钊》：1920年3月14日，载《新民学会通信集》（一）。

三月三十一日　《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十一期“会员通信”栏载：“润玙、时珍、剑翛临走前一晚，上海同人对于两种月刊改革事，曾有所聚议。拟《少年中国》从第二卷第一号起，《少年世界》从第一卷第八号起，彻底刷新，即每间一期出一特别号，按照两种月刊性质，分国研究。《少年中国》七月十五、《少年世界》八月一日，同时出日本号，间一期出法国号、俄国号，以此例推。法国号、德国号由王光祈负责组稿。



王光祈赴德留学前与学会同仁留影

黄仲苏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君复举介绍会友，召集年会，推行月刊诸事，相与讨论，且谈且录入手册。神情欣悦，而语多亲切，顾虑周详，指挥若定。”“会将散，君慨然叹曰：‘国事败坏，岂真不可收拾耶！吾人律己必严，努力向学，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十年二十年后，当可有为。今日之事，拨乱而反诸正，固非异人任也。果欲报国，岂乏机缘，但恐力之不胜耳！”又曰：“求学宜专，办事尚忠，为人贵诚……志存救国，言行相顾，而不谓俗尚所左右者，乃得谓新少年。”[①]

同日　陈独秀、汪孟邹等为王光祈饯行。

四月一日　王光祈以北京《晨报》、上海《申报》、《时事新报》特约通讯记者身份，与“少年中国学会”会友魏嗣銮、陈宝锷同行赴欧留学。会友涂开舆前往新加坡从事教育。共乘法船“保来加”号，由上海启航。王光祈由于经济拮据，赴德旅费由魏嗣銮慨然资助。

同日　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五期发表《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文章认

① 黄仲苏：《哀辞》，载《王光祈先生纪念册》，文海出版社。

为，“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人的问题”。表示他“对于此种组织，仍是十分信仰，仍有十分希望”。

四月三日　船过香港。

四月四日　在香港写成《欧洲通讯》（一），发表在五月四日《申报》副刊《自由谈》上。

四月七日　写成《去国辞》五章。王光祈在序中说：“船过香港，遥望数点青山，罗列海岸，因念去国日远。特制短辞五章，为舟中同仁陶情励志之用。辞中用语多系同仁，素日用以互相砥砺者。此辞更得湖南姜君为之制谱。每当夕阳西下，海波不兴，同人则斜依栏杆，歌此一曲，以度海上寂寞之生涯。”

《去国辞》[①]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
短别离，长相忆。
“发挥科学精神，努力社会事业”，
惟我少年，乃能奋发。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
短别离，长相忆。
“不依过去人物，不用已成势力”，
惟我少年，乃能自立。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
短别离，长相忆。
“只问耕耘如何，不问收获所得”，
惟我少年，有此纯洁。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
短别离，长相忆。
“欲洗污浊之乾坤，只有满腔之热血”，
惟我少年，誓共休戚。

山之崖，海之湄，与我少年中国短别离；

① 载《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十一期。

短别离，长相忆。

愿我青春之中华，永无老大之一日，

惟我少年，努力努力！

四月八日　船抵越南北部湾海防市，王光祈与魏嗣銮诸友上岸游览，途中颇多感慨，魏时珍在给梦九、白华、君怡的信中说："其最大者有二：一、海防居民大半贫瘠，体躯干瘦如柴，沿街行竟晨，竟无一身着完全者。""为人奴隶，无一自由，纵不能死于锋刃，亦将死于贫瘠，诚可慨也"。"二、海防与西贡居民惧外人甚至，见欧人与之言，辄战慄不能成声。尝见一法兵汲水，有安南（即今越南）人在前，法兵令其去，偶行稍迟，辄以杖击其胫。……而安南人乃甘心受之。""以如此之民气，欲望其重兴，岂可得也。"该信后发表于《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二期。

四月十三日　在西贡写成《欧游通信》（二），文中提及"安南地居热带，物产丰富，然其人奇穷异常，虽终岁劳动所得，仍不足糊口。当记者舟离海防时，舟中获贼二十五人，类皆饥饿难堪，故匿舟中，以窃食物，冀得一饱。……敬告国人，勿以吾国物产丰富为可恃也"。

四月十五日　船过南洋，王光祈与魏嗣銮、陈宝锷讨论"动机"与"效果"问题，争论十分热烈。经魏嗣銮整理成文，以《当如何批判——南洋舟中一席谈》为题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一期。

同日　在新加坡写成《欧游通信》（三）（四），载《申报》五月十九日、二十日《自由谈》。

四月二十一日　在锡兰岛之哥仑布写成《欧游通信》（五），载六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四月二十三日　王光祈在印度洋致学会诸同志的信中说："弟因在沪时，检查身体，以有眼疾，非医好后，不能赴美。弟遂临时改道赴德。""此次经过安南之海防、西贡及英属新加坡、哥伦布各处，受刺激极深。见彼白人之经营东亚，不遗余力，而吾有色人种，在彼等支配管理之下，苟延残喘，不知自拔，令人悲从中来，不能自已。"信中提出组织国内旅行团和国外旅行团，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实地考查。组织博物馆、实验室、植物园等，以为学术上之切磋。此信后发于《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一期。

四月二十六日　魏嗣銮自吉布提寄梦九、白华、舜生，君怡的信中说："海上情形，恶足言哉，四等舱污秽霉烂，仰则烟雾涨天，俯则弃屑狼籍，人居其中，如在釜中，心胃沸热，首昏欲坠，终日之间，痛苦而已。""至于国弱人微，受人欺侮，其屈曲可怜之状，实在不忍言。为弱国民，乘四等舱，履他邦土，触处皆令人深愤耳，有何可言者

耶!”“吾与光祈、宝锷身体尚好，夜则共聚谈论，大抵为‘批判问题’，其次为‘演说问题’。又其次为‘男女社交态度问题’。”此信后发表于《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二期。

五月二日　在非洲北岸之波赛写成《欧游通信》（六），发表在六月十八日《申报·自由谈》。

五月四日　船行至红海，同舟居励今君发起集会，纪念“五四”运动。陈剑翛回忆说：居励今“以我们和林长民氏曾身历其境，约作演说。林氏不自量的大吹擂一场，被若愚破口驳得体无完肤。我则自认‘五四’之后，应埋头向学术研究努力，也被若愚责备何其抱负之小了”。他在船上常常自负自豪地讲：“少年崛起，中国复兴，倘果得为国家尽瘁，那么丰功伟烈，正属大丈夫分内之事。”

五月七日　船抵马赛[①]。

五月十日　到达巴黎。李璜回忆说：“是时，我同劼人、鲁之、太玄寓于巴黎近郊一破落户旧日放马车之室中。在车站迎候光祈、时珍来。入室，光祈笑呼：‘拿肉来吃’”！“四等舱三十六日，所食系头、二等厨中弃而不用之肉屑，且不能多。故时珍非吃清炖肥牛肉不可。我买甚肥之牛肉不能得，乞得屠户将卖作化学工业用之牛油一小团，交劼人、太玄如其法炖之，碗上油厚几及二寸。光祈一面食油，一面笑谈，喉愈润而声愈高。屈指会友赴欧美留学者已三十余人，某友习何科，将来可创造某事业，觉中国事大有可为也！谈三日，别去。彼此觉生平朋友之乐，未有乐于此时者。”

六月一日　抵德国法兰克福。他在致幼椿、太玄、劼人、鲁之的信中说：“弟因初到德国，所租之房尚未搬住（因尚有人住着），须七、八号始能搬去，此时尚寄居德烈士博士之家。”“弟与时珍及郑寿麟、吴屏诸兄各租一屋，皆系近邻。时珍等皆在弟之房东处包饭。”弟所居在法兰克福郊外……开窗临野，可望数里之遥，皆系绿野平芜，全系故乡风味。……弟已决定在此专心学德文，数月中绝不履城市。”此信后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二期。

六月四日　在致慕韩、少襄、哲生的信中说：“弟于一日抵德国之法兰克福……现已着手补习德文，决定数月中不履城市，每日除读书外，尚可与德烈士博士谈聚欧洲现势及学术近况，受益不少。”此信后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二期。此后，每晚由魏时珍口译德文报刊，王光祈笔记整理成文，寄回国内有关报刊发表，以通信稿费维持生活。

六月五日　在周太玄兼办的《旅欧周刊》第三十号上发表《工读互助与勤工俭学》。该刊于 1919 年底创办，周太玄任主编。

---

① 王光祈《旅欧杂感》，载《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五期。

六月十二日　在法兰克福写成《德意志各党之内容》，载《申报》八月十三日、十四日。

六月十七日　写成《选举后之德国政局》，载《申报》八月十五日、十七日。

六月中旬　王光祈安顿好在法兰克福的住房后，便去巴黎迎接吴若膺一同返回德国。（吴若膺是于一九二０年五月九日从上海乘“阿芒贝利”号轮船赴法的。同船的有宗白华、张梦九、赵世炎等少中会员，还有周太玄的未婚妻王耀群及其好友胡蜀英。此外，同船赴法的还有日后的著名作家肖三、征象派诗人王独清等。）吴若膺在船上航行的一个多月生活中，竟与王独清有了感情纠葛。据李璜在《我所认识的光祈》一文中回忆说：“不久光祈忽以私事自德国佛郎克埠来巴黎，住只半日，坚留不下，太玄与我送之车站，执手不觉泪下，光祈从此以兹私事含痛，或竟至其死时。”[①] 左舜生在《悼光祈》一文中说：“光祈在国内曾有过一度的恋史，这件事的首尾我完全知道，因为光祈是一个认真绝对负责的人，所以他的失恋，我知道绝对不是他辜负了别人，只是别人毫无理由的抛弃了他。”[②]

王光祈返回法兰克福后，宗白华回忆说：“他受了重大刺激，几乎自杀，由在德的朋友极力劝慰。”李璜回忆说：“光祈既以此隐痛闭门读书，不问事。”

六月十八至七月十八日　王光祈没有发表新闻报导和文章。

七月十九日　写成《最近德国之经济状况》，载《申报》九月十五日、十六日。

七月二十三日　在欧会员为了讨论会员学行砥砺问题、整顿会务问题、月刊稿子问题、法国会员曾琦等公推周太玄来德商议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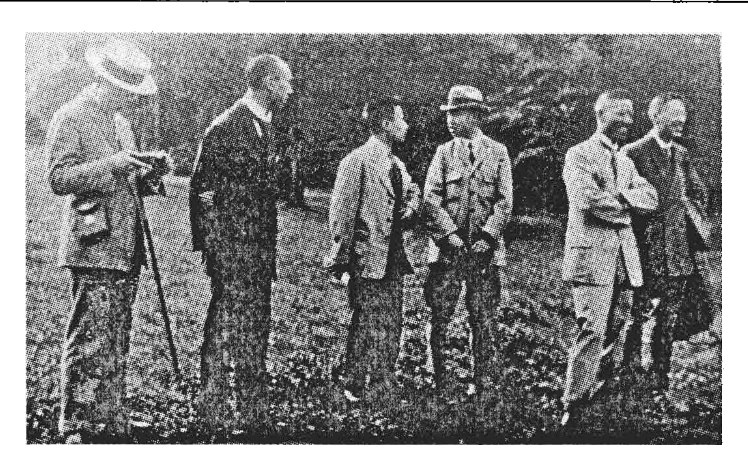
七月二十四日　周太玄偕宗白华[③]来德，会同王光祈、魏时珍在法兰克福附近山林会商连日。

---

① 见上海1936年出版之《王光祈先生纪念册》。

② 同上。

③ 宗白华（1897—1986）原名之櫆，字白华，江苏常熟人，哲学家、美学家、诗人。我国现代美学研究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之一。1918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医工学院先修班（同济大学前身）。同年，经魏时珍介绍结识了王光祈，由于深受王光祈爱国热情的感召而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当选为“少年中国学会”评议员，成为《少年中国》月刊的主要撰稿人。同年8月，出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编辑、主编。1920年赴德留学，先后就读于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和美学。1921年，与王光祈、魏时珍、张梦九、孙少荆等发起组织留德学生“中德文化研究会”，以促进中德文化交流，加深会员间的相互了解。1925年毕业回国，此后一直致力于研究哲学和美学，特别是在中国艺术审美特征的研究方面，已经达到精深微妙的境界。曾任南京大学教授。1936年1月，王光祈病逝于波恩，3月15日，在宗白华的主持下，南京学术界沉痛举行了王光祈追悼会。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全国美学学会顾问和中国哲学学会理事。著有《宗白华全集》及美学论文集《美学散步》、《艺境》等，译著有《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1985年12月2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



20年王光祈在法兰克福郊外会商少年中国学会有关问题

（左一为宗白华，左二为王光祈，左三为魏时珍）

七月三十日　周太玄、魏时珍、宗白华、王光祈将会商的结果，函致国内同志，对他们商讨的会务，尤其对于《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的海外组稿问题。最后商定法国方面每月提供四篇稿件，由周太玄负责按时寄出，德国方面三篇，由王光祈付邮。此外，他们还设计了一张表格，为了大家更好地沟通，他们四人首先填写好，以做一个样表，希望全体少中会员均能认真填写。后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四期。

八月十八日　写成《俄波问题与国际形势》，载上海《时事新报》十月二十日。

八月二十七日　写成《德国大学的危机》，载上海《时事新报》十月二十一日。

八月二十八日　在《旅欧周刊》第四十二号发表《旅欧同人的使命》。

九月十二日　写成《德国科学界的大论战》，载上海《时事新报》十一月五日。

九月十三日　写成《美德结约与英美争霸》，载上海《申报》十一月九日。

九月十七日　写成《社会民主党又欲上台》，载上海《时事新报》十一月十日。

九月二十一日　写成《德国一年来金融状况》，载上海《申报》十一月十日。

九月二十五日　写成《法国新总统对德政策》，载上海《时事新报》十一月十一日。

九月二十九日　写成《德意志破裂之危机与世界前途之关系》，载上海《申报》十一月十二日。

九月（具体时间不详）　写成《德法两国之比较》。载上海《民心周报》第一卷第三十九期。

十月十三日　写成《比京国际财政会讨论情形》，载上海《时事新报》十二月八日。

十月十八日　写成《留德学界之近况》，载上海《申报》十二月十日。

十月二十日　写成《独立社会民主党之分裂》，载上海《时事新报》十二月十日、十一日。

十月二十五日　写成《德国各党之党纲及其现状》，载上海《申报》十二月十七日，十八日。

十月二十六日　写成《德意志共产党演说大会记》，载上海《时事新报》十二月三十日。

十月二十八日　写成《俄波和议后之俄国》，载上海《时事新报》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

本月　在《旅欧周刊》第四十七号发表《分工与互助》。

十一月十五日　在《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五期发表《旅欧杂感》。文中提到“我曾有四首忏悔的诗”，此诗当系一九二〇年初所作。

十二月一日　写成《一年来俄国之形势与各国对俄关系》，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十二月五日　写成《最近德国私运资本出境之大公案》，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一年二月三日。

十二月十日　致恽代英书。认为“工读互助团”失败，完全是人的问题。此信后发表于《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十一期。

十二月十五日　《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六期“少年中国学会消息栏”“本会通告”载：“会员诸兄：太玄等从德国寄回的信，登在《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四号……。北京同人对于他们所拟制的一个表，极表同情，都说：‘我们同志都可以填写，于本人于学会两有利益。’”这个表是周太玄、王光祈等本年七月拟制的。格式及王光祈填写的内容如下：

姓名	终身欲研究之学术	终身欲从事之事业	事业之着手时日及地点	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	最近住址	备考
王光祈	经济学	新村及工读互助团	民国十五年北京及其近郊	手工艺及教育		

十二月 在巴黎《旅欧周刊》发表《留学界两大潮流》。

一九二一年（二十九岁）

一月十一日　写成《德国对华之外交［1］关于派遣使节的意见》，载上海《申报》三月二日。

一月十五日　在《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七期发表《分工与互助——旅欧杂感之一》。

本文写于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九日，曾发表于《旅欧周刊》。

一月二十日　写成《德国对华之外交［2］德国在华之学校政策》，载上海《申报》三月十五日。

一月二十六日　写成《德国对华之外交［3］德国对华之新闻事业》，载上海《申报》三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　写成《德国对华之商业　甲、德国所需之华产》，载上海《申报》四月三日、四日、五日。

二月四日　写成《德国对华之商业　乙、德国对华之输出》，载上海《申报》四月七日、八日。

二月九日　由中国留德学生中纨绔子弟操纵的柏林“中国留德学会”，认为王光祈在《申报》发表的《留德学界之近况》，“内容不真，有伤此间学生之名誉”，委托德律师博罗向法庭起诉。本日博罗致函王光祈说：“君曾谓此间生活，每月五百马克已可足用。又谓此间学生常常寝至中午，午后赌博，晚则与妇女游行……如此类者，殆难备举。因此种情形之颠倒，于是留学者之父母，脑筋顿起不安。”博罗律师要求王光祈立刻更正。除在上海更正外，还须向“中国留德学生会”及外交代表道歉。博罗威胁说：“如果十日之内，犹无承认之答复，我即向法庭起诉。”信中还要求王光祈付给他因此事而需之费用。①

二月十一日　王光祈复函博罗，略谓：“君来信所指之人，系上海《申报》之特约通信员，彼只对该报负责，……故有人对其通信欲提出抗议者，请自与该报交涉。通信员自身无此责任。”“至于君因此事所费之款，亦请自向委任者索取。”

二月十二日　致书柏林“中国留德学生会”，对该会援引“洋大人”对他进行诈吓，进行了愤怒的斥责。他说：“若诸君能以中国法律与王光祈相见，王光祈尚可与之周旋，若引‘洋大人’以自重，则非王光祈所能从事矣。”“王光祈系顶天立地之男子……宁肯受屈以至于死，亦不愿依赖‘洋大人’之力，以与同族争此丑事也”，“诸君驰书骂我，我必不怒，诸君持刀杀我，我必不怨，惟引‘洋大人’以自重，则吾泪涔涔下矣！曾不料吾中华民族之堕落，竟至于如此。”据魏时珍回忆：柏林中国留德学生会得到王光祈的回复，大哗，开会集议，举无善计。适蔡元培先生自法来德，“中国留德学生会”举行欢迎大会，并将王光祈之事，告诉蔡元培，希望得到蔡的支持。蔡元培在北京时很了解王光祈，不但未与支持，且为王辩护。“留德学生会”一些纨绔子弟，极为不满，有

① 王光祈：《博罗律师致王光祈的信》，载《旅德存稿》。

人甚至极不礼貌。蔡元培在会未开完时即拂袖而去①。

二月十五日 在《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八期发表《旅欧杂感》。文中指出：德国有一本书，名叫《桃花》，所载均系中国诗歌，有许多译自《诗经》。德国一家报纸有一天转载了几首，评价说："试想数千年以前，我们德国是何等野蛮状态，而中国已有如此美丽的诗歌，若拿德国文艺与中国文艺比较，德国只算一个乞丐。"文章希望将中国文化尽量输入欧洲，向西方介绍东方文明。

同日 与魏嗣銮、宗白华、张梦九、孙少荆等发起组织留德学生"中德文化研究会"，其宗旨是：促进中德文化交流，促进中德两国民族的了解和同情。

二月十六日 写成《德国对华之商业 丙、对华商业之计划》，载上海《申报》四月十六日、十七日。

二月十九日 写成《伦敦会议与德国》，载上海《申报》四月二十六日。

二月二十三日 写成《普鲁士邦会选举时之情形》，载上海《申报》四月三十日。

三月十二日 致恽代英书，提出反对国家主义，主张民族主义。他说："我们说的民族主义当然不是拿我们的民族去侵略他人的民族，只是主张我们这个又勤又俭的民族，素有文化的民族，要在世界上谋一个安全的地位。我们若对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类，都不设法拯救，那便是我们对不住世界，对不住人类。""我在国外受刺激太多了，外国人无论新旧，早把'劣等民族'四字头衔送给我们了。但是我又相信，我们勤俭智慧的民族，很有改造世界的能力。"此信发表于《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十一期。

三月二十一日 写成《关于研究中德文化之两团体》，载上海《申报》五月四日、五日。

三月二十八日 写成《世界经济重心之转移》，载上海《申报》五月二十三日。

三月三十一日 写成《外国资本压迫之中欧》，载上海《申报》五月二十四日。

四月十五日 写成《德意志之同盟》，载上海《申报》六月十一日、十二日。

四月二十五日 写成《德国人之研究东方文化热》，载上海《申报》六月十四日、十六日。

四月 写出了《对今年七月南京大会的提议》，其基本精神是："学会不标某种主义之笼统名称，而对于将来之政治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及其进行步骤、运动方法，皆加以具体之描写。如果此种具体描写之组织及方法已为同人所赞成，将来即以此种组织及方法作为本会对于某项事业进行之方针，换言之，即本会主义。"此提议后发表于《少年中国》第三卷第二期。

① 魏嗣銮：《我所能记忆光祈之生平》，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四月　王光祈用德文写成《论中国海外留学生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一文，发表在德国《文化》杂志一九二二年四月期（总十六期）上。

五月十九日　写成《德国新政府组织之经过》，载上海《申报》七月十四日。

五月二十七日　写成《最近欧洲国际间之风波》，载上海《申报》七月十八日。

六月三日　写成《中德和约签字后之德国》，载上海《申报》七月二十五日。

六月八日 午夜三时与魏时珍至达尔模城，聆听泰戈尔演讲《东西问题》。

六月二十五日　写成《履行最后通牒与左右两派》，载上海《申报》八月八日。

七月一日　写成《德国最近之财政》，载上海《申报》八月十五日。

七月八日　写成《马克之过去与将来》，载上海《申报》八月二十二日。

七月十四日　用德文写成《德国对华的文化政策》，刊载于《法兰克福日报》。

七月二十三日　写成《奥国之新内阁及各党派》，载上海《申报》九月八日。

七月二十八日　写成《最近德国之银行界》，载上海《申报》九月十六日。

七月三十日　写成《多数社会民主党党纲之更改》，载上海《申报》九月十八日。

七月　参加了德意志国民党在一个森林里举行的报告会和游艺晚会。王光祈回忆说："与我同去的妙龄女郎及少年男子，既无意于儿童玩具，复无意于讲演政治及畅谈生活；至是突闻将开跳舞，无不生气勃勃，兴致洋洋。音乐之声一起，男女之防立撤，于是相依相抱，大跳特跳，直至夜半十二钟，尤不忍归。我素日认为性情庄重，不苟言笑之几个女子，到此，亦莫不眉飞色舞，大有情不自禁之感了。"他还说："我那天自朝至暮，在会场中踱来踱去，一言不发，冷眼旁观，觉得欧洲人自少至老，无不心有所托，情有所泄；所以他们永远是活泼泼的，只知向前进取，不知烦闷悲观。我们中国人则大半落落寡欢，缺乏兴趣。我们二三十岁的青年，有时还比不上欧洲七八十岁老人之兴味浓厚。"至此，王光祈开始感悟到音乐在德国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见王光祈《中国人之生活颠倒》。发表在上海《学生杂志》第九卷七号，后载于《王光祈旅德存稿》下册。

九月二十二日　写成《我所知道的安斯坦》，发表于《少年中国》第三卷第七期。

九月二十八日　写成《德国四党内阁之运动》，载上海《申报》十一月十日。

十月五日　写成《德国在华外交官制之更改及使领人员之派遣》，载上海《申报》十一月五日。

十月十五日　写成《德国赔偿问题与英、意两国经济》，载上海《申报》十一月二十九日。

十月二十七日　写成《德国学者与世界哲学大会》，载上海《申报》十二月四日。

十月二十九日　写成《德国上西莱亚问题失败之由来》，载上海《申报》十二月十

七日。

十月　自德国寄回《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一文，提出："'少年中国学会'者，系表现由政治改革进而为社会改革之精神者也。""'学会'即以社会改革为号召，故其所从事者为社会事业，社会事业者何？教育与实业是也。教育所以谋国人精神上之解放，实业所以谋国人物质上之解放。"本文后发表于《少年中国》第三卷第八期。

十一月五日　写成《战后全欧各国之金融》（一），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二年一月三日。

十一月二十二日　写成《战后全欧各国之金融》（二），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二年一月六日。

十一月二十九日　写成《战后全欧各国之金融》（三），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二年一月十日。

十二月十五日　写成《最近马克暴涨暴跌之原因》，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二年二月一日。

十二月十七日　写成《德国之纸币》，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二年二月七日。

十二月二十四日　写成《德国赔款问题与英法对德态度》，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写成《一九二一年之德国》，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

一九二二年（三十岁）

一月十四日　写成《开恩斯会议之前因后果》（一），载上海《申报》二月二十五日。

一月十五日　写成《开恩斯会议之前因后果》（二），载上海《申报》二月二十六日。

一月二十一日　写成《开恩斯会议之前因后果》（三），载上海《申报》三月六日。

一月二十八日　写成《德国新税问题之解决》，载上海《申报》三月二十四日。

二月四日　写成《开恩斯会议之前因后果》（四），载上海《申报》三月二十八日。

二月十二日　写成《铁路罢工与官吏生活》，载上海《申报》三月二十六日。

二月二十一日　写成《俄法外交关系变迁之传闻》，载上海《申报》四月六日。

二月二十五日　在法兰克福写成《中国人之生活颠倒》，载上海《学生杂志》第九卷第七号。

本月　在加拿大华人工会刊物发表《读了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学说后的感想》，提出：

"现在我们最大的责任，便是农村改造，便是创造一种基于农业的社会主义。""傅立叶的社会主义是建筑在农村上面的……生长于农业之国的中华民族，读了傅立叶的学说，更觉加倍有趣。"

三月一日　在《少年中国》第三卷第八期发表《社会的政治改革与社会的社会改革》。文中推崇托尔斯泰说："若托尔斯泰者，则吾只有歌之咏之以表其崇拜信仰热忱，奉为吾党社会活动唯一无二之良师也。"

同日　写成《各国对俄态度之变迁与俄国对付各国之策略》，载上海《申报》四月十七日。

三月十五日　写成《最近马克跌价之三大原因》、《德国强迫公债之摊购办法》，载上海《申报》四月五日。

三月二十二日　写成《德国对外输出之发展》，载上海《申报》五月三日。

三月二十八日　写成《德国赔款问题之新决定》，载上海《申报》五月六日。

三月三十一日　写成《德国报界之厄运》，载上海《申报》五月十二日。

四月一日　在《少年中国》第三卷第九期发表《傅立叶的理想组织》。

四月十日　热那亚国际经济会议在意大利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三十四国的代表，还有近七百名各国新闻记者，这是欧洲各国代表举行的一次最大的欧洲会议。王光祈及时地向国内作了报道。当日，写成了《日诺瓦（热那亚）会议开幕前之所闻》，载上海《申报》五月二十日。

四月十九日　写成《日诺瓦会议时之以外风波》（一），载上海《申报》六月二日。

四月二十五日　写成《日诺瓦会议时之意外风波》（二），载上海《申报》六月十二日。

四月二十九日　写成《日诺瓦会议时之讨论形式及其会外文章》，载上海《申报》六月十四日。

五月二日　写成《日诺瓦会议中之俄国问题》（一），载上海《申报》六月十五日。

五月三日　写成《日诺瓦会议中之俄国问题》（二），载上海《申报》六月十六日。

五月四日　写成《日诺瓦会议中之俄国问题》（三），载上海《申报》六月十九日。

五月九日　写成《日诺瓦会议中之俄国问题》（四），载上海《申报》六月二十六日。

五月十一日　写成《日诺瓦会议中之俄国问题》（五），载上海《申报》六月二十七日。

五月十四日　写成《日诺瓦会议中之俄国问题》（六），载上海《申报》六月二十八日。

五月十九日　写成《日诺瓦会议中之海牙会议问题》，载上海《申报》七月一日。

五月二十日　写成《日诺瓦会议之回顾》（一），载上海《申报》七月七日。

五月二十二日　写成《日诺瓦会议之回顾》（二），载上海《申报》七月九日。

六月六日　写成《德国之新闻事业》（一），载上海《申报》七月二十三日。

六月七日　写成《德国之新闻事业》(二)，载上海《申报》七月二十四日。

六月十三日　写成《德国之新闻事业》(三)，载上海《申报》七月二十五日。

六月十四日　写成《德国之新闻事业》(四)，载上海《申报》七月二十六日。

六月二十日　写成《上西莱亚之实行分割》，载上海《申报》八月十一日。

六月二十六日　写成《德国之恐怖时代》(一)，载上海《申报》八月十二日。

六月二十七日　写成《德国之恐怖时代》(二)，载上海《申报》八月十三日。

七月一日　写成《德国之恐怖时代》(三)，载上海《申报》八月十四日。

七月五日　写成《德国之恐怖时代》(四)，载上海《申报》八月十八日。

七月二十三日　写成《德意志之中等教育》(一)，载上海《申报》九月六日。

七月二十四日　写成《德意志之中等教育》(二)，载上海《申报》九月八日。

七月二十五日　写成《德意志之中等教育》(三)，载上海《申报》九月九日。

七月二十六日　写成《德意志之中等教育》(四)，载上海《申报》九月十日。

七月二十七日　写成《德意志之中等教育》(五)，载上海《申报》九月十一日。

七月二十八日　写成《德意志之中等教育》(六)，载上海《申报》九月十二日。

七月二十九日　写成《德意志之中等教育》(七)，载上海《申报》九月十三日。

七月三十日　写成《德国最近之生活》(一)，载上海《申报》九月十六日。

本月　由法兰克福迁居柏林马利杜夫街十六号。

八月一日　写成《我们的工作》，发表于《少年中国》第四卷第一期。

同日　写成《德国最近之生活》(二)，载上海《申报》九月十七日。

八月九日　写成《德国之离婚问题》，载上海《申报》九月十八日。

八月十日　“国际青年团”在葛廷根召开第四次年会，王光祈应邀列席。该团首领为葛廷根大学哲学教授纳尔逊博士。该教授崇拜中国孔子，每次开会均先读《论语》。会上，王光祈以“少年中国学会”驻德代表，散发了一张传单，提出我们的特殊工作，一是中国农民阶级改造运动；二是亚洲弱小民族自决运动。

八月十八日　写成《国际青年团》(一)，载上海《申报》十月一日。

八月十九日　写成《国际青年团》(二)、(三)，载上海《申报》十月二日、四日。

八月二十五日　写成《来德留学者注意》，载上海《申报》十月五日。

八月二十六日　写成《葛廷根大学之特色》，载上海《申报》十月六日。

八月二十七日　写成《留德学界之组织》，载上海《申报》十月十一日。

八月二十八日　写成《中国美术展览会》，载上海《申报》十月十六日。

八月三十日　写成《柏林人之道德问题》，载上海《申报》十月十七日。

八月三十一日　写成《柏林之房荒问题》，载上海《申报》十月十八日。

九月五日　写成《最近柏林市上之恐慌现象》，载上海《申报》十月十九日。

九月七日　写成《德国报界前途之危机》，载上海《申报》十月二十日。

九月十日　写成《最近德国之粮食恐慌问题》，载上海《申报》十月三十日。

九月十二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一）荷兰》，载上海《申报》十一月一日。

九月十四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二）波兰》，载上海《申报》十一月二日。

九月十八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三）里特伦》，载上海《申报》十一月三日。

九月二十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四）爱斯提兰》，载上海《申报》十一月十二日。

九月二十二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五）捷克斯拉夫》，载上海《申报》十一月十三日。

九月二十四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六）希腊》，载上海《申报》十一月十五日。

九月二十七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七）丹麦》，载上海《申报》十一月十七日。

九月二十九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现状（八）瑞典》，载上海《申报》十一月十八日。

十月二日　致书左舜生，发表在《少年中国》第四卷第二期。

十月四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南斯拉夫》，载上海《申报》十一月二十七日。

十月五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一）瑞士》，载上海《申报》十二月三日。

十月九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二）西班牙》，载上海《申报》十二月七日。

十月十一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三）罗马尼亚》，载上海《申报》十二月十一日。

十月十二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四）奥大利》，载上海《申报》十二月十六日。

十月十四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五）意大利》，载上海《申报》十二月十九日。

十月十八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六）俄罗斯》，载上海《申报》十二月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七、二十九日。

十月三十一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七）唐车》（唐车是波罗的海的自由都市，为波兰出海的主要通道），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

十一月四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八）比利时》，载上海《申报》一九二

三年一月六日。

十一月十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九）法兰西，甲、财政问题》，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

十一月十一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九）法兰西，乙、商业情况》，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四日。

十一月十二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九）法兰西，丙、农工状况》，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

十一月十五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立陶宛》，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九日。

十一月十七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一）芬兰》，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三日。

十一月二十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二）土尔其》，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三）挪威》，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十一月二十五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四）德意志，甲、商业情况》，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

十一月二十八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四）德意志，乙、农业状况》。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二月六日。

十一月二十九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四）德意志，丙、工业情况》。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二月八日。

十二月一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四）德意志，丁、财政问题》。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二月十日。

十二月九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五）英吉利，甲、金融现象》。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十二月十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五）英吉利，乙、商业情形》。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十二月十二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五）英吉利，丙、工业状况》。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十二月十五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六）勃加利》。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三月二日。

十二月十六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七）卢森堡》。载上海《申报》一

九二三年三月十四日。

十二月二十五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八）乌克兰》。《（二十九）葡萄牙》。《（三十）亚尔巴尼亚》。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十二月二十六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三十一）全欧各国财政状况》。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四月三日。后转载于《少年中国》第四卷第三期。

十二月二十七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三十二）全欧债务概观》。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四月九日。后转载于《少年中国》第四卷第三期。

十二月二十八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三十三）全欧金融概观》。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四日。后转载于《少年中国》第四卷第三期。

十二月二十九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三十四）全欧商业概观》。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后转载于《少年中国》第四卷第三期。

十二月三十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三十五）全欧农业概观》。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四月三十日。后转载于《少年中国》第四卷第四期。



「少年中國學會」成立於民[illegible]起人王光祈（前右）、曾琦（前中）、張夢九（後左）等與會員李璜（前左）、沈怡（後右二起）、魏嗣鑾、陳登恪、宗白華等攝於德國法蘭克福，時為民國十一年冬。

十二月三十一日　写成《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三十六）全欧工业概观》。载上海《申报》一九二三年五月十二日、十三日。后转载于《少年中国》第四卷第四期。

冬　在柏林随一德国私人音乐教师学习小提琴和音乐理论。“放弃研究经济之愿，改习音乐历史。”①

年底　部分“少中”会员在法兰克福聚会并合影留念。

① 王光祈：《旅德存稿》自序。

一九二三年（三十一岁）

一月六日　在柏林致函“少年中国学会”同志，略谓：“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之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之推翻，固为吾辈素志，惟欲实现此种目的，非先造成社会势力不可（换言之，以社会事业作基础之势力）。弟相信只有此种社会势力，始能抵抗帝国主义，推翻军阀巢穴。”后发表在《少年中国》第四卷第二期。

二月十二日　写成《德意志之青年运动（一）青年运动之派别》。载上海《申报》五月二十四日。

二月十三日　写成《德意志之青年运动（二）国家主义之青年运动》。载上海《申报》六月二日。

二月十四日　写成《德意志之青年运动（三）无产阶级之青年运动（上）》。载上海《申报》六月四日。

二月十五日　写成《德意志之青年运动（四）无产阶级之青年运动（中）》。载上海《申报》六月八日。

二月二十三日　写成《德意志之青年运动（五）无产阶级之青年运动（下）》。载上海《申报》六月十五日。

二月二十四日　写成《德意志之青年运动（六）民主主义之青年运动》。载上海《申报》六月十九日。

二月二十六日　写成《德意志之青年运动（七）各种宗教之青年运动》。载上海《申报》六月二十日，《德意志之青年运动（八）自由青年之青年运动（上）》，载上海《申报》六月二十六日。

二月二十七日　写成《德意志之青年运动（九）自由青年之青年运动（中）》和《德意志之青年运动（十）自由青年之青年运动（下）》，载上海《申报》七月三日、五日、六日。

《少年中国》第四卷第五期全文转载了《德意志之青年运动》，并附说明如下：

“王君此文曾分载于五月二十四日及七月六日的《申报》，间转登载，不便检阅，特转录本刊。”

三月四日　德国来比锡举行春季赛会。柏林外交部邀约各国驻德新闻记者前往参观。王光祈应邀于午后四时由柏林乘赛会专车去该城。同行者有日本、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十三国记者。

三月二十二日　写成《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一）》，载上海《申报》七月十三日，十四日。

三月二十三日　写成《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二）》，载上海《申报》七月十七日。

三月二十五日　写成《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三）来比锡赛会之性质及其内容》，载上海《申报》七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三月二十六日　写成《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四）来比锡赛会之外国陈列》，载上海《申报》七月二十四日。《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五）来比锡赛会中之德国陈列》，载上海《申报》七月二十五日。

三月二十九日　写成《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六）德意志工厂股份公司》，载上海《申报》七月二十六日。

三月三十日　写成《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七）克虏伯厂》。载上海《申报》七月二十七日。

三月三十一日　写成《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八）德兰斯登之工业学校》，载上海《申报》七月二十八日。

四月二日　写成《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九）德兰斯登之美术设备》，载上海《申报》七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日　写成《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十）自由战争之历史纪念》，载上海《申报》八月十四日。

四月十六日　写成《战后世界商业之趋势（一）美国》，载上海《申报》八月十六、十八日。

四月十七日　写成《战后世界商业之趋势（二）英国》，载上海《申报》八月二十一日。

四月十八日　写成《战后世界商业之趋势（三）法国、德国》，载上海《申报》八月二十四日。

四月二十二日　写成《世界航务之现状（一）汽车帆船之消长》，载上海《申报》九月九日、十月四日。

五月二十九日　在柏林写成《我们应该怎样运动》。文章认为“要着手中国农民阶级改造运动，第一必须先握乡村教育权柄。”“要从事亚洲弱小民族自决运动，第一必须先谋民族交际机会。”为此，他建议：一、组织乡村教育协会，二、成立亚洲民族交谊会。后发表于《少年中国》第四卷第五期。

少年中國

"THE YOUNG CHINA"

第四卷 第五期　　民國十二年七月　　每期一角五分

——要目——

篇目	作者
我們應該怎樣運動	王光祈
日常生活與思想學術	屬太玄
德意志青年運動	王光祈
蠻爾教與中國	田漢
同情	李劼人
羅密歐與朱麗葉	田漢
會員通訊	家菊　叔愚　崇植
附錄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上海中華書局有限公司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分售

八月　写成《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游记》，载《少年中国》第四卷第六期。

九月九日　写成《德国人之音乐生活（一）德国音乐与中国》。载上海《申报》十月七日。王光祈在文中指出："吾人欲扫除中国下等游戏，代为高尚娱乐，廓清残杀阴气，化为和平祥气；唤起将死民族，与以活泼生机；促醒相仇世界，归于大同幸福；舍音乐其莫由。吾等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能否实现，吾将以是卜之。"他首次提出了"礼乐不兴，则中国必亡"的用音乐振兴民族大业的思想。

九月十日　写成《德国人之音乐生活（二）德国音乐之来源》，载上海《申报》十月八日。

九月十一日　写成《德国人之音乐生活（三）德国音乐之始祖》，载上海《申报》十月十二日。

九月十六日　写成《德国人之音乐生活（四）德国乐中之三杰》，载上海《申报》十月十五日。

九月十七日　写成《德国人之音乐生活（五）三杰以后之音乐》，载上海《申报》十月十六日。

九月十八日　写成《德国人之音乐生活（六）十九世纪之名家》，载上海《申报》十月二十日。

十一月一日　在上海《申报》发表《世界农产之近况（一）各洲麦额之增减》。

十一月四日　在上海《申报》发表《世界农产之近况（二）各国农产之调剂》。

十一月九日　在上海《申报》发表《世界人口问题（一）战前战后之比较》。

十一月十三日　在上海《申报》发表《世界人口问题（二）人口密度与移民趋势》。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上海《申报》发表《德国人之音乐生活（七）德国乐中之歌剧》。

本月　在柏林南郊阿笃夫街住宅完成《欧洲音乐进化论》一书，并作序。该书一九二四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十二月五日　在上海《申报》发表《德国人之音乐生活（七）德国乐中之歌剧（续）》。

十二月六日　在上海《申报》发表《德国人之音乐生活（八）德国乐中之趣剧》。

十二月十日　在上海《申报》发表《德国人之音乐生活（八）德国乐中之趣剧（续）》。

十二月十七日　在上海《申报》发表《德国人之音乐生活（九）德国乐中之艺师》。

十二月二十一日　在上海《申报》发表《德国人之音乐生活（十）音乐中之民族主义》。文中指出："吾国素以'礼乐之邦'自豪于人，礼也者，小而言之，则吾人起居进退之仪，大而言之，则为日常待人处世之道，要之，所以调谐吾人内心之生活者也。……古人制礼作乐之微意，则千古不磨也。今人竞言'爱国救国'从事政治改革运动矣，而吾当则更请先言'爱族救族'，从事社会改革运动。盖未有社会不良，而政治能良者也，未有民族不强，而国家能强者也，唤醒民族改良社会之道奈何，曰自礼乐复兴始。"为了复兴礼乐，王光祈已表露出投身音乐的思想。

十二月　在柏林为《德国人之婚姻问题》撰写了序言。该书原稿系本年二月为《申报》作。后因此稿内容不合该报要求，未曾刊登。十月份中华书局向报社索回原稿，列入《少年学会小丛书》，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出版。王光祈在该书中指出："德国音乐为世界第一。……德国人民对于音乐一道，涵养甚深，而且极为普遍，几无人不懂音乐。"

一九二四年（三十二岁）

一月十九日　在柏林完成《西洋音乐与诗歌》一书。该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叙述西洋音乐与诗歌的关系；中编介绍西洋诗歌音乐十二名家的生平及其作品；下编对诗歌乐谱进行解析。在序言中他主张“介绍西洋诗歌乐谱，应该同时介绍谱中原诗”，“因为乐谱的内容是与他的诗歌的意义相应的”。他针对有人借用西洋曲谱填词，认为这是“牛头不对马嘴”。

二月　在《少年中国》第四卷第十期发表《社会活动之真义》。主张“办学校、报馆、实验室、博物院等”，推行“有基础事业的文化运动”。

三月十九日　写《致苏州会议诸同志》。对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四日苏州会议宣言中“徘徊歧路，未敢自决其行动方针”一句，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学会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本会持此宗旨与国人相周旋者业已数年。即弟等个人求学作事，亦以学会之宗旨为宗旨”。“凡人一日未能自决其行动方针，则一日不能生活下去。弟自信本会行动方针，早已决定。所惜者，行动太少，是为愧耳。”该函后发表于《少年中国》第四卷第十二期。

三月三十日　在柏林将自己几年来撰写的关于“少年中国学会运动”的重要文章，编为一集，名为《少年中国运动》。共计：论文八篇，通信三篇，附录一篇。并写了《少年中国运动序言》。后作为《少年中国学会小丛书》，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五月二十五日　在柏林完成《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一书。他希望这本书能使中国教育界的西洋音乐知识稍稍普及，更由此引起国人研究音乐的雄心，以创造代表中华民族的国乐。书中录有由其译词的德国歌谣二首，即《春使》和《妹妹愿否同跳舞》。该书一九二五年七月由中华书局刊行。

七月四日　在柏林完成《西洋音乐与戏剧》一书。一九二五年二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七月下旬　王光祈致曾琦（慕韩）的信中写道：“手示敬悉，弟在欧洲至少尚有三四年之勾留，在此三四年之内，如不病死，则拟编辑音乐丛书三十种左右，（现已成四种：（一）欧洲音乐进化论；（二）西洋音乐与诗歌；（三）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四）西洋音乐与戏剧。）是即弟在留学期间所以报答社会之道，当弟草成音乐拙著第三种时，曾寄左舜生四诗曰：

夙昔原无著书志，早将身手许邦人，
只怜华族生机少，欲用黄钟起废民。

处事治心惟礼乐，中华立族旧文明，
而今举世方酣睡，独上昆仑发巨声。

古人乐失求诸野，今我编书滞异乡，
借点西洋科学去，回家整理旧琴囊。

梦中未敢忘思索，病里时时把纸伸，
每到书成辄欢喜，先将心血报邦人。

我兄读此，当能了解弟所以不愿急于回国之意。……弟前次将数年来关于‘少年中国运动’之拙著论文汇列一册，名《少年中国运动》，并作有自序一篇，长八千言，其中弟曾谓少中有两种重要运动：（一）民族文化复兴运动（非有此，则不足以抵抗白族），（二）民族生活改造运动。亦即少年中国学会之特殊使命云云，我兄阅之当知其详。”①

信中反映出王光祈对自己的音乐学术研究计划十分周密，还特别表现出王光祈拟以民族文化复兴为重的思想。实际上这是他与曾琦等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的重要标志。

九月一日　在柏林完成《西洋乐器提要》一书。本书分三编，上编介绍了西洋乐器的类别及其历史，中编详列各种西洋乐器的形式，下编详述西洋乐器的应用。他希望本书出版能引起国内研究音乐同志的兴趣，也有一本研究中国各种乐器原理及作用的书籍出现。一九二八年一月中华书局出版。

十二月十六日　在柏林完成《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本书对东西乐制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东方以中国为主，旁及印度、阿拉伯、波斯；西方以欧洲近代为主，远溯希腊及中古的教堂乐制。他在自序中说："所谓乐制者，即研究‘律’与‘调’两大问题之义也，研究乐制而兼及东西各国者，欲以便于比较也。"该书一九二六年一月由中华书局刊行。

① 《王光祈给曾琦的信》，载《醒狮周刊》1924年11月4日3版。

一九二五年（三十三岁）

三月十九日　在柏林完成《西洋制谱学提要》。他在序言中说："此书只算是研究西洋音乐作品的一把钥匙。"全书分三部分：一、主调学；二、谐和学；三、篇法学。一九二九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四月　写成《阳调与阴调》，载《音乐季刊》第五期。

五月　在柏林完成《各国国歌评述》一书。该书分三编：第一编，中国国歌之评述；第二编，西洋国歌之历史；第三编，西洋国歌作品。书中王光祈还著有《少年中国歌》，此歌系他自己作曲，并存有曲谱。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由中华书局印行。

五月十六日　在《醒狮》周报"海外通讯栏"发表《国人能力破产之可惊》。在文章中提出，他研究音乐的目的是"籍此以唤醒'中华民族本性'，为抵抗外国文化侵略之工具"。

七月　"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第六届年会，在这最后一次年会上成立了一个"改组委员会"，负责分发表格，对会员的政治立场和对学会的态度进行调查。此时的"少年中国学会"基本上为国家主义者所把持，会务基本陷于停顿状态。

八月　在柏林完成《对谱音乐》一书。该书一九三三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八月三十一日　在柏林致书"少年中国学会"同志，附《王光祈对于会事进行意见书》。在意见书中，他认为："若要打倒国内军阀之专横，须养成民众实力，所以我们应该先从事民众教育的实施。若要抵抗外国帝国主义之侵略，须促成东方民族之团结，所以我们应该先从东方民族联络入手。若要使中国民族有独立自尊精神，必须先养成民族文化以为其中心思想，所以我们应该努力研究学术。"他提议学会内部宜分三股进行：一、民众教育实施股，二、东方民族联络股，三、专门学术研究股。

十月十一日　根据"少年中国学会"第六届年会的决定，王光祈于是日填写了《'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在"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竟抱何种主义"一栏内，他填写内容如下："我相信民族主义，不相信国家主义，不相信共产主义；但认为在最近的中国，国家及共产两种运动皆各有其用处，只求不要过火，我都相对赞成。民族主义系以争求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为宗旨（汉、满、蒙、回、藏统称为中华民族），其方法系从'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入手，以培养民族实力。至于将来中国政治、经济组织应采何种形式，则需待各派合作之大革命后，再按照彼时世界现状及趋势，与夫国民程度及愿望而定。此时不宜胶执己见，多立党派，减少国民对内、

对外战斗能力。”

黄仲苏回忆说：“光祈于十四年十月间，接读第五届年会记录及附调查表格，则为惶然，戚然，绕室疾走，筹划所以补救之道。所填表格至为周详，可供覆按，其用心之苦可想知矣。”[①]

十一月　在柏林完成《东方民族之音乐》一书。本书以英国人 A·J·ELLIS 所著关于“比较音乐学”的书籍为准，博采中国、德国、法国各种资料加以扩大和充实。特别详尽地收罗了亚洲各民族的音乐，加以比较研究。其体裁均先论乐制，后举作品。他在自序中说：“我希望此书出版后，能引起一部分中国同志去研究‘比较音乐学’的兴趣，若有人能作比较深的研究，则吾此书价值，最多只能当作一本‘三字经’而已。”

本年，用德文写成《中国的音律体系》(未刊行)。

一九二六年（三十四岁）

三月　在柏林完成《音学》一书。他在自序中感叹“吾国今日学术，处处皆落人后”。“有志之士，无不竞言西洋科学。只可惜所竞言者，尚多囿于‘应用科学’一途。而对于一切学术所基之‘纯粹科学’，则习之者反寥寥……此亦吾国学术界不思树本之一证也。”该书脱稿后，中华书局以“过于专门，恐无销路”，拒绝接受出版。总编辑左舜生深知他生活困窘，将书转托启智书局出版，但每千字只付三元稿费。为此，他写信给左舜生，说他患头痛症，常常是“一手握管，一手扶额”，“痛楚无力时，工作始废”。希望能提高稿酬，以维持生活。该书一九二九年九月由上海启智书局印行。

十月二十二日　完成《评卿云歌》一文。这是他对一九二一年三月被定为国歌的《卿云歌》的一篇评论文章。《卿云歌》由章太炎选词，肖友梅作曲。他认为这首歌就音乐而论，不合国民口味，就文字而论，不是国歌材料。颁布《卿云歌》为国歌，不外偶象二字。《卿云歌》是古典，章太炎是古典派学者，教育部是崇拜古典和古典派学者的代表。因此，一唱一随，毓成了这个不合民众心理、缺少平民精神的歌曲。他认为国歌的文字，需含下列三种要素：一、陶铸民族意识，二、须有确当理想，三、须使民众易解。后发表于《中华教育界》第十六卷第十二期。

十一月　完成《战后德国之经济》一书，一九二七年中华书局出版。他在该书中说：“本书所述，即系德国战后八年以来之经济变迁情形，读者诸君阅此，必将发生一

① 黄仲苏：《王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载《王光祈先生纪念册》。

种感想，即是："凡有能力之人，无论别人如何压迫，他终久总是要翻身的。没有充实的能力，则一切主张，皆是无用的空话。"

十二月二十一日　写成《教育家对中国现状应有之三大觉悟》一文。后发表于《中华教育界》第十六卷第十一期。

是年　在德国《德累斯顿导报》用德文发表《音乐在中国的意义》。

魏时珍回忆："民国十五年，余自德返国，道经柏林，光祈即为余言音乐之妙，累日不绝。"他说："吾之志，在以乐为学，而不以乐为技。吾将偏究各国之音乐，考其嬗变，审其异同。吾国先民音乐之素养，视各国为深。吾尤将发湮抉微，张皇幽渺，使吾国音乐亦得与欧洲各国，分占一席，一洗外人讥我为无耳民族之耻。"[1]

一九二七年（三十五岁）

二月　在《中华教育界》第十六卷第八期发表《音乐在教育上之价值》。该文阐述了音乐的教育功能和社会作用，指出了普及音乐教育的迫切性和具体措施。

文中王光祈还录有两首儿歌：

《黄河》

黄河黄河之水真正黄，
好像豌豆汤。
自称北方王，
谁敢和他比短长。

长城长城听了不服气，
偏要试一试。
自西筑到东，
从此黄河有兄弟。

此儿歌为王光祈作词编曲。他在该文中说："譬如《黄河》一歌（见拙著初级小学音乐用书，中华书局出版）的调子，系我从中国旧谱《望妆台》内摘出，而稍稍加以更改者，歌词系我自己著的。"

---

① 魏嗣銮：《我所能记忆光祈之生平》，载《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

《平沙落雁》

天上雁鹅结队飞，
地下儿童拍手追，
雁鹅会摆队，
排成人字往前进。
前进复前进，
寻个沙滩解解闷。
谱谱铺，谱谱铺，谱谱谱谱蒲，（此系形容雁翅扑沙之声，歌者宜以唇音出之）
谱谱铺，谱谱铺，谱谱谱谱蒲，
哼………………（此系形容雁鹅依然飞到天下，怡然自得之意，歌者宜以鼻音出之）
雁鹅好快活，
天地真宽阔。

此曲由王光祈根据同名琵琶曲编曲，歌词则系作者自撰，尚存有片断曲谱。

四月一日　在柏林完成《中国乐制发微》（第一篇）。文中对当时西方某些学者提出的“中国乐制源自希腊”的观点，作了有力驳斥。后发表于《中华教育界》第十七卷第八期。

四月二十六日　致信山东省立第四师范音乐教师李华萱①。信中写道：“顷奉手示及大作，拜读之下，不胜敬佩。往日常在上海出版之《音乐季刊》上，屡读先生之著作，久已仰慕，只以远居欧洲，未能聚首畅谈为憾。吾国近时留心音乐学术者，已不多见，留心斯学而又著述不倦如先生者，更为凤毛麟角。”② 表达了王光祈对国内音乐活动的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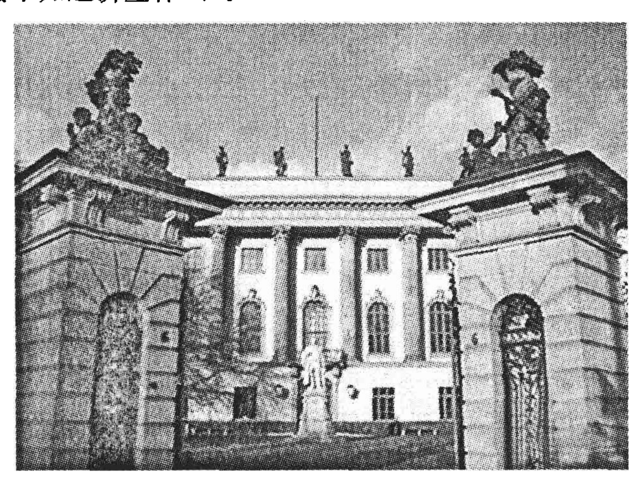
四月二十八日　正式进入柏林大学音乐系深造。以音乐学作为主课，攻读达七个学期。他在《德国音乐教育》一文中讲：“我在未入德国大学之前，即以柏林一位普通音

---

① 李华萱（1895—1965）原名李荣寿，祖籍江苏省宿迁县，出生于济南。幼年随父学习京胡，后师从山东高等学堂音乐教员李佩美学习西乐，师从王露（心葵）学习古琴。1912 年入山东高等师范艺体科学习音乐与美术，1914 年毕业。此后，在山东武定、青州、济宁、济南、曲阜、青岛等地从事中学及师范音乐教育工作。20 年代，李华萱著述颇丰，在京沪两地音乐期刊上发表、出版了大量文章和音乐教材，先后出版了《皮黄曲谱》、《俗曲集》等论著曲集。由于他工作勤奋敬业，教学成绩突出，于 1925 年荣获北京政府教育部总长马叙伦颁发的“文杏章”。1927 年 4 月至 12 月，李华萱收到王光祈的五封来信，信中高度关注并评价了李华萱音乐著作的价值和对音乐教育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调山东师范学院艺术专修科任教，后任艺术系代主任。曾任山东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山东省第一届政协委员。60 年代，李华萱致力于整理王心葵制琴专著《斫桐集》与琵琶曲集《玉鹤轩琵琶谱》。1965 年 12 月 9 日，因患肺癌在济南病逝。

② 刘再生：《王光祈致李华萱书信五则新浮现》，载《音乐研究》2007 年第 4 期。

乐教授补习，每星期学习提琴六点钟，如是者四年，寒暑不断”。此外还“常与彼邦大学音乐教授及‘音乐学者’数人往还，受益不少。否则，一个未具乐理基础之人，跑到大学听讲，简直会不知道讲些什么”。



柏林洪堡大学

在柏林大学，他师从霍恩博斯特尔、舍尔林、沃尔夫、萨克斯等教授。还曾师随柏林乐器博物馆馆长萨克斯教授学了三个学期的乐器学，并到乐器博物馆实习达一年半之久。为了更好地掌握视唱练耳的基本学理，他还师从柏林国家医院耳科主任研究耳朵、喉管解剖之学。

七月二日　致信李华萱。信中十分热情地肯定“尊译《皮黄曲谱》、《俗曲集》两种，极有价值。此后如能继续翻译，当于吾国音乐前途，发生良好影响”。

八月　法兰克福举行“国际音乐展览会”。王光祈约友人凌纯声，在会上演奏七弦琴，以介绍中国音乐于欧洲。

八月三十日　在柏林完成《德国音乐教育》一文。该文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德国音乐教育状况。内容包括：一、中、小学校音乐教育；二、私家音乐教育；三、大学音乐教育；四、社会音乐教育。文中特别详尽地介绍了他所在的柏林大学音乐系的情况。后发表于《中华教育界》第十七卷第四期。

八月　致信李华萱。信中说：“弟远居欧洲，已逾七载，对于国内音乐消息，非常隔阂，故甚望多读国内出版之音乐期刊也。”

九月十四日　致信李华萱，信中说：“先生对于音乐教育之努力，与音乐著述之宏富，在现代中国，实不多见，弟敬佩异常！”还说：“弟在德国研究音乐，至少尚需三年，日与经济压迫奋斗，如将来尚能生还中国，当与足下对座畅谈以谋促进吾国音乐之道也。”

九月十五日　完成《声音心理学》一文。声音心理学和音乐心理学，在当时尚属新兴学科。此文是我国音乐界学者在这方面的最早著述。

九月三十日　在柏林写成《德国音乐教育》一文，载上海《中华教育界》第十七卷第四期。

十一月七日　在柏林完成《中国音乐短史》一文。此文原为八月德国法兰克福所开之“国际音乐展览会”而作。全文对中国音乐的律、调、乐器、乐队、诗乐、剧乐、器乐及音乐思想均作了提纲挈领的介绍，表露出对中国古代音乐文化成就的民族自豪感。曾载于弗朗克府《中国学院杂志》。

十二月十七日　致信李华萱。内容是关于《少年中国歌》（王光祈词曲）在学校试唱的情况。他说：“贵校学生对于该歌，果真爱唱，先生何妨以其试验结果，撰成短篇报告，寄登上海哈同路中华书局编辑所所出之《中华教育界》以介绍于国人之前。因弟曾为中华书局编有《初级小学音乐用书》四册，大半采用中国旧调，现正在印刷之中。弟颇思此种歌谱，能在学校中实地试验，究竟学生是否爱唱？较之西谱究竟如何？”表现了王光祈对国内音乐事业的发展和对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热忱关注。

是年　在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科学导报用德文发表《论中国音乐》。

一九二八年（三十六岁）

三月　在中华书局刊行的《中华教育界》第十七卷第三期发表《小学歌唱教材》一篇。文前编者按语说：“小学歌唱教材，新鲜合用者绝少，兹本局请王光祈先生编有《小学唱歌》一巨册，不日刊行，特录一部分在本志发表，以快先睹。”该期刊登王光祈编写的《黄河》、《种豆》、《燕子》、《冬天冬天》、《家书》、《谁愿知道》、《兵士》、《田家四季歌》、《跳舞》共九首儿歌的词曲，用五线谱刊印。这九首儿歌的歌词均系王光祈创作或译编，曲调或取自德国歌唱教材，或取自中国民谣。有的系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所作，并存有曲谱。以上足见王光祈对小学音乐教材和儿童歌曲之重视。

八月五日　在柏林译完《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本书译自德国一九二六年出版之《一八七一到一九一四年的欧洲内阁大政》。他在序言中说：“大战以后欧洲外交局面虽然略有变迁，而列强在华形势则依然如昔，读本书不仅对于以往史迹完全瞭然，即对现在局势，亦将由此有所领悟也。”自辛亥革命爆发后，西方列强感到惊慌失措。当时，德、美、俄、英、法、日等国，围绕对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承认、对袁世凯的“窃权”当政以及“南北议和”等，频繁展开外交活动，并通过驻北京各外交使团连续举行

会议，商讨如何维护各自在华利益，进而利用中国动荡局势乘机扩大其侵略利益。王光祈翻译的这部德国外交部重要文件，正真实反映了各列强的态度。本书译稿一九二九年四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九月二日　在柏林译完《李鸿章游俄纪事》。一八九五年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后，以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集团对沙俄产生了很大的幻想，认为依靠沙俄可以牵制其他列强，于是借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礼时，清政府派遣李鸿章作为钦差大臣出使沙俄及欧美“联络邦交”。在俄期间，李鸿章与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进行秘密谈判，于一八九六年六月在莫斯科签定了《中俄秘约》。其内容主要包括中俄两国结成对日军事同盟，中国应允俄国修筑经黑龙江、吉林以达海参威的铁路。后来维特把他与李鸿章的交往以及《中俄秘约》签定前后的相关情况，用笔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俄国政府内部各派对于如何保障在华利益，特别是谋取中国东北作为其“势力范围”的争执与最终取向。该书译自俄国沙皇时代国务总理维特伯爵之笔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十一月由东南书局出版。

本月　在柏林译完《瓦德西拳乱笔记》。瓦德西是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陆军元帅。他自被任命为联军统帅赴华到回国期间，写了大量日记，记述其沿途所见所闻以及各种观感，从中既可看到各列强围绕在华利益而呈现的错综复杂矛盾和彼此间的猜忌争斗，亦可窥见德国当时侵占我国山东的野心。本书系由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日记中译出，为研究八国联军和义和团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本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十月九日　在柏林译完《美国与满洲问题》。本书译自一九二六年出版的《德国战前外交文件汇编》。他在序言中说：“美国与满洲问题，并非过去陈迹，乃系未来大事，尚望国人及早加以注意。”此书集中反映了德国与各列强对企图瓜分中国的态度，是研究当时帝国主义在我国东三省角逐争斗的极好材料。本书于一九二九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本月　在北平《晨报》发表《国际三大经济新战线》。

十一月　在《中华教育界》第十七卷第七期发表《学说话与学唱歌》一文。这是一篇相当系统的关于人声发音原理和声乐基本常识的文章，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较早地介绍意大利美声唱法的文章之一。

本年　在国内发表的文章尚有《欧洲农业革命潮流》，载北平《晨报》。

在国外用德文发表的文章计有：

《论中国记谱法》，发表在《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科学导报》上。

《中国耕地数千年的统计》，译自《北平经济半月刊》，发表在《法兰克福科学导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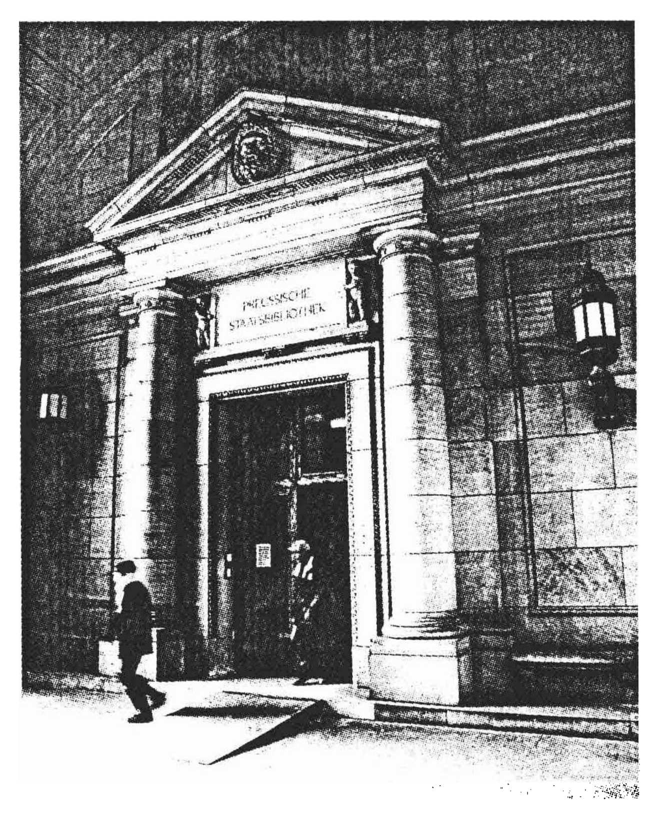
《吕利歌剧〈阿尔美德〉序曲研究》，载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研究报告书。

《论蒂博的声音艺术的准确性及其在十九世纪音乐复兴运动中的意义》，载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研究报告书。

一九二九年（三十七岁）

一月至二月　王光祈完成在柏林大学第四学期的学期论文《Martin Agricola 的德国音乐评论研究》，载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研究报告书。

三月五日　在柏林图书馆内译完《三国干涉还辽秘闻》。此书译自柏林大学汉文教授 O. Franke 所著《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四年列强在东亚》一书。当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之际，作者正在中国任驻华使馆译官。对当时各国纵横捭阖的手段，在书中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王光祈将其中第一篇之第五、第六、第七章译成中文，又从《德国外交部文件汇编》中译出《德日关于辽东问题的协定》之原文，遂成《三国干涉还辽秘闻》。本年七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柏林市立图书馆，王光祈大量的音乐论文写于此处　王勇摄于 2005 年 12 月

三月十二日　在柏林图书馆写成《译谱之研究》一文，后刊载于《中华教育界》第十七卷第十期。本文主要对律吕谱、宫商谱、工尺谱的译法进行了探讨和试译。对国内许多学者的译谱主张和所译乐谱，作了广泛的对照和评述。

三月十三日　在柏林图书馆完成《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一书。本文曾在德国杂志《Sinica》上发表，一九三三年二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六月至七月　王光祈完成，在柏林大学第五学期的学期论文《论卡奇耶的小提琴艺术》，载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研究报告书。

七月　在柏林完成《翻译琴谱之研究》一书。在《导言》中他指出："音乐作品是含有民族性的，欲创造国乐，则中国固有材料，万不能加以忽视。吾国琴谱，写法不良，解释互异，实有加以根本整理之必要。""现在余以两月草成此文，可谓为时甚短，未曾浪费光阴。但在此留学期间，饱受经济压迫与功课逼促之际，而有闲心为此，亦殊不易。倘国内同志对于余之此项工作，能加以纠正补充，并多多从事翻译，以促进国乐之成立，则余将引为万分荣幸矣！"

八月三十日　在柏林图书馆译完《西藏外交文件》。本书共载文件十三篇，均译自英人 Sir Charles Bell 所著《西藏之今昔》。号称"西藏通"的 Bell，曾作为英国驻哲孟雄的政治委员、英军所占藏地之行政长官、西拉姆会议英国全权代表之藏事顾问以及英国外交代表等，居于印藏边界前后达十九年，有《西藏之今昔》等多种著述。王光祈为让世人充分了解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以及英国侵略西藏的原委，特从《西藏之今昔》中译出十三篇文件，并辑录《旧唐书》、《新唐书》、《卫藏图考》和王桐龄《东洋史》、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等相关史料，同时又从德国柏林大学汉文教授 O. Framke 所著之《列强在东亚》中译出部分内容，汇编成此书。一九三〇年四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九月二十日　在柏林完成《音乐与时代精神》一文。他在《导言》中说，他初入柏林大学音乐系时，该学期所研究为十六世纪两大音乐家 Palestrina 与 Lasso 之作品。教授未有一语及于音乐，向学生询问和辨论的尽是关于十六世纪政治、宗教之情形，以及哲学、美术之思潮等等，迨学生对于时代背景明了之后，始从事于该世纪音乐之研究。此种研究方法，给他极深的印象。他觉得在音乐学者中，将整个时代背景应用音乐研究，至今尚不多见，故将个人观察所得及欧洲学者研究结果写成此文。一九三一年二月刊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

十月三十日　在柏林图书馆写成《德国成人教育》一文（三篇）。该文着重介绍了德国"民众大学讲习班"和"民众图书馆"。文中提及他就读柏林大学之前，曾在"纳生民众大学"听《比较音乐学》讲座，该班人数虽不甚多，只有十余人，但听时均甚专

心，计讲六次，每次二小时，缴费六马克（约合中国大洋六角）。第一部分后发表于《教育与民众》第一卷第五号。

十二月二十六日　在北平《晨报》发表《关于东铁问题之欧洲舆论》。

本年　在德国用德文发表的文章计有：

《马丁·阿格里柯拉的德国音乐评论的研究》，载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研究报告书。

《论卡齐耶的小提琴艺术》，载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研究报告书。

为《大英百科全书》参与撰写有关中国音乐的条目。

为《意大利百科全书》撰写有关中国音乐的条目。

一九三〇年（三十八岁）

一月　在《教育与民众》第一卷第六号发表《德国成人教育》（二）。

二月　在《教育与民众》第一卷第七号发表《德国成人教育》（三）。

三月　在《教育与民众》第一卷第八号发表《德国民众图书馆》。

三月十六日　写成《中西音乐之异同》，载《留德学志》第一期（一九三〇年六月）。

四月　在《教育与民众》第一卷第九号发表《柏林国立各博物馆之组织》。文中详尽地介绍了柏林各博物馆组织，计有美术博物馆九种，学术博物馆十九种，故宫博物馆二种。他在文章最后一章说："吾国不欲进为现代世界文明强国则已，如其欲之，则对于设置博物馆一事，万不可缓。盖博物馆之利益，不仅是促进科学、美术，辅助国民教育而已；尤其是可以籍此减除一般市民之下等娱乐，并可以由此培养国民好学风气。"他感叹现在吾国"只有好财风气"，"没有好学风气"。以"愚蠢脸皮"和"乞怜眼睛"与人相见，丧尽了"黄帝祖宗与夫历代先哲之德"。

在北平《晨报》发表《伦敦海军会议之成绩》一文。

五月十九日　在柏林图书馆译完《库伦条约之始末》一书。库伦条约即一九一二年沙皇俄国与外蒙傀儡当局非法签订的《俄蒙协约》及附属《商务专约》。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后来撰写的《从成吉斯汗到苏维埃共和国》一书中，详尽地记载了当年前往库伦谈判签约的经过情形。王光祈将该书德文版之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八诸篇译成中文，故名《库仑条约之始末》。

他在序言中说："外蒙问题至今为中俄两国主要纠纷之所在，推原祸始，实以库伦条约一役为起点。凡留心蒙古问题者，对于此种最有关系之史料，万不可漠然置之也。"

本年十一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本月　在《教育与民众》第一卷第十号发表《德国民众剧院》。

六月二十六日　在北平《晨报》发表《德国金融事业之今昔观》。

七月二十一日　在柏林图书馆完成《英、德、法读音之比较》一书。一九三一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九月十四日　在上海《生活周刊》第五卷第四十期发表《西洋人与中国戏》（一）

九月二十一日　在上海《生活周刊》第五卷第四十一期发表《西洋人与中国戏》（二）

十一月十日　在柏林图书馆音乐部完成《西洋音乐史纲要》一书。在卷首《提纲挈领》中说："我们无论研究任何学问，均应以九牛二虎之力从事，始能稍有收获。大凡素不研究学问之人，根本不知道有所谓问题，若研究学问而不深，则亦不知道问题有如许之多。西洋学者研究学问，往往对于一个极小之问题，不惜以毕生之精力从事。在旁观者观之，固属极为可笑，但西洋学术之进步，即全在于此。"本书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年　在国外用德文发表的文章计有：

《关于席德迈尔的德国歌剧（先莫扎特时代）的研究》，载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研究报告书。

《论中国诗学》，载《法兰克福科学导报》。

一九三一年（三十九岁）

二月二十六日　在柏林图书馆完成《中国音乐史》一书。他在自序中说："本书十之八九系余个人心得。""音乐作品与其他文学一样，须建筑于'民族性'之上，不能强以西乐代庖……而最能促成国乐产生者，殆莫过于整理中国乐史。""先民文化遗产，最足引起民族自觉之心，音乐史亦先民文化遗产之一也。""余留德十余年，皆系卖文为活……本书一点成绩，亦系十年来孤苦奋斗之结果。""西洋汉学家对于吾国近时学人，类多轻视，谓其缺乏普通常识，不解治学方法。""余甚望国内同志能一洗此种奇耻大辱。"一九三四年九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三月二日　在柏林写成《德国对失学国民的救济》，后发表于上海《生活周刊》第六卷第十六期。

同日　写成《留学与博士》。后发表于上海《生活周刊》第六卷第十七期。

五月二十七日　写成《以争立国与以让立国》一文。后发表于上海《生活周刊》第六卷第三十一期、第三十二期。

七月二十一日　在柏林图书馆完成《西洋名曲解说》一书，一九三六年二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八月下旬　由于患胃溃疡和贫血病，呕吐晕昏以至卧床不起。后赴柏林国立大学医院诊治，卧病该院四旬。时值暑假，一切医药费用，完全自理。他说："余虽贫穷，但历来卖文之资，尚可孤注一掷……不向德国医生作乞怜之举。"

夏　周太玄自法归国过德时，在车站会晤王光祈。周太玄回忆："他的精神依旧，抱负不俗，认为'少中'的运动仍应继续。"

十一月五日　在柏林写成《东北问题与国际形势》一文。后发表于上海《生活周刊》第六卷第五十一期。他在文章中说：九月十八日日军占领沈阳之时，"余卧病异邦，闻此噩耗，百感交集，殆难言喻"。"每日皆有一位卖报女郎，按时入院售报。同室各位德国病人，看了此项消息后，多围立余之床前询问，并互相讨论，一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终不可免也者。"

十二月二十九日　在柏林写成《柏林病院四旬记》。后发表在上海《生活周刊》第七卷第三期、第四期、第九期、第十期。

一九三二年（四十岁）

一月一日　在柏林写成《战机尚未成熟》一文。文章认为，日本强占满洲，打破太平洋均势，行将惹起日、俄、美战争，但战机尚未成熟。文章感叹说："令余终日寝食难安者，即吾国因'均势'二字，得以苟延残喘，将来亦随'均势'二字呜呼哀哉！日本武力吞并吾国，是急性症亡国；列强经济共管中国，是慢性症的亡国。"他希望国人能从各方面积极准备，为挽救祖国的危亡而努力。后发表在上海《生活周刊》第七卷第十二期。

一月二日　在柏林写成《御武之武力》一文。"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以此案诉诸国联，以待公理之裁决"。王光祈在文章中认为："国联派遣委员到满调查之举…是在考查中国方面是否有违背条约之事，彼等实有一鼻孔出气之关系，我国欲求得如何公平之结果，恐终属梦想。实际上欲求根本解决，仍非有御侮之武力不可。"后发表在上海《生活周刊》第七卷第十三期。

二月二十五日　在柏林图书馆完成《西洋话剧指南》一书。一九三九年由上海中华

书局印行。

三月三十一日　致函中华书局舒新城。痛感强敌压境，困难当头，拟编译一套《国防丛书》，以备国人抵御侵略之参考。

四月二十二日　在柏林图书馆完成《空防要览》一书的翻译工作。在序言中他说："余本以研究音乐为终身职业，但鉴于此次沪变之被敌蹂躏，而自身远处异国，不能稍尽抵御之责，至以为愧。乃发愤收集西洋国防材料，于课余之暇，从事译述，以备国人参考。盖有国无防，实际等于亡国。若自己不能防而冀他国为之代防，更是无耻之尤。因自御外侮一事，乃是一个民族要求生存权利时应尽之最低义务故也。"该书一九三五年三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五月　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①给王光祈去信，介绍了国内各方面的情形，并多次提起王光祈从事社会事业的旧念，认为他应回国为国家社会服务，入中华书局任事。王光祈因"拟编辑《国防丛书》非在德国再住一二年，不能竣事"的原因，婉辞了朋友的邀请。其时，王光祈已开始着手《国防丛书》的编辑工作，很多时间都在柏林图书馆查阅、搜集资料。由于国内资料缺乏，为工作计，王光祈未能回国。

五月四日　在柏林写成《国防问题》一文。他在文章中说：东北义勇军与日军血战，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使日本暴军，疲于奔命，不能安枕，表现出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的决心和牺牲精神。他提出如果能够改善各地的团练，加强教育训练，则"内乱不足病，外患不足畏矣"！后发表于上海《生活周刊》第七卷第二十六期。

五月六日　在柏林写成《一位德国奇士——捐款中国以征服欧洲》通信稿。后发表在上海《生活周刊》第七卷第二十四期。

七月七日　在柏林图书馆译完《经济战争与战争经济》。本书译自海尔法里耶所著之《世界大战》一书。他指出："吾国经济组织与德国相异，因此，书中所叙各种，不必尽能应用于吾国。但'举一隅可以三隅反'，吾人固可以此得益不少，以作他日国防事业之准备也。"一九三三年二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七月十八日　邵循正先生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对王光祈译著《西藏外交文件》一书中引述乾隆御制《十全武功记》的错讹，提出批评。

八月一日　在柏林写成《防空组织》一文，后发表在上海《生活周刊》第七卷第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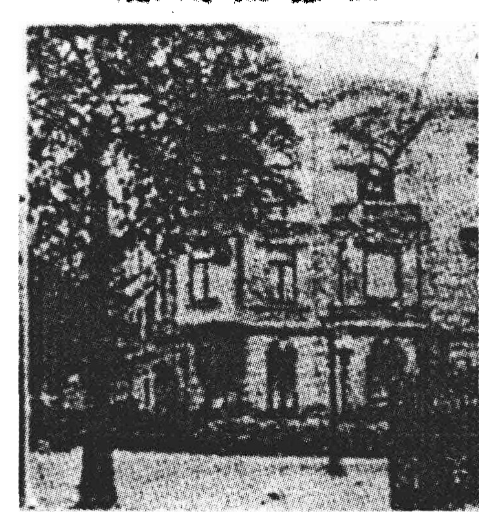
① 舒新城（1893—1960），湖南溆浦人，现代出版家。1919年"五四"运动后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先后担任过中学教师和大学教授，热心于研究和介绍道尔顿教育制度。后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主持编撰《辞海》工作。20至30年代，积极出版和推荐王光祈的著述和译著，与王光祈相知甚深，曾致函动员王光祈回国入中华书局任事。建国后，任《辞海》编辑委员会主编。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编著有《中华百科辞典》、《道尔顿制研究集》等。

十四期。

八月三十一日　在柏林写信致邵循正先生。信中说："仆之专业系在研究音乐历史，惟以国命危殆之故，间亦拨冗翻译外交史料七种，以供国人参考。""译述之时，系在柏林图书馆中……非如国内编著之能多得材料，详细斟酌者可比。更加当时个人处于经济万分压迫之下，健康十分受损之际，疏误之处，势所难免。""仆生平为人，最喜苯干，近又不自量力，为中华书局编译《国防丛书》，此种不度德、不量力之勇气，势将更使先生齿冷。虽然仆宁愿饱受他人'齿冷'之辱，而不愿自己陷于血冷之境也。国难方殷，尚希为国珍重！"后载于天津《大公报》。



波恩大学



王光祈在波恩的寓所

九月二十七日　邵循正先生在北平致信王光祈。信中说："先生著作甚富，脍炙人口，瑕不匿瑜，疵不掩醇。《文副》编者谓先生学行之笃，远非时辈所及，仆聆之神往……编译《国防丛书》，亦当务之急，何日脱稿，先读为快，深望为学珍重，敬候起居不一！"后载天津《大公报》。

十一月一日　受聘波恩大学东方学院，担任中国文艺讲座。并在该校旁听席德迈尔教授的课程。

一九三三年（四十一岁）

二月七日　在莱茵河畔波恩大学译完《国防与潜艇》一书。一九三五年一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五月二十二日　在莱茵河畔波恩大学译完《德英法战时税收》一书。本书为德人客劳斯所著。他在序言中说："本书内容翔实，至今犹为研究欧战时德、英、法财政问题最善之书。吾国财政情形，虽与上述三国相异，但书中可供吾国之参考者亦复不少。因译之，以饷国之留心国防问题者。"一九三四年九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六月十五日　译完《近五十年来德国之汉学》。此文系柏林大学汉文教授、著名汉学家海尼士所作。九月十日载《新中华杂志》第一卷第十七期。

九月　魏时珍在《我所能记忆之光祈生平》一文中说："民国二十二年九月，余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约，复入德求学，因与光祈再遇于波恩。"是时，光祈"为波恩大学讲师，而头已秃，体已衰矣。光祈与余约，每夜七时，来余寓笑谈，八时即去。时当来，光祈已来，时当去，光祈即去，多留一刻，亦不可"。"一夕，光祈告余……十年以来，余成乐书已十余种，其余以糊口而著述者亦十余种。当余执笔时，脑辄作痛，余以左手抚头，右手作字，至痛楚无力时，工作始废。世或有讥余译著不精者，使其知余之生活为何似，将亦不忍苛责也"。

十一月十日　写成《中国音律之进化》，载《新中华杂志》第一卷第二十一期。

十一月二十五日　写成《中国音律之进化》（续完），载《新中华杂志》第一卷第二十二期。

一九三四年（四十二岁）

二月十九日　光祈在波恩致函魏时珍。信中说："本月十五日，有一日本教授在此讲'满洲国与日本'，附以有声影片。此间同学，交涉阻止无效，乃与东方语言院院长接洽，于讲演之前，由该院长说明吾辈反对经过之情形，并朗读吾辈拟就之抗议书一遍。读毕，吾辈全体同学退席，以表示抗拒之意。……并暗中雇一德人速记其演词，现已寄往柏林使馆，请其速向德国外交部抗议矣。将来葛廷根方面，恐不免同样事件之发生，尚希预防为荷。"

四月十六日　本年一月至三月，在柏林由中国政府、东亚美术学会、普鲁士美术学院三方合作，在普鲁士美术学院举办了“中国近代绘画展览会”，参观之人，将近十万。各种报刊，均有评论。王光祈选择了若干种具有代表的意见，题为《德人对于中国绘画之批评》，寄回国内，后发表于上海《新中华杂志》。

五月一日　致函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诸先生。后发表于《音乐教育》第二卷第八期。

六月　以《论中国古典歌剧》一文，荣获波恩大学哲学（音乐学）博士学位。该论文由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所属《东西文化》杂志社出版，分三期连载刊完。第一部分于本年八月载于创刊号上，后依次刊载于九月、十月出版的第二、第三期上。



王光祈博士论文

九月　沈怡至波恩促其归国，据沈怡说："他的经济状况，一时还不容许他立即回国，至少还须二、三年工夫，才可以积起一笔回国的川资。"王光祈写信叮嘱沈怡："不必为他的事情奔走，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德国，随时有著作和国人相见，并非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可比。"

一九三五年（四十三岁）

七月十一日　在波恩大学将自己十五年来在上海《申报》、《时事新报》、北平《晨报》上所发表的关于外交、政治、经济、教育、学术、游记等文章，删存二分之一，共六十四篇，约二十余万言，编为《王光祈旅德存稿》，作为国内研究时事问题的参考。并附录《王光祈旅德西文著作十八篇存目》和《王光祈翻译各种书籍一览表》。该书一九三六年二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他在自序中说："民国九年四月，赴德留学，……是时，余尚未习德文，故最初一、二年之通信，深得同学魏时珍博士供给材料之助。""民国十二年以后，遂决意放弃研究经济之愿，而改习音乐历史。""先后成书三十余种"。

七月二十六日　致书魏时珍。说他自己不是不想回国，苦于国内无相当位置，故暂处国外，以译著事业，报效祖国而已。信中还说到，本年四月二十日蒋介石曾电询柏林使馆，略云："闻王君光祈绩学苦行……如愿回国，当图借重"。使馆曾征询他的意见，他提出"如有相当位置，自愿回国，报效祖邦。如能先以位置相示，以便自揣，能否胜任，再行决定行止。"

八月二十日　写成《中国的道白戏剧和音乐戏剧》一文，刊载于柏林《脑力劳动》第十六期，系王光祈在阅读了该刊同年第九期瑞士学者卡彻先生的文章《中国戏剧》后，所撰写的商榷文章。全文二三千字，简单介绍了中国戏剧的历史，以及中国戏剧中音乐与道白的关系。

八月二十六日　写成《千百年间中国与西方的音乐交流》一文。亲笔签名，赠送他的老师席德迈尔教授，又是作为卡勒教授六十寿诞的贺礼。这是王光祈在波恩大学任汉语讲师时所写的。卡勒教授当时任波恩大学东方学院院长，王光祈正是由他所外聘的汉语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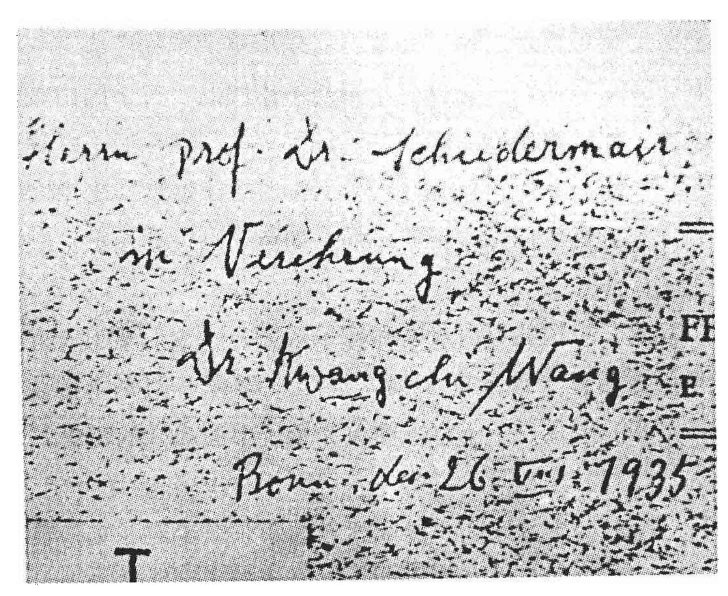
该文发表在波恩出版的纪念卡勒教授专刊上。



席德迈尔教授



卡勒教授



王光祈赠其老师席德迈尔教授的文章德文签名

八月三十日　在波恩大学完成《未来将材之陶养》一书。他在序言中说："书内所言，系针指上次欧战行军之各种弊端，其情形不必尽与吾国相合。但吾国现当国防万分紧急之秋，未来大战，不久终将临头，为避免重蹈他人错误起见，殊有取而参考之价值也。"

十一月十二日　在莱茵河畔波恩大学译完《德国工役制度》一书。一九三六年六月

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年　还完成有下列著述和文章：

《西洋歌剧指南》。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正在印刷中，是否出版，不详。

《王光祈音乐论文》第一集。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正在印刷中，是否出版，不详。

编译《西洋美术史入门读本》（供中学校、师范学校、大学及家庭参考之用）。中华书局一九三九年一月初版。

编译《西洋美术史入门（说明）》，此乃《西洋美术史入门读本》所附另刊之说明书，包括：译者序言（内有对其在德国写作生活的概述）、导言、西洋美术史入门（说明书）的目次（上下两篇十二章）、说明书本文等。中华书局一九三九年一月初版。

写作《工作与人生》、《团体生活》、《音乐与人生》等文章，均发表于三十年代由上海北新书店编辑印行的《初级中学北新文选》上。

一九三六年（四十四岁）

一月十二日　患脑溢血症，下午八时客死波恩医院。王光祈逝世后，波恩大学立即以校长毕脱罗斯基名义向全校教职员发出讣告。

一月十八日　波恩大学举行追悼会。波恩大学东方学院院长、教授卡勒博士说："他是一个很静默稳重的人，只有很接近地去细细认识他，方可以了解他的伟大。""他努力介绍西方音乐的精华到中国去，并且运用西洋的方法去整理那至今还未有人碰过的材料；在这一方面，他可以算是第一个前驱者。"波恩大学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希德玛博士说："他把握住了西欧，特别是德国方面研究音乐的科学方法与途径，由此设法与他故乡的音乐与戏剧的艺术相接近，这居然给他做到了；他是一位受有严格教育的音乐学家。"

二月二十八日　上海《时事新报》刊载《王光祈先生之哀耗》。略谓：王光祈为"吾国唯一之音乐史学家，平生著作甚富，治事亦极精练，不幸骤于上月在德逝世，享年仅四十四岁，噩耗传来，国内学术界咸为震惊，无论知与不知，同深悼惜"。文中还提到王光祈"于去年得有波恩大学博士学位，国人之以音乐史考得是学位者，王君实为第一人，其所提论文《昆曲研究》（即《论中国古典歌剧》），深为德国学术界所赞赏"。"一代英才，竟客死异域，曷胜痛惜"！

三月一日　中华书局舒新城在王光祈《旅德存稿》后记中说："王君此书，去年九

月寄到，今年二月，排校完毕，正待付印，王君一月十二日在德逝世之噩耗已传至上海，而此书已成遗著矣！王君之死，实为我国学学术界一大损失。”

三月十五日　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召开追悼会。到会者有蔡元培、宗白华、徐悲鸿、田汉等三十余人。宗白华主持追悼仪式。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代表到会致词说：“王博士不仅是一个学者，并且也是一个沟通中德文化的一个重要人物。”蔡元培在《王光祈先生追悼会致词》中对王光祈的一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对王光祈壮年辞世，不克进展所长，表示十分婉惜和悲恸。



王光祈先生遗像（徐悲鸿 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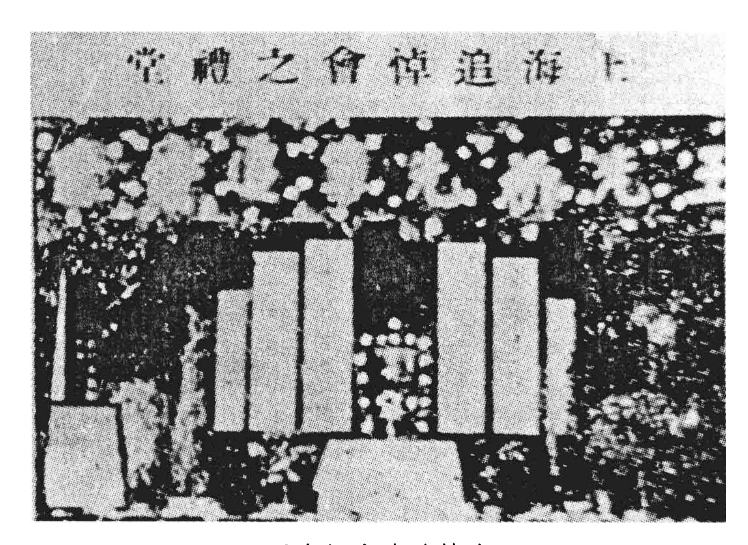
京學術界
昨日追悼王光祈

京學術界於昨日上午十時假中大梅庵、追悼我國[illegible]大師王光祈、到者有徐悲鴻、郭有守、[illegible]、羅家倫、宗白華、唐學詠、[illegible]、田漢、及駐京德使館代表等數十人、圖為參加人員合影、左下角為徐悲鴻所作王光祈之遺像。（國際社攝）

南京学术界追悼王光祈

追悼会上的画像为徐悲鸿所作。

同日　上海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举行了追悼会。舒新城致词，略谓："王君留德十六年，从未受公家或私人方面丝毫津贴，平日生活，纯赖鬻文维持，此种艰苦卓绝之伟大精神，洵足为现代青年表率"。国立音专校长肖友梅因身体不适，由黄自教授代表在会上发表了讲话。黄先生扼要地介绍了王光祈在音乐上的贡献，特别提出："王君所著《中国音乐史》及对于普及音乐之努力，为最有不可磨灭之价值。"



王光祈上海追悼会

四月十九日　成都在文庙西街成公中学举行了追悼会，参加者有李劼人、刘大杰、周太玄、魏时珍等。成公中学是当年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的旧址，王光祈的母校。在举行追悼会的同时，刊行了纪念专刊，"其中有一篇《公祭王光祈先生启》，苍凉凄楚，传颂一时"。



王光祈成都追悼会专刊



王光祈未火葬前之坟墓

七月　全部遗物由同济大学留学生江鸿从波恩寄回上海，存放德、奥、瑞同学会。

八月十五日　遗骸在波恩火化。

十月　骨灰运回上海。

一九三八年

由于李劼人的请托，沈怡辗转由上海将骨灰带至成都，存放在成都东郊“菱窠”李劼人家。

一九四一年

七月二十五日　冼星海在《现阶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我们不能忘记一位埋头苦干死于柏林[①]的中国音乐理论家王光祈，他遗下给我们许多宝贵的著作和翻译，推进了新音乐运动的发展。他的刻苦耐劳是我们从事中国新音乐的模范。"

是年　由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等同窗故友，将骨灰安葬于成都沙河堡李劼人住宅"菱窠"附近之周太玄的家族墓地上。墓穴上覆盖大青石碑一块，周太玄亲笔题写："温江王光祈先生之墓。"



坐落在四川音乐学院的王光祈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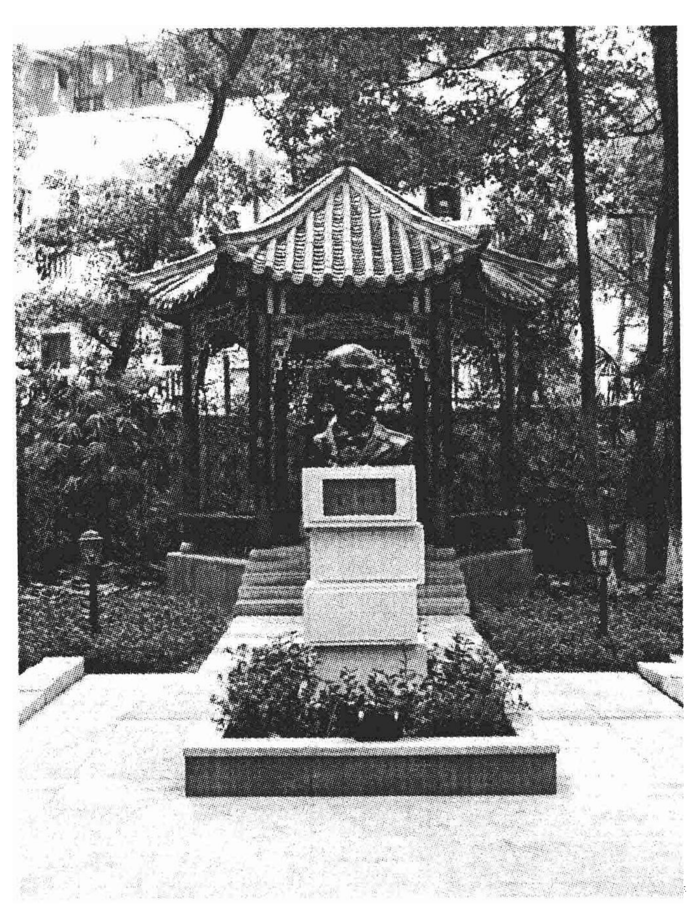
① 柏林：波恩之误。

一九八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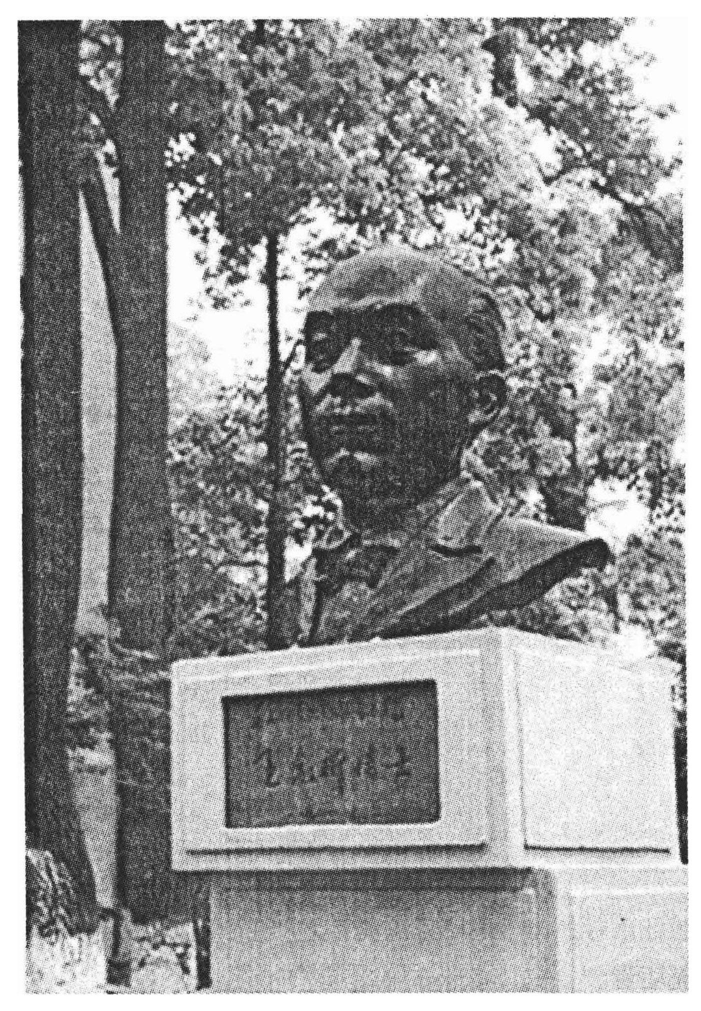
十月　经有关领导单位批准，将墓碑迁于四川音乐学院校园内，并建立了碑亭。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亲笔题写了“王光祈碑亭”横匾。左右楹联由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老革命教育家张秀熟撰文，著名书法家李半黎书写。楹联如下：

革命先驱　少年中国

蜚声寰宇　音乐名家



坐落在四川音乐学院的王光祈碑亭



王光祈塑像（龙德辉　塑）

一九八四年

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　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省政协、四川省音协、四川省社科联主办，温江县政协、四川音乐学院具体承办，在成都召开了第一次“著名音乐学家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关怀和指导下召开的。（吕骥因病住院未能出席，由副主席赵沨代表他做了主题报告。）出席会议的有北京、上海、天津、吉林、辽宁、广东、西安和成都的音乐界、哲学界、史学界学者、专家赵沨、李业道、廖辅叔、冯文慈、俞玉滋、赵宋光、陈聆群、魏时珍、崔宗福、黎永

泰以及四川音乐学院顾问、原院长常苏民和四川音乐学院院长宋大能等七十余人。会议对王光祈做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从此在国内外打开了研究王光祈的新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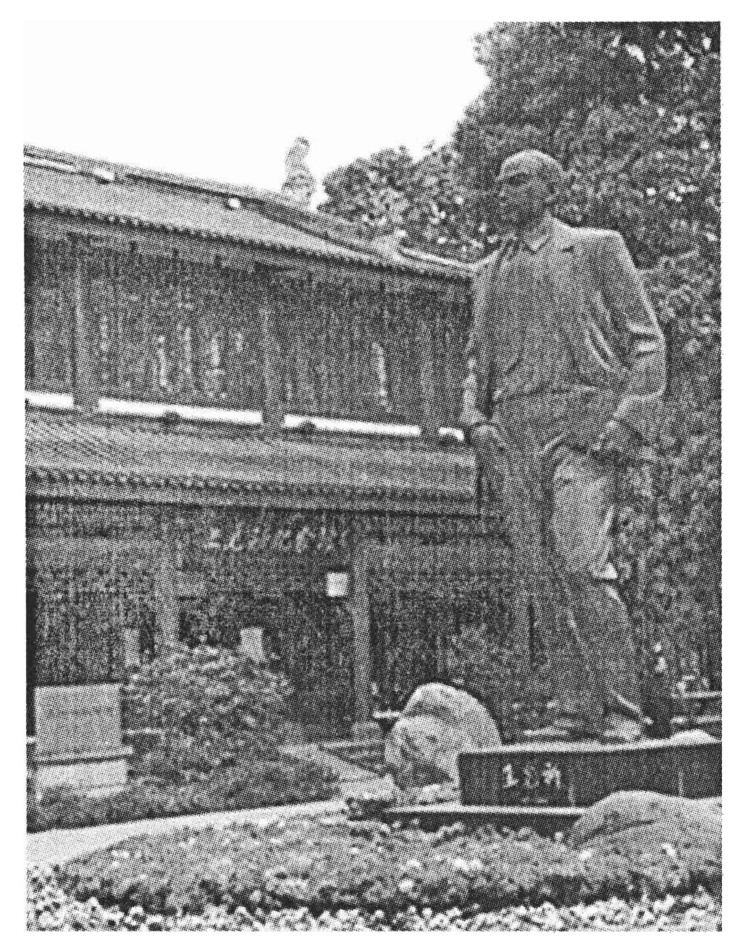
1984 年首届王光祈学术研讨会于成都举行

一九八五年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音乐辞典》之“王光祈”条目中明确写道：“他是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先驱者。”

一九八九年

十月二十五日　温江县人民政府建成“王光祈纪念馆”，并于当日正式开馆。



坐落在温江的王光祈纪念馆与塑像

一九九二年

三月　四川音乐学院编辑《王光祈文集》（音乐卷），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九月十一日　由成都市人大、市政协、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音乐家协会、四川音乐学院和温江县共同主办，四川音乐学院承办的“王光祈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开幕。会期三天，主要有报告会、学术交流、王光祈纪念馆参观活动等内容。出席会议的有中国音协名誉主席吕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黄翔鹏、中国音协书记处常务书记冯光钰、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庄本立教授以及四川音乐学院原院长李忠勇等120多人。



王光祈诞辰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黄翔鹏作重要讲话

二〇〇二年

十二月十八日至十九日　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音乐学院、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文化局、成都市社会科学院、中共温江区委、温江区人民政府主办了“纪念王光祈先生诞辰 110 周年大会暨首届光祈音乐节”。期间，王光祈学术研讨会由四川音乐学院院长敖昌群参加主持。同时经上级批准，温江王光祈纪念馆列为“省、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共温江区委、温江区人民政府举行了正式揭牌仪式。



王光祈诞辰 110 周年大会在温江召开

《王光祈年谱》后记

《王光祈年谱》一九八七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这次重印，编者做了一些修订。

在年谱编写过程中，我们曾访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同志。九十岁高龄的许老，在西山宅邸热情地接见了我们，实事求是地为我们介绍了王光祈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的事迹，使我们十分感动，深受教育。全国音协名誉主席吕骥同志、副主席赵沨同志、四川省政协主席杨超同志、四川省人大常委副主任张秀熟同志，在百忙中也曾多次和我们倾心交谈，给予我们多方面的指导、帮助和支持。王光祈生前挚友、四川大学魏时珍教授、北京大学宗白华教授以及中央音乐学院廖辅叔教授、四川师范学院崔宗复教授，均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他们记忆中的王光祈，并提供了丰富而可贵的历史资料。此外，文化部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上海辞书出版社、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及该校陈聆群教授、温江县政协和县志办公室、李劼人故居文管所、巴蜀书社，也为年谱的资料收集与出版提供了有力支持。在年谱修订过程中，我们参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彭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义彬同志和上海音乐学院王勇副教授有关研究王光祈的文章和著述，吸收了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

书中照片，由王其书教授、王勇副教授和杨晓博士、冯志飞同志翻拍或拍摄。

在此，谨向以上同志和单位、部门，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作　者

二〇〇九年四月

附录二

王光祈文献总目

胡扬吉　编

编者按：此次《王光祈文集》的编辑出版，不仅满足了读者总览王光祈著述全貌的宿愿，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再一次梳理和进一步完善“王光祈文献总目”的契机。客观看来，要为王光祈文献编制一部精准周全得无可挑剔的“全目”，是难以为之的，我们所能做到的无非是“尽可能的全”和“相对的完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笔者力求充分参照前辈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客观审视后学同仁的见仁见智，继而在本人 1993 年所编《王光祈著述及研究资料综目》的基础上，此次将该综目一分为二，分别重新编制成《王光祈文献总目》和《王光祈研究文献综目》，并试图使两者更加细化、完备，以利从事“王光祈研究”的专家学者能从中窥见王光祈文献的来龙去脉和总体架构，同时获得参考和检索相关文献的具体线索。

本目录在以“音乐类”文献和“时政、经济、文化类”文献两个基本大类进行粗分的前提下，再进一步以语言种类、文献体裁形式以及特定的文献种类来加以分类编排。文献资料的编排，较之以前更趋于类分的合理清晰和标识的简洁明了，旨在为读者和专家学者一目了然地提供一个宽口径的参照系。其中若有疏漏和失误之处，恳请不吝指正。

目　录

一 音乐类文献

［**说明**］：以下所列为王光祈所撰写的与音乐有关的中外文各类著述，以“中文著作”、“期刊载中文文章”“报纸载中文文章”、“文集载中文文章”、“外文文献”、“专辑文献”为序，加以进一步类分。其中，“中文著作”以初版时间为序；“期刊载中文文章”、“报纸载中文文章”、“文集载中文文章”以首载时间或刊期为序；“外文文献”和“专辑文献”以初版、首印或首载时间为序。凡时间不详者，均列于各类之末。

（一）中文著作

1.《**欧洲音乐进化论**》/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4月初版，1925年再版，1929年第3版，1931年第4版。1923年11月完稿于德国柏林。

2.《**西洋音乐与诗歌**》/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10月初版，1928年10月第4版，1929年11月第5版。另有“中华音乐丛书”1925年版。1924年1月19日完稿于德国柏林。

3.《**西洋音乐与戏剧**》/上海：中华书局，1925年2月初版，1928年第3版，1929年11月第4版。1924年7月4日完稿于德国柏林。

4.《**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上海：中华书局，1925年7月初版，1926年3月第2版。1924年5月25日完稿于德国柏林。

5.《**东西乐制之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26年1月初版，1928年10月第3版，另有1936年版；北京：音乐出版社，1958年1月据中华书局1926年版重印版；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12月版。1924年12月16日完稿于德国柏林。

6.《**各国国歌评述**》/上海：中华书局，1926年11月初版，1932年12月再版。1925年5月完稿于德国柏林。

7.《**西洋乐器提要**》/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1月初版，1936年8月第3版，1941年7月第4版。另有中华书局1929年版（待查考）。1924年9月1日完稿于德国柏林。

8.《**西洋制谱学提要**》/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7月初版，1940年7月再版。1925年3月19日完稿于德国柏林。

9.《**东方民族之音乐**》/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7月初版；北京：音乐出版社，1958年1月据中华书局初版重印版。1925年11月5日完稿于德国柏林。

10.《**音学**》/上海：启智书局，1929年7月初版，1935年4月再版。1926年3月17日完稿于德

国柏林。

11.《**翻译琴谱之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31 年 10 月初版，1936 年 9 月再版。1929 年 7 月完稿于德国柏林。

12.《**对谱音乐**》/上海：中华书局，1933 年 2 月初版，1947 年 9 月再版。1925 年 8 月完稿于德国柏林。

13.《**中国诗词曲之轻重律**》/上海：中华书局，1933 年 2 月初版。1929 年 3 月 13 日完稿于德国柏林图书馆。

14.《**中国音乐史**》（上、下册）/上海：中华书局，1934 年 9 月初版，1941 年 1 月第 3 版；北京：音乐出版社，1957 年 5 月据中华书局 1934 年版重印版；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 年版。1931 年 2 月 26 日完稿于德国柏林图书馆。

15.《**西洋名曲解说**》/上海：中华书局，1936 年 2 月初版。1931 年 7 月 21 日完稿于德国柏林图书馆。

16.《**西洋音乐史纲要**》（上、下卷）/上海：中华书局，1937 年 12 月初版，1941 年 8 月第 3 版。1930 年 11 月 10 日完稿于德国柏林图书馆。

（二）期刊载中文文章

1. **德国人之音乐生活**/1923 年 11 月 30 日载于《音乐季刊》1923 年第 2 期。
2. **德国人之音乐生活（一）～（五）**/1923 年 12 月载于《少年中国》1923 年总第 4 卷第 8 期。
3. **德国人之音乐生活（六）～（十）**/1924 年 1 月载于《少年中国》1923 年总第 4 卷第 9 期。
4. 《**欧洲音乐进化论**》**自序**/1924 年 2 月载于《少年中国》1924 年总第 4 卷第 10 期。
5. **德国人之音乐生活（续）**/1924 年 4 月 15 日载于《音乐季刊》1924 年第 3 期。
6. **阳调与阴调**/1925 年 4 月 15 日载于《音乐季刊》1925 年第 5 期。
7. **音乐在教育上之价值**/1927 年 2 月载于《中华教育界》1927 年总第 16 卷第 8 期。
8. **评《卿云歌》**/1927 年 6 月载于《中华教育界》1927 年总第 16 卷第 12 期。
9. **小学唱歌新教材**/1928 年 3 月载于《中华教育界》1928 年总第 17 卷第 3 期。
10. **德国音乐教育**/1938 年 4 月载于《中华教育界》1928 年总第 17 卷第 4 期。
11. **声音心理学**/1928 年 5 月载于《中华教育界》1928 年总第 17 卷第 5 期。
12. **论中国音乐**/1928 年 6 月载于《中华教育界》1928 年第 17 卷第 6 期
13. **中国音乐短史**/1928 年 6 月载于《中华教育界》1928 年总第 17 卷第 6 期。
14. **学说话与学唱歌**/1928 年 11 月载于《中华教育界》1928 年总第 17 卷第 7 期。
15. **中国乐制发微（第一篇）**/1928 年 12 月载于《中华教育界》1928 年总第 17 卷第 8 期。
16. **译谱之研究**/1929 年 5 月载于《中华教育界》1929 年总第 17 卷第 10 期。
17. **中西音乐之异同**/1930 年 6 月载于《留德学志》1930 年第 1 期。
18. **西洋人与中国戏（一）**/1930 年 9 月 14 日载于《生活周刊》1930 年总第 5 卷第 40 期。
19. **西洋人与中国戏（二）**/1930 年 9 月 21 日载于《生活周刊》1930 年总第 5 卷第 41 期。

20. **中国音律之进化**（上）/1933年11月10日载于《新中华杂志》1933年总第1卷第21期。
21. **中国音律之进化**（下）/1933年11月25日载于《新中华杂志》1933年总第1卷第22期。
22. **关于中国音乐的一封信——致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1934年7月载《音乐教育》1934年总第2卷第8期。
23. **论中国古典歌剧**（王光祈博士论文中译本，金经言译）/载于《音乐学丛刊》1982年第2辑。

（三）报纸载中文文章

1. **德国乐中之歌剧**/1923年10月5日载于《申报》。
2. **德国音乐与中国**/1923年10月7日载于《申报》。
3. **德国音乐之来源**/1923年10月8日载于《申报》。
4. **德国音乐之始祖**/1923年10月12日载于《申报》。
5. **德国音乐之三杰**/1923年10月15日载于《申报》。
6. **三杰以后之音乐**/1923年10月16日载于《申报》。
7. **十九世纪之名家**/1923年10月20日载于《申报》。
8. **德国乐中之歌剧（续）**/1923年12月5日载于《申报》。
9. **德国乐中之趣剧**/1923年12月6日载于《申报》。
10. **德国乐中之趣剧（续）**/1923年12月10日载于《申报》。
11. **德国乐中之艺师**/载于1923年12月17日《申报》。
12. **音乐中之民族主义**/1923年12月21日载于《申报》。

（四）文集载中文文章

1. **音乐与时代精神**/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2月初版。
2. **音乐与人生**/载于《北新活页文选》，上海：北新书局，刊载目录编号：第2259号，出版日期不详。

（五）外文文献

1. **Das Chinesische Tonsystem.** 1925.【中文译名：论中国的音律体系，1925年。另见本目录“有待进一步考证的文献”。】
2. **Die Bedeutung der Musik in China.** In *Dresdner Anzeiger*. 1926.【中文译名：音乐在中国的意义/载于德文版《德累斯顿导报》，1926年，仅存目。】
3. **Über die chinesische Musik.** In *Sinica*. Frankfurt. 1927.【中文译名：论中国音乐/载于法兰克福德文版《汉学》1927年6—7月合期。】（另注：此文由王光祈另译为中文，载于《中华教育界》1928年第17卷第6期；金经言于2004年将该文译为中文，载于《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4期。）

4. **Ueber die chinesischen Notenschriften.** In *Sinica*. 1928. 【中文译名：论中国记谱法/载于法兰克福德文版《汉学》1928 年 3－4 月合期。】（另注：此文由金经言于 2004 年译为中文，载于《中国音乐学》2004 年第 4 期。）
5. **Die Overtüre der Oper Armide'von Lully.** 1928. 【中文译名：吕利歌剧《阿尔美德》序曲的分析研究/据王光祈自注，此为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研究报告书，1928 年，仅存目。另见本目录“有待进一步考证的文献”。】
6. **A. F. J. Thibauts Ueber Reinheit der Tonkunst und ihre Bedeutung in der musikalischen Renaissance－Bewegung des 19. Jahrhunderts.** 1928. 【中文译名：论蒂博兹《声音艺术的纯洁性》一书及其对十九世纪音乐复兴运动的意义/据王光祈自注，此为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研究报告书，1928 年，仅存目。另见本目录“有待进一步考证的文献”。】
7. **Chinese Music.** 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29. 【中文译名：中国音乐/载于英文版《大英百科全书》，1929 年版。另见本目录“有待进一步考证的文献”。】
8. **Musica della China.** In *Enciclopedia Italiana*. 1929. 【中文译名：中国音乐/载于意大利文版《意大利百科全书》，1929 年版。】
9. **Die deutschen Musiktraktate des Martin Agricola.** 1929. 【中文译名：马丁·阿格里柯拉关于德国音乐评论的研究/据王光祈自注，此为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研究报告书，1929 年，仅存目。另见本目录“有待进一步考证的文献”。】
10. **J. B. Cartier：L'Art du violon.** 1929. 【中文译名：评 J. B. 卡蒂埃的《小提琴艺术》一书/据王光祈自注，此为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研究报告书，1929 年，仅存目。另见本目录“有待进一步考证的文献”。】
11. **Über die chinesische Poetik.** In *Sinica*. 1930. 【中文译名：论中国诗学/载于德文版《汉学》1930 年第 1 期。】
12. **Die deutsche Oper（Vormozartsche Zeit）von Ludwig Schiedermair.** 1930. 【中文译名：评路德维希·席德迈尔的《德国歌剧》（前莫扎特时代）/据王光祈自注，此为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研究报告书，1930 年，仅存目。另见本目录“有待进一步考证的文献”。】
13. **Die chinesische Klassische Oper.** In *Orient et Occident*. Geneve. 1934. 【中文译名：论中国古典歌剧/载于德文版《东西文化》，日内瓦，1934 年，此系王光祈在波恩大学用德文完成的博士论文。金经言曾于 1982 年将其译为中文，并将其中部分内容发表于《音乐学丛刊》1982 年第 2 辑。】
14. **Musikalische Beziehungen zwischen China und dem Western im Laufe der Jahrtausende.** In *Festschrift des Prof*. Kahle. Bonn. 1935. 【中文译名：千百年间中国与西方的音乐交流/载于德文版《卡莱教授纪念专刊》，波恩，1935 年。】
15. **Das gesprochene und musikalische Drama in China.** In *Geistige Arbeit* Berlin. 1935. 【中文译名：中国的道白戏剧与音乐戏剧/载于德文版《脑力劳动》，柏林，1935 年第 16 期。】

（六）专辑文献

1.《**王光祈音乐论文选**》/ 黎文、毕兴、朱舟编，成都“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1984 年 6 月，内部出版。
2.《**新见王光祈音乐论文集录**》/陈聆群编，1984 年，打印稿。
3.《**王光祈文集**》（**音乐卷**）/四川音乐学院编，成都：巴蜀书社，1992 年 3 月
4.《**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上册**）/冯文慈、俞玉滋选注，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 年 1 月。
5.《**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中册**）/冯文慈、俞玉滋选注，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 年 1 月。
6.《**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下册**）/冯文慈、俞玉滋选注，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 年 1 月。

二　时政、经济、文化类文献

［**说明**］：以下所列为王光祈所撰写的与时政、经济、文化等有关的中外文各类文献，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教育、新闻、语言、文学、艺术等诸多学科领域。由于不便在此以相应的学科为类目一一加以细分和赘述，权且以“时政、经济、文化”加以粗略概括。所列文献以“中文著作”、“翻译著作”、“期刊载中文文章”、“报纸载中文文章”、“其他类型出版物载中文文章”、“外文文献”、“书信”、“诗词”为序进一步加以类分。其中，“中文著作”和“翻译著作”以初版时间为序；“期刊载中文文章”、“报纸载中文文章”、“其他类型出版物载中文文章”、“外文文献”、“书信”等均以首载时间或刊期为序，“诗词”则以写作完稿时间为序。凡时间不详者，均列于各类之末。

（一）中文著作

1.《**德国人之婚姻问题**》（少年中国学会小丛书）/上海：中华书局，1924 年 1 月初版，1933 年 1 月第 4 版。1923 年 12 月 7 日完稿于德国柏林图书馆。
2.《**少年中国运动**》（少年中国学会小丛书）/上海：中华书局，1924 年 6 月初版。1924 年 3 月 30 日完稿于德国柏林图书馆。
3.《**战后德国之经济**》（国民外交小丛书）/上海：中华书局，1927 年初版，1928 年 3 月再版。1926 年 11 月 28 日完稿于德国柏林图书馆。

4.《**英德法文读音之比较**》/上海：中华书局，1933 年 2 月初版。1930 年 7 月 21 日完稿于德国柏林图书馆。另有 1931 年初版之说（据《王光祈年谱》），待查考。

5.《**王光祈旅德存稿**》（上、下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 年 2 月初版。1935 年 7 月 11 日完稿于德国波恩大学。

6.《**西洋话剧指南**》/昆明：中华书局，1939 年 8 月初版。1932 年 2 月 25 日完稿于德国柏林图书馆。

（二）翻译著作

1.《**瓦德西拳乱笔记**》（**近代中国外交史料之一**）/上海：中华书局，1928 年 9 月初版。1928 年 9 月完稿于德国柏林。

2.《**李鸿章游俄纪事**》（**近代中国外交史料之二**）/上海：东南书店，1928 年 11 月初版；上海：中华书局，1933 年 5 月版。1928 年 9 月 2 日完稿于德国柏林。

3.《**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度**》（**近代中国外交史料之六**）/上海：中华书局，1929 年 4 月初版。1928 年 8 月 5 日完稿于德国柏林。

4.《**美国与满洲问题**》（**近代中国外交史料之七**）/上海：中华书局，1929 年 4 月初版。1928 年 10 月 9 日完稿于德国柏林。

5.《**三国干涉还辽秘闻**》（**近代中国外交史料之四**）/上海：中华书局，1929 年 7 月初版。1929 年 3 月 5 日完稿于德国柏林。

6.《**西藏外交文件**》（**近代中国外交史料之五**）/上海：中华书局，1930 年 4 月初版。1929 年 8 月 30 日完稿于德国柏林图书馆。

7.《**库伦条约之始末**》（**近代中国外交史料之三**）/上海：中华书局，1930 年 11 月初版，1932 年 9 月再版。1930 年 5 月 19 日完稿于德国柏林图书馆。

8.《**经济战争与战争经济**》（**国防丛书第一种**）/上海：中华书局，1933 年 2 月初版。1932 年 7 月 7 日完稿于德国柏林图书馆。

9.《**德英法战时税政**》（**国防丛书第二种**）/上海：中华书局，1934 年 9 月初版。1933 年 5 月 22 日完稿于德国波恩大学。

10.《**国防与潜艇**》（**国防丛书第三种**）/上海：中华书局，1935 年 1 月初版，1936 年 8 月再版。1933 年 2 月 7 日完稿于德国波恩大学。

11.《**空防要览**》（**国防丛书第四种**）/上海：中华书局，1935 年 3 月初版。1932 年 4 月 22 日完稿于德国柏林图书馆。

12.《**未来将才之陶养**》（**国防丛书第八种**）/上海：中华书局，1936 年 4 月初版。1935 年 8 月 31 日完稿于德国波恩大学。

13.《**德国工役制度**》（**国防丛书第十种**）/上海：中华书局，1936 年 6 月初版。1935 年 11 月 12 日完稿于德国波恩大学。

14.《**西洋美术史入门读本**》/广州：中华书局，1939 年 1 月初版。1935 年 5 月 29 日完稿于德国

波恩大学。

15.《〈西洋美术史入门〉说明书》/广州：中华书局，1939年1月初版。1935年5月29日完稿于德国波恩大学。

16.《玉井山馆笔记·四魂集·李鸿章游俄纪事》（全10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

17.《新译英国政府刊布中国革命蓝皮书》/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83年版。

（三）期刊载中文文章

1. **国际社会之改造**/1918年12月22日载于《每周评论》1918年第1号。
2. **无职业的人不得干预政治**/1919年1月12日载于《每周评论》1919年第4号。
3. **国际的革命**/1919年2月23日载于《每周评论》1919年第10号。
4. **今日之梅特涅**/1919年3月2日载于《每周评论》1919年第11号。
5. **兑现**/1919年3月16日载于《每周评论》1919年第13号。
6. **工作与人生**/1919年4月15日载于《新青年》1919年总第6卷第4号。
7. **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1919年4月20日载于《每周评论》1919年第18号。
8. **为青岛问题敬告协约各国**/1919年5月11日载于《每周评论》1919年第21号。
9. **司法独立与教育独立**/1919年8月10日载于《每周评论》1919年第34号。
10. **《卖国的童子》（黄仲苏译）书评**/1919年8月15日载于《少年中国》1919年总第1卷第2期。
11. **少年中国学会报道**/1919年8月15日载于《少年中国》1919年总第1卷第2期。
12. **少年中国之创造**/1919年8月15日载于《少年中国》1919年总第1卷第2期。
13. **对大学开女禁问题的意见**/1919年10月5日载于《少年中国》1919年总第1卷第4期。
14. **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1919年12月15日载于《少年中国》1919年总第1卷第6期。
15. **团体生活**/1919年12月15日载于《少年中国》1919年总第1卷第6期。
16. **一个社会问题**/1920年1月4日载于《星期日》社会问题专号。
17. **工读互助团**/1920年1月5日载于《少年中国》1920年总第1卷第7期。
18. **城市中的新生活**/1920年1月5日载《少年中国》1920年第1卷第7期。
19. **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1920年4月1日载于《新青年》1920年总第7卷第5号。
20. **工读互助与勤工俭学**/1920年6月5日载于《旅欧周刊》1920年第30号。
21. **旅欧同人的使命**/1920年8月28日载于《旅欧周刊》1920年第42号。
22. **两重保险**/1920年9月4日载于《旅欧周刊》1920年第43号。
23. **分工与互助**/1920年9月19日载于《旅欧周刊》1920年第47号。
24. **旅欧杂感**（1）～（5）/1920年11月15日载于《少年中国》1920年总第2卷第5期。
25. **留学界两大潮流**/1920年12月载于《旅欧周刊》1920年（刊期不详）。
26. **德法两国生活之比较**/1920年（日期不详）载《民心》第1卷第39期。

27. **留德学界之近况**/1920 年（日期不详）载于《中华教育界》1920 年总第 10 卷第 6 期。
28. **分工与互助**/1921 年 1 月 15 日载于《少年中国》1921 年总第 2 卷第 7 期。
29. **旅欧杂感（续）**/1921 年 2 月 15 日载于《少年中国》1921 年总第 2 卷第 8 期。
30. **对今年七月南京大会的提议**/1921 年 9 月 1 日载于《少年中国》1921 年总第 3 卷第 2 期。
31. **少年中国学会问题**/1921 年 9 月 1 日载于《少年中国》1921 年总第 3 卷第 2 期。
32. **我所知道的安斯坦**/1922 年 2 月 1 日载于《少年中国》1922 年总第 3 卷第 7 期。
33. **中国人之生活颠倒——青年烦闷之最大原因**/1922 年 2 月 25 日载于《学生杂志》1922 年总第 9 卷第 7 期。
34. **社会的政治改革与社会的社会改革**/1922 年 3 月 1 日载于《少年中国》1922 年总第 3 卷第 8 期。
35. **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1922 年 3 月 1 日载于《少年中国》1922 年总第 3 卷第 8 期。
36. **傅立叶的理想组织**/1922 年 4 月 1 日载于《少年中国》1922 年总第 3 卷第 9 期。
37. **我们的工作**/1923 年 8 月 1 日载于《少年中国》1923 年总第 4 卷第 1 期。
38. **全欧各国财政·债务·金融·商业概观**/1923 年 5 月（日期不详）载于《少年中国》1923 年总第 4 卷第 3 期。
39. **全欧各国农业·工业概观**/1923 年 6 月（日期不详）载于《少年中国》1923 年总第 4 卷第 4 期。
40. **德意志青年运动**/1923 年 7 月（日期不详）载于《少年中国》1923 年总第 4 卷第 5 期。
41. **我们应该怎样运动**/1923 年 7 月（日期不详）载于《少年中国》1923 年总第 4 卷第 5 期。
42. **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游记**/1923 年 8 月（日期不详）载于《少年中国》1923 年总第 4 卷第 6 期。
43. **社会活动之真义**/1924 年 2 月（日期不详）载于《少年中国》1924 年总第 4 卷第 10 期。
44. **教育界对中国现状应有之三大觉悟**/1927 年 5 月（日期不详）载于《中华教育界》1927 年总第 16 卷第 11 期。
45. **德国成人教育（一）**/1929 年 10 月 30 日载于《教育与民众》1929 年总第 1 卷第 5 号。
46. **德国成人教育（二）**/1930 年 1 月（日期不详）载于《教育与民众》1930 年总第 1 卷第 6 号。
47. **德国成人教育（三）**/1930 年 2 月（日期不详）载于《教育与民众》1930 年总第 1 卷第 7 号。
48. **德国民众图书馆**/1930 年 3 月（日期不详）载于《教育与民众》1930 年总第 1 卷第 8 号。
49. **柏林国立各博物馆之组织**/1930 年 4 月（日期不详）载于《教育与民众》1930 年总第 1 卷第 9 号。
50. **柏林国立各博物馆之组织（续）**/1930 年 5 月（日期不详）载于《教育与民众》1930 年总第 1 卷第 10 号。
51. **德国民众剧院**/1930 年 5 月（日期不详）载于《教育与民众》1930 年总第 1 卷第 10 号。
52. **德国对失学国民之救济**/1931 年 4 月 11 日载于《生活周刊》1931 年总第 6 卷第 16 期。
53. **留学与博士（德国通讯）**/1931 年 4 月 18 日载于《生活周刊》1931 年总第 6 卷第 17 期。
54. **以争立国与以让立国（德国通讯）上**/1931 年 7 月 25 日载于《生活周刊》1931 年总第 6 卷第 31 期。
55. **以争立国与以让立国（德国通讯）下**/1931 年 8 月 1 日载于《生活周刊》1931 年总第 6 卷第

32 期。

56. **东北问题与国际形势（德国通讯）**/1931 年 12 月 12 日载于《生活周刊》1931 年总第 6 卷第 51 期。
57. **柏林病院四旬记（德国通讯）（一）**/1932 年 1 月 23 日载于《生活周刊》1932 年总第 7 卷第 3 期。
58. **柏林病院四旬记（德国通讯）（二）**/1932 年 1 月 30 日载于《生活周刊》1932 年总第 7 卷第 4 期。
59. **柏林病院四旬记（德国通讯）（三）**/1932 年 2 月 5 日载于《生活周刊》1932 年总第 7 卷第 5 期。
60. **柏林病院四旬记（德国通讯）（四）**/1932 年 3 月 12 日载于《生活周刊》1932 年总第 7 卷第 6 期。
61. **战机尚未成熟（德国通讯）**/1932 年 3 月 26 日载于《生活周刊》1932 年总第 7 卷第 12 期。
62. **御武之武力（德国通讯）**/1932 年 4 月 2 日载于《生活周刊》1932 年总第 7 卷第 13 期。
63. **一位德国奇士（德国通讯）——捐款中国以征服欧洲**/1932 年 6 月 18 日载于《生活周刊》1932 年总第 7 卷第 24 期。
64. **国防问题（德国通讯）——团练国防军**/1932 年 7 月 2 日载于《生活周刊》1932 年总第 7 卷第 26 期。
65. **经济战争与战争经济（德国通讯）（上）——国防问题（甲）经济战争**/1932 年 10 月 22 日载于《生活周刊》1932 年总第 7 卷第 42 期。
66. **经济战争与战争经济（德国通讯）（下）——国防问题（乙）战争经济**/1932 年 10 月 29 日载于《生活周刊》1932 年总第 7 卷第 43 期。
67. **防空组织（德国通讯）——国防问题**/1932 年 11 月 5 日载于《生活周刊》1932 年总第 7 卷第 44 期。
68. **近五十年来德国之汉学（翻译文献）**/1933 年 9 月 10 日载于 1933 年《新中华》总第 1 卷第 17 期。
69. **德人对于中国绘画之批评**/1934 年（日期不详）载于《新中华》1934 年总第 2 卷。
70. **读了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学说后的感想**/写于 1922 年 4 月，载于《加拿大华人工会刊物》，刊期不详。
71. **留德学生问题**/载于《中华教育界》，刊期不详。
72. **王光祈旅德存稿**/载于《努力周刊》，刊期不详。

（四）报纸载中文文章

1. **十三省督军电劾张跃曾与某督军勋专电**/载于 1916 年 9 月 16 日《四川群报》。
2. **张勋干涉议会之又一电**/载于 1916 年 9 月 22 日《四川群报》。
3. **张勋干涉国会之又一电**/载于 1916 年 9 月 23 日《四川群报》。
4. **揭露张勋干涉国会的反响和危害**/载于 1916 年 9 月 24 日《四川群报》。

5. 冯国璋劝告张勋（北京专电）/载于 1916 年 9 月 25 日《四川群报》。
6. 王宗尧请宣示二张情事（北京消息）/载于 1916 年 9 月 29 日《四川群报》。
7. 揭露张勋复辟的丑剧/载于 1917 年 7 月（日期不详）《四川群报》。
8. 学生赴欧参战队进行手续之商榷/载于 1918 年 9 月 5 日《时事新报》副刊。
9. 择业/载于 1919 年 2 月 10 日、11 日《晨报》副刊。
10. 学生与劳动（一）～（四）/载于 1919 年 2 月 25 日～28 日《晨报》副刊。
11. 俄罗斯之研究（一）～（二）/载于 1919 年 3 月 1 日、2 日《晨报》副刊。
12. 朝鲜革命与外蒙骚乱/载于 1919 年 3 月 27 日《晨报》副刊。
13. 什么是“善”/载于 1919 年 4 月 26、27 日《晨报》副刊。
14. 读梁乔山先生与某君论社会主义书/载于 1919 年 4 月 29、30 日《晨报》副刊。
15. 劳动者的权力/载于 1919 年 5 月 1 日《晨报》副刊。
16. 社会主义的派别/载于 1919 年 5 月 3 日《晨报》副刊。
17. 关于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载于 1919 年 5 月 7 日《川报》。
18. 有关五四运动的长篇通信/载于 1919 年 5 月 16 日《川报》。
19. 北京特约通信（一）/载于 1919 年 8 月 15 日《时事新报》。
20. 总解决与零碎解决/载于 1919 年 9 月 30 日《晨报》副刊。
21. 改革旧家庭的方法（组织女子周刊 组织女子互助社）/载于 1919 年 12 月 2 日《晨报》副刊。
22. 城市中的新生活/载于 1919 年 12 月 4 日《晨报》副刊。
23. 欧游通信（一）/载于 1920 年 5 月 4 日《申报》。
24. 欧游通信（二）/载于 1920 年 5 月（日期不详）《申报》。
25. 欧游通信（三）/载于 1920 年 5 月 19 日《申报》。
26. 欧游通信（四）/载于 1920 年 5 月 20 日《申报》。
27. 欧游通信（五）/载于 1920 年 6 月 17 日《申报》。
28. 欧游通信（六）/载于 1920 年 6 月 18 日《申报》。
29. 德意志各党之内容/载于 1920 年 8 月 13、14 日《申报》。
30. 选举后之德国政局/载于 1920 年 8 月 15—17 日《申报》。
31. 最近德国之经济状况/载于 1920 年 9 月 15 日《申报》。
32. 最近德国之生活状况/载于 1920 年 9 月 16 日《申报》。
33. 俄波问题与国际形势（德国特约通信）——英意与法美对抗的局面/载于 1920 年 10 月 20 日《时事新报》。
34. 德国大学的危机（德国特约通信）/载于 1920 年 10 月 21 日《时事新报》。
35. 德国科学界的大论战/载于 1920 年 11 月 5 日《时事新报》。
36. 美德结约与英美争霸/载于 1920 年 11 月 9 日《申报》。
37. 德国一年来金融状况/载于 1920 年 11 月 10 日《申报》。
38. 社会民主党又欲上台（德国特约通讯）/载于 1920 年 11 月 10 日《时事新报》。

39. 法国新总统与对德政策（德国特约通讯）——法国人民负担的比较 德国财政总长理财方法/载于 1920 年 11 月 11 日《时事新报》。
40. 德意志破裂之危机与世界前途之关系/载于 1920 年 11 月（日期不详）《申报》。
41. 北京国际财政讨论会情形（德国特约通讯）——与会各国代表的态度 议决的重要问题/载于 1920 年 12 月 8 日《时事新报》。
42. 独立社会民主党之分裂（德国特约通讯）/载于 1920 年 12 月 10 日、11 日《时事新报》。
43. 留德学界之近况/载于 1920 年 12 月 10 日《申报》。
44. 德国各党之党纲及其现状/载于 1920 年 12 月 17 日、18 日《申报》。
45. 德意志共产党演说大会记（德国特约通讯）/载于 1920 年 12 月 30 日《时事新报》。
46. 战后奥大利建国的小史（德国特约通讯）/载于 1921 年 1 月 4 日《时事新报》。
47. 俄波和议后之俄国/载于 1921 年 1 月 4 日《时事新报》。
48. 一年来俄国之形势与各国对俄关系/载于 1921 年 1 月 21 日《申报》。
49. 最近德国私运资本出境之大公案 由法律问题而牵入政治问题/载于 1921 年 2 月 3 日《申报》。
50. 德国对华之外交①关于派遣使节之意见/载于 1921 年 3 月 2 日《申报》。
51. 德国对华之外交②德国在华之学校政策/载于 1921 年 3 月 15 日《申报》。
52. 德国对华之外交③德国对华之新闻事业/载于 1921 年 3 月 31 日《申报》。
53. 德国对华之商业（甲）德国所需之华产/载于 1921 年 4 月 3 日～5 日《申报》。
54. 德国对华之商业（乙）德国对华之输出/载于 1921 年 4 月 7 日、8 日《申报》。
55. 德国对华之商业（丙）对华商业之计划/载于 1921 年 4 月 16 日、17 日《申报》。
56. 伦敦会议与德国/载于 1921 年 4 月 26 日《申报》。
57. 普鲁士邦会选举时之情形/载于 1921 年 4 月 30 日《申报》。
58. 关于研究中德文化之两团体/载于 1921 年 5 月 4 日、5 日《申报》。
59. 世界经济重心之转移/载于 1921 年 5 月 23 日《申报》。
60. 外国资本压迫之中欧/载于 1921 年 5 月 24 日《申报》。
61. 德意志之青年同盟/载于 1921 年 6 月 11 日、12 日《申报》。
62. 德国人之研究东方文化热/载于 1921 年 6 月 14 日、15 日、16 日《申报》。
63. 德国新政府组织之经过/载于 1921 年 7 月 14 日《申报》。
64. 最近欧洲国际间之风波/载于 1921 年 7 月 18 日《申报》。
65. 中德合约签字后之德国/载于 1921 年 7 月 25 日《申报》。
66. 履行最后通牒与左右两派/载于 1921 年 8 月 8 日《申报》。
67. 德国最近之财政/载于 1921 年 8 月 15 日《申报》。
68. 马克之过去与将来/载于 1921 年 8 月 22 日《申报》。
69. 奥国之新内阁及各党派/载于 1921 年 9 月 8 日《申报》。
70. 最近之德国银行界/载于 1921 年 9 月 16 日《申报》。
71. 多数社会民主党党纲之更改/载于 1921 年 9 月 18 日《申报》。

72. 德国右党之失败/载于1921年11月5日《申报》。
73. 德国在华外交官制之更改及使领人员之派遣/载于1921年11月5日《申报》。
74. 德国四党内阁之运动/载于1921年11月8日、10日《申报》。
75. 德国上西莱亚问题失败之由来/载于1921年11月17日《申报》。
76. 德国赔偿问题与英意两国经济/载于1921年11月29日《申报》。
77. 德国学者与世界哲学大会/载于1921年12月14日《申报》。
78. 战后全欧各国之金融（一）/载于1922年1月3日《申报》。
79. 战后全欧各国之金融（二）/载于1922年1月6日《申报》。
80. 战后全欧各国之金融（三）/载于1922年1月10日《申报》。
81. 最近马克暴涨暴跌之原因/载于1922年2月1日《申报》。
82. 德国之纸币/载于1922年2月7日《申报》。
83. 德国赔款问题与英法对德态度/载于1922年2月11日《申报》。
84. 一九二一年之德国/载于1922年2月19日《申报》。
85. 开恩斯会议之前因后果（一）/载于1922年2月25日《申报》。
86. 开恩斯会议之前因后果（二）/载于1922年2月26日《申报》。
87. 开恩斯会议之前因后果（三）/载于1922年3月6日《申报》。
88. 德国新税问题之解决/载于1922年3月24日《申报》。
89. 铁路罢工与官吏生活/载于1922年3月26日《申报》。
90. 开恩斯会议之前因后果（四）/载于1922年3月28日《申报》。
91. 俄法外交关系变迁之传闻（一）/载于1922年4月6日《申报》。
92. 俄法外交关系变迁之传闻（二）/载于1922年4月17日《申报》。
93. 最近马克跌价之三大原因/载于1922年4月5日《申报》。
94. 德国强迫公债之难购办法/载于1922年4月（日期不详）《申报》。
95. 德国对外输出之发展/载于1922年5月3日《申报》。
96. 德国赔款问题之新决定/载于1922年5月6日《申报》。
97. 德国报界之厄运/载于1922年5月12日《申报》。
98. 日诺瓦（热那亚）会议开幕前之所闻/载于1922年5月20日《申报》。
99. 日诺瓦会议时之意外风波（一）/载于1922年6月2日《申报》。
100. 日诺瓦会议时之意外风波（二）/载于1922年6月12日《申报》。
101. 日诺瓦会议之讨论形式及其会外文章/载于1922年6月14日《申报》。
102. 日诺瓦会议中之俄国问题（一）/载于1922年6月15日《申报》。
103. 日诺瓦会议中之俄国问题（二）/载于1922年6月16日《申报》。
104. 日诺瓦会议中之俄国问题（三）/载于1922年6月19日《申报》。
105. 日诺瓦会议中之俄国问题（四）/载于1922年6月26日《申报》。
106. 日诺瓦会议中之俄国问题（五）/载于1922年6月27日《申报》。



107. 日诺瓦会议中之俄国问题（六）/载于1922年6月28日《申报》。
108. 日诺瓦会议中之海牙会议问题/载于1922年7月1日《申报》。
109. 日诺瓦会议之回顾（一）/载于1922年7月7日《申报》。
110. 日诺瓦会议之回顾（二）/载于1922年7月9日《申报》。
111. 德国之新闻事业（一）/载于1922年7月23日《申报》。
112. 德国之新闻事业（二）/载于1922年7月24日《申报》。
113. 德国之新闻事业（三）/载于1922年7月25日《申报》。
114. 德国之新闻事业（四）/载于1922年7月26日《申报》。
115. 上西莱亚之实行分割/载于1922年8月11日《申报》。
116. 德国之恐怖时代（一）/载于1922年8月12日《申报》。
117. 德国之恐怖时代（二）/载于1922年8月13日《申报》。
118. 德国之恐怖时代（三）/载于1922年8月14日《申报》。
119. 德国之恐怖时代（四）/载于1922年8月18日《申报》。
120. 德意志之中等教育（一）/载于1922年9月6日《申报》。
121. 德意志之中等教育（二）/载于1922年9月8日《申报》。
122. 德意志之中等教育（三）/载于1922年9月9日《申报》。
123. 德意志之中等教育（四）/载于1922年9月10日《申报》。
124. 德意志之中等教育（五）/载于1922年9月11日《申报》。
125. 德意志之中等教育（六）/载于1922年9月12日《申报》。
126. 德意志之中等教育（七）/载于1922年9月13日《申报》。
127. 德国最近之生活（一）/载于1922年9月16日《申报》。
128. 德国最近之生活（二）/载于1922年9月17日《申报》。
129. 德国之离婚问题/载于1922年9月18日《申报》。
130. 国际青年团（一）/载于1922年10月1日《申报》。
131. 国际青年团（二）/载于1922年10月2日《申报》。
132. 国际青年团（三）/载于1922年10月4日《申报》。
133. 来德留学者注意/载于1922年10月5日《申报》。
134. 苟廷根大学之特色/载于1922年10月6日《申报》。
135. 留德学界之组织/载于1922年10月11日《申报》。
136. 中国美术博览会/载于1922年10月16日《申报》。
137. 柏林人之道德问题/载于1922年10月17日《申报》。
138. 柏林房荒问题/载于1922年10月18日《申报》。
139. 最近柏林市上之恐慌现象/载于1922年10月19日《申报》。
140. 德国报界前途之危机/载于1922年10月20日《申报》。
141. 最近德国之粮食恐慌问题/载于1922年10月30日《申报》。

142.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一）荷兰/载于 1922 年 11 月 1 日《申报》。
143.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波兰/载于 1922 年 11 月 2 日《申报》。
144.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三）里特伦/载于 1922 年 11 月 3 日《申报》。
145.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四）爱斯堤兰/载于 1922 年 11 月 12 日《申报》。
146.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五）捷克斯拉夫/载于 1922 年 11 月 13 日《申报》。
147.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六）希腊/载于 1922 年 11 月 15 日《申报》。
148.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七）丹麦/载于 1922 年 11 月 17 日《申报》。
149.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八）瑞典/载于 1922 年 11 月 18 日《申报》。
150.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南斯拉夫/载于 1922 年 11 月 27 日《申报》。
151.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一）瑞士/载于《申报》1922 年 12 月 3 日。
152.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二）西班牙/载于《申报》1922 年 12 月 7 日。
153.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四）奥大利/载于 1922 年 12 月 16 日《申报》。
154.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五）意大利/载于 1922 年 12 月 19 日《申报》。
155.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六）俄罗斯/载于 1922 年 12 月 21 日、24 日、27 日、29 日《申报》。
156.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三）罗马尼亚/载于 1922 年 12 月 21 日《申报》。
157.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七）唐车/载于 1923 年 1 月 1 日《申报》。
158.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八）比利时/载于 1923 年 1 月 6 日《申报》。
159.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九）法兰西（甲）财政问题/载于 1923 年 1 月 12 日《申报》。
160.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九）法兰西（乙）商业情况/载于 1923 年 1 月 14 日《申报》。
161.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十九）法兰西（丙）农工状况/载于 1923 年 1 月 16 日《申报》。
162.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立陶宛/载于 1923 年 1 月 19 日《申报》。
163.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一）芬兰/载于 1923 年 1 月 23 日《申报》。
164.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二）土耳其/载于 1923 年 1 月 27 日《申报》。
165.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三）挪威/载于 1923 年 1 月 29 日《申报》。
166.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四）德意志（甲）商业情况/载于 1923 年 2 月 1 日《申报》。
167.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四）德意志（乙）农业情况/载于 1923 年 2 月 6 日《申报》。
168.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四）德意志（丙）工业情况/载于 1923 年 2 月 8 日《申报》。
169.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四）德意志（丁）财政问题/载于 1923 年 2 月 10 日《申报》。
170.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五）英吉利（甲）金融现象/载于 1923 年 2 月 22 日《申报》。
171.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五）英吉利（乙）商业情形/载于 1923 年 2 月 25 日《申报》。
172.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五）英吉利（丙）工业状况/载于 1923 年 2 月 26 日《申报》。
173.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六）勃加利/载于 1923 年 3 月 2 日《申报》。
174.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七）卢森堡/载于 1923 年 3 月 14 日《申报》。
175.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八）乌克兰/载于 1923 年 3 月 28 日《申报》。
176.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二十九）葡萄牙/载于 1923 年 3 月 28 日《申报》。

177.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三十）亚尔巴尼亚/载于1923年3月28日《申报》。
178.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三十一）全欧各国财政情况/载于1923年4月3日《申报》。
179.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三十二）全欧债务概观/载于1923年4月9日《申报》。
180.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三十三）全欧金融概观/载于1923年4月14日《申报》。
181.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三十四）全欧商业概观/载于1923年4月25日《申报》。
182.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三十五）全欧农业概观/载于1923年4月30日《申报》。
183. 欧洲各国经济状况（三十六）全欧工业概观/载于1923年5月12日、13日《申报》。
184. 德意志之青年运动（一）青年运动之派别/载于1923年5月24日《申报》。
185. 德意志之青年运动（二）国家主义之青年运动/载于1923年6月2日《申报》。
186. 德意志之青年运动（三）无产阶级之青年运动（上）/载于1923年6月4日《申报》。
187. 德意志之青年运动（四）无产阶级之青年运动（中）/载于1923年6月8日《申报》。
188. 德意志之青年运动（五）无产阶级之青年运动（下）/载于1923年6月15日《申报》。
189. 德意志之青年运动（六）民主主义之青年运动/载于1923年6月19日《申报》。
190. 德意志之青年运动（七）各种宗教之青年运动/载于1923年6月20日《申报》。
191. 德意志之青年运动（八）自由青年之青年运动（上）/载于1923年6月26日《申报》。
192. 德意志之青年运动（九）自由青年之青年运动（中）/载于1923年7月3日《申报》。
193. 德意志之青年运动（十）自由青年之青年运动（下）/载于1923年7月5日、16日《申报》。
194. 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一）/载于1923年7月13日、14日《申报》。
195. 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二）/载于1923年7月17日《申报》。
196. 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三）来比锡赛会之性质及其内容/载于1923年7月22日、23日《申报》。
197. 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四）来比锡赛会之外国陈列/载于1923年7月24日《申报》。
198. 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五）来比锡赛会之德国陈列/载于1923年7月25日《申报》。
199. 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六）德意志工厂股份公司/载于1923年7月26日《申报》。
200. 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七）克虏伯场/载于1923年7月27日《申报》。
201. 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八）德兰斯登之工业学校/载于1923年7月28日《申报》。
202. 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九）德兰斯登之美术设备/载于1923年7月31日《申报》。
203. 柏林—来比锡—德兰斯登—柏林（十）自由战争之历史纪念/载于1923年8月14日《申报》。
204. 战后世界商业之趋势（一）美国/载于1923年8月16日、18日《申报》。
205. 战后世界商业之趋势（二）英国/载于1923年8月21日《申报》。
206. 战后世界商业之趋势（三）法国、德国/载于1923年8月24日《申报》。
207. 世界航务之现状（一）汽车帆船之消长/载于1923年9月9日、10月4日《申报》。

208. **世界农产之近况（一）各州麦额之增减**/载于 1923 年 11 月 1 日《申报》。
209. **世界农产之近况（二）各国农产之调剂**/载于 1923 年 11 月 4 日《申报》。
210. **世界人口问题（一）战前战后比较**/载于 1923 年 11 月 9 日《申报》。
211. **世界人口问题（二）人口密度与移民趋势**/载于 1923 年 11 月 13 日《申报》。
212. **国人能力破产之可惊**/载于 1925 年 5 月 16 日《醒狮》。
213. **国际三大经济新战线**/载于 1928 年 10 月（日期不详）《晨报》。
214. **欧洲农业革命潮流**/载于 1928 年（日期不详）《晨报》。
215. **关于东铁问题之欧洲舆论**/载于 1929 年 12 月 26 日《晨报》。
216. **伦敦海军会议之成绩**/载于 1930 年 1 月（日期不详）《晨报》。
217. **德国金融事业之今昔观**/载于 1930 年 6 月 26 日《晨报》。
218. **爱尔池摆改被刺后左派之反动**/载于《申报》，刊载日期不详。
219. **德国右派之虚无党手段**/载于《申报》，刊载日期不详。
220. **德国工人思想之变迁**/载于《时事新报》，刊载日期不详。
221. **德国劳工各种保险组织**/载于《时事新报》，刊载日期不详。
222. **德国银行业集中运动**/载于《晨报》，刊载日期不详。
223. **德人对各国侨民的情感**/载于《时事新报》，刊载日期不详。
224. **德意志的工人大学**/载于《时事新报》，刊载日期不详。
225. **德意志教育之近况**/载于《时事新报》，刊载日期不详。
226. **德意志全国皆工的新教育制度**/载于《时事新报》，刊载日期不详。
227. **发明相对论的安斯坦将游中美两国**/载于《时事新报》，刊载日期不详。
228. **十年来目击之德政潮**/载于《晨报》，刊载日期不详。
229. **世界二次大战之预测**/载于《时事新报》，刊载日期不详。

（五）其他类型出版物载中文文章

1.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载于《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刊载日期不详。
2. **“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载于《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刊载日期不详。
3. **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载于《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刊载日期不详。

（六）外文文献

1. **Deutsche Kulturpolitik in China.** In *Frankfurter Zeitung*. 1921，7，14.【中文译名：德国对华文化政策/载于德文版《法兰克福日报》1921 年 7 月 14 日。】
2. **Über den Einfluss im Auslande vorgebildeten Chinesen auf di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China.** In *Kultur*. 1922，4.【中文译名：论中国海外留学生对中国政局发展的影响/王光祈自注此文发表于 1921 年。据王勇赴德查考，此文载于德国德文版《文化》1922 年第 4 期，1921 年应为王光祈撰写该文的时间。】

3. **Die Statistik des chinesischen Ackerlandes im Laufe der Jahrtausende.** In *Sinica*，1928. 【中文译名：千年间中国耕地的统计/载于法兰克福德文版《汉学》1928年第1期。此系王光祈据1927年12月15日《经济半月刊》刊载中文文章《历代田亩统计》翻译的德文文章。】

（七）书　信

1. **致云生**/1919年3月载于《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1919年第1期。
2. **复赵世炯（子章）**/1919年3月载于《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1919年第1期。
3. **讨论小组织问题——致左舜生**/1919年7月5日载于《时事新报》。
4. **讨论小组织问题——与左舜生**/1919年8月载于《少年中国》1919年总第1卷第2期。
5. **致黄霭女士书**/1919年8月载于《少年中国》1919年总第1卷第2期。
6. **致泗英兄**/1919年8月载于《少年中国》1919年总第1卷第2期。
7. **致冰先生书**/1919年8月载于《少年中国》1919年总第1卷第2期。
8. **致裴山先生**/1919年8月载于《少年中国》1919年总第1卷第2期。
9. **致夏汝诚先生书**/1919年8月载于《少年中国》1919年总第1卷第2期。
10. **致李贵诚先生书**/1919年8月载于《少年中国》1919年总第1卷第2期。
11. **致黄仲苏先生书**/1919年8月载于《少年中国》1919年总第1卷第2期。
12. **致时珍、白华书**/1919年9月载于《少年中国》1919年总第1卷第3期。
13. **复M. R先生信**/1919年10月载于《少年中国》1919年总第1卷第4期。
14. **致君左**/1919年12月载于《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1919年第4期。
15. **致幼椿、太玄**/1919年12月载于《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1919年第4期。
16. **致慕韩信**/1919年12月载于《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1919年第4期。
17. **复A. Y. G女士信**/1919年12月载于《少年中国》1919年总第1卷第6期。
18. **致太玄、幼椿、慕韩、调元诸兄**/1919年12月载于《少年中国》1919年总第1卷第6期。
19. **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1920年2月载于《少年中国》1920年总第1卷第8期。
20. **致“少年中国学会”诸兄**/1920年7月载于《少年中国》1920年总第2卷第1期。
21. **致幼椿、太玄、劼人、鲁之诸兄**/1920年8月载于《少年中国》1920年总第2卷第2期。
22. **致慕韩、少襄、哲生诸兄**/1920年8月载于《少年中国》1920年总第2卷第2期。
23. **致少年中国学会诸兄**/1920年10月载于《少年中国》1920年总第2卷第4期。
24. **致代英兄**/1921年5月载于《少年中国》1921年总第2卷第11期。
25. **致代英兄**/1921年6月载于《少年中国》1921年总第2卷第12期。
26. **致舜生兄**/1923年4月载于《少年中国》1923年总第4卷第2期。
27. **致少年中国学会诸兄同志书**/1923年4月载于《少年中国》1923年总第4卷第2期。
28. **至少年中国学会苏州会议诸同志书**/1924年5月载于《少年中国》1924年总第4卷第12期。
29. **致邵循正先生书**/载于《大公报》1932年（写于1932年8月31日）。
30. **关于中国音乐的一封信——致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1934年8月载于《音乐教育》

1934年总第2卷第8期。

31. **致柏林中国留德学会书**/载于《王光祈旅德存稿》下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5月版。

32. **复博罗律师函**/载于《王光祈旅德存稿》下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5月版。

33. **致少年中国学会同志书（对于会事进行的意见书）**/载于《王光祈旅德存稿》下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5月版。

34. **致魏时珍**/载于《王光祈先生纪念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36年12月（写于1934年2月19日）。

35. **致魏时珍书**/载于《王光祈纪念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36年12月（写于1935年7月29日）。

36. **致沈怡**/载于《王光祈纪念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36年12月（写于1936年2月12日）。

（八）诗　词

[**说明**]：以下所列王光祈诗词共计28首，以“旧体诗”、“新诗”、“歌词”为序予以进一步类分，各类均以诗词写作完稿的时间为序加以排列。

1. **旧体诗**(19首)

（1）**寄内**（一首）/作于1914年，首载于《少年中国》1921年总第2卷第11期；1992年载于朱舟编《王光祈诗词辑览》。

（2）**乙卯秋节余二十三初度与黄廷锐登陶然亭感而赋此**（二首）/作于1915年，1987年首载于韩立文、毕兴编著《王光祈年谱》，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年载于朱舟编《王光祈诗词辑览》。

（3）**暮春送赵三之江南**（二首）/作于1915年，1987年首载于《王光祈年谱》，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年载于朱舟编《王光祈诗词辑览》。

（4）**丁巳七夕同彭云生周太玄在陶然亭寓所感赋**（一首）/作于1917年，首载于1936年4月（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1992年载于朱舟编《王光祈诗词辑览》。

（5）**七月七日陶然亭晚眺**（一首）/作于1917年，首载于1936年4月（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1992年载于朱舟编《王光祈诗词辑览》。

（6）**忏悔**（四首）/作于1920年，首载于《少年中国》1920年总第2卷第5期；1992年载于朱舟编《王光祈诗词辑览》。

（7）**无题**（一首）/作于1920年，首载于1992年9月朱舟编《王光祈诗词辑览》。

（8）**无题**（一首）/作于1924年，首载于《醒狮》1924年11月1日第4号；1992年载于朱舟编《王光祈诗词辑览》。

（9）**夔州杂志**（六首）/作于1924年，首载于1936年4月（成都）《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1992年载于朱舟编《王光祈诗词辑览》。

2. **新诗**(2首)

（1）**哭眉生**（一首，有序）/作于1919年，首载于《少年中国》1919年总第1卷第2期；1992年载于朱舟编《王光祈诗词辑览》。

(2) **去国辞**（一首）/作于1920年，首载于《少年中国》1920年总第1卷第11期；1992年载于朱舟编《王光祈诗词辑览》。

3. **歌词**(7首)

(1) **少年中国**/作于1920年，1992年首载于朱舟编《王光祈诗词辑览》。

(2) **少年中国歌**/作于1925年，1927年载于《中华教育界》1927年总第16卷第12期。首载于王光祈《各国国歌述评》，中华书局1926年版。该词由王光祈亲自谱曲，并存有曲谱（见《各国国歌评述》）。1992年载于朱舟编《王光祈诗词辑览》

(3) **黄河**/作于1926年，首载于《中华教育界》1927年总第16卷第8期，该词由王光祈编曲（见王光祈《音乐在教育上之价值》一文）。1992年载于朱舟编《王光祈诗词辑览》。

(4) **平沙落雁**/作于1926年，首载于《中华教育界》1927年总第16卷第8期，该词由王光祈编曲（见王光祈《音乐在教育上之价值》一文）。1992年载于朱舟编《王光祈诗词辑览》。

(5) **种豆**/1992年载于朱舟编《王光祈诗词辑览》。此首歌词据推测于1925年至1926年间（具体时间不详）所作，且为王光祈亲自谱曲（见1928年3月《中华教育界》第17卷第3期）。

(6) **家书**/1992年载于朱舟编《王光祈诗词辑览》。此首歌词据推测于1925年至1926年间（具体时间不详）所作，且为王光祈亲自谱曲，现存有曲谱（见1928年3月《中华教育界》第17卷第3期）。

(7) **田家四季歌**/1992年载于朱舟编《王光祈诗词辑览》。此首歌词据推测于1925年至1926年间（具体时间不详）所作，且为王光祈亲自谱曲，现存有曲谱（见1928年3月《中华教育界》第17卷第3期）。

三　有待进一步考证的文献

[**说明**]：以下所列为仅有一定历史记载但始终未能定论或被确认的王光祈文献。其中，有些文献仅有模糊的时间线索，但无明确的文献出处，查无实据；有些虽注有写作、刊载时间或文献出处，但却因语焉不详、疑点重重而查无实证；有些经查考后与存目所记载的文献信息有一定的出入。基于此，本目录恪守学术研究应有的严谨态度，特设置“有待进一步考证的文献”这样一个大类，旨在强调“王光祈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一些长期被误传、遗漏或未知的王光祈文献尚有待我们去深入挖掘和考证。

1.《**小学唱歌**》/本目录“音乐类文献”之“期刊载中文文章”中已收录有王光祈发表于《中华教育界》1928年总第17卷第3期的《小学唱歌新教材》一文。据王勇新近查考，此文系《中华教育界》推介王光祈所编《小学唱歌》教材的短文，并未肯定是王光祈所作。同时认为王光祈当另有一部独立存在的《小学教材》有待查访（见王勇《一位新文化斗士走上音乐学之路的“足迹”考析——王光祈留德生涯及西文著述研究》)。此推测是否属实，有待进一步考证。

2.《**中国乐器常识**》/据中华书局有关出版物和《肖友梅文集》有关文献记载，该书系中华书局（上海）拟于1936年出版印刷的王光祈专著。据王勇新近查考，此书尚无实证，疑有误（见王勇《一位新文化斗士走上音乐学之路的“足迹”考析——王光祈留德生涯及西文著述研究》)。此书是否存在，有待进一步考证。

3.《**西洋歌剧指南**》/据中华书局有关出版物记载，该书系中华书局（上海）拟于1936年出版印刷的王光祈专著。迄今为止，尚无人对其进行查考，编者亦无从查实，后有无出版不详。此书是否存在，有待进一步考证。

4.《**王光祈音乐论文集**》（**第一集**）/据中华书局有关出版物记载，该书系中华书局（上海）拟于1936年出版印刷的王光祈音乐论文集。迄今为止，尚无人对其进行查考，编者亦无从查实，后有无出版不详。此书是否存在，有待进一步考证。

5. **Chinese Music.** In *Encyclopedia Britanmca*. 1929/【中文译名：中国音乐/载于英文版《大英百科全书》，1929年版。鉴于此文注有明确的文献出处和刊载日期，故已作为存目将其列入本目录“音乐类文献”之“外文文献”中。据王勇新近查考，此文尚无佐证，疑有误（见王勇《一位新文化斗士走上音乐学之路的“足迹”考析——王光祈留德生涯及西文著述研究》)。此书是否存在，有待进一步考证。】

6. **Das Chinesische Tonsystem.** 1925.【中文译名：论中国的音律体系，1925年。此文在“音乐类文献”的“外文文献”所列中虽注有刊载时间，但无文献出处。此文是否刊用，有待进一步考证。】

7. **Die Overtüre der Oper Armide'von Lully.** 1928.【中文译名：吕利歌剧《阿尔美德》序曲的分析研究/据王光祈自注，此为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研究报告书，1928年，仅存目。据王勇新近赴德考证，此系王光祈在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就读时的学期论文，未刊载（见王勇《一位新文化斗士走上音乐学之路的“足迹”考析——王光祈留德生涯及西文著述研究》)。此文是否刊用，有待进一步考证。】

8. **A. F. J. Thibauts Ueber Reinheit der Tonkunst und ihre Bedeutung in der musikalischen Renaissance—Bewegung des 19. Jahrhunderts.** 1928.【中文译名：论蒂博兹《声音艺术的纯洁性》一书及其对十九世纪音乐复兴运动的意义/据王光祈自注，此为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研究报告书，1928年，仅存目。据王勇新近赴德考证，此系王光祈在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就读时的学期论文，未刊载（见王勇《一位新文化斗士走上音乐学之路的“足迹”考析——王光祈留德生涯及西文著述研究》)。此文是否刊用，有待进一步考证。】

9. **Die deutschen Musiktraktate des Martin Agricola.** 1929.【中文译名：马丁·阿格里柯拉关于德国

音乐评论的研究/据王光祈自注，此为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研究报告书，1929 年，仅存目。据王勇新近赴德考证，此系王光祈在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就读时的学期论文，未刊载（见王勇《一位新文化斗士走上音乐学之路的“足迹”考析——王光祈留德生涯及西文著述研究》)。此文是否刊用，有待进一步考证。】

10. **J. B. Cartier: L'Art du violon.** 1929.【中文译名：评 J. B. 卡蒂埃的《小提琴艺术》一书/据王光祈自注，此为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研究报告书，1929 年，仅存目。据王勇新近赴德考证，此系王光祈在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就读时的学期论文，未刊载（见王勇《一位新文化斗士走上音乐学之路的“足迹”考析——王光祈留德生涯及西文著述研究》)。此文是否刊用，有待进一步考证。】

11. **Die deutsche Oper (Vormozartsche Zeit) von Ludwig Schiedermair.** 1930.【中文译名：评路德维希·席德迈尔的《德国歌剧》（前莫扎特时代）/据王光祈自注，此为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研究报告书，1930 年，仅存目。据王勇赴德考证，此系王光祈在柏林大学音乐史学院就读时的学期论文，未刊载（见王勇《一位新文化斗士走上音乐学之路的“足迹”考析——王光祈留德生涯及西文著述研究》)。此文是否刊用，有待进一步考证。】

附录三

(1924—2009)
王光祈研究文献综目

胡扬吉　编

编者按：为进一步拓宽王光祈研究的学术视野，向中外研究者全面提供和分类梳理相关研究文献的检索线索，笔者自1991年以来，先后编辑了《(1981—1991) 近十年王光祈研究资料知见录》、《王光祈著述及研究资料综目》、《王光祈研究资料目录（增补部分）》等一系列专题目录，旨在为大家适时提供尽可能全和尽可能新的参考资料线索，指引文献检索的路径，给相关人员的相关研究工作带来一点便利。

本综目在上述专题目录的基础上，不仅对内容进行了最大限度的补充，同时也在结构和编排方面作了适当的调整，并将文献资料收录的时间范围扩展至2009年，从而再一次保证了“王光祈研究”专题目录的“尽可能新”和“尽可能全”。这也是本目录可以聊以自慰之处。限于时间、精力和文献资料的收集范围，本目录仍难免有缺憾和不尽周全的地方，诚祈各位专家学者斧正、赐教。

目 录

一 报刊类研究文献

[**说明**]：下列文献仅限于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中文报刊刊载的有关文章。所列文献以作者姓氏的汉语拼音为序。

B

1. **毕 兴、韩立文：王光祈生平大事及主要著述年表**/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2. **毕 兴、韩立文：王光祈生平大事及主要著述年表（续一）**/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3. **毕 兴、韩立文：王光祈生平大事及主要著述年表（续二）**/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
4. **毕 兴、韩立文：王光祈生平大事及主要著述年表（续三）**/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5. **毕 兴、黎 文：王光祈和成都的五四运动**/载于《四川日报》1984年5月5日。

C

6. 蔡晓燕：从社会活动家到音乐家的王光祈/载于《民国春秋》2000 年第 6 期。
7. 蔡元培：王光祈先生追悼会致词/载于《新民报》1936 年 3 月 15 日。
8. 陈达波、李　姝：王光祈与民族音乐的发展/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 期。
9. 陈锦忠：王光祈先生二三事/载于台湾《中央日报》1968 年 4 月 10 日。
10. 陈聆群：新见王光祈的音乐论文/载于《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84 年第 1 期。
11. 陈其射：深刻的思想启示——在王光祈音乐观下的后学反思/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 期。
12. 陈四海：王光祈——我国最早一位获得音乐博士的人/载于《天津歌声》1985 年第 11 期。
13. 陈应时："变"和"闰"是清角和清羽吗？——对王光祈"燕调"理论的质疑/载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2 第 2 期。
14. 陈　莹：王光祈民族性国乐观研究/载于《音乐天地》2007 年第 11 期。
15. 陈　永：《王光祈留德生涯与西文著述研究》述评/载于《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7 年第 3 期。
16. 川　子：三卷本《王光祈文集》着手缀辑　《王光祈研究论文集》六月出书/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5 年第 2 期。
17. 春　明：王光祈的隐痛/载于台湾《四川文献》1974 年第 146 期。
18. 崔小玲：试析王光祈论"声韵音乐"——读《论中国古典歌剧》札记/载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9 年第 2 期。
19. 崔宗复：王光祈的生平和著作/载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 1 期。
20. 崔宗复：王光祈先生的苦学与爱国主义精神/载于《四川地方志通讯》1985 年第 2 期。

D

21. 达　威：直行终有路　何必计枯荣——读《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载于《人民音乐》1995 年第 1 期。

F

22. 樊祖荫：王光祈的"国乐"观对今天的启示/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93 年第 1 期。
23. 方惠生 、朱　舟：王光祈为什么要改学音乐/载于《人民音乐》1984 年第 9 期。
24. 方惠生：记著名音乐学家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载于香港《联合音乐》1985 年第 3 期。
25. 冯光钰：王光祈的中西音乐文化观/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92 年第 4 期。

26. 冯光钰：礼乐兴邦 复兴中华——纪念王光祈先生诞辰 110 周年/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03 年第 4 期。

27. 冯 雷、肖 阳：行万里路，读中外书——学习《王光祈留德生涯与西文著述研究》课程心得笔记/载于《艺术研究》2008 第 1 期。

28. 冯文慈：王光祈的音乐史学方法和学风——为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而作/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4 年第 4 期。

29. 冯文慈、俞玉滋：我国现代音乐学的奠基人王光祈/载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2 年第 4 期。

30. 傅庆裕：关于王光祈《翻译琴谱之研究》的研究/载于《中国音乐》（中国音乐学院学报）1985 年第 3 期。

31. 傅汀汀：王光祈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贡献述评/载于《黄河之声》2002 年第 4 期。

32. 傅彦长：关于王光祈先生/载于《立报》1936 年 2 月 29 日。

G

33. 高元江：毛泽东惦记中的王光祈/载于《四川党史》2003 年第 2 期。

34. 宫宏宇：王光祈初到德国/载于《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2 年第 3 期。

35. 宫宏宇：王光祈与德国汉学界/载于《中国音乐学》2005 年第 2 期。

36. 关继文、秦 蓉：王光祈：我国近现代多种音乐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世纪之初王光祈音乐思想研究的一个侧面/载于《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 年第 7 期。

37. 管建华：试评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学观点/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4 年第 1 期。

38. 管建华：王光祈的《声音心理学》述略/载于《乐苑》1984 年第 2 期。

39. 郭 莹：王光祈“礼乐复兴”思想及其成因初探/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01 年第 4 期。

H

40. 韩立文 、毕 兴：音乐学家王光祈生平事略/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3 年第 1 期。

41. 韩立文、毕 兴：试评王光祈关于音乐本质和社会功能的论述/载于《音乐研究》1984 年第 4 期。

42. 韩立文、毕 兴：五四前后的社会活动家王光祈/载于《成都文史资料》1984 年第 6 辑。

43. 韩立文、毕 兴：王光祈生平综述/载于《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86 年第 2 期。

44. 韩三洲：毛泽东不忘王光祈/载于《海内与海外》2008 年第 10 期。

45. 何昌林：王光祈先生释“变”与“闰”/载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5 年第 3 期。

46. 河山星：王光祈儿歌九首评析/载于《人民音乐》1985 年第 11 期。
47. 侯德础：王光祈史学著译论略/载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 1 期。
48. 侯　敏：宗白华与王光祈的交谊与共识/载于《文史杂志》2004 年第 6 期。
49. 胡企平：释宫商角徵羽五声阶名的由来/载于《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96 年第 4 期。
50. 胡扬吉：王光祈研究资料目录（增补部分）/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03 年第 1 期。
51. 胡郁青、丁晓红：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王光祈音乐思想探析/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01 年第 4 期。
52. 黄民文：王光祈早年思想发展探析/载于《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4 期。
53. 黄翔鹏：音乐学在新学潮流中的颠簸——王光祈先生诞生百周年随想录/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93 年第 1 期。

J

54. 蒋一民：宗白华先生谈王光祈/载于《音乐天地》1985 年第 1 期。

K

55. 康少杰：关于王光祈“燕调”的探讨/载于《音乐学习与研究》（天津音乐学院学报）1985 年第 4 期。
56. 快　人：王光祈留德治乐/载于《音乐季刊》1925 年第 5 期。

L

57. 黎永泰、刘　平：王光祈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探讨/载于《科学社会主义》1985 年第 10 期。
58. 黎永泰：王光祈/载于《少年文史报》1985 年 2 月 18 日。
59. 李安和：近代中国音乐学先驱者——王光祈/载于台湾《大学杂志》1977 年第 108 期。
60. 李安和：近代中国音乐学先驱者——王光祈/载于台湾《全音音乐文摘》1983 年第 10 期。
61. 李　嘉、刘潇敏：王光祈音乐救国思想渊源探析/载于《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1 期。
62. 李岚清：中国近现代音乐学的开拓者——王光祈/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08 年第 2 期。
63. 李世军：试论王光祈民族文化新音乐思想/载于《中国音乐》（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03 年第 1 期。
64. 李　岩：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四川温江王光祈社会活动暨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03 年第 1 期。
65. 李　岩：王光祈书、文、事考/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03 年第 3 期。

66. 李业道：纪念王光祈先生——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闭幕式发言/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4 年第 4 期。

67. 李映发：王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载于《四川文物》1993 年第 1 期。

68. 李永春：论王光祈的“少年中国”理想/载于《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3 期。

69. 李炤人：五四追忆王光祈/载于《四川日报》1950 年 5 月 4 日。

70. 李忠勇：纪念真诚爱国、刻苦治学的王光祈先生——在王光祈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92 年第 4 期。

71. 廖辅叔：略谈王光祈先生/载于《快乐的小队》1951 年（刊载日期不详）。

72. 廖辅叔：记王光祈先生/载于《音乐研究》1980 年第 3 期。

73. 廖辅叔：从诗人到音乐家——纪念王光祈先生诞生九十周年/载于《群众音乐》1982 年第 10 期。

74. 廖辅叔：独上昆仑发巨声——王光祈诗如其人/载于《人民音乐》1983 年第 6 期。

75. 廖辅叔：重印王光祈《中国音乐史》赘言/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5 年第 4 期。

76. 林成西、许蓉生：王光祈的空想社会主义及其实践/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03 年第 3 期。

77. 林大雄：王光祈的“新儒家”音乐思想初探/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93 年第 1 期。

78. 林睿晶：王光祈对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贡献/载于《龙岩学院学报》2008 年第 2 期。

79. 刘仁静、王　川：怀念王光祈先生/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4 年第 3 期。

80. 刘再生：王光祈致李华萱书信五则新浮现——李华萱《音乐奇零》一书初探/载于《音乐研究》2007 第 4 期。

81. 陆曼炎：一个艰苦的学生——王光祈/载于香港《大风》总第 66 期（时间不详）。

82. 罗天全：论王光祈在中国音乐史上的主要成就/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03 年第 1 期。

83. 吕　骥：王光祈在音乐学上的贡献/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4 年第 4 期。

84. 吕　骥：纪念王光祈先生百年诞辰/载于《音乐研究》1992 年第 4 期。

M

85. 马宣伟：艰苦奋斗一生的王光祈/载于《重庆音讯》1984 年第 7 期。

86. 马宣伟：毛泽东与王光祈的友谊/载于《文史杂志》2000 年第 1 期。

87. 茅　原：从王光祈论戏曲音乐谈到他的美学观/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92 年第 4 期。

88. 梅子乾、文　枢：音乐博士王光祈/载于《龙门阵》1982 年第 2 辑。

89. 明　言：作为新音乐批评家的王光祈——纪念王光祈先生诞辰 110 周年/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02 年第 1 期。

P

90. 潘　娜：试论王光祈的国乐思想/载于《中国音乐》（中国音乐学院学报）2004 年第 3 期。
91. 彭　丽：王光祈、青主发展“国乐”观之探微/载于《齐鲁艺苑》（山东艺术学院学报）1991 年第 3 期。

R

92. 任秀蕾：浅谈王光祈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贡献/载于《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4 年第 5 期。

S

93. 沈有鼎：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载于《清华学报》1936 年第 1 期。
94. 司丽静、李　荣：王光祈爱国思想/载于《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1 期。
95. 宋祥瑞：王光祈学术阐微/载于《中国音乐学》1995 年第 3 期。

T

96. 谭晓钟：王光祈五四时期的文化选择述评/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 期。
97. 谭晓钟：论王光祈 20 世纪初的文化取向/载于《文史杂志》2006 年第 6 期。

W

98. 王安华：中国第一个音乐理论博士——王光祈/载于《四川日报》1983 年 3 月 26 日。
99. 王　成：我国现代音乐理论家——王光祈/载于《儿童音乐》1982 年 2 期。
100. 王洪生：王光祈《声音心理学》解析/载于《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2 年第 1 期。
101. 王鸿飞：我国第一位探索音乐学的理论家——王光祈/载于《北方音乐》1991 年第 3 期。
102. 王孟谦：音乐界名人亲赐手笔 缅怀景仰王光祈博士/载于《吉林艺术学院学报》1990 年第 2 期。
103. 王　勇：王光祈与《SINICA》/载于《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4 年第 4 期。
104. 王　勇：还历史一段真相——关于王光祈留德原因的重新考证/载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 年第 2 期。
105. 王云飞：国乐的开创者王光祈/载于《文史月刊》2009 年第 3 期。
106. 蔚　兰：毛泽东惦记中的王光祈/载于《党史博采》2007 年第 3 期。
107. 魏时珍：忆王光祈/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4 年第 3 期。

108. 魏雪梅：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在蓉举行/载于《音乐世界》1984 年第 8 期。

109. 文守江：王光祈先生之生平及著作/载于台湾《四川文献》1966 年第 50 期。

110. 文　治：王光祈诞辰 100 周年纪念会及学术交流综述/载于《音乐研究》1992 年第 4 期。

111. 文　治：他的精神和思想仍激励、启迪着我们——王光祈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及学术交流综述/载于《人民音乐》1993 年第 2 期。

X

112. 修海林：贯中西志举华音 治乐学黄钟流韵——为中国现代音乐学奠基人王光祈音乐论集的出版而作/载于《国际音乐交流》1994 年第 1 期。

113. 徐　毅：论王光祈音乐思想中的民族性/载于《齐鲁艺苑》（山东艺术学院学报）1987 年第 19 期。

114. 许常惠：中国现代音乐的先烈学者——王光祈/载于台湾《东方杂志》1967 年总第 1 卷第 1 期。

115. 胥端甫：艰苦学人王光祈/载于台湾《畅流》1961 年总第 24 卷第 8 期。

116. 许康健：前行终有路 何必计枯荣——重读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载于《人民音乐》2006 年第 9 期。

Y

117. 杨　超：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幕词/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4 年第 3 期。

118. 杨永贤：音乐学家王光祈评述/载于《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2 年第 3 期。

119. 叶　隽：《留德学人与德国》系列随笔——王光祈/载于《德语学习》2000 年第 4 期。

120. 叶　语：学习王光祈的音乐思想/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93 年第 1 期。

121. 佚　名：王光祈先生略历/载于《音乐教育》1936 年第 4 卷第 5 期。

122. 佚　名：王光祈先生之哀耗/载于《时事新报》1936 年 2 月 18 日。

123. 佚　名：王光祈墓碑迁移川音校园——明年举行“王光祈学术讨论会”/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3 年第 1 期。

124. 佚　名：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剪影/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4 年第 3 期。

125. 佚　名：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将在成都召开/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4 年第 2 期。

126. 佚　名：著名音乐学家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载于《人民音乐》1984 年第 8 期。

127. 佚　名：著名音乐学家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载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4 年第 3 期。

128. 佚　名：音乐学家王光祈逝世四十九周年 温江县举行纪念活动/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

乐学院学报）1985 年第 1 期。

129. 佚　名：纪念王光祈先生诞辰 110 周年暨首届光祈音乐节贺电、贺信/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03 年第 1 期。

130. 余三乐：恽代英与王光祈——五四时代同始异终的典型/载于《北京党史》1998 年第 4 期。

131. 俞人豪：王光祈与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6 年第 3 期。

132. 俞玉滋：王光祈《千百年间中国与西方的音乐交流》述评/载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4 年第 3 期。

133. 俞玉滋、修海林：论王光祈的音乐思想/载于《音乐研究》1984 年第 3 期。

134. 袁中行：王光祈博士轶事/载于《志林大观》1999 年第 1 期。

135. 恽代英：评王光祈著《少年中国运动》/载于《中国青年》1924 年第 53 期。

Z

136. 张　斌：王光祈复蒋介石电本意辨析/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 期。

137. 张秀熟、朱　舟：在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4 年第 3 期。

138. 张　彦：王光祈的救国之路/载于《文史杂志》2005 年第 6 期。

139. 张荫伯、秦树基：人格的魅力——王光祈音乐学研究的启示/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03 年第 1 期。

140. 赵　沨：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博学的音乐学家王光祈——在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5 年第 2 期。

141. 赵　沨：《王光祈年谱》前言/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8 年第 2 期。

142. 赵宋光、管建华：有关王光祈评价的一些理论问题——在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5 年第 1 期。

143. 赵晓铃：王光祈的寂寞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03 年第 4 期。

144. 郑华钰：王光祈先生纪念馆在成都市温江县落成开馆/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9 年第 4 期。

145. 钟善祥：试评王光祈的博士论文——《论中国古典歌剧》/载于《乐苑》1984 年第 2 期。

146. 钟善祥：王光祈“谐和”思想和“国乐”观/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4 年第 4 期。

147. 钟善祥：试评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载于《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6 年第 3 期。

148. 周　畅：纪念王光祈先生/载于《人民音乐》1957 年第 1 期。

149. 周凡夫：王光祈的音乐思想初探（上、下）/载于台湾《音乐与音响》1987 年总 166、167 期。

150. **周淑真：王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纪念王光祈诞辰一百周年**/载于《兰州学刊》1992 年第 6 期。
151. **周旭光：闪耀在王光祈著述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载于《人民音乐》1992 年第 4 期。
152. **朱岱弘：王光祈音乐论著述评**/载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3 年第 1 期。
153. **朱岱弘：王光祈著作文章及有关资料目录**/载于《音乐研究》1984 年第 3 期。
154. **朱梦渊：王光祈的少年中国梦**/载于《党史纵横》2007 年第 10 期。
155. **朱正威：五四时期王光祈的思想剖析**/载于《近代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
156. **朱　舟：王光祈**/载于《音乐世界》1979 年第 1 期。
157. **朱　舟：王光祈《中国音乐史》述评**/载于《音乐研究》1984 年第 4 期。

二　专辑类研究文献

［**说明**］：下列文献以专辑编印或出版的时间为序。

1. **《王光祈先生追悼会特刊》**（南京），1936 年 3 月 15 日。
   （1）方东美：王光祈先生追悼会特刊小序
   （2）佚　名：王光祈先生遗著一览
   （3）蔡元培：王光祈先生追悼会致词
   （4）戴傅贤：王光祈先生文集序
   （5）傅斯年：追忆王光祈先生
   （6）陈剑脩：与王若愚先生同行赴欧的追忆
   （7）左舜生：悼光祈
   （8）腾　固：悼王光祈先生
   （9）朱　偰：吊王光祈先生
   （10）郭有守：若愚在蓬庐
   （11）蒋复璁：王光祈先生追悼会特刊后记
2. **《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成都），1936 年 4 月 19 日。
   （1）王光祈先生早年遗诗
   （2）周太玄：王光祈先生与少年中国学会
   （3）魏嗣銮：我所能记忆之光祈生平
   （4）彭云生：悼王君光祈（诗）
   （5）李劼人：诗人之孙

(6) 李　璜：我所认识的王光祈

(7) 李思纯：王润玙挽诗

(8) 李思纯：王光祈先生追悼会演说词

(9) 周冲谦：五光祈与现代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10) 刘泗英：哭润玙

(11) 孟寿椿：五四运动时代王光祈先生的奋斗生活

(12) 朱师辙：挽王光祈先生（词）

(13) 倪平欧：光祈北平生活之一段

(14) 周光煦：王光祈的精神不朽

(15) 郑颖荪：敬悼王光祈先生

3.《**王光祈先生纪念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九辑），沈云龙主编，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台北：文海出版社，1936 年 12 月。

(1) 左舜生：王光祈先生事略

(2) 李劼人：诗人之孙

(3) 周太玄：王光祈先生与少年中国学会

(4) 常燕生：从王光祈先生想到少年中国学会

(5) 郭有守：若愚在蓬庐

(6) 倪平欧：光祈北平生活之一段

(7) 陈剑翛：与王若愚先生同舟赴欧的追忆

(8) 李　璜：我所认识的王光祈

(9) 魏嗣銮：我所能记忆之光祈生平

(10) 舒新城：哭王光祈兄

(11) 沈　怡：追忆光祈兄

(12) 余家菊：怀想光祈

(13) 傅斯年：追忆王光祈先生

(14) 黄仲苏：王光祈哀辞

(15) 孟寿椿：五四运动时代王光祈先生的奋斗生活

(16) 周光煦：王光祈的精神不朽

(17) 郑颖荪：关于王光祈先生

(18) 周谦冲：五光祈与现代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19) 郑颖荪：敬悼王光祈先生

(20) 腾　固：悼光祈先生

(21) 左舜生：悼光祈

附　录

(1) 王光祈先生逝世情形及遗骸遗物之处置

(2) 德国波恩的追悼会

(3) 南京的追悼会

(4) 上海的追悼会

(5) 成都的追悼会

(6) 筹集王光祈音乐奖学基金会经过

(7) 挽诗挽联

(8) 王光祈著作提要

[注]：该“纪念册”系在选录南京“特刊”和成都“专刊”中部分文章基础上再作增补后汇编成册的，为了保持该“纪念册”的原貌，与前两刊相同的文章此处仍照列。

4.《**王光祈研究论文集**》(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黎文、毕兴、朱舟编选，四川音乐学院编印，1985年6月。

(1) 吕　骥：王光祈在音乐学上的贡献(代序)

(2) 杨　超：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3) 张秀熟：在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4) 赵　沨：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博学的音乐学家王光祈

(5) 李业道：纪念王光祈先生

(6) 廖辅叔：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王光祈的著作和思想

(7) 赵宋光：有关王光祈评价的一些理论问题

(8) 俞玉滋、修海林：论王光祈的音乐思想

(9) 方惠生、朱泽民：王光祈为什么要改学音乐

(10) 冯文慈：王光祈的音乐史学方法和学风

(11) 韩立文、毕兴：试评王光祈关于音乐本质和社会功能的论述

(12) 管建华：试评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学观点

(13) 吕金藻：王光祈音乐思想初探

(14) 孙学武：王光祈欧洲音乐理论著述简评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15) 康少杰：关于王光祈“燕调”的探讨

(16) 钟善祥：王光祈的“谐和”思想和“国乐”观

(17) 胡扬吉：王光祈与音乐教育

(18) 赵　沨：关于建立比较音乐学年会的建议

(19) 陈聆群：新见王光祈的音乐论文

(20) 何福琼：王光祈儿歌九首评析

(21) 朱　舟：王光祈《中国音乐史》述评

(22) 钟善祥：试评王光祈的博士论文—《论中国古典歌剧》
(23) 俞玉滋：王光祈的《千百年间中国与西方的音乐交流》
(24) 管建华：王光祈《声音心理学》述略
(25) 蓝光明、杨路：简评王光祈《音学》—兼述音乐声学研究的发展及意义
(26) 傅庆裕：关于王光祈《翻译琴谱之研究》的研究
(27) 王迪先：王光祈与“五四”时期的四川革命斗争
(28) 黎永泰、刘平：“五四”时期王光祈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探讨
(29) 崔宗复：王光祈先生的苦学与爱国主义精神
(30) 候德础：王光祈史学著译论略
(31) 魏时珍：忆王光祈
(32) 刘仁静：怀念王光祈先生
(33) 戴尧天：王光祈温江故乡生活志略
(34) 袁中行、刘楚俊：温江人民怀念王光祈先生
(35) 段启诚：循着开拓者的脚迹前进
(36) 廖辅叔：王光祈的光辉业绩应载入史册
(37) 朱岱弘：王光祈著作、文章及有关资料目录

附　录

(1) 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领导小组、代表及工作人员名单
(2) 缪天瑞的一封信
(3) 诗词、书法及照片

5. **《纪念王光祈先生诞辰 100 周年论文集》**，四川音乐学院编印，1992 年 9 月。

(1) 钟善祥：纪念王光祈先生
(2) 段启诚：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王光祈“国乐”观简说
(3) 苑树青：再论王光祈的“国乐”观
(4) 周亨芳：王光祈对中国声乐的贡献——《学说话与学唱歌》述评
(5) 黄国玺：王光祈在乐律学上的贡献
(6) 张欣然：浅析王光祈先生博士论文《论中国古典歌剧》第五章“调和移调”
(7) 郭湘平：谈王光祈先生《论中国古典歌剧·中国戏曲的发展》
(8) 邱　星：读王光祈有关音乐论著有感
(9) 胡扬吉：(1981—1991) 近十年王光祈研究资料知见录
(10) 朱　舟：王光祈诗词辑览

6. **《黄钟流韵集——纪念王光祈先生》**，毕兴、范树青编，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 年。

(1) 杨　超：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2) 吕　骥：王光祈在音乐学上的贡献

(3) 张秀熟：在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4) 赵　沨：真诚的爱国者、博学的音乐家王光祈
(5) 李业道：纪念王光祈先生
(6) 廖辅叔：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王光祈的著作和思想
(7) 赵宋光：有关王光祈评价的一些理论问题
(8) 俞玉姿、修海林：论王光祈的音乐思想
(9) 方惠生、朱泽民：王光祈为什么要改学音乐
(10) 冯文慈：王光祈的音乐史学方法和学风
(11) 韩立文、毕　兴：试评王光祈关于音乐本质和社会功能的论述
(12) 管建华：试评王光祈的比较音乐学观点
(13) 吕金藻：王光祈音乐思想初探
(14) 孙学武：王光祈欧洲音乐理论著述简评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15) 康少杰：关于王光祈"燕调"的探讨
(16) 钟善祥：王光祈的"谐和"思想和"国乐"观
(17) 朱　舟：王光祈《中国音乐史》述评
(18) 陈聆群：新见王光祈的音乐论文
(19) 钟善祥：试评王光祈的博士论文—《论中国古典歌剧》
(20) 俞玉姿：王光祈的《千百年间中国与西方的音乐交流》
(21) 何福琼：王光祈儿歌九首评析
(22) 管建华：王光祈《声音心理学》述略
(23) 蓝光明、杨路：简评王光祈《音学》—兼述音乐声学研究的发展及意义
(24) 傅庆裕：关于王光祈《翻译琴谱之研究》的研究
(25) 胡扬吉：王光祈与音乐教育
(26) 赵　沨：关于建立比较音乐学年会的建议
(27) 廖辅叔：王光祈的光辉业绩应载入史册
(28) 黎永泰、刘平：五四时期王光祈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探讨
(29) 王迪先：王光祈与五四时期的四川革命斗争
(30) 崔宗复：王光祈先生的苦学与爱国主义精神
(31) 侯德础：王光祈史学著译论略
(32) 魏时珍：忆王光祈
(33) 刘仁静：怀念王光祈先生
(34) 戴尧天：王光祈温江故乡生活志略
(35) 袁中行、刘楚俊：温江人民怀念王光祈先生
(36) 段启诚：循着开拓者的脚迹前进
(37) 缪天瑞：建议出版王光祈音乐著译全集或选集

(38) 佚　名：出席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代表名录

(39) 冯如秀：王光祈先生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开幕词

(40) 冯光钰：王光祈音乐思想给我们的启示——在“王光祈先生诞辰 100 周年纪念会”上的致辞

(41) 李忠勇：纪念真诚爱国、刻苦治学的王光祈先生

(42) 吕　骥：纪念王光祈先生百年诞辰

(43) 冯光钰：王光祈的中西音乐文化观

(44) 黄翔鹏：音乐学在新学潮流中的颠簸

(45) 茅　原：从王光祈论戏曲音乐谈到他的美学观

(46) 樊祖荫：王光祈的“国乐”观对今天的启示

(47) 石惟正：炽热的爱国情愫，深厚的文化功底

(48) 叶　语：学习王光祈的音乐思想

(49) 林大雄：王光祈的“新儒家”音乐思想初探

(50) 庄本立：对乐律、乐舞、乐器的研究——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的启示

(51) 张荫柏、秦树基：“少年中国”与音乐

(52) 钟善祥：纪念王光祈先生

(53) 苑树青：再论王光祈的“国乐“观

(54) 段启诚：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王光祈的国乐观简说

(55) 周亨芳：王光祈对中国声乐的贡献——《学说话与学唱歌》述评

(56) 钟善祥：试评王光祈《东西乐制之研究》

(57) 颜曼秋：试评《西洋音乐与戏剧》—缅怀中国音乐学的先驱者王光祈先生

(58) 黄国玺：王光祈在律学上的贡献

(59) 张欣然：浅析王光祈博士论文《论中国古典歌剧》第五章“调和移调”

(60) 周淑真：试论王光祈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

(61) 黎永泰：王光祈与毛泽东的交往略述

(62) 潘清雍：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进行不懈探索的业绩永存

(63) 韩立文、毕兴：王光祈生平综述

(64) 朱　舟：王光祈诗词辑览

(65) 李建明：在王光祈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66) 王孟谦：弘扬先驱精神，激励后代奋进——海内外名流向王光祈先生纪念馆赠书画

(67) 崔宗壮：王光祈先生事略诗纪七十韵——献给王光祈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

(68) 袁中行：谒王光祈先生纪念馆

(69) 刘绍南：在阳光集团资助《王光祈研究论文集》编辑出版仪式上的讲话

(70) 黄万品：在阳光集团资助《王光祈研究论文集》编辑出版仪式上的讲话

(71) 佚　名：王光祈先生诞辰 100 周年纪念会简报

(72) 佚　名：出席王光祈先生诞辰 100 周年纪念会人员名单

(73) 仲万美子：日本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给纪念会的一封信

附　录

(1) 岸边成雄：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7 年刊载于日本)

(2) 胡扬吉：王光祈著述及研究资料综目

7.《**纪念王光祈诞辰 11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会组委会、四川音乐学院编印，2002 年。

(1) 谭晓钟：王光祈五四时期的文化选择述评

(2) 武　文：王光祈复蒋介石电本意辨析

(3) 明　言：作为新音乐批评家的王光祈——纪念王光祈先生诞辰 110 周年

(4) 胡郁青、丁晓红：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王光祈音乐思想探析

(5) 陈达波、李　姝：王光祈与民族音乐的发展

(6) 郭　莹：王光祈“礼乐复兴”思想及其成因初探

(7) 周孟璞：缅怀王光祈先生

(8) 冯光钰：礼乐兴邦·复兴中华——纪念王光祈先生诞辰 110 周年

(9) 张　彦：试析王光祈的救国之路

(10) 林成西、许蓉生：王光祈的空想社会主义及其实践

(11) 张荫伯、秦树基：人格的魅力——王光祈音乐学研究的启示

(12) 杨永贤：音乐学家王光祈评述

(13) 赵晓玲：王光祈的寂寞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

(14) 陈聆群：沈知白先生谈王光祈及其他

(15) 胡扬吉：王光祈研究资料目录（增补部分）

三　著作及选辑类研究文献

[**说明**]：下列文献中均含有“王光祈研究”方面的专文或专述，所列文献以作者姓氏的汉语拼音为序。

C

1. **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年。

2. **陈聆群**：《**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音乐简史**》(油印本) /1981 年。

2. **陈聆群**：《**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在 20 世纪：陈聆群音乐文集**》/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

社，2004 年 。

3. 陈应时：《中国乐律学探微：陈应时音乐文集》/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年。
4. 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编：《成都掌故 第三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年。

F

5. 樊祖荫：《音乐与人：中国现当代音乐研究文集》/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年。
6. 方宝璋：《中国音乐文献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 年。
7. 冯文慈：《中国音乐史学的回顾与反思：冯文慈音乐文集》/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 年。
8. 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
9. 符礼建、李　奇：《敢为人先—成都的全国之最》/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 年。

G

10. 高　芾：《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
11. 管建华：《中西音乐文化比较的心路历程》/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
12. 郭正昭、林瑞明：《王光祈的一生与少年中国学会》/台北：环宇出版社，1974 年。

H

13. 韩立文、毕　兴：《王光祈年谱》/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 年。
14. 何洪禄：《中外音乐故事》/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
15. 胡继华、马自力：《百年老课文》/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 年。
16. 黄炎培：《黄炎培诗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年。

L

17. 李劼人：《李劼人选集 第五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 年。
18. 李　岩：《朔风起时弄乐潮：李岩音乐学术论文集》/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年。
19. 梁茂春：《百年音乐之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年。
20. 廖崇向：《廖辅叔文集：乐苑谈往》/北京：华乐出版社，1996 年。
21. 凌瑞兰：《20 世纪中国音乐史略》（修订版）/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
22. 刘再生：《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 年。
23. 路海江、贺明洲：《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
24. 吕　骥：《吕骥文选》（下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 年。
25. 吕金藻：《音乐春秋——中国近现代音乐家故事选》/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 年。

M

26. 茅　原：《铺路石：茅原音乐文集（二）》/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年。

27. 明　言：《20 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年。

O

28. 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 5 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年。

Q

29. 乔　佩：《中国现代音乐家》/台北：天同出版社，1981 年。

R

30. 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的故事》/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 年。

S

31. 上海音乐学院编写组编：《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 年。
32. 邵奇青：《音乐史上的今天》/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 年。
33. 沈用大：《中国新诗史》（1918—1949）/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
34.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温江文史专辑 总第 8 辑：纪念王光祈先生诗书画集萃》/1998 年。
35.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温江文史资料选 第 4 辑》/1994 年。
36. 四川省音乐家协会编：《中国音乐家小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年。
37. 宋三旦：《毛泽东与他的师长学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 年。
38.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年。

T

39. 唐朴林：《神奇的音乐：中国音乐故事·传说·趣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年。

W

40.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家评传》/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年。
41.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二次修订版；中国文库·艺术类）/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年。
42. 温江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温江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 1 辑》/1987 年。
43. 文守江：《民国四川人物传记》/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 年。

X

44. 向延生：《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 年。

45. 肖　羽：《中国音乐家趣闻轶事》/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 年。
46. 徐士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上海：南海出版公司，1997 年。

Y

47. 颜廷阶：《中国现代音乐家传略》/台北：绿与美出版社，1992 年。
48. 杨没累：《没累文存》/上海：泰东图书局，1929 年。
49. 余甲方：《中国近代音乐史（1840—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50. 俞人豪等：《音乐学基础知识问答》（修订版）/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 年。
51. 俞玉滋、张援：《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文选》（1840—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年。

Z

52. 张国臣编著：《中国艺术之最》/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87 年。
53. 张岂之：《民国学案》（第 6 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5 年。
54.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五四运动在四川》/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 年。
5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人物传》（三）/上海：中华书局，1981 年。
56. 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研究所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参考资料》第二编第一辑（油印本）/1959 年。
57. 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研究所音乐史编辑组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第二编第四章第五节（油印本）/1959 年。

四　工具书类研究文献

[说明]：下列工具书中均含有“王光祈”的相关词条或相关内容，所列文献以工具书书名的汉语拼语为序。

C

1.《成都大词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 年。
2.《辞海》（三卷本）/《辞海》编辑委员会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年。

D

3.《大陆音乐辞典》/康讴主编，台北：大陆书店，1981 年。

4.《东西方艺术辞典》/戚廷贵、刘孝严、唐树凡主编，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

J

5.《简明体音美辞典》/温敬铭、童忠良、阮璞主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6.《简明音乐辞典》/志　敏、国　华编著，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L

7.《黎明音乐辞典》/洪万隆总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

M

8.《民国人物大辞典》/徐友春主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9.《民国史大辞典》/尚　海、孔凡军、何虎生主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

S

10.《实用音乐辞典》/许常惠主编，台北：百科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
11.《四川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7年。

X

12.《学生音乐辞典》/沈阳：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

Y

13.《音乐百科词典》/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年。
14.《音乐辞典》/梁得所编，台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2年。
15.《音乐辞典》/刘诚甫编纂，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16.《音乐辞典》/王沛纶编，台北：文艺书屋，1963年。
17.《音乐手册》/张人模编著，台北：天同出版社，1982年。
18.《音乐知识词典》/高天康编，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
19.《音乐字典》/王沛纶编著，台北：大陆书店，1981年。

Z

20.《中共党史简明辞典》/肖超然等主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21.《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出版社编辑部 编，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89年。
22.《中国革命史人物辞典》/何　东、杨先材主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
23.《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廖盖龙主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24.《**中国文化大百科全书**》(**艺术卷**)/长春：长春出版社，1994年。

25.《**中国艺术百科辞典**》/**冯其庸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26.《**中国艺术家辞典**》/《**中国艺术家辞典**》**编委会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27.《**中国音乐辞典**》/**丹青艺丛编委会编**，台北：丹青图书有限公司，1986年。

28.《**中国音乐家辞典**》/**黄胜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29.《**中国音乐词典**》/**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词典**》**编辑部编**，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

30.《**中国音乐辞典**》/**张乐水、戴安琳编**，台北：常春树书坊，1985年。

31.《**中国音乐理论书目大全**(1949—1999)》/**陈建华编**，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

32.《**中国音乐、舞蹈、戏剧人名辞典**》/**曹惆生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附录四

中西文译名对照表

表一　音乐卷名词中西文译名对照表

音乐卷编辑小组　编

【编辑说明】

一、《音乐卷名词中西文译名对照表》所列出的词语均源自《王光祈文集·音乐卷》中的各专著及文论，主要为音乐理论专业的常用词语，亦含少量非音乐专业重要词语。因其在王光祈原文中的中文译名与今常见的中文译名存在明显差异，故我们将其以“王光祈译”、“西文原文”、“常见今译”的顺序列表对照。在“王光祈译”一栏中，各词语均按其汉语拼音音节逐一排序，对王光祈原文中那些只有西文名而无中文名的词语，或只有中文名而无西文名的词语均不列入。

二、在王光祈原文中，多处存在将不同的西文词语翻译为完全相同的中文词语的情况，例如将 Komische Oper（喜歌剧）与 Komodie（喜剧）均译为“趣剧”，将 Psalmen（诗篇歌）与 Choral（赞美诗或众赞歌）均译为“圣诗”。对此，我们在“王光祈译”一栏中将该名词分别列出，并附加序号以示区别。

三、王光祈在著述中对西文的使用较为灵活，文献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英语、拉丁语等西文语种，对于原文中以不同语种表达的同义词汇，我们也在表中予以分别列出。“西文原文”一栏中语词的语法和拼写方式均照原文，只对少数有明显拼写错误之处做径直更正。

四、“常见今译”一栏中的译词主要参照《外国音乐辞典》（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牛津简明音乐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新德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三本词典进行，同时亦参照西方音乐学科在当代中文语境中常用的翻译方式。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阿八	Alba	晨歌、破晓歌
阿白	Auber	奥伯
阿白龙	Oberon	奥伯龙
阿白乃邪	Obrecht	奥布雷赫特
阿伯儿	Aubert	奥贝尔
阿博罗惹伍	Ambrosius	安布罗斯
阿尔比鲁里	Albinoni	阿尔比诺尼
阿尔非由斯、阿尔非	Orpheus	奥尔菲斯、奥菲欧
阿尔港鲁	Organum	奥尔加农
阿尔克斯得	Orchestra	管弦乐队、乐池
阿尔启罗可	Archilochos	阿基洛科斯
阿非土里	Offertorium	奉献经
阿芬把赫	Offenbach	奥芬巴赫
阿佛多、爱克所多	Aphodos、Exodos	退场、结尾
阿哈白	Ahab	亚哈
阿喀拍拿式	a Cappella-Stil	无伴奏风格
阿喀拍拿式歌调	a Cappella-Lied	无伴奏利德
阿凯海模	Okeghem	奥克冈
阿克鲁	Agnus	羔羊经
阿苦以鲁	Alcuinus	阿尔比努斯
阿里非	Alypius	阿利皮乌斯
阿里朴	Olympos	奥林帕斯
阿里朴赛会	Olympische Spiele	奥林匹亚竞技会
阿鲁	Aulos	阿夫洛斯管
阿马体	Amati	阿马蒂
阿模白鲁斯	Ambros	安布罗斯
阿那土锐拔舍勇	Oratorische Passion	清唱剧式受难曲
阿乃费	Halévy	阿莱维
阿乃里阿鲁	Aurelianus Reomensis	奥勒良
阿乃里屋	G. F. Anerio	乔瓦尼·弗朗切斯科·阿内里奥
阿乃鲁亚	Allelujah	阿利路亚
阿绒	Arion	阿里翁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阿塔里阿》	Athalia	《阿塞利亚》
阿堂	P. Haultin	P·霍尔廷
阿堂奖	P. Attaingnant	皮埃尔·阿泰尼昂
爱耳外	Herve	埃尔韦
爱里	Ellis	埃利斯
《爱里阿斯》	Elias	《以利亚》
爱里改那	Erigena	埃里金纳
爱排所顶	Epeisodion	古希腊悲剧中两段合唱间的部分
爱皮所得	Episode	插句、插段
《爱情》	Erotik	《情爱》
爱情歌者	Minnesinger	恋诗歌手、爱情歌手
爱提南	Eitner	艾特纳
爱往改里斯提	Evanglisten	福音传教士
爱心睹而夫	Eichendorff	艾兴多夫
《安低果乃》	Antigone	《安提戈涅》
《安乐园与拍里》	Paradies und Peri	《天堂与仙子》
安蒲弄体曲	Impromptu	即兴曲
按音	Griffbrett	指板、键盘
昂十耳	Auselm V. Flandern	安瑟伦
《奥冷斯匹格》	Till Eulenspiegel	《蒂尔的恶作剧》
巴耳底	Bardi	巴尔迪
巴黎古乐时代	Ars antiqua	古艺术
巴鲁克乐风	Barockstil	巴洛克风格
巴鲁克	Barock	巴洛克
巴起舞	Bacchius	巴基乌斯
拔车买西	Pachymeres	帕奇梅雷斯
拔纳斯推拿	Palestrina	帕莱斯特里那
拔妥车	Petrucci	彼得鲁奇
八阶	Oktave	八度
把那台	Ballada	叙事歌
把时钥	Bassschlüssel	低音谱号
白阿推里斯	Beatrice	比阿特丽斯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白堤火焚、白堤火粉	Beethoven	贝多芬
白里耳	Briard	布里阿尔德
白里利	Bellini	贝里尼
白鲁克兰	Bruckner	布鲁克纳
白鲁里	Eduard Bernoulli	爱德华·贝努利
白屡体可佩孚	Immanuel Breitkopf	布雷特可普夫
白弄得	Blondel v. Nesles	布隆德尔·冯·内斯莱斯
柏耳那	Bernart v. Ventadorn	贝纳特·冯·文塔多恩
柏林	Perrin	佩兰
柏鲁格罗	Pietro Perugino	P·佩鲁吉诺
柏纳谟斯	Brahms	勃拉姆斯
柏纳斯体拿	Palastina	巴勒斯坦
邦启里	Banchieri	班基耶里
《悲哀的开场音乐》	Tragische Ouvertüre	《悲剧序曲》
《悲凉之夜乐》	Sérénade Mélancholique	《忧伤小夜曲》
比昌池老满	Byzantiner Neumen	拜占廷纽姆谱
比色	Bizet	比才
比先	Karl Bücher	布赫尔
彼得果纳斯	Pythagoras	毕达哥拉斯
筚篥、小笛	Flautino	短笛
变化谱①	Variationenform	变奏曲式
变化谱②	Variation	变奏曲
标来	Burney	伯尼
表情跳舞①	Pantomimus	哑剧
表情跳舞②	Ballet	芭蕾舞
表现主义	Expressionismus	表现主义
冰雪	Gilles Binchois	G·班舒瓦
波里乃克斯	Polyneikes	波吕克斯
波诺乃色	Polonaise	波洛奈兹、波兰舞曲
波色乃舍时	Bossinensis	伯希内西斯
钵	Becken	钹
伯尔柳迟	Berlioz	柏辽兹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博老	Fritz Braun	布劳恩
薄也丢	Boieldieu	布瓦尔迪厄
卜革里利	Paganini	帕格尼尼
补邪	Busch	布施
不协和音阶	Dissonanz	不协和音程
布车那	Buccina	布西纳号
布那门得	Buonamente	博纳门特
采罗	Zeno	芝诺
采乃斯塔	Celesta	钢片琴
查理罗	Zarlino	扎利诺
长短确定乐	Musica mensurata	有量音乐
长前击	Lange Vorschlag	长倚音
长三阶	Grosse Terz	大三度
《超人于是言曰》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车车里	Sizilien	西西里
崇拜真体	Ave verum	圣体颂
初阶	Prime	一度、同度、(自然音阶上的)第一音
《船子之歌》	Tasso：lamento e trionfo	《塔索的悲伤与胜利》
《创造》	Die Schöpfung	《创世纪》
《春歌》	Frühlingslieder	《春之歌》
纯粹复音歌乐	a Cappella-Polyphonie	无伴奏多声部合唱
纯粹复音歌乐之“马队咯”	a Cappella-Madrigal	无伴奏牧歌(意大利文艺术歌曲)
纯粹复音歌乐之斜诵	a Cappella-Chanson	无伴奏尚松(法文艺术歌曲)
纯净音乐	absolute Musik	纯音乐、绝对音乐
次阶	Sekunde	二度、(自然音阶上的)第二音
达费提	David	大卫
达摩克里提	Demokrit	德谟克利特
打里那	Dalila	达利拉
打猛	Damon	达蒙
大耳查	Dalza	达尔扎
大风琴	Orgel	管风琴
大风琴乐谱	Orgel-Ricercar	管风琴利切卡尔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大空澈堤	Concerto grosso	大协奏曲
大乐队	Ripieno	协奏部
大琵琶	Theorbe	西尔伯琴、短双颈琉特琴
大套歌曲	Da capo-Arie	返始咏叹调
《大学庆典之开场音乐》	Akademische Festouvertüre	《学院节庆序曲》
丹冷	Denner	登纳
单唱众和	Responsorium、Gradculien	应答圣歌
弹簧风管	Zungenpfeifen	管风琴簧管
淡泊主义学派	Stoiker	斯多葛派
导调	Leitmotive	主导动机
得士苦	Descort	德斯科歌体
德比舍	Debussy	德彪西
德买推里五斯	Demetrius	德米特里厄斯
德蒲	Josquin de Pres	约斯坎・德・普雷
《德意志挽歌》	Deutsches Requiem	《德意志安魂曲》
《登幻》	Don Juan	《唐璜》
低塔斯笃湖	Dittersdorf	迪特斯多夫
低体那补	Dithyrambus	酒神颂歌
低屋柳锁	Dionysos	狄奥尼索斯
低音大笛	Fagott	大管
低音喇叭	Tuba	大号
低音琵琶	Gitarre	吉他
抵阿统	Diatonisch	自然音阶
抵时康都	Discantus	迪斯坎图斯
弟弟模	Didymus	戴狄慕斯
第七阶	Septime	七度、(自然音阶上的)第七音
调别	Tonart	调
丢非	Guillaume Dufay	纪尧姆・迪费
丢斯特朴	John Dunstaple	邓斯泰布尔
《冬日旅行》	Winterreise	《冬之旅》
《董吉诃德》	Don Quixote	《堂吉诃德》
董里采体	Donizetti	多尼采蒂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都耳	Doris	多利斯
独奏空瀓堤	Solokonzert	独奏协奏曲
短句	Motive	动机
短剧、香艳短剧	Operette	轻歌剧、小歌剧
短三阶	Kleine Terz	小三度
段谱	Strophenlied	分节歌
断续音	Staccato	断奏
对谱句	Kontrasubjekt	对题
对谱音乐	Kontrapunkt	对位法、对位
额喜罗	Aischlos	埃斯库罗斯
恩哈姆里克	Enharmonik	等音
二段谱	Zweiteilige Liedform	二段式
二音合唱	Duett	二重唱、二重奏
发明谱	Inventionen	创意曲
法国康处乃	Canzoni alla francese	法国坎佐纳
《法国舒怡台》	Französische Suiten	《法国组曲》
法里格	Phrygia	弗里几亚
法体	Fétis	费蒂斯
法之法郎克	César Franck	塞扎尔・弗朗克
房中乐	Kammermusik	室内乐
非斗	Fidel	菲德尔、提琴
非里朵	Danican Philidor	菲利多
非鲁歹母	Philodemos	菲洛德穆
非鲁那阿斯	Philolaos	菲洛劳斯
费打拿	Viadana	维亚达纳
费大里	G. Vitali	G・维塔利
费耳	Vers	诗、诗节
费耳的	Verdi	威尔第
费耳来	Virelai	维勒莱
费格耳	Vigil	守夜祈祷、晨祷
费斯拍	Vesper	晚课、晚祷
费哇耳底	Vivaldi	维瓦尔第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分	Cents	音分
芬迟南	Pfitzner	普菲茨纳
佛耳客	Forkel	福克尔
佛克里罗	Fogliano	福格里诺
佛鲁冷池	Florenz	佛罗伦萨
伏波洞	Fauxbourdon	福布尔东、假低音
《浮斯德生风里》	Faustsymphonie	《浮士德》交响曲
《浮斯德之被罚》	La Damnation de Faust	《浮士德的沉沦》
复基音	Polytonalität	多调性
复加	Fuga、Fuge	赋格
复音音乐	Mehrstimmigkeit	多声部音乐
改那得罗	Gherardello	盖拉尔代洛
干燥的吟诵	Recitativo secco	清宣叙调、干宣叙调
刚性六音组	Hexachordum durum	硬六声音阶
钢琴、次弱	Piano	钢琴、弱
钢琴艺师	Klaviervirtuos	钢琴名家
高音琵琶	Mandoline	曼陀林
《告春》	An den Frühling	《春之歌》
戈体一	Gautier	戈蒂尔
割势伶人	Kastrat	阉人歌手
歌唱	Cantabel	如歌的
歌唱、歌曲	Aria	咏叹调
歌唱名家	Meistersinger	名歌手
歌队	Chor	合唱队
歌队轮唱	Antiphon	交替圣歌
歌奏大乐	Chorwerk	大型声乐作品
格	Gay	盖依
格朗底	Al. Grandi	亚历山德罗·格兰迪
格朗将	Granjon	格莱让
格里哥第一	Gregor I	格列高利一世
格里哥乐歌	Gregorianischer Gesang	格列高利圣咏
格里克	Grieg	格里格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格里推	Grétry	格雷特里
格鲁孟拿	Gremona	克雷莫那
格那者耳	Graduale	升阶经
格乃鲁	Henricus Loritus Glareanus	格拉瑞安
格乃提心	Gretchen	葛丽卿
根据	Cantus firmus	固定调
苟特式	Gotik	哥特式
辜独	Guido von Arezzo	圭多·阿雷佐
古耳乃里	Guarneri	瓜内利
古里邪夫	Golyscheff	戈尔雪夫
古鹿垓	Gluck	格鲁克
《归自外地》	Heimkehr aus der Fremde	《还乡》
过路音	Durchgang	经过音
《哈鲁尔德在意大利》	Harold en Italie	《哈罗尔德在意大利》
《海白里登》	Hebriden	《芬格尔山洞》
《海波不兴平安驶行》	Meeresstille und glückliche Fahrt	《平静的大海和幸福的航行》
海登	Haydn	海顿
海尔米阿	Hermia	荷米娅
海猛	Hämon	哈蒙
海乃	Heine	海涅
海诺	Hérold	埃罗尔德
杭乃	Hanne	汉娜
杭思里克	Hanslick	汉斯立克
好耳	Hauer	豪埃尔
好金	Hawkins	霍金斯
号角、小洋号	Korenett	短号
《何尔伯格舒怡台》	Holberg-Suite	《霍尔堡组曲》
何耳波斯特	Hornbostel	霍恩博斯特尔
何克巴耳德	Hucbald	于克巴尔、胡克巴尔德
赫恩	Hahn	阿恩
黑耳木火耳慈	Helmholtz	赫尔姆霍茨
黑鲁朵	Herodot	希罗多德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黑谟乃提》	Hamlet	《哈姆雷特》
黑乃儿	Hiller	希勒
黑乃拿	Helena	海伦娜
亨登	Händel	亨德尔
亨登米堤	Hindemith	亨德米特
洪拔抵克	Humperdinck	洪佩尔丁克
后击	Nachschlag	后倚音
胡尔堤文格来	Furtwängler	富尔特文格勒
胡朗池	Franz	弗朗茨
胡六图	Flotow	弗洛托
《幻想生风里》	Symphonie fantastique	《幻想交响曲》
诙谐	Scherzo	谐谑曲
混合的里底	Mixolydisch	混合利第亚调式
混合合唱	Gemischterchor	混声合唱
基础谐和	Accords Fondamentaux	原位和弦
基音①	Grundton	主音、根音
基音②	Tonika	主音
《家庭生活》	Sinfonia domestica	《家庭交响曲》
蒋乃金	Janequin	雅内坎
脚本报告者	Testo	（清唱剧中的）叙述者
教堂调式	Kirchentonarten	教会调式
教堂空澈提	Concerti ecclesiastici	教堂协唱曲、教堂协奏曲
教堂乐章、康打台	Kantate	康塔塔
节奏方式	Modus	节奏模式
节奏学	Rhythmik	韵律学
金质吹奏乐器	Blechblasinstrumente	铜管乐器
敬仰、格罗里	Gloria	荣耀经
剧场乐队	Opernorchester	歌剧管弦乐队
《绝命歌曲》	Schwanengesang	《天鹅之歌》
喀白里利	Gabrieli	加布里埃利
喀车阿	Caccia	猎歌
喀车里	Caccini	卡契尼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喀狸奴	Carreno	卡雷尼奥
喀里斯米	Carissimi	卡里西米
喀浦乃体	Capuletti	凯普莱特
喀士那	Pietro Casella	卡塞拉
喀哇里	Cavalli	卡瓦里
喀瓦处里	Cavazzoni	卡瓦佐尼
喀瓦里利	Cavalieri	卡瓦利埃利
卡白里耳	Gabriel	加百利、加布里埃尔
开场音乐	Ouverture	序曲
《凯歌》	Triumphlied	《胜利之歌》
凯鲁比里	Cherubini	凯鲁毕尼
康白累	Cambrai	康布雷
康伯	Cambert	康贝尔
康处乃	Kanzone	坎佐纳
康洛、慷洛	Kanon	卡农
柯乃里	Corelli	科雷利
柯乃聊时	Cornelius	科内利乌斯
柯诺拿	Colonna	科隆纳
克耳峡	Athanasius Kircher	阿塔纳斯·珂雪
克老底五斯	Claudius	克劳狄斯
克里斯托法里	Cristofori	克里斯托福里
克鲁马体克	Chromatisch	半音阶
克鲁他	Chrotta	克鲁斯琴
克乃斯来	Kreisler	克莱斯勒
克乃翁	Kreon	克瑞翁
克舍我多	Cassiodor	卡西奥多
克特色比阿	Ktesibios	克特西比乌斯
客那费车把	Klavicimbal	羽管键琴
客那费可儿	Klavichord	楔槌键琴
客厅琐那台	Sonata da Camera	室内奏鸣曲
肯皮斯	Kempis	坎佩斯
空澈堤	Concerto、Konzert	协奏曲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孔伯乃提	Complet	夜课
孔睹克都、孔独克都时	Conductus	孔杜克图斯
孔冷	Conen de Bethune	科南
孔母里屋	Communio	圣餐经
口吹风琴	Mundharmonika	口琴
《骷髅跳舞》	Danse Macabre	《骷髅之舞》
苦老	Kuhnau	库瑙
快板、最快板	Presto	急板
快板复加谱	Fugiertes Allegro	快板赋格曲
快慢符号	Tempo	速度
狂歌	Rhapsodie	狂想曲
昆六	Quinault	基诺
拉丁老满	Lateinische Neumen	拉丁纽姆谱
拉法尔	Raphael	拉菲尔
来	Lai	莱歌
来格冷扯	Legrenzi	莱格伦齐
来屋	Leo	莱奥
赖鲁达	Neruda	内鲁达
赖满	Lehmann	勒曼
郎殂时马土体乃	Landes matutinae	早祷
郎底鲁	Francesco Landino	弗朗切斯科·兰迪尼
老满	Neumen	纽姆谱
李可老	Nicolai	尼古拉
李可马苦	Nikomachos aus Gerasa	尼科马科斯
李桑得	Lysander	拉山德
李斯志	Liszt	李斯特
里底	Lydia	利第亚
立喀土	Ligaturen	连音、连音线
栗形乐器	Kastagnetten	响板
连贯音	Legato	连奏
怜佑、克里	Kyrie	慈悲经
六阶	Sexte	六度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六阶谐和	Sextakkord	六和弦
六拍	Hexameter	六音步
六音组	Hexachordum	六声音阶
芦叶	Rohrblatt	簧片
《鲁冰与马绒》	Jeu de Robin et de Marion	《罗宾与玛里昂》
鲁布	Rhombe	菱形
鲁恩	Non	第九课
鲁喀斯	Lukas	卢卡斯
鲁曼辞	Romanze	浪漫曲
鲁模	Nomoi	诺莫斯
鲁乃	Cipriano de Rore	奇普里亚诺・德・罗勒
鲁色	S. Rossi	萨洛莫内・罗西
鲁色里	Rossini	罗西尼
鲁森谬南	Rosenmuller	罗森缪勒
鲁沙领得	Rosalinde	罗莎林德
路易	Ludwig	路德维希
吕里	Lully	吕利
吕满	Riemann	里曼
罗成	Lortzing	洛尔青
罗格诺舍鲁	Logroscino	洛格罗希诺
罗马大琵琶	Chitarrone	西塔隆琴、长双颈琉特琴
《罗马教皇马扯鲁期》	Marcellus	《马尔切里斯教皇弥撒曲》
罗曼主义	Romantik	浪漫主义
《罗蜜欧与尤里阿》	Romeo und Julia	《罗密欧与朱丽叶》
罗体克	Notiker Balbulus	诺特克
马仓领	Mazarin	马萨林
《马车巴》	Mazeppa	《玛捷帕》
马队喀	Madrigal	牧歌
马耳克不鲁	Marcabru	马卡勃鲁
马耳体里	Martini	马蒂尼
马耳邪南、马喜来	Marschner	马施纳
马海谟学校	Mannheimer Schule	曼海姆乐派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马克鲁比五	Macrobius	马克罗比乌斯
马利亚阿土阿乃提	Marie Antoinette	玛丽·安东尼
马乃儿	Mahler	马勒
马乃里	B. Marini	比亚焦·马里尼
马思康已	Mascagni	马斯卡尼
马琐耳喀	Mazurka	玛祖卡舞曲
《马太约斯所述之被难记》	Matthäus Passion	《马太受难曲》
马侠那	Maschera	玛斯科拉
马雪	Guillaume de Machault	纪尧姆·德·马肖
买所买得	Mesomedes	墨索墨德斯
买他斯他色	Metastasio	梅塔斯塔西奥
买羊摆儿、买羊伯尔	Meyerbeer	梅耶贝尔
麦尔苦体屋	Mercutio	默克提欧
麦鲁罗	Merulo	梅鲁洛
《麦鲁舍乃》	Melusine	《美丽的梅露西娜》
慢板①	Allegretto	小快板
慢板②	Adagio	柔板
慢板、平板	Andante	行板
茫洛阿	Manoah	玛挪亚
莽海模	Mannheim	曼海姆
梅落哀舞乐	Menuett	小步舞曲
每时祈祷	Stundenofficium	日课
美歌	Bel Canto	美声唱法
《美丽磨女》	Die Schöne Mullerin	《美丽的磨坊女》
美术诗歌	Kunstlied	艺术歌曲
门登思宋	Mendelssohn	门德尔松
孟大金	Bartolommeo Montagna	巴托罗密欧·蒙塔格纳
孟德废邸	Monteverdi	蒙特威尔第
孟色金	Monsigny	蒙西尼
孟特祈	Montecchi	蒙泰古
米叙	Micha	米夏
谬里克	Mörike	默里克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摩擦耳提	Mozart	莫扎特
摩塔都	Motetus	经文歌
摩塔都拔舍勇	Motettenpassion	经文歌式受难曲
陌李	Peri	佩里
墨飞斯妥非乃时	Mephistopheles	梅菲斯特
默思	Messe	弥撒
木号	Zink	木管号
木桥	Steg	琴马
木质敲击乐器	Xylophon	木琴
那白乃胡	alla breve	二二拍子
那马吞	Lamartine	拉马丁
那米	Ramis	拉米斯
那木	Rameau	拉莫
那所	Orlando di Lasso	拉索、拉絮斯
那妥蒲	Natorp	那托普
《那威嫁》	Norwegischer Brautzug	《挪威生活素描》
那足斯	Lajos	拉约什
乃阿冷处	Lorenzo	劳伦斯
乃阿坡	Neapel	那不勒斯
乃把布	Rebab	拉巴巴琴
乃色耳	Reyser	雷塞尔
乃色坡	Lesbos	莱斯博斯
乃翁喀瓦罗	Leoncavallo	莱翁卡瓦洛
欧克里德	Euklid	欧几里德
欧里皮歹	Euripides	欧里庇底斯
耦调	Parallel Tonart	平行大小调、关系大小调
拍尔果乃色	Pergolesi	佩尔戈莱西
拍里模	Prim	第一课
拍鲁多	Parodos	进场歌
《拍鲁买台由斯》	Prometheus	《普罗米修斯》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拍那克他罗格	Parakataloge	有伴奏的说白
拍那体鲁	Pratinas von Phlius	帕拉提那斯
拍乃土锐	M. Praetorius	普里托里乌斯
拍谱邪	Pepusch	佩普什
拍士土纳	Pastourelle	田园恋歌
拍线	Taktstrich	小节线
拍子	Takt	小节、拍、拍子
《派尔根堤舒怡台》	Peer Gynt Suite	《培尔·金特》组曲
跑罗	Paolo	保罗
朋得皮	Bontempi	邦滕皮
皮车里、辟启里	Piccini	皮契尼
皮耳色（匹尔斯）	Henry Purcell	普赛尔、珀塞尔
皮罗	Piero	皮埃罗
皮那德	Pylades	皮拉得斯
皮色罗	Psellos	普塞洛斯
篇、句	Satz	乐章、乐曲、作曲风格、主题
篇法学	Formenlehre	曲式学
平大耳	Pindar	平达
坡非里五	Porphyrius	普菲利欧斯
坡体五	Boethius	波伊提乌、博依西厄斯
蒲多西母	Ptolemans	托勒密
蒲鲁罗	Prolog	开场
蒲鲁他邪	Plutarch	普卢塔克
《普通弥撒》	Missa solemnis	《庄严弥撒》
七弦手竖琴	Kithar	基萨拉琴
前击	Vorschlag	短倚音
强弱之法	Dynamik	力度
敲击乐器	Schlaginstrumente	打击乐器
轻重律	Metrik	诗韵学、格律学
《卿似一枝花》	Du bist wie eine Blume	《你好比一朵鲜花》
《庆祝之歌》	Festklänge	《节庆之声》
趣剧①	Opera buffa、Komische Oper	喜歌剧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趣剧②	Komodie	喜剧
趣剧科班	Buffonistentruppe	喜歌剧团
全谱	Durchkomponiertes Lied	通谱歌
《热情生风里》	Pathétique	《“悲怆”交响曲》
《人生忧乐》	Les Préludees	《前奏曲》
日本瑟	Koto	日本筝
绒朵	Rondeau	回旋歌
柔性六音组	Hexachordum molle	软六声音阶
芮克尔	Reger	里格
锐扯喀	Ricercar	利切卡尔
萨耳迟堡	Salzburg	萨尔茨堡
三段谱	Dreiteilige Liedform	三段式
三角乐器	Triangel	三角铁
三阶	Terz	三度
三人合奏曲	Trio	三重奏、三重唱
三音合唱	Terzett	三重唱、三重奏
三音谐和	Dreiklange	三和弦
色尔文达	Sirventes	西尔旺特
色克斯提	Sext	第六课、午祷
色昆辞	Sequenz	继叙咏、西昆斯
色乃拿	Serena	小夜曲
色润克斯	Syrinx	绪任克斯、潘管
沙白斯体羊里	J. Sebastiani	J·塞巴斯蒂亚尼
沙克斯	Hans Sachs	汉斯·萨克斯
沙克斯号角	Saxhörner	萨克斯号
沙克索风	Saxophon	萨克斯管
沙鲁索风	Sarrusophon	撒吕双簧管
沙模	Samos	萨摩斯
沙模松	Samson	参孙
上五阶、上五音谐和	Dominante	属音、属和弦
伸缩喇叭	Posaune	长号
深苛拍	Synkope、Synkop	切分音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神剧	Mysterium	神秘剧
神圣、商克士	Sanctus	圣哉经
《神仙趣剧》	Divina Commedia	《神曲》
甚强	Forte	强
生风里①	Sinfonia	交响曲、歌剧序曲
生风里②	Symphonie、Symphony	交响曲
生风里乐队	Sinfonieorchester	交响乐队
生风里诗	Symphonischen Dichtungen	交响诗
声音心理学	Tonpsychologie	音响心理学
《圣爱里沙白提故事》	Die Legende von der heiligen Elisabeth	《圣伊丽莎白传奇》
圣歌拔舍勇	Choralpassion	众赞歌受难曲
圣商	Saint-Saëns	圣一桑
圣诗①	Psalmen	诗篇歌
圣诗②	Choral	众赞歌
《圣诗引子》	Choralvorspiel	《众赞歌前奏曲》
诗歌式的乐谱	Liedform	艺术歌曲形式
诗歌音乐	Liedkomposition	艺术歌曲作品
诗剧①	Liederspiel	利德剧或田园剧
诗剧②	Ballad-Opera	民谣歌剧
诗乐	Lied	（德文）艺术歌曲
诗料音乐、命题音乐	Programm Musik	标题音乐
施统胡	Karl Stumpf	卡尔·施通普夫
施拖波	Strabo	斯特雷波
十二阶	Duodezime	十二度
十二律旋相为宫	Transponieren	转调
《十二平均律之钢琴》	Das Wohltemperierte Klavier	《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
十六阶	Doppeloktave	十六度
史卜	Spohr	施波尔
史卜拿	A. Spagna	A·斯帕格纳
史客拉体	A. Scarlatti	A·斯卡拉蒂
史朋体里、史卜体里	Spontini	斯蓬蒂尼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史特老司①	Richard Strauss	理查·施特劳斯
史特老司②	Johann Strauss	约翰·施特劳斯
史特米迟	J. Stamitz	J·施塔米兹
史特闻斯齐	Strawinsky	斯特拉文斯基
史推抵哇里	Stradivari	斯特拉底瓦里
手弹	Pizzicato	拨奏
手拉风琴	Ziehharmonika	手风琴
手琴	Leier	里尔琴
手摇风琴	Regal	小型管风琴
舒怡塔、舒怡台	Suite	组曲
水风琴	Wasserorgel	水压管风琴
丝弦乐队音乐	Streichorchester	弦乐乐队
司皮乃提	Spinett	斯皮耐琴
司台阿克乃斯	Eteokles	厄忒俄克勒斯
司特方鲁斯	Stephanus	斯提反
斯宾塞尔	Herbert Spencer	斯宾塞
《死神与解脱》	Tod und Verklärung	《死与净化》
四阶	Quarte	四度
四人合奏曲	Quartett	四重奏、四重唱
四人丝弦合奏曲	Streichquartett	弦乐四重奏
《四时》	Die Jahreszeiten	《四季》
四音组	Tetrachord	四音列
苏佛克乃	Sophokles	索福克勒斯
苏沙绒	Susarion	苏萨昂
所里罗昆吞	Soliloquenten	个人吟诵段
琐那台、琐娜台	Sonata、Sonate	奏鸣曲
塔耳辞	Terz	第三课
台乃斯阿时	Teiresias	泰瑞西阿斯
特别弥撒	Proprium Missae	专用弥撒
特耳	J. Theile	J·泰莱
特耳彭达	Terpander	泰尔潘德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特那肯	Thrakien	色雷斯
特斯皮	Thespis	泰斯庇斯
腾所	Tenso、Partimen	辩论歌
提宝①	F. J. Thibaut	安东·弗里德尼希·尤斯图斯·蒂博
提宝②	Thibaut von Navarra	蒂博·冯·纳瓦拉
提琴钥	Violinschlussel	高音谱号
《天使》	Der Messias	《弥赛亚》
天羊	Agnus dei	羔羊经
跳舞舒怡塔	Tanzsuite	舞蹈组曲
跳舞音乐	Tanzmusik	舞曲
听音器	Resonatoren	共鸣器、共振器
通常弥撒	Ordinarium Missae	常规弥撒
突后式	Trochaus	扬抑格
土巴堵儿	Troubadour	特罗巴杜尔（游吟诗人）
土耳巴	Turba	众唱段
土马	Thomas	托玛
土乃里	Torelli	托雷利
吐乃法郎喀	Fausto Torefranca	特雷弗兰卡
脱费儿	Trouveres	特罗维尔（游吟诗人）
妥克塔	Toccata	托卡塔
瓦尔察舞乐	Walzer	圆舞曲
瓦庚来大洋号	Wagner Tuba	瓦格纳大号
瓦纳斯	Wallace	华莱士
《挽歌》	Requiem	《安魂曲》
威廉谬南	Wilhelm Müller	威廉·缪勒
威马	Weimar	魏玛
维推	Philippe de Vitry	菲利普·德·维特里
伪乐	Musica ficta	伪音
尾声	Kadenzen	终止式、收束、华彩乐段
魏伯耳、魏伯尔	Weber	韦伯
魏克买斯得	Werckmeister	韦克迈斯特尔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魏那耳	Willaert	维拉尔特
《我欲乘风翼》	Auf Flügeln des Gesanges	《乘着歌声的翅膀》
卧琴①	Psalterium	索尔特里琴
卧琴②	Zither	齐特尔琴
乌里尔	Uriel	尤利尔
屋独	Odo von Clugny	奥多
屋非里阿	Ophelia	奥非莉娅
无主乐	Atonale Musik	无调性音乐
无主音	atonal	无调性
《无字之诗》	Die Lieder ohne Worte	《无词歌》
吴尔湖	Wolf	沃尔夫
五阶	Quinte	五度
五人合奏曲	Quintett	五重奏
五人丝弦合奏曲	Streichquintett	弦乐五重奏
五音之乐调	Dominant Tonart	属调
《五月一日之前夕》	Walpurgisnacht	《五旬节首夜》
《午后孔雀》	Prélude à l'Après-midi d'un Faune	《牧神午后前奏曲》
希腊古代歌谱	Pindar-ode	平达颂歌
喜剧	Satyrspiel	滑稽剧
下都耳	Hypodorisch	副多利亚调式
下法里格	Hypophrygisch	副弗里几亚调式
下里底	Hypolydisch	副利第亚调式
下五音	Unter Dominante	下属音
下五音谐和	Subdominante	下属和弦
夏得冷	Le Chatelain de Coucy	沙特兰
夏可夫斯基	Tschaikowsky	柴科夫斯基
夏买	Schalmei	肖姆双簧管
《夏夜之梦》	Sommernachtstraum	《仲夏夜之梦》
仙灵	Schering	舍林
小风琴	Positiven	小型管风琴
小乐队	Concertino	主奏部、小协奏曲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小琐那台	Sonatine	小奏鸣曲
协和音阶	Konsonanz	协和音程
斜诵	Chanson	尚松
谐和	Akkord	和弦
谐和学	Harmonielehre	和声学
写实主义	Verismo	真实主义
谢履登	Schroder	施罗德
新乐	Ars nova	新艺术
信号	Signalhorn	步号
信仰、克乃	Credo	信经
《匈牙利狂歌》	Ungarische Rhapsodien	《匈牙利狂想曲》
许伯堤	Schubert	舒伯特
叙里亚	Syrien	叙利亚
叙情诗	Lyrik	抒情诗
薛迟	Schutz	许茨
薛满	Schumann	舒曼
薛时买儿	Süssmayr	苏斯迈尔
雪盆、曲冰	Chopin	肖邦
荀白格	Schönberg	勋伯格
循环谱	Rondoform	回旋曲式
亚里斯多法乃	Aristophanes	阿里斯托芬
亚里斯多克深罗斯	Aristoxenos	亚里斯多塞诺斯
亚里斯体德昆体里阿罗	Aristides Quintilianus	昆体良
亚西里亚	Assyrien	亚述
延余之音	Vorhalt	延留音
演奏之康处乃	Canzoni da sonar	用乐器演奏的坎佐纳
宴会短歌	Skolion	酒歌
扬波式	Jambus	抑扬格
阳调	Dur	大调
洋笛	Flöte、Flüte	长笛
洋号角	Horn、Hörner	圆号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洋喇叭	Trompete	小号
洋琵琶	Laute	琉特
洋唢喇	Oboe	双簧管
洋箫	Klarinette	单簧管
耶克浦	Jacopo di Bologna	博洛尼亚的雅各布
耶稣被难记	Passion	受难曲
《耶稣圣诞法曲》	Weihnachtsoratorium	《圣诞节清唱剧》
《野寂》	Feldeinsamkeit	《寂寞的夏日原野》
野角	Waldhorn	猎号
夜乐①	Ständchen、Serenade	小夜曲
夜乐②	Nocturne	夜曲
《夜乐》	Serenade	《弦乐小夜曲》
一段谱	Einteilige Liedform	一段式
依时买乃	Ismene	伊斯墨涅
阴调	Moll	小调
音乐诗人	Dichterkomponist	诗人作曲家
音推以土	Introitus	进台经
音学	Akustik	声学
音之交叉	Kreuzen der Stimmen	声部交叉
吟诵	Recitativ	宣叙调
吟诵式	Stile recitativo	宣叙调风格
引子	Praeludium、Präludium	前奏曲
《英国舒怡台》	Englische Suiten	《英国组曲》
《英雄生活》	Ein Heldenleben	《英雄生涯》
《英雄怨歌》	Heldenklage	《英雄的葬礼》
由强渐弱	Decrescendo	渐弱
由弱渐强	Crescendo	渐强
犹太上帝	Jehova	耶和华
邮号	Posthorn	驿号
《游意所见》	Aus Italien	交响幻想曲《意大利》
有伴的吟诵	Recitativo accompagnato	带伴奏的宣叙调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余响	Nachhall	回声、余音
余音、高声	Oberton、Overtone	泛音
《宇宙之歌》	Das Lied von der Erde	《大地之歌》
语歌	Sprechsing	朗诵唱
乐队	Orchester	管弦乐队
乐队舒怡台	Orchestersuite	管弦乐组曲
乐队音乐	Orchesterstück	管弦乐
乐工	Jongleurs	戎格勒、流浪艺人
乐曲、法曲	Oratorium	清唱剧
约底谱斯	Ödipus	俄狄浦斯
约翰	Johannes de Florentia	佛罗伦萨的约翰尼斯
《约翰所述之被难记》	Johannes Passion	《约翰受难曲》
岳阿黑谟	Joachim	约阿希姆
再击、新引伸	Repercussio	吟诵音、再现部
赞美歌	Tedeum	感恩赞
輙斯体	Cesti	切斯蒂
《真福》	Les Béatitudes	《八福》
整音	Ganzton	全音
中洋号	Bügelhorn	布格号、次中音号
中奏	Zwischenspiel	间奏
主调	Melodie	旋律
主句	Thema	主题
主音、伴音分立音乐	Generalbass	通奏低音
主音音乐	Begleitete Monodie	主调音乐
著作	Op.	作品
转组	Mutation	唱名转移
庄剧	Opera seria、Ernste Oper	正歌剧
自然六音组	Hexachordum naturale	自然六声音阶
自由幻想	Phantasie	幻想曲
奏乐监督	Kapellmeister	乐监

表二　时政文化卷、中国近代外交史料译文卷常用名词中西文译名对照表

时政文化卷、中国近代外交史料译文卷编辑小组　编

【编辑说明】

一、本表所列出的词汇，均出自《王光祈文集·时政文化卷》和《王光祈文集·中国近代外交史料译文卷》所收录的专著及文论，为王光祈原著中的翻译与现今常见的翻译有较为明显差异的常用词汇，包括人名、地名和专有名词。

二、本表对上述两卷王光祈原文献中只有西文原文而无中文翻译，或只有中文翻译而无西文原文的词语，未予列入；两卷中王光祈原文的翻译在现今西文词典中无法查证的部分词汇，亦未予列入。

三、王光祈原文中，有将同一西文词语翻译为不同的汉语词汇的情况，例如：将“Bolshevik”翻译为“布尔扎维克”、“布尔斯维克”，我们在“王光祈译”一栏中将不同译文一并列出。

四、王光祈在著述中采用了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等西文语种，本表在尽量保持原文用语用词的原则下，对少数有明显错误的拼写径直做了改正。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阿老	Aarau	阿劳
阿润堤	K. Arendt	K. 阿伦特
爱德尔	Eitel	艾特尔
爱尔池摆改	Erzberger	埃茨贝格尔
爱脱尔利亚人	Etrusker	伊特鲁里亚人
爱西鲁斯	Aischylos	埃斯库罗斯
安村落鲁白	Anzengruber	安岑格鲁伯尔
安得生	Andersson	安德森
安那其主义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
安斯坦	Einstein	爱因斯坦
昂赫儿提	Anhalt	安哈尔特
奥大利	Austria	奥地利
巴敦	Baden	巴登
巴斯体羊	Bastian	巴斯蒂安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白克尔	Bernhard Becker	伯恩哈德·贝克尔
白郎德	Brandt	勃兰特
摆耳	Bern	伯尔尼
保尔	Bauer	鲍尔
波士尼亚	Bosnia	波斯尼亚
勃朗克	Planck	普兰克
薄浪运动	Brownsche Bewegung	布朗运动
布尔斯维克主义	Bolshevism	布尔什维克主义
布尔扎维克、布尔斯维克	Bolshevik (Bu'ershiweike)	布尔什维克
布坦	Bhutan	不丹
楚里徐	Zürich	苏黎世
德格鲁堤	De Groot	德格鲁特
丢尔	Dürer	丢勒
多费	Dover	多佛尔
法伯	Faber	法贝尔
法郎克	Phalange	法朗吉
法乃他格	Freytag	弗赖塔格
非力德里徐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
费卡	Lope de Vega	维加
佛尔德	Fulda	富尔达
佛兰克虎儿提	Frankfurt A. M.	法兰克福
佛郎克	Franke	弗兰卡
佛郎克	Frankfurt	法兰克福
格里波立	Gallipoli	加里波利
格里尔帕察	Grillparzer	格里尔帕策
格吕乃瓦德	Grunewald	格吕内瓦尔德
格罗斯	Grosse	格罗塞
苟廷根	Göttigen	哥廷根
果德西堤	Gottsched	戈特谢德
哈克满	Hackmann	哈克曼
海伯尔	Hebbel	黑贝尔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海登伯格	Heidelberg	海德堡
海尔打里	Lord Haldane	哈尔顿
海尔非里徐、海尔法里耶	Helfferich	黑尔费里希
海尔满	Herrmann	赫尔曼
何尔本	Holbein	霍尔拜因
何夫曼斯塔	Hofmannsthal	霍夫曼斯塔尔
赫士哥维拿	Herzegovina	黑塞哥维那
黑尔摩提	Helmholtz	黑尔姆霍尔茨
亨德颂	Henderson	亨德森
吉青纳	Kitchener	基奇纳
坚苦淡泊学派	Stoa	斯多噶派
君子人	Gentleman	先生、绅士
喀伯冷词	Gabelentz	加贝伦茨
喀笃	Gato	加托
喀尔德龙	Calderon	卡尔德龙
喀李乃	Galilei	伽利略
喀鲁	Caillaux	卡约
卡尔他果	Carthago	迦太基
凯色尔	Kaiser	凯撒
柯尔乃节	Corneille	高乃依
可林提式	Korinthisch	科林斯式
可鲁纳	Coronel	科罗内尔
克老舍	Krause	克劳斯
克乃斯堤	Kleist	克莱斯特
库伦	Urga	乌兰巴托
宽城子	Kuan-Cheng-tze	长春
廓尔喀	Gurkhas	尼泊尔
来比锡	Leipzig	莱比锡
老满	Neumann	诺伊曼赫尔曼
鲁德斯	Cecil Rhodes	塞西尔·罗德
鲁乃迟	Lorentz	洛仑兹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鲁斯堤	Rust	卢斯特
罗斯坦	Rostand	罗斯坦德
马波儿邪	Marburg	马尔堡
马格斯	Marx	马克思
马色多领	Mazedonien	马其顿
马斯拍罗	Maspéro	麦斯皮罗
麦寒	Mahan	马汉
梅德林	Maeterlinck	梅特林克
美术不达米	Mesopotamien	美索不达米亚
门兴、明星、闵星	München	慕尼黑
明可夫斯几	Minkowski	明可夫斯基
谬南	F. W. Müller	F·M·米勒
莫里哀尔	Molière	莫里哀
那森	Racine	拉辛
那提老	Rathenau	拉特瑙
纳辛、纳深	Lessing	莱辛
乃登	Leiden	莱顿
乃蒲扯邪	Leipzig	莱比锡
奈端	Newton	牛顿
欧里匹德斯	Euripides	欧里庇得斯
拍拉堤	Plath	亚普拉斯
弃宗弄赞	Song-tsen Gam-po	松赞干布
日诺瓦	Genua	热那亚
锐邪堤火粉	Richthofen	里希特霍芬
萨尔池堡	Salzburg	萨尔茨堡
沙里斯堡	Lord Salisbury	索尔兹伯里
莎士比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
史推德伯格	Strindberg	斯特林堡
史托斯	V. v. Strauss	V. v. 施特劳斯
斯喀该那	Skagerrak	斯卡格拉克
斯克兰	Skane	斯科纳

王光祈译	西文原文	常见今译
苏达门	Sudermann	苏德曼
犁悉笼腊赞	Ti-song De-tsen	墀松德赞
所买费儿提	Sommerfeld	索末菲
索夫克乃斯	Sophokles	索福克勒斯
琐非	Sofia	索非亚
琐买	Somme	索姆
太戈耳	Tagore	泰戈尔
唐车	Danzig	但择
体森	Thiessen	泰森
托梦斯基	Troski	托洛茨基
脱尔斯泰	Tolstoy	托尔斯泰
维得	Witte	维特
魏根来	Wegener	韦格纳
涡文	Robert Owen	罗伯特・欧文
乌尔模	Ulm	乌尔姆
西漠拉	Simla	西姆拉
喜来	Schiller	席勒
萧伯讷	Bernhard Shaw	萧伯纳
谢米提阿德	Schmidt-Ott	施密特-奥特
谢乃甘	Schlegel	施勒格尔
辛德莱	Schindler	辛德勒
星加坡、新嘉坡	Singapore	新加坡
薛冷堡	Schulenburg	舒伦堡
亚里斯妥方乃斯	Aristophanes	阿里斯托芬
依翁式	Ionisch	爱奥尼亚式
彝泰赞普可黎可足	Ral-pa-chan	墀足德赞
羽果	Hugo	雨果
约里	Julien	朱利安

后　记

《王光祈文集》经过时断时续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在2009年10月，四川音乐学院建院70周年大庆的日子里，由巴蜀书社出版面世了。

1984年6月，在成都举行了建国以来首次《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一致建议编辑出版《王光祈全集》或《王光祈文集》，认为这是对王光祈先生最好的也是最实际的纪念。会后，四川音乐学院成立了“王光祈研究课题组”，拟出了《王光祈文集》编选方案。当时确定共编选三卷：即音乐卷、历史译文卷、时政文化卷。每卷备选50万字，共计150万字。方案得到四川省教育厅的批准，并列为四川省古籍整理的重点项目，随即与巴蜀书社签订了出版合同。“音乐卷”编选校注工作由朱泽民、钟善祥、何福琼、俞抒、韩立文、毕兴等负责。“历史译文卷”由毕兴、韩立文、侯德础、马功成等负责。1988年这两卷编选工作先后完成。1992年，“音乐卷”由巴蜀书社正式出版，“历史译文卷”则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付印。由毕兴、韩立文负责编选的“时政文化卷”，也就拖下来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拖就拖了将近20年。其间，朱泽民、钟善祥教授已先后作古，其他几位教授，也都进入耄耋之年，须发斑白，垂垂老矣！

2008年，在学院党委书记柴永柏、院长敖昌群的鼎力支持和精心策划下，由学院科研处、音乐学系、社科部等部门的中青年教师及相关人员组成新的编辑组。大家精诚合作，全力以赴，使《王光祈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得以重新启动。考虑到上世纪80年代编选的历史局限性，编辑部重新确立了《文集》编辑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构架。

在对王光祈进行研究和编校《王光祈文集》的漫长过程中，我们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许多老领导、老专家、老学者的深切关怀和大力支持。

2005年5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偕同夫人章素贞专程来四川音乐学院视察。岚清同志在川音视察期间，虽然日程紧张、时间有限，但仍特意到坐落于川音校园内的“王光祈纪念碑亭”参观拜谒，在王光祈铜像前留影，以表达对王光祈的由衷敬意。2008年5月，岚清同志又在百忙之中专门撰写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学的开拓者——王光祈》一文，刊载于川音学报《音乐探索》2008年第2期，并特意篆刻“以乐为学”的印章一枚，以作纪念。此次《王光祈文集》的编辑出版，再次得到了岚清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当得知本文集拟采用其专稿代作总序时，岚清同志欣然同意。对此，我们尤感荣幸之至，特向岚清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谢忱！

原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老教育家张秀熟和王光祈是同时代人，学生时代深受王光祈的影响，对王光祈受到不公正的历史评价，深感痛心。1992年，《王光祈文集》音乐卷的出版是和他的支持分不开的。

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同志，不仅为“王光祈碑亭”题写匾额，同时还为1992年出版的《王光祈文集》（音乐卷）题签书名。几次“王光祈研究学术讨论会”，他均详为谋划，具体指导，因而会议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原天津音乐学院老院长缪天瑞先生，几次来信，言词恳恳，称王光祈是他学音乐时未曾见面的老师。缪老与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黄翔鹏先生都曾反复建议编辑出版《王光祈文集》或《王光祈全集》。原中央音乐学院老教授廖辅叔先生，对川音“王光祈研究活动”的开展甚为关注，虽年事已高，仍尽心相助，热心诚挚，令人感动。

此外，原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冯光钰教授，中央音乐学院冯文慈教授、俞玉姿教授，上海音乐学院陈聆群教授、王勇博士等专家学者都对《王光祈文集》的编辑指导思想、框架结构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对他们的关心和支持，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还需要说明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王光祈研究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受到王光祈家乡——温江人民的热情支持。温江的历届领导和四川音乐学院积极合作，《王光祈文集》的出版，是我们共同合作的结果。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巴蜀书社的领导和有关编校人员，没有他们在盛夏酷暑的拼命工作，这套书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和大家见面的。

由于编者的水平和其他原因，书中难免存在不足，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王光祈文集》编辑委员会

2009年9月